欧亚备要

党项西夏史探微

汤开建 著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0459-3
9 787100 104593 >
定价：126.00元

党项西夏史探微

汤开建 著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项西夏史探微 / 汤开建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0459－3

Ⅰ. ①党… Ⅱ. ①汤… Ⅲ. ①羌（古族名）－民族历史－中国－文集②中国历史－西夏－文集 Ⅳ. ①K289-53 ②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712号

党项西夏史探微

汤开建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459－3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 1/4

定价：126.00元



1981 年中国第一届西夏研究学术会在银川召开，后排左起第 13 人为作者

简体版前言

《党项西夏史探微》于2005年经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启庆先生推荐，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海外汉学界。正如原书推介者所言：该书收录作者二十余年来研究党项西夏论文二十余篇，针对党项源流、党项部落分布与迁徙、党项姓氏、党项风俗、西夏军事制度、宋夏战争、金夏关系、西夏文化及元代西夏遗民诸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本书最大的特点，即是史料搜集极为繁富齐全，包括正史、杂史、方志、笔记、文集、小说、金石、类书、画谱及各种已翻译的藏文、蒙文、突厥文、回纥文、西夏文资料，特别是对党项西夏史考古材料的搜集与使用。可以说，宋元明清以降有关党项西夏史料基本网罗殆尽。作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他的党项西夏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为学界党项西夏史的研究开启了新方向。

然而，此书出版数年以来，内地研治西夏史、民族史学者多未见到此书，纷纷来函向余索求，而允晨文化出版公司亦称销售已罄。今蒙我国著名中亚史、西北史专家余太山教授相邀，决定在国内出简体字版，本人不胜感激，遂请人重新打字录入，并花数月时间校对。这一次出版，除个别文字修订及史料出处补齐外，又对其中部分内容增补了不少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最新的西夏文翻译资料及新寻觅的方志资料，还在版本、注释的校对中耗去不少精力，总之，简体字版不论是内容还是注释校勘又胜台湾版一筹。余以为，《党项西夏史探微》在内地的出版发行，势必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对党项西夏史研究将会有所推进，而且对目前尚方兴未艾的“西夏学”亦应有所裨益。余今日学术研究的重点虽然不在“西夏学”，但并不等于某些人就可以将余之西夏研究成就完全漠然置之，或讳莫如深。中国学术有很多恶

劣之风，前辈人辛辛苦苦从浩瀚的文献中挖掘出新史料，做出了新研究，有的后来者全盘接过，转换文字，有的则是全盘抄录，间作修补，即为己有，全然不提前人之存在，甚至连名字也不愿提及。此风在西夏史研究中并不少见。不认真学习、总结与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而是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与基础搭建起自己的学术象牙之塔而反将前人“置之度外”，这就是我国学术大发展中普遍出现的“怪现状”。此风不煞，中国之学术无望；此风不正，中国之学术只能是一片混沌。

学术的发展从来就是叠罗汉似的向上攀援，任何学者的学术成就一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高攀。余在党项西夏史研究中之所以有所发现，有所创见，就是站在王国维、顾颉刚、邓广铭、岑仲勉、王静如、石泰安、聂历山、姚薇元、陈述、杨志玖、蔡美彪、金宝祥、罗福颐、罗福苌、吴天墀、唐嘉弘、克恰诺夫、韩荫晟、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蔚、周伟洲、耿昇、聂鸿音、陈炳应等前辈或同辈学者的肩膀上取得的。虽然，余之研究与他们不同，且经常与上述学者商榷，甚至在观点及结论上与他们截然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他们在西夏学领域中的前期研究，就不可能有余后来之成就。这是学术史发展的逻辑链接，谁也无法超越。古人云：“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学界之恶风，当为明智者戒。

余治党项西夏史三十余年，其间虽有较多的时间移至南海，但对党项西夏史资料的搜集及研究从未中断，纵览以往之党项西夏史研究，一直在余脑中反复思索的问题实为一“头”一“尾”。“头”即是党项及拓跋氏的源流。对于这一问题，余确殚精竭虑，遍寻汉、藏、西夏各种考古材料，从东胡、羌藏两大民族系统的变迁着眼，指出了党项民族之本源为鲜卑，但进入羌中日久，而逐渐“羌化”。党项羌为鲜卑党项的流变，这应该是这一民族的历史事实。余几篇重头论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而且为党项源出鲜卑提出一系列具有坚实史料基础的证据链，余以为，这个问题讨论到今天，余已完成了全部文献及史料的考证与诠释。既指出了称党项为“羌”的缘由，又以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考证，证出党项实出于“鲜卑”。余以为，这应是确凿无疑的结论了。但令人不解的是，学术界大多仍坚持党项源出于“羌”这种既无多少史料为证，又无法对历史文献中各种党项源出“鲜卑”史料作出正确解释的观点，实在令人茫然。是一种学术偏见？还是一种人为

的因素？难解。原本就是一个十分简单清楚的鲜卑姓“拓跋”，硬要指陈为“羌”，难道其中还有其他“奥妙”？“尾”指的就是西夏遗民，西夏遗民的资料搜集是极为困难的，可以说，元以后的汉文史籍必须全部过目，特别是地方志。此外，各种文字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这又给资料的搜集带来更多的困难。余于1985年完成的《元代西夏人物表》，几经修订、增补，从屠寄、钱大昕的200余人，到余初稿的300余人，到现今增订到近500人，但仍有遗漏者，借今日补订之机，再稍加完善，可以反映其间的曲折艰辛。

总之，此次商务印书馆将余这部党项西夏史研究的专著在国内再版，让国内读者可以更方便地阅读到此书，亦能够对这一部著作给予准确的评判。生命有限，学海无涯，功过是非，任由评说。

汤开建

癸巳年仲春于澳门氹仔

序

西夏是中国近世史上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王朝。自元昊于公元 1038 年建国称帝，至 1227 年为蒙古所灭，立国近二百年。在当时的多元国际格局中，西夏的地位虽因时势变化而有所升沉，但始终是一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前期与北宋及辽朝相争峙，后期则与金朝及南宋相抗衡。其国祚仅略短于辽朝，而超过同时其他各国。西夏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全盛时代，其版图包括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大部分、陕西北部、青海东北及内蒙古一部分。境内各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此外尚有汉族、吐蕃、回鹘、吐谷浑及鞑靼等族。西夏广泛吸收汉族、吐蕃及西域文化，创造了自身的主体文化，而在政制、法律、佛教、儒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辉煌成就。

西夏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应与辽、金二朝相当，却长期受到学者的忽视，而西夏史研究更是中国近世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西夏史受到忽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元末右丞相脱脱修辽、宋、金三史，对三国各予正统，而以西夏为偏统，故西夏无专史，仅列入三史《夏国传》、《西夏外记》中，这些记载均甚简略，篇幅简短，不足以反映西夏历史的全貌。此后，史料大量流失，研究更难着手。

自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有少数学者搜集排比汉文史籍中有关西夏的史料，撰为专史数种，如吴广成《西夏书事》、张鉴《西夏纪事本末》等，这些专史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体例、观点往往甚为陈旧。20 世纪初年，由于西夏文文献的大量发现，国际间遂掀起一股“西夏学”的研究热潮。但是，西夏学前辈学者王静如先生以“西夏字学”一辞来称呼西夏研究，意即当时的西夏学主要是指西夏文字的研究与文献的整理，与历史研究并无直接

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夏研究在中国学者间兴起第二波的热潮，这一波热潮的兴起可能由于重大考古发现及大量文献资料的出版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陷，为西夏研究提供较前坚实的基础，也激励了甚多中青年学者投身研究团队。西夏学研究对象，不再止于语言文字与文物考古，政治、外交、社会、经济、文化史的研究，早已开启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本书著者汤开建教授即为1980年前后投身西夏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属于“文革”后复学知青的第一代。他于1978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为研究生，从李蔚教授治宋史，三年后毕业，同年调任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由于身处西北，对西北民族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西夏史更成为他研究的重点。1986年调任广州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在广州他的研究兴趣已有所改变，将重心转移至东南沿海。但对西夏史的研究并未停止，因而他从事西夏史研究前后已二十余年。

这本论文集是汤氏从所撰六十余篇中精选的二十一篇，分为三编：上编党项编收录论文九篇，皆是有关西夏王朝主体民族党项的族源、迁徙、姓氏、风俗之探讨，涵盖西夏建国前后党项族历史的各方面。中编西夏编收录论文八篇，重点在于西夏王朝的外交史及军事史，但亦旁及文化。下编遗民编收录论文四篇，皆有关蒙古灭夏后西夏遗民在元朝的人物、表现及相关文献。总之，这二十一篇论文，涵盖的时代甚长，不仅包括西夏本身的历史，亦探讨了其“前史”与“后史”。并牵涉到民族、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汤教授师法陈援庵（垣，1880—1971）先生。援庵先生是民国前期史料学派的大师。其治史方法最重要的两项是“竭泽而渔”的史料搜求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考证方法。不过，陈先生虽着重考证，却不以解决孤立之历史问题为满足，而系通过一连串疑难问题之考证，求得系统。汤教授此部论集沿袭了援庵先生考证史学的优点。

检视集中各文，正如著者自陈，“是在基本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层面上而进行的严肃学术研究”。著者之论述系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根据，除去一般西夏史研究者所着重的夏、宋、辽、金史料外，作者对元明史料、考古发现以及近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皆极熟谙，广肆征引。在广阔的史料基础上，

著者对所处理的课题皆经过严密的考证。确实做到“不讲无证之言，不下无据之论”。

由于西夏的史料零碎而分散，著者避免谈大而无当并缺史料佐证的问题（如西夏社会性质等），而着重对个别的重要课题（大如党项族源、宋夏战争、金宋关系，小如《西夏姓氏录》考订、监军司驻所等）作出具体的探讨。但是著者并不回避主流问题，勇于针对疑难与其前辈及同辈学者作学术上的论辩，并提出令人悦服的看法。如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过去学者或主张出于羌族，或认为源于鲜卑，本书著者则主张党项拓跋氏虽出自鲜卑，但史书中所说的“党项羌”是以鲜卑和羌人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共同体。拓跋鲜卑成为新民族共同体内的统治族群，共同体内的基础则是羌人。拓跋鲜卑虽贵为统治者，在生活与文化各方面却都逐渐羌化，故史书称之为羌，而不称之为鲜卑。这一主张超越了过去的单一起源说，是一种新鲜而合理的看法。又如《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一文认为党项部落的迁徙过程，亦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它就像滚雪球，最初的小球不过是一个纯粹羌民族共同体，不断向前滚动，越滚越大，鲜卑、突厥、吐谷浑、沙陀、吐蕃及寓居在西北地区西域诸胡的后裔都滚到这个雪球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掺和杂糅而逐渐浑然一体”，也是立足于实证之上的宏观论述。此外，关于党项姓氏及风俗、西夏军事制度、监军司、金夏关系、天文学等篇，在海内外党项西夏研究中既是最早的开路之作，采用新资料亦是最多，值得重视。

作为一个蒙元史研究者，多年以前，我阅读到本论文集遗民编中的几篇文章，即留有深刻印象。《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元代西夏人的历史贡献》都是根据大量史料对元代西夏遗民的地位及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作出了平允的评估。而《元代西夏人物表》则是将现存史料中元代西夏遗民的事迹列表呈现。在我看来，本书著者不仅是西夏遗民史研究的开拓者，而且所臻水平已高，其对元代史事与史料之熟谙不亚于元史学者。这几篇论文固为其西夏史研究的延伸，对元史研究亦具有甚大参考价值。

集中诸文大多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但著者已作过重大修正，并且纳入新发现的史料（如2001年出版的元季西夏遗民杨崇喜《述善集》），因而并无过时之虞。

总之，披阅汤著《党项西夏史探微》，所得印象为一学风谨严、取材广

阔而又富有创见之论文集。著者虽谦称本书为《探微》，实际含有不少宏观的见解。在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有关西夏的众多著作中，本书无疑为一优秀论著，不仅对西夏本身的历史及其前史和后史之了解皆大有裨益，而且对宋、辽、金、元学者亦颇富参考价值。基于本书的优越价值，我乐于向中外学者积极推介。

萧启庆

乙酉年春于台湾新竹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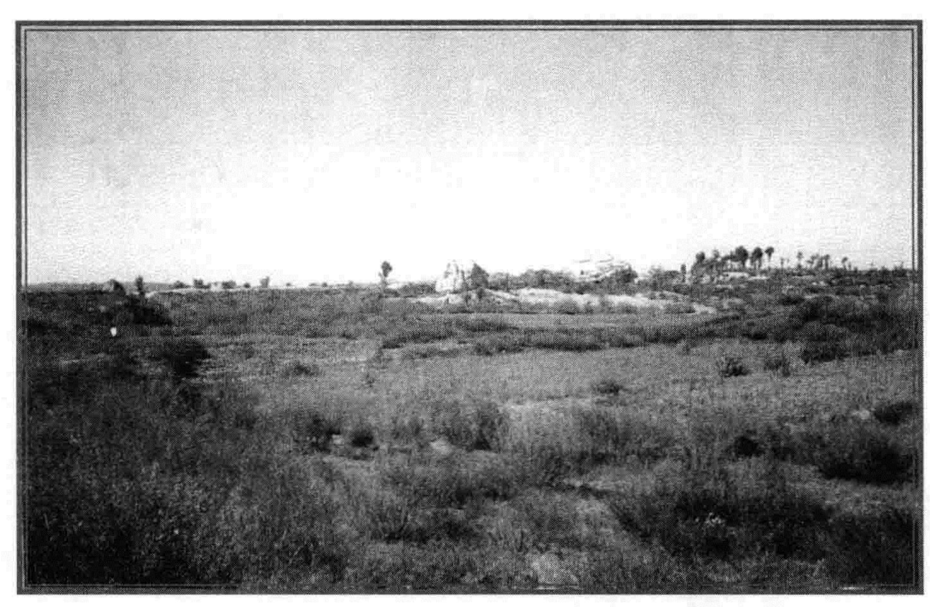
上编　党项编

中编　西夏编

下编　遗民编

上 编

党项编



党项拓跋部的发迹地夏州城遗址

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

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许多专家都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顾颉刚、杨志玖、吴天墀、王忠、李范文、唐嘉弘诸先生和一些海外学者各就自己的意见开展过一些争论，[①]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拓跋氏源出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拓跋氏与羌族同源，前者以吴天墀、唐嘉弘等为代表，后者则以杨志玖、李范文等为代表。时至今日，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似乎还未结束，要得出一个大家一致的结论，看来尚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一、党项拓跋氏与拓跋鲜卑的关系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拓跋氏与拓跋鲜卑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搞清的重要问题。据西夏人自述，西夏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与元魏同出，这在文献中有四条较明显的材料记载。

（一）《宋史·夏国传》载元昊上宋廷表云：

---

*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原名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收入此书时，对标题及内容略作修改。

①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2 期；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 年第 4 期；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0—11 页；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 5 期；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第 2 期；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75 年；林瑞翰：《西夏史》，载《边疆文化论集》，台北，1953 年；Е. И. Кычанов: Измененный и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а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р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1149—1169），Москва, 1988。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①

（二）《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记此表稍异：

臣祖宗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②

（三）《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一月夏使贺九言在赍宋嫚书中言：

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③

（四）《金史·西夏传》中保留的《夏国谱系》一书的序言也称：

元魏衰微，居松州因以旧姓为拓跋氏。④

这四条材料一致认为，党项拓跋氏是拓跋鲜卑之后，元魏的苗裔。但是，由于这些材料都出自西夏国人之口，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分歧意见。有些学者极力否认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西夏拓跋氏自称是元魏的后代，这完全是"冒认"，是"高攀元魏"，目的是为他们的统治贴金，为他们的门第夸耀。⑤有些学者却驳斥了这说法，他们认为，元昊的时代，已不是魏晋隋唐那种崇尚门阀的时代，元昊称帝自有他的实力作凭借，用不着冒认元魏王室作祖宗。⑥

反对"高攀"说、"冒认"说的是吴天墀先生和唐嘉弘先生。他们在党项拓跋氏族源上说出了许多理由，但反驳也有偏颇之处。因为，尽管元昊时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
④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⑥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0—11页；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代已不是门阀峻刻的时代，但在封建社会里，“名正言顺”却是一个永恒的观念。元昊一族原是宋朝之节镇，元昊要脱离宋朝而建立自己的国家，“为帝图皇”，不找出一些根据来就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完全有可能高攀与自己同姓的元魏王朝，有可能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元魏皇帝的后代，以取得自己称帝的合法性。嫚书中所言：“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①]是这种心情的真实表露。

坚持“冒认”、“高攀”说的是杨志玖先生和李范文先生。杨先生认为，元昊称自己出于元魏，而元昊之前的德明、继迁却从未提及，这就可说明是冒认。[②]这种反证法是很难成立的。德明、继迁时期虽时有背叛之举，但基本上对宋一直是纳贡称臣，并接受宋廷的封爵。既为臣属，即使有元魏之事，也是臣下犯讳之言，岂有四处张扬之理。况且，西夏史实见载于史册是百不存一，即使德明、继迁提出过元魏之事，现存史书完全有可能漏载。因此，德明、继迁不言元魏事，并不能证明元昊言元魏事就是“冒认”、“高攀”。李先生认为：“在历史上，大凡一个新的统治者，因受正统观念与阀阅门第思想的影响，他们及其使臣总要为其先世找一个高门世族高攀一番”。[③]对李先生这一看法难表苟同。我们承认历史上有许多“高攀”、“冒认”的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统治者都要找一个高门世族来“高攀”。刘邦当皇帝没有高攀，赵匡胤、耶律阿保机当皇帝也没有高攀。另外，高门世族者也不一定全是“高攀”，李唐称自己出于“陇西李氏”，大概可以认作“高攀”，刘玄德称自己出于“汉中山靖王之后”，难道也能说是“高攀”？不能因为历史上有“冒认”、“高攀”的事情，就对一切认高门世族为亲者一概采取不承认态度。要搞清党项拓跋氏与鲜卑拓跋的关系，既不能轻信党项拓跋氏的表述，也不能简单否定，而需要找出确凿根据。

首先，据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10《拓跋》载：

孝文帝迁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

② 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

③ 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①]

拓跋守寂是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泰之子，与乾晖、澄岘都是党项拓跋氏的成员。林宝称守寂为“东北蕃”，意即为鲜卑，而且前与孝文帝改姓元氏相连，可见，唐人林宝认为，党项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是同出一源的。

第二，据《辽史·西夏外记》载：

西夏，本魏拓跋氏也，其地则赫连国也。[②]

《辽史》成书于元，但元修《辽史》是在金人修《辽史》的基础上完成的，而金人两次修《辽史》都是以辽人耶律俨《实录》为依据，因此，辽《实录》实际上是今本《辽史》的基本骨架，辽《实录》的撰修者所处的时代与西夏是同时代，作为史官不仅应了解本国历史，对于自己的友好邻国西夏应该是很熟悉的，他们称西夏拓跋氏“本魏拓跋氏后”，绝不是攀附之辞，而是应有所本。

第三，据《宋史·宋琪传》及《长编》卷35同载：

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从银、夏至青、白两地，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③]

这里须注意的是对“拓跋”与“野利”二姓的不同称谓。宋琪称“拓跋”为“蕃姓”，而称“野利”则为“羌族之号”，明显将“蕃”和“羌”对立起来，视为两个不同民族的概念。“野利”是党项大姓，被称为“羌族之号”，这里宋琪明确指野利氏属羌，而对同属党项八部的拓跋氏却使用另一个不同称呼——“蕃姓”，而不用“羌姓”，可见对西北边事“熟于听闻”[④]的

---

①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10《拓跋》。

②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③ （元）脱脱：《宋史》卷264《宋琪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癸酉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264《宋琪传》。

宋琪的看法是有根据的。文献中将鲜卑称为“东北蕃”，将沙陀、契丹、回鹘等称为“北蕃”，将西域各族及吐蕃称之为“西蕃”，而对羌族一般不称“蕃”。宋琪有意识地区别羌、蕃，可见西夏拓跋氏不是羌族，应为鲜卑。

范仲淹《上仁宗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札子载：

> 议者皆谓，元昊，胡人也，无居中国之心，欲自尊于诸蕃尔。臣等谓，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之徒皆胡人也，并居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进据太原，后都西洛，皆汉人进谋诱而致之。[①]

范仲淹在此处将元昊称之为“胡人”，范仲淹还将元昊与“拓跋珪、石勒、刘聪”等人类比。在历史文献中一般都只将北方民族称之为“胡人”，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及西域各族，而羌族是不能称胡的。《晋书·苻坚载记》载苻坚斥姚苌语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②]可见，羌不能称胡是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故文献中多以“羌胡”二字并列。因此，从宋琪与范仲淹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党项拓跋氏不属于羌而属于“蕃”、“胡”中的鲜卑族。

第四，元人的记载虽复杂些，却更能说明问题。《元史·李恒传》载：

> 李恒，字德卿，其先姓于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夏国主。[③]

《吴文正公集》卷42《李世安墓志》又载：

> 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④]

---

①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边防门·辽夏》5引范仲淹《上仁宗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

② （唐）房玄龄：《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④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42《李世安墓志》。

李恒、李世安都是西夏王族拓跋氏的后代，元人追述他们的族属时称之为“于弥氏”、“于弥部人”。“于弥”是什么意思呢？据聂历山、王静如等人考证，“于弥”即“嵬名”异译；[①]“嵬名”，据多种宋代史料记载，乃元昊时改的西夏国姓，而据《元史·李恒传》，在“唐末赐姓李”之前，西夏先世就姓“嵬名（于弥）氏”，这在西夏文文献《夏圣根赞歌》中也可得到印证，《夏圣根赞歌》之原文译为：

母亲阿妈起族源，银色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②]

这可证明“嵬名”为西夏族最早之姓。那“嵬名”又作何解释呢？欧阳修《归田录》卷1云：

（宝元二年）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③]

其他宋代文献均言元昊改姓“嵬名”，欧阳修却言改姓“元氏”。欧阳修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关系到朝廷改年号的大事，应当是可信的，据此推断，“嵬名”一词应即是“元”之西夏语音。《元史·李恒传》与《夏圣根赞歌》中都称西夏先世为“嵬名（于弥）”，质言之，西夏先世也就是姓“元氏”，则元昊并非改姓，而是恢复旧姓。且《李世安墓志》言“于弥（嵬名）部”在贺兰山，据《太平寰宇记》卷36载：

贺兰山在县（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④]

似可证明，西夏拓跋氏确系出自元魏，源于拓跋鲜卑。元人去西夏亡国

---

① 聂历山：《关于西夏之国名》，载《西夏语文学》第1册；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辑。

② 《夏圣根赞歌》，为西夏文宫廷诗，译文转引自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③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又（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4引《泾阳图经》“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白草，……鲜卑等类多依山谷为氏族”。

不远，且西夏子弟均在，此说可信。

第五，明人记载虽有久远之嫌，然明代宁夏本土学者在《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文中的记载“夏本拓跋魏之后，流为党项别部”[1]颇为有力。查《拓跋夏考证》一文，实出明孝宗弘治年间宁夏地官郎中胡汝砺之手。胡氏不仅“博学多识”，且谙熟地方掌故。他修《宁夏新志》时：

考经史，参旧志，询之稗官故老，采以金石之文，百家之说。古今事有关地方者，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收录无遗。[2]

胡汝砺为明弘治时人，上距西夏亡国虽有二百五十余年，但宁夏地方流传的西夏文献、故事、金石及遗存的史迹还不少，认为“夏本拓跋魏之后”，应该是可信的；尤其认为“流为党项别部”是颇为精当的考证，而非抄录前史。另外《嘉靖宁夏新志》卷3《所属各地》中《安塞王樗斋记》载：

粤惟灵武，地迩荒服，鲜卑衣裔，耕牧其俗。[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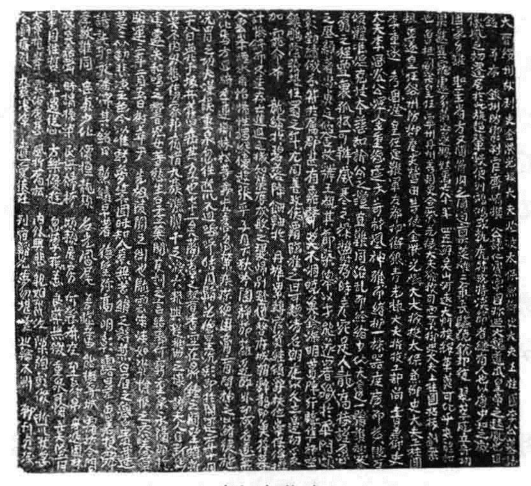
宁夏、灵武，俱为西夏旧地，明代宁夏人视西夏旧地上生活的民族是鲜卑后代，这是西夏拓跋氏源出于拓跋鲜卑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更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出土与发现的一批又一批考古资料不断证实上述观点的正确。1996年发现榆林地区出土的后晋开运三年（946）《李仁宝墓志铭》称：

公讳仁宝，字国珍，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也。[4]

李仁宝即唐中期迁入银、夏州地区拓跋部的一支，与李仁福为同辈兄弟，在夏州定难军政权中任绥州刺史。此处称仁宝“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即言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与元魏同出。后晋时的李仁宝没有必要去

① （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
② （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之《宁夏新志序》。
③ （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3《所属各地》。
④ 《李仁宝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51—252页。



李仁宝墓碑

冒认元魏之裔吧！2002年公布的《李彝谨墓志铭》称：

公讳彝谨，字令谦，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苹系焉。[①]

李彝谨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子，亦为党项拓跋氏迁入银夏地区的一支。墓志还称：

昔后魏威振朔陲，声扬诸夏。……故得家留余绪，代不乏贤。[②]

进一步声称自己家族来自于元魏，是为鲜卑。稍后公布的《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亦称：

（公）本后魏之华宙（胄），朔野之大族。[③]

李光睿为李彝殷之子，李彝谨之侄，亦称其为元魏之后，鲜卑之裔。

①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及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384页，2002年。

②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及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384页，2002年。

③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载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西夏学》第1辑，第81—86页，2006年10月。

2002年公布的另一通党项拓跋氏《李继筠墓志铭》称：

公本后魏之苗裔也，峻址长源，绵历代祀。匡时济俗，继有其人。[①]

墓志之赞又称：

后魏华族，浚源巨渎。英杰诞生，何人敢躅。[②]

四通新发现元昊家族先祖的拓跋氏墓碑异常一致地显示，众口一辞地申明：党项拓跋氏源出元魏，为鲜卑人的后代。这就清楚地说明，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拓跋氏称自己出自元魏之后为鲜卑拓跋并非创自元昊，而是党项拓跋氏长期以来对自己祖先族源的追认。

上面，我们援引了唐、辽、宋、元、明五个朝代及现代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拓跋氏确实是源出拓跋鲜卑，他们自称元魏的后代，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冒认”。根据现有材料虽不能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代，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同出一族应属可信。

元人胡三省对党项拓跋氏源出元魏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说：

元魏之拓跋氏起于代北，党项之拓跋氏起于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项拓跋之后也。宝元、康定之间，凭陵中国，嫚书狎至，使其出于元魏，亦必张大而言之，而未尝语及者，非其所自出也。[③]

首先，他这一段考证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宝元、康定间，元昊给宋朝的嫚书中多次傲慢宣称自己“本出帝胄”，为元魏帝之后代，胡三省却说“未尝语及者”。可见，胡三省当时并未详看宋历朝国史，也未参考李焘的《长编》，故误出此言。其次，胡三省仅凭元魏与西夏之地域差异，就断言元

①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及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386页，2002年。

②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及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387页，2002年。

③ （元）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10。

魏拓跋与西夏拓跋不是一族，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绝不会由于"代北"与"西陲"的差异而隔绝，匈奴、吐谷浑、回鹘西迁的历史事例还少吗？胡三省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轻下结论是完全不可取的，党项拓跋氏源出于拓跋鲜卑拥有的史料依据是充分的，完全可以相信。正因为如此，宋王朝当然不愿让西夏更多地了解元魏的历史，所以，当元昊遣使到宋"求市史传及佛经"时，宋"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止与佛经而归"。[①]不敢让西夏了解元魏的历史，这正是宋王朝心虚的表现，这种心虚，又恰恰可反证西夏拓跋氏的确与元魏有关，否则，宋又何惧西夏了解"东晋、元魏间事"呢？

二、拓跋鲜卑流进羌部落的过程

前已论证党项拓跋氏为拓跋鲜卑之后。然而，从新、旧《唐书》及新、旧《五代史》和《宋史·党项传》的记载来看，党项拓跋氏为党项族中极为重要的一支。这一支拓跋氏是怎样流进党项部落中来的？是怎样"流为党项别部"的？如果将历史文献中残存的蛛丝马迹联系起来考察，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出原居于河套、阴山的拓跋鲜卑流进党项部落的过程。

吴天墀先生在谈到拓跋氏之所以入居羌中的原因时说：

> 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谈到，魏孝文帝厉行汉化，曾遭到同族人的反对，有许多人逃回代北或流徙远方，"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所以，拓跋氏之人居羌中不足引为怪异。[②]

我们认为，邓名世的这一段材料并不能证明鲜卑拓跋氏来到了川北、甘南的党项部落中。如前所见，魏孝文帝厉行汉化后，拓跋王朝中的反对派主要是逃回代北或向北方草原流散。但所谓"散在夷狄"，是指流散在北方草原上的拓跋氏，如《元史·按扎儿传》中的"拓跋按扎儿"。[③]他们不可能从

---

① （宋）范纯仁：《宋故朝议大夫致仁王公墓志铭》，现藏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转引自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该氏《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0页。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2《按扎儿传》。

洛阳西行，穿过一大片北魏腹里地区而向川北、甘南流散。实际上，鲜卑拓跋氏进入羌中要远远早于孝文帝，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即魏圣武帝诘汾之时，拓跋鲜卑就开始进入羌人地区。

拓跋鲜卑原居于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严格地说，这一时期还只能称鲜卑而不能称拓跋，因为拓跋鲜卑是鲜卑与匈奴融合以后的产物。公元1世纪时，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拓跋鲜卑乘匈奴势力转衰之机开始南下，大约迁到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又经过大约一个多世纪的辗转迁徙，到拓跋鲜卑第二推寅时，经过许多“山谷高深、九难八阻”[①]才来到“匈奴之故地”，即今河套、阴山一带定居。在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但是，其中有一支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就迁到河西地区，这就是被称为“秃发氏”的“河西鲜卑”。马长寿先生说：

> 拓跋鲜卑，正确地说，应该包括北魏建国以前的拓跋部，建国之后的拓跋魏，还有南凉的秃发部，一称河西鲜卑等等。[②]

马长寿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元和姓纂》卷10《秃发》条载：

> 秃发，河西鲜卑也，与后魏同出。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神元时率其部众徙河西，六代孙树机能立，尽有凉州之地。[③]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及《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亦载：

>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④]

---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1《序纪》。

②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7页。

③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10《秃发》。

④ （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之《南凉录》卷1《秃发乌孤》;（唐）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秃发乌孤的八世祖匹孤是魏圣武帝诘汾的长子，可证，秃发鲜卑实际上就是拓跋鲜卑，秃发为拓跋之音转。《隋书·经籍志》中有《拓跋凉录》10卷，所记即南凉史事，[①]可见，南凉主虽称“秃发”，实际中原人士仍视之为“拓跋”。崔鸿及《晋书》、《魏书》的作者之所以分“拓跋”、“秃发”二氏，实意在区别元魏与南凉之主也。

上证如不诬，则可知，在公元3世纪中期，在秃发匹孤的率领下，有一支拓跋鲜卑进入了河西地区，尔后，建立了南凉政权。秃发鲜卑当时的居地是“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②]大约相当于今甘肃东北一部分，青海东部一部分，到南凉秃发傉檀时，“其地东自金城，西至青海，南有河湟，北至广武”，[③]相当今兰州至青海湖附近一大片土地。这些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羌人的居地，这是拓跋鲜卑进入羌中的明确记载。

公元414年，西秦灭南凉，秃发（拓跋）鲜卑分为二支：秃发傉檀率领一支投降西秦；秃发樊尼率领一支投奔北凉，这二支秃发（拓跋）鲜卑又先后归入吐谷浑政权。

先看秃发傉檀一支。在西秦灭南凉时被并入西秦。西秦领地“西逾浩门，东极陇抵，北距河，南略吐谷浑”。[④]到吐谷浑汗慕璝时，陇西、金城、枹罕三郡之地全被吐谷浑占领，西秦、南凉的大部分土地都并入吐谷浑。[⑤]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原投降西秦的南凉秃发（拓跋）鲜卑必有一部分归附于吐谷浑，而进入吐谷浑的部落中。如后言之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即应是遗留下来的拓跋（秃发）鲜卑。另一支秃发（拓跋）鲜卑在秃发樊尼率领下，投奔了沮渠蒙逊的北凉，北魏灭北凉后，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 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⑥]

---

① （唐）魏征：《隋书》卷33《经籍志》2。
② （唐）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3。
④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3。
⑤ （唐）李延寿：《北史》卷96《吐谷浑传》：“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彼（指慕璝）自取之”。
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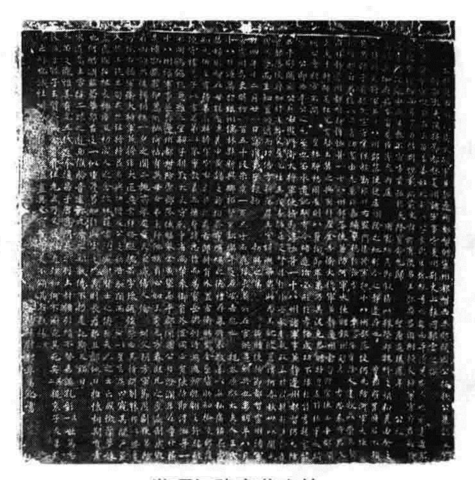
《旧唐书》认为，秃发樊尼西迁后，在羌中建立的国家即吐蕃。关于吐蕃源于秃发鲜卑之说早已为藏族史家们否定，就连《新唐书·吐蕃传》的作者也没有采用此说。《新唐书·吐蕃传》载：

> 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①]

樊尼建吐蕃国之说虽不能成立，但樊尼率秃发（拓跋）部徙居黄河、积石山以西的羌人地区却是事实，而黄河、积石山以西的地方是吐谷浑的主要居地。可见，秃发樊尼这一支鲜卑也进入吐谷浑部落之中。

吐谷浑的统治者是从辽东西迁过来的慕容鲜卑部，它们与拓跋鲜卑有着很近的血亲关系。因此，秃发（拓跋）鲜卑进入吐谷浑后，在这个游牧行国中享有较高的地位。《隋书·吐谷浑传》与《北史·吐谷浑传》都有"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的记载，《资治通鉴》作"裨王"。[②]《拓跋寂墓志铭》称：

> 公讳寂，字守寂。……世雄西平，……载炳前史，详于有隋。名王



党项拓跋寂墓志铭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② （唐）魏征：《隋书》卷83《吐谷浑传》；（唐）李延寿：《北史》卷96《吐谷浑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6《陈纪》10。唐代夏州拓跋思恭、拓跋守寂一支即出自"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

弥府君洎附，授大将军，宁府君矣，时逢季代……[①]

此“名王弥府君”当即“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正因为拓跋氏为鲜卑，故在鲜卑、吐谷浑中能位居“名王”，这既可反映拓跋鲜卑在吐谷浑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又可证明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之密切关系。否则，吐谷浑是不会对拓跋氏以“名王”或“裨王”相称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隋书·党项传》与《北史·党项传》都记有：

（开皇五年）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②]

这是首次明确将“拓跋氏”列入党项羌中的记载。党项之名，虽始见于《隋书》，但党项活动，则早见于魏、周之际。然而，这一时期的党项族名虽已出现，但它似乎还未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政权。虽然《隋书》与《北史》都并列《吐谷浑传》和《党项传》，但党项似乎还是隶属于吐谷浑的一个部落，这从党项的居地可以得到证明。《北史·党项传》记载党项居地时说：

（党项）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③]

而《北史·吐谷浑传》却载：

（吐谷浑）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④]

党项、吐谷浑领地的东西所至，都是东以西平为界，西进入了今天的新

---

①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

②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唐）李延寿：《北史》卷96《党项传》。前引《拓跋寂墓志铭》称：“名王弥府君洎附，授大将军，宁府君矣，时逢季代……”此“弥府君”为拓跋木弥，则“宁府君”当即为“拓跋宁丛”。

③ （唐）李延寿：《北史》卷96《党项传》。

④ （唐）李延寿：《北史》卷96《吐谷浑传》。

疆。很明显，文献中记载的吐谷浑与党项境地是同一个地方。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党项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它还只能算作吐谷浑政权内的一个部落。所以，这一时期的党项各部还寓居于吐谷浑国境之中。从《隋书·党项传》中“拓跋宁丛”名字出现，才清楚告诉我们，被称作“党项羌”的拓跋部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至隋末，随着隋王朝对西边的开拓而于青海湖边设立西海郡，吐谷浑遭到了重大的冲击，一度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吐谷浑故地。在吐谷浑遭到重创之际，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诸部向东迁徙，并吸收了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开始脱离吐谷浑的统治，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正如《旧唐书·党项传》所载：

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为强族。[①]

这时，吐谷浑虽然趁隋末之乱又重返青海湖驻牧，但党项之境土与吐谷浑之境土已截然分开。《新唐书·党项传》说，党项之地“北连吐谷浑”。[②]可见，原寓居于吐谷浑境内的党项已从吐谷浑的境地完全分离出来。

唐朝初年，吐谷浑与党项虽然已形成两个各自为政的政治实体，但是，党项拓跋氏与吐谷浑统治者的密切关系，仍然可以见之于《旧唐书·党项传》的记载：“有羌酋拓跋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③]这里说明两点：一是党项拓跋氏原是吐谷浑的臣属，这里所说的“臣属”，是指党项部落从吐谷浑部分离出来之前的事；二是吐谷浑慕容氏与党项拓跋氏至唐初还保持着联姻关系。不仅如此，当唐王朝派军队进攻吐谷浑时，拓跋赤辞还主动率领部族“屯狼坡道以抗官军”，当唐王朝遣使劝降时，赤辞还说：“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④]这种种密切关系，都可以从侧面证明党项拓跋氏应来自吐谷浑拓跋氏。前引新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发现的《拓跋寂墓志铭》更可证明，世居银川的党项拓跋部之拓跋思恭、拓跋守寂即出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一系，直接证明了党项拓跋氏来自吐谷浑拓跋氏，即来自鲜卑。最明确的证据是《册府元龟》卷 967 载：

西北吐谷浑……贞元十四年，以朔方军节度副使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跋勒豆可汗。未几卒，其封遂绝。唐末有赫连铎、拓跋思恭，后唐有白承福、念公山、薛粪堆。[①]

赫连铎、白承福、念公山等都是吐谷浑族人，拓跋思恭当亦出自吐谷浑，后为平夏党项部的首领，西夏之先世，这条材料与《新五代史·吐谷浑传》所载"唐至德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唐处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跋、赫连等族"[②]相合，这就十分有力地证明，西夏拓跋氏源出于吐谷浑拓跋氏。唐至德以后，吐谷浑部族中并未见"拓跋"一族，这个"拓跋"应指党项之拓跋，与《册府元龟》所言"拓跋思恭"当为同指。因此，我们认为将西夏拓跋氏看作吐谷浑拓跋氏之外流是有充分理由的。稍后，在吐蕃出现的拓跋怀光，在凉州出现的拓跋承谦，[③]都有可能是吐谷浑拓跋氏的后裔。至此，我们可以总结拓跋鲜卑流进羌部落的全过程：鲜卑（大鲜卑山）→拓跋鲜卑（河套、阴山）→秃发南凉（河西）→吐谷浑（青海湖西）→党项羌（川北、甘南）→西夏。

三、党项拓跋氏与羌族的关系

前面阐明了拓跋鲜卑流进羌部落的全过程，这一支拓跋鲜卑进入羌部落后，成为文献记载中的党项拓跋氏，它们与羌族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本节必须弄清的问题，否则就无法驳议党项拓跋氏源出羌族的论见。提出党项拓跋氏与羌族同源论见的主要依据是，文献中不乏党项拓跋氏属于"党项羌"

---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967《外臣部·继袭》2。

②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4《吐谷浑传》。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48《唐纪》6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 138《吐蕃传》。

的记载。有些文献甚至直接称拓跋氏首领为“羌酋”。[①] 如何看待这些记载和论见呢？

首先“党项”一族，绝非一个纯粹的民族共同体，它至少是融合了鲜卑与羌两个民族以上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唐中叶后居住在河东、河西、陇右地区的匈奴、突厥、回鹘、沙陀、吐浑、鞑靼等族残部与党项族混居。随着党项日渐强大，就像早年匈奴一样，“余种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②]它们遂亦以党项为名号，致使唐末五代时党项势力急剧膨胀，而出现了一个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文献中称之为“杂虏”或“杂种”。例如，《文苑英华》卷 370 记载：

> 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③]

又《樊川文集》卷 15 也说：

> 伏以党（项）羌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④]

党项族民族成分的混杂，这从党项族的部落、姓氏中也能找到充分的根据。例一，折氏。据《新五代史·党项传》载折氏为党项之大姓。[⑤]查《折克行神道碑》：

> 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⑥]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有羌酋拓跋赤辞者。”（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元昊初叛命，……时张士逊、章得象当相柄，陈执中、张观辈、筦枢极皆谓:小羌不足忧……”（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65《百官门·帅臣》引余靖疏:“臣观贼昊，虽同小羌”。（宋）郑獬:《郧溪集》卷 13《策问》:“羌人方殁，其弱子未能为国（此处指元昊刚死，其遗腹子谅祚）”。可见唐宋时期，中原汉人多认为拓跋氏是“羌”。这是一点都不应该奇怪的。因为拓跋氏是党项八部之一，人们一般都认为党项来自西陲，本为古羌之地，故以党项为羌。既然党项为羌，则党项八部之一亦当为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切均源自对“党项”的认识。

② （晋）陈寿：《三国志》卷 30《魏书·鲜卑传》。

③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 370《夏平》。

④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 15《贺平党项表》。

⑤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4《党项传》。

⑥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 147《折克行神道碑》。

《宋会要·府州》：

> 折氏，世为云中大族。[①]

《东都事略·折可适传》记：

> 其先与魏道武俱起云中，号代北著姓。[②]

据《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载，折掘为河西鲜卑部。[③]《姓解》卷1亦称：

> 折屈，虏复姓也。南凉秃发傉檀立其妻折屈氏为后。今府州折氏盖折屈氏之后也。[④]

“代北著姓”、“云中大族”，均可理解为鲜卑姓，[⑤]而河西鲜卑与元魏拓跋同种。可知折氏是流进党项的河西鲜卑部落。又《册府元龟》卷972有“达怛都督折文通”，[⑥]《宋史·党项传》中府州折氏又有“突厥移”与“突厥罗”之名。[⑦]这又可说明折氏本身即已有部分鞑靼与突厥部人。《宋朝事实类苑》卷54又称：

> 夏倚常言，嘉祐中为麟倅，沿牒至府，其州将乃（折）御卿四世孙，不类胡种。[⑧]

因为夏氏认为麟州折氏本是“胡种”，所以折御卿之后代“不类胡种”

---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5册《方域》21《府州》。
②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04《折可适传》。
③ （唐）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④ （宋）邵思：《姓解》卷1《手六》。
⑤ （梁）沈约：《宋书》卷95《索虏传》：“晋初，索头虏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
⑥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5。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⑧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4《折御卿》。

而提出此说。折氏为“胡”，而不是羌。邓名世《古今姓氏辩证》称“羌族有河西折氏，世家云中，为北蕃大族”。[①]羌族无居云中者，云中为突厥故地，唐时曾置突厥降部为云中都督府。[②]更不可称“北蕃”，只能称“西蕃”，此处之“羌”当为“蕃”之误。北蕃与河西鲜卑代北著姓、“胡种”均合。

例二，慕家族。据《长编》卷312，环州有属羌慕家族。[③]《宋史·种世衡传》载有党项大酋慕恩。[④]《西夏书事》卷24载，环州有蕃官慕化。[⑤]《宋史·夏国传》载有慕洧，[⑥]《三朝北盟会编》卷192记为：“慕容洧奔夏国。……洧，环州人”。[⑦]故之环州党项慕家族当出慕容鲜卑。而这支慕容鲜卑，又当出自吐谷浑。《元一统志》卷4：“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州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閤门”。[⑧]环州在金明西，可知，这慕家族当来自吐谷浑，而且，这一支吐谷浑部落也被称作“羌部落”。

例三，《宋史·夏国传》记载，李继迁祖母独孤氏。[⑨]《西夏书事》延州党项李士彬母亦独孤氏，[⑩]《新元史·太祖纪》有夏太傅西壁（又作鲜卑）讹答。[⑪]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中有“真义国师西壁智海”。[⑫]独孤，为屠各匈奴之姓，[⑬]西夏文《文海》亦有“陀割”之族姓，[⑭]西壁则是鲜卑姓氏或以鲜卑为姓的。西夏文《文海》亦有“西壁”一姓。[⑮]党项族中有此姓，亦可反映其匈奴、鲜卑成分。

另外，如党项大姓梁氏、高氏、路氏、贺氏、苏氏等都可能与鲜卑姓拔列兰（改为梁）氏、是楼（改为高）氏、没路真（改为路）氏、贺兰（改为

---

①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辩证》卷38《折氏》。
② （唐）杜佑：《通典》卷197《突厥》上；（唐）李筌：《太白阴经》卷3《关塞四夷篇》。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元丰四年四月丙子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335《种世衡传》。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4熙宁九年八月条。
⑥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⑦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2《熙河路经略使慕容洧叛附夏国》。
⑧ （元）孛兰肹：《元一统志》卷4《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⑨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⑩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宝元元年九月条。
⑪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3《太祖纪》。
⑫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西夏壁画》，载《文物》1980年第9期。
⑬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46页。
⑭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23·132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27页。
⑮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6·123条，第415页。



西夏文《文海》书影

贺）氏、拔略（改为苏）氏有关。[①] 因此，我们将党项族看成为鲜卑族与羌族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应该是有根据的。从上述例证，党项族内还融进了不少其他北方民族成分，不然，何以被称之为“杂种”呢？所以，文献中称拓跋氏为“党项羌”，并非一定就是指其为羌族。

第二，拓跋鲜卑进入羌部落后，采用各种手段密切与羌人的关系，以致成为各羌部落的领导阶层。据《旧唐书·吐蕃传》载：

① 党项有梁家族，梁氏有梁太后、梁乙逋、梁兀乙、梁格嵬、梁哆唛等；高氏为唐兀氏，有高惟正、高崇德、高大亨、高大伦、高良惠、高逸、高智耀等；党项有路氏，折惟正母路氏，沙览答里姓路氏；贺氏（贺兰氏）有贺永珍、贺守文、贺九言、贺浪罗、贺惟一等；党项有苏家族，苏氏有苏忠札、苏志纯、苏寅孙、苏尼通、苏守信、苏吃曩等，均为西夏之廷臣。上述材料散见于《宋史》、《元史》、《长编》、《宋会要辑稿》、《金史》、《西夏书事》、《范文正公文集》、《梦溪笔谈》、《嘉靖宁夏新志》中。

(秃发)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1]

《宋史·夏国传》亦载：

(宋太宗)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2]

拓跋鲜卑不仅以恩信抚以群羌，而且经常以联姻的办法笼络羌部落。据西夏文文献《夏圣根赞歌》记载，西夏皇族鼻祖"喇都"，娶的妻子就是"西羌姑娘"。[3] 由于拓跋鲜卑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它们又能赢得羌部落的信服，而且，它们本身又拥有较为强大的实力，即所谓"拓跋最为强族"。[4] 因此，拓跋鲜卑成为各羌部落的实际领导者，他们像慕容鲜卑统治吐谷浑的羌人一样，统治着党项族内的羌人。所以，文献中往往把拓跋氏首领称作"羌酋"或"党项羌酋"，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第三，拓跋鲜卑进入羌族的地区后，由于长时期与广大羌人生活在一起，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拓跋鲜卑在传统羌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部分"羌化"的现象，鲜卑的旧俗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渐消失。

例一，按鲜卑风俗，男人多为髡发，[5] 此为东胡民族之旧习。面西羌却是以披发为俗。据《后汉书·西羌传》载：

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6]

拓跋鲜卑进入羌人地区后，长期受羌俗的影响，因此，拓跋部人也由原来的髡发改为披发。《长编》卷35：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夏圣根赞歌》，为西夏文宫廷诗，译文转引自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⑥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

保忠（拓跋继捧）方寝，闻难作，单衣披发，仅以身免。[①]

可见拓跋氏进入羌中后已染羌俗，变髡发为披发。赵元昊为了恢复鲜卑旧俗，发扬鲜卑之民族传统，故向全国颁布秃发令。《太平治迹统类》卷 7 载：

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全国人皆秃发。[②]

秃发即髡发，正因为进入党项族内的鲜卑人习俗已经“羌化”，而发式之变化为其重要表征，故元昊才有这一著名的秃发令颁布。

例二，鲜卑在未入主中原之前，一直是一个纯游牧形式的草原民族，不定居，逐水草迁徙。而羌人却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定居民族，所谓“缘山滨水，以广田畜”，[③]“俗皆土著，居有屋栋”。[④]正是当时羌族定居生活的反映。拓跋鲜卑进入羌中后，受羌人影响，也改变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宋史・夏国传》载：

俗皆土屋，惟有命者以瓦覆之。[⑤]

这“有命者”应包括作为统治阶级的拓跋部，从德明在锹子山大起宫室及继迁在灵州西面屯田的事实，[⑥]可以反映拓跋鲜卑入居羌中后，受羌族的影响，也逐渐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

例三，鲜卑语应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然而，拓跋鲜卑进入羌族地区后，他们同羌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在羌语言的包围圈中，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语言习惯，而操用更适用于经济生活的羌语，这从现存大量的西夏语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 淳化五年三月戊辰条。
②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7《康定元昊扰边》。
③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7 咸平四年八月条、卷 9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条。

的读音可以得到验证。[①]然而，西夏语从总体来说虽属羌语系统，但其中阿尔泰语的残存，仍可以反映出党项拓跋氏从鲜卑语向羌语转化的痕迹。如西夏称皇帝为“兀卒”或“吾祖”，[②]《文海》中音作“祖”。[③]属通古斯语族的女真语称头为“兀术”或“乌珠”，[④]而金太祖第四子完颜宗弼又以“兀术”为名，很明显，这个“兀术（头）”当可作首领解，与西夏语国王自称“吾祖”意义相近。[⑤]这一极重要词汇的相同，应可反映西夏语中阿尔泰语的成分。陈乃雄先生对记载有“河西国：倘吾的”的《河西译语》的研究，其中也有为量不少的阿尔泰语成分。[⑥]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拓跋鲜卑进入羌区以后，由于长期受羌族语言的影响，基本上已改变了过去的习惯语言而采用羌语；又由于党项族内有很多与鲜卑有一定关系的部族，所以在西夏语的少量词汇中，又很自然地留下了原来鲜卑语言的痕迹。

这种原来风俗习惯的保存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在葬俗及婚姻上还有更清楚的反映。羌人的丧葬习俗主要是火葬。《庄子》云：“羌人死，燔而扬其灰”。[⑦]《荀子》云：“氐羌之虏，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⑧]《旧唐书·党项传》载：“死焚其尸，名为火葬”[⑨]。党项拓跋氏却与羌族的葬俗不同，拓跋寂死后，“护葬于银州儒林县新兴乡招贤里欢乐平之原，安吉兆也”[⑩]。并有坟墓，立有墓碑，很明显是土葬。李仁宝死后，“祔葬于先祖陵阙之侧”[⑪]。可以说，党项拓跋氏很早就开始实行土葬，且有“陵阙”之制。李继迁葬乳母是用“棺柩”，[⑫]李继迁死，德明“即位于柩前”，[⑬]德明母罔氏死“以乐迎至

---

① 关于西夏语的族属问题虽然有很多争论，但主要倾向是羌语，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肯定西夏语为羌语的学者甚多，这可以王静如《论四川羌语及弥药语与西夏语》为代表，见《西夏研究》第2辑。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杂4·143，第535页。

④ （元）脱脱：《金史》附录《金国语解》。

⑤ （元）脱脱：《金史》卷77《宗弼传》。

⑥ 陈乃雄：《〈河西译语〉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载《中国语言学报》1981年第1期。

⑦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94《四夷部》引《庄子》文，此条为《庄子》佚文。

⑧ （唐）杨倞注：《荀子》卷27《大略篇》。

⑨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⑩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

⑪ 《李仁宝墓志铭及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51—252页。

⑫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⑬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太宗经制西夏》。

柩前”，[1]西夏皇陵108号陪葬墓发现了棺椁朽木和棺钉，[2]这些都可以反映西夏拓跋氏在丧葬习惯上并未从“羌俗”。据明何景明《雍大记》载：

> 红石峡，旧传李继迁葬其祖彝昌障水别流，而凿石为穴以葬。及葬毕，仍引水流于故道。今云墓在水下石穴中。[3]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亦称：

> （继迁）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4]

这种“凿石为穴”的葬法显然也不是羌人的习俗，恐怕与鲜卑人的石室祭祀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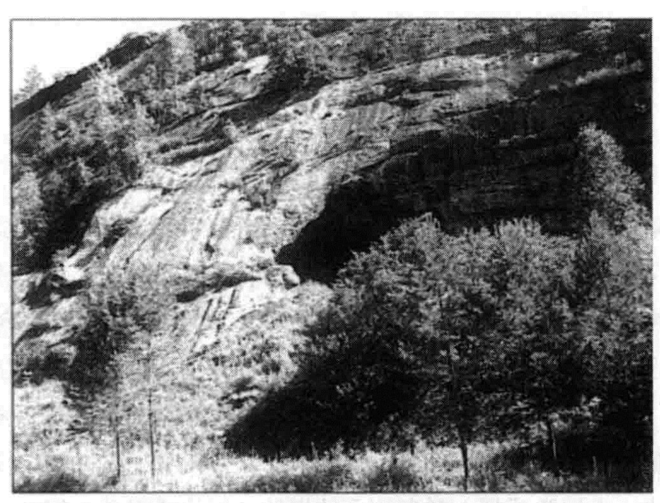
羌人部落普遍实行的一种原始落后的收继婚制，这种婚姻习俗一直到唐代在羌部落中还十分盛行，“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5]“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报，诸夷中最为甚”。[6]然而，在党项拓跋部落中，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还见不到这种原始落后的收继婚制，拓跋王室虽有一夫多妻的现象，但从拓跋思恭直到末主李睍，始终没有出现过“妻庶母及伯叔母嫂”的现象。元昊因强占了太子宁令噶的未婚妻，竟遭到了臣子们的极力反对，并由此而死于非命。[7]从这里可以看出党项拓跋氏与羌人的婚姻习俗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对于拓跋鲜卑与羌族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文献中的“党项羌”并非纯粹的羌族，而是以鲜卑、羌人及其他北方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共同体。（二）由于拓跋鲜卑成了党项族内的统治者，而党项族内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8期。
③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9《考迹》。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咸平六年正月条。
⑤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基础成分应是“羌”，故当时人多称拓跋氏“羌酋”。（三）由于拓跋鲜卑长期受羌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逐渐“羌化”。因此，他们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鲜卑的印象已基本消失，故史书多称之为“羌”，而不言鲜卑。①



大兴安岭北段东麓之嘎仙洞（拓跋鲜卑石室）

① 1965年出土、2003年3月征集到的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拓跋寂墓志铭》恰好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墓志称：“公讳寂，字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拓跋守寂为拓跋思恭之子，即夏州拓跋氏之先祖。为什么在这里的拓跋氏又称自己“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呢？余以为，这就是拓跋鲜卑进入羌地后“羌化”的结果。长期居住羌地，而逐渐“羌化”，故拓跋鲜卑亦以自己与羌人同源。拓跋氏进入内地后，随着本部落的发展，其原本民族意识逐渐上升，恢复其原来民族之意愿亦越来越强烈，故李仁宝以后的墓碑全部称之为鲜卑之裔。就拓跋氏出土墓志而言，有五通一致称拓跋氏出于鲜卑，仅一通言拓跋氏“出自三苗”这种完全不着边际模糊族源认知。之所以出现这种模糊，受《隋书·党项传》：“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的影响。因拓跋在当时已成为“党项别部”，故他们亦认为自己源出于羌；或是由于还需要对羌部的控制，还必须称自己出自羌。还拓跋为鲜卑之本源，这应是进入内地拓跋部获得更大发展之后的事。原本“拓跋”即鲜卑一姓氏，羌人从未有“拓跋”一姓。有人将并无文献依据的“达布”、“夺籛”之名来对应唐代的“拓跋”，这是一种不规范的学术考证。“达布”、“夺籛”一词出现在何时，记录在哪一文献中并无交待，何以可同唐代之“拓跋”并语，这种不规范的考证，很明显将历史引入歧途，将拓跋氏为一鲜卑姓这一千真万确的史实而变得混淆不清，这一点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55页，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第9页。）

党项源流新证*

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问题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论尚未结束，[①]党项自身的族源问题又带来了多种不同意见。最早提出党项源出羌族者为王静如、聂历山、寺本婉雅、冈崎精郎诸先生，[②]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党项源出匈奴—鲜卑系统之“当（单）于”。[③]早期学者关于党项源流的讨论多在语言学的对音上寻出结论，其论证均缺乏历史事实及文献的佐证。1981年唐嘉弘先生在银川举行的西夏研究会上提交《论西夏拓跋氏、甲绒、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一文，正式提出把党项划入鲜卑族系的说法，但论证得并不细致。[④]1988年他又在纪念王静如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的论文集中提交《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一文，再次否定了党项是羌族的传统说法，而提出党项为鲜卑。[⑤]吴天墀先生则认为西夏拓跋氏源出鲜卑，但不赞成将党项也归入鲜卑族系。[⑥]欧洲的藏学家们多依据藏文文献（特别是后期的喇嘛教文献）提出党

---

*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收入此书时又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补充修改。

①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4年第2期；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拙稿《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辑；（俄）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ё фонды,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а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Т.1, СТР.74-94；（日）寺本婉雅：《西藏古代民族研究》下，载《支那佛教史学》第1卷第3号，京都，1937年；（日）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第1卷，养德社，昭和22年。

③ 参见唐嘉弘：《再论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95—107页。

④ 唐嘉弘：《论西夏拓跋氏、甲绒、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年提交银川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后不知发表何处。转引自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8—149页。

⑤ 参见唐嘉弘：《再论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95—107页。

⑥ 吴天墀：《西夏史稿》之《再版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项为弥药（木雅），而木雅则属于构成吐蕃人主体的塞、穆、东、董四族姓中的“董（Ldong）族”，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即石泰安先生。[①] 近年中国学者张云博士则在石泰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党项即“Ldong-gshan”音译，即“下部董氏”，并在“董族”中将早期党项八部之名全部考证出来，令人耳目一新。[②] 余文初稿完成于 1995 年，受唐嘉弘先生文章影响，因认为唐先生对这一问题论述尚不彻底，故作此文。今借修订之际，再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补充论证，并将余七年前的观点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以求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一

早在 1986 年，余在《党项风俗述略》一文中就提出，党项族是一个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鲜卑、汉、羌、回鹘、吐蕃、契丹、突厥、吐浑、沙陀及其他中亚西域民族均有部落融入，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多源多流的大杂烩民族。[③] 在党项众多的源流中，必有一个主源。党项族的主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目前党项西夏史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将党项简单地划入羌族的范围之中，认为党项之主源是羌，而其他民族则是后来逐渐融入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正史的《党项传》的记载。《隋书·党项传》称：

>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④]

《旧唐书·党项传》称：

---

① 欧洲汉学家涉及这一问题的学者较多，如托马斯（F. W. Thomas）、杜齐（G. Tucei）等，但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石泰安（P. A. Stein），其《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远古传说》（方浚川译，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第 223—265 页）与《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为这一观点的代表著作。

②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载《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4—33 页。

③ 拙稿《党项风俗述略》，载《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④ （唐）魏征：《隋书》卷 83《党项传》。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①]

《旧五代史·党项传》称：

党项，西羌之遗种。[②]

其他各种文献基本上均略同于上述记载，无不在党项之后冠以“羌”字，以示党项源出羌族。由于党项是羌，文献中进一步将西夏亦称为羌。孙觉《上哲宗乞弃兰州》：

羌人又尝大举围闭，久之乃罢，终为中国之患。[③]

韩琦《上仁宗论西北议和有三大忧者三大利者》：

自羌人盗边以来，于今七年。[④]

宋人《倦游录》：

康定中，羌人盗边。……庆历初，羌人输款。[⑤]

“羌人”在上述材料中就是指西夏，指党项。近代学者治西夏史者接受此说，以党项为羌，王静如先生则进一步认为，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vt”为其复数。故汉族称其为“党项”。[⑥]

为什么这么多汉文文献将“党项”称为“羌”，余已在《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行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要而言之，由于党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③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9《边防门·辽夏》11。
④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6《边防门·辽夏》8。
⑤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6《安边御寇》引《倦游录》。
⑥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辑。

项迁居羌地，其族群至隋唐时已基本“羌化”，故当时人对党项多以“羌”称之。

欧洲的藏学家们则依据藏文材料提出新的观点，吐蕃人称党项为弥药（木雅），而木雅人则属于吐蕃的“董（Ldong）族”，故又称之为“董（Ldong）木雅（mi-nyag）”。这是以石泰安先生为代表的观点。石泰安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在《弥药与西夏》及《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两部著作中，使用了极为丰富的古藏文文献，对川、青、甘、藏民族走廊上的古部落及木雅人的早期历史展开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应该说，石泰安先生的研究成果已达到这一领域研究中很高的境界，但是其中的几点不足却令人感到遗憾。

一是对所使用藏文文献文本内容是传说还是历史，是当时的原始记录还是后代人的描述，石氏未进行逐一的考证。藏文文献，特别是后期喇嘛教文献，如《如意宝树史》、《西藏王臣记》、《安多政教史》等文献中记录的历史是否完全可信，特别是其中记载西夏（即木雅）部分的历史与历史真实有很大距离，但石氏并未对这些进行解释和考证。

二是石氏基本上不重视汉族史学家记录下来的有关西夏历史的资料，甚少将这些汉文史料同他所引用的藏文史料进行比勘。举一个例子，石氏据藏文材料中称吐蕃的所有居民都出自四个矮人部落：噶族、珠族、扎族和董族，还称“董族”一名存在于“矮人系列”中，董族人种集团肯定是“矮人”中最重要的分支。[①]既然木雅人属董族，则木雅人亦当是“矮人”。然而，迄今所见各种文献与图画均可证明，党项人种身材高大，绝不属于矮人系列。元时西夏人余阙言：

> 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到八九尺者。[②]

可见，党项人身材十分高大。《鲁不鲁乞东游记》第26章记载：

---

①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0、32、53页。
②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我看到的唐兀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①

与余阙记录的完全一致。再从安西榆林窟29号窟壁画上所绘西夏人供养像看，也是个个雄武高大。②俾丘林《西藏与青海史》亦称，西夏人身材高大，黑皮肤，黑头发。③故西夏文文献中亦称党项人为“长弥药人”。④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完全否定木雅人出自“矮人”系列之吐蕃董族。

三是即使证明木雅人来自“董族”，但也无法证明木雅人为“羌”或“藏”。连石泰安自己也承认，“董族人常常被当作非西藏人”。⑤因为在早期的吐蕃部落中早已融入了相当部分北方民族部落。如属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在被吐蕃征服后，这些部落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也被称之为吐蕃部落，它们是以Va-zha（阿柴）之名出现在藏文文献的，这些吐谷浑人到后来已完全吐蕃化，成为了青藏高原的吐蕃色部落。⑥其实，党项人也是一样，原为鲜卑系统，吐蕃征服一部分居住在甘、青、川地区的党项部落后，这一部分党项部落亦随之吐蕃化，而以“木雅”之名号融入到吐蕃部族之中。藏文文献称木雅人属于吐蕃董族，并不是指木雅最早之族源，而是指融入吐蕃后的现状。正如藏文文献中Va-zha（阿柴）一样，可称Va-zha为早期吐蕃部落，但不可称Va-zha之族源出于吐蕃。

张云博士关于党项族源和名义的考证亦存在同石泰安先生一样的问题，即抛开了大量的汉文文献中关于党项族源的种种记录，一味在藏文中比勘，过分依靠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及较后的喇嘛教文献进行简单的对音勘同，其结论恐怕可信程度不高。特别是将同时并存于多种文献中的“党项”和“西山诸羌”视为同一族，这违背了汉族史学家修史的基本原则。⑦《新唐书》既列

①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第26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② 安西榆林窟第29窟男女供养人像，见《敦煌研究文集》附图88与102，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俄）俾丘林：《西藏和青海史》第2卷，圣彼得堡，1833年，第22页。

④ 此处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译文采用罗矛昆《“白高”国名新探》一文，载《中国民族史研究》（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⑤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第68页。

⑥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4卷第1期，第223—265页；（法）石泰安，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第41页。

⑦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载《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24—33页。

《党项传》又列《东女传》，而西山诸羌均属东女国。如果西山诸羌亦是党项，当时的史家肯定不会将西山诸羌收入《东女传》，而应记入《党项传》。[①] 至于张云博士关于党项八部的考订，亦过于简单，尚未脱离吴景敖先生早年考订的痕迹。[②]

对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中将党项源于“羌”、“藏”的说法进行辨释后，再看看文献中明确记录的党项非“羌”之材料。在唐宋史学家的文献中，常常将“党项”和“羌”一分为二，相提并论。《旧唐书·吐蕃传》：

> 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使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③]

《唐大诏令集》卷69《南郊赦》：

> 天下所有诸色结聚及羌、浑、党项等，能悔过自陈，各归土业，一切并赦其罪。[④]

《资治通鉴》卷223：

> 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⑤]

很明显，在这些作者的心目中，党项不是羌。否则就不会一族而二出。党项人也不将自己视为羌。党项人自称为“羢”，可译作“番”。《文海》杂9·242条载：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及《东女传》。
②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28—29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
④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69《南郊赦》。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3《唐纪》39。

番：此者党项也，弥药也，番人之谓。①

而称羌为“㶲”，读作“孛”。汉文称“西羌”，西夏文对应部分则称“㶲”。②《文海》33·141条载：

羌：此者戎羌也、藏也、羌国人之谓。③

西夏文《夫子善仪歌》亦称：

羌汉番三一母生，语言不同地所分。愈西愈高羌人国，羌人国内羌文字；愈东愈低汉人国，汉人国内汉文字。自己语言自己爱，各个文字各个敬。我辈国野利夫子，天上文星出东方，引导文字照西方。④

此处“羌汉番”分别指三个民族，羌指吐蕃，汉指宋人，番指党项。羌人国指吐蕃，汉人国指宋朝，我辈国指西夏（党项）。可知，党项人并不视自己为“羌”。

西夏文五言诗中更称为：

弥药勇健走，契丹缓步行，西羌敬佛僧，中国爱俗文。⑤

西夏境内的主要民族都谈到，弥药指党项，西羌指吐蕃，故知党项人并不将自己视为“羌”。还有些文献干脆就将党项称作“胡”，而不称“羌”。《涑水纪闻》卷12：

---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杂9·242条，第543页。

②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载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章，第107—113页。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3·141条，第443页。

④ 聂鸿音：《西夏文〈夫子善仪歌〉译释》，载氏著《西夏文献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7—211页。

⑤ 陈炳应:《西夏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又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碎金〉研究》译文不同:“弥药勇健走，契丹步履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回纥饮酸孔，山讹嗜荞饼”，见《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王吉）请髡发，衣胡服，挟弓矢，诈为胡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①]

王吉是化装为党项人，此处称“胡人”。同书同卷：

李士彬世为属国胡酋，领……胡兵近十万人。[②]

李士彬居延州北面之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据宋人宋琪和夏竦言，该地为党项居地。[③] 又《长编》卷51称李继福、李继周、李文直及叶勒（野利）文义“皆党项蕃族”。[④] 士彬为继周子，故知李士彬为党项，其部族亦当为党项，而此处称李士彬为“胡酋”，称其部族为“胡兵”。《资治通鉴》卷278：

李彝超不奉诏，遣其兄阿罗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⑤]

这里干脆称“党项诸胡”，而不是称“诸羌”。类似称党项为“胡”的材料还很多，不再举例。余以为，在宋人文献中称党项为“羌”者是正常的，不令人奇怪。因为史家从修《隋书》开始，就将党项定性为“羌”，故人们均会习惯性地称党项为“羌”。但是，如此众多的宋朝人，且均是对西北边境民族比较熟悉的人称党项为“胡”，这个问题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了。

特别是在目前各种文献中保留的数百个党项族姓或族名中，鲜卑或鲜卑系统的族姓、族名可以找到许多，而西羌之族姓或族名在现存党项姓氏中却基本找不到。因此，余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南宋著名姓氏学家罗泌曾对党项之族源提出过完全与众不同的见解。《路史》卷14：

---

①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②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癸酉条：“自鄜延以北……谓之‘南山野利’”。（宋）夏竦：《文庄集》卷14《陈边事十策》：“党项遗类，居呼韩旧地，东薄银夏，……南趣鄜延”。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四月癸巳条。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8《后唐纪》7。

> （黄帝）生昌意，……昌意有子三人，……季悃，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①]

这一提法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清代学者周春虽然注意到了这一观点，但却轻率断言罗泌之说为“伪造不经”[②]之语。没有任何根据，随意否定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伪造”，本身就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治学态度。罗泌为南宋人，是与西夏同时并存的人物，且又是专治姓氏学的专家，其言应有所依据，绝无去随意“伪造”的理由。《路史》之言与《魏书》相印证，《魏书·序纪》载：

>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上，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③]

拓跋鲜卑最早认同至黄帝，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罗泌大概是根据党项族内的拓跋氏是源出拓跋鲜卑，故将党项也归于黄帝后代之类。虽然拓跋鲜卑自称黄帝之苗裔很难找到历史根据，但党项与拓跋鲜卑共同的认同关系却令人深思，使余在认识党项源流问题上，越来越倾向党项源出鲜卑。

二

要论证党项源出鲜卑，必须要证明党项发祥地究竟在哪里。

党项之名，在汉文史籍中最早见于《隋书》。《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的居地是：

> 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④]

---

① （南宋）罗泌：《路史》卷14《黄帝纪》上。
② （清）周春：《西夏书》卷10《官氏考》。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1《序纪》。
④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到唐前期，党项居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旧唐书 · 党项传》称：

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①]

阎立本《西域图》绘党项国的方位是：

吐国（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②]

弥罗即弥药，弥药即党项。可见，汉文文献所载党项族的居地就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部之间。但是，这一居地是否是党项族的最早居地呢？不是。党项之名，最早见于隋，但《隋书 · 党项传》称党项"魏、周之际，数来扰边"。[③] 那魏周之时，党项原居地在何处呢？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据藏文《新红史》载，弥药人的先祖"斯乌王"生在凉州与嘎（Gha）地的一座大山中。[④]《贤者喜宴》、《红史》、《西藏王统记》则称此山为"门西山"。"嘎"即"夏"字的译音，"嘎地"当指夏州。石泰安先生认为，这座山应该是贺兰山。[⑤] 贺兰确为党项人的早期居地。《吴文正公集》卷 42 载西夏皇族后代李世安：

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⑥]

《新唐书 · 地理志》载：

夏州北渡乌水，……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百余里至阿颓泉，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②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 4《西域图》。
③ （唐）魏征：《隋书》卷 83《党项传》。
④ 班钦 · 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7 页。
⑤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第 223—265 页。
⑥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 42《李世安墓志》。

> 又经大非苦盐池，六十六里至贺兰驿，又经库也干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颓泽。[①]

此处有“弥鹅泊”，在贺兰驿北，贺兰驿当以贺兰山得名，故知“弥鹅泊”与贺兰山相近。《新唐书·浑传》载：

> （浑）释之以朔方都知兵马使为裨将，……（仆固）怀恩已入，使（张）韶杀释之，收其军。已而恶韶，……折其胫，囚死弥峨城。[②]

朔方为夏州，此“弥峨城”当在夏州北。《读史方舆纪要》卷61称，“夏州北又有弥峨城”[③]即指此，但顾氏误记为“唐志”。《太平寰宇记》卷37又载：

> （灵州回乐县）北至碛南弥峨川水一千里。[④]

碛南即漠南。灵州北一千里正是贺兰山脉的北端，“弥峨川”在此。南宋苏州文庙有一幅《地理图》，该图在贺兰山左边近标有“碛南弥峨州”。[⑤]唐李筌《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载：

> 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一十里，北抵白亭海、弥峨山，独洛河。[⑥]

河西节度指凉州，凉州北行有“弥峨山”，以其方位推之，亦应与贺兰山相近。综上所述，弥鹅泊、弥峨川、弥峨州、弥鹅城均与贺兰山接近，弥鹅、弥峨与弥药，很明显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译法。这么多以“弥药（minak）”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7。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浑传》。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1《陕西》10。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
⑤ 苏州文庙《地理图》，参见曹婉如：《介绍三幅古地图》，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⑥ （唐）李筌：《太白阴经》卷3《关塞四夷篇》。

命名的地名出现在贺兰山一带，与藏文文献相对应，即可确证，贺兰山是弥药（党项）人的早期居地。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卷36载：

> 贺兰山在（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①

这里就明确表明，居住在贺兰山一带的党项人为鲜卑民族。

贺兰山虽为党项人的早期居住地，但却还不是最早的发祥地。党项人的发祥地同鲜卑民族一样，应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一份最具权威性的西夏文文献《夏圣根赞歌》（又译作《颂祖先诗》）对党项人的发祥地有所记载：

> 黑头石城漠水边，
> 赤面父冢白河上，
> 高弥药国在彼方。②

这是陈炳应据聂历山之俄文的传统译法，且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近年罗矛昆先生根据西夏文原文进行了重新翻译，其文为：

> 黑头石室荒水域，
> 赤面父冢白高河，
> 长弥药人国在彼。③

余十分赞同罗先生的重译，因为西夏文“城”字在《文海》里有“城”、“墙”、“室”、“舍”等义，在《掌中珠》里作“修造舍屋”的“屋”字，在《杂字》里作“室”字，可见，这一字主要是表示较小范围内的居住地，故译成“室”比较恰当。但余不同意罗矛昆先生仍承袭聂历山的观点，将“黑头”、“赤面”均视为党项。

---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

② （俄）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ё фонды,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а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T.1, CTP.74-94.

③ 罗矛昆：《“白高”国名新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黑头”、“赤面”二词经常出现在西夏文文献中，特别是西夏的文学作品中，“黑头”与“赤面”，总是对称或平行出现，如“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低，国土上万赤面智不一”；[①]“天下黑头，地上赤面”；[②]“皇下黑头凡胜羆，陆上赤面聋胜熊”。[③]“以德教导千黑头，万赤面处取法则”，“千黑头少因异，万赤面心不同”，“倾听于千黑头者拱其手，万赤面住处赞其恩德”。[④]俄罗斯西夏学家克平总结西夏文献中的“黑头”与“赤面”后称：黑头在前，赤面在后；黑头在天上，赤面在地上；黑头人数较少，赤面人数较多；黑头与白鹤同名，赤面与猕猴相似；黑头代表男性，赤面代表女性，黑头被赤面崇拜，黑头教授赤面美德；黑头不用劳作，而赤面则要为生存而劳作等等。[⑤]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对“黑头”与“赤面”得出较为确切的认识。余以为，“黑头”是指党项。这从《文海》中的材料可获证明：

人名，“勒波”也，黑头之父，先人名是也。[⑥]

这位被称作“黑头之父”的先人“勒波”是谁呢？余以为“勒波”即“拓跋”之异译。《魏书·序纪》称：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⑦]

北人称拓跋为“土后”，土后即地神。《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螾，土精，大五六

① （俄）克恰诺夫：《关于西夏文献〈圣立义海〉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②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载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7—113页。

③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昭和61年，第75页。

④ 西夏文《赞歌》和《大诗》，转引自K. Б. 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载《西夏学》第5辑，第177—187页，2010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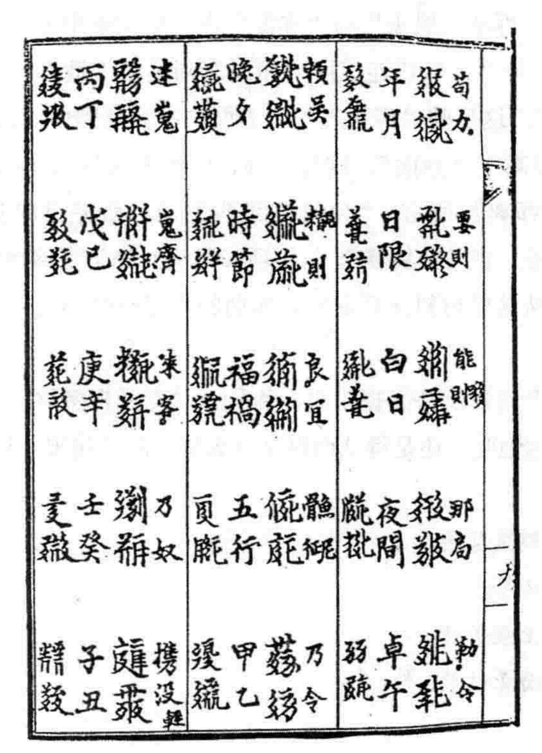
⑤ 参见K. Б. 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载《西夏学》第5辑，第177—187页，2010年9月。

⑥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3·251条，第424页。

⑦ （北齐）魏收：《魏书》卷1《序纪》。

围，长十余丈。[1]

地蝢即地神，亦为一蛇精。《掌中珠》中“[illegible]（地）”字读作“勒”，“[illegible]（蛇）”字读作“瘑（phio）”，[2]故知，“勒波”即“勒瘑”即“拓跋”。《文海》称“勒波”这一先人名为“黑头之父”，即是“拓跋”为“黑头之父”，拓跋氏又为党项诸部的统治者，党项部落又称酋长或部落首领为“父”，[3]这就可以证明，西夏文中的“黑头”应指党项。据《西藏王统记》、《如意宝树史》、《新红史》等藏文文献，亦称党项祖先源出一“蛇精”，[4]可证，“黑头”确指党项。



《番汉合时掌中珠》影件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之索隐。

②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地用》下。

③ （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文宝）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15《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君已至，……乃与族众拜伏喧呼曰：今而后，惟父所使”。

④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4卷第1期，第223—265页。

"赤面"是否指党项呢？目前所有保存的西夏文材料中，没有一条材料可作为"赤面"为党项的证据。而据敦煌文献印598号《于阗国阿罗汉授记》将吐蕃王称为"赤面王"，将吐蕃国称为"赤面国"；[①] 敦煌文献《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亦载："于阗等此三国，汉与赤面、苏毗、突厥、回鹘等贼，动其干戈，而来侵损"。[②] 这里的"赤面"也应指吐蕃；西夏文《文海》84·151条："赤面祖宗，此者前朝根本之谓"。[③] 党项人在吐蕃帝国全盛时曾为其统治，故党项人将吐蕃王朝视为"前朝"。可知，这里的"赤面"也是指吐蕃。《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④] 这恐怕是称吐蕃为赤面的缘由。再从"黑头"与"赤面"在西夏文献中大量平行对应出现时，"黑头"总是与"天"相连，而"赤面"则是与"地"相连，如"天下黑头，地上赤面"，这反映"黑头"与"赤面"在西夏国内的地位是不同的，"黑头"地位明显高于"赤面"，这与党项、吐蕃在西夏国内的地位亦相符。正如西夏诗《颂师典》所言："为何不跟西羌走，西羌已向我俯首，大陆事务我主宰，政务、官员共协辅"。[⑤] 党项（黑头）处于主宰地位，吐蕃（赤面）是协辅者。从这些材料应可证明，赤面的本源意义不是指党项，而是指吐蕃。

于是，有一个问题就势必提出来，为什么《夏圣根赞歌》要追述羌（吐蕃）人先祖的发源地呢？还是得从西夏文《大诗》的诗句来分析：

> 上天白鹤黑熊愚，
> 天下黑头愚过熊。
> 地上赤面猴子聋，
> 地上赤面聋过熊。[⑥]

---

① 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 Lho Bal 的研究》，中国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年。

② （日）森安孝夫：《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 Dry-gu 与 Hor》，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84·151条，第519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⑤ 陈炳应：《西夏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⑥ 西夏文《大诗》，转引自 K. Б. 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载《西夏学》第5辑，第177—187页，2010年9月。按：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录此诗译文稍异，今从克平之译文。

诗中将“黑头”比作“白鹤”，因为白鹤头顶呈黑色（东北丹顶鹤头部呈深褐色）；将“赤面”比作“猴子”，因为猴子的脸庞呈红色。克恰诺夫曾对“黑头”、“赤面”二词作过这样的猜想：

> 黑头是白鹤的后代，是上天、白圣、父系的孩子，是当政家族的远祖。赤面是太阳腿女人的后代，是大地的、母系的孩子，他们曾是黑头的合作伙伴。[①]

克平更认为，“白鹤——猴子”是西夏的一对图腾祖先：

> 他们分别代表两种人，其一是西夏上等人，似乎是西夏本土宗教——“本西”法师（黑头）的后代；其二是大量百姓（赤面）。西夏神话中的二词可以追溯到一对西夏图腾动物：白鹤（黑头），男性；猴子（赤面），女性。他们结合繁育了西夏人。另一个推测是：“白鹤”和“猴子”源自两个部落，他们形成了西夏人。[②]

这两位西夏学家均将问题引向了深入。余以为，“白鹤”就是党项人的图腾，白鹤（丹顶鹤）生长在我国东北地区，党项源自鲜卑，早年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鲜卑别部——党项将白鹤作为自己本民族的图腾，这一点应是不奇怪的。《圣立义海》载：“十月属亥，五行属水，牧白鹤季。”[③] 已迁居在河套、阴山地区的党项人还保留“牧放白鹤”的习俗，反映了党项人对白鹤的喜爱和推崇，亦是对白鹤图腾的反映。而“猴子”就是吐蕃人的图腾，藏文史集一致记录，猕猴及岩魔女的结合传出了吐蕃人种，[④] 汉文史籍则

---

① Е.И.Кычанов, Море значений,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святым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Центр《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7. P.56.

② К. Б. 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载《西夏学》第5辑，第177—187页，2010年9月。

③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④ 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第7章《由猕猴岩魔女传出西藏人种》，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43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称："宕昌、白狼（羌），皆自称猕猴种。"[①]可知，羌藏系统人种多以"猴子"为图腾。党项是进入羌藏部落的鲜卑人种，但党项仅是上层的统治者，故称"黑头"，而下层的基础即被统治者均为羌藏人种，为猕猴种，故被称为"赤面"。这就是说，党项族是由两大民族集团组成的："白鹤"和"猴子"。"白鹤"即鲜卑种人，为统治阶层，人数较少；"猴子"即羌藏人种，为被统治阶层，人数众多。而且在党项族中的鲜卑种系与羌藏人种长期通婚，第一代党项首领啰都娶的就是"吐蕃美女"。[②]故杜宝《大业杂记》炀帝问党项酋领"是何种之后"时，党项酋领回答："相传弥猴之后"。[③]这正是党项人入居羌中后彻底羌化的反映（藏族人就自称是弥猴的后代）。这也是历代正史为党项修传时，总以"党项羌"称之的原因。正因为这个缘故，党项人追述自己祖先的历史时，是无法将羌人这一"第二族源"的历史彻底抛弃的。

对于《夏圣根赞歌》的前三句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句"黑头石室荒水域（或漠水边）"，是叙述党项人最早的发源地，第二句"赤面父冢白高河（或白河上）"，则是叙述羌（吐蕃）人的发源地，第三句"长弥药人国在彼"，则是表述在东北和西北的这两个党项人的发源地上都居住着高高的弥药人。根据党项人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长白山一线到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贺兰山、青海湖等地都有部落散居这一事实，[④]可以证明，《夏圣根赞歌》的"长弥药人国在彼"确可以这样解释。

这样，寻求党项人的发祥地就只能仅限于第一句，"黑头石室漠水边"了。这里"石室"二字犹为重要，余以为党项人所称的"石室"当即1980年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嘎仙洞发现的鲜卑石室。[⑤]《魏书·礼志》载：

> 魏之先居幽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贡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⑥]

---

①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载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第20—21页。

③ （宋）晁载之撰：《续谈助》卷4引杜宝《大业杂记》。

④ 参阅拙作《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载《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及《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分布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⑤ 米文平：《拓跋鲜卑先祖石室考》，载《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成立纪念文集》，1980年。

⑥ （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

《魏书·乌洛侯传》：

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①]

可见，鲜卑祖庙石室在鲜卑人中间是颇具影响的。党项统治者拓跋氏源出拓跋鲜卑，故鲜卑石室的祖宗祭祀应在党项人的心中有较深刻的记忆。《西夏书事》卷7载：

（李继迁）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此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②]

这种"凿石为穴"的墓葬，是不是受鲜卑石室影响呢？故此，余以为，前引诗中的"石室"当即鲜卑石室，"漠水"亦可作"黑水"，古称粟末水，即指今黑龙江上游。这句诗是追述党项人发祥地，是否可理解为党项人的发祥地当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与大兴安岭之间呢？

党项族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与大兴安岭之间，还可以在其他文献中获至证明。《旧唐书·百济传》：

（贞观十六年，百济王）又兹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以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③]

为什么在初唐之时，我国东北地区有一座"党项城"呢？据文献记载，唐初党项人的居地在远隔万里的甘、青、川交界处，既然在初唐时这里以"党项"作为城名，这应是党项文化在东北地区的遗存，则可反映党项在此地居住时间不很短，而这种文化的遗存最能证明，党项原居地即在我国东北地区。《金史·兵志》又载：

---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100《乌洛侯传》。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咸平六年正月条。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百济传》。

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剌部，曰唐古部，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①]

东北路即东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泰州，即今吉林白城市。辽代迁党项俘户置北唐古仅在吉林长春一带，而金朝时有一部分党项人（唐古即党项）居住在吉林省白城市一带。乣，有“杂类边民”[②]之意，《大金国志》称金之西北诸虬为“生番”。[③]“生番”与“熟番”相对应。在金人的眼中，这一支被称为“唐古”的党项人，还是未曾开化的原始部落。则可知，吉林白城市一带很可能就是这一批党项人的原居地之一。还有《金史·昭肃皇后传》载：

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人唐括部人。[④]

《金史·唐括德温传》：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⑤]

帅水、率河即为同一水名，今黑龙江省境内的通肯河与双阳河。唐括又书作“同古”，即唐古，亦即党项，则又知金朝还有一批党项人居住在黑龙江省的通肯河与双阳河一带。金代将氏族姓氏分为“白号”与“黑号”两种，[⑥]在古代北方民族中，部落氏族以“黑白”对应者，多以“白”为较文明之部落，而“黑”则为较野蛮原始之部落，可以白鞑靼、黑鞑靼，白匈奴、黑匈奴，白霫、黑霫为例。唐括（古）氏为金源十六黑号姓之首，与蒙古氏同列。[⑦]可知，金代上京率河地区的党项仍是一部分尚未进入文明

① （元）脱脱：《金史》卷44《兵志》。
② （元）脱脱：《金史》卷94《内族襄传》。
③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1《章宗皇帝》下。
④ （元）脱脱：《金史》卷63《昭肃皇后传》。
⑤ （元）脱脱：《金史》卷120《唐括德温传》。
⑥ （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
⑦ （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

社会的原始部落，亦可证，金上京率河地区确为党项部落最早居地之一。

从《夏圣根赞歌》中“黑头石室漠水边”所反映的党项人的发祥地，再结合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在我国东北地区有党项城和大批党项部落的原始遗存，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党项族同我国古代鲜卑族一样，发祥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兴安岭、长白山与黑龙江之间。

三

西夏文《夏圣根赞歌》中有一段关于“七兄弟”的有趣传说。原文第7行至第10行：

> 啰都先祖身体不重却为圣人
> 昔日不愿为小有大志
> 吐蕃美女为其妻
> 刚勇七子为其伴

第31行至第34行：

> 后世子孙兴起一寅弥细逢
> 出生之时有二齿
> 长成后一种吉祥物悉聚主
> 率领七骑来称帝[①]

这里的“七子”或“七骑”都是指党项的先祖“七兄弟”，这七兄弟在诗中分别有其名，即“山拔都”、“欺库林”、“活合韈”、“嵬迎嗍”、“普六没嘿”、“嗯嗯屈部”、“耶庄”及“啰都”。[②]《夏圣根赞歌》称其先祖“啰都”娶一吐蕃美女为妻，并生了七个优秀的儿子。他的后代逐渐繁衍兴旺，到“寅

① 《夏圣根赞歌》，转译自（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第20—21页。

② 关于七兄弟名，为西田龙雄文中所录西夏文《月月乐诗》原文翻译，但聂鸿音译法差距甚大，参见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载氏著《西夏文献论稿》，第191—194页。

弥细逢”出世长成后，他率领着七骑士夺得了帝位。这一传说在藏文文献能获得验证。《西藏王统记》第3章载：

> 弥药的国土全在汉地的下方，其地北面有名叫“门西”的大山，山中有名叫“塞胡”的凶恶毒龙。一次，毒龙变为七位骑士，去北面的一座城堡，有一个食肉的女子与七骑士的首领交合，生了一个儿子。当时天空出现了一颗前所未见的星，汉地的卜师们占卜说，这是有人要占领京城的预兆。果然，后来这个男孩带领他的七位骑士攻占了汉地，成了弥药之王。①

《如意宝树史》、《红史》、《汉藏史集》均有类似记载。② 可见，藏文文献关于党项人的祖先的传说与西夏文中关于党项人祖先的传说大体一致。更为有趣的是，契丹先祖的传说也与藏人、党项人的传说有许多近似之处。《辽史·地理志》：

>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③

《皇朝事实类苑》、《契丹国志》均有类似记载。王易《重编燕北录》之记载更为巧趣：

> （辽）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也；赤娘女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④

---

① 福幢著，上官剑壁译：《西藏王统记》第3章，第11页。

② 松巴堪钦·益西班觉著，陈庆英、才让译：《如意宝树史》甲3，第746页；蔡也·贡噶多吉著，陈庆英译：《红史》，第23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上篇，第65页。

③（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1。

④（元）陶宗仪：《说郛》卷38王易《重编燕北录》。

党项人的先祖与契丹人的先祖都与“七骑士”或“七兄弟”有关。这种“七兄弟”或“七骑士”协力建国之传说，可以从《魏书·官氏志》中找到类似的记载：

> 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摄领之，及分其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①

献帝即拓跋鲜卑之第二推寅拓跋部，他不仅领导鲜卑南迁成功，而且将鲜卑分为八部，让自己的七位兄弟各统一部，各为一姓氏，连同自己领导的拓跋部共为八部，即拓跋氏、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这八部即原始时代八个鲜卑部落，又称“鲜卑八国”。其首领又称“八部大人”。由此而衍生出两种秩官：一是八部帅，《魏书·食货志》：

> 天兴初，制定京邑，……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②

二是八部大夫，《魏书·官氏志》：

> （天兴元年）十二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以拟八座，谓之八国。③

这八个部落统归拓跋部统领。党项原始部落的结构似乎亦仿北魏之先。《夏圣根赞歌》中的“啰都”和“啰都七兄弟”就应该是最早的党项八部，后来《旧唐书·党项传》中记载的党项八部是：

> 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为强族。[①]

《新唐书》、《宋史》之党项传记载大体相同，也是八部，而拓跋氏为其统治者。契丹之原始部落也是分为八部，古八部：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陵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大贺氏八部：达稽部、纥便部、独活部、芬问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遥辇氏八部：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温部。[②]契丹源出鲜卑，《辽史·世表》称：

契丹国，出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③]

故契丹八部之置似受鲜卑影响，党项八部的出现，也应与鲜卑八部有某种难以解脱的渊源。其他塞北及东北民族也有八部之说：南匈奴有八部大人，[④]西魏、北周有八柱国，[⑤]百济"国中大姓有八族"，[⑥]渤海大氏有八部，[⑦]高丽有八牧，[⑧]满清有八旗。这似乎也可说明一个问题，"八"当是古代东北民族崇尚的一个数字，党项是东北民族的一支，故其初设部落亦为"八部"。

四

要证党项源出鲜卑，尚须从风俗习惯上进行一些比较。前面证明，党项人自称"黑头"，党项人为什么要自称"黑头"呢？余以为也与拓跋鲜卑的风俗有关。《资治通鉴》卷155载魏孝武帝在洛阳即位仪式云：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1。

③ （元）脱脱：《辽史》卷63《世表》。

④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3《梁纪》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兵制》："八柱国之设，虽为摹仿鲜卑昔日八部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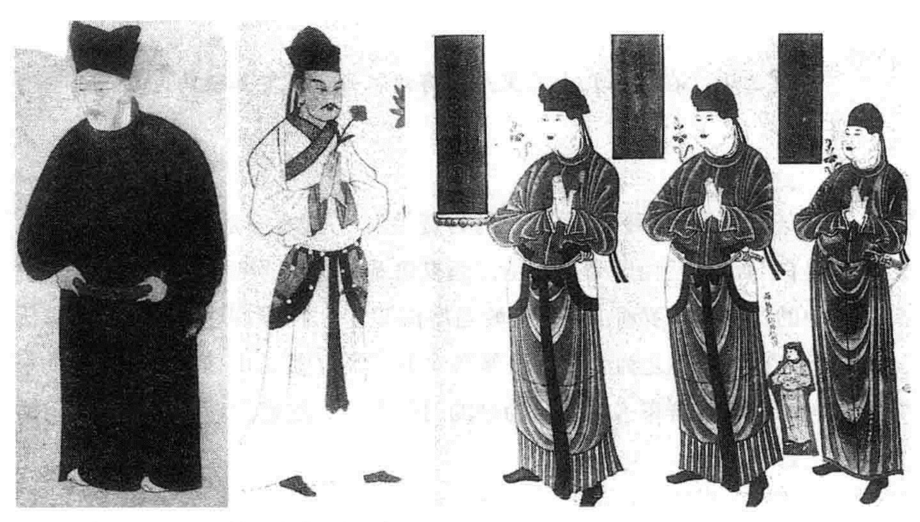
⑥ （唐）魏征：《隋书》卷81《百济传》。

⑦ 《北番风俗记》，原书未见，转引赵振绩：《契丹二元政制与元魏之关系》，载《宋史研究集》第14辑，第413—426页。

⑧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76《百官志》1。

> 孝武帝即位于东郊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①]

辽亦保留此俗，蔡絛使辽时，亦见此俗，称之为“鲜卑旧俗”。[②] 所谓“代都旧制”，即拓跋鲜卑保持的原始习俗，以“黑毡蒙头”去推选部落盟主，这是古代拓跋部选举盟主的一种仪式。党项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以黑毡蒙头的选举仪式亦可能在党项族中流行，“黑毡蒙头”是鲜卑族中地位高贵的一种表示，故党项人自尊为“黑头”。这种风俗在西夏文《月月乐诗》中亦有表现：“庆赞语：（五月里）黑头毡帽上覆草，大众语：（五月里）黑头毡帽上戴蒲草。”[③] 可知，西夏黑头有戴毡帽之俗。黑头戴毡帽当即鲜卑旧俗“黑毡蒙头”在党项人中的遗存。《宋史·夏国传》称元昊“冠黑冠”，又称其“毡冠红里”。[④] 可见，元昊戴的是一顶黑色毡帽，亦应是黑毡蒙头的鲜



西夏绘画中的男人服饰，均戴黑色之帽　　敦煌榆林西夏武官像亦戴黑帽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55《梁纪》11。

②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 2：“时戎主坐御床上，后有乌熊皮蒙一物，颇高大，久而似疲，则以身倚之。俄于乌皮间时露一二人手足，则罔测其故。”

③ 西夏文《月月乐诗》，转引自 К. Б. 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载《西夏学》第 5 辑，第 177—187 页，2010 年 9 月。

④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卑习俗。这是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一。

对白马的推崇也可证明党项沿袭了鲜卑之习俗。《山海经·海外北经》：

北海内，……有兽焉，其名曰驳，状如白马。[①]

《逸周书·王会篇》：

正北方，义渠、兹白，兹白者，若白马。[②]

兹白即鲜卑。又《述异记》载鲜卑慕容乾罗“乘白马，自天而坠，鲜卑神之”。[③] 白马为鲜卑之神。前引契丹祖先的传说也是“有神人乘白马”与“乘青牛的天女”相合。其中亦有鲜卑白马传说的影子。《元和郡县图志》卷4：

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④]

叶廷珪《海录碎事》：“突厥谓马为贺兰”。[⑤] 其实应是“驳马”为贺兰。驳马即是白马。贺兰山即是白马山，西夏语音白马为“嗬瘫”，[⑥] 所以宋人史料文献中的罗庞山、罗逋山、罗庞岭当均指贺兰山。[⑦] 夏国将贺兰山列为该国三大圣山之首，并称之为“贺兰山尊”。[⑧] 这里除了贺兰山曾是党项民族的早期居地外，恐怕同鲜卑人以白马为神的习俗有关。这是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二。

---

① （晋）郭璞注：《山海经》卷8《海外北经》。
② （晋）孔晁注：《逸周书》卷7《王会篇》。
③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29引《述异记》。
④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4。
⑤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4《夷狄门》。
⑥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地用》下。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8；（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夏国传》；《（嘉庆）灵州志迹》卷2《星野》；（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⑧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54、55、58页。

《宋史·夏国传》载，宋太宗时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太宗“献白鹘，名海东青”。[①]到夏仁宗天盛时，西夏仍向金进贡“海东青七”。[②]“海东青”是东北民族之特产，产于黑龙江下游及附近海岛，是东北民族用于畋猎的鸷鸟。宋人《鸡肋篇》卷下称：

> 鸷鸟来自海东，唯青鸪最佳，故号“海东青”。[③]

《大金国志》卷1：

> 五国（即女真五国部，今吉林省东北）之东接大海，出名鹰，来自海东者谓之“海东青”。[④]

已迁居陕西北部地区的党项族，仍以“海东青”进献于宋金朝廷，即可证明，该族始终保持以“海东青”畋猎的生活习俗，而这种习俗则正是鲜卑、契丹等东北民族之习俗。鲜卑、契丹均是十分重视狩猎的民族。鲜卑“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⑤]契丹则是“击兔射鹿夸雄强”，“钩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⑥]党项人亦重射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⑦]夏人称：“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⑧]《圣立义海》中记录更多：“十月，……黄羊照丛林，边地国人追射”，“十月时，天降霜，……率军行猎”，“十月，……国人射雕”，“年末，君出射猎，备储食”。[⑨]这些资料完全可以说明党项人保持着鲜卑系统民族“狩猎为习”的生活习俗。而这种生活习俗的保留，正是党项为东北民族的证据，亦是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三。

东北民族自古以来即善制弓箭，这在肃慎、鲜卑、高丽等族文献中均有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楼钥：《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
③ （宋）庄绰：《鸡肋篇》卷下。
④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太祖武皇帝》上。
⑤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⑥ （宋）苏辙：《栾城集》卷16《虏（契丹）帐》。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政和二年六月条。
⑨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4—55页。

记载，其中尤以鲜卑人的角弓最为有名。《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

> （鲜卑）以角为弓，俗谓之端弓。①

党项人承袭鲜卑民族制弓之艺，更以良弓驰名，西夏都城兴州为产良弓之地。康与之《昨梦录》载：

> 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而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②

可见，西夏以角制弓之艺与鲜卑一脉相承，是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四。

党项人还有一种风俗称“杀鬼招魂”。《宋史·夏国传》载：“其人……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地，众射而还”。③ 这一风俗与契丹风俗极为相似。《辽史·礼志》“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蝟，谓之射鬼箭”。④ 这种“射鬼箭”即党项人的“杀鬼招魂”。党项人中保留着以艾烧羊胛骨的占卜方式。《宋史·夏国传》载：“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⑤《宋史·张亢传》：“始谋击琉璃堡，……见老无力炙羊髀骨占吉凶”。⑥ 这种占卜方式与契丹族十分相似。武珪《燕北杂记》：“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⑦ 契丹为鲜卑种。此为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五。

党项节令俗重冬至，戴锡章《西夏纪》称党项“旧俗止重冬至”。⑧ 此亦当为鲜卑旧俗。契丹人“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

---

①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② （元）陶宗仪：《说郛》卷21引康与之《昨梦录》。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元）脱脱：《辽史》卷51《礼志》。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⑥ （元）脱脱：《宋史》卷324《张亢传》。
⑦ （元）陶宗仪：《说郛》卷4引武珪《燕北杂记》。
⑧ （清）戴锡章：《西夏纪》卷11引《甘肃通志》。

酒，天子拜黑山”。[①] 可知，契丹、党项两族均重冬至，契丹为鲜卑种，此为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六。

麟府州在宋代是党项族聚居之地，北宋人上官融曾至其地亲见该地葬式。《友会丛谈》卷 3：

> 用缯彩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条其单，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高丈余，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②]

这是党项族保存的一种较原始的丧葬习俗，为天葬的一种，这种葬式与契丹、室韦的葬俗很相近。《隋书·契丹传》：

> 以其尸置于山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③]

《魏书·失韦传》：

> 尸则置于林树之上。[④]

《隋书·室韦传》：

> 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⑤]

鲜卑族原始丧葬方式文献无载，但契丹、室韦均出于鲜卑系统，其原始葬俗与党项原始葬俗相近。此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七。

从发式来看，党项人发式与鲜卑系统的发式相同。“髡发”为鲜卑人重

① （元）脱脱：《辽史》卷 53《礼志》。

② （元）陶宗仪：《说郛》卷 40 引上官融《友会丛谈》卷 3。

③ （唐）魏征：《隋书》卷 84《契丹传》。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 100《失韦传》。

⑤ （唐）魏征：《隋书》卷 84《室韦传》。

要习俗，“父子男女以髡头为轻便”，[①] 苏颂使辽诗中记录辽俗称“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②]“削顶垂发”就是契丹人髡发之式，顶上头发削掉一部分，其余头发垂下来，不结辫。女真髡发稍不同，《三朝北盟会编》卷3：“男子辫发垂后”。[③] 范成大使金时所见：“男子髡顶，月则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村落间多不覆巾，蓬辫如鬼”。[④] 从出土文物看，“女真人是髡发，颅后两条辫子”。[⑤] 鲜卑系统的发式名称两种，一为“辫发”，或“索发”，一为“髡发”，其实就是一种发式的两种称呼，“辫发”或“索发”是指其所留头发编结成辫的部分，但也有剃光头发之部分；髡发则是指其秃发部分，但也有余发结辫之部分。故文献中载鲜卑发式为“髡发”，[⑥] 又称拓跋鲜卑为“索头”。[⑦] 契丹，乌桓、室韦都应是这种发式，甚至包括以后的女真，都有秃发的一部分，亦有结辫的一部分，但各族“髡发”与“辫发”之部位可能不尽相同。党项族的早期发式或“辫发”或“披发”，但无“髡发”部分。阎立本《西域图》载弥药人的发式是：

> 一王皮韬小髻，余发垂双辫如绫，皮裘玄靴，解衽交手按膝。一奴皮韬，发余垂独辫，朱裘玄靴者。[⑧]

《长编》卷35：

> 保忠（拓跋继捧）方寝，闻难作，单衣披发，仅以身免。[⑨]

《西域图》弥药人是辫发，《长编》载拓跋氏是披发。其实，辫发即披

①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②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前使辽诗》。
③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3《炎兴下帙》引张汇《金虏节要》。
④ 《永乐大典》卷11951“顶”字韵引《揽辔录》佚文。
⑤ 邓宋臻：《女真发辫式样管窥》，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⑥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⑦ （梁）沈约：《宋书》卷95《索虏传》：“索头虏姓拓跋氏。”
⑧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4《西域图》。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条。

发，解辫则披也。此与西羌“被发覆面”[①]之“被发”相同，与吐蕃“辫发而萦之”[②]的“辫发”亦相同。何也？党项人的“羌化”也。说明早期党项进入羌中后，已染羌俗，故其发式为辫发和披发。赵元昊为了恢复鲜卑旧俗，发扬鲜卑之民族传统，“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③]《隆平集》称：

> 其文人服靴笏幞，武臣金帖镂冠，……余皆秃发，耳重环。[④]

《辽史·西夏外记》载：

> 其俗，衣白窄衫，……秃发，耳重环。[⑤]

《涑水纪闻》卷12：

> 王吉……请髡发，衣胡服……诈为胡人。[⑥]

宋人化装成党项人必须“髡发”，可见，元昊的秃发令是确实实行了。现存有关西夏人“髡发”的文物资料不多。前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陈列品第59号（观音像）有两个着党项服装的人，头式为“秃发”。[⑦]安西榆林窟第29窟壁画中有三位少童是“髡顶”的，[⑧]其髡发形式近于契丹之发式。如果党项内部主体民族是羌族，而元昊却要从根本上去改变羌民族的习俗，变“被发”为“秃发”，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所以，这种恢复鲜卑发式之制

---

①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上。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条。

④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⑤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⑥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⑦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第6章《11—13世纪的西夏文献——黑城遗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⑧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章有“西安榆林窟第29号，窟壁画西夏供养人武官和童子像”。

度，[①] 可视之为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八，亦是可确证党项源出鲜卑不可推翻的证据。[②]

五

要证明党项源出鲜卑，余以为还有一个最为可靠的证据，即着手对现存数百个党项族姓进行分析，看其鲜卑系统的族姓在党项族中所占比例究竟有多大。下面对如下姓氏进行分析。

拓跋氏：为鲜卑，参见拙稿《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③]

折氏：据《新五代史·党项传》载，折氏为党项之大姓。[④] 查《折克行神道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⑤]《宋会要·府州》："折氏，世为云中大族"。[⑥]《东都事略·折可适传》记："其先与魏道武俱起云中，号代北著姓"。[⑦] 据《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载，折掘为河西鲜卑部。[⑧]《姓解》卷1亦称："折屈，虏复姓也。南凉秃发傉檀立其妻折屈氏为后，今府州折氏盖折屈氏之后也"。[⑨]"代北著姓"、"云中大族"，均可理解为鲜卑姓，而河西鲜卑与元魏拓跋同种。可知折氏是流进党项的河西鲜卑部落。又《册府元龟》卷972有"达怛都督折文通"，[⑩]《宋史·党项传》中府州折氏又有"突厥移"之名，府州还有"突厥罗"之名，[⑪] 折氏本身即已有部分鞑靼与突厥部人。《宋朝事实类苑》卷54又称："夏倚常言，嘉祐中为麟倅，沿牒至府，其州将乃

① 元昊秃发令颁布后，西夏国内有秃发者，亦有不秃发者。武威木板画之西夏男性头发即有秃发者，亦有不秃发者（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图8"武威林场西夏墓驭马木板画"、图9"武威林场西夏五男侍木板画"）。（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上记载西夏使臣为"椎髻披发"。

② 关于西夏"秃发"之考证，可参见余《西夏秃发考》一文中的详细考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参阅拙作《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④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⑤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7《折克行神道碑》。

⑥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5册《方域》21《府州》。

⑦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04《折可适传》。

⑧ （唐）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⑨ （宋）邵思：《姓解》卷1《手六》。

⑩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郊·征讨》6。

⑪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折）御卿四世孙，不类胡种”。[①] 因为夏氏认为麟州折氏本是“胡种”，所以折御卿之后代“不类胡种”而提出此说。折氏为“胡”，而不是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称：“羌族有河西折氏，世家云中，为北蕃大族”。[②] 羌族无居云中者，更不可称“北蕃”，只能称“西蕃”，此处之“羌”当为“蕃”之误。北蕃与河西鲜卑、代北著姓均可称之为“胡种”。

慕容氏：据《长编》卷 312，环州有属羌慕家族。[③]《宋史·种世衡传》载：有党项羌酋慕恩。[④]《西夏书事》卷24载：环州有蕃官慕化。[⑤]《宋史·夏国传》载有慕洧，[⑥] 应为慕容洧。《三朝北盟会编》卷 192 记：“慕容洧奔夏国。……洧，环州人”。[⑦]故知环州党项慕家族当出自慕容鲜卑，而这支慕容鲜卑，又当出自吐谷浑。《元一统志》卷 4：“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閤门”。[⑧] 环州在金明西，可知，这慕家族当来自吐谷浑。

独孤氏：《宋史·夏国传》载，李继迁祖母独孤氏，[⑨]《西夏书事》延州党项李士彬母亦独孤氏。[⑩]独孤，为屠各，匈奴之姓，匈奴入鲜卑，后又为鲜卑部族。[⑪]沈曾植《鲜卑部族考》有独孤部族[⑫]。西夏文《文海》亦有“陀割”之族姓，[⑬]党项族中亦有匈奴鲜卑成分。

西壁氏：《新元史·太祖纪》有夏太傅西壁（又作鲜卑）讹答。[⑭]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中有“真义国师西壁智海”。[⑮] 西壁则是鲜卑姓氏，或以鲜卑为姓的。西璧即鲜卑。《永乐大典》中更保存有“唐兀西卑氏”之

---

①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 54《将帅才略》。
②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 38《折氏》。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2 元丰四年四月丙子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 335《种世衡传》。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4 熙宁九年八月条。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⑦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92《炎兴下帙》绍兴九年正月熙河路经略使慕容洧叛附夏国条。
⑧ （元）孛兰肹：《元一统志》卷 4《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⑨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⑩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2 宝元元年九月条。
⑪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独孤部即屠各部”。
⑫ （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 2《鲜卑部族考》。
⑬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1 · 114 条，第 440 页。
⑭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 3《太祖纪》。
⑮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西夏壁画》，载《文物》1980 年第 9 期。

传，西卑即西壁即鲜卑。保定明代西夏文石经幢中保存了“鲜卑三鸠”等六位姓“鲜卑”的党项人。[①]西夏文《文海》亦有“西壁”一姓。[②]

野利氏：为党项八部之一，也是党项大姓。新旧《唐书·党项传》作“野辞氏”，《通典》、《太平寰宇记》作“野律氏”，[③]新、旧《五代史》作“野利氏”。“野利”又译作“拽里”、“叶里”、“叶勒”与“野律”，均应为“耶律”之异译，为契丹之族姓。耶律氏来源于契丹起源之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④]契丹耶律氏何时进入党项，目前尚无文献明证。据现存文献，至少在唐初即已进入。耶律氏进入党项后，唐中叶迁入庆州一带居住，后又有部分迁入绥州、延州，甚至灵州、环州一带，统称为“南山野利（狸）”。[⑤]唐时野利族与吐蕃关系密切，“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⑥]该部野利秃罗都、野利景庭、野利刚等同吐蕃一起进攻唐军，该族逐渐“吐蕃化”。到五代时，野利族已被人视作为“吐蕃”而非党项，故宋琪称：“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⑦]即是野利氏吐蕃化的结果。

颇超氏：隋唐之际为早期党项八部之一，但后来不见该氏。疑原居雪山、后迁至庆州的“破丑氏”即“颇超氏”。五代后唐时李仁宝妻为破丑氏，时人称“夫人以元魏灵苗，孝文盛族”。盖指破丑氏为鲜卑也。[⑧]《西夏文字典》又有“跛周”[⑨]一姓。金源黑号姓氏有“蒲察氏”，[⑩]《金史·景祖纪》、《金史·留可传》有“蒲察部”，[⑪]“蒲察”又译作“普察”、“仆叉”、“富察”，疑

---

① 《永乐大典》卷2806《西卑传》；史金波：《西夏社会》下册，第867—869页。

②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6·123条，第415页。

③ （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4《党项传》。

④ （元）脱脱：《辽史》卷116《国语解》。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引赵珣《聚米图经》：“在安（唐安乐州，今宁夏同心西）盐（今陕西定边）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癸酉条：“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元）脱脱：《宋史》卷276《尹宪传》作“南山野狸”。（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又作“野狸十族”。

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264《宋琪传》。

⑧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47页。

⑨ （俄）聂历山：《西夏文字典》，载《西夏语文学》第2册（下引《西夏文字典》均同此，不另注）；西夏姓氏译文采自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5章，第256—258页。

⑩ （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

⑪ （元）脱脱：《金史》卷1《景祖纪》、卷67《留可传》。《千家姓》称蒲察氏为河西族，见（明）陈士元：《姓觿》卷2《平声》。

与“颇超”、“破丑”、“跛周”皆一音之转。

米擒氏：为党项八部之一。《西夏文字典》有“每尼积”一姓，实应译为“米擒”，西夏文《杂字》即有“米旌”一姓。《金史·百官志》有“梅知氏”，[①]《辽史·营卫志》为“梅只部”，[②]“梅只”、“米擒”，“每尼积”，为同音异译。

贺朗氏：《长编》卷490：“其（夏国）洪、宥、韦三州都统军贺朗赍率众迎战”。[③]贺朗赍为西夏统军使，西夏文《碎金》有番姓“贺兰”，[④]其名为贺兰势，《杂字》中有番人名“贺兰金”。[⑤]鲜卑有贺兰氏，《魏书·官氏志》：“北方贺兰氏，后改为贺氏”。《泾阳图经》：“贺兰山，……鲜卑等类多依山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此山名”。[⑥]贺兰、贺朗当为异译。疑夏人贺永珍、贺守文、贺九言、贺从勖等均为贺兰氏。贺为贺兰之省称。

梁氏：党项大姓梁家族。《长编》卷53：“灵州河外贺兰山侧有大梁、小梁，部族甚盛”。[⑦]“大梁、小梁”宋时即又译作“大凉、小凉”，[⑧]可见非汉人姓氏之“梁”。《太平寰宇记》卷36称：“贺兰山在（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⑨]可知，贺兰山之“大梁、小梁”应为鲜卑，西夏之梁太后，国相梁乙逋一族应出于此。疑梁氏又为鲜卑姓“拔列兰氏”所改，《魏书·官氏志》称：“拔列（兰）氏后改为梁氏”。[⑩]

高氏：西夏大族。前期有高惟正，后期有高崇德、高大节、高大亨、高大伦、高逸、高良惠、高智耀。《元史·高智耀传》称其“隐居贺兰山”，[⑪]故疑其家族出自鲜卑。又鲜卑有高氏，《魏书·官氏志》称：“是楼氏后改为高氏”。[⑫]

---

① （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
②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梅只部为契丹国内的奚族。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丙戌条。
④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载《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范文、中嶋幹起：《西夏文〈杂字〉研究》，台湾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7年，第83页。
⑥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4引《泾阳图经》。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条。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正月丙午条。
⑨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
⑩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⑪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⑫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路氏：党项大姓。府州党项折惟正母为路氏，元代西夏人沙览答里姓路氏，[①] 鲜卑有路氏，《魏书·官氏志》称："没路真氏后改为路氏"。[②] 汉文《杂字》有"路移"一姓，[③] 路移轻读即为路。

苏氏：党项有苏家族。[④] 苏氏有苏忠礼、苏执礼、苏志纯、苏寅孙、苏尼通、苏守信、苏吃曩。鲜卑有苏氏，《魏书·官氏志》称："拔略氏改为苏氏"。[⑤] 又党项有苏移山海、素移正谋、素移正业等，[⑥] 疑党项苏姓即苏移（素移）之轻读而略去移。

磨卢氏：党项族姓。《宋史·李继周传》有"磨卢家"族。[⑦]《宋史·党项传》有"貌奴"族。[⑧]《金史·交聘表》有"麻奴绍文"。[⑨]《宋史·高昌传》称"邈孥王子族"居贺兰山下。[⑩]《西夏文字典》有"麻勒"一姓。鲜卑有莫芦氏，《魏书·官氏志》称："莫芦氏改为芦氏"。[⑪] 沈曾植《鲜卑部族考》亦列"莫芦"一族。[⑫] "莫芦"、"磨卢"、"麻奴"、"毛奴"、"邈奴"、"邈孥"、"麻勒"均一音之转。

失鹤氏：党项族姓。聂历山《西夏文字典》中有"失鹤"一姓。《辽史·营卫志》载遥辇氏八部中有"室活部"，[⑬] 室活、失鹤，同音异译。失鹤为契丹早期部落。

吴移氏：党项大族。《宋史·党项传》有"吴移族"，[⑭]《金史·交聘表》有夏使"吴移遂良"；[⑮]《宋会要·兵》27 有"吾移越布"，[⑯] 黑城西夏契约有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 2《人物》。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③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 咸平四年七月己亥条："苏家族齐都砌齐"。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3《李显忠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 253《李继周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⑨ （元）脱脱：《金史》卷 61《交聘表》中。
⑩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⑪ （北齐）魏收：《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⑫ （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 2《鲜卑部族考》。
⑬ （元）脱脱：《辽史》卷 33《营卫志》下。
⑭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⑮ （元）脱脱：《金史》卷 61《交聘表》中。
⑯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85 册《兵》27。

“兀移女□□”，[①]《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有夏将“误移业谋、误移乙逋”。[②]西夏汉文《杂字》番姓中有“吴移”[③]一姓。鲜卑有胡掖氏，《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秃发寿阗之母为“胡掖氏”。[④]“胡掖”与“吾移”、“误移”、“兀移”、“吴移”均为一音之转。

吃罗氏：党项族姓。聂历山《西夏文字典》有“吃罗”一姓。鲜卑有叱罗氏，《魏书·官氏志》：“叱罗氏后改为罗氏”。[⑤]《晋书·乞伏国仁载记》有“叱卢部”，[⑥]《西夏地形图》灵州界有“吃罗驿”，[⑦]“叱罗”、“叱卢”、“吃罗”，一音之转。叱卢为河西鲜卑。

如罗族：党项族。《宋史·真宗纪》：“丰州瓦窑、没剂、如罗、昧克等族以兵济河击李继迁”。[⑧]《宋史·党项传》、《长编》卷55同，知党项有“如罗族”。《西夏文字典》有“鱼各罗”一姓。鲜卑有“如罗氏”，《魏书·官氏志》：“如罗氏后改为如氏”。[⑨]沈曾植《鲜卑部族考》亦有“如罗”一族。[⑩]

乞当族：党项部族。《宋会要·丰州》载有“乞党族首领岁移”，[⑪]《宋会要·西凉府》又有兰州马咸山“乞当族”。[⑫]乞党、乞当疑即契丹的异译，《文海》31·132条中有“契丹”[⑬]一族姓。

斡勒氏：西夏陵墓出土残碑M2D：23号中有“斡勒玉宁”。[⑭]党项有兀罗族、[⑮]讹罗文信[⑯]等。《金史》卷1有“斡勒部”，[⑰]《金史》卷71有“兀

---

① 西夏天庆十一年典麦契残卷15件，载《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477页。
②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
③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 （唐）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⑥ （唐）房玄龄：《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
⑦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
⑧ （元）脱脱：《宋史》卷7《真宗纪》2。
⑨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⑩ （清）沈曾植：《海日楼扎丛》卷2《鲜卑部族考》。
⑪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⑫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西凉府》。
⑬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1·132条，第439页。
⑭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图版40，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⑮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2《麟州兀罗族子弟屈德充本族副军主制》；（宋）胡宿：《文恭集》卷19《故麟州兀罗族下殿侍三班差使罗佔亲男崖可本族副军主制》。
⑯ 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⑰ （元）脱脱：《金史》卷1《世纪》。

勒部”，[①]《辽史·兴宗纪》有“斡鲁部”。[②]《西夏文字典》有“讹六”一姓。“斡鲁”、“斡勒”、“兀勒”、“兀罗”、“讹六”，译音之异。可知，斡勒为辽金属下部族，当为契丹族系。

都罗氏：《宋史·夏国传》有“都罗马尾”、“都罗重进”。姚薇元称：豆卢即吐伏卢之异译，[③]则鲜卑有“豆卢氏”，如《周书》卷19有“豆卢宁”，[④]《隋书》卷39“豆卢积”[⑤]等。“豆卢”、“都罗”当为一音之转。汉文本《杂字》有“都罗”[⑥]一姓。

没剂氏：《宋史·真宗纪》有党项“没剂族”。[⑦]《三朝北盟会编》有夏使“没细好德”。[⑧]夏人还有“没细征牟”、“没细游成宁”，[⑨]鲜卑有“万俟（音moqi）氏”，《续高僧传》卷3有万俟天懿，[⑩]《魏书》有万俟丑奴，[⑪]《周书》有万俟道洛[⑫]等，皆鲜卑人。“没剂”、“没细”、“万俟”皆一音之转。

乃来氏：《金史·交聘表》有夏人乃来思聪[⑬]。汉文《杂字》番姓有“乃来”，[⑭]鲜卑有“那卢氏”，[⑮]《北齐书》有那卢安生。[⑯]《晋书》有“那娄奇”。[⑰]《三朝北盟会编》卷3载金人“那懒氏”。[⑱]《金史》太祖母“拏懒氏”，[⑲]即满洲之“纳兰氏”。“乃来”、“那卢”、“拏懒”、“纳兰”当系音转。

细封氏：党项八部之一。《旧唐书·党项传》有细封氏，《通鉴》卷82：

---

① （元）脱脱：《金史》卷71《斡鲁传》。

② （元）脱脱：《辽史》卷19《兴宗纪》2。

③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3《内入诸姓》，第96页。

④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19《豆卢宁传》。

⑤ （唐）魏征：《隋书》卷39《豆卢积传》。

⑥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⑦ （元）脱脱：《宋史》卷7《真宗纪》2。

⑧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6《炎兴下帙》引绍兴五年正月十三日丁巳《夏国贺正表》。

⑨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3《那连提黎耶舍传》。

⑪ （北齐）魏收：《魏书》卷10《孝庄纪》。

⑫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5《李贤传》。

⑬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⑭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⑮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3《内入诸姓》：“那娄、那卢，均莫那娄氏之省译。”

⑯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61《安德王延宗传》。

⑰ （唐）房玄龄：《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⑱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重和二年正月十日。

⑲ （元）脱脱：《金史》卷2《太祖纪》。

“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①]俟汾氏即宇文氏。“俟汾”，“细封”一音之转。

拽浪氏：《宋史·夏国传》有夏臣“拽浪撩黎”，[②]《宋史·真宗纪》有“拽浪南山”。[③]又译作“叶朗”。汉文本《杂字》有“夜浪”一姓。[④]《魏书·官氏志》有“伊娄氏”，[⑤]又作“伊楼”，[⑥]“拽浪”、“夜浪”、“叶朗”、“伊娄”当为译音之异。

野蒲氏：《元史·昂吉儿传》有党项人昂吉儿，姓野蒲氏，[⑦]李继迁党有“移湖族”。[⑧]鲜卑有“乙弗氏”，《北史》卷13有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⑨]又有“乙弗丑”。[⑩]“野蒲”、“移湖”、“乙弗”，译音之异也。

麻骨氏：《金史·交聘表》有夏使麻骨德懋及麻骨进德。[⑪]《续通志》又译作“莽古”。[⑫]女真有“蒙古氏”，[⑬]又作“萌古”、“忙古”等。《金史》卷102有“蒙古纲”[⑭]等。夏国又有“蒙古城”，[⑮]是否即麻骨（蒙古、忙古）族之居地？“麻骨”、“莽古”、“蒙古”、“忙古”，译音之异。

把里氏：《新唐书·党项传》有“把利族”，[⑯]《金史·交聘表》有夏使“芭里庆祖”、“芭里安仁”、“芭里昌祖”[⑰]等。鲜卑有“拔列氏”。《魏书·官氏志》：“拔列氏后改为梁氏”。[⑱]“拔列”、“芭里”、“把利”，皆一音之转。汉

---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2《晋纪》4。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元）脱脱：《宋史》卷7《真宗纪》2。
④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⑥ （梁）沈约：《宋书》卷95《索虏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⑨ （唐）李延寿：《北史》卷13《后妃传》上。
⑩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19《薛孤延传》。
⑪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⑫ （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81《氏族略》。
⑬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第1种《金史氏族表》。
⑭ （元）脱脱：《金史》卷102《蒙古纲传》。
⑮ （宋）刘挚：《忠肃集》附录《王开府行状》。
⑯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⑰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⑱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文本《杂字》番姓有“芭里”一姓。[①]

仡党氏：《辽史・圣宗纪》有党项曷党部，[②]《宋会要》有党项仡党族，[③]鲜卑有渴单氏，《魏书・官氏志》：“渴单氏后改为单氏”。[④]又作纥单、可单，“曷党”、“仡党”、“渴单”、“纥单”、“可单”，均译音之异。

悉利氏：《宋史・李继隆传》有党项悉利族，[⑤]《西夏文字典》有“吃力”姓，鲜卑族有“俟力伐氏”，《魏书・官氏志》俟力伐氏后改为鲍氏。[⑥]俟力伐省读为俟力，“悉利”、“吃力”、“俟力”，音近译异。

篪逋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灵州党项“篪逋族”。[⑦]鲜卑有“乞伏氏”，又作乞步氏。《元和郡县图志》灵州有乞伏山，[⑧]《魏书・官氏志》：“乞伏氏后改为扶氏”。[⑨]“篪逋”、“乞伏”、“乞步”，皆译音之异。

毛羽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载府州党项毛羽族。[⑩]汉文本《杂字》番姓有“毛女”一姓，[⑪]鲜卑有“莫舆氏”，《魏书・官氏志》：“莫舆氏后改为舆氏”。[⑫]又作慕舆。“毛羽”、“毛女”、“莫舆”、“慕舆”，音近译异。

拽藏氏：《宋史・李继周传》有党项拽藏族。[⑬]鲜卑有“乙旃氏”，《魏书・官氏志》：“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⑭]《宋书》卷43有乙旃眷，[⑮]《晋书》卷125有乙旃涂，[⑯]皆鲜卑人。“拽藏”、“乙旃”，译音之异也。

叶示氏：《长编》卷63有党项熟户“叶市”族，[⑰]《宋史・党项传》又有

---

①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② (元)脱脱：《辽史》卷15《圣宗纪》6。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6册《蕃夷》1。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⑤ (元)脱脱：《宋史》卷257《李继隆传》。
⑥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⑦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
⑧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4。
⑨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⑩ (清)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2《古迹》录《宋折国公碑阴字迹》。
⑪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⑫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⑬ (元)脱脱：《宋史》卷253《李继周传》。
⑭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⑮ (梁)沈约：《宋书》卷43《檀道济传》。
⑯ (唐)房玄龄：《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
⑰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戊戌条。

“叶示族”，[1]《长编》卷319有“叶市归埋”，[2]《宋会要》有“叶石悖七”，[3]清译为“伊实”。《辽史》太祖二十部中有“乙室部”，驻地在“西南招讨司境内”，与夏国接连。[4]绍兴初“乙室部”逃入夏国。[5]乙室为奚族，亦为鲜卑种，叶示、叶市、叶石、伊实、乙室，译音异也，实为一。

费听氏：党项早期八部之一，陈士元《姓觿》卷7称：“费听：夷姓，党项部族，出后魏官氏志。”[6]但今本《魏书·官氏志》无费听氏，不知陈氏出处。

娥氏：唐夏州朔方县有娥冲虚，后晋夏州定难军有都料官娥景稠，[7]宋初夏州定难军有都料官娥敬万，[8]当为党项。《魏书》卷30称：“娥清，代人也……拜给事黄门侍郎，后转宗正卿”。[9]任宗正卿职，必为元魏宗室。又《宋书》卷48：“索虏拓跋嗣遣弟黄门郎鹅青”[10]。鹅青即娥清异译，知娥清为魏明元帝拓跋嗣之弟，后娥清以罪戾见摈于皇族，不得袭用阴山贵姓。故姚薇元先生称：“代郡娥氏，本姓拓跋，因事被黜，以名为氏，鲜卑族也”。[11]故夏州娥氏亦是融进党项中的鲜卑。

从上述三十多个党项姓氏与鲜卑及其族系的姓氏对音，可以看出，鲜卑系统族姓在党项族姓中保存量是相当大的，而且还可以找出许多，这应当可以作为党项源出鲜卑的一个可靠证据。

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大部分汉文文献将党项视为“羌”是有道理的。因为党项部落的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辛卯条。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0册《兵》17。

④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⑤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5。

⑥ （明）陈士元：《姓觿》卷7《去声》。

⑦ 《娥冲虚墓志铭》，《毛汶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36、248页。

⑧ 邓辉、白庆元：《内蒙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338页，2002年。

⑨ （北齐）魏收：《魏书》卷30《蛾清传》。

⑩ （梁）沈约：《宋书》卷48《朱龄石传》。

⑪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1《东胡请姓》，第237页。

早期居地就是“羌中之地”，党项民族如同吐谷浑族一样，原本是从东北地区逐渐迁徙到甘、青、川地区定居下来，长期同羌族混居一起，亦逐渐“羌化”。唐中叶后又从羌中居地迁到陕、甘、宁三边地区，其族从西羌之地来。所以当时的汉文文献均习惯性地称之为“西羌之别种”、“西羌之遗种”等。

（二）藏文文献又称党项（木雅）出自吐蕃之“董族”。党项移居羌地后，由于吐蕃的扩张，一部分党项人（木雅）并入吐蕃部落，成为早期吐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党项（木雅）之族源就是吐蕃，更不能因此而称之为羌，正如吐谷浑（阿柴）人被并入吐蕃后被藏文史料称之为“Va-zha”部落一样，Va-zha并不是吐蕃族，也不是羌族，而是吐谷浑族、鲜卑族。木雅（弥药）亦当如是。

（三）唐末之时，正因为这些被“羌化”了的党项族，或在人种上，或在习俗上，或在文化上，仍然保留着过去民族痕迹，而这些残存的痕迹已被一部分人所认识，因此，在许多文献中还保留着将党项称之为“胡”的记录，以否定习惯性的称号“党项羌”。

（四）考对各种汉、夏、藏文文献，其中透露的种种信息均可证明，党项最早的原居地在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有“党项城”的记录更可证明，党项族源为东北民族。

（五）西夏文献中罗都与七兄弟的传说，及早期党项八部的出现，与契丹、鲜卑、匈奴、高丽、百济的八部说完全相同，这应是证明党项源出鲜卑系统的重要证据。

（六）党项人保存的多种风俗习惯与契丹、鲜卑系统民族风俗相同，而与羌族相异。特别是已被“羌化”了的党项族到元昊建国时颁行“秃发令”，一改旧日“被发”之羌俗，而恢复推行“秃发”的鲜卑俗。如果党项民族之族源不是鲜卑而是羌族的话，这种要改变蓄发风俗的“秃发令”能制定与推行吗？如果党项民族不是鲜卑而是羌族的话，刚立国的元昊所制定的第一项国家法令岂不就是逆全民族之心而动吗？可反证党项非羌而是鲜卑。

（七）从现存的数百个党项姓氏中，我们找到了三十几个与鲜卑及其族系相同的姓氏对音，可以反映，鲜卑系统族姓在党项姓氏中保存量相当大，亦可成为党项源出鲜卑的一个有力证据。

凡此种种，余以为，党项应源出鲜卑，而非羌或藏。

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考辨

一、弥罗、弥药与拓跋

关于文献中出现的"弥药"一词，虽有诸多专家考释，但始终觉得这一问题尚未解决，[①]近日从阎立本《西域图》中发现在附国嘉良夷之旁记录一国名为"弥罗国"，戴表元的文字表述是：

> 一王皮韬小髻，余发垂双辫如缕，皮裘玄靴解衽，交手按膝。一奴皮韬，发余长独辫，朱裘玄靴者。吐国（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②]

这是余发现的一段极为珍贵的党项国早期史料，记录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初年，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党项、西夏史料中最早成文的文字记录，"弥罗国"与党项有何关系？"弥罗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

---

① 关于弥药研究可参见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 1 辑；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载《图书季刊》第 4 卷第 3—4 期，1943 年；岑仲勉：《党项与于弥语源辨》，载《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6 年，第 105 页；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该氏《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30 页；（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第 223—265 页；Kamil Sedláček：《西夏王朝的党项族名新释》，ZDMEC XN I, 1964, pp.180-185；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近年更有人提出"党项"就是"东胡"、"弥药"就是"鞑鞨"的说法，参见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76—278 页。完全不顾各种历史事实，进行这种荒谬的对音比证，只能将历史研究引入歧途。

②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 4《唐画〈西域图〉记》。

如果仅从对音上考察，樊绰《蛮书》中的“弥诺国”[①]与“弥罗国”是极为音近的。但“弥诺国”是今缅甸境内靠近海边的国家。伯希和认为“弥诺国”在弥诺江与伊洛瓦底江汇流处；岑仲勉认为在今曼尼普尔城之故地；陈序经认为在缅甸西境阿腊千一带。[②]三说均与《西域图》中所载“弥罗国”方位相距太远，可以断言，《西域图》中的“弥罗国”非《蛮书》中的“弥诺国”。

《西域图》称“弥罗国”的方位在“吐国（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吐谷浑之地虽东西绵延数千里，但其主要驻牧地区在“甘松山之阳，洮水之西”，[③]这一点是明确的。白兰的方位就比较麻烦，有《华阳国志》中汶山郡的“白兰”，[④]有《后汉书》莋都夷中的“白狼”，[⑤]又有《魏书》、《周书》中吐谷浑西南之“白兰”。[⑥]这个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作过详细论证，但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余倾向于周伟洲、黄颢二先生的观点，[⑦]白兰应分为青海湖西南和四川西北两大部分，即《新唐书·党项传》中所载：“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⑧]十六国、南北朝、隋时的“白兰”应主要指青海湖西南之白兰，而这一部分白兰被吐谷浑控制，到唐初，文献中所出现的“白兰”则是指四川西北之北之白兰，亦即属于党项的“左部白兰”。《新唐书·党项传》还载“以其（白兰）地为维、恭二州”。[⑨]维、恭二州即唐初白兰之地，在今四川汶川、理县之西北，弥罗国的方位大约就在洮水、西倾山之南，维、恭二州之北，即今四川阿坝州与若尔盖之间。求证了弥罗国的方位，再比较“弥罗”二字的译音，余疑“弥罗”即《新唐书·党项传》中的“弥药”，[⑩]亦即《隋

---

① （唐）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

② （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上卷《陆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陈序经：《骠国考》，载《陈序经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

④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汶山郡》。

⑤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⑥ （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传》；（唐）令狐德棻：《周书》卷50《吐谷浑传》。

⑦ 周伟洲、黄颢：《白兰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

⑧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⑨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⑩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书·附国传》中的“婢药”。[①]“弥药”、“婢药”、“弥罗”不仅音近互转，而且“弥罗国”地望与“弥药”、“婢药”地亦相近，“弥罗”当即“弥药”、“婢药”的可能性极大。

关于“弥药”一族，汉藏文献记载甚多。弥药人与吐蕃很早就有联系，而且关系密切。据藏文文献记载，松赞干布的妃子洁莫尊即弥药王之女，[②]既有“弥药王”，当即有“弥药国”。可见，至少在唐初还有一个“弥药国”存在。多数藏文著作都认为“弥药”之地在青海的北方，还说“弥药王的王宫”在甘州与额济纳之间，因此有“北方弥药”之说。[③]这一点汉文材料也可印证，汉文文献中出现的“弥娥山”、[④]“弥娥泊”、[⑤]“弥娥城”、[⑥]“弥娥州”[⑦]等，都在碛南居延海与贺兰山近侧。这一带应是“弥药”人的早期居地。

由于漠北部落（柔然、突厥等）的势力不断南逼，可能有一部分弥药人南下，越过青海湖，来到了四川西北部的深山大谷中定居下来，“弥药”人像宕昌、白兰人一样加入了党项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建立起弥药政权，这就是《西域图》中的“弥罗国”，藏文称之为“密纳克（mi-nak）”。那么“弥药”是什么人呢？余以为，是党项族内的拓跋部。从上引藏文资料，弥药人来自北方，来自于甘州与贺兰山之间的地区，即河西地区。又知拓跋鲜卑与秃发鲜卑同种同源，秃发鲜卑又称河西鲜卑，[⑧]党项拓跋部出自河西鲜卑的秃发氏，[⑨]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从河西来的，因此，又有许多地方将党项拓跋氏称之为“河西人”，[⑩]明代《华夷译语》就将“密纳克（弥药mi-nak）”译作

---

① （唐）魏征：《隋书》卷83《附国传》。

②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该译本余一直未买到，此处征引为其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发表连载本）。

③ 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转引自（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4卷第1期，第223—265页。

④ （唐）李筌：《太白阴经》卷4《关塞四夷篇》。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7。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71《浑传》。

⑦ 今苏州文庙文管会藏南宋《地理图》，在居延海与贺兰山左下注明“碛南弥蛾州”。

⑧ （唐）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又（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3：“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

⑨ 拙稿《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⑩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蒙古人初名此国曰河西，续名之曰唐兀惕”。（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4：“唐兀即河西。吴海王氏家谱序云：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盖河西即西夏也。

“河西”。[1] 此其一。

再从拓跋赤辞部落的居地来看，《新唐书·党项传》：

> 有拓跋赤辞者，初臣吐谷浑……赤辞知宗族携沮，稍欲自归，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于是自河首、积石而东，皆为中国地。[2]

此事系年在贞观初，松州都督府辖下三十二羁縻州之地亦与《西域图》中“弥罗国”地望相合，时间与地望均合，故又可以认为文献中的“弥罗国”即拓跋赤辞领导下的松州都督府属下的党项国，居地在洮水、西倾山之南，积石山以东，维、恭二州以北，[3] 实际上也就是一“拓跋国”。此其二。

再者，汉文中“弭药”一词真正的出现仅有两次，一是《旧唐书·党项传》：

> 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指拓跋氏）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指拓跋氏）故地陷于吐蕃，其（指拓跋氏）处者为其（指吐蕃）役属，吐蕃谓之“弭药”。[4]

二是《新唐书·党项传》：

> 后吐蕃寝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其（指拓跋氏）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5]

根据这些记载，有些学者就将“弭药”理解为留居在原地而被吐蕃役属

---

① （明）火原洁：《华夷译语》，《涵芬楼秘笈》第4集。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1《地理志》松州都督府辖二十五羁縻州，又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剑南道北部》之松州都督府领地，第43—44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的党项人。余以为，这是对原文理解不细而产生的误会。新、旧《唐书》的记载虽有个别字句差异，但大体意思是一致的，只不过《新唐书》比《旧唐书》更文饰一些。这一段话，主语是“拓跋氏”，后面的“其”字都是人称代词，代“拓跋氏”，丝毫不涉及党项。很明显，关于“弭药”一词最原始的认识与界定在两《唐书·党项传》不是指整个党项族，而指党项族内的一个部落，即党项拓跋部。此其三。

据此，余可以这样认为：弥罗国即弥药国，而弥药国当即拓跋国，亦即拓跋人领导的党项国，故又称之为“弥药国”。如此证可以成立，则《西域图》中的“弥罗国”国王当即《旧唐书·党项传》中的“拓跋赤辞”。又据《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娶弭药人洁莫尊为妃，称“茹雍妃”。[①]此妃曾在拉萨建造过卡查寺，很明显，这个“弭药王”当为《西域图》中的“弥罗国王”，也就是“拓跋赤辞”。[②]

弭药人最早的居地并不是四川西北部的深山大谷，而在青海北面的一座大山之中。《新红史》记载，弭药人的先祖“斯乌王”生在凉州与嘎（Gha）地的一座大山中。[③]《贤者喜宴》、《红史》、《西藏王统记》则称此山为“门西山”。“嘎 Gha”即“夏”字的译音，“嘎地”当指“夏州”。石泰安先生认为，这座山应该是指“贺兰山”。[④]余以为，这一分析是极为正确的。贺兰山是“弭药人”的发源地，西夏文《圣立义海》称“贺兰山”为“贺兰山尊”，将其列为“夏国三大山”之首，[⑤]当是对祖先居地的崇拜。《吴文正公集》卷 42《李世安墓志》称“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⑥]“于弥”即“嵬名”，“嵬名”即拓跋，[⑦]可见，拓跋部的祖籍确实是在贺兰山。《太平寰宇记》卷36：“贺兰山在（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⑧]拓跋亦为鲜卑部族，更可证，

---

① 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
② 唐太宗贞观时党项人能称为“弥罗王（拓跋王）”者，非拓跋赤辞莫属。
③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7 页。
④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第 223—265 页。
⑤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 58 页。
⑥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 42《李世安墓志》。
⑦ 考证见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该氏《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9 页。
⑧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36《关西道》12。

拓跋部起源于贺兰山。“于弥”是西夏语“拓跋”的读音，而吐蕃人称“于弥”则转为“弥药（mi-nak）”，这应是早期弥药的原始意义，则是指拓跋。与藏文材料参比，则可证，藏文中的“弭药”即汉文献中的“拓跋”。

还有一材料，《蒙古源流》卷 4 称：“（成吉思汗）杀锡都尔固合罕，纳其古尔伯勒津高娃夫人，并收服密纳克唐古特国”。[①] 密纳克，即是指“弥药（mi-nag）”，唐古特国，即指西夏（或党项）国，这里在唐古特国之前还加一个“密纳克”，就是指拓跋氏的唐古特国，相当于后人所称“拓跋夏”一样。可知，到十七世纪初蒙古人还认为“密纳克（弥药）”就是“拓跋”。

前面所证似乎可以证明一个问题，弭药人的确切含义应是指居住在贺兰山的鲜卑拓跋部，正因为他们的居地在藏族居民地的北方，故藏文史籍中又称其为“北方弭药”，而藏文材料中又有“Bodmi-nag（藏弥药）”之说，这恐怕是指北方弭药人流进藏区的部分，像前引之“吐谷浑之南、白兰之北”的“弥药（罗）国”，实即流进藏区的鲜卑拓跋部。

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材料中记载的“弥药”似乎不是指“鲜卑拓跋”，而是指党项或者西夏，这又应怎样解释？是的，这样的材料确实很多，先排列材料：

（一）西夏文《文海》杂 9 · 242 条：“番，弥药也，番人之谓”。[②] 很明显这里的“番”绝不仅指拓跋，而指党项。西夏国内的“番”一般是与“汉”相对应的，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之“番”当即是党项。

（二）西夏文的“宫廷诗”中有“黑头石室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源，高弥药国在此间”。[③] 这是歌颂先祖的诗，当时夏国尚未建立，这“高弥药国”应指党项国。

（三）西夏文宫廷诗还有：“我处皇族不间断，弥药皇储代代传”。“衙门官员有几何，要数弥药为最多”。“弥药勇健走，契丹缓步行”。[④] 这里的弥药也应该是指党项，第一个弥药亦可指“拓跋”。

---

①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 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76 页。沈曾植称密纳克为满剌，误，密纳克即弥药（mi-nag），参见《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卷 4，第 178 页注 4。

②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杂 9.24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③ （俄）聂历山：《关于西夏之国名》，载《西夏语文》第 1 卷，莫斯科，1960 年。

④ 此处西夏宫廷诗为陈炳应译，见陈炳应：《西夏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

（四）《宋史·于阗传》："绍圣中，其（于阗）王……又言：缅药家作过，我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①]《宋会要辑稿·蕃夷》6："董毡遣人以蕃书，已回写蕃书，约令引兵深入，摩灭缅药家"。[②]《长编》卷363："蕃家王子结施哥揽哥邦彪鄂特凌古文字送与熙州赵龙图，探得缅药家点集人马，告汉家边上，作大准武"。[③]"缅药"即"弥药"，清译又作"满裕克"。这里三处提到的"缅药家"，很明显指的是西夏。

（五）元《彰所知论》将藏文中的"弥药"直译为"西夏"；[④]明《华夷译语》将藏文"弥药"则译成"河西"，因西夏国又可称作"河西国"。[⑤]总的来说，当时人与后来人一般都将"弥药"视作党项或西夏，这是不奇怪的。"弥药"一词实际上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变化过程，最初，弥药当为专指拓跋部，后因为不论是党项时期还是西夏时期，拓跋氏总是它们的领导者，用"拓跋"来作为党项或西夏的象征是完全适宜的，故文献中常有"拓跋夏"之说，就像后人称唐朝为"李氏王朝"，宋朝为"赵家王朝"一样，到后来，弥药一词的内涵扩大到党项甚至整个西夏。故当时的西夏人、藏族人、汉人以及后来的藏人、蒙古人称党项或西夏为"弥药"，也是合理的。

二、河西党项

唐中后期，党项各部大规模地内徙后，逐渐形成了六大部落集团，即平夏党项（居银夏以北）、东山党项（居庆州）、南山党项（居安、盐州以南）、渭北党项（居原、渭州）、河曲党项（居鄜、坊、麟、府以至太原）、河西党项（居河套地区），此处仅谈"河西党项"问题。

党项部落进入河西大约是在武则天时期。《新唐书·党项传》："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万，以其为朝、吴、浮、归十州，散居灵、夏间"。[⑥]到圣历初年，就扩展到胜州一带。《新唐书·陆余庆传》："圣历初，灵、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0《于阗传》。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3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子条。

④ （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32《彰所知论》卷上《情世界品》第2。

⑤ （明）火原洁:《华夷译语》，查今通行涵芬楼秘笈本无此条，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35页。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1] 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又将迁居庆州的党项部落迁河西地区。《新唐书·党项传》:“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2] 故《新唐书·地理志》称 :“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3] 从一般意义上的“河西”来讲，党项部落大约在武则天、唐玄宗之时就已进入了河西地区。但这还不是我们要论及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党项部落集团——河西党项的内容。《旧五代史·党项传》有这样的记载 :

> （唐德宗时）党项部相率内附，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4]

注意，这里的“河西”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河西，因为内述的邠宁、鄜延、灵武、麟府等均在广义的河西范围之内，而又以“河西”一名并列，即反映了这一名称的特定意义。余意以为，这一“河西”即为“河西党项”之“河西”，亦即河套地区。

“河西党项”一词最早见于唐太宗时。《旧唐书·刘师立传》:

> 时河西党项破丑氏常为边患，又阻新附，师立总兵击之。军未至，破丑氏大惧，遁于山谷，师立追之，至恤于真山而还。[5]

据《旧唐书·刘师立传》，师立时为岐州都督，[6] 据《新唐书·党项传》，师立时为岷州都督。[7] 这个“河西党项”居地在什么地方呢 ?《新唐书·党项传》载 :“居雪山者曰破丑氏”。[8] 这雪山实际就是指大积石山，即今阿尼玛卿

---

①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116《陆余庆传》。
②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③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7。
④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 138《党项传》。
⑤ （后晋）刘昫 :《旧唐书》卷 57《刘师立传》。
⑥ （后晋）刘昫 :《旧唐书》卷 57《刘师立传》。
⑦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⑧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山，在黄河九曲之西，故称之为“河西党项”。这被称作“河西党项”的破丑部什么时候内迁，文献无载。但至安史之乱后，破丑部已迁至庆州是明显的。《新唐书·党项传》：

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①

到唐代宗永泰年间，又出现了“河西党项”的记载。《旧唐书·代宗纪》：

（永泰元年二月）戊子，河西党项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宜芳等十五州。②

这个“河西党项”是否还是指迁居庆州的破丑部呢？史文无载。新发现后唐绥州刺史李仁宝妻破丑氏墓志称“今永定破丑氏也。”③可证，永泰元年内属的“河西党项永定等州部落”仍然是破丑部。这个“永定等十二州”在何处？史文亦无载。周伟洲先生《党项羁縻府州变迁表》称永定等十二州属陇右河西，④但不知据何而言。据《表》资料出处是《新唐书·地理志》，然《新唐书·地理志》将永定州置于陇右道下，但在表明具体属处的“右”字下是一“阙”字，证明《新唐书·地理志》亦不知“永定等十二州”属陇右道何州。《新唐书·地理志》这样记载：“永定州：永泰元年以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附，析置州十五”。⑤据前引《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及《李仁宝墓志铭并盖》，⑥可以判断，永定州当在绥州境。也应当是永泰元年永定等州内属后，也将破丑部迁入绥州。绥州亦称“河西”。如此说成立，则可知，这一支“河西党项”居地是在河套地区。

再引证一些材料来佐证这一问题。《旧唐书·刘沔传》：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1《代宗纪》。

③ 《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 247 页。

④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6 年，第 31 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7。

⑥ 《李仁宝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 251—252 页。

太和末，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①

《旧唐书·石雄传》：

太和中，河西党项扰边，选求武士，乃召还，录振武刘沔为裨将，累立破羌之功。②

天德军在河套北岸，振武军在河套口，以两地之师去讨伐“河西党项”，这个“河西党项”居地亦肯定在河套地区。还可引证《旧唐书·武宗纪》载：

（会昌二年）九月，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纥西南面招讨使。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李思忠率回鹘、党项之师屯保大栅。③

据《旧唐书·李德裕传》，保大栅在振武军④。可见这支河西党项亦应在振武一带。

党项在河套地区活动的材料还很多，下面再罗列几条。《旧唐书·范希朝传》：

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⑤

《新唐书·陆余庆传》：

灵、胜二州党项引北胡寇边。⑥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1《刘沔传》。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1《石雄传》。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武宗纪》上。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⑤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6《陆余庆传》。

《元和郡县图志》卷 4：

天德军：先是缘边居人，常苦室韦、党项之所侵掠，投窜山谷，不知所从。[①]

《册府元龟》卷 995：

（太和五年）九月，丰州刺史李公政奏，党项于黑山劫归国回鹘。[②]

《辽史·地理志》：

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③]

《宋会要·方域》21《丰州》：

丰州，本河西藏才族（党项的一支）都首领王甲居之。[④]

可见，振武、天德二军，胜、丰、灵三州等河套地区均是党项部落的居住地。由于它们居地在河套，而唐宋时期的河套地区又被称作“河西”，所以，文献上一般所指的“河西党项”即分布在河套地区的党项部落。

还要指出一点，这一时期的河西党项与唐前期九曲黄河之西的“河西党项”有很大的不同，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破丑氏族”，而融入原居住河套地区的其他北方民族的残存部落，他们亦称“河西党项”。我们可以稍列几条材料来证明。《五代会要·党项羌传》：

天成二年二月，河西党项如连山等来朝贡，进马四十匹。[⑤]

---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4《关内道》4。

② （宋）王若钦：《册府元龟》卷 995《交侵》。

③ （元）脱脱：《辽史》卷 37《地理志》1。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丰州》。

⑤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 29《党项羌传》。

《册府元龟》卷976：

长兴元年月敕：河西党项蕃官来万德可怀化司戈。[1]

《册府元龟》卷972：

（长兴）二年正月，河西党项折七移等进驰马。[2]

“如”（当为“如罗氏”之省称）姓、“来”（“乃来氏”之省称）姓、“折”（“折掘氏”之省称）姓都进入了河西党项部落，可见，河西党项不是一个简单的血缘氏族部落，而是许多部落组成的一个地域性集团的总称，在唐五代时势力不小，一时导引吐蕃入寇，一时向中原王朝朝贡不绝。

最后，再来看一看高居诲《使于阗记》中的记载：

自灵州过黄河，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尊曰捻崖天子。[3]

这一条路线陈守忠先生作过实地考察，从灵州过黄河后，出贺兰山口不是向西行，而折向西北，经现在锡林高勒、和屯盐池至凹度井，转向西南，到达今甘肃民勤县的西屯井。[4]所谓党项界即在灵州过黄河的西北地区，所谓沙岭即在甘肃民勤县的五屯井附近。沙岭，作为党项牙帐所在地。《使于阗记》中的党项部落也应属河西党项部落，河西党项的牙帐有可能就设在沙岭。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河西党项是党项民族内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较大的部落集团，分布地域在今河套及河套以西地区。

辽王朝兴起后，河西党项归附辽朝，成为辽五十九属国中的一国。《辽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6《褒异》3。

②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2《朝贡》5。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3。

④ 陈守忠：《北宋时期中原通西域的几条道路的探索》，载该氏《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228页。

史·圣宗纪》：

（统和十年正月）丙子，以河西党项叛，诏韩德威讨之。（二月）丙辰，韩德威奏破党项捷。（三月）甲申，河西党项乞内附。[①]

据《辽史·韩德威传》：

未几，以山西城邑多陷，夺兵柄。李继迁受赂，潜怀二心，奉命率兵往谕，继迁托以西征不出，德威至灵州俘掠而还。[②]

传、纪所载，当为同一事。亦可证，河西党项的基本居地是往灵州一带。河西党项附辽后，被辽王朝迁往东北。《辽史·营卫志》：

河西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③]

从此，河西党项集团离开了河西地区而在我国东北地区长期定居下来。散落的河西党项或归顺宋朝，或归并西夏。

三、唐古、唐兀与党项

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

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④]最早提出唐古即党项这一观点。然而，观堂先生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这一观点并无异议，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如蔡美彪先生在《乣与乣军之演变》一文中说：

---

① （元）脱脱：《辽史》卷13《圣宗纪》。

② （元）脱脱：《辽史》卷82《韩德威传》。

③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3册卷14《鞑靼考》。

> 大抵辽金文献中所谓唐古，犹如阻卜或鞑靼用以泛称北方诸族一样，系用以泛称西北诸族及不知名的部落，并非专指党项族人，更不是专称西夏。①

陈述先生、张博泉先生均将“唐古”部族列入女真部族之中，而回避“唐古”部族与党项族之间的关系。②

党项是汉族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最早见于《隋书》、《北史》。然而，周边的民族称党项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拓跋部一直是党项族的领导者的缘故，与党项关系极密切的吐蕃人称党项为“mi-nag”，汉译作“弭药”、“弥鹅”、“弥罗”、“缅药”、“木雅”、“木内”、“穆纳”等，③后来又将“mi-nag”推而广之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这大概是南方藏族对党项的称呼。北方民族，就是持阿尔泰语之民族，对党项民族的称呼却不同。如突厥，公元735年鄂尔浑河畔的古突厥如尼文《毗伽可汗碑》东面24行，记载毗伽可汗在十七岁时曾与唐古特（tangut）人作战。这是最早关于“唐古特”的记载。很多学者都认为，唐古特这个字源于党项的“党（tang）”加上蒙古语复数词尾（-ut）。④岑仲勉先生径直将tangut译为党项。⑤当时内迁党项部落已进入了河套地区，直接与漠北的东突厥国相邻，而当时的党项部落尚未建立西夏，故知将《毗伽可汗碑》中的tangut译成党项是正确的。又十一世纪的突厥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也这样记载：tangut是突厥的一个部族名，他们靠近中国（指契丹）而居。还说tangut是定居民族，不是游牧民族。⑥很明显，这个靠近契丹的tangut部落应指党项。还有于阗文和粟特

---

① 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5年。

②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第1种《金史氏族表》卷5；张博泉：《金史论稿》第2编第二章《女真部族的形成与分析》。

③ 上述称呼俱见前引《西藏王统记》、《如意宝树史》、《新红史》、《新唐书》、《西域图》、《宋史》、《西夏地形图》、《蒙古源流》诸藏汉文献中。

④ （美）R. W. 邓内尔（一作邓如萍）著，索介然译：《唐古特是什么民族？——论唐古特的族源和族名》，载《世界民族》1985年第4期。

⑤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914页。

⑥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何锐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关于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称，“tangut党项”是突厥族，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文中，均将党项称为tangut。[①]波斯人拉斯特《史集》将西夏国称为“唐兀惕（tan kqut）”地区。[②]这个“唐兀惕”，在有的文献中也称为“党项国”。《蒙古秘史》也将西夏称为“唐兀惕”。[③]可见，北亚和中亚人对党项的称呼大体一致，或为“唐古特”，或为“唐兀惕”。如将“唐古特”或“唐兀惕”急读，译音也就成了“唐古”或“唐兀”。所以在《辽史》、《金史》和《元史》中，党项又被译作“唐古”或“唐兀”，甚至还有译为“唐骨”、“同古”的。党项之名是汉族人对这一民族的认识，而“唐兀惕”、“唐古特”、“唐骨”、“唐古”则是北方民族包括突厥、蒙古、契丹对它的认识，因此，可以断定“唐古”一词应是党项族的最原始称呼，应早于“党项”一词。

还有一点亦须证明，即唐括（又作适）也是唐古。陈述先生在《金史氏族表》中将“唐古”视同为“唐括”。张博泉先生亦认为“唐古亦作唐括”。[④]《金史·百官志》在“黑号之姓唐括”二字下注有：“旧书作同古”。[⑤]《金史·唐括安礼传》中的“唐括安礼”，在《族帐部曲录》中作“唐骨安礼”。[⑥]“同古”、“唐骨”是“唐古”一词的异译，可证辽金史籍中的“唐括（适）”也就是“唐古”。汉籍中对“蒙古”二字的翻译亦是如此。蒙古，又译作“萌古”、“萌骨”、“蒙括”、“毛割石”、“蒙古斯”[⑦]等。可见，从翻译意义上来讲，辽、金时代的“唐古（括）”即指党项是可以肯定的。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唐古就是党项，那为什么在《辽史》中有的地方称“唐古”，而有的地方却称“党项”呢？余以为，在辽代，尽管唐古是党项已无疑问，但在契丹统治者使用“唐古”和“党项”这两个词时，还是有所区别的。先看看文献中关于唐古诸部的记载：

一是《辽史·营卫志》所载辽分隶南北府的部族军，其中有：

梅古悉，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颉的

---

①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②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编《唐兀惕部落》，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③ 额尔登泰等校勘：《蒙古秘史》续集卷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第1种《金史氏族表》卷5；张博泉：《金史论稿》第2编第2章《女真部族的形成与分析》。

⑤ （元）脱脱：《金史》卷57《百官志》3。

⑥ （元）脱脱：《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

⑦ 上述译名见《辽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金史氏族表》、《亡辽录》、《蒙韃备录》诸书。

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匿讫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北唐古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黄龙府都部署司，戍府南。南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鹤剌唐古部与南唐古同，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①]

二是《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分隶南北府的部族军，其中有：

（北府）西南路招讨司：梅古悉部，颉的部，匿讫唐古部。黄龙府都部署司：北唐古部。（南府）屯驻本境：南唐古部。[②]

三是《辽史·百官志》，记载了辽四十九小部落节度，其中有：

梅古悉部，匿讫唐古部，北唐古部，南唐古部，鹤剌唐古部。[③]

在契丹境内被称为"唐古"者，就是上述六部（包括河西部）。又《辽史·营卫志》圣宗所属三十四部的"奥衍女直部"条下，对含上述唐古六部的部族进行了这样的说明：

自此至河西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④]

这里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述六部唐古都是契丹征略党项时所获之俘虏，初期隶属于辽国的各斡鲁朵，充当宫卫。随着人口增长，部落繁衍，人心归化，到辽圣宗时将这些原来的战俘升格而成为契丹部族。据《辽史》统计，仅太祖、太宗两朝，就对党项部族进行过八次征讨，而且每次俘获人口不在少数。《辽史·太祖纪》：

---

①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② （元）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中。

③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其中有"鹤剌唐古"。鹤剌即Xara,阿尔泰语系中意为"黑",则鹤剌唐古即黑党项。据（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又有黑党项,居赤水西"。（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96:"爰至雪山,建（达）于黑党项"。知唐时黑党项居赤水西之雪山。

④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神册元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户口万五千六百。[①]

这些被俘的党项人户又被契丹统治者安置在契丹的腹里之地，或充宫卫，或为“头下户”。《辽史·地理志》载，祖州有一座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移居到契丹腹里之地的党项俘户经过几代演变后，逐渐顺服归化，而契丹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扩充自己的统治力量，逐渐将这些顺化归服了的部族纳入到自己的统治圈中。《辽史·营卫志》记载的从太祖时所属的部落二十部到圣宗时增置的三十四部，就是很清楚的说明。根据现存有关“唐古”部族的所有记载，余推断：契丹统治者为了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党项部落，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译名，将那些顺服归化了的党项部落称为“唐古”，即将党项最原始的称呼归还了顺化的党项部落，而将那些尚未顺服归化的党项部落仍称之为“党项”。

前已言之，蔡美彪先生并不完全赞成唐古即党项观点，他认为唐古“采用以泛称西北诸族及不知名的部落，并非专指党项族人”。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唐古六部中有“梅古悉”即“蒙古斯”之异译，[③]故应为蒙古部。二、《蒙鞑备录》中载金章宗以唐古部人守净州北长城后又叛归蒙古之事，与《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汪古事迹完全符合，[④]则应是指汪古。应怎样解释这些问题，是否据此就可以否定唐古即党项一说，余尚有些不同的意见。余曾在其他文章中阐述过这个问题：党项族是魏晋以后出现的一个杂糅融合了北方诸种部落的新的民族共同体。[⑤]特别是从甘、青、川边境地区迁入河套地区之后，又长期与残存在这一地区的北方各胡族（如匈奴、突厥、沙陀、鞑靼、吐浑）杂处、通婚，更增加了这一民族的混血成分。尤其是唐后期党项势力大发展时，当时居住在河套南北的一些势力较为微弱的部

① （元）脱脱：《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② （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1。

③ 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5年。

④ 韩儒林：《蒙古的名称》，载《文史哲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

⑤ 拙稿《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落加入党项这个民族共同体中，当时的唐人称党项为“杂虏”、“杂种”、“杂羌”，[①]这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早期的蒙古部落和白鞑靼（即汪古）部落也完全有可能加入党项民族之中。如《宋史·党项传》中出现过的党项熟户“旺家族”，观堂先生即以为是“汪古”。[②]余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北宋人刘挚《王开府行状》载：

> 未几，边将遣兵攻羌境（指夏国），羌复犯我庆州，我亦取其蒙古城。[③]

这恐怕是“蒙古（不指其他译法）”一词的最早记载。余以为，西夏境内的“蒙古城”应就是因蒙古人聚居该城而得名，而这些聚居在西夏境内的早期蒙古人很可能融进了党项部落。因此，在辽金时代的“唐古”部族中出现“蒙古”和“汪古”部族是不足为奇的。

---

①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370《夏平》；（唐）杜牧：《樊川文集》卷15《贺平党项表》。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3册卷14《鞑靼考》。

③ （宋）刘挚：《忠肃集》附录《王开府行状》。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

余在《党项源流新证》一文中，将党项族发源地考定在今大兴安岭、黑龙江及长白山一线的东北地区，其族当为鲜卑之一部，后随鲜卑族东迁，先进入蒙古高原，后入漠南，次入河西乃至青海、积石山一线，大约在魏晋之时，该族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关于这一时期党项部落迁徙的详细过程，文献中没有多少材料进行说明，大概只能从拓跋鲜卑及吐谷浑鲜卑的迁徙史来作一些旁证，而这两种鲜卑的迁徙已在余与其他作者的文章中进行过较为清楚的表述，[①] 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就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的问题进行一些较细致的考证，欲将一些同仁较为忽视的细节搞清楚。这里必须说的一点是，下面表述的每一阶段党项部落的迁徙，都只是指其聚居中心或部分的迁徙，而不是指全部党项族的迁徙。

一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者均将位于甘川两省交界处的白龙江流域视为党项人的发源地，这包括了聂历山、克恰诺夫、吴景敖、邓少琴、李范文及陈炳应诸先生。持此说最重要的依据是《夏圣根赞歌》中的一句诗："赤面父冢白河上"，认为"赤面"指党项，"白河"即白龙江。依据西夏文《文海》中的材料"赤面"，似非党项，而指吐蕃。敦煌藏文卷印 598 号《于阗国阿罗汉授记》之"赤面国"、"赤面王"则均指吐蕃，在其他藏文文献中还将"赤

* 原文发表于《暨南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① 参阅拙稿《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周伟洲：《吐谷浑史》第 1 节，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8 页。

面”与汉、苏毗、霍尔等族并列，统称为于阗的“敌人”。[①]“赤面”为吐蕃当为有据，故党项人源起白龙江流域之说似难成立。[②]吴景敖先生在《西陲史地研究》一书，还居然在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将早期党项八部之拓跋、细封、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擒、把利等部的居地都找了出来，但考证纯系推测，连主张党项源出羌族的周伟洲先生也认为，吴景敖先生的考证“难以尽信”。[③]

党项族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后，其最早的居地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一点，我们须对文献资料进行一些细致的辨识。最早记载党项部落居地的文献是《隋书·党项传》，其称党项之居地为：

> 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④]

这应是《隋书》作者追述隋以前党项部落的居地。《隋书》为党项立专传，亦可证明，时人对党项族已有了较深认识，也有过较多的接触，故其所载应是可以相信的，不宜轻易否定。临洮，指隋临洮郡，即今甘肃南部洮水流域的上游地区；西平，指隋西平郡，即在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平原。“东接临洮、西平”，其意即指党项部落的居地区界接近临洮、西平二郡地。如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来讲，即党项部落的东部界线在青海东侧及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一线。叶护，一般指西突厥领地，即新疆境内的于阗、龟兹、焉耆诸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党项部落进南部新疆的记录，“西距叶护”，则大致是指党项部落的西界接近了阿尔金山一带。其间称“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与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

《旧唐书·党项传》及《新唐书》、《唐会要》、两《五代史》、《宋史》之《党项传》均作大致相同的记载：

---

① 敦煌藏文卷印 598 号《于阗国阿罗汉授记》，转引自杨铭：《关于敦煌卷子中 Lno bal 的研究》，中国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阿勒泰，1993 年；（日）森安孝夫：《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 Drv-gu 与 Hor》，载《西北史地》1983 年第 2 期。

② 关于“赤面”考证，参阅拙稿《党项源流新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黄颢先生也认为“赤面即吐蕃”，参阅《〈贤者喜宴〉摘译》（3）注释 66，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③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 年，第 28—29 页。

④ （唐）魏征：《隋书》卷 83《党项传》。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①]

古析支之地在何处？《后汉书·西羌传》作了解释，云：

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②]

这里所说的析支之地的地望与《隋书》中记载的党项居地也基本相合，即东南至积石、河曲之地，西北接近今新疆。杜牧《樊川文集》卷15《贺平党项表》亦称：

伏以党羌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为西戎所蹙，举种来降，国家纳之，置于内地。[③]

“河外”指什么地方？一般指黄河上游以西的地方。《宋史·夏国传》：“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④]积石山、青海湖均在黄河上游以西的地方，以此为党项原居地的东部界线，与杜牧所言亦相合。又《元史·地理志》称：

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肃三州，尽得河西故地。[⑤]

称“河西”为西夏人的“故地”，可知，河西走廊一线亦为党项人的原居地，故宋元人又称党项为“河西”。河西走廊亦在青海湖以西，新疆以东，与上述党项原居地亦合。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宋）王溥：《唐会要》卷98《党项传》；（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3及（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③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15《贺平党项表》。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明）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

藏文文献关于党项起源的传说作过这样的叙述，《红史》、《贤者喜宴》、《新红史》诸书均称“弥药斯乌王”出生在“凉州和弥药嘎之间的门施山中”。《青史》称“嘎地”即甘州，而《汉藏史集》则将邓柯上部称为“嘎地”，石泰安则认为“嘎地”是指夏州。[①]不管“嘎地”何指，上述三种方位亦与汉文史籍记载的党项原居地大致相合。

及至唐初，黄河上游的西部还聚居着一大批党项部落，《旧唐书·党项传》：

有黑党项，在赤水之西。[②]

赤水，即今青海兴海一带。同传又称：

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③]

雪山指何处？此处不明，但《旧唐书·刘师立传》称“破丑氏”为“河西党项”，[④]则可知，雪山应指黄河上游以西的阿尼玛卿山，当时称积石山，又称之为“雪山”。《通鉴》又称：

（贞观五年）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⑤]

据《册府元龟》卷977，这“党项之地”在“河曲”，《唐会要》则记为“河西”。[⑥]

从这一系列材料可以看出，党项部落在西北地区的最早居地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青海湖及黄河上游以西之地，这与《隋书·党项传》记载的党项居地完全相合，“东接临洮、西平”，黄河上游与临洮郡相接，青海湖与西平

---

①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4卷第1期，第223—265页。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7《刘师立传》。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

⑥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7《降附》；（宋）王溥：《唐会要》卷98《党项羌》。

郡相接；"西距叶护"，河西走廊与新疆东部紧连；所以《隋书·女国传》记载隋以前女国方位时称：

女国在葱岭之南，……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①]

此女国指西女国，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如果党项人居住地是在白龙江流域的话，怎么可能经常与居住在"葱岭之南"的女国发生战争呢？余想这也应该是党项族西北地区最早居地在河西走廊及青海湖、积石山以西之地的重要佐证。这里还必须强调一点，在周、隋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支党项部落进入今甘南、四川西北部。

搞清楚了党项部落在西北地区的早期居地后，还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即党项部落的居地完全处于吐谷浑行国的领地之中。《魏书·吐谷浑传》载：

（吐谷浑）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②]

甘松，在今甘南迭部与舟曲之间；昂城，在今川西北之阿坝；龙涸，即今川西北之松潘。这是早期吐谷浑的疆域，东在今甘南、川西北，西部已达青海省之西南地区。吐谷浑全盛时期疆域更广阔。《梁书·河南传》载：

东至垒（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当为万之误）余里。[③]

《隋书·吐谷浑传》称隋占据的吐谷浑之地：

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

---

① （唐）魏征：《隋书》卷83《女国传》。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③ （唐）姚思廉：《梁书》卷54《河南传》。

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①]

可见，党项早期居住地全处于吐谷浑的领地之中，党项诸部亦隶属于吐谷浑政权。故裴矩《西域图记》云：

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②]

突厥所统治的是西域及漠北“诸胡”，而吐谷浑所统治的则是青藏高原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诸羌”，党项即吐谷浑所领“诸羌”之一。

二

定居在西北地区的党项部落聚居中心的最早迁徙大约在西魏、北周、隋末之时，当中原王朝向吐谷浑发动战争时，一批批党项部落摆脱了吐谷浑的控制向正东及东南方迁徙，这是从星星点点的文献材料中透露出来的讯息。

金城郡：这里原无党项部落。《大业杂记》载：

（帝）行次金城郡，党项羌首朝见。[③]

又《隋书·炀帝纪》：

（大业五年，609）次狄道，党项羌来贡方物。[④]

狄道属金城郡，唐初曾在此设一党项羁縻州——保塞州。这里的党项部落当由西南迁来。

临洮郡：这里原无党项部落。《隋书·党项传》：

---

① （唐）魏征：《隋书》卷83《吐谷浑传》。
② （唐）魏征：《隋书》卷67《裴矩传》。
③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4引杜宝《大业杂记》。
④ （唐）魏征：《隋书》卷3《炀帝纪》上。

（开皇）五年（585），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①]

旭州，在今甘肃碌曲县东，属临洮郡。《新唐书·地理志》称：

儒州，本西盐州，贞观五年（631）以拓跋部置，故汉后魏洪和郡蓝川县地。[②]

洪和郡蓝川县，今在甘肃临潭东。以地望观之，贞观五年归唐的拓跋部应即开皇五年诣旭州内附的拓跋宁丛部。又《隋书·慕容三藏传》：

（开皇）十五年（595），授叠州总管，党项羌时有翻叛。[③]

叠州在隋临洮郡境内。《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五年（622），叠州"置安化、和同二县，以处党项"[④]。又设密恭县及淳州来安置党项部落，这些党项部落隋时均居临洮郡内，大约均是同拓跋宁丛部一起从西面迁来。

宕昌郡：这里原无党项。《隋书·党项传》称"其种有宕昌"，[⑤]则知宕昌羌人在灭国以后也加入了党项部落。同时这里亦被东迁过来的党项部落占据。《旧唐书·党项传》：

宝应元年（762）十二月，其归顺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⑥]

这些部落居地何在？《新唐书·地理志》称：

---

①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③ （唐）魏征：《隋书》卷65《慕容三藏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0《地理志》。
⑤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归顺州，本在山南之西，宝应元年诣梁州刺史内附。[①]

山南之西，当指陇右道之东南部地区，宕昌即其一。居山南之西共十州部落，即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等。羁縻州置于何时，文献无载，但这里居住的党项部落应是由西面迁来。

同昌郡：这里原无党项。《旧唐书·党项传》称“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②] 邓至羌旧居同昌郡境，周灭邓至后，党项进入同昌郡境内。《通鉴》卷 190：

（武德六年，623）四月，吐谷浑寇芳州，刺史房当树奔松州。[③]

芳州，在隋同昌郡北部，房当树即是党项房当部人。《元和郡县图志》卷39：

（丹岭县）所管百姓，皆是党项诸羌（武德初）。[④]

丹岭属芳州。这里的党项部落也应是西迁而来。

汶山郡：这里原无党项部落。《隋书·杨文思传》：

天和初（566），治武都太守。复治翼州事，党项羌叛，文思率州兵讨平之。[⑤]

翼州治翼升，隋在汶山郡境。《通鉴》卷178：

（开皇十六年）党项寇会州。[⑥]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43《地理志》下。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0《唐纪》6。
④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39《陇右道》2。
⑤ （唐）魏征：《隋书》卷 48《杨文思传》。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78《隋纪》2。

隋汶山郡开皇初名会州。唐初归顺的细封步赖部，以其地置轨州，拓跋赤辞部，以其地置懿、嵯、麟、可三十二州，细封部与拓跋部地所置羁縻州均在隋汶山郡境，他们在唐贞观初仍居住该地，可见，也应是由西面迁入汶山郡境的党项部落。

党项族迁入上述诸郡的时间最早约在周天和中，最晚约在隋末。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场党项部落东迁运动呢？除各部落迁徙时独有的具体原因外，主要应与西魏、北周及隋等三个王朝对吐谷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有关。

前已证明，在隋以前，党项诸部还隶属于吐谷浑政权，吐谷浑对中原王朝边境州郡发动攻掠时，党项部落亦必然协同作战。《隋书·党项传》之“魏周之际，数来扰边”[①] 当即指此。《隋书·阴世师传》：

> 先是，吐谷浑及党项羌屡为寇掠。[②]

西魏时，凉州刺史史宁与突厥联合作战曾大败吐谷浑，联军攻进了吐谷浑之腹心地区，吐谷浑遭重创；北周时，周明帝及武帝先后派遣军队大败吐谷浑，不仅攻占其洮阳、洪和、浇河、叠川、甘松、同昌等地，还率军深入吐谷浑境，直捣伏俟城。与此同时，还攻灭了与吐谷浑关系甚为密切的宕昌、邓至二羌，并以其地置宕、邓州。到隋末年，隋炀帝决意开拓西域，在大业四年对吐谷浑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吐谷浑几至灭国。《隋书·吐谷浑传》称这次战争隋占有吐谷浑的土地是“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③] 并在其地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不得不南逃至积石山、河曲以西的党项部落避难（因为这里还没有受到战争的侵扰）。[④] 西平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这也是早期党项部落的主要居地，它们无力承受这一系列战争的打击，只好归附于中原王朝。每一次战争，必有部分党项部落逃散，也必有部分党项部落内附。在周隋之际，居

---

① （唐）魏征：《隋书》卷 83《党项传》。

② （唐）魏征：《隋书》卷 39《阴世师传》。

③ （唐）魏征：《隋书》卷 83《吐谷浑传》。

④ （唐）魏征：《隋书》卷 83《吐谷浑传》：“伏允无以自资，率其数千骑客于党项。”

住在祁连山下、青海湖畔的党项部落也就这样分期分批地迁入周隋边境州郡之地。河西走廊及青海湖以西的党项部落仅存赤水之西的黑党项及河曲之西的雪山党项。隋末大乱，吐谷浑乘机复国，再次进入青海东部地区。这时，党项与吐谷浑就变成了南北紧邻的两个政权了。《旧唐书·党项传》称党项居地：

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①]

东边的界线由过去的“临洮、西平”东南推进至松州，北边与占据青海湖东部的吐谷浑相邻。这就是说，过去以祁连山麓、青海湖畔为主要居地的党项人已朝东南迁移，进入四川西北部的若尔盖、阿坝地区及白龙江流域，与原居于积石山、河曲西面的党项人连成一片，形成了隋末唐初党项部落的新聚居中心。由于摆脱了吐谷浑政权的控制，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党项政权在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诞生。这就是阎立本《西域图》中所言：

吐国（当作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②]

弥罗即弥药，弥药即指党项，弥罗国即指拓跋，又泛指党项国。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党项政权，大约在隋末唐初。

三

党项部落第二阶段迁徙：即由唐之陇右道东部及剑南道北部地区迁入关内道南部地区。这是党项部落又一次大规模的聚居中心的迁徙。

杜佑云：

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党项、白兰诸部落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③]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4《唐画〈西域图〉》。

③ （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6《吐蕃》。

李唐王朝建立不久，旋即扫平中原地区的割据群雄，混一海内，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周边民族展示了自己的雄威，远夷畏服，纷纷归附。特别是唐太宗即帝位后，李唐王朝更是如日中天，威耀四方。

《通典》又载：

> （贞观）三年（629），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①]

隋末唐初聚居在甘、青、川省交界区的党项诸部，也是在这一时期归附唐朝的。从贞观元年（627）开始，至贞观十年（636）止，居住在此地区的党项拓跋部、细封部、房当部、把利部、别丛部、破丑部及黑党项等部落均已内附，唐王朝以其原居地设置党项羁縻州府，[②]不管是贞观三年细封步赖归附，“列其为轨州”，其部属来附，“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还是贞观五年的拓跋赤辞内属，“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③]在文献上都明确记录在他们的原居地设置党项羁縻州府。“于是，自河首积石而东，皆为中国地”。[④]但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贞观十年以前，这里的党项部落是内附而没有迁徙，都是在归附部落的原居地设置羁縻州府。

直到崛起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向东北地区步步进逼时，党项部落才开始了它的第二阶段的迁徙。见于文献的大概有三次，一次在贞观年间，其他两次均在肃代之际。

---

① （唐）杜佑：《通典》7《食货》7《历代户口形势》。

② 这一时期设置的党项羁縻州文献记载矛盾甚多，各羁縻州设置时间歧异甚大，如细封步赖降，唐置轨州的时间，新旧《唐书·党项传》均称贞观三年，新旧《唐书·地理志》则均作贞观二年，新、旧《唐书·党项传》及《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均称贞观三年置崌、奉、岩、远四州，而《新唐书·地理志》则称，崌、奉二州置于贞观元年，岩州置于贞观五年，远州置于贞观四年；《旧唐书·地理志》“松州下都督府”条下更称崌、懿等二十五州均为贞观二年置，很难断其正误。大体这一时期有三次置羁縻州，一是贞观三年以细封步赖地置轨州都督府及崌、奉、岩、远四州（《新唐书·党项传》）；二是贞观五年十二月，“太仆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资治通鉴》卷193）；三是贞观五年拓跋赤辞降，“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新唐书·党项传》）。贞观五年的三十二州当含贞观五年的十六州、贞观三年的四州。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拓跋赤辞贞观五年来属的时间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而《西夏书事》卷1将此事系于贞观八年。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第一次迁徙：这是贞观年间发生的以拓跋赤辞部为首的党项部落大规模内徙。关于这一次迁徙，文献中的记载是不太清楚的，首先是迁徙的时间，并无清楚的交代。那么拓跋赤辞部落的迁徙究竟始于何时呢？一般的论著都将拓跋赤辞部的迁徙定于开元中。[①]这恐怕是受吴广成《西夏书事》的影响，吴氏云："开元中，吐蕃寖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元宗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②]吴氏在这里所系时间是错误的，吴氏的材料出自于两《唐书》之《党项传》，而《党项传》并无"开元中"这一时间限词。《党项传》云：

后，吐蕃寖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③]

这个"后"，是指拓跋赤辞率部落归附后，并无"开元中"之意。《传》后行文还有"龙朔后""天授中"之时间系年，而龙朔、天授均是开元之前的年号，故这里所言之"后"不可能是"开元中"。更何况高宗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④]拓跋部何以会至开元中才感到"畏逼"而求内徙呢？因此，拓跋部开元中内徙是不可信的。

那么，拓跋赤辞部落的内迁究竟始于何时呢？余以为大约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新唐书·太宗纪》载：

（贞观十二年）八月壬寅，吐蕃寇松州。[⑤]

《通鉴》卷195：

（贞观十二年八月）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⑥]

---

① 史卫民：《党项族拓跋部的迁徙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李范文：《论西夏社会性质》，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中和元年三月条。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太宗纪》。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唐纪》11。

在贞观十二年时，崛起在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已经深入松州西境，而松州西境正是拓跋赤辞属下各羁縻州府之驻地，“破党项、白兰诸羌”，说明一部分党项部落已被吐蕃军队击破，因此，拓跋部感到了“畏逼”，才向唐朝政府请求内徙。故《通鉴》卷 220 胡三省注称：

> 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①]

可见胡三省也认为拓跋部内徙不在“开元中”，而在“贞观以后”。具体来说，当以贞观十二年为妥。《新唐书·地理志》载：

> 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②]

这又告诉我们，静边州并非迁到庆州以后设置，《旧唐书·党项传》中“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这一句话是不准确的。静边州是贞观中设置，大概也是属于拓跋赤辞部落归顺时所设松州都督府下辖的“三十二州”之一。郭声坡先生推测静边州置于贞观二十三年。拓跋部归顺时是以旧地置羁縻州，归顺以前，拓跋赤辞部落居松州西北境，则静边州所在地亦当在松州西北境。郭声坡先生推测静边州在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③]贞观时，松州西北诸羁縻州均属陇右道，永徽以后，割属剑南道。仪凤时，内徙关内道。故《新唐书·地理志》称静边州“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当指此。

这一次党项部落的迁徙规模是不小的，除拓跋部外，同时迁往庆州的还有野利部、把利部、破丑部等。[④]这些党项部落迁入庆州地区后，很快又向北部发展。一是迁入银州地区，《拓跋寂墓志铭并盖》：

> 迨仪凤年，公之高祖立伽府君，委质为臣，率众内属。……拜大将

---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20《唐纪》36 胡三省注。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43《地理志》下。

③ 郭声坡：《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府州及相关问题》，载《历史地理》第 21 辑，2005 年。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圁阴（唐银州）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①]

则知，仪凤以后，拓跋立伽又率十八羁縻州迁至庆州东北面的银州之境，静边州都督府亦迁至此。

二是进入胜、灵二州，《新唐书·陆余庆传》载：

圣历初，灵、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②]

可知，在唐高宗及武则天时，银、灵、胜三州已有党项部落迁入。开元时，党项又与六州胡勾结反唐，后被唐军击溃，据《旧唐书·张说传》，唐以胜州连谷、银城之地置麟州，专门安置党项部落，[③]则可知，贞观年间迁往庆州地区的党项部落到后来已有一部分扩散到了河套地区的灵、银、胜、麟等州。

第二次迁徙：党项部落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是发生在安史之乱后，准确地说，应是在唐肃宗在位之时。这一次迁徙仍是原松州都督府管辖下的党项羁縻州向关内地区的迁徙。在第一次迁徙与第二次迁徙之间，松州都督府管辖下的党项羁縻州曾发生过很大变化，时有旧羁縻州的罢废，亦时有新羁縻州的设置，但都在原地废置，文献中没有反映出任何迁徙之迹象。[④]《新唐书·地理志》载：

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有者于灵、庆、银、夏之境。[⑤]

---

①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据墓志称：拓跋守寂之父为拓跋思泰，祖为拓跋后那，曾祖父为拓跋罗胃，高祖为拓跋立伽，均为拓跋（木）弥、拓跋宁（丛）之后。据此可知，拓跋守寂一支很可能并不是拓跋赤辞之直系后代。因为拓跋赤辞降唐后被赐姓为李，若守寂为赤辞之后，不可能不称其“李”姓，而仍称拓跋。从立伽、罗胃、后那等名字来看，还是采用党项之本名，也可反映其汉化程度不高。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6《陆余庆传》。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张说传》。

④ 《新唐书·地理志》称：“乾封二年（667），以吐蕃入寇，废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鍠、率、差等十二州，咸亨二年（671），又废蚕、黎二州。”《旧唐书·地理志》称贞观中松州都督府管二十五羁縻州，永徽以后，生羌相继复叛，屡有废置，仪凤二年（677），又增至三十羁縻州，到天宝十二年（724），松州都督府管一百零四个羁縻州。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同书同志又载：

> 肃宗时懿、盖、嵯、诺、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及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①]

吐蕃陷河陇实际上也是在肃宗之时，这两处所记载的内徙党项羁縻州都是原松州都督府管辖下的羁縻州，它们是继贞观以后，第二次从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地区迁入到关内地区来的党项部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迁徙的部落包括天授三年（692）内附的朝、吴、浮、归等十州部落，而有些研究者却将这十州部落的内附之年认作迁徙之年，[②]这是不妥当的。而且，有许多细节需要细解。《旧唐书·党项传》称：

> 其（指党项）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十州，散居灵、夏间。[③]

《新唐书·吐蕃传》称：

> 又明年（应指天授二年），大首领曷苏率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降。[④]

《通鉴》卷205却称：

> （长寿元年即天授二年）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⑤]

这里的记载歧异很大。归附人数一作二十万口，一作三十万口，一作万余人。余以为前二说的数字均偏大，而《通鉴》的“万余人”比较可信。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② 周群华：《隋唐时期的党项羌及其同中原王朝的关系》，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唐纪》21。

《旧唐书·地理志》松州都督府管下党项羁縻州中仅六州有户口数，分别为崛州一百五十五户、盖（盍）州二百二十户、直州一百户、位州一百户、玉州二百一十五户、嶂州二百户，平均每州一百六十户。[①]这里将归附党项分为十州，共万余人，则平均每州千余人，以每户五口计，则每州二百余户。以万余人分置十个羁縻州，正好与唐政府设置其他党项羁縻州人口数差不多。因此，《通鉴》"万余人"之说比较可信，其他二说均不可取。这十州部落是何时迁往"灵、夏等界内"的呢？两《唐书》之《党项传》记载都比较含混，没有将内附置州的时间与内迁的时间区分开来，以致造成今人认识的错误。两传均明言，这一支党项部落是"在西北边者"，又明言"以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那就告诉我们，置十州时，地仍在西北边，未迁入内地，并非将十州置于内地。《新唐书·地理志》明言，浮、归二州属松州都督府，肃宗时从松州迁出。又同书同志灵州都督府条内有吴、朝、归、浮四州，可知，天授三年，这支党项部落内附，曾在松州都督府境内置朝、吴、浮、归等十州，当时并没有内迁。到肃宗时，吐蕃攻占松州，这十州部落才随其他内迁部落一起迁到了"灵、庆、银、夏之境"。

第三次迁徙：这次迁徙发生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迁徙的规模不大，仅十个党项羁縻州内迁。《新唐书·党项传》载：

> 上元元年（760），在泾、陇部落十万众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降。二年，与浑、奴刺连和，寇宝鸡，杀吏民，掠财珍，焚大散关，入凤州，杀刺史萧愧，节度使李鼎追击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进寇奉天，大掠华原、同官去。诏臧希让代勉为刺史。于是，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凡十州部落诣希让献款。[②]

这段材料有几处地方必须辩证。一是上元元年（760）请降的"十万众"并不全为党项，而是"羌、浑、党项"三族。《册府元龟》卷987：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0《地理志》。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上元元年）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州、陇州等界羌、浑、党项十万余众。[①]

《通鉴》卷221及《新唐书·肃宗纪》略同。二是这十州之名并非在宝应元年设置，《新唐书·地理志》载：

归顺州，本在山南之西，宝应元年诣梁州刺史内附。[②]

可见，这十州原居山南道的西面，即秦、成、武、文、龙州之地，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这十州部落有九州名附于陇右道末，[③]据此可以知道两点。一是属陇右道，二是不隶属松州都督府。它们内附置州的时间已无法了解，但十州名在宝应元年前即已出现。大概是由于吐蕃进逼河陇的原因，这十州部落东进至泾、陇州界，与羌、浑、奴刺等部落又联合起来寇扰唐朝州县。宝应元年，又诣梁州刺史处内附。唐政府将这十州部落迁徙何处，文献中无明确交代，唯《新唐书·地理志》中灵州都督府内有“归顺州”，[④]即可知这十州部落仅有一州（归顺州）迁入灵州境，其他九州迁往何处，史无明载。综上所述，这三次迁徙均是原居住在唐陇右、剑南地区的党项羁縻州府在吐蕃进逼的压力下，向唐王朝关内道地区迁徙。据《新唐书·地理志》之统计数，这时期进入关内道的党项部落羁縻州五十一，羁縻都督府十五（其中部分是稍后析置），[⑤]而当时的主要安置地就在“盐、庆等州”。

四

大批的党项部落进关内道后，由于唐王朝当时正遭受吐蕃强大军事力量毁灭性的打击，根本无力顾及如何妥当处理这么一大批内附的党项部落，也

---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征讨》6。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但没有说明宝应元年内附后，迁往何处，仅存“右阙”二字。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谈不上制定对内附党项认真管理的措施，而将他们“散处盐、庆等州”。[①]吐蕃攻陷河陇，不久，又进据关中。这时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与吐蕃勾结，背叛唐朝，寇扰关中地区。“时吐蕃、党项岁岁入寇”。[②]《通鉴》卷222载：

> 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③]

唐政府没有采纳，广德元年（763），“吐蕃、党项入犯京畿”[④]，并直接攻进了长安。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叛后，“诱党项、浑、奴剌入寇，众数万”[⑤]。党项人再次成为叛军的结盟者。为了阻止叛军与党项进一步勾结，郭子仪将散处在盐、庆等地的党项部落分三支迁往他处分管。庆州是关内道最早安置内附党项的地方，静边州即是以拓跋部为核心，下辖“达、洫十二州”的最大的党项都督府。[⑥]随着内附党项日渐增多，静边州所管党项部落势力也越来越大。故郭子仪首将原居庆州静边州拓跋部及原居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迁至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即今内蒙乌审旗之南地。《新唐书·党项传》载：

> 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⑦]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38《韦伦传》。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2《唐纪》38。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7《程元振传》。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⑥ （清）董诰：《全唐文》卷16《赠拓跋思泰特进制》。《全唐文》误，《旧唐书》卷38《地理志》称静边州管小州十八，《拓跋寂墓志并盖》亦作“淳、恤等一十八洲”，参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

⑦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前引《拓跋寂墓志铭并盖》明确指出，早在仪凤以后，拓跋立伽即率十八州部落徙居银州，直至开元二十五年拓跋守寂逝世，静边州都督府还在银州。为什么到永泰以后，又称表徙静边州都督于银州之北呢？唯一可解释的是，静边州管辖部落甚多，仪凤后仅迁十八州部落到银州，其原管部落是二十五州，故将剩余部落在永泰后再迁。

《旧唐书·地理志》称：

> 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①

这也是指庆州迁至银州的静边州。这里就形成了后来党项族中著名的“平夏部”。

二是迁往灵州安置。《新唐书·党项传》称：

> 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水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跋乞梅等皆入朝。②

上述十州《新唐书·地理志》中均隶属灵州都督府。其中静边、芳池、相兴三州不仅设都督，还要设长史，表明这三州的重要性。《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

> 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州，拓跋、舍利、仆固、野利、桑乾、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③

这“党项十四州”当即《新唐书·地理志》灵州都督府属下十四州：清塞、归德（后侨治银州）、兰池、芳池（后迁延、绥）、相兴、永平、旭定、清宁、忠顺、宁保、静塞、万吉、容乐、静边州。④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即《新唐书·地理志》中“调露元年（679）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实为昭武九姓胡），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⑤这六胡州设在“灵、夏二州之南境”，即今鄂托克旗、乌审旗以南，陕西定边县与宁夏盐池县以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8《地理志》1。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唐）李筌：《太白阴经》卷3《关塞四夷篇》。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北之地。[①]"神龙三年（707），置兰池都督府，分六（胡）州为县"。[②]可知，兰池都督府原是管粟特胡之羁縻府，六州胡后被迁走，兰州都督府后遂又为灵州境内十二党项羁縻府之一。可见，到后来唐朝灵州、夏州南境的党项、突厥、粟特胡部落是混杂在一起的。

三是迁往延、绥二州。《新唐书·党项传》称：

> 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③]

芳池州原居庆州怀安县界，领小州十，全部为党项野利族人，宜定州，原名安定州，旧寄庆州界，管小州七，这七州有一"野利州"，可知宜定州内也有野利族人，又西戎州为"拓跋部"置，[④]可知，宜定州内有拓跋部人，而宜定州刺史为"折磨布落"，则该州当有党项"折氏"。这一支以"野利部落"为主的党项族迁徙，其迁徙地为延、绥州。这就形成了后来党项族中的"南山部"，而留居庆州者即被称为"东山部"。[⑤]值得注意的是，静边州既徙银州，又表置于灵州；芳池州即徙于灵州，又迁于延、绥二州。静边、芳池都是当时党项势力较强的羁縻州府，多处分徙，进一步削弱各强大羁縻州的力量。

至此，党项部落向内地迁徙的第二阶段行程已基本完成。到唐代宗广德年间，党项部落的聚居中心已由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区基本转移到了今陕、甘、宁三边地区，即唐李德裕所言："闻党项分隶诸镇，绥、银、灵、盐、夏、邠、宁、延、麟、胜、庆等皆有党项"。[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一是居住银夏之间"平夏部"，以拓跋氏为主。二是居住在延、绥境的"南山部"（以野利氏为主）与留居盐、庆之间的"东山部"（以破丑、把利等部落杂居），亦即后来宋夏边界最为有名的"横山部落"。三是居住在灵、麟、胜三州地区的党项，就是稍后的"河西党项"。会昌时，唐政府曾将关内道的党项部落分为三部分管辖，"以邠、宁、延属崔彦曾，盐、夏、长泽属李鄠，

---

① 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8《地理志》1。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7《唐纪》63。

灵武、麟、胜属郑贺”。[①]则知崔彦曾管辖“南山部”与“东山部”，李鄂管“平夏部”，郑贺则管“河西党项”。

五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第三阶段的迁徙应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以后。也就是说当北迁党项入居关内道不久，又一次开始了新的迁徙。其中有一部分党项开始向今山西、内蒙交界区发展。永泰元年后第一支迁徙的党项部落是“河西党项”。《旧唐书·代宗纪》：

> （永泰元年二月）戊子，河西党项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属，置宜芳等十五州。[②]

永定州，在《新唐书·地理志》有载，为党项羁縻州，设在陇右道。[③]则可知，永定十二州是由陇右道迁入“河西（即灵、庆、银、夏之河西）”地区。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永定州当在绥州境，而且这永定十二州即为原“河西党项破丑部”。则是永泰后，将永定州迁置于绥州，[④]当亦是唐朝置宜芳十五州之地。

第二支迁徙的党项部落为“六州部落”。《新唐书·党项传》：

> 六州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夏州者号平夏部，永泰后稍徙石州。[⑤]

《旧唐书·党项传》记载不同：

> 党项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④ 《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47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逐水草。[①]

《通鉴》卷 225 载：

六州党项自永泰已来居石州。[②]

这三处记载反映的是一件事，即六州党项迁徙石州之事。六州党项，又称“六府部落”，为“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野利）儿黄、野（利）海、野（利）窣”等，当即永泰时迁到延、绥地区的芳池州都督府辖下的野利氏六州。初芳池州寄庆州时，辖十小州，[③]后将宁州、静州合并为一州，遂领九州。[④]这九州均为野利氏族。前面所言这野利氏六州，再加上大历末叛唐的野利秃罗都、野利景庭及野利刚，正好是野利氏九州。大历后“野利秃罗都”被斩，野利景庭与野利刚入附六州部落，故到永泰迁徙时，野利部仅剩六州。[⑤]党项羁縻州，大概是一小州为一族，故知野利氏到永泰时仅剩六族。而到北宋时，又出现“野狸十族”[⑥]之称，是保持旧有的十族之称，还是到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十族”？这就不得而知。这些被迁到延、绥州的野利氏与吐蕃关系密切，吐蕃对野利氏首领“悉王之”，并与野利氏联姻。[⑦]故大历末，这些野利部落再次与吐蕃联合叛唐，而遭唐朝军队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野利氏才从延、绥之地向河东石州地区迁徙。这应是六州野利迁徙石州的原因，但六州党项在石州居住时间不长，由于石州地区将阿史那“赋索无极”，六州部落又“亡走河西”。[⑧]

这是第一批进入河东地区的党项部落。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吐蕃势力继续东进，不断攻掠灵、庆、盐、坊、银、夏、麟州之党项部落，掠其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25《唐纪》41。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38《地理志》1。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43《地理志》下。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 277《郑文宝传》。
⑦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⑧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羊马，掳其人赀。到德宗贞元三年（787），吐蕃又攻陷盐、夏、银、麟等州。[①] 余以为这一时期必定有更多的党项部落进入河东地区。《通鉴》卷232载：

> （贞元二年十二月）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②]

六胡州原为开元中安置粟特降户所置，后粟特降户迁至河南许、邓诸州，以其地置宥州，来控制党项，即前引《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中的"鲁丽塞下党项十四州"。所以，贞元二年，迁至云、朔二州的实际上是党项部落。除唐王朝强制迁徙者外，为避吐蕃侵扰之难而逃奔至河东地区的党项部落必为数不少。这一时期，太原、振武等地均出现了党项部落。[③]这也应是由河西党项中陆续东迁过来的。《旧唐书·地理志》有这么一段材料：

> 云中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五：舍利州、思壁州、阿史那州、绰部州、白登州。呼延州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三：贺鲁州、那吉州、跌跌州。[④]

《太平寰宇记》卷37亦同上。[⑤]云中、呼延二都督府：初置时均在今内蒙、山西交界处，但二都督府均不是以党项部落置，而是以突厥部落置，舍利、思壁、阿史那、绰部、贺鲁、跌跌均是突厥部落名，明明是突厥部落的羁縻州，却不知《旧唐书》为何误录至此，《太平寰宇记》明显是抄袭《旧唐书》之误，《新唐书·地理志》称其为突厥羁縻州，[⑥] 当是。

党项部落较大规模地从河套南部向河套北部（即今内蒙地区）迁徙，这应是唐武宗会昌元年（840）以后的事了。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3《德宗纪》。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唐纪》48。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称:"振武有党项"。(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请先降使至党项屯集处状》称党项部落分布至"太原"。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8《地理志》1。

⑤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内道》13。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公元840年，雄踞大漠以北的回鹘汗国遇到了不可抵御的天灾，其畜牧经济社会崩溃，加上内乱和外部黠戛斯的攻击，他们被迫离开了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的回鹘旧居地，分别向西和南迁徙，向西者迁入了河西、安西等地，向南者则渡过大碛，进入了漠南草原。就在这时，居住在河套南部的党项部落开始北渡黄河，逐渐向河套北部地区进逼，且与业已衰微的回鹘残部展开了一场争夺漠南草原的斗争。《册府元龟》卷995：

（太和五年，831）九月，丰州刺史李公政奏，党项于黑山劫掠归国回鹘，差兵马使仆固全等七人为贼所杀。[①]

黑山，即杀胡山，在振武军北塞外。这是党项部落挤进漠南草原的前奏。《旧唐书·刘沔传》：

太和末（835），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②]

既动用“天德之师”，则是党项在进扰天德之境。《新唐书·文宗纪》：

（开成二年，837）七月癸亥，党项羌寇振武。[③]

党项部落为了更顺利地挤入漠南草原，想利用唐朝的军事力量打败回鹘余部，假报仇之名，向天德军使田牟请求出兵援助。李德裕在其《论田牟请许党项仇复回鹘嗢没斯部落事状》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

今若许田牟徇党项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虏，……取笑四夷。[④]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95《交侵》。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1《刘沔传》。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文宗纪》。

④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3《论田牟请许党项仇复回鹘嗢没斯部落事状》。

李德裕也看出党项部落进击回鹘是“贪利”，而强占漠南草原恐怕是最大的“利”。唐王朝援助也好，不援助也好，党项部落仍然是大踏步地进入了河套北部地区。《全唐文》卷705《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

> 一、谓速降中使，赍敕至云、朔，天德已来，宣谕生熟退浑及党项诸部落等，待天德交锋后，任随便出军讨逐。[①]

《旧唐书·石雄传》：

> 会昌初，回鹘寇天德，刘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沔谓雄曰：……雄受教，自选劲骑，得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契苾、拓跋杂虏三千骑。[②]

仅云州一处，即得“契苾、拓跋杂虏三千骑”，可见，这一时期进入河套北部地区的党项部落人数之众。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党项部落已遍布于东起丰州之北，西至云朔之境的广袤地区内，它们分为数百个大小不等、互不统属的部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隗衍党项、山南党项、河濡党项、沿河党项、黑山党项、模赧山（牟纳山）党项、夹山党项、山后党项、阴山党项等，[③]到辽朝建立后统治这些党项部落时，还设立了“党项国王府”来专门管理这一地区的党项部落。[④]

通过上面的考述，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的全过程。党项部落经过隋唐时期的大迁徙后，其部落分布的格局在五代、辽、宋时期就大体稳定下来了。后在契丹境内生活的党项部落又有部分被强行迁至东北地区的黄龙府、五国城一带，这是以后的事了。

---

① （清）董诰：《全唐文》卷705《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1《石雄传》。

③ 参阅（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元）脱脱：《辽史》卷3《太宗纪》、卷93《萧惠传》、卷91《耶律唐古传》；（宋）王溥：《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及（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 *

党项部落经过隋唐时期的大迁徙后，至五代、辽、宋时期，其分布格局已大体稳定下来。[①] 党项族，在唐中叶迁入关内道时，仍被唐朝人称为“小蕃”，[②] 但到唐末，由于我国西北地区几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均先后衰颓，突厥、吐蕃、吐谷浑、回鹘、沙陀莫不如此。相反，原来一直充当其他民族配角的党项族却在唐末时逐渐壮大，于是残存在西北地区的北方各胡族和部分吐蕃族均加入到党项族来，并以党项自号。到五代时，党项已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民族，其分布范围极为广泛。《新五代史 · 党项传》称党项部落“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③]《宋史 · 党项传》称：“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④]《宋史 · 宋琪传》称：“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会疑误，会州在南，与丰州平行线上的北面州军当为胜州或云州）。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⑤] 这都是比较笼统的党项部落分布情况的概说。[⑥] 其分

---

*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

① 参阅拙作《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载《暨南学报》1994 年第1期。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47《杜佑传》。（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 5《赐回鹘可汗书》甚至称党项为“微小杂种”。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4《四夷附录》3。

④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 264《宋琪传》。

⑥ 关于党项部落的分布，必须要首先搞清辽宋时代党项居住区和吐蕃居住区的划分。余在《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载《中国藏学》1988 年第 4 期）及《宋代甘青藏族人口的发展及其原因》（载《民族研究》1988 年第 5 期）两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大体来说，陇山、六盘山可以算作党项区与吐蕃区的分界线，陇山、六盘山以北、以东之地为党项居住区，而陇山、六盘山以南、以西之地为吐蕃居住区。正如宋人何亮所言：“西戎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指党项）；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渭、仪之西诸戎是也（指吐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4）但环、庆、灵、凉四州及镇戎军却是二族之分界地区，故有错杂混居的现象。本文处理这四州一军的党项、吐蕃部落采取的办法是：一、名见《宋史 · 党项传》、《宋会要 · 丰州 · 府州》者入党项；名见《宋史·吐蕃传》及《宋会要·西凉府》者入吐蕃。二、名不见上述《宋史》、《宋会要》诸传者，就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其族属。三、名互见于两传者，则不作辨析，既入吐蕃，又入党项，姑两存之。

布区域述说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的分布基本缺略，更无从了解详细具体的情况。本文依据现存文献资料，将散匿在文献中的党项部落钩沉索隐，并拟分为契丹、西夏、北宋西北边境三大地区进行考述，希望能为党项、西夏史研究提供一些可靠的数据。

一、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分布极广，但其主要部分则分布在上京、东京、西京三道。

（一）上京道

党项国：《辽史·百官志》中有“党项国大王府”,[①]《辽史·兵卫志》中又有“党项”属国。[②]这个党项国既不是指西夏国，又不是指西南边境上的党项部落。党项国在何处？《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理远近》:“（契丹）西近北至生吐蕃国，又西至党项、突厥等国”。[③]此言“党项国”在契丹西，亦在生吐蕃国西。“生吐蕃国”不知何指。又《三朝北盟会编》卷98引《燕云录》:“沙子里，在沙院西北，去金国四千里，……南接天德、云内，北连党项国南关口”。[④]去金国四千里之金国当指金之上京会宁。天德、云内之北，而又距金京有四千里的“党项国”，余以为就在辽上京道的西北招讨司境内。

西北唐古：《辽史》卷30：耶律大石西行至可敦城时有十八部王众来会，其中就有“唐古部”。[⑤]唐古部即党项。可敦城在辽上京道西北路招讨司境之镇州。这一部“唐古”在辽国之西北境，故称“西北唐古”。

姚家族：《梦溪笔谈》卷24：“北狄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⑥]党项族多以“某家”相称，如“旺家”、“呆家”、“慕家”、“苏家”、“折家”、“媚家”、“宗家”、“封家”等，余疑姚家族亦为党项，居辽上京庆州之东北。

---

①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② （元）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
③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理远近》。
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靖康中帙》引《燕云录》。
⑤ （元）脱脱：《辽史》卷30《天祚皇帝纪》4。
⑥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1。

隗衍党项：《辽史·百官志》中有“隗衍党项部”。[①]《辽史·耶律唐古传》称耶律唐古：“明年，移屯镇州，重熙间，改隗衍党项部节度使。先是，筑可敦城以镇西域”。[②]可见，隗衍党项部在西北招讨司境内之镇州。耶律唐古为耶律屋质之庶子，这个唐古很可能就是党项族人。西夏汉文《杂字》蕃姓中有“嵬迎”一姓。[③]隗衍、嵬迎，译音之异也。

南唐古部：南唐古应是北唐古相对应的唐古部落，北唐古居黄龙府，南唐古应在黄龙府南。《辽史·营卫志》：“南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④]其他四部唐古均注明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独南唐古无。但《辽史·兵卫志》却说南唐古“屯驻本境”[⑤]。南唐古本境在何处？《辽史·营卫志》载太宗斡鲁朵有“唐括抹里”[⑥]。据《辽史·地理志》又知怀州为太宗行帐放牧地。故知这一部分唐古人可能居怀州。[⑦]《辽史·地理志》又载：“祖州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⑧]这太祖、太宗的俘户可能就是圣宗时所设的南唐古，地在上京临潢府之东，黄龙府之西南，故称这一部分唐古为南唐古。

（二）东京道

北唐古：《辽史·营卫志》：“北唐古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黄龙府都部属司，戍府南”。[⑨]北唐古部在辽时影响不大，居地在今吉林省长春市一带。到金时，北唐古却是女真统治集团的重要氏族。金十六个黑号之姓中的第一姓即是“唐括氏”，金昭肃皇后，金驸马、太傅唐括德温均是金上京帅（率）河唐括部人。[⑩]《金史·兵志》载：“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剌部，曰唐古部，二部五户五千五百八十五”。[⑪]又《金史·食货志》：“迭

---

①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② （元）脱脱：《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③ 西夏汉文本《杂字》，参见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以下引汉文本《杂字》均见此，不另注），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⑤ （元）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中。

⑥ （元）脱脱：《辽史》卷31《营卫志》上。

⑦ （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1。

⑧ （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1。

⑨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⑩ （元）脱脱：《金史》卷120《唐括德温传》、卷63《昭肃皇后传》。

⑪ （元）脱脱：《金史》卷44《兵志》。

剌、唐古二部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①]可见，北唐古部至金时发展迅速，已成为一个有数万人口的大部族了。

河西党项：《辽史·兵卫志》之五十九属国中有“河西党项”[②]，这个党项部原应指河西地区党项。《辽史·圣宗纪》：“（统和十五年正月）丙子，以河西党项叛，诏韩德威讨之。（二月）丙辰，韩德威奏破党项捷。（三月）甲申，河西党项乞内附”。[③]河西党项恐怕是最后归化的党项部落，虽也被纳入圣宗的三十四部族中，但只称其为“河西部”[④]，而不称“河西唐古”，这可能与归化时间较短有关。《辽史·营卫志》：“河西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⑤]；并在奥衍女直条下明言河西部为“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⑥]。辽东北路统军司治所不详，金东北路统军司治泰州，即今吉林白城市。

（三）西京道

鹤剌唐古部：鹤剌即Xara之音译，阿尔泰语意为“黑”。鹤剌唐古，即黑党项。《新唐书·党项传》：“有黑党项者，居赤水西”[⑦]。赤水在青海之共和。《辽史·营卫志》：“鹤剌唐古部，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⑧]。又《辽史·耶律仁先传》：“改鹤剌唐古部节度使”。[⑨]黑党项可能亦是契丹劫掠河湟时移居辽西南地区的党项部落。

匿讫唐古部：《辽史·营卫志》：“匿讫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⑩]

梅古悉部：《辽史·营卫志》：“梅古悉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⑪]

颉的部：《辽史·营卫志》：“颉的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

---

① （元）脱脱：《金史》卷46《食货志》1。
② （元）脱脱：《辽史》卷36《兵卫志》下。
③ （元）脱脱：《辽史》卷13《圣宗纪》4。
④ （元）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中。
⑤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⑥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⑦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⑧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⑨ （元）脱脱：《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⑩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⑪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使属西南面招讨司”。[①]

以上四部唐古均属辽西南招讨司，西南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蒙鞑备录》:“（金）章宗又以为患，乃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纠人之戍”。[②]这一部分唐古显然是辽之西南路之唐古。静州当为净州，在西南招讨司境。

山南党项：《辽史·萧惠传》:“（重熙）十三年，夏国李元昊，诱山南党项诸部”。[③]此山当即阴山，这一部分党项当指阴山南部的党项。《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又有“山前党项”,[④]山前即山南。

河壖党项：《辽史·太宗纪》:“及从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壖党项”。[⑤]河，当指黄河，壖，则谓空地也。《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又称：“沿河党项”。[⑥]即指黄河边上的党项部落，大致为辽之河清、金肃、宁边、东胜诸地。

山后党项：《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又准沿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部首领”。[⑦]山后党项即指阴山之北党项，约在辽倒塌岭节度使司之境。

藏才族：《折克行神道碑》有“藏才山”,[⑧]藏才族当居此而得名。《宋会要·丰州》条称“藏才三族”,[⑨]当指藏才东、西、中三族。《宋史·党项传》又有藏才八族。[⑩]《长编》卷124:“藏才凡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后”，有“十余万众”。[⑪]黑山，在辽天德军境。《宋会要·丰州》又云：“丰州，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领王甲居之，契丹补左千牛卫将军”。[⑫]这丰州，即唐丰州，后改为天德军，藏才族三十八族均居此。《武经总要前集》卷17:“（开宝二年）藏

---

①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② （宋）孟珙：《蒙鞑备录》，从书集成本。
③ （元）脱脱：《辽史》卷93《萧惠传》。
④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⑤ （元）脱脱：《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⑥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⑦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⑧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7《折克行神道碑》。
⑨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⑩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八月戊辰条。
⑫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牙（才）族酋长王承美归顺，因建州”，[①] 即宋丰州（在府州之西北）。这样，藏才族部分居宋丰州，一部分居古丰州，即辽天德军境。

庄浪族：《宋会要·丰州》条：“以河北黑山北庄浪族宁远将军龙移为安远大将军，昧克为怀化将军”。又言：“此族在黄河北，数万帐，东接契丹，北接鞑靼，南至河”。[②]黑山北，仍在天德军之境。《金史·交聘表》中夏使有“庄浪义显”，当出此族。[③]《金史·结什角传》积石军吐蕃有“庄浪族”，[④]又今之兰州西北有“庄浪河”，不知与此族有何关系。西夏汉文本《杂字》蕃姓中有“庄浪”一姓。

言泥族：《宋史·党项传》：“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拔黄太尉率三百余帐内属。拔黄本大族，居黄河北古丰州。诏府州厚赐茶彩，给公田，依险居之。”[⑤]古丰州即辽天德军，言泥族居天德军，附府州者仅拔黄之三百余帐。

日利、月利、没细、兀瑶等十一族：《宋会要·丰州》条：“契丹日利、月利、没细、兀瑶等十一族七万余帐内附，斩首二千余级，获伪天德军节度使韦太及生口、羊、马万计”。[⑥] 获天德军节度使，可见这十一族是从契丹天德军境归附的，后徙居宋丰州。《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译日利、月利为“逸利、越利”[⑦]。《西夏文字典》中有党项“一利”一姓。[⑧]《宋史·党项传》译兀瑶为“瓦瑶”[⑨]。《宋会要·蕃夷》有“没细游成宁”，[⑩]《三朝北盟会编》有“没细好德”，[⑪]《宋南渡十将传》卷1有“没细征牟”，[⑫]均当出没细族。

勒浪族：《宋史·党项传》：“以勒浪十六府大首领屈遇……当丰州路最为忠顺”。又“以勒浪嵬女儿门十六府大首领马尾等内附，以马尾为归德大将

①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7《河东路》。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③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④ （元）脱脱：《金史》卷91《结什角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⑥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⑦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安重荣传》作“逸越利”，脱一“利”字。
⑧ （俄）聂历山:《西夏文字典》,载《西夏语文学》第2册（以下所见聂历山字典者,均见此,不另注）。
⑨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⑩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
⑪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6《炎兴下帙》引《夏国贺正表》。
⑫ （宋）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1《刘琦传》。

军，领恩州刺史，以勒浪树李儿门首领没崖为安化郎将”。又“以勒浪副首领遇兀等百九十三人归附，贡马七匹。遇兀旧属契丹，淳化初，迁族帐于府州界”。[①]勒浪为党项大族，下还分“嵬女儿门”。“树李儿门”等小族。《宋会要·蕃夷》：“至道元年正月，韩德威率数万骑诱近蕃勒波（当作浪）马尾族自振武入寇”[②]。振武即辽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太平寰宇记》卷38称：“（府州）北至二十六府勒浪马尾……等蕃族四百八十一里”。[③]辽东胜州即在宋府州北面四百余里之地，处古丰州与麟、府州之间，故可称“当丰州道”。西夏汉文本《杂字》蕃姓有“勒罗”一姓，勒浪、勒罗，一音之转。

名波族：《宋史·党项传》：“以……名波族十二府大首领浪买当丰州道最为忠顺”[④]。此名波族与勒浪族同为当丰州道之部族，其地相近，亦当在东胜州境，后随勒浪族归宋。

直荡族：《宋史·党项传》：“开宝元年，直荡族首领啜佶等引兵入寇府州”。又“直荡族大首领啜尾、子河汉大首领马一并来贡马”。又“诏直荡族首领鬼啜尾于金家堡置渡”。[⑤]直荡族旧属契丹，后归附宋。《太平寰宇记》卷38：“（府州）北至……直荡、啜娘等蕃族四百八十里”[⑥]。地亦在辽东胜州境。《武经总要前集》卷19“胜州，……河镇二，紫河……今谓之紫河汉，地产良马”。[⑦]胜州即辽东胜州地，紫河汉属东胜州。

没儿族：《宋史·党项传》：“赐麟、府州……没儿大首领莫末移……凡十族，书招怀之”[⑧]。《太平寰宇记》卷38：“（府州）西北至……没儿雀悉命等蕃族三百五十里”[⑨]。府州西北三百五十里为辽河清军、金肃州之地，没儿族当居此，后迁居麟、府州界。雀悉命或为没儿族首领名。

女女四族：《宋史·党项传》：“以……女女四族首领杀越都等归化，并赐敕书抚之”。女女四族为：女女杀族，首领越都；女女梦勒族，首领越移；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6册《蕃夷》1。
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8《关西道》14《府州》。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8《关西道》14《府州》。
⑦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⑨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8《关西道》14《府州》。

女女忙族，首领越置；女女籰儿族，首领党移。[①]《太平寰宇记》卷 38："府州……西北至女女越都族三百五十里"[②]。府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即辽河清军、金肃州地。女女四族居此，后徙居麟、府州。《金史·交聘表》有夏使"恧恧世忠"[③]，恧恧即女女之异译，西夏文《杂字》中有"恧恧"一姓，[④]恧恧世忠当出此族。

党儿族：《宋史·张昷传》："破浪黄、党儿族"。[⑤]《折继闵神道碑》："贼酋党儿（族）伪观察来守顺果引兵入寇"。[⑥]来守顺为党儿族酋。《武经总要前集》卷 17："唐龙镇，……酋帅来氏世其职"。有来万德、来有行、来璘、来美、来怀正、来守信、来怀顺、来守顺、来闰喜、来子敬等，均为党儿族人，唐龙镇属辽，称宁边州。

社（杜）庆族：《宋史·党项传》："杜庆族依援唐龙镇"。[⑦]《宋史·真宗纪》作"社庆族"[⑧]，《长编》译作"苏沁"。《长编》卷 503 夏人有"苏沁定玛"[⑨]。苏沁、社庆，译音之异。故知当为社庆族，居地在辽宁边州。

嘉舒克顺七族：《长编》卷 152："西界唐龙镇嘉舒克顺等七族去汉界不远。……七族蕃部旧属府州，比因边臣不能存恤，逃入西界，在今府州东北缘黄河西住坐，其地面与火山军界对岸"[⑩]。火山军对界即辽宁边州。唐龙镇属契丹，曾一度归西夏，唐龙镇部族曾内附归属府州。嘉舒克顺为清译，宋译名尚未见。

阿理撒米、仆里鼈米二部：《辽史·耶律勃古哲传》："保宁中，为天德军节度使，……以讨平党项羌阿理撒米、仆里鼈米，迁南院大王"。[⑪]二部当居于天德。西夏汉文本《杂字》有番姓"卧利"，又《西夏文字典》有"布立"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38《关西道》14《府州》。
③ （元）脱脱：《金史》卷 61《交聘表》中。
④ 李范文、中嶋幹起：《西夏文〈杂字〉研究》（以下引西夏文《杂字》均见此，不另注），台湾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7 年。
⑤ （元）脱脱：《宋史》卷 326《张昷传》。
⑥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 260 页。
⑦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 7《真宗纪》2。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3 元符元年十月丁亥条。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2 庆历四年十月壬子条。
⑪ （元）脱脱：《辽史》卷 82《耶律勃古哲传》。

一姓，阿理、卧利、仆里、布立，皆译音之异。

曷党、乌迷二部：《辽史·圣宗纪》："党项诸部叛者皆遁黄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党、乌迷两部因据其地，今复西迁"①。曷党当即仡党，《宋会要·蕃夷》："仡党族首领迎罗佶及长嗟、黄屯三人诣府州内附云：旧居山后，今乞渡居勒（浪）马尾族地"。② 山后疑即模赧山后，模赧山即牟那山。据《辽史·地理志》天德军境内有牟那山。③乌迷，即"于弥"、"乌密"，亦即嵬名。《元史·李恒传》："李恒，字德卿。其先于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④《吴文正公集·李世安墓志》："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⑤可知，西夏王族在唐朝赐姓李之前就称"于弥氏"。这里的"乌迷部"又可证明在元昊改姓"嵬名"之前就有"乌迷部"，亦可证明元昊并非改姓，而是复旧姓，元昊之旧姓是什么呢？很明显，西夏王室之旧姓即"拓跋"，而"拓跋"即为"元"姓，就像"完颜"为"王"姓一样。故欧阳修《归田录》称元昊改姓为"元"。⑥可知，曷党、拓跋二部均有在辽天德军境者。《通鉴》卷247："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契苾、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⑦当时乌介牙帐在天德，可知，唐末时拓跋部即已进入天德之境。

小斛禄部：《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北征记》："小骨碌者，天德、云中间一族帐，旧臣属辽人"。⑧又引范仲熊《北记》称"小蕃小骨碌"。⑨小蕃，一般指党项。《辽史·天祚皇帝纪》："党项小斛禄请临其地"。《辽史·属国表》亦称："党项小斛禄"。⑩《西夏书事》卷34："小鞠禄，党项族，仕辽为西南面招讨使"。⑪ 小骨碌，又译作小鞠禄、小斛禄、小护虏、小葫芦。《北征记》称其为"天德、云中间一族帐"，具体居地不明。刘一止《苕溪集·杨公墓碑》称："公统领麟府军马驻兵武州之偏头独建，独建者，契丹

① （元）脱脱：《辽史》卷15《圣宗纪》6。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6册《蕃夷》2。
③ （元）脱脱：《辽史》卷41《地理志》5《西京道》。
④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⑤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42《李世安墓志》。
⑥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⑦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7《唐纪》63会昌三年正月条。
⑧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引《北征记》。
⑨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引范仲熊《北记》。
⑩ （元）脱脱：《辽史》卷70《属国表》。
⑪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靖康元年冬十月条。

枭将小护虏之故居也”。[①]可知，党项小斛禄部居武州，今山西神池。

呆儿族：《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先是，（范）仲淹言：今边上采报，皆称契丹大发兵马，讨伐呆儿族并夹山部落，及称亦与元昊兵马相杀”。又“（庆历四年六月戊午）富弼言：伏见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呆儿族。”[②]《宋史·夏国传》："（庆历四年）是岁，辽夹山部落呆儿族八百户归元昊，兴宗责还，元昊不遣”。[③]呆儿，《儒林公议》译作“呆家”，[④]《东都事略》译作“保家”。[⑤]一般学者俱以呆儿族为鞑靼，为阻卜，[⑥]这种解释不妥。呆儿族不是鞑靼，而是党项。文献确有明证。《辽史·萧惠传》："（重熙）十三年，夏国李元昊诱山南党项诸部，帝亲征”[⑦]。《辽史·西夏外记》："（重熙）十三年四月，党项及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诏诸道兵讨之”。[⑧]《辽史·耶律侯哂传》："重熙十三年，党项部人多叛入西夏”。[⑨]《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三年四月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项等部叛附夏国”。又“五月壬戌朔，罗汉奴奏，所发部兵与党项战不利，……李元昊来援叛党。戊辰，诏征诸道兵会西南边讨元昊”。又“（十月）壬子，军于河曲，革言：元昊亲率党项三部来，……元昊伏罪”。[⑩]《辽史》中虽无言“呆儿族”，辽重熙十三年即宋庆历四年，宋记为“呆儿”，辽记为党项。可以看出，这次叛逃入夏是党项部落，而非鞑靼（阻卜）。呆儿族之住地为夹山，据《儒林公议》卷下则云在“夹西”。夹山在何处？《儒林公议》又云：云州西约五百里为夹山。[⑪]《金史·地理志》称夹山在云内州柔服城北六十里。[⑫]而《三朝北盟会编》卷9却称夹山在天德军北。[⑬]可知，夹山绵延甚长，西起天德，东至云

---

① （宋）刘一止：《苕溪集》卷48《杨公墓碑》。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及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⑤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夏国传》。

⑥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01页；冯继钦：《西夏与蒙古高原诸部的关系》，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⑦ （元）脱脱：《辽史》卷93《萧惠传》。

⑧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⑨ （元）脱脱：《辽史》卷92《耶律侯哂传》。

⑩ （元）脱脱：《辽史》卷19《兴宗纪》2。

⑪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⑫ （元）脱脱：《金史》卷24《地理志》上《西京路》。

⑬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政宣上帙》9宣和四年九月十八日条。

内均有夹山。呆儿族居夹山南，则应在天德军境。

山西五族：《辽史·西夏外记》："重熙十三年四月，党项及山西部族节度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①]《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三年四月丙辰，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详稳斡鲁母等奏，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②]山西部族，据《梦溪笔谈》卷24："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鞑靼接境"。[③]《西夏书事》卷17："连山，亦曰夜来山，其西有五大族，各自为部，胡人谓之山西族"。[④]这山西五族是与夹山西部的呆儿族一起归顺夏国的，那这山西即应是夹山之西，实际上均指阴山。《辽史·圣宗纪》："诏党项别部堨西设契丹节度使治之"。[⑤]《辽史·百官志》：堨西节度使排在倒堨岭节度使司之后，均属契丹西路诸司。[⑥]这个山西族，既非党项，又非鞑靼，亦非黑水，但明显与党项部族关系密切，故与党项夹西部落一起逃入西夏。余以为这个称之为"党项别部"的"堨西"即是"山西族"。"堨西族"很可能为倒堨岭之西的意思，倒堨岭亦可能为阴山之一段。圣宗时置节度使，故兴宗时逃夏之山西族首领亦称"山西部族节度使"。《辽史·百官志》只有"堨西节度使"，而无"山西节度使"，可知"堨西"或即是"山西"。

银瓮族：欧阳修《杜衍墓志铭》："契丹与夏人争银瓮族，大战黄河外，而雁门、麟、府皆警"。[⑦]许多学者均认为银瓮族即是呆家族、呆儿族，[⑧]原因很简单，这与呆家族附夏指的是一回事。银瓮与呆儿、呆家无法使人相信是一族的异译。余以为，呆家是呆家，银瓮是银瓮。因为《辽史》中明载元昊引诱是"山南党项诸部"，又记载的是："党项等部叛附夏国"。所以，我们可以看作银瓮族与呆儿族都是庆历四年四月叛附西夏的党项部落，这样恐怕更合适一些。《大金国志》卷7："曷董城自云中由猫儿庄、银瓮口北去约

---

①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② （元）脱脱：《辽史》卷19《兴宗纪》2。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1。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7庆历四年夏四月条。
⑤ （元）脱脱：《辽史》卷17《圣宗纪》8。
⑥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⑦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31《杜衍墓志铭》。
⑧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01页；冯继钦：《西夏与蒙古高原诸部的关系》，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第1期。

三千里”。[①]银瓮口在今内蒙土默特左旗境，银瓮族当以居此地得名。应在辽云内州境。

拓跋、黑连部：《册府元龟》卷972：“（后唐清泰二年）四月，新州言，党项拓跋、黑连（合）欲入朝贡”。[②]拓跋为党项甚明，疑“黑连”即“赫连”，为匈奴与鲜卑混血种，十六国时有赫连勃勃建夏，后赫连夏为吐谷浑慕璝所灭，其种即入吐谷浑。《新五代史·吐谷浑传》：“（吐谷浑）唐至德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唐处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赫连等族”。[③]吐谷浑灭亡后，其种又入党项，此处之“黑（赫）连”即为一证。唐新州，即辽奉圣州。知辽奉圣州近侧亦有党项拓跋族及赫连族。

宋犀族：《辽史·圣宗纪》：“西南招讨司奏，党项部有宋犀族输贡不时”。[④]知宋犀族居地在西南路招讨司境内。

隆益答部：《辽史·韩德凝传》：“改西南路招讨使，党项隆益答叛，平之”。[⑤]此部居地在西南路招讨司境。

党项十五部：《辽史·圣宗纪》：“（统和元年正月）甲申，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奏党项十五部侵边，以兵击破之”。[⑥]这十五部党项亦应在西南路招讨司境内。

（四）居地不明之党项

可丑买友部：《辽史·景宗纪》：“耶律沙以党项降酋可丑买友来见”。[⑦]

阿刺怃部：《辽史·圣宗纪》：“党项太保阿刺怃来朝，贡方物”。[⑧]

曷鲁部：《辽史·圣宗纪》：“党项长曷鲁来贡”。[⑨]《西夏文字典》中有党项“吃吙”一姓，吃吙、曷鲁，译音之异。

---

①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5。
②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2《朝贡》5。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3《吐谷浑传》。
④ （元）脱脱：《辽史》卷16《圣宗纪》7。
⑤ （元）脱脱：《辽史》卷74《韩德凝传》。
⑥ （元）脱脱：《辽史》卷10《圣宗纪》1。
⑦ （元）脱脱：《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⑧ （元）脱脱：《辽史》卷12《圣宗纪》3。
⑨ （元）脱脱：《辽史》卷16《圣宗纪》7。

二、西夏境内的党项部落

西夏本土是党项部落的最大聚居区，自唐中叶以来，党项部落就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这一地区，而且发展很快。李德裕《赐党项敕书》言："自尔祖归款国家，依附边塞，为我赤子，编于黔黎，牛马蕃孳，种落殷盛"。[①]至唐朝后期，党项部落已遍布西夏本土的河南之地，《通鉴》卷247又称党项分隶诸镇，"绥、银、灵、盐、夏、邠、宁、延、麟、胜、庆等州均皆有党项"。[②]本节所述西夏境土以庆历和议以后夏国所领之地为界限。

（一）夏州（今陕西横山西）

平夏部：《通鉴》卷249："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又云："平夏，地名，在夏州界"，[③]又赵珣《聚米图经》："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④]《宋史·宋琪传》称："从银夏至青白池，地惟砂碛，俗谓平夏"。[⑤]可知：一、平夏部即拓跋部，乃贞观中从松州西北迁往庆州，后又从庆州迁往银夏，拓跋部从拓跋赤辞始，有拓跋立伽、拓跋罗胃、拓跋后那、拓跋守寂、拓跋思泰、拓跋乞梅、拓跋朝光、拓跋思恭、拓跋思谏等，拓跋部始兴于思恭，西夏王室即出于拓跋部，后改称嵬名氏；二、拓跋部并非止居夏州，乃居银夏州以至青、白池这一片砂碛区。拓跋部除了西夏境内者，宋边境熟户及契丹境内也有拓跋部落。

黄乜族：《宋史·党项传》："以黄乜族降户七百余散于银、夏州旧地处之"。[⑥]《宋太宗实录》卷33："府州上言，三族寨折御乜率中府黄乜三族五百余户来降"。[⑦]知黄乜有三族，即后言府州之王乜三族，旧居地在银、夏州。太宗时，银、夏州归宋，故能在银、夏州安置党项，后居府州。

咩嵬族：《宋史·党项传》："夏州咩嵬族魔病人乜崖在南山族结党为

---

①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6《赐党项敕书》。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7《唐纪》63会昌三年八月庚戌胡注。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大中五年正月条胡注。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大中五年正月条引赵珣《聚米图经》。
⑤ （元）脱脱：《宋史》卷264《宋祺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⑦ （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33淳化二年七月条。

寇”。[①]《宋史·党项传》:“宥州羌族腊儿率众劫熟户咩魏族,金明都监李士彬击之”。[②]《长编》卷95:“鄜延部署言,宥州蕃族拉尔率众劫熟户密威族”。[③]咩嵬、咩魏、密威,译音之异,然后者称为熟户,则咩嵬族也曾归顺宋朝,以《长编》言,则是后移居延州。《西夏文字典》有“明嵬”一姓。

南山族:上引《宋史·党项传》有南山族。《通鉴》卷249:“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胡三省云:“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其窜居南山者,为南山党项”。[④]《宋史·宋琪传》:“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无族之号也。”[⑤]《宋史·尹宪传》又称:“南山野狸族”。[⑥]可知:一、南山指鄜延以北、银夏以南的横山地区;二、南山族即野利部。野利部自唐贞观以来迁入庆州地区,后又迁银夏,又迁延绥,又徙河东,又返河西,分布极广。但银夏以南的横山地区则为其主要居地,故称“南山野狸”。野利为党项之大族(时又称之为吐蕃),元昊妻野利氏,元昊统军大将野利遇乞、野利旺荣均出此族。西夏契约中有“夜利”一姓,[⑦]亦当即“野利”之异译。

吴移、越移四族:《宋史·党项传》:“夏州尹宪等引兵至盐城,吴移、越移四族来降”。[⑧]盐城即盐城镇,在夏州。《稽古录》卷17称吴移、越移四族为“杂虏四十七族”。[⑨]《册府元龟》卷170有延州党项首领“吴怡磨五”;[⑩]《金史·交聘表》中有夏使“吴移遂良”;[⑪]《宋会要·兵》27中有“吾移越布”;[⑫]黑城西夏契约中有“兀移女□□”;[⑬]《宋会要·兵》中有“乌移革移”;[⑭]《宋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正月辛未条。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大中五年正月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264《宋祺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276《尹宪传》。
⑦ 《西夏天庆十一年典麦残卷十五件》,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475页。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⑨ (宋)司马光:《稽古录》卷17。
⑩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招怀》8。
⑪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⑫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7。
⑬ 《西夏天庆十一年典麦残卷十五件》,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第475页。
⑭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6册《兵》8“乌移”一姓。

朝南渡十将传》卷3有“误移业谋、误移乙逋”。[①]吴怡、乌移、吾移、兀移、误移当为吴移之异译。可知，吴移当为党项之一大族。西夏汉文本《杂字》中党项姓氏中有“吴移”一姓。越移当为另一族名。

岌伽、罗腻十四族：《宋史·党项传》：“岌伽、罗腻十四族拒命”。[②]《宋史·尹宪传》：“杀戮三汉、丑奴庄岌伽、罗腻十四族”。[③]《宋史·太宗纪》作“岌伽、罗腻十四族”。[④]《西夏书事》卷4：“夏州盐城镇岌伽罗、腻十四族俱党项种落”。《尹宪传》中的“三汉、丑奴庄”当在夏州盐城镇近侧，为岌伽、罗腻十四族的居地。罗腻当为一族名，《金史·交聘表》下有“罗移守忠”。[⑤]西夏官印中有“罗移那尼征”，罗移为一族姓。西夏汉文本《杂字》蕃姓有“路移”，疑罗腻、罗移、路移为译音之异，故断岌伽、罗腻为二族名。

貌奴、猥才二族：《宋史·党项传》：“继迁奔地斤泽，貌奴、猥才二族夺其牛畜二万余。”[⑥]地斤泽在夏州东北。《金史·交聘表》中有夏使“麻奴绍文”[⑦]；《西夏文字典》有“麻勒”一姓。麻奴、麻勒、貌奴，译音之异，当出一族。《儒林公议》卷上元昊卫队第六队队长为“隈才浪罗”，[⑧]当出“猥才族”。《金史·交聘表》中有“嵬宰师宪”[⑨]。嵬宰、隈才、狈才，为译音之异。

（二）银州（今陕西榆林县南）

保寺、保香二族：《宋史·党项传》：“又于开光谷西杏子平破保寺、保香族”。[⑩]《文献通考》作“保寺、保杏族”。[⑪]杏子平在银州。

保洗族：《宋史·党项传》：“又破保洗两族，俘三千人，降五十五族”。[⑫]此二族及投降之五十五族均属在银州境内族帐。保洗为一族名，保洗两族是指保洗族内有两族。又《宋史·党项传》：“保细族结集扇动诸部，夏州巡检

---

① （元）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276《尹宪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5《太宗记》2。
⑤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⑥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⑦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⑧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⑨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⑩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⑪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4《四裔》11。
⑫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使梁回率兵讨平之”。[①]又《长编》卷331有蕃官“保细唛”[②]，《东都事略》卷127有“保细吃多已”[③]，当出此族。保细、保洗，译音之异也。

银州三族：《宋史·李继隆传》：“又出开光谷杏子平……降银三族首领折八军等三千余众”。[④]杏子平在银州。又《宋史·王侁传》有“河西三族”首领折遇乜。[⑤]《太平治迹统类》卷2有“河西三族蕃部都监折遇乜”。[⑥]河西三族，当即“银三族”，即银州三族呰之三族，因银州在河西，故又称“河西三族”。疑上述保寺、保香、保洗（保细）即银州之三族也。

没邵、浪悉讹二族：《宋史·党项传》：“王侁、李继隆等又破银州杏子平东山谷内没邵、浪悉讹等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诸族”。[⑦]西夏文《杂字》有“没施”一姓，没邵、没施，译音之异。浪悉讹当即浪讹，为一党项族姓。《金史·交聘表》中有“浪讹进忠”、“浪讹元智”、“浪讹德光”、“浪讹文广”；[⑧]《儒林公议》有“浪讹遇移”。[⑨]《通鉴》卷200：“（显庆元年）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率众内附，以其地置柘、洪二州”。[⑩]“浪我”当即“浪讹”。西夏汉文本《杂字》党项姓氏有“浪讹”一姓。

悉利族：《宋史·李继隆传》：“出银州北，破悉利诸族”。[⑪]《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上府悉利族”。[⑫]《欧阳文忠公集》卷79有悉利族军主嗟移可都军主之制文。[⑬]悉利族原居银州北，后归附府州折氏部下，成为宋之熟户。《宋史·太宗纪》、《宋太宗实录》均称“西蕃息利族”。[⑭]

拓跋遇部：《宋史·党项传》：“银州羌部拓跋遇来诉本州赋役苛虐，乞移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乙酉。
③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夏国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257《李继隆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274《王侁传》。
⑥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太宗经略西夏》。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⑧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⑨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0《唐纪》16显庆元年十一月丙寅条。
⑪ （元）脱脱：《宋史》卷257《李继隆传》。
⑫ （清）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2《宋折国公碑阴字迹》。
⑬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79《外制》。
⑭ （元）脱脱：《宋史》卷5《太宗纪》2；（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33雍熙二年四月辛丑。

居内地”[①]。唐时拓跋部初居松州，后徙银、夏二州，银州曾有静边州都督府之旧址。《拓跋寂墓志铭并盖》称：拓跋立伽于“仪凤年”，“徙居圁阴之地，今静边府”[②]，即银州之旧称。拓跋遇为拓跋守寂之后？

卫慕族：《西夏书事》卷8：“卫慕氏，银州大族”[③]，《宋史·夏国传》有“未慕军主”、“卫慕山喜”。[④]西夏文《杂字》及《碎金》均有“卫慕”一姓。[⑤]该族居银州。

（三）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北）

咩兀十族：《宋史·党项传》“宥州界咩兀十族首领都指挥使遇乜布”。[⑥]《长编》译为“密乌”。《金史·交聘表》有夏臣“梅讹宇文”。[⑦]梅讹、咩兀，一音之转。

御泥布、罗树二族：《宋史·党项传》：“宥州御泥布、罗树二族党附继迁，不肯卖马”。[⑧]《西夏文字典》有“罗朔”一姓。罗朔、罗树，一音之转。

腊儿族：《宋史·党项传》：“宥州羌腊儿（又译拉尔）率众劫熟户咩魏族。”[⑨]

庞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六族：《宋史·狄青传》：“略宥州，屠庞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⑩]《长编》卷56有“庞咩偷布安”，[⑪]当出“庞咩族”。毛奴当即麻奴、貌奴，夏州已见。《宋史·夏国传》有“赏罗讹乞”，[⑫]《长编》卷514有“尚罗格依”，[⑬]当出“尚罗族”。西夏文《碎金》有“桑罗”一姓，桑罗、尚罗、赏罗，译音之异。

末藏族：《宋史·李继周传》：“雍熙中，又与侯延广败末藏、末腋等族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8景德元年五月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以下引《碎金》均见此，不另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⑥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⑦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⑨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⑩ （元）脱脱：《宋史》卷290《狄青传》。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二月戊午条。
⑫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⑬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七月甲子条。

于浑州西山”。[1] 浑州即浑州川，西山当即横山之一段；浑州川在延州西北，宥州东南，《涑水纪闻》卷 12“引到宥州团练侍者密臧福罗”。[2]《宋朝事实类苑》卷 75：“李士彬申：……引到宥州末臧屈已、团练侍者末臧福罗，屈已居宥州南没姑川”。[3] 没姑川当即浑州川。末藏又译作密臧、没藏，《长编》卷 162：“密藏，大族也”。[4] 可知，没藏乃宥州党项大族。元昊妻后称“没藏大师”，其兄为没藏讹庞。西夏汉文本《杂字》党项姓氏中有“没藏”一姓，聂历山《西夏文字典》中有“没藏”一族姓。

末腋族：上引《宋史·李继周传》中末腋族在浑州西山，属宥州。末藏在宥州南，末腋亦在宥州南。《宋史·夏国传》元昊第四妻没移氏，[5]《西夏书事》卷 16 夏臣没移皆山，[6]《西夏文字典》中有“没移”一族姓。

孟香族：《长编》卷 164：“蕃酋孟香（《长编》又译作蒙桑）率众千余人内附”。[7]《西夏书事》卷 18：“孟香，宥州蕃酋，得罪惧诛，率众千余人内附”。[8] 西夏文《碎金》有“麻尚”一姓，孟香、蒙桑、麻尚，译音之异。

结明爱、旺莽额二部：《长编》卷 216：“贼倾犯边……特洪、宥州酋结明爱、旺莽额倡之，……如能禽致旺莽额、结明爱及其同谋……”[9] 可知，二酋居洪、宥州。疑“结明爱”为“凌结明爱”之省称，凌结实为姓，即《碎金》中的番姓“令介”。

（四）绥州（今陕西绥德）

折马山族：《宋史·兵志》：“知青涧城种世衡言，募蕃兵五千，隶折马山族”。[10] 青涧属绥州。知绥州亦有折氏。

鬼魁九族：《宋史·兵志》：“龙安砦、鬼魁等九族，兵五百九十九，马一百二十九。”[11]龙安砦属绥州。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253《李继周传》。
②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 12。
③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 75《安边御寇》。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2 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6 庆历二年八月条。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4 庆历八年四月甲戌条。
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8 庆历八年五月条。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6 熙宁三年十月辛酉条。
⑩ （元）脱脱：《宋史》卷 191《兵志》5。
⑪ （元）脱脱：《宋史》卷 191《兵志》5。

横山五族：《王开府行状》："今横山五族与吐蕃董毡等族世受王命"。又"夏人果使横山族杀保安守将杨定"。[①] 横山五族具体指哪五族，不明。文献中载居横山党项大族有嵬名山、朱令陵、轻泥环侧、李阿雅卜等部。《皇朝编年备要》卷17："初，夏谅祚迫迁横山种落于兴州，有嵬名山者，因众不乐，以所统横山部族内附"。[②]《涑水纪闻》卷11："夏国酋长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有众万余人，其弟夷山先降为熟户"。[③]《种太尉传》："绥州羌酋嵬名山与其属沙遇罗部落内附"。[④] 嵬名山部是横山一大族。朱令陵，《长编纪事本末》卷83："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为诱横山之众，诏增给四五顷"。[⑤]《西夏书事》卷29有宥州蕃族朱智用内附，[⑥] 朱智用当为朱令陵后。《宋会要·兵》18还有蕃官"朱呢陵"，[⑦]《长编》卷476有蕃官朱保忠，卷517有蕃官朱守贵、朱再荣。[⑧] 轻泥环侧，《长编纪事本末》卷83："赵谅祚部轻泥环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诈，归命朝廷"。[⑨]《长编》卷504之"李阿雅卜部（后赐为赵怀明）"[⑩] 亦为横山大族，其子侄襄卜、约尚、尚格、尚裕、李罗垒等后举族归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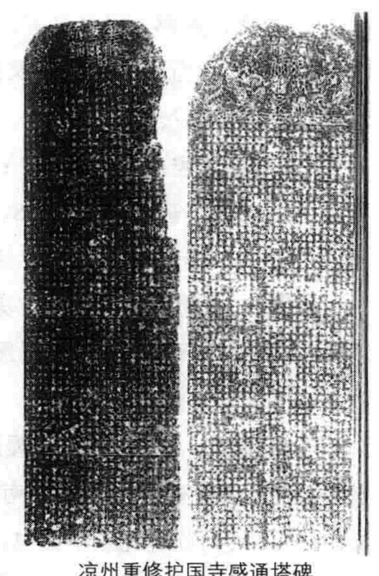
茭村族：《宋史·李继福传》："李继福者，授永平砦茭村族军主"。[⑪]《苏魏公文集》卷29有"茭村族军主李怀德可本族都军主"[⑫]之制文。李怀德当为李继福之后。永平砦属延州。《长编》卷45："绥州界裕勒沁族首领李继福"。[⑬]"裕勒沁"即"茭村"之清译，永平寨又在延、绥州界。

拽浪族：《宋史·真宗纪》："河西蕃族拽浪南山等四百人来归"。[⑭] 拽浪为一族，居河西。《宋会要·兵》27："苏安静与吕宁拽浪撩黎议定"。[⑮] 吕宁为

---

① （宋）刘挚：《忠肃集》附录《王开府行状》。
② （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卷17治平四年十月。
③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1。
④ 《宋武臣传》（不分卷）之赵起《种大尉传》，台北藏穴砚斋史抄本。
⑤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神宗经制西夏》。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绍圣二年五月条。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1册《兵》18。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6元祐七年八月壬戌、卷517元符二年十月辛亥条。
⑨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神宗经制西夏》。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4元符元年十二月乙未条。
⑪ （元）脱脱：《宋史》卷253《李继福传》。
⑫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9《外制》。
⑬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月戊辰条。
⑭ （元）脱脱：《宋史》卷6《真宗纪》1。
⑮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7。

夏蕃号官名；拽浪撩黎亦为拽浪族人。《宋会要·兵》17 中有夏酋“异浪升崖”。[①]《西夏书事》卷 29 称：“绥州钤辖移浪心讹内投”。[②]《长编》中又译作叶朗，族当居绥州。西夏汉文本《杂字》党项姓氏中有“夜浪”一姓。拽浪、异浪、移浪、叶朗、夜浪，均为译音之异。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令介族：《宋史·夏国传》：“克米脂，降守将令介讹遇”。[③]《长编》卷 329：“羌领凌结阿约勒以八万人南袭绥德，……阿约勒之弟兴嫩以告（沈）括”。[④]《西夏书事》卷 30：“复遣首领移卜卓、凌吉讹遇以千骑邀官军”。[⑤]《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有夏僧“令介成庞”。[⑥] 凌吉、凌结、令介，译音之异。西夏文《碎金》中有“令介”一族姓。令介族当居米脂，属绥州。

拽臼部：《宋史·真宗纪》：“石隰都巡检使言，绥州东山蕃部军使拽臼等内属”。[⑦]《长编》卷 54：“拽臼（又译叶锦）等百九十五口内属”。[⑧] 当徙居石、隰州，原居地在绥州。

素哆族：《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4：“至宥州监军司，谒素哆正谋，留之一见。素哆正谋问尔为谁家？显忠曰：我乃苏尾九族李氏也。正谋曰：尔与我一家也，皆出唐睿宗之后。肃宗立于灵武，故以吾家一族留于此，以防党项[⑨] 素哆兄弟当出素哆族。《宋史·党项传》有“绥州羌酋苏移山

---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80 册《兵》17。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9 元祐七年十一月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29 元丰五年九月乙未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0 绍圣四年七月条。
⑥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 3 章《西夏的碑刻》，页 107—113。
⑦ （元）脱脱：《宋史》卷 7《真宗纪》2。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4 咸平六年三月壬辰条。
⑨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4《李显忠传》。

海”。[1] 苏移、素咩，译音之异。素咩当为大族，跨居绥、宥二州。此族唐以来“防党项”，当原非党项，又居宥州，原六胡州之地，很可能原为昭武九姓胡，但后亦融入党项。

小力族：《宋史·党项传》：“羌兵寇小力族”。[2] 小力族居地何处，本传不详。据《太平寰宇记》卷38，绥州有“大力山”、“小力山”，还有“小力川”。[3] 小力族当以居此地而得名。

啖母族：《通鉴》卷288：“羌族啖母杀绥州刺史李仁裕叛去”。[4]《宋史·党项传》中有“啖母驮香”[5]，乃绥州羌酋，啖母当为一族姓，而党项人名中又多直称其姓而略其名者。

苏尾九族：《宋朝史·李显忠传》：“李显忠，绥德军青涧人，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6]《宋朝南渡十将传》卷4：素咩正谋问：“尔为谁家？”显忠曰：“我乃苏尾九族李氏也。”[7] 苏尾九族在绥州。《长编》卷356有“蕃弓箭手岁尾昌移”，[8]《金史·交聘表》中有“孰嵬英”[9]，西夏汉文本《杂字》有“孰嵬”一姓，孰嵬、苏尾、岁尾，译音之异。

努玛族：《长编》卷152：“西界努玛族太尉香布以其族十八人内附”。[10]《苏魏公文集》卷34有“蕃官香布”及“嵬名山”[11] 一并加官之制文，前引文，嵬名山在绥州，香布亦当是，努玛族当在绥州。

破丑族：《宋史·种世衡传》：“庞籍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12] 够见到野利兄弟的蕃部当在西夏境内。唐初，破丑部居雪山，《新唐书·党项传》称其为“雪山党项”，后迁居庆州，“有破丑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8《关西道》14《绥州》。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纪》3。
⑤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⑦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4《李显忠传》。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丙辰条。
⑨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庚戌条。
⑪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外制》。
⑫ （元）脱脱：《宋史》卷335《种世衡传》。

氏族三”。[①]后随永定等十二州迁入河西绥德境，后唐时绥州刺史李仁宝夫人即破丑氏，称“今永定破丑氏”。[②]后汉时，绥州衙内指挥使李光琇妻亦为破丑氏。[③]《宋史·夏国传》李继迁逃入夏州北面地斤泽时，有部将“破丑重遇贵”。[④]可知破丑族居绥州。西夏文《杂字》有“跛州”蕃姓。跛州、破丑，译音之异。

（五）灵州（今宁夏灵武）

傍家外生族：《太平寰宇记》卷36载有“傍家外生族”，[⑤]居灵州城下。同书载环州有“傍家族”，当为“傍家外生（甥）族”之舅族。[⑥]

媚家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媚家族”，居灵州城下。《太平寰宇记》卷36延川县青眉山有“青眉家族”。是否即媚家族？

越邦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越邦族”，居灵州城下及清远镇。

移香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移香族”，居灵州城下。

保尾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保尾族”，居灵州城下。

罗香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罗香族”，居灵州城下。

青天门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青天门族”，居灵州清远镇。

泥悉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泥悉逋族”，居灵州清远镇。

罗泥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罗泥族”，居灵州清远镇。同书有“罗泥埋庆族”，疑罗泥为姓，埋庆为名，出罗泥族。《宋史·党项传》中“罗泥天王”[⑦]当出此族。《金史·交聘表》有夏使“啰哆守忠”[⑧]，《西夏文字典》有“罗乙”姓，罗乙、啰哆、罗泥，译音之异。

禁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禁埋族”，居灵州清远镇。

嗓㑩移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嗓㑩移族”，居灵州清远镇。《宋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② 《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47页。

③ 《大汉故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转引自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283页，2002年。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灵州》。以下灵州部族引《太平寰宇记》卷36者均出于此，不另注。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环州》。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⑧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史·党项传》有“桑泥族”[①]，桑泥、嗓筐移，同音异译。

封家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封家族”，居灵州清远镇。疑为党项细封族之省称。

宗家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宗家族”，居灵州清远镇。《宋史·吐蕃传》亦有宗家族。[②]

委尾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委尾族”，居灵州昌化镇及保静镇。

拓跋第一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拓跋第一族”，居灵州保静镇。《宋史·周美传》灵州东南有“拓跋谷”[③]。《通鉴》卷288：“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④]朔方节度治灵州，拓跋彦超当即此族。此为灵州之拓跋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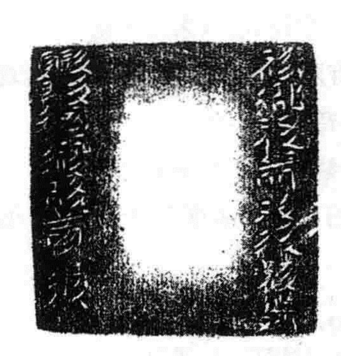
杨尉尉族：《太平寰宇记》卷36“杨尉尉族”，居灵州保静镇。

吐蕃村族：《宋史·党项传》有“吐蕃村族”，居灵州、通远军界。吐蕃村为一地名，《新唐书·地理志》四称犛牛河以西有“吐蕃村”一地[⑤]，此族是否从青藏高原迁来而保持原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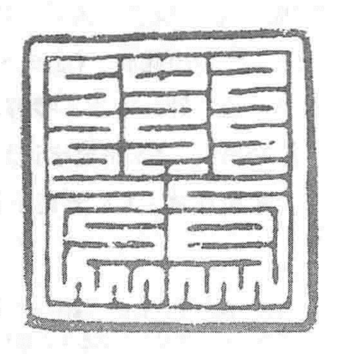
八笆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八笆族”，居灵州怀远镇。

浪崖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浪崖族”，居灵州怀远镇。西夏官印有“浪哀嵬名山”一名，[⑥]浪崖、浪哀，译音之异。

天盛乙酉十七年



正首领兀酉 玉



西夏文官印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323《周美传》。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纪》3。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7《羁縻州》。

⑥ 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尾落族：《宋史·党项传》有“尾落族”[①]，居灵州、通远军界。《西夏文字典》有“味奴”一姓，尾落、味奴，译音之异。

柰家族：《宋史·党项传》有“柰家族”[②]，居灵州、通远军界。

篪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篪逋族”，居灵州怀远镇。汉文本《杂字》有“恃胡”一姓，篪逋、恃胡，译音之异。

悉篪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悉篪族”又作“悉笣族”，居灵州怀远镇。

成悉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成悉逋族”，居灵州保静镇。《宋史·夏国传》元昊时大将“成逋克成”[③]，当出此族，成逋为成悉逋之急读。

罗庆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罗庆族”，居灵州保静镇。

埋庆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埋庆族”，居灵州保静镇。《西夏书事》卷35有“静州埋庆族”[④]即此。西夏汉文本《杂字》有蕃姓“妹轻”。埋庆、妹轻，译音之异。

庾子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庾子族”，居灵州保静镇及临河镇。

嗺悉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嗺悉逋族”，居灵州临河镇。西夏文《杂字》有“息部”一姓，疑为“嗺悉逋”之省读。

埋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埋逋族”，居灵州怀远镇，当即镇戎军西北之“咩逋族”，咩逋、埋逋，译音之异。

罗悉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罗悉逋族”，居灵州怀远镇，罗悉逋之急读为罗逋，灵州近处有罗逋山、罗庞岭、罗逋川，罗逋为西夏语白马二字译音，故疑罗悉逋族为白马族。

嗺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嗺埋族”，居灵州怀远镇。

移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移逋族”，居灵州定远镇。《西夏文字典》党项姓有“移则布”当即此族姓。

麴家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麴家族”，居灵州定远镇。《通鉴》卷207有“吐蕃将麴莽布支”，[⑤]疑此族为吐蕃。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三年七月条。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7《唐纪》23。

笸浪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笸浪族”，居灵州定远镇。《西夏书事》卷35有“定州笸浪族”[1]，定州前身为定远镇。

富儿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富儿族”，居灵州定远镇，《西夏书事》卷35有“定州富儿族”[2]即此。

小阿父儿族：《太平寰宇记》卷36有“小阿父儿族”，居灵州定远镇。

嗓迷族：《宋史·党项传》有“嗓迷族”，[3]居灵州通远军界。

折四族：《宋史·党项传》有折四族。[4]《新五代史·党项传》有“折思族”，居灵州通远军。[5]《西夏文字典》有党项姓“折四”。

奈㖞三家族：《宋史·党项传》有“奈㖞三家族”，居灵州、通远军界。[6]

睡泥族：《宋史·党项传》有“睡泥族”，首领你也逋，居地近灵州。[7]

石存乜族：《通鉴》卷285：“拓跋彦超、石存乜、厮褒三族共攻灵州”。[8]又据《旧五代史·冯晖传》：“张希崇镇灵州、党项拓跋彦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9]故知石存乜族亦在灵州。

厮褒族：上引《通鉴》卷285有厮褒族，居灵州。[10]

裕勒榜族：《长编》卷45：“清远军裕勒榜族首领多拉来贡”。[11]远军旧属灵州。

大斌族：《西夏书事》卷35有“威州大斌族”[12]，威州旧属灵州。

大凉、小凉二族：《长编》卷53：“灵州河外贺兰山侧有大凉、小凉，部族至盛”。[13]《长编》又作“大梁、小梁”,[14]《宋史·党项传》作“大凉、小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三年七月条。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三年七月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⑤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⑧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6。
⑨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25《冯晖传》。
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6。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癸卯条。
⑫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三年七月条。
⑬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条。
⑭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正月丙午条。

凉"[①]。《宋会要・丰州》称丰州龙移昧克族"南至河西，与大梁、小梁相连"。《西夏书事》卷 7："贺兰山大、小凉族构兵，二族居贺兰山北"。[②]《宋史・李继和传》称镇戎军正当"梁家"诸族之路，[③] 此梁家族即指大梁、小梁。

拽利王子族：《宋史・高昌传》有"拽利王子族"[④]，居灵州河外，为九族鞑靼之一。拽利即野利，为党项大姓，亦可知此族或为党项并入鞑靼中者。

么啰王子族：《宋史・高昌传》载：贺兰山下有"么啰王子族"[⑤]，为九族鞑靼之一。党项多以王子、大王、天王等名称之，疑为党项并入鞑靼者，居贺兰山。《西夏文字典》有"莫累"一姓，当即么啰之另译。

邈拏王子族：《宋史・高昌传》载：贺兰山下有"邈拏王子族"[⑥]，为九族鞑靼之一。疑为党项并入鞑靼者。前引党项有麻奴、貌奴族，疑与此同。

越黜黄水州巡检族：《宋史・高昌传》载：贺兰山下有"越黜黄水州巡检族"[⑦]，为九族鞑靼之一。与灵州党项部落名极似，疑为党项并入鞑靼者。

茅女娲子族：《宋史・高昌传》有"茅女娲子族"[⑧]，居灵州黄河西，为九族鞑靼之一。名似党项，疑为党项部落并入鞑靼者。

茅女王子开道族：《宋史・高昌传》有"茅女王子开道族"[⑨]，居灵州黄河西，为九族鞑靼之一。疑为党项部落并入鞑靼者。

大虫太子族：《宋史・高昌传》有"大虫太子族"[⑩]，居灵州黄河西，为九族鞑靼之一。党项有大虫族，疑此为党项并入鞑靼者。

万山族：《宋史・夏国传》有蕃族万山。[⑪] 万山为党项大族，《长编》卷 49："万山闻之，必不敢于灵州河西屯兵矣。万山退缩，则贺兰山蕃部亦稍叛迁贼矣"。万山居地当在灵州一带。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7 咸平五年十二月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 257《李继和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⑨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⑩ （元）脱脱：《宋史》卷 490《高昌传》。
⑪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六）凉州（今甘肃武威）

卑宁族：《长编》卷50："凉州卑宁族首领格埒班珠尔归附，……自称有精骑三万"。[①]《宋史·党项传》："卑宁族首领喝邻祝半贡名马"。[②] 卑宁为党项大族，居凉州境。

都罗族：《宋史·吐蕃传》："西凉府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振武军都罗族大首领并来贡马"。[③] 这里有一处记载值得怀疑，振武军在河套以北，怎么会同灵州河外的西凉首领一起贡马呢？余以为，此"振武军"当为"振武城"之误，据《凉州府志备考》，凉州旧有"振武城"。[④] 又《宋会要·西凉府》："以西凉府六谷左厢副使折逋游龙钵领宥州刺史，又以其督六族首领褚下箕等三人并为怀化将军"。[⑤] 督六、都罗，译音之异也。两次都是与折逋氏一起，而且明言督六即都罗（《长编》清译作多啰族）。《宋史·高昌传》作"都罗罗族"[⑥]，亦为九族鞑靼之一，乃折逋氏之下属。可知，都罗族应在凉州。《宋史·夏国传》有夏将"都罗重进"[⑦]，《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有"都罗叔侄"，[⑧]《长编》卷496有"投来落部子都勒满登"、"都罗摩尼扬昌"，[⑨]《西夏书事》中有"都罗马尾"，[⑩]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有"都罗刘酉"，[⑪]《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有"都罗慧性"，[⑫]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有"都罗乌□吃铁木尔"，[⑬] 均当出自都罗族。西夏汉文本《杂字》蕃姓有"都罗"一姓，《西夏文字典》中有"都罗"一族姓。

野马族：《宋史·真宗纪》："西凉府暨龙、野马族来贡"。[⑭]《五凉全志》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戊子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④ （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之《祥异古迹》。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西凉府》。
⑥ （元）脱脱：《宋史》卷490《高昌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元）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6元符三年三月癸酉条。
⑩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3熙宁五年七月条。
⑪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载《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⑫ 王静如：《西夏文本活字版佛经与铜碑》，载《文物》1972年第11期。
⑬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⑭ （元）脱脱：《宋史》卷7《真宗纪》2。

卷5:“野马泉，蔡旗堡南十里”。[1] 野马族当出此。西夏汉文本《杂字》党项姓氏中有“野马”一姓，故知野马族为党项。《长编》卷368有“西人叶乌玛”[2]，叶乌玛即野马之清译，以族名作名。

暨龙族：上引《宋史·真宗纪》有暨龙族，居凉州。

仁多族：《长编》卷467:“夏国首领人多保忠乃昔日唛丁之子，久据西南部落，素为桀黠，与邈川首领温锡沁邻境相善”[3]。《长编》卷404:“梁氏与星多（仁多）二族分据东西厢。”[4] 仁多族在夏为大族，有仁多唛丁、仁多楚清、仁多洗忠、仁多保忠等，《铁围山丛谈》卷2:“西羌呐氏久盗有古凉州地，号青唐，传子董毡死。其子弱，群下争强，遂大边患。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结鬼章”。[5] 人多零丁为夏国将，蔡絛误为唃厮啰政权之属将。但有可能仁多族出自吐蕃，夏之所以命仁多保忠为卓罗右厢监军使，一是因仁多族居地近吐蕃，二是仁多族有可能是吐蕃族。《潏水集》卷3:“（星多）贝中部族并在西凉一带左右”。[6] 凉州南面有“仁多泉城”，[7] 仁多族姓当出于此。

捻崖天子部：《新五代史·于阗传》:“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8] 党项捻崖天子部居凉州东北。白亭河，在凉州北面。

（七）西夏境内居地不确之党项部落

罔家族：《西夏书事》卷35:“罔氏，西夏大族”。[9] 继迁母罔氏，李继捧祖母也是罔氏，《咸平集》卷29有李继捧祖母“河西罔氏”特进西河郡太夫人制文。[10]《宋史·夏国传》有“罔聿谟”、“罔豫章”、“罔萌讹”。[11]《金史·交聘表》中有夏使“罔进忠”、“罔永德”、“罔敦信”。[12]《西夏书事》中有“监军司使罔存礼”。[13]

---

① （清）张澍，《五凉全志》卷5《山川》。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7元祐六年十月甲戌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4元祐二年八月戊申条。
⑤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2。
⑥ （宋）李复：《潏水集》卷3《又上章丞相书》。
⑦ （元）脱脱：《宋史》卷87《地理志》3。
⑧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于阗传》。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年二月条。
⑩ （宋）田锡：《咸平集》卷29《外制》。
⑪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⑫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⑬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年六月条。

野遇族：《西夏书事》卷38："野遇，西夏之大族"。[①]《金史·交聘表》有"野遇思文"、"野遇克忠"[②]等。疑"野遇"即"野利"之异译，《续通志·氏族略》将"野遇"译作"叶里（即野利）"[③]。野利氏为党项大族，不可能到西夏后期完全消失，此处"野遇思文"与"野遇克忠"当即野利族人。西夏文《碎金》有"野余"一姓，但无"野利"姓。野利、野遇、野余，译音之异，但居地不明。

万遇族：《宋史·夏国传》蕃族万遇，与万山同出，[④]万遇万居地亦当在灵州一带。

锡伯族：《摛文堂集》卷5有"锡伯中族大首领隆戬补皇城副使带本族巡检，锡伯上族大首领嘉勒斡补皇城副使带本族巡检"之制文。[⑤]锡伯是清译，夏人有太傅"西壁讹答"、[⑥]"西卑"，[⑦]西夏文题记中有"昔毕智海"，[⑧]西夏文石幢中党项人的题名姓"昔毕氏"有七人，[⑨]西夏文《碎金》有"西壁"一姓，西壁与锡伯、昔毕、西卑俱一音之转，很可能即源于"鲜卑"[⑩]之意。

忙宗、车明族：《乐全集》卷23："夏人数易西蕃，前年交兵，数为董毡摧败，忙宗、车明等族因此构衅，被诛"。[⑪]忙宗、车明族当为夏国部族。

移湖族：《宋史·党项传》："迁党移湖等帐。"[⑫]移湖属继迁，故当在夏境。《元史·昂吉儿传》之甘州党项野蒲氏亦当出此族。[⑬]野蒲、移湖，一音之转。

三、宋西北边境的党项部落

宋朝西北边境的党项部落主要是指依附于宋朝的党项熟户，"熟羌，乃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8淳熙十四年三月条。
②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③ （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81《氏族略》1。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5《外制》。
⑥ （明）宋濂：《元史》卷1《太祖纪》。《新元史·太祖纪》作"鲜卑讹答"。
⑦ 《永乐大典》卷1806"卑"字引《元史·西牟传》："西卑，唐兀氏"。此传今本《元史》无。
⑧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⑨ 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⑩ 《西夏记》卷26戴锡章自注云："西壁实鲜卑之讹，西夏本鲜卑别种，故其国人有鲜卑氏"。
⑪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3《奏夏州事宜》。
⑫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⑬ （明）宋濂：《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唐设三使所统之党项也，自西夏不臣，种落叛离，分寓南北”。[①]《李显忠传》中亦有一条材料 :“禄山之乱，肃宗立于灵武，故以吾家（党项素移家）一族留于此，以防党项与史思明相应故也。我家世封宥州节度，尔家为苏尾九族巡检使。自拓跋思恭破巢贼之后，分为南北”。[②]北即西夏境内之党项，南即宋西北边州之党项。宋朝西北边境主要就是河东、陕西二路，河东路党项部落的主要分布区即麟、府、丰三州；陕西路党项部落的主要分布区即延、庆、环三州及保安、定边、镇戎三军，其他州军如石、隰、岚、宪、鄜、丹、宁、邠州自唐以来就有党项部落居住，但由于文献中无具体部落记载，故正文不述。《宋史·兵志》言 :“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则石、隰、麟、府”。[③]除秦、凤、泾、原四州为吐蕃地区，余皆为党项生、熟户杂居之地。

（一）麟州（今陕西神木）

杨家族 :《资治通鉴》卷291称 :“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④]杨信为“麟州土豪”，则杨氏当为世居麟州土著。又《神木乡土志》:“麟州城一名杨家城，以州刺史杨光信、长子重勋、孙光世守麟州，次子继业、孙延昭以勇力雄其一方，因而得名”。[⑤]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君琸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人”。[⑥]杨琪为杨信之后。麟州是唐开元初为安集党项而建的州，这里居住的主要应是党项部族。《乖崖集·麟州通判厅壁记》称 :“麟州旧壤，实曰新秦，戎人绥荒，在河一曲，党项部族，汉民混居”。[⑦]杨家能世代统治麟州的党项部落，当为党项族人。综观五代、宋初西北边州之泛例，灵州冯氏（蕃族）、夏州李氏（党项）、府州折氏（党项）、丰州王氏（党项）、宥州素移氏（党项）、凉州折逋氏（嗢末）、绥州高氏（蕃官，亦当为党项），[⑧]莫

---

① （元）脱脱 :《宋史》卷191《兵志》5。
② （宋）章颖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
③ （元）脱脱 :《宋史》卷191《兵志》5。
④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2广顺二年十二月条。
⑤ （民国）佚名 :《神木乡土志》卷4《古迹》。
⑥ （宋）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集》卷29《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⑦ （宋）张咏 :《乖崖集》卷8《麟州通判厅壁记》。
⑧ 参阅《宋史·夏国传》、《宋史·党项传》、《宋会要·府州》、《宋会要·西凉府》、《宋会要·丰州》及《宋朝南渡十将传》。

不如此。余以为麟州杨氏亦不出其外，《宋史·党项传》中的“杨家族”[1]当即指麟州杨家。《神木县志》中的“杨家城”[2]亦即指此。

兀罗族：《苏魏公文集》卷32有“麟州兀罗族子弟屈德……充本族副军主”之制文。[3]《文恭集》卷19有“故麟州兀罗族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罗佑亲男崖可本族副都军主”之制。[4]《音同》的整理者为“讹罗文信”。[5]西夏文题记中有“兀罗氏女香”。[6]《西夏文字典》有“兀南”一族姓。西夏文残碑有斡勒玉宁。[7]斡勒、兀罗、讹罗、兀南，当为译音之异。

阿尔族：《长编》卷457有“麟州阿尔族”。[8]蕃将高永年疑出此族。此为清译，宋译当为“讹二族”。西夏文《杂字》党项姓中有“讹二”一姓。

结当族：《长编》卷329有“神木寨结当族”，由蕃官楚默任巡检。[9]神木寨属麟州。

折御乜族：《宋史·党项传》有“麟州及三族砦羌人二千余户皆降，酋长折御乜等六十四人献马首罪”。[10]麟州有“折氏”。

勒厥麻三族：《长编》卷53：“麟州界首领勒厥麻等三族千五百帐以浊轮寨失守，相率越河内属”。[11]《宋史·党项传》同，又作“折勒厥麻”。[12]《武经总要前集》卷17：“浊轮砦：……蕃户三族，次一千五百帐，徙于岚、石州，给田居之。”[13]蕃户三族当即折勒厥麻三族，浊轮砦属麟州。《宋史·党项传》称：“徙置宪州楼烦县”。[14]

庞青族：《宋史·王凯传》有“徙麟州都监，尝出双峰桥、染枝谷，遇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清）王致云：《（道光）神木县志》卷4《古迹》。
③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2《外制》。
④ （宋）胡宿：《文恭集》卷19《外制》。
⑤ 李范文：《同音研究》，第202页。
⑥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⑦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附录图版40。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7元祐六年四月辛亥条。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壬辰条。
⑩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壬午条。
⑫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⑬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7《麟府路》。
⑭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夏人破之；又破庞青黄罗部”。[①]庞青在此为一族姓，黄罗为人名。《诸臣奏议》卷132引田况奏议称“刘谦、高继嵩破庞青诸族”。[②]《西夏官印汇考》中有“庞庆张力玉”。[③]《金史·交聘表》有夏使“庞静师德”。庞青、庞静、庞庆，译音之异。西夏汉文本《杂字》蕃姓有“庞静”一姓，此族当居麟州西。

香叶、策木多二族：《长编》卷230：“诏麟府路……其新投降蕃部香叶、策木多二族并仍旧给口食”。[④]《长编》卷336有“策木多莽”、“策木多格”，[⑤]卷328有“蕃部策木多伊克”，[⑥]当出策木多族。

黄女族：《宋会要·府州》、《宋史·党项传》均称“河西叛羌黄女族长蒙保异”寇麟州万户谷，[⑦]麟州在黄河西，这一河西叛羌亦当居麟州近侧。

（二）丰州（宋丰州，陕西府谷西北）

藏才族：共三十八族，居黑山前后。《折继闵神道碑》称：“虏藏才族与夏人叛，自相鱼肉。”[⑧]知藏才族与西夏不合；又据《宋会要·丰州》，宋丰州藏才族只是黑山前后藏才三十八族分出来的一部分。王氏世为其首领，有王甲、王承美、王文玉、王余庆等。[⑨]

耶保移族：《宋会要·丰州》有“耶保移族”、[⑩]《折继闵神道碑》有“伪容州刺史耶布移堡障”，[⑪]《宋史·张岊传》中有“容州刺史耶保移守贵”，[⑫]当出此族，并明言在丰州。

邈二族：《宋会要·丰州》中有“邈二族”，[⑬]《宋史·党项传》有“邈二族大首领崖罗”。[⑭]

---

① （元）脱脱：《宋史》卷255《王凯传》。
②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2《边防门·辽夏》4。
③ 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第63页。其第61印收天津历史博物馆藏西夏文“庞庆张力玉”印一枚，李范文译文。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0熙宁五年二月丙寅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6元丰六年闰六月辛巳条。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辛卯条。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府州》。
⑧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0页。
⑨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⑩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⑪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1页。
⑫ （元）脱脱：《宋史》卷326《张岊传》。
⑬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⑭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乞党族：《宋会要·丰州》有“乞党族领岁移”。[①]《宋会要·西凉府》中称兰州马咸山亦有“乞当”族。[②]乞当、乞党即契丹之异译，西夏文《文海》31·132条中有“契丹”一族姓。[③]

没剂、如罗二族：《长编》卷55及《宋史·真宗纪》称“没剂”、“如罗”等族渡河击李继迁，并称为丰州族帐，[④]西夏官印有“没则宜成口”一名，[⑤]没则宜、没剂，译音之异；又《魏书·官氏志》有鲜卑姓“如罗氏”。[⑥]

（三）府州（今陕西府谷）

折家族：《册府元龟》卷976：“党项折家族五镇都知兵马使折文政检校仆射”。[⑦]折氏世居府州，从五代起，折太山、折嗣伦、折从阮、折德扆、折御卿、折惟正、折继宣、折克行、折可大，累世相传。[⑧]府州折氏名望甚高，但部族人口不多，《宋会要·府州》称“本族仅三百口”。[⑨]这可能仅指折氏之嫡系血脉，并不包括其他折姓者。《五代会要》卷29亦称“党项折家族”。[⑩]折氏原为鲜卑遗裔，《折克行神道碑》称“出河西折掘姓”。[⑪]党项入河东，声名渐盛，折氏亦以党项名之，此古鲜卑族在党项部落留存的痕迹。

毛州族：《苏魏公文集》卷34有“府州靖化堡毛州族子弟屈移可银酒监武充本族副都军主”之制文，[⑫]知毛州族在府州。《宋折国公碑阴字迹》称“宁边寨毛羽族”，[⑬]州、羽，形近易讹，州当为羽。《魏书·官氏志》鲜卑有“莫舆氏”，[⑭]《通志·氏族略》作“慕舆氏”。[⑮]西夏汉文本《杂字》有“毛女”

---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西凉府》。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1·132条，第43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咸平六年六月丁卯条；（元）脱脱：《宋史》卷7《真宗纪》2。

⑤ 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第41页。

⑥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⑦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6《征讨》6。府州旧管五镇指保安、保靖、临河、怀远、定远五镇，参见（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章第4节，第394页。

⑧ 散见两《五代史》、《五代会要》、《宋史》及《宋会要》诸书。

⑨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府州》。

⑩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党项羌传》。

⑪ （清）王昶：《金石萃编》147《折克行神道碑》。

⑫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外制》。

⑬ （清）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2《宋折国公碑阴字迹》。以下府州部族引《宋折国公碑阴字迹》者均出于此，不另注。

⑭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

⑮ （宋）郑樵：《通志》卷29《氏族略》5。

蕃姓。毛女、毛羽、莫舆、慕舆，译音之异。

麻乜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麻乜族”。《长编》卷510有“河东靖化堡麻也（当作乜）族蕃官伊锡”。《长编》卷318有蕃官“麻乜讹赏”，当出靖化堡之麻乜族。《宋会要·兵》27称麟府间有麻乜寨和麻也吃多讹寨，当与麻乜（也）族有关。

兀泥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宁武寨兀泥族”，《宋史·党项传》称：“先是，兀泥族大首领泥中佶移内附，俄复归继迁，其长子突厥罗与首领黄罗至是以千余帐降”。又云：“兀泥族在青冈岭、三角城、龙马川，领族帐千五百户”。又云：“兀泥族大首领名崖”。[①] 兀泥共三族，其一为兀泥中族（《党项传》误为兀泥巾族），其他二族名当为上族和下族。《宋史·党项传》又有“泥巾族”当为“泥中族”。[②] 前引“泥中佶移”即其姓。泥中又为“兀泥中”之省称。《苏轼文集》卷38有“蕃官兀埿常”，[③]《辽史·圣宗纪》有“瓦泥乞移”[④]，此二人当出兀泥族。兀泥，西夏语太后之意。

女乜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女乜族”。《宋史·党项传》：“府州女乜族首领来母崖男社正等内附”。[⑤]

狐咩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斥堠堡狐咩族”，斥堠堡属府州。

张王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安丰寨张王族”，安丰寨属府州。

王乜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安丰寨下府王乜族”，又有“上府王乜族”。前引“黄乜族”当即王乜族，与此二族合称王乜三族，即王乜族分上、中、下三府居。

浪王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宁川寨浪王族”，宁川寨属府州。《宋史·张昷传》有“浪黄族”[⑥]，浪王、浪黄，疑为一族。

咩保族：《宋史·党项传》：“宁边寨咩保族”。[⑦]《宋史·折克行传》中有“大酋咩保吴良”[⑧] 当即出咩保族。宁边寨属府州。镇戎军有咩逋族，咩保、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8《制敕》。
④ （元）脱脱：《辽史》卷11《圣宗纪》2。
⑤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326《张昷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253《折克行传》。

咩逋音近，疑为一族。莫高窟西夏文题记有“酩布那征埋”、“酩布移则”，西夏汉文本《杂字》番姓有“咩布”一姓，咩布、酩布、咩保、咩逋，当为译音之异。

杂母族：《宋折国公碑阴字迹》有“下府杂母族”，同碑又有“杂母买”，亦当属府州。莫高窟西夏文题记有“杂谋惠月”，杂母、杂谋，译音之异。

外浪族：《宋史·党项传》“府州外浪族首领来都贡马”。[①]《长编》卷 82 有“外浪族杜庆光”[②]，居唐龙镇。

茗乜族：《宋史·党项传》有“茗乜族”[③]，属府州。武威西夏文欠单有“酩敏”一姓，[④]茗乜、酩敏，译音之异。

路乜族：《宋会要·府州》有“路乜族大首领越移”。[⑤]

细乜族：《宋会要·府州》有“细乜族大首领庆元”。[⑥]

路（洛）才族：《宋会要·府州》有“路才族大首领罗保”。[⑦]

细毋族：《宋会要·府州》有“细毋族大首领杂保乜”。[⑧]《儒林公议》卷上有“细毋屈勿”及“细毋嵬名”二人，[⑨]当即出此族。汉文本《杂字》蕃姓有“细遇”姓。细遇、细毋，译音之异。

郭莽族：《长编》卷 67：“府州又言：唐龙镇略夺芦子塞郭莽族人马”。[⑩]

折突厥移部：《宋史·党项传》：“府州界五族大首领折突厥移为安远大将军”。[⑪]

簿备家族：《五代会要·党项羌》有“簿备家族都督簿备撒罗”。[⑫]因与“折家族”并列，故纳入府州。又有“簿备香”，亦当出此族。《范文正公集》附录《西夏堡寨》称岢岚军与火山军之间有簿家庄，[⑬]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2 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壬戌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 6 章，第 282 页。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府州》。

⑥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府州》。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府州》。

⑧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府州》。

⑨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7 景德四年十一月甲戌条。

⑪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⑫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 29《党项羌》。

⑬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下册《范文正公遗迹》附录《西夏堡寨》。

泥也六族：《五代会要·党项羌》有“泥也六族”首领“泥香王子”，又有“泥也大首领拓跋山”，又称“府州党项”。[①]

府州八族：《宋史·党项传》：“府州八族都校明义等言，屡于麟州屈野川击继迁”。[②] 八族何指，俟考。

（四）延州（今陕西延安）

司家族：《新五代史·刘景岩传》：“周密镇延州，……党项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强”。[③]

格登族：《长编》卷137：“以延州格登族军主香玛……为副都军主。”[④]西夏文《杂字》有“戛斗”一姓，格登、戛斗音近。

贝家族：《长编》卷137：“以延州……贝家族都虞侯崆爱……为副军主”。[⑤]

索干九族：《长编》卷156：“鄜延路经略司言：索干九族巡检右班殿直李延遇”。[⑥]《长编》卷137：“以延州……索干族都虞侯拓德迈、李文信并为副军主”。[⑦]

硕尔族：《长编》卷86：“延州界硕尔族巡检殿直李文真”。[⑧]

韦家族：《长编》卷333：“鄜延路经略司言：蕃部奇乌本韦家族弓箭手”。[⑨]《西夏官印汇考》中有“韦乙成”、“嵬阿娱”。[⑩]韦家又可译作“嵬家”。夏酋有“嵬啰”、[⑪]“嵬逋”[⑫]等。疑嵬姓为嵬悉（韦悉）姓省称。

曹守贵部：《宋史·仁宗纪》：“鄜延蕃部首领曹守贵等内附”。[⑬]

磨卢家、媚咩、拽藏三族：《宋史·李继周传》：“有磨卢家、媚咩、拽

①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党项羌》。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7《刘景岩传》。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六月壬辰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六月壬辰条。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丙午条。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六月壬辰条。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子条。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3元丰六年二月癸丑条。
⑩ 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第44、60页。
⑪ （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⑫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⑬ （元）脱脱：《宋史》卷9《仁宗纪》1。

藏等族居近卢关”。[①]关即卢子关，在延州塞门砦北。磨卢当前引麻奴、貌奴之异译。

罗垒族：《长编》卷81：“鄜延部署曹利用言：北境克实克军主率众过大里河南侵，为熟户罗垒族多拉击走之，请以多拉为本族指挥使”。[②]《宋史·党项传》作“罗勒族”。[③]《西夏文字典》有“罗辣”一姓，罗辣、罗勒、罗垒，译音之异。

部道族：《长编》卷70：“补延州部道族朗阿为侍禁，赐名忠顺，是族在州之西，北连庆州蕃境”。[④]

野家族：《长编》卷82：“以延州野家族蕃合指挥使加凌补三班借职”。[⑤]《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下《李公行状》称李显忠曾祖母为“野氏”。[⑥]野氏当即出野家族。《宋史·周美传》延州近侧有“野家店”。[⑦]疑西夏大族野利（遇）氏即野家族，野家为野利（遇）之省称（参见野遇族条）。

扑咩族：《宋史·党项传》：“扑咩族马讹等率属来归”。[⑧]《长编》译作“普密族”。[⑨]《宋史·党项传》又称：“继迁诸羌族明叶示及扑咩讹猪等首领率属内附”。[⑩]《长编》卷50及96均指归顺延州，原居西夏境。

东茭、金明、万刘三族：《宋史·赵振传》：“元昊将反……，于是东茭、金明、万刘诸族胜兵数万悉为贼所有”。[⑪]东茭即茭村族，茭村在延州东路，故称东茭。金明族，当即李士彬族。《涑水纪闻》卷12：“李士彬为属国胡酋，领金明都巡检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万人”。[⑫]李士彬即金明人，曾祖计都、祖孝顺、父继周世掌金明族帐。万刘族不知何指，均为延州党项族。

卞移等八族：《宋史·兵志》：“鄜延路肃戎军，卞移等八族兵七百四十八、

---

① （元）脱脱：《宋史》卷253《李继周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庚申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丁酉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壬子条。
⑥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下《李公行状》。
⑦ （元）脱脱：《宋史》卷323《周美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辛未条。
⑩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⑪ （元）脱脱：《宋史》卷323《赵振传》。
⑫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马一百二十三”。[①]肃戎军不知在延州何处。汉文本《杂字》蕃姓有“便移”，便移、卞移，一音之转。

普萨部：《华阳集》卷30有“安远砦普萨可充本族正军主制”。[②]安远在塞门砦北，属延州。

黄族：《长编》卷157：“鄜延经略司言西界先掠过黄族军丰黄伊特等四十九人，投本族住坐。”[③]则黄族当在延州。《西夏书事》卷18作“黄族军主黄移都”。[④]又《邓殉买地券》称镇西军留青村税户邓殉“买到黄西蔟浪也地”。[⑤]“黄西蔟”当即“黄四族”，黄族是否黄四族之省称，镇西军当在鄜延境。

大卢、小卢十族：《长编》卷47：“延州言：钤辖张崇贵等破蕃贼大卢、小卢十族，禽获人口、羊马二十万”，[⑥]又《长编》卷51：“潘原县正当小芦谷蕃贼来路”。[⑦]疑大卢、小卢族当以大芦谷、小芦谷而得名。

跛臧族：《宋史·赵振传》：“时，金汤李钦、白豹神木马儿、高罗跛臧三族尤悍难制”。[⑧]金汤属保安军，白豹在定边军，高罗亦当为一地名，疑即秦高奴废县，在延州东，跛臧当在延州。西夏文《杂字》有蕃姓“巴藏”，跛臧、巴藏，一音之转。

鄜州三族：《宋史·尹宪传》有“鄜州三族”。[⑨]鄜州有部族名，仅见于此。

（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

小胡族：《宋史·兵志》：“德靖砦，……小胡等十九族，兵六千九百五十六，马七百二十五”。[⑩]德靖砦属保安军。《长编》卷132有“保安军小胡等族”[⑪]之称。《诸臣奏议》卷125称“此（指小胡族）族富庶，人马强壮”。[⑫]首领有胡继谔、胡守清、胡守中、擦也香。《欧阳文忠公集》卷106称胡继夸为“延

①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
② （宋）王珪：《华阳集》卷30《外制》。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二月甲戌条。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庆历五年十二月条。
⑤ 《邓珣买地券》、《邓珣墓志记》，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56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咸平三年九月丙寅条。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癸亥条。
⑧ （元）脱脱：《宋史》卷323《赵振传》。
⑨ （元）脱脱：《宋史》卷276《尹宪传》。
⑩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乙丑条。
⑫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25《兵门·蕃兵》。

州蕃官”，[①] 因保安军旧属延州。《宋史·党项传》有“小湖族”，小湖即小胡。延州境有胡家川砦和胡家川庄，当为胡家族居地。《长编》卷 95：“保安军小蕃族都虞侯日威、巡检胡怀节等击贼有劳”。[②] 胡怀节当为保安小胡族人。

揭家族：《长编》卷 137：“以延州……揭家族副军主李朝政为军主”。[③]《宋史·兵志》：“德靖砦：同巡检所领揭家等八族兵一千一百一十四，马一百五十”。[④] 德靖砦属保安军。

金汤族：《武经总要前集》卷 18 有“金汤族”。[⑤] 金汤族当以金汤城而得名，金汤城属保安军。《宋史·赵振传》有“金汤李钦族”[⑥]，则李钦族亦当纳入金汤族。

厥七九族：《宋史·兵志》：“保安军北都巡检所领厥七等九族，兵一千四百四十一，马一百六十七”。[⑦]《太平寰宇记》卷 39：“保安军东北至蕃部厥豸族十里”。[⑧]《摛文堂集》卷 7 有：“保安军顺宁砦蕃弓箭手指挥觉默特族右侍禁阿穆尔与转五宫制”。[⑨] 厥七、厥豸、觉默特，均为译音之异，族居保安军顺宁砦。

刘绍能部：《宋史·刘绍能传》：“刘绍能，字及之，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⑩]《长编》卷 487：“保安军顺宁砦蕃官刘延庆”。[⑪] 又有蕃官刘怀忠，均为族人。南宋大将刘光世即延庆之次子。《长编》卷 102：保安军蕃族军主旺律赐姓名“刘汉忠”。[⑫] 不知刘汉忠是否即刘绍能之先人。

卧浪族：《宋史·党项传》：“小湖、卧浪族军主最处近塞”。[⑬] 前证小湖（胡）族居保安军德靖砦，则卧浪族亦当居此。《宋史·真宗纪》有“卧浪

①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 106《论乞放还蕃官胡继谔札子》。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5 天禧四年四月甲戌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7 庆历二年六月壬辰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 191《兵志》5。
⑤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 18《邠宁环庆路》。
⑥ （元）脱脱：《宋史》卷 323《赵振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 191《兵志》5。
⑧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37《关西道》13《通远军》。
⑨ （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 7《外制》。
⑩ （元）脱脱：《宋史》卷 350《刘绍能传》。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87 绍圣四年五月甲子条。
⑫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2 天圣二年四月己卯条。
⑬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己”[①]，《金史・交聘表》中有“卧罗绍昌”、“讹罗绍甫”、“讹罗世”、“讹留元智”、“讹罗绍光”等。[②]卧浪、卧罗、讹罗、讹留均为一音之转，当出此族。

米知顺族：《长编》卷126：“藩篱熟户李士彬、米知顺、李思（脱‘顺’字）三（原文误作之）族，亦为之降且虏”。[③]李焘自注：“米知顺，保安熟户”。李士彬为延州熟户（详前），李思顺为环州熟户。

末descending族：《太平寰宇记》卷37：“保安军，东至蕃部末descending族七里”。[④]《元一统志》卷4：“圣人道，在保安县今废州城东七里，从蕃界末descending家族来”。[⑤]descending，他书又作移，即末移，与没移同，则知没移族在保安军亦有部落。

悉逋族：《太平寰宇记》卷37：“保安军西蕃部悉逋族十里”。[⑥]《通鉴》卷285灵州近处有厮褒族。厮褒当即悉逋之异译。又灵州有泥悉逋、成悉逋、嗤悉逋、罗悉逋族，不知是否均出自悉逋族而分成数族。西夏文《杂字》蕃姓有“息部”，悉逋、息部，译音之异。

胡、李二族：《宋会要・方域》20：“保安军胡经臣、李德平二族”。[⑦]德靖之胡、李二族属保安军，胡经臣当为小胡族，李德平或为揭家族。

归娘族：《宋史・夏国传》：“（元昊）遗贺永年嫚书……留归娘族而去”。[⑧]《武经总要前集》卷18：“顺宁砦北五里即生户归娘族”。[⑨]又顺宁砦北三十里有“归娘岭”，族当以此得名，顺宁属保安军。《长编》清译作“珪年族”

（六）定边军（今陕西吴旗西边）

神木马儿族：《宋史・赵振传》有“白豹神木马儿族”。[⑩]白豹地属定边军。

瓦娥族：《诸臣奏议》卷132引田况奏议：“如郝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无所获”。[⑪]郝仁禹时为东谷寨监押，东谷属定边军。瓦娥族当在定边军境。《长编》清译作“旺额特”。

---

① （元）脱脱：《宋史》卷6《真宗纪》1。
②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癸未条。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保安军》。
⑤ （元）孛兰肹：《元一统志》卷4《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保安军》。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195《方域》20《荔原堡》。
⑧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⑨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鄜延丹坊保安军路》。
⑩ （元）脱脱：《宋史》卷323《赵振传》。
⑪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2《边防门・辽夏》4。

神树移族：《宋朝事实类苑》卷56："王怀政攻白豹城西，断神树移来路"。[1]神树移又作神树移，在白豹城西，属定边军。《册府元龟》卷167有树移二十一族，[2]当脱"神"字。

赏渥等族：《宋朝事实类苑》卷56："石全攻其（白豹）南，击赏渥等族"，[3]赏渥族在白豹南。

后桥十八族：《宋史·田敏传》："后桥属羌数扰边，敏诛违命者十八族"。[4]《宋朝事实类苑》卷75："入西贼界，打破贼后桥砦，破荡却吴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等族帐"。[5]这些后桥部族亦当在十八族中。其中舍利族当为突厥遗种，《新唐书·地理志》突厥羁縻州下有"舍利州"，舍利州原属云中都督府，后侨治朔方，[6]至宋又流进党项部落。《张说之文集》卷16："桑乾、舍利两部来降"，[7]就是纪王方翼平突厥之功。遇家，《金史·交聘表》有夏使"遇忠辅"、"遇惟德"，当出遇家族。后桥，在定边军境内。

外尸族：《南阳集》卷18有"东谷寨外尸族蕃官军主归惟永可本族副都军主"之制文，[8]又《永乐大典》卷13506引《宋元宪公集》称："庆州东谷寨熟户外尸族蕃部罗泥"。[9]东谷寨旧属庆州，后属定边军。

罗骨族：《宋史·田敏传》："后桥属荒数扰边，敏诛违命者十八族，又败罗骨于三店川"。[10]《宋史·党项传》："北界罗骨等劫剽熟户"。[11]罗骨族在三店川，应属定边军。

（七）庆州（今甘肃庆阳）

把利族：《通鉴》卷195有"诺州刺史把利步利"。[12]唐初居诺州，在松州都督府。据《新唐书·党项传》庆州有把利族一，则后迁入庆州。唐宋五

---

①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6《将帅才略》。
②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67《帝王部·招怀》5。
③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6《将帅才略》。
④ （元）脱脱：《宋史》卷326《田敏传》。
⑤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5《安边御寇》。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地理志》7。
⑦ （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16《纪王方翼平突厥碑》。
⑧ （宋）韩维：《南阳集》卷18《外制》。
⑨ 《永乐大典》卷13506引《宋元宪公集》。
⑩ （元）脱脱：《宋史》卷326《田敏传》。
⑪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⑫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唐纪》11贞观十二年八月条。

代亦未见把利族迁徙记载，《金史·交聘表》中有“把里公亮”、“芭里庆祖”等数人[①]，把里、把利、芭里即一音之异，当出一族。西夏汉文本《杂字》党项姓氏中有“芭里”一姓。

野鸡族：《五代会要》卷29：“庆州刺史郭彦钦奏：党项野鸡族掠夺商旅，……州北野鸡族多羊马”。[②]《宋史·党项传》：“野鸡族侵掠环庆界”。[③]《册府元龟》卷167：“（庆）州北十五里寡妇山有蕃部曰野鸡族”。[④]野鸡为一党项大族，《通鉴》卷291称“野鸡二十一族”。[⑤]上引《元龟》又称“野鸡第七门族首领李万全”。[⑥]党项大族下多分“门”，如勒浪族，下有“嵬女儿门”、“树李儿门”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8称高平砦（镇戎军）北有“野鸡峰”，野鸡族当以居野鸡峰得名。

杀牛族：《通鉴》卷291：“初，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闻官军讨野鸡馈饷迎奉”。[⑦]野鸡在庆州，则杀牛亦当在庆州；又《册府元龟》卷987：“至马岭，党项杀牛族结集，遂杀获首领阿磨而下五人”。[⑧]马岭，在环州南境，旧属庆州，宋属环州。当在环、庆州界。

拨相公族：《册府元龟》卷987称在马岭抓“拨相公族人马”。[⑨]则拨相公族亦当在环、庆州界。

骨咩族：《宋史·任福传》：“攻白豹城……平骨咩等四十一族”。[⑩]《宋朝事实类苑》卷56：“任福谋袭夏虏白豹城及骨咩等族”。[⑪]《长编》卷118：“任福等攻西贼白豹城，克之……破荡恭迈等四十一族。”[⑫]恭迈即“骨咩”之清译。以此观之，骨咩当在白豹城。又《苏魏公文集》卷33有“大顺城下骨

---

①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②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党项羌》。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④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67《帝王部·招怀》5。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2。
⑥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67《帝王部·招怀》5。
⑦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2广顺三年二月丙戌条。
⑧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6。
⑨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6。
⑩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
⑪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6《将帅才略》。
⑫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条。

咩族屈嵬”的记载。[①]大顺、白豹相距甚近，则骨咩四十一族当居大顺与白豹之间。汉文《杂字》蕃姓有“骨婢”一姓，骨咩、恭迈、骨婢，当为译音之异。

委乞、大门二族：《宋史·党项传》：“鄜延路言，亡去熟户委乞等六百五十人，及骨咩、大门等族来归”。[②]《长编》卷93：“庆州言：……曹玮为华州观察使、鄜延路都部署、环庆秦州缘边巡检安抚使，鄂伽、恭迈、德密等族闻瑋至，归附者千余落”。[③]《宋史·真宗纪》：“庆州骨咩，大门等族归附”。[④]《宋史·曹玮传》：“委乞、骨咩、大门等族闻玮至，归附者甚众”。[⑤]《元宪集》卷33《曹公行状》：“庆州乌尔勤、郭勒敏、特你等族千余落诣吏归款”。[⑥]鄂伽、乌尔勤、委乞均为同名异译，恭迈、郭勒敏、骨咩又同名异译，德密、大门、特你亦为同名异译。除《宋史·党项传》中言委乞似与鄜延有关外，其他种种文献均言此三族为庆州蕃族，前又证骨咩族是大顺城蕃族，故基本可断委乞、大门二族亦是庆州蕃族。所谓“鄜延路言”，并不一定是这些族均在鄜延路。

左惟窯族：《苏魏公文集》卷33有“蕃官庆州荔原堡左惟窯族孟怡……充本族副军主”[⑦]的制文，《长篇》卷479有环庆蕃官孟真，《曾公遗录》作孟直，[⑧]或出此族？

党平族：《宋史·武英传》：“又徙庆州柔远寨主，……破党平族，又从任福破白豹城”。[⑨]党平族当居庆州柔远砦一带。

胡家门族：《宋史·张凝传》称“庆州胡家门等桀黠难制”。[⑩]《长编》卷51同，但作“庆州胡家门等族”。

星叶族：《长编》卷154：“补庆州星叶族蕃官安顺子吹迪博为三班奉职、

①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3《外制》。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天禧三年三月壬申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8《真宗纪》3。
⑤ （元）脱脱：《宋史》卷258《曹玮传》。
⑥ （宋）宋庠：《元宪集》卷33《曹公行状》。
⑦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3《外制》。
⑧ （宋）曾布：《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甲申条。
⑨ （元）脱脱：《宋史》卷325《武英传》。
⑩ （元）脱脱：《宋史》卷279《张凝传》。

本族巡检”。[①]

岑移等三十二族：《宋史 · 党项传》：“臣领兵离木波镇直凑八州原下砦，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②]木波镇在环州东南，八州原当在庆州境。《长编》作“三十三族”。[③]《碎金》有“操移”一姓，西夏文《杂字》作“曹移”。曹移、岑移、操移，当为译音之异。

麻谋等三十一族：《长编》卷 54：“又从淮安镇入分水岭，招降得麻谋三十一族”。[④]淮安镇在庆州境。《宋史 · 党项传》作“三十三族”。

巢迷等二十族：《宋史 · 党项传》：“又至柔远镇，招降得巢迷等二十族”。[⑤]余疑《宋史 · 党项传》中的“庆州界首领盐州刺史巢延（巢迷）渭”[⑥]当出此族。柔远镇即柔远砦地，属庆州。汉文《杂字》蕃姓有“杂咩”一姓，杂咩、巢迷，译音之异。

誃树、罗家等一百族：《长编》卷 54：“遂抵业乐，招降得誃树、罗家等一百族”。《宋史 · 党项传》同。汉文《杂字》番姓有“拽税”，《西夏文字典》又有“鹿家”一姓，誃树、拽税，译音相近；罗家、鹿家，亦译音相近。业乐即业乐镇，在庆州。

井坑族：《宋史 · 崔峄传》：“知庆州，羌井坑族乱”。[⑦]知井坑族居庆州。此处羌，当即党项中的羌族人。

嵬可族：《南阳集》卷 16 有“庆州界蕃官都巡检使赵明父故持禁柔远寨界蕃部嵬可赠右千牛卫将军”之制文。[⑧]嵬可之后为赵明，据《长编》赵明后又有赵余庆、赵余德，《曾公遗录》有赵世忠、赵世良，[⑨]《襄陵文集》卷3还有赵宗古，[⑩]均为庆州大顺城柔远寨部落。

朗干章威部：《长编》卷 232：“知庆州王广渊言，乞移朗干章威等于近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4 庆历五年二月乙巳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4 咸平六年三月乙卯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4 咸平六年三月乙卯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 299《崔峄传》。
⑧ （宋）韩维：《南阳集》卷 16《外制》。
⑨ （宋）曾布：《曾公遗录》卷 7 元符二年五月庚午及六月丙子条。
⑩ （宋）许翰：《襄陵文集》卷 3《外制》。

里汉界熟户部内买地住坐耕种”。[①]《长编》同卷又有纳干堡，纳干、朗干，译音之异，知朗干当为一族姓，以地名为族名。而朗干章威则为朗干族之首领名。朗干章威在庆州。

吃咩族：《永乐大典》卷13506制字韵引《宋景文公集》有“吃咩族军主吃埋将授银酒监武制”，其中有“赤心保塞”句，[②]知吃咩族当为熟户，但不知居何州，权附此。汉文《杂字》蕃姓有“乩咩”一姓，乩咩、吃咩，译音之异。

淮安镇六族：《宋史·党项传》：“以淮安镇六族都军主乞埋为三班借职”。[③]淮安镇属庆州。

毛尸族：《宋史·党项传》：“北界毛尸族军主浪埋，骨咩族酋长乩唱，巢迷族酋长冯移埋率其属千一百九十口，牛马杂畜千八百归附”。[④]这里“北界”并非西夏境，是指北部边界，上证骨咩族在庆州大顺城，巢迷族在庆州柔远砦，毛尸族亦当在庆州境。毛尸，《长编》译作穆什；骨咩，《长编》在此又译作“楚密克”。

喜玉族：《五代会要·党项羌》：有“喜玉（《册府元龟》作‘喜万’）族、折思族、杀牛族”。此三族均为助官军讨庆州野鸡族者，又称“皆熟户蕃人”。野鸡族在庆州，前又证杀牛族在庆州，则喜玉族亦当在庆州。《西夏译经图》有“西玉智”，[⑤]莫高窟西夏文题记有“息玉那征宝”，聂历山《西夏文字典》中有“息玉”一姓。西玉、息玉、喜玉，译音异也。折思见折四族条。

（八）环州（今甘肃环县）

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斯骨尾四族，屈悉保三族：《旧五代史·明宗纪》：“药彦稠奏诛党项阿埋十族”[⑥]。十族即上面十族。《册府元龟》卷987：“诛党项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斯骨尾各一族，屈悉保三族”。[⑦]《新五代史·药彦稠传》：“党项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⑧]方渠，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辛未条。

② 《永乐大典》卷13506制字韵引《宋景文公集》。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⑤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载《文献》1979年第1期。

⑥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9。

⑦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6。

⑧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7《药彦稠传》。

即方渠镇，在环州。据此可知，阿埋等十族居地应在环州。夏人有“麟州刺史嵬悉咩”，又有“嵬悉俄”、“嵬悉逋”。“嵬悉”、“韦悉”当为异译，则嵬悉咩等可能出于韦悉族。

牛儿、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册府元龟》卷398：“药彦稠长兴中与康福率师自牛儿族入白鱼谷，追击背叛党项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①]白鱼谷，《宋史·郑文宝传》：“环州至伯鱼，伯鱼抵青冈，青冈距清远皆两舍”。[②]伯鱼当即白鱼谷，青冈峡在环州北部边界，则白鱼谷应在环州境内。又白马族之名屡见《宋史·党项传》：“环州白马族与继迁战斗”。[③]《宋史·兵志》：“环州之白马族”。《长编》卷99：“环州洪德寨白马族庆香”，《宋元宪公集》有环州洪德寨熟户白马族勃椤。[④]环州北境有白马川，白马族当以此而得名。《新五代史·唐明宗纪》环州有“牛儿谷”，牛儿族当得名于此。据此可知，牛儿、白马、卢家、客户诸族均在环州境。卢家，又参见前“移树、罗家族”条，卢家、罗家均当是“鹿家”之异译。

野利、大虫二族：《旧五代史·明宗纪》：“灵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虫二族三百余帐于方渠”。[⑤]《通鉴》卷267：“（康福）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⑥]一言方渠，一作青刚峡，差距不小，但俱在环州境内。《宋史·郑文宝传》：“守环州甜水谷、独家原，传箭野狸十族”。[⑦]《长编》卷54：“环州野狸族庆香来贡马”。野狸，当即野利，野利族唐贞观时迁入庆州地区，其后又迁银、夏地区，又有迁延、绥地区，又有迁河东者，故分布甚广，宋有“南山野利”之说，又有“环州野狸”之说，还有“原州野狸”之说，且文献中时称党项，时称吐蕃，极为复杂。此青刚峡之野利族在环州。《太平寰宇记》卷37：“通远军（后改环州）西南至蕃部拽利族十五里”。[⑧]拽利即野利。大虫族亦是，原州有，环州亦有，大约在环、原二州的北部边境。

---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
② （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④ 《永乐大典》卷13506制字韵引《宋元宪公集》。
⑤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40《明宗纪》6。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7《后梁纪》2。
⑦ （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⑧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通远军》。

牛家、大、小羊家、苏家四族：《长编》卷 54：“环庆都部署张凝言：蕃部牛、羊、苏家等族与贼迁族帐斗敌。上曰：‘此族在环州侧。’”[①] 牛家族在环州石昌镇，《欧阳文忠公集》卷 79：“环州石昌镇熟户牛家族巡检奴讹男万讹可本族都军主”。[②]《宋史·种世衡传》：“知环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③] 大、小羊家族，《范文正公年谱补遗》：“种世衡领环州蕃汉兵烧荡大、小羊族帐”。[④] 苏家族：《长编》卷 155：“以环州苏家族巡检三班奉职实吉为左班殿直”。[⑤]《宋史·党项传》的“环州酋长苏尚娘”，[⑥]《西夏官印汇考》有“苏斯成”，“苏尼通”，《宋史·夏国传》有“苏守信”，当出此族。

密觉族：《长编》卷 95：“环州熟户密觉族军主锦尼”。又卷 194 有“蕃部密觉族寇平远砦”。[⑦]《琬琰集·韩绛碑》有熟羌“密矩族”，[⑧] 当即密觉族。宋译作“乜臼”，《宋史·党项传》讹为“七臼”。

磨媚、浪壴、托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宋史·史方传》：“（史方）以供备库使知环州、环庆路兵马都监。先是磨娟（当作媚）、浪壴、托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内寇”。[⑨] 磨媚族又见于《宋史·卢鉴传》：“徙环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镇”。[⑩]《宋史·刘平传》中有“磨糜”，[⑪] 又《白氏长庆集》卷 57 中有党项磨梅部落，[⑫]《长编》卷 101 将“磨糜”译成“玛尔默”，磨梅、磨糜、磨媚当为同名异译。《长编》卷 135：“世衡知环州，……又有乌尔族授敌补伪”。[⑬]《宋史·种世衡传》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⑭]《范文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4 咸平六年二月戊子条。
②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 79《外制》。
③ （元）脱脱：《宋史》卷 335《种世衡传》。
④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下册《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5 庆历五年四月壬辰条。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5 天禧四年四月甲子条、卷 194 嘉祐六年七月戊戌条。
⑧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 10《韩绛碑》。密觉、密矩均为清人改译，查《琬琰集》之宋本作“乜臼”。《宋史·党项传》作“七臼族军主近塞”，《宋会要·兵》27 亦称“环州千速砦七臼族”，“七”当为“乜”之讹。
⑨ （元）脱脱：《宋史》卷 326《史方传》。
⑩ （元）脱脱：《宋史》卷 326《卢鉴传》。
⑪ （元）脱脱：《宋史》卷 325《刘平传》。
⑫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 57《翰林制诏》4。
⑬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5 庆历二年三月庚午条。
⑭ （元）脱脱：《宋史》卷 335《种世衡传》。

正公文集》卷 13："巡按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有兀二族受夏戎伪署"。[①]磨媚、兀二族居环州，其他四族亦当在环州。西夏文《杂字》番姓有"讹二、讹三"两姓，"讹"又可译作"兀"。前揭麟州党项时亦有"阿尔族"，即讹（兀）二族。

独家族：《太平寰宇记》卷 37："通远军（后改环州）东南至蕃部独家族十五里"。[②]独家族在环州西北。《宋史·郑文宝传》中环州有"独家原"[③]，独家族当以此得名。

傍家族：《太平寰宇记》卷 37："通远军西北至蕃部傍家族十五里"。[④]则傍家族在环州东南。《宋史·兵志》："永和砦，旁家一计六标，强人一千二百五十五，壮马二百二，为四十四队"。[⑤]永和寨属环州。

威尼族：《长编》卷 99："令肃远寨界上威尼族巡检叙州刺史敏珠尔主之"。[⑥]《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有"韦移移崖"。《宋史·党项传》中有"韦移族都香"[⑦]，属环州。《西夏书事》卷15有"嵬泥族军主阿克"，[⑧]《西夏文字典》有"嵬立"一族姓。威尼、嵬泥、嵬立、韦移，均为译音之异，《金史·交聘表》有"嵬移执信"，当出嵬泥族。肃远寨在环州。

乌贵族：《长编》卷 133："以环州乌贵族蕃官巡检右侍禁慕恩为阁门祗候"。[⑨]

慕家族：《长编》卷 312："环州属羌慕家族首领迎适数纵火杀人"。又"环州肃州远寨慕家白子等剽属羌"。[⑩]《宋史·张守约传》亦称环州有党项慕家族[⑪]；据《曾公遗录》、《西夏书事》，慕家族有慕化、慕俊、慕洧，慕即慕容之省称。《三朝北盟会编》卷 192："慕容洧奔夏国。……洧，环州人"。[⑫]慕容

---

①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 13《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
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37《关西道》13《通远军》。
③ （元）脱脱：《宋史》卷 277《郑文宝传》。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37《关西道》13《通远军》。
⑤ （元）脱脱：《宋史》卷 191《兵志》5。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9 乾兴元年八月乙卯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5 庆历二年五月条。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3 庆历元年九月丁未条。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2 元丰四年四月丙子条。
⑪ （元）脱脱：《宋史》卷 350《张守约传》。
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92《炎兴下帙》绍兴九年正月熙河路经略使幕容洧叛附夏国条。

家族当出鲜卑吐谷浑，同折掘（折）氏一样加入党项，居环州肃远寨。慕恩虽称乌贵族蕃官，应是慕家族人去掌管乌贵族。

李忠杰部：《长编》卷505有蕃官李忠杰，“管环州永和、平远等寨人马”。

沃协族：《元宪集》卷25有“环州蕃部沃协等可本族军主制”，称“沃协等世保疆陲，地雄种落”。[①]

熟仓族：《宋史·党项传》：“环州熟仓族乩遇略夺继迁牛马”。[②]《西夏书事》卷4：“熟仓，会州蕃族，首领咩嘪”。[③]《宋史·党项传》：“继迁寇会州熟仓族”。一言熟仓在会州，一言在环州。又云“内属戎人橐驼路熟藏族首领乜遇率部族反攻继迁”。[④]《西夏书事》卷5：“熟仓大族，东西蕃部五千余帐，皆保聚岩谷，为环庆藩篱，保吉不得熟仓，不能入环庆”。[⑤]橐驼路，在环州北界。熟藏即熟仓。此处会州，指唐会州，因熟仓族是大族，故时称会州熟仓族，时又称环州熟仓族。西夏文《碎金》有“叔苍”一姓，叔苍、熟仓、熟藏，译音之异。

鼻家族：《宋史·党项传》中有“鼻家族”。《宋史·兵志》称环州鼻家族。《太平寰宇记》卷37称：“通远军（后改环州）东北至蕃部鼻家族十五里”。[⑥]《册府元龟》卷170有“环州党项皋家族”，首领为“越斯七移”。[⑦]“皋”为“鼻”之讹，实即鼻家族。

乩媱庆族：《宋史·党项传》：“继迁寇洪砦，酋长庆香与乩媱庆族合势击之”。[⑧]此洪德砦酋长庆香即白马族庆香，洪德砦属环州，乩媱庆族亦当在环州。疑保安之厥媱族即环州之乩媱庆族，或一族分居两地。

郭家族：《武经总要前集》卷18：“大拔砦，东至熟户郭家族十五里”。[⑨]大拔砦属环州。

---

① （宋）宋庠：《元宪集》卷25《外制》。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端拱二年十月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5淳化二年十月条。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通远军》。
⑦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招怀》8。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⑨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邠宁环庆路》。

岌拖族：《宋史·周仁美传》："戍环州，……又与（宋）思恭讨募窟泉岌拖族"。[①] 募窟泉当为岌拖族的居地，在环州。西夏文《杂字》有"乞多"蕃姓，岌拖、乞多，译音之异。

旺家族：《长编》卷105："环州熟户旺家族（又译作旺扎勒族）故康州刺史罗阿子苏都为新州刺史本族巡检。"[②]《宋史·党项传》亦有"旺家族"。

思顺族：《宋会要·兵》28："环州界蕃官思顺族逃入西界"。[③] 思顺即李思顺。

梁家族、小遇族：《范文正公年谱补遗》："石昌镇中，梁家族蕃官屈都等并小遇族蕃官薛娘为仇，其梁家族点集一千余人骑报仇相杀"。[④]《宋史·仁宗纪》："环州小遇族叛"。[⑤] 可知，梁家、小遇二族均居环州石昌镇。小遇，《长编》卷183译作"辖裕勒"。[⑥]《宋史·吐蕃传》收小遇族，是否吐蕃，俟考。

保家族：《长编》卷43："招马之处，……环州之白马、保家、名市族"。保家族当居环州。

名市族：上引《长编》卷43亦称名市族在环州，《宋史·党项传》有"继迁诸羌族明叶示"。[⑦] 名市或即明叶示之急读？

（九）镇戎军（今宁夏固原）

叶市、潘、保、薛四族：《长编》卷63："有叶市、潘、保、薛等四族来投镇戎军，……四族本皆熟户，兹还旧居"。[⑧] 十分明确，四族本镇戎军熟户。《长编》卷54："鄜延部署康进等言：叶示族罗埋持贼迁伪署牒，帅其族百余帐来归"。[⑨]《宋史·党项传》："（曹）璋言：叶示族大首领艳奴归顺"。[⑩]《宋朝事实类苑》卷56："谭嘉政攻其（白豹）北，断叶市之路"。[⑪] 叶示或即明叶示之

---

① （元）脱脱：《宋史》卷279《周仁美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七月乙巳条。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8。

④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下册《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⑤ （元）脱脱：《宋史》卷12《仁宗纪》4。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3嘉祐元年七月丁亥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甲午条。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二月丙戌条。

⑩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⑪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6《将帅才略》。

省称？《宋会要·兵》17有“降羌叶石悖七”，《长编》卷319有“叶市归埋”，卷490有“伊实诺尔”，叶市、伊实、叶石、叶示，均为译音之异。潘当为潘家，保当为保家（见保家族条），薛当为薛家，即潘家族、保家族、薛家族，或即汉人融入党项之部族，均在镇戎军。

咩逋族：《宋史·党项传》：“以咩逋族首领泥埋领鄯州防御使，充灵州河外五镇都巡检使”。[①]《宋史·李继和传》：“镇戎军……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之路”。[②]《长编》卷50：“继迁往来侵掠军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国镇北三十里，至南市界三百余里，便于萧关屯聚万子、米逋、西鼠等三族界”。[③]“米逋”、“咩逋”，译音之异。据此可断咩逋族的居地在镇戎军西北。《宋史·吐蕃传》亦著录“咩逋族”。[④]《金史·交聘表》有夏使“咩布师道”；[⑤]《西夏书事》卷18有“咩布移则”；[⑥]《苏魏公文集》卷34有蕃官“咩布嘋移”。[⑦]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中有“酩布夏园”、“酩布那征乐”、“酩布惠茂”。[⑧]汉文《杂字》有番姓“咩布”。“咩逋”、“咩布”、“酩布”，译音之异也。可知，咩逋族为党项。府州之“咩保族”与镇戎军之“咩逋族”当为分居两地之同族。

贱遇族：上引《宋史·李继和传》知贱遇族亦当在灵州与镇戎军；又《折继闵神道碑》：“虏入萧关，围镇戎，……斩贼酋贱遇”。[⑨]亦可断贱遇族居镇戎军西北。

马臧族：前引《宋史·李继和传》可知马臧族当在镇戎军西北。[⑩]《南阳集》卷18有：“马藏族蕃官副都军主萨尾可本族都军主制”。[⑪]马臧即马藏。

羊嘱族：《武经总要前集》卷18：“镇戎军乾兴寨北羊嘱族帐”。[⑫]羊嘱族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庚申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⑤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庆历五年夏四月条。
⑦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外制》。
⑧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⑨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1页。
⑩ （元）脱脱：《宋史》卷468《李继和传》。
⑪ （宋）韩维：《南阳集》卷18《外制》。
⑫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在镇戎军乾兴寨北。

万子族：《长编》卷 50："（继迁）便于萧关屯聚万子、米逋、西鼠等三族界"。《长编》卷 83："镇戎军报，北界万资（即万子）集人马，谋为钞略"。《长编》卷 74："（绰克宗）初以马二百余入贡，至天都山与万资太保相遇"。《长编》卷 68："赵德明遣万贵等到四军主领族兵攻西凉府"。[①]《宋史·党项传》称："北界万子族谋钞略，……大败于天麻川"。[②] 万子、万资、万贵为译音之异。综观之，万子族亦当居镇戎军西北天麻川，天都山在镇戎军西北，后在西安州境。

西鼠族：上引《长编》卷 50 中有西鼠一族，西鼠（清译作"西舒"）居地近萧关，亦在镇戎军西北。西夏文《杂字》番姓"昔玉"与西鼠音近。

妙娥族：《长编》卷 63："渭州言，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款内附"。《临川集》卷 90《曹穆公行状》："移知镇戎军，……河西大族延家、妙娥等族拔其部人来归"。[③] 河套南部之地，亦可称河西。《武经总要前集》卷 18："三川寨……西控妙娥山"。[④] 三川寨属镇戎军，妙娥山在镇戎军西，妙娥族当以此得名。西夏文（碎金）有"妙讹"一姓，妙讹、妙娥，译音之异。

熟嵬族：上引《长编》卷 63 有"熟嵬族"，又《宋史·党项传》云："镇戎军言：先叛去熟魏族酋长茄罗、兀赃、成王等三族应招抚"。[⑤] 知熟嵬族下有三族，居地亦应在镇戎军。绥州有苏尾族，镇戎军有熟嵬，汉文本《杂字》蕃姓有"熟嵬"。苏尾、熟嵬，译音之异，则知此族分布在两地。

延家族：上引《长编》卷 63 有"延家族"，当亦在镇戎军。

来离八族：《宋史·党项传》："继迁寇会州熟仓族，为其首领咩嚟率来离诸族击走之"。[⑥]《宋史·吐蕃传》："灵武五部以橐驼、良马致贡，来离等八族酋长越嵬护送入界"。[⑦] 既可护送灵州入贡蕃部，又与会州相近，则应是在镇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8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戊辰条、卷 74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甲寅条、卷 83 大中祥符七年秋七月丁亥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③ （宋）王安石：《临川集》卷 90《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④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 18《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 492《吐蕃传》。

戎军一带，来离族在镇戎军西北，共有八族。

魏狸族：《长编》卷51："知镇戎军李继和上言：昨日天麻川杀卫狸族"。[①]《武经总要前集》卷18，镇戎军境有天麻川，并称："天麻川，东北至捺龙谷路入静边砦。"[②]《永乐大典》卷13506引《夏文庄集》有"西蕃魏狸族首领潘般"。[③] 卫狸、魏狸，同音异译，居地在镇戎军。《宋史·李继和传》作"卫埋族"，[④] 埋为理之误。

裴天下族：《宋史·党项传》："原州熟户裴天下等请率族兵掩击迁党移湖等族帐。"[⑤] 裴天下为原州党项熟户。[⑥]

樊家族：《宋史·仁宗纪》："泾原樊家族密斯歌内附"。[⑦] 樊家族在泾原。《宋史·党项传》："樊家族九门都首领客断铎内属"。[⑧] 知樊家族下有"九门"，为党项族。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己卯条。

②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③ 《永乐大典》卷13506引《夏文庄集》。

④ （元）脱脱：《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⑥ 原州为吐蕃居地，因裴天下部收入《宋史·党项传》，故应视为党项。泾、原、渭三州尽管是吐蕃居地，由于接近党项界，亦有党项部落混居。

⑦ （元）脱脱：《宋史》卷12《仁宗纪》4。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考》质疑 *

关于党项族姓的研究，除了清代中叶的海宁周春、武威张澍二人作过一些罗列排比以外，[①] 再就是苏联学者聂历山在西夏文资料中进行过较为广泛的搜求，[②] 但是，迄今还没有人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1980 年苏乾英先生发表《〈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考》一文（以下简称“苏文”），对党项族姓进行了大胆的考证，[③]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仔细读完全文后，发现其中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特提出来与苏乾英先生商榷。

一

首先，苏文在《旧五代史·党项传》的校勘上存在问题。

毋庸置疑，苏乾英先生校勘《旧五代史·党项传》所花工夫是不小的。不论是从引用书目的版本，还是从引用书目的种数上看，都无懈可击；并且，在互校和他校之中，根据多种文献和各种版本的不同记载，订正了其他文献许多讹脱衍误之处，使读者能从各种文献错综复杂的记载中，得出一个清楚一致的认识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功绩。但是，在《旧五代史·党项传》中，有一个较大的错误，苏文却没有在校勘中指出。

先看《旧五代史·党项传》的原文：

---

*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文丛》1983 年第 2 期。

① 周春：《西夏书》卷 10《官氏考》，张澍：《西夏姓氏录》，两书都十分粗疏地排列过一些党项姓氏。

②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 2 册《西夏文字典》搜集了二百多个党项姓氏。

③ 苏乾英：《〈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3 辑，该文后又收入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为 1949 年后至 1981 年之前西夏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 明宗遣灵武康福、邠州药彦稠等出兵讨之。福等击破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及其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杀数千人，获其牛羊巨万计，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由是党项之患稍息。[①]

很明显，这一段话有误。从文字上讲，史书上绝无“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族”、“都统悉那埋摩族”、“侍御乞埋嵬悉逋族”这样的称呼，“大首领”、“都统”、“侍御”是指这几个党项人的职位，怎么会在后面再加一个“族”呢？所以，从文字字义是讲不通的。再从其他史书上的记载来看，更可以证明有误。《五代会要》卷29《党项羌》载：

> 其年二月，行营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等奏诛党项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等七族七百余人，又率兵自牛儿族入白鱼谷，追及叛党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获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人。[②]

《册府元龟》分作两处记载，卷398载：

> 药彦稠长兴中与康福自牛儿族入白鱼谷追及叛党项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获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人。
>
> 是月，药彦稠奏诛党项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各一族、屈悉保三族，计十族得七百人。[③]

《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载：

> 药彦稠奏诛党项阿埋十族与康福入白鱼谷追袭叛党项获大首领六人。[④]

---

①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党项羌》。
③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
④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9。

《新五代史》卷27《药彦稠传》载：

长兴中为静难军节度使，党项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杀回鹘使者，明宗遣彦稠与灵武康福会兵诛之，阿埋等（疑此处脱一“族”字）亡窜山谷。明宗以谓党项知惧，可加约束而绥抚之。使者未至，彦稠等自牛儿族入白鱼谷获其大首领连香等，遣人上捷。[①]

从以上四种书所载材料来看，可以得知《旧五代史·党项传》那一段话有两个错误：一、将后唐长兴三年党项部落的两次作战混记成了一次；二、将党项大首领连香等六个人的人名记成了族名。根据以上各书的确凿材料与《旧五代史·党项传》相校，其文应为：

福等击破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等族，又获其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

“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为党项的各部族，而“连香李八萨王”、“悉那埋摩”、“乞埋嵬悉逋”为党项族人名，这样才与各史所载相合。

二

苏文为了找到党项族姓的先例，强调了党项与北魏王朝的关系，人为地制造了几个令人莫名其妙的前提。

苏文说：“党项，原为西羌之别种，故亦称党项羌。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珪便是属于这一族。”

拓跋珪者，北魏道武帝也，什翼犍之孙，拓跋寔之子，他们的族属乃是来自东北大鲜卑山的鲜卑拓跋部，这在《魏书·序纪》中记载得十分清楚，[②]也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怎么会属于党项呢？党项虽然与鲜卑关系密切，但无论如何不会有鲜卑拓跋跬属于党项之说。

①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7《药彦稠传》。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1《序纪》。

党项正式见于史籍最早为《隋书·党项传》和《北史·党项传》,[①] 党项之名,乃周隋之际的产物。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珪怎么会属于出现在周隋之际的党项族呢?这岂不本末倒置?

苏文又说:"(北魏)太和十八年,国都由山西的平城迁到河南的洛阳。羌族及其他归附各部族的上层统治阶级多随之南迁,并改取新姓,逐渐与汉族同化"。

这又是一件怪事。众所周知,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随之南迁的主要是鲜卑贵族及归附鲜卑的各部族。怎么会是"羌族"及归附羌族的各部族南迁呢?羌族自秦汉以来,世居之地为甘、青、川边区。十六国时,虽有羌人姚兴于长安立国,史称后秦,但后秦亡后,并未见羌人迁往代北的记载,怎么突然在太和十八年出现羌人南迁至洛阳的怪事呢?还有,羌人"改取新姓,逐渐与汉族同化",这更是无稽之谈。查《魏书·官氏志》所改的姓氏绝大多数是鲜卑姓(当然并不排斥有一部分其他漠北民族的姓氏),除鲜卑王室十姓外,下属各部落及东南西北四方都为鲜卑姓:如步六孤、丘穆陵、贺赖、是连、吐谷浑、慕容、宇文、贺兰等。在《官氏志》中收录的一百三十个姓中,并未发现一个羌姓。[②] 这一点姚薇元先生已在其著名的姓氏学著作《北朝胡姓考》中逐一作了详尽的考证。[③] 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的目的同禁止鲜卑民族说鲜卑语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国中加快鲜卑民族的汉化速度。羌族在当时乃北魏王朝的西面边裔之族,孝文帝怎么会将他们的族姓颁令更改呢?

苏文还说:"党项建号于北魏灭亡之后,这个新的游牧王朝以羌族为主体,旧时服属于北魏的鲜卑族、氐族和高车族等亦各有一部分在它的统治之下。各族杂处,分布在青海、甘肃、宁夏及陕北等地"。

这几句话错误更多。"党项建号"可以称得上王朝,那是西夏建国以后的事了。西夏建国以前一直服属于中原王朝,或隋,或唐,或宋,从未见党项称王朝之事。党项族本身都还经常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东迁西徙,居所不定,一直没有一个坚实的根据地,哪来的鲜卑族、氐族、高车族在它的统

---

① (唐)魏征:《隋书》卷 83《党项传》;(唐)李延寿:《北史》卷 96《党项传》。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③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 年。

治之下呢？这是其一。鲜卑族本身就是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怎么能称“旧时服属于北魏王朝的鲜卑族”呢？《宋史·党项传》云：“党项，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后周世始强盛。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来禽氏、拓跋氏最为强”。[①]《新五代史·党项传》：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跋氏最强”。[②] 这里虽然有与鲜卑有关系的部族，但哪里有氐族和高车族的影子呢？为了考证党项族姓内有氐姓、高车姓，预先在这里安下一个楔子，而没有任何史料作证，这种前提怎么可能成立呢？这是其三。如果仅凭“党项建号于北魏之后”这一条理由，从而推出“旧时服属于北魏的鲜卑族、氐族和高车族等亦各有一部分在它的统治之下”的结论，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从上面所罗列的三个前提，我们可以看出，苏文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混淆了鲜卑族和党项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建立北魏王朝是鲜卑拓跋部，而不是党项。在党项中虽有拓跋等鲜卑姓，我们充其量只能认为党项之源流同鲜卑有关，党项族中有流入或同化的鲜卑人，就同吐蕃部落有“野利氏”，[③] 鞑靼部落有“折氏”，[④] 于阗国有“尉迟氏”[⑤]一样，都是流进各族的他族人。但是，绝不能因为党项有拓跋部，鲜卑有拓跋部，就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党项也就成了鲜卑，甚至说成党项统治鲜卑人。以上错误，正是苏文的考证前提。

三

我们再来谈谈苏文的考证方法。其第一个失误就是在族名中寻找族姓。

我们知道，北方草原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一般都以部落为姓，即一个部落之名号就为该部落成员的姓氏，如突厥阿史那部，回纥药罗葛部，鲜卑拓跋部和慕容部，这些部落的成员都是以上述部族名而为其姓氏，阿史那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3。

③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7《褒异》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6《后唐》5。

④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2《朝贡》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鞑靼传》。

⑤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4《尉迟》。

氏、药罗葛氏、拓跋氏、慕容氏。[①] 党项亦是如此。《旧唐书·党项传》云："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②] 党项"以族为姓"，这一点苏文自己也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具体的考证中，作者就违背了这个原则，而进行了一部分无意义的考证。

为了避免累赘，余不想复述前面所引的材料，但前面所引的材料无论哪一条（包括《旧五代史·党项传》中的那一条），都十分清楚地指出："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是一连串的党项族名，从《五代会要》和《册府元龟》的记载中，还可以知道"阿埋"有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是四个族名，[③] 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如果承认"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是几个党项部族族名的话，而又承认党项"以族为姓"，那还在这些族名中寻找什么族姓呢？应该每个族名就是一个族姓。假如"韦悉"可以断开为一个部族的话，那"韦悉"就应该是一个族姓，[④] 而不应该在"韦悉"中去找"韦"姓了。正像"拓跋"、"野利"都是党项部族之名，而我们不会再在"拓跋"和"野利"中去找"拓氏"和"野氏"一样。而苏文正是使用这一方法在"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大找"韦"、"阿"、"褒"、"强"、"埋"等姓氏，这样做岂不是缘木求鱼？而苏文却正是犯了这一错误。

第二个失误就是将党项族姓简单地以字相对。

考证少数民族的姓氏绝不能像考证汉姓一样，只要哪一本《姓谱》上有这一种姓，就可以将其姓名找出，少数民族的姓氏存在种种复杂情况：

（一）史籍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人名有时有名而无姓，这种现象是常见的。

先以苏文之例为例。《宋史·党项传》载：

---

① 拓跋氏、慕容氏为常见，不另举例。（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50《突厥传》："突厥者……姓阿史那氏"。有阿史那库头（《周书·杨荐传》），阿史那苏尼失（《旧唐书》卷190），阿史那忠及阿史那社尔（《新唐书》卷110）。《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药罗葛，又译作夜落隔、夜落纥，宋有夜落隔归化、夜落隔通顺及夜落纥密礼遏（《宋史·回鹘传》）。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称："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各一族，屈悉保三族，计十族。"故知，"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为四族。

④ 韦悉，当即"嵬悉"，（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中的"嵬悉俄"，（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雍熙二年二月条之"嵬悉咩"，本文考证史料中的"嵬悉逋"，当即以"嵬悉"为族姓，出自"嵬悉"或"韦悉"族。另《宋史·夏国传》的"嵬啰"、"嵬逋"，亦当即"嵬悉啰"、"嵬悉逋"之省读。

（太平兴国七年）丰州大首领黄罗并弟乞蚌等来贡马。[①]

二者为兄弟，前者冠“黄”，后者冠“乞”。苏文认为“乞”为“乞蚌”之姓。但与其兄“黄罗”对照，就知“乞”不是姓，因为，兄弟二人，焉能有一姓“黄”，一姓“乞”者，可见“黄”、“乞”都不会是他们的姓。据《宋会要辑稿》第195册可知，“黄罗”、“乞蚌”属于党项藏才族，[②]则“藏才”才是他们的族姓。《宋史·党项传》载：“雍熙二年四月，（王）侁等……枭伪署代州刺史折罗遇并弟埋乞”。[③]苏文认为“埋”为“埋乞”之姓，实误。折氏，党项大姓，“折罗遇”为“折氏”，其弟怎么会为“埋氏”呢？可见，上述“乞蚌”和“埋乞”都是名字，文献中并未提及他们的姓氏。

再举个例子，《宋史·夏国传》载：“（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闰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④]，如果把“屈移”之姓定作“屈氏”，那就大错特错。查《续资治通鉴》卷132，“是月，归朝官李宗闰上书言：……臣是时久留云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云中，副使李阿雅卜谓臣曰……”毕沅在“李阿雅卜”下注云：“旧作屈移，今改”。[⑤]毕氏采用的是清乾隆时改译的辽、金、元三史的人名。可见，“屈移”并非一完整的姓名，很可能“李阿雅卜”的名字，李为其氏，“阿雅卜”则为“屈移”之异译。

还有，苏文中所列的羌姓“悉氏”，有“悉末朗”、“悉薰热”、“悉猎”等，这都是新旧《唐书·吐蕃传》的人物，但“悉”并不是他们的姓，吐蕃人的习惯是只称其名，而不道其姓。《资治通鉴考异》卷21云：“吐蕃国法不呼本姓，但士族则曰‘论’，官族则曰‘尚’，其中字即蕃号”。[⑥]如苏文说的“悉猎”，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即称“悉猎”，又称“名悉猎”，还作“论名悉猎”，[⑦]可见，“悉”并非羌姓，在新旧《唐书·吐蕃传》中所见到的“悉末朗”、“悉熏热”等都是人名。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2绍兴二十九年三月条。
⑥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卷21。
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

（二）在汉文史籍中出现的少数民族族名和人名大部分是译音，每一个译字并不具有与汉人名字相同的意义，有时在这本书译成此，在那本书又译成彼。

还是以苏文所举例为例吧。《宋史·党项传》云：

（咸平）四年七月，以会州刺史乩遇为保顺郎将、苏家族屈尾、鼻家族都庆、白马族埋香、韦移族都香为安化郎将。[①]

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 清译却为：

（咸平四年七月）己亥，以会州刺史伽裕勒为保顺郎将，苏家族齐都尔齐、白马族密香、威伊特族多香并为安化郎将。[②]

《宋史》作“乩遇”，《长编》作“伽裕勒”；《宋史》作“埋香”，《长编》作“密香”，像这种并不具有汉文之意的译音，怎么能简单地与汉族或少数民族已经汉化的固定姓氏硬套呢？

苏文在考证党项族姓时，根本不考虑以上两种因素，一味以字对姓，采用十分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复杂的少数民族族姓。于是，党项族内出现了一些在此之前没有见过，在此之后也不曾出现的姓氏。如“韦氏”、“褒氏”、“强氏”、“埋氏”、“连氏”、“悉氏”、“乞氏”等等，[③]如果苏文的考证方法成立的话，那就还可以割裂出更多的姓氏出来。“斯氏”，《宋史·党项传》有“斯多逋丹”、“斯敦琶”，[④]《宋史·吐蕃传》有“斯铎督”、“斯铎完”；[⑤]“勒氏”，《长编》卷 396 有夏国副使“勒喀玛”，[⑥]《长编》卷 382 有夏国大使“勒阿拉雅赛”。[⑦]由此可见，苏文的考证方法是不正确的。

苏文除了考证方法上存在问题以外，还有几条党项族姓的考订是错误的。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 咸平四年七月己亥条。

③ 如果这些都是党项族姓的话，那么在今天还保留着的数百个西夏姓氏中不会没有痕迹。

④ （元）脱脱：《宋史》卷 491《党项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92《吐蕃传》。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96 元祐二年三月戊辰条。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82 元祐六年六月壬寅条。

苏文在“阿埋条”中说：“长兴三年被俘的阿埋与元符元年被俘的阿埋虽然同名，但不是同一人……惟其同属于嵬名族则甚有可能”。前面一个“阿埋”是后唐长兴年间的一个党项族名，后面一个“阿埋”是北宋元符年间的一个党项族人名，两者都同属于“嵬名族”吗？据《宋史·夏国传》，元符元年被俘的“阿埋”确实属于“嵬名族”，其姓名为“嵬名阿埋”，为西夏之统军使，[①] 但据两《五代史》，长兴三年被俘的阿埋为一族名，当时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此一阿埋属于“嵬名族”，仅根据其名相同，就判断二者同出一姓：就好比称张明与李明同出一姓一样荒唐。《西夏书事》卷 11 云：“元昊既袭封，衣白窄衫……复以李赵赐姓不足重，自号嵬名氏，称吾祖，于是，属族悉改嵬名，部尊荣之，疏族不与焉”。[②] 可见，改“嵬名氏”乃元昊袭封以后的事，与前一个“阿埋”相隔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前者怎么可能属“嵬名族”呢？

苏文在“李氏条”中说：“党项王族皆以李为姓。后唐长兴三年被俘的党项大首领李八萨王乃党项王族中人”。又说：“八萨王不是汉名，亦不是蕃名，而是党项王族的封号”。李八萨王是五代时期人，这一时期，党项人多半还是散居山野的部落，西夏王朝还没有建立，王族从何而来？《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两书明载，李八萨王是“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的大首领”。“白马、卢家、客户”等族显然不是“拓跋氏”，何以肯定“李八萨王”必为党项王族？至于李姓，唐代以来，各族中赐姓、冒姓、自姓为“李氏”者实在普遍，吐蕃、回纥、吐浑、党项诸族中都不为奇。[③] 因此，姓李并不能表示必定是党项王族。至于“八萨王”，根本不可能是封建王朝对党项王族的封号，既不见任何史书有此封赐的记载，而且从名字上就完全可以看出是一个自封的草头王号。

苏文在“嵬氏条”中说：“嵬氏，拓跋氏子姓”。又说：“长兴三年被俘的党项传御嵬悉逋，当属于王族拓跋氏的子孙”。还说：“夏州羌族以嵬为氏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1 明道元年十一月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 492《吐蕃传》之“李立遵”、“李巴全”、“李磨论”等，（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 138《回鹘传》之“李引释迦”、“李末”、“李屋”等，（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4《吐浑传》中“李绍鲁”，还有党项族中非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继周（《宋史·李继周传》）、李显忠（《宋南渡十将传》卷 3《李显忠传》）。

者皆王族拓跋氏的子孙”。苏文这种结论想当然的成分太大。“嵬氏”，在东汉学者王符的《潜夫论·姓氏篇》中就已有著录，[①]而拓跋氏的出现却在魏晋之时。那么，“嵬氏”怎么会成为“拓跋”的子姓呢？“嵬名”是元昊时期拓跋氏的改姓，“嵬氏”却是东汉前的羌人姓氏。可见，二者并无内在联系。苏文所依据的理由是元昊蕃名“嵬理”，故“嵬氏”是“拓跋氏”的子姓，《宋史·夏国传》明明记载，“嵬理”是元昊小字，[②]怎么会变成蕃名的呢?“嵬理”二字中根本不含姓，《隆平集》则称“崖块”，[③]根本与“嵬氏”、“嵬名氏”没关系。党项人喜用“嵬”字作姓和名，党项除了“嵬名氏”外，还有“嵬宰氏”、“嵬悉氏”、“嵬迎氏”、“嵬啄领氏”、“孰嵬氏”、“坡嵬氏”、“明嵬氏”，[④]党项人用“嵬”作名者有“梁格嵬”，[⑤]可见，“嵬”字是党项人中的常用字，既用于姓，又用于名，[⑥]亦可证“夏州羌族以嵬为氏者皆为王族拓跋氏的子孙”实属无稽。嵬悉逋，余以为根本不是“嵬氏”，而以“嵬悉”为氏，他可能就是被药彦稠击破的“韦悉”族中的人，“韦悉”、“嵬悉”，一音之转，同姓无疑，根本不是“属于王族拓跋氏的后裔”。

四

最后，谈谈对《旧五代史·党项传》中几个党项族名和人名的个人看法。

从现存的党项姓氏来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特点，即党项民族的姓为多缀语，也就是多音节，而绝大部分是双音节。如新旧《唐书·党项传》、《金史·交聘表》、《宋史·夏国传》和《长编》等书中所载诸多姓氏即是。还有苏联学者聂历山从西夏文资料中搜集的两百多个党项姓氏都是多缀语，至少为双音节，还有三音节、四音节的姓氏，[⑦]而且还远不止上述之数（以上参阅

---

① （东汉）王符：《潜夫论》卷35《志氏姓》。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④ 参见本书另文《党项姓氏丛录》。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乙丑条。
⑥ 李逸友：《黑城文书》下篇，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⑦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篇第3节称：“从西夏时的党项姓来看，还基本上保留着双音节姓氏的特点。如果用西夏文书写，就是两个西夏字。有的西夏字译成汉字或以汉字注音时，用两个汉字表示，但它仍是一个音节。单音节的党项姓较少，三音节的更少。”

另文《党项姓氏丛录》)。可见，党项姓氏应为多缀语姓氏，而不是单音节姓氏。也许会有人说，有些党项人的姓就是单音节的姓，如折氏，余以为党项人中的单音节姓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本多音节，由于前面或后面的音节轻读之后，有些音节就没有发音，故译成单音节，如："嵬哆"、"吴哆"、"来兀"等，如轻读，"哆"、"兀"之音就听不见了，译出来就是"嵬"、"吴"、"来"等姓。折氏当亦是"折哆"之轻读或"折掘"之省读。[①] 二是有些姓本来是多音节姓，受汉族人的影响，自己将多音节姓氏省为单音节姓氏。如党项姓氏有罔佐氏，而又有罔氏；有卧浪氏，而又有卧氏等等。党项慕容氏在当时就省作"慕氏"。[②] 但是，党项姓氏以多音姓氏为其主体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并不排除杂入西夏境内其他各族留下来的单音节姓，如史、白、慕、贺、高、梁、党、浑、乩、康、安等）。而苏文的党项族姓全为单音节：韦、褒、强、埋、连、李、悉、乞、嵬等，以上述多音节的党项族姓与之相较，则可反映苏文的考证离史实已经很远了。

因此，余以为"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应为五个族姓。"阿埋"可以断开，为一个族姓；"韦悉"可以断开，亦为一个族姓；"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应为三个族姓，但由于暂时还没有旁证史料，故不宜妄断。后面六个人名，因为是两两相连，故极易断开。第一组"连香李八萨王"，因"李八萨王"为一人名无疑，则"连香"也应为一人名；第二组"悉那埋摩"为两人，那就应该是"悉那"和"埋摩"各为一人名。但"连香"、"悉那"、"埋摩"、"乞埋"四人，余以为都是不带姓氏的党项人名。

总之，研究党项族姓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较之前人所注重的北朝胡姓还要更困难。姓氏之学，自清初三百年以降极为衰微，党项姓氏之学，更是史学领域中的一个空白点。今天大量西夏文献（汉文、西夏文）已经发掘公布，党项姓氏之汉文、西夏文资料公布已有数种，累积姓氏已达数百。如果我们认真地对文献中出现的诸多党项姓氏展开深入研究，并与鲜卑、契丹、女真、高丽及西羌之姓氏进行比较。我想对进一步深化党项西夏史的认识，应有所裨益。

---

①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有"折哆"一姓；（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7《折克行神道碑》"（公）出河西折掘姓"。

② 参见拙稿《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

中国古代关于姓氏研究之书，虽无汗牛充栋之数，却也不乏“五车”。然而，这些姓氏之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究竟有多高，从来是被学者们所怀疑的。南宋人洪迈说："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①] 洪迈之言，虽多批评，但也可见姓氏学之难。清代中叶的著名姓氏学大师张澍（字介侯）先生，其姓氏五书被时人称“绝学”，[②] 但是，就在那称为“绝学”的姓氏五书中，其纠纷舛错之处，亦不为罕见。下面，仅就张介侯先生姓氏五书之一《西夏姓氏录》存在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西夏姓氏录》，原书附于《辽金元三史姓录》后。据罗振玉先生介绍，这部书当时并未刊刻，后来，法人伯希和氏于关中介侯故家购得，又经罗振玉先生从巴黎抄录得归，并收入罗氏《雪堂丛刻》之中，即为今日所见之书。《西夏姓氏录》不分卷，全书录西夏姓氏 162 条，并在各条姓氏之后附录人物事迹，有些还略加考释，在西夏姓氏研究中，尚为第一专书。由于介侯先生在姓氏学研究领域中声名甚高，所以，他的《西夏姓氏录》一直被人们列为治西夏史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其错讹之处，从未有人提出，以致以讹传讹，贻误至今，使本就是“雾中之花”的西夏姓氏，更加让人感到模糊不清。

余对介侯先生所录 162 条西夏姓氏，进行了一次认真料理，发现所列西夏姓氏舛错之处竟达三分之一强，而且，还有许多西夏著名姓氏漏而不载。

---

* 原文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① （宋）洪迈：《容斋随笔》之《容斋四笔》卷 9《姓源韵谱》。

②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 486《文苑传》3。

介侯先生在《辽金元三史姓录序》中说："余之为三史之姓也，依据本史，兼系当时人之著述，稍有增益，其所不知则仍阙如，后之君子，尚祈补正，是所望也"。[1] 余遵前人之嘱，循前人之迹，将是书错谬之处逐条订正，至于漏载之西夏姓氏，可参见另文《党项姓氏丛录》。

《西夏姓氏录》（以下简称《夏录》）所收西夏姓氏错误，约可厘为六大类。

一、将吐蕃人名误作西夏姓氏

在宋代，吐蕃与西夏从来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权。虽然，吐蕃部落有时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但是，它对西夏政权而言，总是保持着一个政权模式的独立性。西夏建国后，其国土掩有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的部分地区（青海部分曾短期占领，那是南宋以后的事情），而吐蕃部落却主要散处于熙、河、洮、岷、叠、宕、湟、鄯、廓、积石等州军。这一地区吐蕃部落，大致是属于青唐唃厮啰政权领导，一直与西夏为敌；后期，由于宋对吐蕃发动战争，一部分吐蕃部落开始与西夏合作，但他们从未役属于西夏，而《夏录》却将这一地区的吐蕃人物纳入西夏姓氏之中。况且，"吐蕃国法不呼本姓"，[2] 见于史籍的吐蕃人物一般都只呼其名而不载姓氏，《夏录》却依汉名之例，取其人名的前一、二字作姓，这种姓氏学家的通病，介侯先生亦不例外。此类共有 12 条：

1. 折逋氏。《夏录》云："宋史，乾祐中，凉州刺史李超卒，推土人折逋嘉施权知留后，又申师厚至凉州，奏请授吐蕃首领折逋支官，从之。……"

按：胡三省云："折逋，羌族也，因以为姓"。[3] 宋人对吐蕃、党项皆以"羌"呼之，《夏录》所录的"折逋氏"，是党项还是吐蕃呢？从新旧《五代史》和《宋史》来看，折逋氏一家事迹都收在《吐蕃传》中，而《宋史·吐蕃传》还明确载折逋支为"吐蕃首领"，[4] 可见，折逋氏应为吐蕃部落人。所以，折逋一家不能算作西夏人，也不能列入西夏姓氏。

---

① （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 4《三史姓录序》。
②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卷 21《唐纪》13。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90《后周纪》1 胡三省注。
④ （元）脱脱：《宋史》卷 492《吐蕃传》。

2. 铸督氏。《夏录》云："宋史，夏大首领铸督延巴"。

查《宋史·吐蕃传》："（淳化）五年，折平族大首领，护远州军铸督延巴率六谷诸族马千余匹来贡"。[①]《宋史》并无"夏大首领"之载，铸督延巴乃"折平族大首领"。折平族，《宋史》收入《吐蕃传》中，可见，当为吐蕃部族，《夏录》却作夏大首领，当误。

3. 赏氏。《夏录》云："宋史，西夏首领赏样丹"。

查《宋史》赏样丹并无"西夏首领"之称。《宋史·吐蕃传》云："熟户郭厮敦、赏样丹皆大族"。[②]《宋史·曹玮传》："唃厮罗使其舅赏样丹与厮敦立文法于离王族"。[③] 赏样丹为唃厮罗之舅，其甥唃厮啰为吐蕃王裔，赏样丹焉能为"西夏首领"? 又《长编》卷88称赏样丹为"尚杨丹"。[④]《资治通鉴考异》卷21载，吐蕃宦族曰："尚"。[⑤] 可见，赏样丹乃吐蕃部落人，非"西夏首领"。

4. 瞎氏。《夏录》云："宋史仁宗纪，西蕃瞎毡来贡，又神宗纪，河州首领瞎药等来降"。

按：《宋史·吐蕃传》与《东都事略·西蕃传》均载，瞎毡为唃厮啰长子，吐蕃王裔；瞎药则为吐蕃青唐族大首领。[⑥]《宋朝诸臣奏议》卷141载："今木征与青唐族首领瞎药等在河州"。[⑦]《梦溪笔谈》卷25又云："青唐羌，本吐蕃别种"。[⑧] 可见，瞎毡和瞎药均为吐蕃部落人。吐蕃人名的第一个字多用"瞎"，如：瞎撒欺丁、瞎欺丁木征、瞎扬乌尔、瞎吴叱、瞎征[⑨]等，并非姓氏。

5. 撒逋氏。《夏录》云："宋史，西夏折平族首领撒逋渴为顺州刺史"。

查《宋史·吐蕃传》："（景德三年）仍以折平族首领撒逋渴为顺州刺史"。[⑩]其中并无"西夏"二字，折平族收入《吐蕃传》中当为吐蕃部族，《夏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258《曹玮传》。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丁未条。
⑤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卷21《唐纪》13。
⑥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9《西蕃传》。
⑦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1《边防门·青唐》。
⑧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
⑨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⑩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录》辄加“西夏”二字，实无据可凭，故“撒逋氏”不应列入西夏姓氏。

6. 药氏。《夏录》云：“宋史王君万传，……羌酋药斯逋”。

按：羌酋，西羌之首领，宋人称吐蕃为“西羌”。据《宋史·王君万传》载：“王师定武胜，首领药斯逋邀劫于阗贡物，帅师讨焉”。[①] 武胜，为武胜军，即宋熙州，宋代吐蕃主要居地。可知，此战是宋征熙河吐蕃之役，药斯逋是武胜军一带的吐蕃部落首领，非属西夏，故不应录入西夏姓氏之中。

7. 握氏。《夏录》3：“宋史，夏首领握散”。

查《宋史·吐蕃传》：“（至道）二年四月，折平族首领握散上言”。[②] 握散为折平族首领，并非“夏首领”，折平族为吐蕃部族，故握散不应入西夏姓氏。

8. 渴氏。《夏录》云：“宋史，宋以仪州延蒙八部都首领渴哥领化州刺史”。

按：渴哥之事，收入《宋史·吐蕃传》中，延蒙八部，即延蒙八族。《宋史·吐蕃传》又载：“（铸督延巴）既辞，复挝登闻鼓，言仪州八族首领逋波鹌等侵夺地土”。[③] 这里的“仪州八族”应即是“仪州延蒙八部”，均为《吐蕃传》收录，可见为吐蕃部族，而不应列入西夏姓氏。

9. 透氏。《夏录》云：“宋史，以夏首领透逋为怀化郎将”。

查《宋史·吐蕃传》，《夏录》所引材料与上条同出一语，云：“（咸平）二年，以仪州延蒙八部都首领渴哥为化州刺史，首领透逋为怀化郎将”。[④] 透逋应为“延蒙八部首领”，而不是“夏首领”。故此，透逋也应为仪州之吐蕃，而不应列入西夏姓氏。

10. 散氏。《夏录》云：“宋史，西夏人散八昌”。

查《宋史·夏国传》：“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等到国”。[⑤] 散八昌郡丹星等为西蕃的使臣，“到国”是指到夏国，可见《夏录》所引的散八昌绝非西夏人，而是西蕃人。西蕃者，宋人所指吐蕃也。《宋会要辑稿》第199册

---

① （元）脱脱：《宋史》卷350《王君万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载：“以西蕃瞎毡子瞎欺丁木征为河州刺史”。[①]《东都事略·西蕃传》载：“朝廷以董毡为保顺军节度使西蕃邈川道领”。[②]《夏录》作西夏人，当误。

11．鬼氏。《夏录》云：“宋史，西夏鬼章，种师道破擒之”。

按：《夏录》此条有二误。一、鬼章非西夏人，乃唃厮罗第二子董毡下面的一员大将。《宋史·吐蕃传》云：“（董毡）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团练使”。[③]《长编》卷250：“先是董戬将青宜结果庄数扰河州属蕃”。[④]青宜结果庄即鬼章，董戬即董毡。可见，鬼章为吐蕃将，不是西夏人。二、鬼章非种师道所擒，种师道北宋末、南宋初人，鬼章死于宋哲宗元祐年间。可见，种师道擒鬼章实属荒谬。《宋史·哲宗纪》载：“（元祐二年八月）丁未，岷州行营将种谊复洮州，执蕃酋鬼章青宜结”。[⑤]《宋史·种谊传》所载亦同，[⑥]可见，《夏录》为误。

12．心牟氏。《夏录》云：“宋史，鬼章使子结吼龊入寇，心牟钦毡、温溪心不肯从。”

按：心牟钦毡，吐蕃大将，也是董毡部将。《宋史·吐蕃传》载董毡进封武威郡王后，心牟钦毡也被封为刺史。《长编》卷514：“是日，青唐大酋森摩乾展及董戬妻契丹公主……至总噶尔城通款”。[⑦]森摩乾展，即心牟钦毡，乃青唐大酋，可见为吐蕃部落人无疑，不应收入西夏姓氏之中。

二、将吐蕃族名误作西夏姓氏

吐蕃自唐末以后，国势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不相统一。他们散处于河西、陇右各州军，其族名甚多，仅《宋史·吐蕃传》中提及的就有：来离、大石、小石、大马家、小马家、安家、小遇、折平、延家、者龙、觅诺、懒家、样丹、宗家、当宗、章迷、宗哥、青唐等，[⑧]很明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
②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9《西蕃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甲申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17《哲宗纪》。
⑥ （元）脱脱：《宋史》卷335《种谊传》。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戊子条。
⑧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显，这些族并不属西夏统治。他们开始属于吐蕃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后又属青唐吐蕃唃斯罗政权，与西夏政权并无丝毫关系。然而，《夏录》因为党项部落是以族为姓，而将许多吐蕃部族也收入到西夏姓氏之中，实为介侯先生之误。此类共有四条：

1. 觅诺氏。《夏录》云："宋史真宗纪，祥符三年，以西凉州觅诺族瘟疫赐药"。

按：《宋史·吐蕃传》载："西凉府觅诺族瘟疫，赐首领温逋药"，又云："西凉府即闻罗支遇害，乃率龛谷、兰州、宗哥、觅诺诸族攻者龙六族"。[①] 西凉府为五代、宋初一吐蕃政权，先由吐蕃折逋家族领导，后又转入吐蕃贵族潘罗支及其弟斯铎督的手中，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以前，一直是西夏李氏的劲敌，觅诺族就是这个政权下属的一个吐蕃部族，不应纳入西夏姓氏。

2. 妙氏。《夏录》云："宋史，渭州言，妙娥、延家率熟嵬等族千余帐……内附"。

查《宋史·吐蕃传》："（景德三年）渭州言，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余帐……内附"。[②]《夏录》所引之文已被改动，将妙娥、延家族变成了两个人名，故《夏录》从"妙娥"二字取"妙"为氏。《宋史·吐蕃传》明载，妙娥为一吐蕃部族，不应列入西夏姓氏之中。

3. 青唐氏。《夏录》云："宋史，吐蕃之种入贡，首领唃斯罗居鄯州，后徙青唐，为青唐氏"。

按：《夏录》这一段文字错谬极大，唃斯罗根本不是"始居鄯州，后徙青唐"，宋代鄯州就是青唐。《宋史·地理志》云："西宁州，旧青唐城。元符二年，陇拶降，建为鄯州"。[③] 唃斯啰居青唐，根本不曾称"青唐氏"。但吐蕃有青唐族，《长编》卷175："临占先世跨有九谷，后浸衰，仅保三谷，余悉为他族所据，青唐族最强"。[④]《长编》卷214："王安石云：臣闻青唐族有七八万人"。[⑤] 吐蕃包约、包顺兄弟就是青唐族的首领，而《夏录》却以此为西夏姓氏，实误。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87《地理志》3。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5皇祐五年闰七月己丑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辛丑条。

4．茄啰氏、兀赃氏、成王氏。《夏录》云："宋史，蕃官茄罗氏、兀赃氏、成王氏三族归顺"。

查《宋史·吐蕃传》："（景德元年九月）先叛去蕃官茄罗、兀赃、成王等三族及豁移军主率属归顺"。[①]可见，三个"氏"字乃《夏录》所加。茄罗、兀赃、成王是三个族名，收入《吐蕃传》中，应为三吐蕃部族，故不应收入西夏姓氏之中。

三、将西夏官号误作西夏姓氏

西夏自建国以后，在外交上对宋王朝采用一套避虚就实的政策，宋王朝要求夏国王不称帝，而称"国主"，则夏国的大臣就不能以宋之官制相称，于是，夏政权就专门在外交上对宋实行了一套蕃号官名，[②]如称枢密，则曰"领卢"，称太尉，则曰"宁令"，据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载，当时西夏的蕃号官名约有：祖儒、枢铭、吕宁、领卢、昂星、昂聂、谟箇、丁拿、吕则、芭良、鼎利、阿泥、春约、映吴、祝能、广乐等等。[③]但是，西夏对宋采用的这一套蕃号官制由于史籍的缺略，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谜，每一个官号的准确意义还不能搞清楚，因此，很多学者对此都发生了误解，将官名看作人名，《夏录》因袭《续通志·氏族略》的错误，将一些西夏蕃号官名列入西夏姓氏之中。此类共五条：

1．鼎氏。《夏录》云："宋史，夏使臣鼎利"。

查《宋史·夏国传》："（元祐元年）五月，遣鼎利罔豫章来贺哲宗即位"。[④]罔氏，为西夏大姓，赵德明之母为罔氏，夏大臣还有罔聿谟、罔萌讹、罔敦信、罔永德、罔进忠等。故可知，罔豫章是一人名；鼎利，则是夏遣宋廷使臣的蕃号，《西夏书事》卷11中有鼎利一蕃号名。[⑤]

2．谟氏。《夏录》云："宋史，夏使臣谟箇"。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② 参考拙稿《宋史夏国传人名标点勘误九则》，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条。

查《宋史·夏国传》:"(元丰六年)闰六月遣使谟箇咩迷乞遇来贡"。[①] 咩迷氏，党项族姓，又作密密氏，元昊第四妻为"咩迷氏"。故可知，咩迷乞遇是一人名；谟箇，则是夏遣宋廷使臣的蕃号，《西夏书事》卷11中有谟箇一蕃号名。

3. 昂氏。《夏录》云:"宋史，西夏西南都统昂星"。

查《宋史·夏国传》:"(元丰五年五月)夏西南部统昴星嵬名济乃移书刘昌祚"。[②]《长编》记载为"星茂威明吉鼐"。嵬名氏，乃西夏王族之姓，又作威明氏。《宋史》有嵬名济乃、嵬名谕密、嵬名公辅;《金史》有嵬名仁显、嵬名彦、嵬名世安;《长编》有威明伊特允凌、威明藏、威明叶云等，西夏文嵬名作"𗼃𗖵",[③] 故可知嵬名济乃为一人名。昂(或作昴)星则是嵬名济乃的蕃号官名，《西夏书事》卷11中也有昂星一蕃号名。

4. 芭氏。《夏录》云:"宋史，西夏臣芭良"。

查《宋史·夏国传》云:"(元丰)八年，十月，遣芭良嵬名济赖，昇聂张聿正进助山陵礼物"。[④] 嵬名济赖和张聿正是西夏使臣之名，芭良和昇聂则是西夏使臣的蕃号官名，《西夏书事》卷11中有芭良一蕃号名，昇聂则作昂聂。

5. 映氏。《夏录》云:"宋史，夏大使映吴"。

查《宋史·夏国传》:"(元祐二年)三月，夏遣大使映吴嵬名谕密，副使广乐毛示聿等进驼马"。[⑤] 嵬名谕密和毛示聿都是西夏使臣名，映吴和广乐则是西夏使臣的蕃号官名，《西夏书事》卷11中有映吴和广乐之蕃号名。

四、将一人分作两人而误录其姓

在中国古代姓氏书中，将一人硬分作二人而误录其姓的现象不为罕见，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名，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张介侯先生在其《姓氏辩误》一书中就多次纠正前人之误，然而，他在《夏录》中，又不自觉地重蹈前人之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2册《西夏文字典》。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辙，将一人硬分作二人而误录其姓。

1．圣氏。《夏录》云：“宋史，罗支遣官圣腊来贡”。

查《宋史·吐蕃传》：“（咸平六年）罗支又遣蕃官吴福圣腊来贡，……又以吴福圣腊为安远将军”。[①]《长编》卷54亦载：“西凉府六谷首领遣蕃官吴福圣腊等来贡，……以吴福圣腊为安远将军”。[②] 很明显，吴福圣腊不是两人，不能视为吴福、圣腊，《夏录》却硬分成两人，而且，吴福圣腊为西凉府吐蕃部落人，不应纳入西夏姓氏。

2．青氏。《夏录》云：“游师雄传，西夏将青宜结与鬼章，素号黠桀”。

查《宋史·游师雄传》：“吐蕃寇边，其酋鬼章青宜结乘间胁羌构夏人为乱”。[③] 传中“鬼章青宜结”处并无一“与”字，是介侯先生加字而硬分作两人。鬼章，有时称“青宜结鬼章”，如《宋史·吐蕃传》云：“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领青宜结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④] 有时又称“鬼章青宜结”，如上引《宋史·游师雄传》，又如《东都事略》卷88：“吐蕃大酋鬼章青宜结者，董毡之别将也”。[⑤] 可见，鬼章青宜结（或作青宜结鬼章）是一人，《夏录》前录“鬼氏”，此又录“青氏”，实误。而且，鬼章青宜结，诸书都明确载为吐蕃大酋，不应列入西夏姓氏之中。

3．磨氏。《夏录》云：“宋史，夏首领磨壁”。

查《宋史·吐蕃传》：“（景德元年）龛谷懒家族首领尊毡磨壁余龙及便嘱等献名马”。[⑥]《长编》卷56亦云：“（景德元年正月）渭州言，龛谷懒家族首领尊毡磨壁余龙及便嘱等各献名马”。[⑦] 很明显，《宋史》和《长编》所载之“尊毡磨壁余龙”是一人，并无“夏首领磨壁”之文，《夏录》将一人作数人，实误。尊毡磨壁余龙也不是夏首领，而是龛谷懒家族首领，属于吐蕃西凉府政权，故不应列入西夏姓氏。

4．尊氏。《夏录》云：“宋史，夏国首领尊毡”。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二月己卯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332《游师雄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⑤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88《吕公著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正月丙申条。

查尊毡，他处无载，仍系上引《宋史·吐蕃传》之“尊毡磨壁余龙”，《夏录》误作三人，作“尊毡、磨壁、余龙”，实为一人；又孔平仲《谈苑》卷1：“羌人（指吐蕃）……自称曰倘，谓僧曰尊”。[①]可知“尊”不是姓，而是吐蕃语僧人之意。并说是“夏国首领”，实误。

5．鸡氏。《夏录》云：“宋史，青唐族有鸡罗明”。

遍查《宋史》，并无鸡罗明之人。《宋史·吐蕃传》云：“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药鸡罗及僧鹿遵迎之居洮州”。[②]这个青唐族的首领瞎药鸡罗很可能就是《夏录》中的“鸡罗明”。瞎药鸡罗，就是瞎药，瞎药为其名省称，并非二人。《长编》卷188引汪藻《青唐录》云：“辖约格罗及僧罗遵共迎摩正，……会诸羌不从，摩正逐辖约复还河州”。[③]《诸臣奏议》卷141载：“令木征与青唐族首领瞎药在河州”。[④]可见，瞎药鸡罗是一人，《宋史》中并无“鸡罗明”之人，而且，青唐族乃是吐蕃一大部族，不应纳入西夏姓氏之中。

6．介氏。《夏录》云：“宋史，夏臣有介分”。

遍查《宋史》，并无“介分”一人。《宋史·夏国传》云：“（元丰四年）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将令介讹遇，进攻石州”。[⑤]《夏录》很可能将“令介”二字，误作“介分”；然《夏录》令氏条又云：“刘昌祚传，克米脂，降守将令分讹遇”。交相舛错，令人难解。《宋史·夏国传》和《宋史·刘昌祚传》都作“令分讹遇”，[⑥]而《太平治迹统类》卷15却作“令介讹遇”。[⑦]西夏《新集碎金置掌文》番姓中有“令介”一姓。[⑧]可见，应为“令介氏”，《夏录》所云之“令氏”“介氏”均误。

五、将西夏人名而误作西夏姓氏

在中国史籍上出现的少数民族人名往往十分混乱，有时，在史籍上全称

---

① （宋）孔平仲：《谈苑》卷1。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月辛丑条。

④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1《边防门·青唐》。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⑥ （元）脱脱：《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⑦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神宗经制西夏》。

⑧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载《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人名，有时则称姓不称名，有时还只称名不称姓，极易混淆，特别是有些情况，“或似名而实姓”，[①]更容易使人产生错误，《夏录》就有这一方面错误。此类共七条：

1. 讹氏。《夏录》云：“宋史，谅祚幼养于讹哤，讹哤专国政”。

查《宋史·夏国传》：“谅祚幼养于母族讹庞，讹庞因专国政”。此处“讹庞”并非以“讹”为姓，而是一西夏人名。讹庞，其姓为没藏氏，西夏汉文本《杂字》番姓有“没藏”。[②]为西夏一大姓，其妹没藏尼为元昊的第二娶，为谅祚的生母。《梦溪笔谈》卷25：“元昊……又纳没藏讹庞之妹，生谅祚而爱之”。[③]《西夏书事》卷18：“谅祚，本名宁令两岔，养于没藏讹庞家”。[④]可见，讹庞，乃没藏讹庞之名，非以“讹”为姓。

2. 聿氏。《夏录》云：“宋史，夏元昊臣聿舍，谅祚臣聿则庆，又有聿精、聿正进、聿正常使宋”。

按：《夏录》所列聿氏之人名，都不姓聿。元昊臣聿舍，是如定聿舍，为如定氏，《宋史·夏国传》云：“（庆历三年）元昊亦遣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继来”。《长编》卷142云：“（庆历三年七月）乙酉，元昊复遣吕尼如定兴舍、僚礼旺约特和尔与邵良佐俱来，所请要凡十一事”。[⑤]吕尼，为西夏蕃号官名，如定兴舍即如定聿舍。可见，“聿”不为其姓。谅祚臣聿则庆，也不为聿氏，《宋史·夏国传》原文是：“嘉祐元年，母没藏氏薨，遗祖儒嵬多聿则庆唐及徐舜卿来告哀”。[⑥]这里，《宋史》有二误，一、嵬多应为嵬名，西夏只有嵬名氏，而无嵬多氏，《西夏书事》卷19云：“（嘉祐元年）遣祖儒嵬名聿则、庆唐徐舜卿入告哀”。[⑦] 二、“及”字应在“庆唐”二字之前。因祖儒和庆唐都是西夏蕃号官名，《东原录》云：“祖儒、枢铭，乃西夏之官称大者”。[⑧]《西夏书事》卷31：“庆唐、磋迈皆蕃官名也”。[⑨]嵬名聿则的蕃号官

---

① （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4《三史姓录序》。
②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研究》，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年。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1。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庆历七年二月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乙酉条。
⑥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9嘉祐元年十月条。
⑧ （宋）龚鼎臣：《东原录》，不分卷，函海本第9函。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元符二年四月条。

名为祖儒，徐舜卿的蕃号官名为庆唐，故无“聿则庆”之人，《夏录》为误。还有聿精，是指陈聿精，亦非聿氏，《宋史·夏国传》:“(元丰八年）七月，遣丁拏嵬名谟铎、副使吕则陈聿精等来奠慰”。[1] 此处“丁拏”为嵬名谟铎的蕃号官名，“吕则”为陈聿精的蕃号官名。聿正进，是指张聿正，《宋史·夏国传》:“(元丰八年）十月，遣芭良嵬名济赖，昇聂张聿正进助山陵礼物”。[2]《夏录》的所谓“聿正进”，就是《夏国传》中的“昇聂张聿正进助山陵礼物”，昇聂（又作昂聂）乃张聿正的蕃号官名，“进”乃“进助”之进，《夏录》却荒唐至此。最后一个“聿正常”，却不知所出，以上几例，足可见《夏录》所列“聿氏”不为西夏之姓氏。

3. 旺氏。《夏录》:“涑水纪闻，元昊妻之弟旺荣复书及刚浪凌分将左右厢兵用事”。[3]

按:《夏录》所言之“旺荣”，乃野利旺荣之名，在《涑水纪闻》卷 11 中作“野利氏兄弟旺荣”，可见，非旺氏，为野利氏（清译作叶勒氏)。《宋史·夏国传》:“元昊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东都事略·种世衡传》:“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宁令舅野利旺荣及刚浪凌分将左右厢兵，最用事”。[4]《长编》卷167:“王嵩入夏国反间，其用事臣叶勒旺荣兄弟皆被诛”。[5] 叶勒为野利之清译。可见，旺荣实一人名，其姓为野利氏。而《夏录》误取“旺”为姓。

4. 仁氏。《夏录》云:“宋史，李德明遣牙将仁氏奉誓表请藏盟府。”

按:西夏有“仁多氏”，如仁多保忠、仁多唛丁、仁多洗忠等，而无仁氏;《夏录》所云“仁氏”，并非姓“仁”，而为“刘”姓。《宋史·夏国传》:“(景德）三年，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6]《长编》卷 88:“赵德明遣牙校刘仁勖贡马二十四匹”。[7] 可见，《夏录》载“仁氏”之“仁”为西夏姓氏，实误。

5. 永氏。《夏录》云:“交聘表，明昌二年……夏进奉使枢密直学士永

---

①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②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③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 11。
④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 44《种世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7 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条。
⑥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8 大中祥符九年十月丙子条。

昌奉奠皇太后”。

按：此处“永昌”，余以为只是一个人的人名。在史籍中，少数民族人名往往书其名而不著姓，永昌之“永”，前代姓谱中既无此姓，西夏人物中出现的姓氏中也无此姓，余疑《金史·交聘表》中明昌二年处之“永昌”，即《金史·交聘表》中承安五年的“高永昌”。《金史·交聘表》云：“（承安五年）八月壬子……知中兴府高永昌来谢恩”。[①] 金明昌二年至金承安五年，时隔八年，很可能两次使臣同为一人，高永昌明昌二年时为夏枢密直学士，至承安五年时，很可能进为知中兴府尹。如此，永昌则不为“永姓”，而为“高氏”。另外，如《夏录》所列的“塔氏”（塔哥）、“和氏”（和翰）都当是西夏人名，而不是姓氏。

6. 屈怀氏。《夏录》云：“宋史，夏国主德明妃屈怀氏，按李焘长编作屈囔氏生成嵬”。

查《宋史·夏国传》：“德明娶三姓，卫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讹藏屈怀氏生‘成嵬’”。[②] 再查《长编》卷 111：“夏王赵德明娶三姓，……额藏渠怀氏生沁威”。[③] 额藏渠怀，即讹藏屈怀之清译，成嵬即泌威，可见，“屈怀”并非姓氏，而是姓之一部分，此姓全称应是“讹藏屈怀”或“额藏渠怀”，周春《西夏书·官氏考》将这一姓列入西夏四字姓中，[④] 大概与汉人的复姓意同，这从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文题记和黑城契约中的西夏四字姓“息玉那征”、“夜利那征”等可得到证明。[⑤]

7. 克氏、都如氏、多多氏（因此三姓出自一条史料，故合）。

克氏。《夏录》云：“宋史，元昊以克成赏主兵马”。

都如氏。《夏录》云：“宋史，元昊以都如定主兵马”。

多多氏。《夏录》云：“宋史，元昊以多多马定主兵马”。

而且，《夏录》还列了如定氏，《夏录》云：“宋史，夏主兵马使如定多丹玛，又使宋议事官如定聿舍”。

---

① （元）脱脱：《金史》卷 62《交聘表》下。

②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1 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条。

④ （清）周春：《西夏书》卷 10《官氏考》。

⑤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资料概述》，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敦煌学专号”；《敦煌资料》第 1 集《西夏天庆十一年典麦契残卷》。

查《宋史·夏国传》，以上所列四姓同出一条史料，云："元昊……以成逋克成赏都卧㕿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夏录》将"克成赏"作一人名，"㕿如定"作一人名，"多多马"作一人名；如若此说成立，那介于"克成赏"和"㕿如定"之间的"都卧"也应是一个人名；更矛盾的是，《夏录》既承认"如定多丹玛"是一个人名，又哪里来的"㕿如氏"和"多多氏"呢？显然，《夏录》之说是混乱的，是矛盾的。《夏录》所列四姓，只有如定氏，乃西夏姓氏，正如《夏录》所云，有如定多多马、如定聿舍，西夏汉文本《杂字》番姓有"如定"。[①] 其他三姓皆为《夏录》所误。按照党项姓氏的一般规律，其姓氏多为二字姓（即汉译为双音）。所以，余以为这一段人名应断为："成逋克成、赏都卧㕿，如定多多马、窦惟吉"[②] 较妥。如此，则"成逋"、"赏都"均为党项姓氏，而"克"、"㕿如"、"多多"均非西夏姓氏。

六、将一姓异译者而复录其姓

少数民族人名见于史籍者都是音译为多，故各书译法不同，就是一本书内，前后译名也有歧异之处，所以，这种不同译音的译名就很容易使人误作不同的姓名，以致重录于各代姓书，《夏录》亦是如此。此类共三十二姓十二条：

1．嵬名、于弥、乌密、嵬茗四姓，《夏录》列为四条，其实为一姓，音译歧异之故。据王静如先生考证："嵬名"即"于弥"之同音（嵬与乌，名与弥音极近，西夏无 -ng 音），其所谓于弥部或唐兀乌密氏，即嵬名部及唐古嵬名氏。[③] 据吴天墀先生考证："关于嵬名，《长编》作威明，《元史》则作于弥、乌密、吾密等，都是西夏文的音译"。[④] 可见，嵬名、于弥、乌密为一姓，嵬茗和嵬名更是一字形之异，都是嵬名一姓。

2．野利、叶里、野遇、页允四姓，《夏录》分列四条，其实为一姓，音译稍异之故。野利氏，乃西夏大族，元昊妻野利皇后，元昊大将野利旺荣、

---

①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研究》，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 年。

② 参考拙稿《宋史夏国传人名标点勘误九则》，载《史学月刊》1982 年第 5 期。

③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 1 辑，1932 年。

④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41 页。

野利遇乞，制西夏文字者野利仁荣，然各书译野利二字不同，《长编》清译为“叶勒”，[①]《金史》则译成“野遇”，而《续通志》则将“野遇”译作“叶里”，[②]《夏录》据《金史》清译本将“野遇克忠”、“野遇思文”译作“页允克忠”、“页允思文”。其实，文献中所见“野遇”、“叶里”、“叶勒”、“页允”都是“野利”二字的音转，故以上四姓应列为一目。

3. 讹罗、讹留、卧落三姓，《夏录》分列三条，其实一姓。《金史·交聘表》有讹罗世、讹罗绍先、讹罗绍甫，又有讹留元智，[③]而《续通志》将“讹罗”和“讹留”都译作“额鲁氏”，[④]故“讹罗”、“讹留”实为一姓；又《金史·交聘表》有“卧落绍昌”，“卧落”、“讹罗”，为一音之转，也就同为一姓。故以上三姓应同列一目。

4. 乃令、乃来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金史·交聘表》有“乃令思聪”，又有“乃来思聪”，承安四年官职为“夏殿前太尉”，[⑤]乃来思聪泰和五年的官职也为“夏殿前太尉”，二者实为一人，“乃令”、“乃来”译音之异，故二姓应同列一目。[⑥]

5. 拽浪、叶朗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宋史·夏国传》称“拽浪撩黎”，[⑦]而《长编》卷193清译称“叶朗僚礼”。[⑧]可见，“叶朗”、“拽浪”译音之异，故二姓应同列一目。

6. 摩益、没移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宋史·夏国传》称元昊第四娶为“没移氏”，[⑨]《夏录》据《宋史》称“元昊妃摩益氏”，《长编》卷162清译称元昊第七娶为“摩移克氏”。[⑩]“摩益”、“没移”、“摩移克”均一音之转，故摩益、没移二姓应同列一目。

7. 没藏、额藏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宋史·夏国传》称谅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乙丑条。
② （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81《氏族略》。
③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④ （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81《氏族略》。
⑤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⑥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嘉祐六年六月庚辰条。
⑨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春正月辛未条。

祚母为"没藏氏",[①]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则称谅祚母为"密藏氏",[②]《长编》清译"额藏氏",[③]"没藏"、"额藏"、"密藏",均一音之转。故没藏、额藏二姓应同列一目。

8. 咩迷、咩铭、密密三姓,《夏录》列为三条,其实一姓。《夏录》云:"宋史,夏国主德明妃密密氏"。查《宋史·夏国传》,德明妃作咩迷氏,[④]《夏录》据《宋史》清译本作"密密"。然密密、咩迷为一音之转,故二者同为一姓,咩铭、咩迷,亦为音转,《金史·交聘表》有"咩铭友直",[⑤] 故咩迷、咩铭、密密三姓应同列一目。

9. 卫慕、米母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宋史·夏国传》称李继迁母为"卫慕氏",[⑥]《东都事略》卷127则称为"米母氏",[⑦]《长编》卷162清译"默穆氏",[⑧] 卫慕、米母、默穆,皆一音之转,故卫慕、米母二姓应同列一目。

10. 庞静、巴沁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金史·交聘表》称"夏武节大夫庞静师德",[⑨] 而《续通志·氏族略》却作"夏武节大夫巴沁师德"。[⑩] 庞静、巴沁,乃一音之转,故二姓应同一目。

11. 额、讹、卧、谔四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夏录》云:"宋史,夏监军额博罗"。《夏录》又云:"宋史真宗纪,夏国监军讹勃罗"。额博罗即讹勃罗,两处所录,实为一。《长编》卷513作清译"夏监军额伯尔"。[⑪] 故知额、讹乃一音之转。《夏录》云:"交聘表……夏武节大夫卧德忠"。《夏录》又云:"宋史,西夏武节大夫谔德臣"。查标点本《宋史》,无"谔德臣"一名。此"谔"当为清译。而且夏宋通使,概不以汉制官号称,而呼蕃号,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入声11《没藏氏》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春正月辛未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⑥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⑦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夏国传》。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春正月辛未条。
⑨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⑩ (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81《氏族略》。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七月。

此处之“谔德臣”即《金史·交聘表》中的“卧德忠”，[①]《续通志·氏族略》作“谔德臣”，[②]恐《夏录》从《续通志》所抄，而误为《宋史》。故又可知谔、卧乃一音之转。又《宋史·夏国传》称“没藏讹庞”，而《长编》则称“默藏鄂特彭”。《西夏书事》卷25称“夏酋讹勃哆”，[③]而《长编》卷316则称“夏国首领卧勃哆”，[④]可见，讹、鄂、额、卧皆一音之转，故讹、鄂、额、卧四姓应同列一目。还有可能此姓即“讹罗”一姓的省称。

12．洼、旺二姓，《夏录》分列，其实一姓。《夏录》云：“元史夏将洼普”，《夏录》又云：“辽史，夏将旺布。”《夏录》所言之“洼普”《元史》无载，洼普乃辽、夏时期的夏国将领，怎么会在《元史》中收录呢？查《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九年二月）夏将洼普、猥货乙灵纪等来攻金肃城……洼普被创遁去，杀猥货乙灵纪”。[⑤]再看《夏录》关于“旺布”的记载：“辽史，兴宗十九年正月，夏将旺布等攻金肃城……旺布被创遁去，杀武赫伊特凌结。”可见，旺布即洼普，《夏录》据清改译本，将洼普记为旺布，实一人。故二姓应同列一目。

另外，《夏录》还有“约罗氏”一条，《夏录》云：“宋史交聘表，夏侍御史约罗特默格，列传有崇义军节度使约罗特伯”。查《宋史》，没有《交聘表》，《金史·交聘表》中亦无此人，《夏录》不知何据。

---

①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② （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81《氏族略》。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5元丰四年八月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庚子条。

⑤ （元）脱脱：《辽史》卷20《兴宗纪》3。

党项姓氏丛录

为了方便学者们对党项西夏史的研究，特别是进一步认清党项族源，并厘定清代西夏姓氏书之讹误，特对文献及考古材料中的党项姓氏（番姓）作一次较为全面的辑录，希望能给党项西夏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以下所录党项姓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西夏文献中明确为“番姓”或“族姓”者，如8至12，另一类则是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出现的西夏人名而断出其族姓者，如1至7。对于第二类，余判断是：一是明确为党项姓者，如拓跋氏、野利氏等；二是党项族名，又有人名处于此族者，如《宋会要》有没细族，又有人名为没细游成宁及没细好德；三是文献中出现的西夏姓名之姓部分与现存西夏《杂字》、《碎金》、《文海》及《西夏文字典》中收录的党项姓译音相同或相近者：如《杂字》有“庄浪”一姓，人名有“庄浪义显”、“庄浪昧克”;《西夏文字典》有“折思”一姓，文献中有“折四族”，则断“折四”为一党项姓；原则上讲，党项以族为姓，但对没有找到姓名的“族名”，此处大都未予收录。对于各文献中重复出现的党项姓不录，但译文歧异者，予以保留。所录少量单音节姓，很可能是原双音节姓的省读和省译，如“卧”姓当为“卧落”或“卧浪”之省读；“罔”姓当为“罔佐”之省读，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但尚未找到完全的证据，故一并录之。以下所录西夏党项姓氏共一千余条，如汰去重复者，至少可获四百至五百余条。这么庞大的党项姓氏出现与保存，这在中国的姓氏学中堪称奇迹，恐怕在现存的全国少数民族姓氏中（包括历史与现状），党项姓氏保存下来应是最多的。因此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党项姓氏及党项姓氏集团的研究，应是西夏学中亟待展开的新课题，本人辑录党项姓氏之目的即在于此。

1. 两唐书、两五代史及五代会要：

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利、米禽、房当、拓跋、破丑、把利、喜玉、折思、薄备、折、如

2.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及长编纪事本末：①

阿尔（讹二）、叶市（伊实）、努卜、奴移、别丛、越厮、吴怡、浪我、没罗、麻也、若沮、色辰、庞咩、苏沁、麻女、珪布、凌结、密乌、都勒、诺尔、叶结、岁尾、穆纳、牟尼、轻泥、普密、吹同（策卜腾）、异浪、庆鼎、毛迎、热嵬、野也、卧卜

3. 宋史及宋会要：

拽厥嵬名、讹藏屈怀、没移（末腋）、没藏（末臧）、拽浪（异浪）、赏罗（尚罗）、吴移（乌移）、咩保（咩逋）、万保移、耶保移、宁子宁、苏移、夜母、嵬名、女女、卫慕、万庆、都罗、成逋、党移、扎万、赏都、保细、讹罗、康奴、咩米、如定、没移、令介、仁多、泪丁、妹勒、叶示、温都、兀泥、猥才、貌奴、咩嵬、泥中、折四、野马、勒浪、扑咩、庄浪、岁罗、没细、罗保、庞罗、骛涉、庞青、卧普、你斯、讹孛、理索、讹屯、罔越、吾越、讹也、部细、乙麦、乞当、悖乜、细禹、屈适、讹化、悟儿、安、嵬、来

4. 杂史、野史、笔记、文集及其他：②

阿山（讹三）、杂熟、猥才、细毋、没罗、浪讹、慕容、部纳、素移、苏尾、误移、杂母、兀涂、兀罗、骨咩、没细、米卜、细赏

5. 辽、金、元史及西夏书事：

乃令（乃来）、把里（芭里）、罗移（诺移）、天籍辣、阿理、仆米、曷党、乌迷、痕货、瓦泥、浪讹、杂辣、嵬宰、骨勒、庄浪、咩布、讹移、恧恧、麻骨、卧落、热辣、麻奴、讹罗、野遇、纽尚、拽税、吴移、庞静、连都、折移、纽卧、咩铭、习勒、咩讹、罔佐、梅讹、孰嵬、嵬恧、谋宁、嵬移、西壁、曲也、叶悖、晤儿、令王、浪斡、轻泥、没细、细赏、嵬悉、野蒲、耀没、讹革、埋移、野乜、独孤、耶卜、咩、猥、党、卧、同、米、曹、利、斡、康、罔、白、索、浑、遇

---

① 此处采（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光绪浙江书局本，其中少数民族人名均为清乾隆后之改译。

② 此处采纳文献为《儒林公议》、《涑水纪闻》、《三朝北盟会编》、《苏东坡全集》、《宋朝南渡十将传》、《道园学古录》及《（乾隆）府谷县志》中的《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阴》。

6．各类考古材料：

（1）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西夏文题记：[①]

息玉那征、麻尼则嵬名、尼说嵬、息玉、杂谋、播杯、麻尼则、嵬立、酩布、骨匹、居地、那征、味奴、讹三、千玉、吃六

（2）天庆年典当契：[②]

麻尼则嵬名、夜利那征、翟嵬名、夜贺、昔吴、昔毕、来罗、鱼各罗、兀移、息玉、那征、兀女、刘折、笃屈、梁折、讹静

（3）凉州感通塔碑铭：[③]

浑嵬名、木杨、药乜、令介、韦移、酒、卧

（4）明代西夏文经卷石幢：[④]

巴答那征、昔毕富遏、稀蔡命屈、斜四命屈、依罗那征、哆$_{合}$讹、讹义、遏$_{轻}$能、喻屈、吟尚、昔毕、桑那、柴百、平尚、依罗、柴能、敖移、酩部、耶和、鲜卑、昊、旺

（5）甘州卧佛万历十九年铭文：[⑤]

嵬咩

（6）天盛律令颁律表：[⑥]

讹劳甘、嵬名、乃令、浪讹、不心、讹名、芭里、昊、酒

（7）金光明最胜王经序：[⑦]

芭里嵬名

（8）天庆虎年欠款单和会款单：[⑧]

耶六、没罗、讹六、讹命、袜墨、苏能、酩敏

（9）黑水守将告近禀帖：[⑨]

婆年

---

①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② 《敦煌资料》第1辑《西夏天庆十一年典麦契残卷十五件》。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章，第113页。

④ 白滨、史金波：《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章，第65页。

⑥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律令》卷首之《颁律表》。

⑦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5章，第186页。

⑧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6章，第275—284页。

⑨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西夏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10）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和《劝世歌》：①

没息

（11）黑城出土汉文文书：②

西兀日、吾七、吾即、麦足、也火、嵬如、石革、邹即、李嵬、刘嵬、李汝、粱都、党乞、吾盖、叶玉、粱赤、李即、粱汝

（12）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③

北却、西玉、鲁布

（13）西夏文《礼诗文》：④

吕郎、骨勒

（14）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⑤

永菩、马嵬、折裴、枝符

（15）西夏文《德行集》：⑥

讹里、味奴、节亲

（16）李彝瑾墓志铭、夏州观察使何公墓志铭：⑦

野由、叱吕

7. 西夏官印：⑧

咕唐那长尼、领牟嵬忠、浪哀嵬名、缅玉嵬名、嵬名那尼、吃长尼、没则宜、庞庆张、则尼利、任药、牟山、□奄、药帝、你每、耶昆、西能、苏斯、郑茂、折特、酩能、表堂、□跋、嵬恧、都酩、酩底、息讹、墨罗、咕逋、酩够、柴惠、罗啃、酩西、庞奇、布底、酩哲、任玉、罗万、兀西、辛嵬、卧罗、乙锐、多药、崦及、嵬汉、图嵬、昆屈

---

① 聂鸿音：《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载《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下篇，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③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载《文献》197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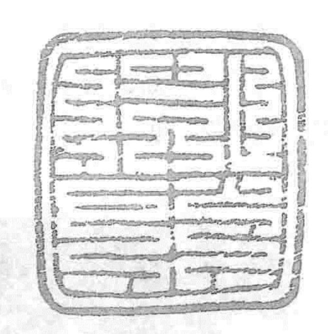
④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⑤ 此处参考橘瑞超、王静如、史金波、陈炳应等人译文综合。见（日）木公泽博：《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遗文——以橘瑞超带来在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馆藏品为中心》，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

⑥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第13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⑦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末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第385页，2002年；《中国藏西夏文卷》第18册，第67页。

⑧ 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西夏文官印

8. 西夏汉文本《杂字》:[①]

嵬名、没藏、药女、浪讹、吴移、都罗、咩布、细遇、佑税、野货、季卧、乃来、床罗、赵移、移令、磨讹、铺主、来里、连奴、吃女、恃胡、乩咩、浑货、毛女、逃讹、杂里、杂咩、如定、吃涂、妹勒、勒瓦、勒罗、路移、蔡令、光宁、嵬迎、卧没、麻女、野马、芭里、妹轻、回纥、令咩,毛庞、孰嵬、夜浪、庄浪、庞静、并尚、乃税、特罗、拽税、骨婢、便移、讹移、季移、轻宁、卧利、细卧、骨勒

9. 新集碎金置掌文:[②]

移合讹、贞卧、乃来、咩布、药乜、墨□、令介、只移、贺兰、势□、居地、河水、乐□、六恧、梁千、辣□、息齐、野余、多□、璎玉、勿即、骨婢、麻尚、乃令、卫慕、连奴、勒罗、罗迹、芭里、西壁、铺药、没念、味奴、□齐、兀罨、野隆、移青、拽税、叔苍、良玉、卧利、鲁赞、格契、勿埼、铺主、女斗、特吴、柳来、操移、小狗、冷宁、妙讹、桑罗、阿香、播杯、儿童、浪、双、卧、摄、然、命、乃、什、床、来、药、永、关、五、白、黑、耨、乃、坡

10. 西夏文《文海》:[③]

嵬名(则移酩)、波移怛名、□恧□水、□力□青、波泥六、泥六领、只移合、勒则尼、□尼仓、普珠、未谋、□年、你胡、骨匹、恩鲁、讹名、向□、泥斤、陈□、每□、波六、跋州、兀那、陀割、骆罨、讹□、道讹、

①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研究》,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第167—185页。

②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载《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芭君、吃览、炭末、契丹、□更、耶四、回鹘、□那、吃□、每□、盈那、璎玉、□令、□尚、北斗、当当、果嘿、讹菊、腰□、麻□、依隆、每勒、□藐、鱼骨祖、嵬



西夏文《杂字》书影

11．西夏文《杂字》：[①]

年奴（宁社）、嵬名、吴够、讹里、埋卧、浪讹、黎藏、利施、遇喻、遇玉、息名、息尚、息部、息捷、息牢、息遇、息斤、息玉、吟汝、吟秋、吟昤、吟鄂、吟弟、吟介、吟玉、贞卧、乃佘、道讹、都都、讹侠、讹族、讹罗、跖哆、叻哆、匹哆、蒲朱、罗邪、丑哆、多哆、都罗、□梁、夷玉、哆讹、逵狄、嵬胡、得没、没藏、没施、没讹、嵬哆、嵬迎、嵬恧、嵬那、讹大、讹二、讹三、讹四、讹五、讹六、讹七、讹八、讹利、讹哆、讹没、讹名、吟藏、罗部、罗朔、卫慕、耶卫、特利、狄铎、徐青、徐逋、巴藏、名巴、埋捷、埋那、埋村、埋郭、骨勒、格寂、卡狄、勒狄、令部、令谋、果洛、罗奴、曹哆、布哆、左哆、李哆、千谋、千玉、千利、千□、折

① 李范文、中嶋幹起：《西夏文〈杂字〉研究》，台湾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7年。

吟、折牧、折沛、折斯、乞葛、味奴、果六、果宁、如定、陀葛、耶宙、耶那、魏利、魏青、坡嵬、播杯、平牢、平弥、平尚、葛讹、摩讹、讹司、洼喽、恧恧、汝恧、摩尚、珂申、泊宁、畏藏、畏庞、莫藏、莫哆、岁讹、牢玉、婆荼、部嵬、部药、荼嵬、叔嵬、叔仓、鲁拉、赭族、夷利、夷龙、夷额、夷茹、昔玉、昔埋、昔璧、息吉、波宁、波祭、来关、高祀、日祀、汲契、汲狄、依施、依袾、西卢、密布、陆部、陆毗、陆家、陆施、吴族、褐那、布斗、布狄、布徂、芭里、赖里、牛力、乃施、耶由、由地、耶罢、耶和、麻藏、麻格、麻勒、麻施、契多、咧剩、咧部、税咧、左葛、葛货、怛名、丹奴、狄胡、称赏、蛇兮、乞多、米勒、米旌、米笃、米施、磊罗、叻喻、移卒、播朱、播奚、浪兮、庞青、清羊、乜勒、桑卢、酩玉、夷丘、束丘、部叻、屈叻、戛尚、戛斗、守鞴、折名、纪汝、翁力、塔末、允娑、窦代、潘蜀、塞笃、奚药、吕良、什鹤、庶合、乘赛、梁呔、黎吟、温布、杂年、聆屈、聆邪、聆藏、聆施、聆嵬、布嵬、寂利、欣戟、跋洲、鄂利、狄定、骨匹、妹勒、兀叻

12．聂历山《西夏文字典》：[1]

干明、明嵬、明药、息明、领明、罗明、□明、吃讹、埋忘、明玉、□命、今命、累命、鹿命、勒命、光六、光你、普刀、明刀、讹青、青羊、迎斗、毕凉、叶玛、吃讹、定如、乃水、能二、跋周、鹿监、未谋、嵬名、息名、名末、嵬迎、史合、息尚、平尚、末$_{轻}$尚、迎尚、勿$_{\circ}$藏、勿疣、哆移则、腮纳、炭末、柳罗、没念、一利、一罗、一□、一蕁、一求、令$_{合}$不、名辣、饿力、云女、鲳罨、□吟、波竺、失鹤、波乙、移则、青□、永青、疣青、末$_{轻}$鮥、领$_{重}$藏、强韈、答名、□玉、息□、强瑞、块果、哆则布、酩布、路布、特吴、尼说嵬、折吟、折谋、折裴、折四、累力、贵力、永力、尼积力、尅多、平名、责名、都罗、息祖、□星、喻屈、讹六、道讹、累名、无地、名精、地掷、鮥掷、问令、领尼顷、恤领、六量、居地、喻居、北居、尼尼足、信毕、赤多、叔坐、贞卧、磋磋、嵬磋、六磋、受鞴、永北、吃六、当当、鮥罗、勒罗、罗朔、叶有、药乜、每嘿、桑啰、左葛、葛尼、屈络、浪吃、息业、拶年、兀南、每茄、每逕、千力、千玉、兀力、每

---

①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2册《西夏文字典》，其中西夏文党项姓氏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5章，第256—258页，陈氏译原文一字有多种译法，此处收录时仅取其一种。

尼积、每尊、罗脊、杏脊、告尼积、味奴、年奴、盈那、云杀、没。藏、没哆、□地、令地、吴秋、骨勒、罗奴、鹿水、骨匹、鮥藏、鮥尼卒、没鮥、鮥岁、平日知、耶和、思鲁、嗁那、盘柔、工浪、麻告、雳呤、令介、乙药$_{合}$、诺斜马$_{重}$、罗浪、名水、坡嵬、辛孟、吃罗、北尼卒、盈寸、藐尼说、你勒、箇麻。则、丹瓷、布立、布埿、叶胃、禄立、嵬立、萨立、左立、吃立、喻立、罗年、罗乙、奈令、嵬吴、陀刈、累哆、藏累、累能、累三、累勒、累五、累六、累□、累八、累攀、莫累、多哆$_{合}$、蒲珠、讹哆、哆玉、播墨、心五、心鸡、末兰、□乙、每勒、蜀$_{合}$求、息日知、呤知玉、坠尚、泪哆$_{合}$、麻藏、麻勒、麻水、丑哆$_{合}$、令戮、奈刘、叔嵬、□其、□没、令埿、□哆$_{合}$、斜。没、息玉、五哆$_{合}$、喻。藏、哆水

党项风俗述略 *

党项族，是一个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最早出现在魏、周之际，最终消失于明代中叶，有将近千年的历史痕迹。公元 11 世纪时，还建立过一个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夏国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古代的党项族虽已消失，但对党项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考察，这对于研究党项源流、西夏社会形态、西夏文化艺术及古代民族的消亡、融合过程应有所裨益。

一、党项人的自然崇拜

在古代北方的游牧公社中，由于社会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对于自然物和自然界的各种变化还不能科学地理解，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普遍存在着对天地、自然现象及自然物的崇拜，大都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这在党项社会中也表现十分突出。

天，在信奉萨满教的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地位，《文海》说："天者，乾也，天出，霄也，众生覆盖遮蔽处"，[①]意即天起着保护众生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故党项人对天极为崇拜。

党项最高领袖自称"兀卒（吾祖）"，《长编》释其为"青天子"，称宋为"黄天子"，[②]与匈奴领袖称"撑犁孤涂单于"，[③]突厥领袖称"天生大突厥天下

---

*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5 年。今又作修改补充。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3 · 162 条，第 443 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2 宝元元年九月己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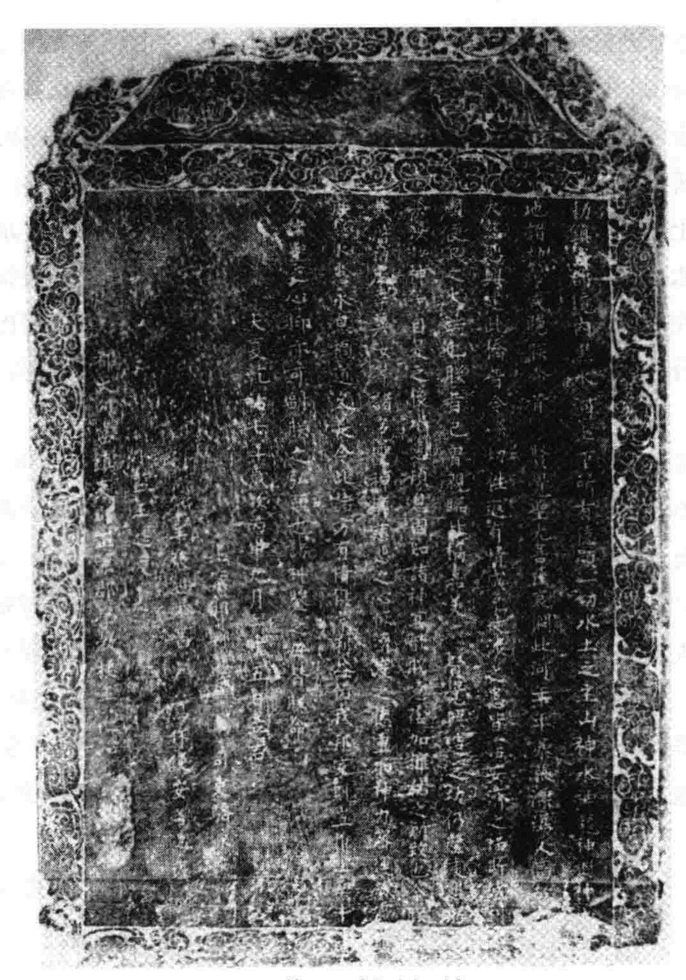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

圣贤天子”[①]意同，即指党项最高领袖乃“苍天”之子。西夏最高官称“谟宁令”，华言为“天大王”，[②]喻义为人臣中之极位者，“天”冠大王之前，都可表示党项人对天之尊崇。宋将刘法累胜夏军，夏称之为“天生神将”，[③]宋军奇袭夏军，党项酋领称之为“天兵”；[④]折继闵一箭射中敌酋，自己却祷为“天助”，[⑤]夏州地震，党项人视为“天之所以示警”，将一切都视为天的意愿在起作用。这一点与蒙古人相似。《蒙鞑备录》称：“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⑥]

萨满教认为，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是天神的居处，它能降祸福于人间，故人们最崇敬天神，西夏文《文海》及《掌中珠》中有“天神”一名，党项为了表示对天神崇敬，每隔三年，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天活动。《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⑦]到西夏建国后，这种祭天活动改为每年一次，《圣立义海》：“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准备供奉天神”。[⑧]由于牧草的荣枯和牛羊的蕃息等问题，古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不得不依靠天，一般都在夏初和秋末举行祭天活动。《周书·突厥传》载：“（突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⑨]《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祭天神。[⑩]党项人由于部落散处，不相统一，进行大规模的集体祭天活动极为不易，故“三年一相聚”，这种祭祀活动不仅是为了完成某种宗教仪式，而且还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原始议会形式，“相聚”应还意味着商讨部落中的大事，可能与蒙古人中的库勒尔台形式相似。

党项民族的自然崇拜范围十分广泛，从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乃至动物、植物都赋以神的形象而崇拜。《黑水桥碑》祭祀的神有：山神、水神、

① （唐）魏征：《隋书》卷84《突厥传》。
②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20《折渭州墓志铭》。
⑤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0页。
⑥ （元）陶宗仪：《说郛》卷54孟珙《蒙鞑备录》。蒙古人称天为Tangri，又译为腾格力。峨岷山人：《译语》：“虏称天为腾格力，极知敬畏”。
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⑧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60页。
⑨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50《突厥传》。
⑩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西夏甘州的《黑水桥碑》

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①] 西夏文献《尊贵的九曜》一书将一些星辰视作主管祸福的神，并有诗赞美这些神："光耀闪闪照乾坤，奋力驱开众恶魔，主管降福和降祸"。[②] 俄国人从哈拉浩特带走的一批西夏画中，许多神像画都是表现人们对"星君"的崇拜。[③]《宋史·夏国传》载，由于恒星的出现，西夏人竟不敢出兵，[④] 因星变而惧，则可以反映党项人"畏天"。

---

① （清）叶昌炽：《语石》卷1《黑水桥碑》。

② （俄）聂历山：《十二世纪时西夏的天文学》，载《西夏语文学》第1册，第52—73页。

③ （俄）科兹洛夫著，王希隆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第25章，第372页。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根据弥药的传说，弥药王之先祖，乃是青海北方甘州与夏州之间一座称之为 Se-pu 山的蛇神，它统治着这一地区，人们如不按时给它祭品，一怒之下，就会使你昏迷，甚至得麻疯、疯癫等病。①这个蛇神，在《如意宝树史》中作“妖龙神”②，在《西藏王统记》中作“毒龙”，③可见弥药人的“蛇神”崇拜实际上是“龙”的崇拜。《史记索隐》引崔浩语：“西方胡皆事龙神”。④前引《黑水桥碑》中也有享皇帝祭品的“龙神”。龙神亦是吐蕃人崇拜的原始神灵，在藏文苯教文献中分为“嘉让、解让、苯让、章赛让、得巴让”五种龙神，分管东、南、西、北、中五区；又将五类龙神分为善、恶、善恶兼之三种。⑤

石泰安引藏文史料，称弥药王的王宫在一个叫 Gan-Cu（甘州）的地方，离黑水不远。⑥据甘州方志，甘州城南的忠武王庙乃是西夏所祀之神，为西夏土王，而且“祷无不应”。⑦这尊神是羊首人面，可能就是《文海》中所记载的“守羊神”，即“羊中守护者也”。⑧西夏是羊马之国，党项族内重要成分是羌人，羌人素来有拜羊神之俗，这“羊首人面”的守羊神正是党项人对羊崇拜的反映。这在其他民族中也有类似记载，明人张昱言：“高昌之神，戴羧首，仗剑骑羊，气猛烈”。⑨这都反映了羊在这些游牧民族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党项人对山川的崇拜总是同祖先崇拜紧连在一起。杜宝《大业杂记》载：

> （炀帝）行次金城郡，党项羌首拜见。帝问曰：古有先零、烧当等

---

①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第 223—265 页。

② 松巴堪钦·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如意宝树史》，第 746 页。

③ 福幢著，上官剑壁译：《西藏王统记》第 3 章，第 11 页。

④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见《史记》卷 110《匈奴传》。

⑤ 藏文苯教经典《十万龙经》，通常又称为《白、黑、花十万龙经》，分上、中、下三部，传说为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亲口所传。上部：《大白济龙经（Klu-vbum-dkar-bo）》；中部：《班烂济龙经（Klu-vbum-khra-bo）》；下部：《玄青济龙经（jky-vbum-nag-bo）》。转引自丹珠昂奔：《藏族神灵论》，第 1 章《原始神灵》，第 3—6 页。

⑥ （法）石泰安著，方浚川、陈宗祥译：《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第 223—265 页。

⑦ （清）杨春茂：《重刊甘镇志》不分卷《祠祀部》，甘肃省图书馆藏明刊本。

⑧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26 · 231 条，第 432 页。

⑨ （元）张昱：《可闲老人集》卷 2《甘州神》。

种落，尔是何种之后？对曰：相传弥猴之后。[1]

《隋书·党项传》载：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2]

在藏族的民间传说中也称自己是“弥猴种系”（《西藏王统记》即为此说），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弥猴转化而来的。这说明在党项族内确有一支不可否认的藏系血统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崇拜是以弥猴为图腾崇拜。



西夏文《圣立义海》书影

《圣立义海》中有被称为“圣山”的“积雪山”：

积雪大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涨，夏国

①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4引杜宝《大业杂记》。
②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灌水宜农也。雪山绵长不断，诸国皆至，乃白高河本源。[①]

此当为西夏境内祁连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无冬夏，皆积雪，故曰天山，山阔千余里，其高称是，连亘数郡界"。[②]在宋时，祁连山正是西夏、吐蕃、回鹘三国之分界山，横亘河西数郡。西夏人视祁连山为"圣山"，除了这里是自己民族的原住地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祁连山（天山）是黄帝"授金液神丹"[③]之山。元昊称帝即位后，马上就到"西凉府祀神"。[④]因为元昊自称元魏之后，而元魏却又称是黄帝子昌意之后，基于这种遥远的血统关系，所以，元昊去西凉府南面的祁连山祀神，实际是表示对自己远祖黄帝的祭奠。

西夏的圣山还有贺兰山，这里也是党项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李世安墓志》载："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⑤]"于弥"即"嵬名"，可见，党项王族嵬名氏起源于贺兰山，后来，这里又被党项人辟为党项人的重要陵区。所以，党项人对贺兰山也极为崇拜，《圣立义海》将贺兰山列为"夏国三大山"之首。[⑥]《使辽录》载：

虏中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魂皆归此。每岁王京进入马纸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⑦]

贺兰山在西夏约相当于契丹之黑山，人死，魂皆归此。因此，党项人以此山作为自己民族的公共墓地来安置亡魂。近年在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口发现的二百多幅岩画中，就有表现祭祀、祈祷及神灵鬼怪的岩画，[⑧]这也可反映，这里曾是党项人祈祷先祖亡魂祭地。

党项祭祀祖先的活动在内蒙嶝口县西北那仁乌拉山发现的西夏岩画中，

---

①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60页。
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2。
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2。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42《李世安墓志》。
⑥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60页。
⑦ （元）陶宗仪：《说郛》卷3宋无名氏《使辽录》。
⑧ 盖山林：《内蒙古西夏地区的西夏文物》，西夏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银川，1981年。

还有更为形象生动的反映。在一幅动物的岩画中有西夏文，字为“文字父母”，而在此动物岩画东北又有三个被解成数块的动物图形，左上方是一动物头，中为躯干和腿，左边为一没有头的动物形。盖山林认为，这两幅属于同一时期的西夏岩画，正是表现了作者“祭奠已故父母亡灵而奉献的祭品”。[1]这种以画代牲祭祀祖先的办法，只可能是贫穷的党项部民所为，真正党项贵族的祭祀活动不致如此寒酸。

二、党项人的巫师与占卜

不管佛教传入党项部落之前，还是佛教在西夏社会盛行之时，党项人信鬼尚巫之风一直不衰。

巫，西夏语读作“厮”。[2]《文海》释巫为“驱鬼也，驱灾鬼害者用是也”。还言：“能知言语，显说所问则故曰巫”。[3]党项人极重巫术，巫师在党项社会中地位很高，黑城所出《西夏官阶封号表》里列“巫”之位在太后、诸王、国师、大臣、统军之后边。[4]巫师，又称为萨满（shaman），在党项社会中，他充当着与一切鬼神发生关系的人物，由于他是原始宗教（萨满教）最权威的解释者，因此，他对整个社会生活乃至政治军事活动都能施加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党项部落中，他是党项人的精神领袖。他能与鬼神通，能控制自然，呼风唤雨，他能施展法术，使牲畜繁衍，他能驱鬼制邪、医治百病，甚至还能念动咒语而击败强大的敌人。

党项人对鬼神的概念区别是很清楚的。前一节所述诸神都是党项人崇拜的对象，而各种鬼魅则是党项人诅咒的对象。《文海》中有各种鬼的名称，如他杀的鬼、自杀的鬼、虚鬼、厉鬼、饿鬼、孤鬼等，还释“闹鬼”为“房舍中不住人，则鬼魅为依附”。党项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不吉利的凶事都是鬼魅作祟，要消灾除病，要趋吉避凶，必须请神驱鬼，画符送祟。《文海》中所谓“在咒鬼处设坑壑，即把鬼送入专设的坑中”，巫师则在“坑境上骂

---

① 盖山林：《内蒙古西夏地区的西夏文物》，西夏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银川，1981年。

②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75·221条及89·152条，第507、526页。

④ 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詈”，[1]这样就能驱鬼消灾。党项人打了败仗，不是总结失败经验，而是在三日之后，“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2]有疾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3]故《宋史·夏国传》称西夏“笃信神鬼，尚诅咒”。[4]《明一统志》卷36作“俗尚鬼神而信祷祈”。[5]俄国人从黑城取走的西夏文献中，还有一批关于巫师祈祷、祈雨的咒语集。

另外，在藏、蒙史书中还有关于西夏巫师的记载。《蒙古源流》载：蒙古军围夏灵州（Turmegei）城时，“其咒者哈喇刚噶媪，登上城楼，摇动黑旗咒之，则人马成群倒毙焉”。[6]藏文传说则更为厉害，一个弥药的女巫告诉弥药王及其军队，将许多马粪和马鞭抛在河里，就制服了中国国王及其大臣，而杀了他们。[7]这当然是不可信的神话，但可以说明一点，党项巫师不仅在其国内有很高的位置，而且，在相邻的蒙古、西藏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

占卜，是萨满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巫师的一大职能。《文海》释“卜”为“卜骨也，测思问意处之谓”。[8]在党项社会中，不管干什么事，必须先占卜问吉凶，行军、打仗、生产、结婚、安葬、出门、行商等，无一不去占卜。[9]《宋史·夏国传》称，占卜求“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丰稔”。[10]正因为卜师对党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干预极大，所以，往往许多卜师就由大族酋豪来担任，如赵德明、折可适等党项领袖都是通贯占卜的酋领。[11]元昊之称号为“风角城皇帝”。[12]“风角”为古代占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86·151条、24·232条及88·131条，第429、521、524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36《延安府》。
⑥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4，第175页。《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也有女巫“黑媪”之载。
⑦ 福幢著，上官剑壁译：《西藏王统记》第3章，第11页。
⑧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58·141条，第481页。
⑨ 1972年在甘肃武威下西沟岘山洞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又《李夫人墓志》称折克禧“卜地以葬夫人”，载《文物》1978年第12期。《折彦文妻曹氏墓志铭》称：“祖母安康郡太夫人冯氏薨于正寝，又吉归葬”。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5页。《李继筠墓志铭》则称：“卜于端正北原之上，附于先茔。”参见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2002年。
⑩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⑪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德明出兵攻回鹘，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大惧还”。《折渭州墓志铭》：“（公）虽医药占卜，无不通贯”。部落酋领兼任萨满，这在其他北方民族中也常见。
⑫ 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候之法，故元昊也是精通卜筮之学的。夏相斡道冲还写过一本占卜专著《周易卜筮断》。[①]1972年，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中就有西夏文写本占卜辞。[②]这些足以表明党项人对占卜的重视。

党项重视占卜，故极相信占卜之结果。《西夏书事》卷11载：

> （景祐元年正月）填星犯舆鬼。占者云：大臣有变。[③]

元昊利用党项人信卜之俗，竟在国中大肆杀戮臣民，企图消弭国中“莫须有”的政变。《西夏书事》卷39载：

> （嘉泰四年八月）夏州豕生麟，麟一身二首，州民以献。安全使人占之云，一国两主兆也。[④]

身为镇夷郡王的李安全知此吉兆，遂蓄谋篡夺帝位，果于开禧二年废其主纯佑而自立。这里的“占者”既是西夏的天文学家，又是西夏宫廷的萨满。在党项人心目中，他们就是“神”的代言人，深获统治者的信赖。

党项人的占卜方法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羊髀卜：

《宋史·夏国传》载：“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⑤]《辽史·西夏外记》作“灼羊胛骨”[⑥]，《隆平集》作“灼羊夹面骨”。[⑦]沈括之言略异：“西戎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脾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⑧]《宋史·张亢传》：“始谋击琉璃堡，使谍伏敌砦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⑨]松、潘、茂、汶等地的羌人或炙羊膀，或炙羊膊，根据烧过骨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总镇·人物》；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② 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书考释》，载《文物》1978年第8期。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景祐元年正月条。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9嘉泰四年八月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⑥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⑦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⑧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⑨ （元）脱脱：《宋史》卷324《张亢传》。

头的纹来判断凶吉，据林声说，羌人是以烧羊肩胛骨最为灵验。[①]



西夏文占卜书

（二）擗竹：

《宋史·夏国传》载："擗竹于地，若罣揲以求数，谓之蓍算"。[②] 这种占卜方法应是在早期党项部落中存在，也就是党项人生活在茂、汶、松、潘之时，因为党项北迁后，所居灵、夏、绥、银之地是无竹可擗的。擗算应属汉族的"竹卜"一类的占卜方式，党项"擗算"之卜法，是否从汉地传入，不得而知。

（三）咒羊：

《宋史·夏国传》载："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③]《辽史》、《隆平集》大致相同。沈括言之有异："先咒以食羊，羊食其粟，则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

---

① 林声：《论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载《考古》1963年第8期。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1]

（四）矢击弦：

《宋史·夏国传》载：“以矢击弓弦，审其声”。[2]用击弓弦听音的方式来占卜，此为党项人独见。

（五）星云卜：

《圣立义海》载：“观察云色：冬中观云，云色黄则大安，青则来年虫，白则有病亡，赤则有兵，黑则有水灾”。[3]在苏联所藏西夏文献中，还有专门根据恒星与行星占卜的手稿，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占卜小手册。[4]

以上几种占卜方式应以羊髀卜最为流行，不仅党项中多以羊髀卜，而且在契丹、蒙古及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中都使用这种占卜方法，今天羌族中仍有少数端公（巫公）知道这种卜法。

三、党项人血亲复仇与和断

党项人是以部落的形式聚族而居，部落内部的凝聚力极高，“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5]而且“患难垂乏，绝不少变，精急专一”。[6]在族内，能“亲上死长”、“上下之情怡然相欢”，“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7]这种团结对外、祸福与共的原始共产社会遗风在党项部落内一直保存，且“传越久则俗越定”。[8]然而，他们对外部落和异族却不愿往来，有很深的部落界限，而且，对他们又极重复仇，在《旧唐书·党项传》中有如下记载：

（党项）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

---

①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60页。
④ （俄）聂历山：《西夏文献及其精华》，载《西夏语文学》第1册，第74页。
⑤ （元）脱脱：《宋史》卷246《宋琪传》。
⑥ （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⑦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河西廉使序》。
⑧ （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人而后复常。

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斗殴，而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由于长期积怨而产生的报复行动，乃是氏族社会时期表现氏族间相互对抗的一种形式，称之为“血亲复仇”。近世彝、苗、瑶、壮等族中的“打冤家”，也是这种“血亲复仇”的残存形式，在当时又称之为“酬赛”。[①]

党项人部落之间由于都处于分散闭塞的状况，许多部落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党项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依靠一些剽劫活动来作自己经济生活的补充。杜佑说：

（党项）不事生产，好盗劫，彼此常凌劫。[②]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相互劫夺，逐渐结成了很深的怨隙。宋琪说：

（党项）其俗多世仇，不相往来。[③]

不仅党项内部相互为仇，而且与回鹘、鞑靼、吐蕃也结有深仇，且历数百年不解。唐将田牟称：

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回鹘）为仇。[④]

李德裕言：

河曲党项，向与回鹘有仇。[⑤]

---

①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25《上仁宗乞用泾原熟户》：“蕃族之情，最重酬赛，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复得其用”。

② （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6。

③ （元）脱脱：《宋史》卷246《宋琪传》。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6《唐纪》62。

⑤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4《请发陈许汝襄阳等兵状》。

于阗使者称：

> 鞑靼与李氏（党项王族）世仇也。[①]

苏轼言：

> 西羌本与夏人世仇。[②]

党项在族内与族外进行的复仇活动极为频繁。沈亚之云：

> 广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项与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橐驼。其后支属更酬杀，转转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杀掠以为常。[③]

《辽史·西夏外记》：

> 喜复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有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④]

《西夏书事》卷9：

> 夏俗以不报仇为耻，德明与回鹘世仇，愤其兵数败，遣张浦将精骑二万攻甘州。[⑤]

为报回鹘之仇，在唐时党项就多次攻击回鹘部落，回鹘嗢没斯部归唐时，党项部落为了"复仇"，不断出兵劫夺回鹘。[⑥]至宋代，德明为报回鹘世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元年五月丙子条。
②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1《上哲宗乞约鬼章讨阿里骨》。
③ （唐）沈亚之：《沈下贤集》卷2《夏平》。
④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条。
⑥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2《论田牟请许党项复仇回鹘嗢没斯部落事状》。

仇，几乎年年出兵偷袭回鹘，大中祥符元年至二年间，竟连续五次进攻甘州回鹘，虽屡败而不渝志，[①]表现了党项民族强烈的复仇心理。

更有甚者，府州折氏本与夏主同为党项一族，然双方结隙极深，东西相抗二三百年，夏攻破府州后，“夷折氏坟茔而戮其尸”，[②]竟连鬼神也不顾了。党项一般不杀俘虏，最多“馘耳鼻以还”。[③]然对杀羌人的宋将，获取之，竟“探其心肝而食之”，[④]或“漆其头颅为饮酒器”。[⑤]特别是将仇人的头作为饮酒器这种斯基泰民族遗俗在党项中多次出现，而且将仇人的头颅——“髑髅”作为饮酒器，往往出现在重大的盟誓会上，将鸡、犬、猪血和酒，置于“髑髅”中，诸酋共饮，然后盟誓。这些都可以说明党项民族复仇心理极强，血亲复仇之习俗根深蒂固。

党项民族“强梗尚气”[⑥]，而且又极重复仇，因此，党项族内部落与部落之间，同姓与同姓之间，甚至与外民族战争屡起，干戈不息。在元昊建国之前，这种“打冤家”似的仇杀活动屡见不鲜。在党项族内解决这一类仇杀纠纷的办法称之为“和断”。据几种文献材料的反映，在党项族内有一种自己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来处理这种纠纷。《宋史·党项传》载：

> 唐龙镇羌族来美与其叔璘不叶，……其族人怀正又与璘互相仇劫，侧近帐族不宁，诏遣使召而盟之，依本俗法和断。[⑦]

这种本俗法又称“蕃法”、“羌法”。主持“和断”的人有时是“汉官”，有时是“蕃官”，大约主持熟户“和断”是汉官，《宋史·宋琪传》载：

> 臣（宋琪）顷任延州节度判官，经涉五年，虽未尝躬造夷落，然常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德明攻回鹘事，二年凡五见，查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相合。

② （元）脱脱：《金史》卷128《张奕传》。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9嘉祐二年七月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53《高永年传》。

⑤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97《上哲宗奏为种谊生擒鬼章赏未称功》。

⑥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今蕃落将和断公事。[①]

延州蕃落应为熟户，故为汉官宋琪主持，而主持生户“和断”者，则应是“蕃官”，《隆平集》卷20载：

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公之曲直。[②]

所谓“和断”就是使双方和好解仇，然而，和解是有条件的，双方协议，必有一方对别方进行赔偿，战争中打死的人，须由对方付出偿命金，宋代西南民族皆称之为“骨价”。[③]党项族中，约有两种赔偿方法：一是以钱偿命。《辽史·西夏外记》称：“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④]二是以羊马赎死罪，《曹玮行状》：“昔，羌杀中国人，如羌法以羊马赎死罪”。[⑤]就是汉人杀死羌人，也要依蕃俗进行赔偿，绍熙五年，宋兵杀死“弥羌人闷笆”。宋方害怕生事，故赔“骨价”三千三百缗。[⑥]一般说来，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经济赔偿，冤仇可解，解仇后，双方进行盟誓，《辽史》中记载了西夏人的盟誓方法：

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于髑髅中饮，乃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⑦]

折从阮讨野鸡族时，招到一些溃败部族，从阮给他们敕书袍带彩缎，设酒食，“令发誓词盟约”而“和断”。[⑧]茂州党项的盟誓方法更有特色，《长编》卷279：

---

① （元）脱脱：《宋史》卷246《宋琪传》。

②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③ （宋）秦观:《淮海集》卷33《泸州使君任公墓表》:“故事,汉人杀夷,既论死,仍尝其资,谓之骨价”。

④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⑤ （宋）王安石:《临川集》卷90《曹玮行状》。（宋）宋庠:《元宪集》卷34《曹公墓志铭》作“黠羌杀人，辄以羊马自赎”。

⑥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乙卯失索之变》。

⑦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⑧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67《帝王部·招怀》5。

> 故事，蕃部和誓，当先输抵兵求和物，……然后盟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及棘于上，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①

宰羊立誓恐怕是较大规模的盟誓，一般立誓多杀犬、豕、鸡，西南民族中还有杀猫、猴立誓，吐蕃小盟则“刑羊狗弥猴”，大盟则“杀犬马牛驴以为牲”。②茂州党项杀婢以誓，则表现党项人对于盟誓的重视。党项盟誓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即以箭作为信物。夏辽交战，为了表示和解的元昊“折箭为誓”③。继迁为了对吐蕃表示和好，多次送铁箭为誓，这可能是双方不能在一起和谈时，党项人采用的一种盟誓方法。④

四、党项人的尚武与骑射

一般说来，我国历史上处于西、北二边的游牧民族都是崇尚武力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然而党项民族的尚武精神在西北诸民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隋书·党项传》称党项“俗尚武力”⑤；《辽史·西夏外记》称其“民俗勇悍”；⑥《金史·西夏传》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⑦元人袁桷则称：“其民沉鸷尚勇”。⑧党项人的尚武主要表现在喜好战斗之上。文献中多次记载党项人盗劫剽夺之事，实际上也就是党项族崇尚武力的表现特征。杜牧有一段文字正是表现党项民族尚武精神的好材料：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癸酉条。据（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2，茂州在唐为党项地，此为茂州羌人之俗。又见（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4；（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8《赵抃碑》亦称茂州蕃部杀婢盟誓。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
③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8《夏国传》下。
④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⑤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⑥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⑦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⑧ （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伏以党羌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大历、建中之际，逆胡余波，巨盗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乌飞，为戎虏之耳目，狼心枭响，作郊畿之残贼。……每至，劲弓折胶，重马兔乳，以魁健之质，张忿鸷之凶，劫馈毂以焚舟，杀轺车而闭道，众虺盘结，群犬牛牙，依据深山，出没险径，近在宇下，游于毂中，艰难以来，不能铲削。[①]

透过这层恶毒咒骂，我们不正可以看出党项民族勇悍尚武、能征善战的形象？党项人的好战在波斯史籍中也有记载：

（唐兀惕）部落大部分住在城市和城镇里，但他们非常好战，并拥有庞大的军队。唐兀惕人曾多次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兀鲁黑）作战。[②]



榆林窟西夏男供养人像

党项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比较恶劣的地理环境中，生活条件艰苦。因此，身体锻炼得十分强健，能忍饥受寒，吃苦耐劳，而且，身体都比较高大，余阙说夏人“有身长至八九尺者”，[③]这从安西榆林窟二十六窟壁画上的西夏供养人像可以得到形象的证明。[④]强健的体格、高大的身躯正说明党项民族具有尚武的本钱；党项民族本地区物资生活不足，为了维持起码生存条件，不得不靠剽劫财货来补充其生活来源，这样的客观环境就培养了剽悍好斗、喜于战斗的生活习俗。唐时党项是个小民族，周边大族吐蕃、回鹘、突厥崛起，不断对党项民族进行压迫

①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15《贺平党项表》。

②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译：《史集》第3篇《唐兀惕部落》。（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第26章则称西夏人很勇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9页。

③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河西廉使序》。

④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附图88《西夏武官供养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和欺凌。吐蕃奴役党项，[①]突厥从党项人那里“获取男人、妇女、财物”，[②]汉族的割据军阀视党项为“小蕃”，“亟有侵刻，或利其羊马，或取其子女，贿其衣物，征为徒役”，[③]正因为“国小则无所恃”[④]而经常遭受大族、大国之侵凌，这就更激起了党项民族同仇敌忾的反抗，一种强烈的民族尚武精神因此而形成。所以，他们“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而来”，[⑤]甚至“年不满十岁”的孩童，也都“谙武艺”，[⑥]就连党项妇女也不例外，上自太后，下自女婢，都能披坚执锐，驰驱沙场。[⑦]在西夏，还专门组成了一支称为“麻魁”[⑧]的女兵，这在西北诸族中是很少见的。最可贵的是，党项族在其存在的七八个世纪中尚武之风历久不衰。建立政权前，党项族“俗尚武”，以勇敢、剽悍、顽强、善战的习俗著称于世；建立政权后，他们重武技，尚武风，挟武力以抗宋、辽、金，使三强望而生畏；就是在西夏政权灭亡后，在元帝国的西夏遗民中，仍然是“其民多武勇少文理”，[⑨]并出现了一大批英勇善战为元朝屡建功勋的军事将领。这是什么原因？陈师道言：

> 议者重燕而轻夏，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夏人不慕中国，习俗自如，不可轻也。[⑩]

“习俗自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尚武精神。

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习骑射是党项民族的又一重要风俗。蔡襄言：“西虏之俗，善骑射”。[⑪]曾巩言：“（党项）长于骑射”。[⑫]虽然骑射是党项族较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毗伽可汗碑》（突厥文）东面第24节，转引自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汉译《毗伽可汗碑》。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④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8《夏国传》。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引滕甫语。
⑥ （元）孛兰肹：《元一统志》卷4《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引《府谷旧郡志》。
⑦ 参阅《隆平集》卷20、《太平寰宇记》卷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及卷127、《宋史·夏国传》，均有妇女参战之载。
⑧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⑨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河西廉使序》。
⑩ （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4引黄绶语。（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纪》下更称：“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宋）蔡襄：《蔡忠惠集》卷19《论地形胜负》。
⑪ （宋）蔡襄：《蔡忠惠集》卷19《论地形胜负》。
⑫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为普遍的风俗，但居住在灵、夏、绥、银、府、麟、丰州的党项部落则更重此俗。如夏州："习俗颇殊，地广人疏，逐水草畜牧，以兵为务"；[①]丰州："北居碛卤，俗随水草以畜牧，唯以鞍马骑射为事"。[②]其他几州风俗如夏、丰两州。党项民族骑射之俗与他们的狩猎生活分不开。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中有许多党项民族狩猎的记录：

> 十月，国人射雕；十月黑风如鹿嚎声，黄羊逃丛林，边地国人追射；十月时，正降霜，（君）率军行猎；年末腊日，君出射猎。[③]

在党项部落经济中，除了主要的畜牧经济外，狩猎经济仍然是补充其生活物资的重要经济来源。乾顺时，夏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言："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④]这句话很能说明，射猎对于党项族来说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野利仁荣言："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⑤]元昊甚至"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⑥]就是仁孝这位著名的文治皇帝，也常"猎于贺兰原"。[⑦]

党项人长期的狩猎生活，造就了一大批能骑善射、武艺超群的人才，如拓跋思忠，曾射铁鹤"没羽"。[⑧]李继迁，少年时就一箭射死一只虎。[⑨]折可适，"驰射超轶，殆不习而能"。[⑩]折太君，"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⑪]察哥，"引弓二十余石，射洞重甲"。[⑫]迈里古斯，"自幼有奇气，善击搏技"。[⑬]三旦

---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
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9《关西道》15。
③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60页。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政和二年七月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庆历二年七月条。
⑥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绍兴二十五年九月条。
⑧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开宝七年十二月条。
⑩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20《折渭州墓志铭》。
⑪ （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0《折太君》。
⑫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崇宁二年九月条。
⑬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24《迈公墓铭》。


西夏板画中的武士像

八，“善剑术骑射”。[①] 算智尔威，“关弓驰马，拳勇绝人”。[②] 哈石霸儿，“善骑射，饶智略，临阵摧锋，所向无敌”。[③] 党项人还训练了一支十分著名的骑兵，《宋史·兵志》载：

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④]

苏舜卿在《庆州败》一诗中对党项骑兵有生动的描写：

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⑤]

女真族原也是能骑善射的民族，但建立封建政权后，骑射之技日趋荒疏，以致“不能娴习骑射”。[⑥] 西夏建国后，虽也有武备松懈之时，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尚武之俗始终没有放弃或改变，直至西夏灭亡后，余阙还说：“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⑦] 这种极强的习武传统，不能不说是党项风俗的重要特点。

五、党项人婚姻与丧葬

党项族早期的婚姻制度在《隋书》、《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之党项传中多有记载，其中以《旧唐书》为详：

---

① （元）杨维桢：《铁崖文集》卷 2《三旦八公勋德碑》。
② （元）姚燧：《牧庵集》卷 26《史公先德碑》。
③ （元）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 33《魏郡伯墓碑》。
④ （元）脱脱：《宋史》卷 190《兵志》4。
⑤ （宋）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 1《庆州败》。
⑥ （元）脱脱：《金史》卷 8《世宗纪》。
⑦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 4《送归彦温河西廉使序》。

（其俗）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①]

在汉族封建史家看来，“妻其庶母及其叔母、嫂、子弟之妇”，当然是“淫秽”之极，殊不知，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及部分南方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实行的一种传统婚姻，即收继婚制。这种婚制不仅在党项族内风行，历史上的匈奴、乌孙、鲜卑、柔然、突厥、羌等民族中也甚为流行。这种蒸母报嫂的婚姻制度主要是使丧夫之妇不再改嫁，让其儿子兄弟去继承他们的婚姻关系，将他们约束在本氏族中，对防止本氏族的人口与财产外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上文所说的“不婚同姓”，这又告诉我们，至少在隋唐之时，党项族已排除了不利于氏族发展的族内婚制，普遍实行族外婚。如对党项拓跋氏与折氏两大族的婚姻状况进行考察，可以得知两点：

1. 党项上层酋豪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如李德明凡三娶，[②]李元昊凡七娶，[③]折御卿凡四娶，[④]折惟忠凡三娶，[⑤]折继闵凡三娶，[⑥]折可适三娶，除正妻之外，还有“侍姬”若干，[⑦]《宋史·夏国传》李继迁十七岁时“复连娶豪族”，[⑧]野利等族羌豪皆以女妻之，可见一次娶妻就是几个，后契丹还下嫁义成公主，故有言：“蕃俗诸母众多”。[⑨]

2. 党项上层酋豪之间主要是大姓联姻。与拓跋氏联姻者主要是野利氏、卫慕氏、没藏氏、慕容氏、路氏、梁氏及破丑氏，早期联姻者以破丑氏为多见，后期联姻者以野利氏为多见。[⑩]而与府州党项折氏联姻者则为慕容氏（三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④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0页。
⑤ 《李夫人墓志》，载《文物》1978年第12期。
⑥ 《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61页。
⑦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20《折渭州墓志铭》。
⑧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雍熙元年十二月条。
⑩ 参阅《宋史·夏国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涑水纪闻》卷12及《榆林碑石》之《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又《李彝谨墓志铭》载，李彝谨的祖母也是破丑氏，李彝瑾长子李光琇“娶破丑氏之女”，李彝殷子李光睿亦“次婚破丑氏”，参阅邓辉等《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2002年；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载《西夏学》第1辑，2006年。

见）、路氏、杨氏（麟州党项）、李氏（绥州党项）、王氏（丰州党项）、梁氏（贺兰山党项），均为党项大族。[①]

党项人一夫多妻并不仅局限于上层酋豪之中，“蕃俗诸母众多”应是这个民族的习俗。马可·波罗经过西夏故地时曾见到：

> 其地之人娶妻至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尊贵，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②]

可见，一夫多妻之俗在党项族内比较通行。

西夏文献中有许多反映党项人婚姻制度的记载，如妻、妾、嫁娶、婚配、求妻、送女、索女、入嫁、鳏夫、寡妇、妆奁等。[③]其中有三点值得一谈：

（一）婚姻不完全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感情，而完全依靠经济力量决定。《文海》中有“婚价”一条，释为：“婚价也，结婚娶女价，向亲戚、叔、舅等馈物之谓”。[④]这种“馈物”就是女方向男方索所付之价格，完全是一种买卖婚姻。

（二）党项族尚武，故勇敢者也能获得美满婚姻。西夏有谚语云：“弥密（党项姓）勇，婚嫁美”。[⑤]

（三）党项族内盛行姑舅表婚，西夏语“男甥”和“为婚”两词语音完全相同，说明在党项社会中舅父之女和外甥之间存在着一种优先缔结婚姻的权利。[⑥]西夏谚语有“亲上亲，甥妇坐姑上，热上热，设帐向南晒”，“天热去照日，亲眷加亲眷”，“善亲胜戚，大婚重婚”。[⑦]这些谚语完全可以反映党项

---

① 参阅《西夏书事》卷12、《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府州丰州条、《榆林碑石》之《折继闵神道碑》及《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

②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纪行》第1卷第61章《甘州城》，第128页。

③ 参阅黄振华:《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献看西夏社会》，载《中亚学刊》1983年第1期。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考释》所引《杂字》，载《文物》1978年第8期。

④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7·151条，第401页。

⑤ 《新集锦合辞》（西夏文），莫斯科科学院，1974年。该书为西夏谚语集，克恰诺夫曾将西夏文译成俄文，霍升平先生又转成汉文，载《艺术交流》1984年总第3期。陈炳应《新集锦成对谚语》第242条译为“勇（年年），美姻连”。

⑥ 史金波：《西夏语的“买”“卖”和“嫁”“娶”》，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

⑦ 陈炳应译：《新集锦成对谚语》第135、280、250条。

民族内部姑舅表等亲属联姻的习俗。[1]

西夏建国后，虽然从文献可以看出西夏社会有一套完整的婚姻制度，而且受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婚姻制度越来越渗透封建因素。然而，由于原始婚俗的遗存，党项族内男女之间性关系却始终是不严格的。北宋人上官融记载了麟府州党项人风俗：

> 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排映之处，并首而卧，绳带置头，各迭用力紧之，倏忽毙。[2]

这是党项未婚男女的为情至死而在婚前的自由结合。婚前性关系自由，这在许多古代民族中是不为罕见的。如乌桓，“嫁娶先私通，百日后方行礼”。鲜卑，“婚嫁先秃头，至三月，男女大会，然后各从所爱者配合”。[3]西藏民族中亦多不禁婚前性交。对于已婚妇女而言，也无封建的贞操观，这从党项王室的内乱完全可以获得证明，元昊妻卫慕氏（默穆氏）与人私通，生子“貌类他人”被杀，[4]元昊又与野利遇乞妻没藏氏私通；没藏氏与元昊有关系后，又先后与李守贵、保细吃多已通；[5]没藏讹庞以女妻谅祚，而谅祚又与没藏讹庞之子妇梁氏私通；更为甚者，元昊竟夺其子宁令噶妻没移氏为后。[6]已经部分封建化的党项王室其男女关系尚且如此紊乱，那处于半原始状态的党项部落民族之间的男女关系就可想而知。

党项人还有一种特殊风俗：“凡有女子，先荐国师，而后敢适人”。[7]元人马祖常之《河西歌》亦云：

>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8]

---

① 参阅邵方：《西夏婚姻家庭》第2章第3节，第31—32页，该氏未刊博士论文，1998年。
②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此事又见（宋）谢枋得：《碧湖杂记》。
③ （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汇集8方风《夷俗考》。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⑤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夏国传》。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⑦ （宋）彭大雅：《黑鞑事略》。
⑧ （元）马祖常：《石田文集》卷5《河西歌效李长吉体》。

这应是藏传佛教传入西夏后，在党项族内形成的习俗。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夏地位极高，故出家者甚多，当时即有“河西土俗，太半僧祇”[①]之说。僧人在西夏享有盛誉，党项女子以身先荐国师并不认为是不光彩之事，反而被人们视之为荣耀，这同西藏风俗大致相同。当然，党项女子愿以身先荐国师，亦与他们本民族性关系自由之俗有关。

生荣死哀是人之共愿，不论什么社会，不论何种民族，总有一套表现生荣死哀的方式。党项人总的说来是“轻生重死”，[②]但“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③]这种风俗明显是草原游牧民族重壮贱老的反映，他们认为，年轻力壮者在战斗及生产中起重大作用，而老年人却无力从事生产和战斗，故老者死不哭，而少者死却悲恸。党项人的丧礼，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处理尸体的方式却十分复杂，归纳起来，大约有四种：

（一）火葬：

《旧唐书·党项传》：“死则焚尸，名为火葬”。[④]《文海》“烧尸”条：“火上烧化尸体之谓”。又“丘墓也，烧尸处骨尸所围之谓”。[⑤]近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又在贺兰山东麓发现了一批用陶罐盛骨灰的党项平民火葬墓。[⑥]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党项的火葬是先将尸体烧成骨灰，然后进行掩埋，武威发现的两座西夏墓葬就是以“灵匣”装骨灰进行安葬，葬具是木缘塔。[⑦]马可·波罗过西夏故地（唐古特州）时，看到西夏遗民的焚尸之俗：

> 焚前，死者之亲属在丧柩经过之道中，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缎。柩过屋时，屋中人呈献酒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旧时。迨至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彼世因此得到以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柩

---

①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6《弹西夏中兴路高智耀不当状》。

②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75·242条、43·262条，第460、507页。

⑥ 《宁夏首次发现西夏火葬墓》，转引自《新华文摘》1985年第5期。（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16《风俗》载毕仲游《河东土俗埋葬札子》云：“亲戚丧亡，即焚其尸，纳之缸中，寄放僧寺与墓户之家，类不举葬”。河东乃党项居地之一，葬法与贺兰山发现西夏火葬相同。

⑦ 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题说》，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行时，鸣一切乐器。其焚尸也，必须请星者选择吉日，未至其日，停尸于家，有时停至六月之久。其停尸也，方法如下。先装一匣，匣壁厚有一掌，接合甚密。施以绘画，置樟脑香料不少于匣子，以避臭气。旋以美丽布帛覆于尸上。停丧之时，每日必陈食于柩前桌上，供死者之魂饮食。陈食之时，与常人食时相等。其尤怪者，卜人有时谓不宜从门出丧，必须破墙而出，此地一切偶像教徒焚尸之法皆如是也。[①]

马可·波罗所见到的西夏火葬焚尸方式与文献、考古所见均相合。

（二）土葬：

党项人的土葬方式文献无征，但从零星的记载可看出一点内容。首先，在今宁夏银川西面的贺兰山下“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②]仿宋陵之法，其葬式应是土葬。其中108号陪葬墓中发现了棺木和棺钉。[③]西夏字典《音同》中有“棺椁”二字，[④]李继迁乳母死时，就以棺椁殓尸出葬；继迁死后，德明即位柩前。[⑤]“棺椁”、“柩”都是土葬之一法。党项人不仅行土葬，而且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银州儒林县新兴乡招贤里乐平之原”应是早期拓跋氏的公共墓地，拓跋思恭以上均应葬此，至后晋开运时，李仁宝仍葬于银州，“祔葬于先祖陵阙之侧也”。[⑥]但稍后其公共墓地又迁至“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李彝瑾葬此。李彝瑾夫人里氏，李彝殷之母渎氏亦葬于此，李继筠为李彝瑾之侄，“祔葬先茔”，李光睿为李彝殷之子，均葬于此。[⑦]府州府谷县天平山就是党项折氏的公共墓地，[⑧]西夏攻破府州时，曾“夷折氏坟垄而戮其尸”，[⑨]可见，党项人这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57章《唐古忒州》，第116页。

② 《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总镇·李王墓》。

③ 《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8期。

④ 李范文：《同音研究》，第405页。

⑤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太宗经制西夏》。

⑥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李仁宝墓志铭及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250页。

⑦ 《渎氏墓志铭》、《里氏墓志铭》、《李彝谨墓志铭》及《李光睿墓志铭》，参见邓辉等《内蒙古乌审旗发现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2002年；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载《西夏学》第1辑，2006年10月。

⑧ 参阅《折可存墓志铭》，载《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折继闵神道碑》，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

⑨ （元）脱脱：《金史》卷128《张奕传》。

种公共墓地完全是汉族传统的土葬法。这应该是比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党项上层人物的葬法。

（三）水葬：

党项水葬之法仅见一例。《西夏书事》卷7载，李继迁葬其祖的情况：

> 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①]

这种水葬形式是十分奇特的，西藏、道孚、云南之民族虽也有水葬一法，但都是将尸体投诸河中，随其浮沉漂流，不准回顾。党项却是“凿石为穴”，然后引水将洞穴掩盖，这里除了深藏隐秘之意外，余疑其是否与拓跋鲜卑的石室祭祀有关。

（四）天葬：

这是麟府州党项部落的一种葬式。北宋人上官融到麟州亲见其事云：

> （男女殉情而死）用缯彩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条其革，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高丈余，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予大中祥符七年，随倅至彼，闻土人多言，却不之信。是时，主帅折惟中（当为忠）巡出边徼，拉予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见女栅置于岭上，而新者毡角宛然，异俗如此，且低徊昵爱又如此。呜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土风差殊可骇耳目。[②]

契丹、都波、女真、吐蕃古之葬法均有天葬一式，然各不尽同。契丹是“以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方取骨焚之”。[③]都波是“人死以木柜盛尸置树上，任鸢食之”。[④]女真“则以木槽盛之，葬于山林。”[⑤]藏人是以天葬为最吉，只有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咸平六年正月条。

②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

③ （元）陶宗仪：《说郛》卷86叶隆礼《辽志》（即《契丹国志》之节录）之《国土风俗》。

④ 《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总镇・李王墓》。

⑤ （元）陶宗仪：《说郛》卷8文惟简《虏廷事实》。

善人才能举行天葬。喇嘛死，用刀将其胸部划成棋子块形，用绳缚其体，置于高台，任鹰雕啄食，前胸食完，翻过背再让啄食，家人不悲。[①]党项天葬显然与藏人、都波不同，党项将尸体先用缯缎包身，又用毡裹其外，还用革条密加缠束，很明显并非让鹰雕啄食，可能是与契丹葬法相同，三年后，让尸体风化后，取其骨而焚之。

六、党项人的其他风俗

党项人在最初阶段可能是不过年的，因为他们无正朔，不知纪年，而是“候草木以记岁时”。[②]后来由于受汉藏两方面文化影响，开始有自己的历日和年节，汉人的四时、八节之俗也被党项人接受，而且越来越被党项人看重。赵德明时，每年岁旦、圣节、冬至都遣使献贡，故宋称“西夏人最重年节”。[③]

党项有哪几种年节呢？一是冬至节。党项以十二月为岁首，故冬至节尤被重视，[④]相当于汉人的岁旦节。

二是寒食节。[⑤]党项人过寒食节可能是受并州风俗影响，并州，古晋国之地，因“介子推焚身，民咸言神灵，忌烧火，由是至冬中辄一月寒食，不复烟爨”。[⑥]并、代、石、隰，亦为党项居地，党项一月寒食，不复烟爨，恐怕即源于此。

三是以四孟朔为节。党项原无此俗，元昊称帝后，“又以四孟朔为节”，[⑦]即以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月初一为节。

四是定元昊生日为国人之节，[⑧]元昊生于五月五日，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故以五月五日为全国人民的节日，党项人过节主要是聚会宴饮表示庆贺，在这一天，不管是首领还是平民都来参加聚会，并无上下之分。这就是

---

① （清）朱增鋆：《道孚风俗纪略》之《丧葬》。

②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6册《兵》28。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6册《兵》28载：“（西人）兼经十二月为首岁（当为岁首）”。（宋）曾巩：《隆平集》卷20载：“其俗旧止重冬至”。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6册《兵》28载：“西人最重年节及寒食”。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40《河东道》1。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太平寰宇记》中所谓“酒醴之会，上下通焉”。[①]宋朝军队也往往趁党项军民豪饮尽欢之时去进攻西夏。

党项人的住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瓦屋：包括宫殿、寺院、园宅等，这是党项贵族、僧侣、富商、官宦等上层人物居住之宅，即所谓“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②]党项人“以富为贵，以贫为丑”，[③]党项社会的阶层分化已明显到以居住条件上一看就一目了然的程度，凡居瓦屋者必为有命之人，曾巩还言：“有官爵者，方得覆之以瓦”。[④]皇室的宫廷“逶迤数里，亭榭池台，并极其胜”。显宦之家也是“广起第宅”，“园宅数处”，[⑤]僧侣之庙宇“其梁柱榱题，颇甚华丽”。[⑥]

（二）土屋、板屋。这是一般平民居住的简陋之屋。屋墙由土垒成，或用木板建造，屋顶则“织犁牛尾及羊毛覆之”。[⑦]《文海》中有“茅屋、草屋”的记载，也是属于这类土屋，只是房顶不是盖羊毛和犛牛尾，而是盖茅草。土屋也有盖瓦的，[⑧]麟府州党项“居民用土，止若棚焉，驾险就中，重复不定，上引瓦沟，虽大澍亦不浸润”。[⑨]这都属普通党项居民的住宅，最贫困者，则掘地为穴，称之为“窟室”。[⑩]

（三）毡帐，又作穹庐。上述两种住宅皆为定居人口的居地。党项人中自始至终都有一部分“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部落，他们所居就称之为毡帐。《宋史·夏国传》云：“其民一家号一帐”。这些穹庐毡帐多在城邑之外，宋上官融见麟州“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⑪]仁孝时，曾献百头帐于金。[⑫]百头帐，又称百子帐，《演繁露》称百子帐：

---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绝域方言集》第1种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④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庆历六年四月条、卷36绍兴十六年四月条。

⑥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

⑦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⑧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俗皆土屋,惟有命者以瓦覆之”。（宋）孔平仲:《谈苑》卷1:“（羌人）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处佛”。

⑨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

⑩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

⑪ （元）陶宗仪：《说郛》卷40引上官融：《友会谈丛》卷3。

⑫ （元）脱脱：《金史》卷61《交聘表》中。

本出戎虏，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耳。卷柳为圈，以相连锁，百张百阖，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揔之，亦非有百圈也。其弛帐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①

这手工艺十分复杂的毡帐绝非穷苦牧民所有，既可作西夏皇帝的进贡之物，则应是极富贵的游牧部落首领和牧主之居所。

党项人的服饰特色有以下记载。《隋书·党项传》称：

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②

裘是指用兽皮做的衣服，褐是指毛制的衣服，这与元昊所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③的记载是相合的，这是指党项人早期的服饰，也是党项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服饰，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胡服”④，应该就是这种皮毛制作的衣服。丰州是党项居地，其人“衣以驼衣褐布”。⑤黑城是西夏北边重镇，其民典当抵押之物全为皮裘、苦皮、马毯、袄子裘等，⑥完全可以证明，党项人比较普遍的衣着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胡服”，即皮毛之服。阎立本《西域图》中还保存唐初弥罗国（即党项国）王与奴仆的服饰：

一王皮韬小髻，……皮裘，玄靴，解衽，交手按膝；一奴皮韬……朱裘玄靴。⑦

亦与元昊所言“衣皮毛”相合。

到元昊称帝时，西夏服饰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帝王“始衣白窄衫，毡冠

---

① （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广集3《枫窗小牍》卷下引程大昌《演繁露》。

②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王吉）请髡发，衣胡服，……诈为胡人。”此胡服大抵即指皮毛之服。

⑤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9《关西道》15。

⑥ 黑城出土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共十五件文书，见《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474—480页。

⑦ （唐）阎立本：《西域图》，今佚，其内容录载元人戴表元《剡源文集》卷4《唐画西域图》中。

红裹，冠顶后垂结绶”，“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栏，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栏、束带”，“民庶衣青绿，以别贵贱”。[①]这些服饰从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可以得到某些形象的印证。榆林窟二窟的男供养人毡冠，后垂红结绶、带饰，折领袍服加栏短围。榆林窟二十九窟供养人前二人穿圆领窄袖长袍、系带，下加栏短围，着软裹。二十九窟供养人侍从着圆领短衫，下服裤褶，足着单靴，服饰极为简朴。莫高窟四〇九窟西夏贵妇之服饰为圆形冠饰，穿大翻领，着长袖袍。[②]榆林窟二十九窟西夏武官命妇之服饰为戴花钗金镂冠，衣交领窄袖花旋栏，内着百褶裙，足穿尖扣钩履。[③]上述均为党项贵族官宦服饰，与司马光所见平民之服不同：“并州蕃俗，……妇女不服宽袴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以便乘驴”。[④]元昊有时“衣锦袍、黄锦胡帽”，[⑤]野利后则“戴金起云冠”；[⑥]所有男人“皆秃发，耳垂环”，[⑦]这从西夏壁画中不戴冠冕侍从的发式即可获证。南宋以后，关于党项使臣的服饰还有一些记载。夏国遣宋的使臣：“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皮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载《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1辑。
③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西夏壁画》，载《文物》1980年第9期。
④ （元）陶宗仪：《说郛》卷3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并州属河东路，为党项居地之一。
⑤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七月丁卯条：“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西夏秃发之令是否严格实行，到西夏后期是否还继续实行？又李思纯《江村十论》言：“西夏的剃发是全剃头顶，童然无寸发如僧”。此说甚谬。西夏《观音经》第39、40等图中，夏人秃发是秃顶而留边，榆林窟二十九窟之夏童秃发亦如是。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这个问题仍十分模糊，（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在对西夏图画资料研究以后称：“关于秃发问题未彻底搞清楚，画出的不戴帽子的大部分唐古特人的两绺头发在两耳前面落下，另一种发式在佛像的施主中出现过。这种发式或者是梳向两边的短发，耳朵后面有一绺一绺的长发或发辫。有时这些发辫打成结。这就产生了个问题，什么样的发式才是‘秃发’？而这两种人根据外貌和衣服都是唐古特人。”又称：“只能作初步推测，贵族和平民的‘秃发’样式是不同的，……‘秃发’一词含糊不清，以及两种发式的存在，使这个问题成为悬案”。捷连提耶夫参考的西夏图画是：西夏特藏，第984号，第2203号（作祈祷的党项人），第71号（十二身），第8100号（许多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陈列品，第59号（观音像侍从），第68号，第88号（剃过的头有一绺头发）；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图42（侍从）。以上见（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第6章《11—13世纪的西夏文献——黑城遗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146页。

靴”。[1]遣金的使臣“正使戴金冠，制作甚工，朱袍、蹀躞，状貌甚伟，副使衣冠如高丽人，三节皆不入见，椎髻被发，小巾，尖帽，皆夷服”。[2]

总之，西夏建国以后，党项人的上层贵族逐渐汉化（不排斥建国前的部分汉化），服饰多仿汉人，故主要衣着为绢缯帛缎之料，“衣毛皮”之说只在党项贫下户中保留。

党项居住地很少膏腴之土，地瘠产薄。宋太宗对张浦曾说：“戎人贫窭，饮食、被服粗恶不可恋者”。[3]曾巩说党项人的主要食物时言：

> 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华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蓰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4]

党项部族由于粮食生产还不能充分保障，不得不采集一部分野生植物来充作主粮。如“登厢草”，又作“东墙”，为“甘、凉、银、夏之野沙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饭，俗名登粟，一名沙米”。[5]上面反映的应是已转向农耕生产的党项部民生活，还有很大一部分党项游牧民除了“食以白麦印盐”[6]外，牛羊肉及乳酪应是其主要食品，《文海》中乳制食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浆、烧肉、烤肉等条，文州羌人的犛牛酥号称“绝美”。[7]元昊与酋豪围猎时，“割鲜而食”，[8]即吃生肉，这都反映了党项游牧民的饮食之俗。

党项人的饮食还有茶、酒二项。由于党项游牧民是以食肉为主，故茶是帮助消化的重要饮料。顾亭林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9]宋人

---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帙 49 引《中兴小史》。
② （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上。“椎髻被发”，可见至后期西夏上层并没有实行髡发，仍有保持羌旧俗者。
③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2《太祖太宗经制西夏》。
④ （宋）曾巩：《隆平集》卷 20《夏国赵保吉传》。
⑤ （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普集 3 胡侍《真珠船》卷 5。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39《关西道》15。
⑦ 上揭《江邻几杂志》，文州亦曾是党项居地。
⑧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⑨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65《王廷相严茶议》。

洪中孚说："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①]又致成为他们"日不可阙"[②]的生活品。党项人喝茶还比较讲究，在《掌中珠》中，还载有专门烧茶的"茶铫、茶臼"。[③]党项居民多生活在高寒地带，饮酒可以抵抗高原的严寒，因此，喜爱饮酒也是党项人重要的生活习俗。在早期，党项人还没有农业生产时，为了造酒，竟"求大麦于他界，酿以为酒"。[④]党项人一有聚会或盟誓，或庆贺，总是饮酒作乐。《东都事略·夏国传》："曩霄奉卮酒为寿，大合乐，仍折箭为誓"。[⑤]《辽史·西夏外记》："仇解，用鸡犬血和酒，贮于髑髅中饮之"。[⑥]《宋史·夏国传》："（元昊）率部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⑦]饮酒成了党项人极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党项人将这种开怀痛饮的聚会称之为"酒醴之会"。《文海》中有专门"酿酒"一条，[⑧]榆林窟还有专门反映西夏酿酒的壁画——"酿酒图"。[⑨]这一切足以证明，西夏饮酒已成习俗。《圣立义海》中还保存了一些党项人生活习俗的记录：

> 七月十五日，报父母之恩，供神石，设具场，乃众神会聚之日；八月属酉，国内演戏游乐，八月末，储干菜，供养谷神；九月九日，斟酒饮，民庶安乐；九月十五日，神圣聚日与禅事日。[⑩]

从上述宝贵的资料中，大致可以看出党项民族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

七、后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党项风俗的来源是极为复杂的，就像党项族内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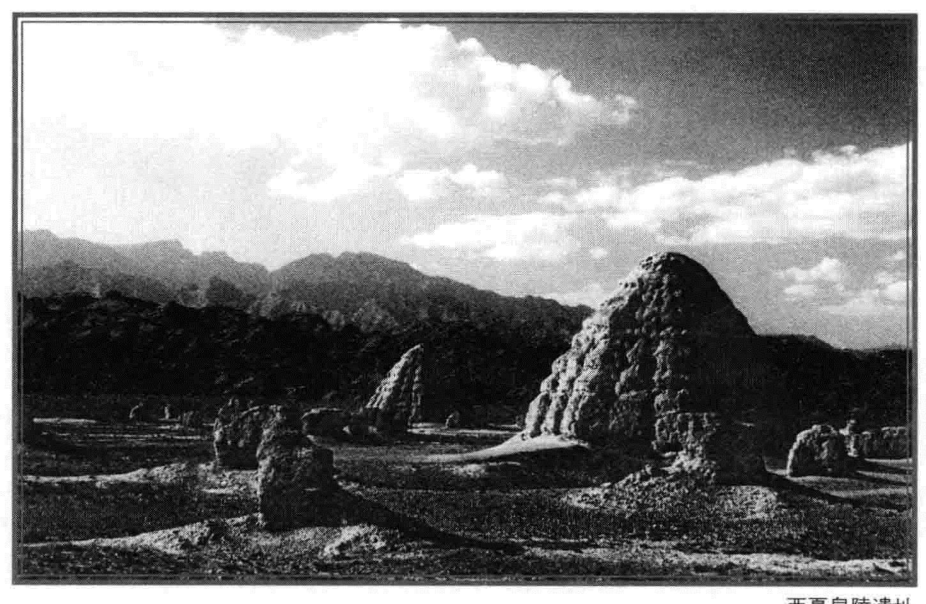
---

① （宋）罗愿：《新安志》卷7《洪尚书》。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4册《职官》43。
③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人事》下。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8《夏国传》。
⑥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73·12条，第503页。
⑨ 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载《敦煌研究文集》，第324页。
⑩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3—60页。

成分一样，既有羌藏系统的因素，又有鲜卑、突厥民族的因素，而且还夹杂着各种土著因素，因此而形成党项民族这一五花八门的杂俗。可以这么讲，上述各种风俗习惯，很难说哪一种风俗是党项民族的共同风俗，由于地域的不同，由于组成党项民族的原来民族基本因素不同，因此，很可能在同一种风俗中，各地党项风俗却差异很大，比如说西夏的蛇神传说、弥猴图腾明显是受羌藏文化中“龙神”崇拜与“弥猴种”传说的影响；而石室祭祀、白马崇拜及射鬼箭等，则完全可能是鲜卑系统古老风俗在党项族中的遗存。以狩猎为例，平夏党项与横山党项就会有差距；以婚俗为例，甘州党项与麟州党项就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在考量党项风俗时，千万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首先考虑党项民族的多元成分之背景，再进行具体分析。

中 编

西夏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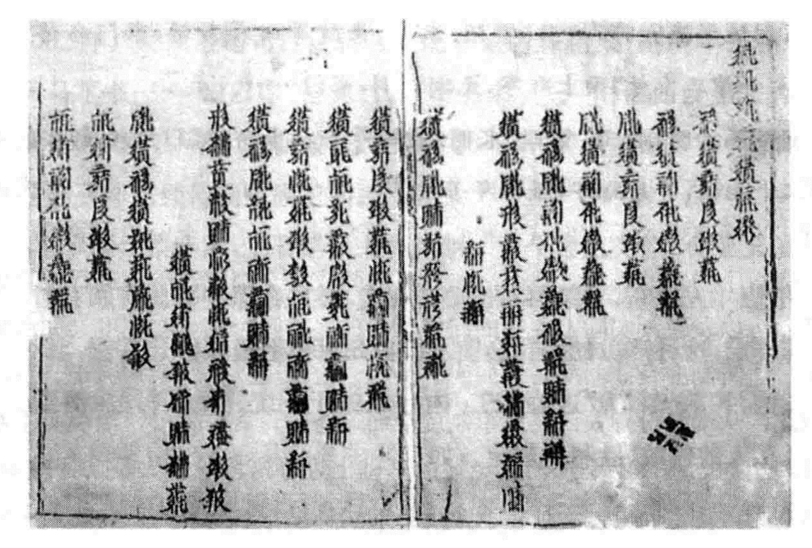
西夏皇陵遗址

关于西夏军事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一个立国二百余年且长时期与宋、辽、金三大国对抗的政权的军事制度，应该是一项不小的课题，很多学者也曾想将这一课题进行规模化的经营，也确实投入了不少精力和心血，发表和出版了数十份相关的著作与论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如果将这些成果全部摆在一起进行认真比对的话，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的问题相当的多，除个别个案制度（如西夏监军司、边防制度及武器配备等）研究具有一定深度外，其余均流于一般简单的叙述，从十几份有关西夏军事制度全面论述的论著内容看，出现了不断的重复和雷同，基本上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语境的张大及名词的更换，实际并无新意，而且，无证据或少证据的定性结论，随意性的表述及不分时间段地创立固定概念的现象大量存在。还有一些研究者不太重视文本的可靠与否，他们在论文中大量使用清人戴锡章《西夏纪》、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及吴广成《西夏书事》的资料，这三种清人著作除吴广成《西夏书事》中保存了一部分宋人著作的第一手资料外，其余均属第二手资料，不能作为论文的直接证据，而应核对资料的出处，探究文本的可靠性，直接引用宋人或西夏人的著作。但是，目前直接征用《西夏纪》、《西夏纪事本末》的研究者却比比皆是。就是对宋人著作的原始记录，也要对文本进行认真的探究，有很多宋人著作记录的西夏资料是某些当时人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带有一定程度个人见解的叙说，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有很多研究者却对这类资料多是不加辩证地照用。现存俄译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①]即使是国人所译之所有西夏文文献，也存在着各译者之间相互不同及同

① 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西夏法典》，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译者前后不同的问题，[①]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对这些文本多是不加辨明，不加思索地使用。还有的利用这些不太可靠的文本对西夏军事制度展开大面积总结性的研究。整体而言，国内西夏军事制度的研究存在问题甚多，其研究水准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下面仅就个人思索所至，在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将其中几个具有共性的问题提出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书影

一、西夏军事制度的定性分析

从20世纪50年代的金宝祥先生开始，就有对西夏军事制度的定性分析，金说西夏军队是一个“带有氏族血缘的部落军事组织”。[②]吴天墀先生则称：“西夏的军事制度，保留有奴隶制的浓厚残余”。[③]李蔚先生也认为：“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④]乔幼梅先生是对西夏军事制度性质进行详细分析的唯一学者。她认为，西夏早在建国前即

① 比如陈炳应译《贞观玉镜将》与胡若飞译《贞观玉镜将》译文相异；史金波等译《天盛律令》1994年译本与2000年译本也有很大的差距。

②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与封建化》，载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③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④ 李蔚：《简明西夏史》第3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已进入了奴隶制的社会阶段，故党项族的全民兵役制与这一阶段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党项族内又保持着“宗法封建制”，故在西夏军队中始终有“宗族兵”。所以她总结为“西夏宗族兵制是全民兵役制的基础，而西夏全民兵役制则是宗族兵制的一个发展”。[①]似乎是抽象出了一套颇具逻辑的范式归纳，也提出了一些先前西夏史研究者未曾提出过的概念。说实话，余并不反对史学研究中（包括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理论性的范式归纳。这主要看这种理论性的范式归纳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余很不赞同将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哲学范畴内的理论放到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中来，尤其是放到西夏社会历史研究中来。这一点其实每一位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心中都很清楚，有关这些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原始记录，不论是文献还是实物，实在是太少了。以现存资料而言，有时连一个政权的名称都无法辩证清楚，怎么可以轻易地给一个消失了千百年的民族社会定性呢？人类社会演进发展历史的复杂性，绝非一两个名词就可以简单归纳的，即使这一历史保存着当时十分丰富的原始记录与实物，也很难给这一社会简单定性，更何况那些当时历史的原始记录万不存一的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史？

这一类简单的定性最常见的是，用上一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再加上几条常见的史料，就可以自编自述地给一个基本上没有多少文字记录的社会定性。如金宝祥先生《西夏的建国与封建化》一文，就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理论认为，“中唐以后，党项内部牲畜私有制的出现，……象征着党项游牧氏族制度接近解体，……于是向汉族地区进行的商品贸易和军事掠夺也必然同时并起。……所以，军事组织，自中唐以后也便成为党项诸部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了”。[②]以此言之，中唐以前党项诸部尚未有私有制，也就不会对外掠夺，也就不会出现军事组织了。但《隋书·党项传》中即已记录：

> 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隋文帝）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③]

① 乔幼梅：《西夏兵制初探》，载《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与封建化》，载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③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隋文帝时党项部落对汉族地区的军事掠夺就已出现，何以至中唐。同书同传又载：

> 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有战阵则相屯聚。

这里记录的是隋以前的党项部落，即出现了强大的军事组织。很显然上述理论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吴天墀先生为了证明马克思《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各形态》提出的“普遍奴隶制”适用于党项社会，提出了党项社会奴隶的种种来源，一是俘掠奴隶，二是买卖奴隶，三是债务奴隶，四是罪犯奴隶。一、三、四项均未列举任何史料，第二项使用了两条《宋史·太宗纪》资料“禁陕西缘边诸州阑出生口”。“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①] 这两条材料何以可以证明是党项买卖人口？宋初陕西缘边有党项、吐蕃、吐谷浑、回鹘、生氐，生羌等，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人口一定卖进了党项部落呢？党项社会的“普遍奴隶制”就是在这样的论证下得出结论，而根据这些结论又大谈“西夏军事制度保留着奴隶制的浓厚残余”。

乔幼梅教授的《西夏兵制初探》则有这样的论述：

> 党项夏国之所以实行这种全民兵役制，是有其深远历史根据，并且是由党项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党项自青甘川故居东迁至宁夏为中心的陕甘宁边界地区，经历了自氏族社会末期向奴隶占有制过渡这一历史阶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和发展私有财产制，从氏族贵族到一般氏族成员，无不积极地投身于掠夺性的武装活动中，……所谓党项人“不事生产，互相凌劫”云云；所谓“不事生产，好为盗贼”云云，即是这一情景的缩写。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掠夺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正当的职业，成为英雄强者的光荣！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党项人同前此的匈奴人一样“贵壮贱老”，……丁壮构成维护和发展党项人私有财产的武装力量。……党项氏族部落时代的全体成员皆兵的制度，经过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48页。

元昊的整齐画一，成为西夏全民兵役制。[①]

以上言观之，乔先生认为西夏全民兵役制是建立在奴隶制对外掠夺的经济基础之上。乔先生在另处又提出，西夏从李继迁时代起即已进入“宗法封建制”，而这种“宗法封建制”仍是以“奴隶广泛存在”为其重要特征，甚至提出“奴隶制与党项夏国统治相始终”。[②]应该承认，乔先生在理论的自圆其说及史料的求证上比前两位先生细致许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依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点来审视西夏社会性质，就必须看到，西夏占据的所有州县均为“汉唐郡县”，这些州县下辖的主体人口，或是“蕃化”的汉人，或是“汉化”的蕃人，且多是汉唐封建国家下的编户齐民，怎么可能反而到宋代以后，这些地区其社会性质及经济成分倒退回奴隶制呢？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讲清楚的。特别是依据宋代陕西边州有将“生口”卖入番部只言片语之文献记录，和西夏文字典及《西夏法典》中有几个“奴仆”字样，就认为西夏“奴隶广泛存在”，“奴隶制与党项夏国统治相始终”，这实在是一种误导。人口买卖是中国社会中从古至今从未中断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夏文献中的“奴仆”实际上均是家奴、家丁，豪门大族拥有一定数量的家奴、家丁，甚至是拥有一定武装的家兵，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贯穿始终的事实，与奴隶制无涉。

对西夏社会性质加深认识的努力，将西夏军事制度研究提升到西夏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来认识，并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这些探索性的研究均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历史留给我们对西夏社会性质展开研究的素材实在是太少，现存的素材与资料根本无法让我们认识像西夏社会性质之类的重大问题。勉强拼凑材料或抓住两三条并不典型的史料就给西夏社会定性，并以此定性来衡准西夏军事制度，其结果自然是不会令人满意的。

二、西夏军事组织发展的分期

正式对西夏军事组织发展进行分期研究者仅陈炳应先生一人。陈先生将

① 乔幼梅：《西夏兵制初探》，载《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14章《西夏的宗法封建制》，第260—261页。

西夏军事组织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原始阶段，二是发展阶段，三是成熟阶段。[①]应该说，系统地对西夏军事组织发展展开不同阶段的研究与总结，是对西夏军事制度加深认识极为有益的，但是，陈先生的这种分期法实在过于简单化，其分期之根据缺乏科学性，带有很大的随意成分。陈先生将北迁以前的党项军事组织称之为“原始阶段”，而将北迁后的党项军事组织称之为“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几种区分这两个阶段的标准。但如认真分析史料，弄清史实，可以发现陈先生的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及各类标准的提出是存在误区的。

一是北迁后的党项军事组织是否较北迁前党项军事组织肯定有所发展？

首先，这在文献中找不到明确史料为证据。《旧唐书·党项传》称北迁前的党项军事组织“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②]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党项军事组织的规模，北迁后，唐王朝将内附党项分散安置在西北各边州地区，各强宗大姓之部落组织被分割变小，其军事组织之规模相应也有一定程度的削弱，所以我们在唐中叶以后史料反而找不到前期“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的记录。正因为内迁党项的分散安置，虽然“广德年中，……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橐驼，其后支属更酬杀，转转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杀掠以为常”，[③]且经常引导吐蕃入寇唐之边州，但党项军事力量始终未能对唐边州构成威胁，只能成为吐蕃之附庸，故常被唐朝边臣轻视，称之为“党项小蕃”。[④]再者，原处于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及四川西北部的党项部落本是清一色的游牧部落，而内迁后散处于西北各边州地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党项游牧部落逐渐演变为半耕半牧或纯农耕居户，如居庆州之“东山部”及居住在灵、夏、盐、环、延、泾、兰、会等州的党项部落；这种由纯游牧部落组织向半耕半牧或纯农耕组织的演变，亦不利于党项军事组织的发展，甚至削弱党项军事组织的战斗力。因此，很难说北迁后党项军事组织较北迁前党项军事组织肯定有所发展。

二是陈先生将北迁后的发展阶段定为从公元7世纪开始向陕甘宁地区迁

---

① 陈炳应：《党项人的军事组织述论》，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5期；《贞观玉镜将研究》2《西夏的军事体制》，第6—8页。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唐）沈亚之：《沈下贤集》卷3《夏平》。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徙直至公元 1032 年元昊承袭定难军节度使止，将长达三个世纪的党项军事组织统称为“发展阶段”是否合适？我们知道，这三百年中，前两百年，内迁党项其军事组织看不到有什么明显大发展的迹象，但到 9 世纪时拓跋思恭领导的党项势力崛起后，特别是到夏州定难军藩镇建立后，应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党项之军事组织不论从性质上还是从规模上，均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这里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党项部落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民族政权，而在这相对统一的民族政权之中必然有一支统一的军队。然而在此之前的党项各部虽有强有弱，但均“不相统一”，[①] 更无统一的军事力量。因此，夏州定难军藩镇时期，即从拓跋思恭到元昊建国前，亦即从公元 9 世纪末到公元 11 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是党项军事组织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应与内迁后的前两百年分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

三是陈先生在说明党项军事组织的“原始”及“发展”阶段使用的一系列名词缺乏科学性，亦无法证实。陈先生称内迁前党项酋长身边“逐步形成常务兵性质的扈从队伍”，并名以“党项兵”；而称内迁后党项人则“有了较为稳固的常备兵”，还称内迁前的党项兵为“原始的志愿兵”。余不知这些名词概念的使用，陈先生是拥有何种史料作为依据而下的判定。什么样的党项兵为“常务兵”？什么样的党项兵为“常备兵”？又何以知道内迁后党项军事组织的“精兵”、“锐士”不是“志愿兵”？内迁前党项军事组织内实行何种“兵役制”？有何文献证明？如果连何种“兵役制”都无法搞清楚的话，又如何区分党项军队中的“志愿兵”与“非志愿兵”？还有，陈先生称内迁后党项的军队“至少是准军事组织”，还称德明时期的部落兵“是比较松散的准军事组织”。余不明，到夏州定难军时期，党项军队已参加了平定黄巢叛乱及对五代宋初各割据政权的各类战争，党项军队有自己的番号，党项军队已建立自己“一整套较完整的统军体制”。这样一支东征西讨为西夏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军队还被称之为“准军事组织”，什么样的军队才可称之为“军事组织”？总之，在这里陈先生使用的大量力图将历史科学化、系统化的名词概念，反而将历史给弄糊涂了。

四是陈先生将北迁前党项军事组织称为“这时还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军

---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政、军令、军法，只能有极简单、约定俗成的办法和口头规定”，而对内迁后的党项军事组织称之为：“在军政、军令、军法方面主要还是党项人的习惯法，即‘蕃法’”。关于党项习惯法，日本学者冈崎精郎有专门的研究，[①]但并没有将党项习惯法局限在内迁后的党项部落。既然是习惯法，那就是这种习惯法一定在内迁前的党项部落中也是存在的，那种“简单的、约定俗成的办法和口头规定”也应该就是习惯法。这一点不可能在党项内迁前后有什么不同。陈先生将元昊建国以后西夏之军事组织的发展视作一个阶段，即“成熟阶段”。西夏立国二百余年，军事组织的发展与变化应该有很大的不同，西夏建国初期之军事组织与西夏后期之军事组织应有所不同，白滨先生指出，“在西夏后期的统军体制中有了新的变化，如从史料上出现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皇城司、内宿司、巡检司等新的机构名称，……说明西夏在军事统御方面由前期枢密院独掌兵权，到后期出现了军事分权”。[②]西夏的军队数量、兵种配置与监军司的设置，还有军事法令的制定，前期与后期均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简单地、笼统地将西夏立国两百余年的军事组织之发展视为一个“成熟阶段”，也是很不适合的。党项、西夏军事组织及军事制度的发展究竟应如何分期，应该依据现存史料，并将现存史料（包括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进行严格的考订，再认真细致地分析党项、西夏民族政权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其军事组织或军事制度的发展状况，并对各种状况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判，然后再来划分党项、西夏军事组织发展的分期，切不可简单化，亦不可无材料地主观推论，无材料者，宁肯阙无，亦不可以论代史。

三、中央兵与地方兵之界定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均认为，西夏军事制度中其军队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之分。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军队分为三大部分：（一）边镇军，包括监军司和巡检司兵；（二）中央军，包括兴、灵镇守兵和擒生军；（三）国主护

---

① （日）冈崎精郎：《党项的习惯法和西夏法典》，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田村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1968年。

②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7卷《辽金西夏》，第465页。

卫军，包括六班直与铁骑。白滨先生认为西夏军队分为侍卫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三种，中央军包括擒生军及镇守兴、灵州之兵，地方军则是指各监军司兵。乔幼梅先生则将西夏军队分为中央兵和地方兵两大系统，中央兵包括拓跋王族拥有的宗族兵，与拓跋王族有姻亲关系之酋豪控制的宗族兵，西夏王室的侍卫军及被俘而归顺西夏的宋军；地方兵主要是各监军司控制的宗族兵。西夏是否有严格的中央军与地方军两大系统的区分，特别是将监军司之军队称为地方兵，余不同意这一观点。

首先，西夏军制虽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但其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大都是学习或仿照宋朝之制度而推行的。正如《宋史·夏国传》称："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1]宋朝的中央军称禁兵，地方兵称厢兵和乡兵。禁兵不仅是宫廷禁卫军和京师卫戍兵，"屯驻"或"驻泊"在京师以外各州军的军队（包括边境地区）也是禁兵，故各地的驻守任务主要是由中央禁兵来担任。[2]西夏虽无禁兵之名，但其在各地驻防、屯戍之军队均应是由朝廷派出的军队，亦当属中央管辖之军队，而不是地方军队。《长编》卷120：

> （景祐四年）是岁，……赵元昊……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自河北至鄂尔宁山七万人，以备契丹，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山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3]

《宋史·夏国传》所载除监军司与总军力数字不同外，其余相同。三十余万，是元昊建国时的总兵力，而这些军队分别驻守在河北、河南、宥州路、甘州路及贺兰、灵、兴州等地，均为夏国朝廷派出的军队，看不出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之区别，以宋朝兵制观之，这些驻守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均应属中央军之列，而不是地方军。

其次，从大多数宋夏战争的交战情况看，西夏监军司军队均是作为西夏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卷2《北宋前期和中期的禁兵》，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的主力部队而进行对外战争的，并非非正规的地方军。《长编》卷 316：

（元丰四年九月己酉）衔头闻汉兵四出，即分遣诸监军司兵马属委贼帅总领，谋抗官军。[①]

《长编》卷 317：

（元丰五年六月丁丑）夏国诸监军司并僧道悉点集，以七月会于芦河川，欲寇泾原。[②]

《长编》卷 404：

元祐二年八月戊戌，夏国主乾顺尽召十二监军司兵屯会州天都山西南。[③]

宇文之邵《上皇帝书》：

去岁谅柞猖獗，……贼之来也，大则六监军、衔头一时俱发。[④]

类似资料甚多，可以证明，西夏监军司军队乃该国对外作战之主力部队，并非地方军。还有的先生提出，镇守兴、灵之西夏军队是中央军，而监军司的军队是地方军，据刘温润《西夏须知》，西夏在灵州（西平府）“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⑤]，灵州翔庆监军司即后之白马强镇监军司，[⑥]是总领全国军队的监军司，亦可证，监军司绝非地方兵。

再次，从监军司的统帅将领来看，亦可证明诸监军司兵马统属中央统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6 元丰四年九月己酉条。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7 元丰五年六月丁壬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04 元祐二年八月戊戌条。
④ （宋）吕祖谦：《宋文鉴》卷 53 宇文之邵《上皇帝书》。
⑤ （宋）刘温润：《西夏须知》，转引自（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 元祐七年五月条。
⑥ 拙稿《西夏监军司驻地考略》，载《历史地理》第 6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领，而非地方。《长编》卷123：

（宝元元年九月己酉）善约特者，元昊从父也。……善约特名惟亮，与弟惟永分掌左右厢兵。[①]

善约特，即赵善约特，即嵬名山遇，汉名赵惟亮，为元昊之叔，任夏国枢密；其弟赵惟永，任夏国太尉，[②]分别掌管左、右厢军队；赵惟亮兄弟为西夏王族，官居夏国中央枢密、太尉之职而掌左、右厢监军司之兵，难道其监军司之兵还是地方军？又魏泰《东轩笔录》卷8：

刚浪陵统明堂左厢，野利遇乞统天都右厢。[③]

据吴广成考证，刚浪陵即野利旺荣，为元昊妻野利皇后之兄，野利遇乞为其弟。野利兄弟为西夏后族，官居太尉，所统之兵为左、右厢监军司之兵。[④]《西夏书事》卷12更称："（元昊）受册即皇帝位，……以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成逋克成、赏都卧𠷚、如定多多马、窦惟吉分驻十二监军司地，主兵马"。[⑤]可知，十二监军司之领军将领均由中央派出，亦可证监军司之兵非地方兵。

还有，司马光《日录》卷1中有一条重要资料：

刚浪唆（当为崚）凌死。又曰：始元昊分国中兵马为左、右厢，使唆兄弟分统之。唆反诛，元昊更分左右厢为十六监军，各有厢首领。[⑥]

这是从李裕民先生在日本发现的司马光《日录》中找到的一条关于西夏军制的原始资料。这条资料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元昊继位后，整顿西夏军事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元年九月己酉条。
②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宝元元年九月十六日条。
③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8。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5庆历二年二月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宝元元年冬十月条。
⑥ 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01条，第43页。

的最先措施是"分国中兵马为左右厢"。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亦可佐证：

> 元昊志在恢拓，数侵诸蕃境土，……又分兵为左右厢，……其厢左距契丹，右抵甘州。①

很清楚，这里的"左右厢兵"即是元昊全国之兵。厢，是一种军事编制单位，兴起于唐，军队的左、右厢，即为左、右翼之意。中唐以后，左右厢已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五代、宋初亦沿袭左、右厢编制。按规定，五百人为一指挥，五指挥为一军，十军为一厢，每厢应有二万五千人。②宋真宗时，吐蕃西凉潘罗支六谷政权也是将其属下兵马分为左、右厢。③

元昊继位后，亦将全国兵马分为左、右厢。这里面并不存在着中央兵与地方兵之分。后又在左、右厢之基础上设监军司，即前引司马光《日录》之"元昊更分左右厢为十六监军"。可知，这左、右厢与十六监军即是西夏全国的军队，也就是说，西夏监军司的军队即是西夏国家的主要军队，非地方军。西夏职官中有"巡检司"一职，④但西夏巡检司似乎同宋朝之"巡逻州邑，擒捕盗贼"⑤的巡检司不同。根据《天盛律令》，巡检司将领从监军司派出，巡检司属下有高级将领正、副行统，还有边检校、营垒主管、检队提点等，其中边检校"应派监军习判中堪任之人"。⑥可知，西夏巡检司大约是与监军司同一级别，负责边防巡检的重要军事部门，而非宋朝州县辖下只管百十来名士兵的巡检司。故此，陈炳应先生称西夏巡检司为地方兵亦是不妥的。⑦

余虽不敢完全否认西夏军队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两大系统之分，但从目前文献所透露的全部信息，还不足以说明西夏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两大系统清楚的区分，更不可以将西夏监军司和巡检司之兵称之为地方兵。

---

①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卷2《北宋前期和中期的禁兵》，第24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十月己未条："六谷分左、右厢，伊朗布为左厢副使，促勒锡卜为右厢副使"。

④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人事下》。

⑤ （元）脱脱：《宋史》卷167《职官》7。

⑥ 史金波等译：《天盛律令》卷4《边地巡检门》，第211—212页。

⑦ 陈炳应：《党项人的军事组织述论》，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5期。

四、西夏军队数量之判断

关于西夏军队数量的问题，由于各种文献记录存在的差异较大，因此，研究者对西夏军队数量的估算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有估算为十五万者，有估算五十万者，有估算七十万者，甚至还有估算一百万者。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余以为这是我们研究者应如何看待现存之西夏文献的问题。《宋史·夏国传》是目前现存的有关西夏历史记录最为详尽系统的原始资料，应该说也是有关西夏历史的最权威记录之一。元人修宋史，只花了两年半时间仓卒成书，“文字不加修饰，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方面也存在许多缺点”，素有“繁芜杂乱”之称。[①]但是，正是由于宋史的“繁芜杂乱”和很少修饰与剪裁，其保存资料所具备的原始性则更强，可信性更高。但又由于宋史的编纂者对其中史实的考订过疏，因此，宋史中的问题也是大量存在。《宋史·夏国传》所记录的西夏资料也是如此，因此，对《宋史·夏国传》的资料既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在使用时则须进行谨慎的考订。如《宋史·夏国传》关于西夏监军司与西夏总兵力有两段记录，一是元昊建国之时：

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北……七万人……河南……等五万人，……左厢宥州路五万人，……右厢甘州路三万人，……贺兰山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②]

二是《宋史·夏国传》在西夏灭后总论西夏时称：

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③]

---

①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之出版说明。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对于这两段史料每一位研究者都在使用，但无人对它进行审慎的鉴别。余以为，对这两段史料，至少应有如下两个认识：

第一，这两段史料是分别记录不同时期西夏军事制度的资料，前一条资料是记录元昊建国时期，后一条资料应是记录西夏中后期，因此，这两段史料所反映的西夏军事制度是前后两期的西夏军事制度。

第二，正因为这两条史料是分别记录前后两期的西夏军事制度，而编修《宋史·夏国传》之史臣不明其事又未对其进行认真的考订，故将早期记录的两处原本不同的资料进行了改动，统一为一样的资料，一是监军司数，一是西夏总兵力数。西夏监军司早期数应是18所监军司，《长编》卷120称："（赵元昊）置十八监军司"，[①]这条材料与《宋史·夏国传上》的前一条材料所记为同一事，《长编》作十八，《宋史·夏国传》作十二；前引司马光《日录》称："始，元昊分国中兵马为左右厢，使唆兄弟分统之，唆反诛，元昊更分左右厢为十六监军"。[②]十六监军再加左、右两厢监军，亦为十八监军。《范文正公年谱》也称元昊时建十八监军司，[③]这些都是来自当时人的原始资料。可知，元昊始建监军司时当为18所。

后随着宋夏战争规模的扩大，西夏监军司数又有增加，就文献所见数，超过20所。[④]到西夏后期，西夏对外战争逐渐减少，其监军司数目当亦随之减少，到夏仁孝天盛年间，西夏监军司还有17所，[⑤]到夏国末期更减少至12监军司。故《宋史·夏国传下》结尾论及西夏军事制度时载西夏监军司之数为12，这应是西夏末期之监军司数。元人修《宋史·夏国传》时未详细考订其他的原始资料，因看到后面谈及西夏监军司之数为12，误以为元昊初建监军司也是12，故将原为十八监军司统一为十二监军司。此其一。西夏总兵力数早期应是30余万。《长编》卷120："自河北至鄂尔宁山七万人，……总三十余万"。[⑥]这是一个有详细数据而又十分准确的数字，总数与各地驻军数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② 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01条，第43页。

③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之《年谱》。

④ 拙稿《西夏史札记》2《西夏监军司的数量》，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⑤ 史金波等译：《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之和（37 万）相合，应是元昊建国时西夏全国的总兵力。但《宋史·夏国传上》却称元昊建国时全国军队“总五十余万”，《宋史·夏国传上》公布在西夏全境驻军总数（包括河南、河北、左厢、右厢及兴灵等地）十分明确是 37 万，但总数却称“五十余万”，很明显又是元人误将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的总兵力 50 余万与元昊时的总兵力等同起来，故将原来的 30 余万改为 50 余万。西夏建国初期全国总兵力是 37 万，到后期兵力扩充几近一倍，总数在 70 余万。[①]《宋史·夏国传》关于西夏军事制度的原始记录，如果利用司马光《日录》及《长编》等资料校正元人误改元昊建国时监军司与全国总兵力数字的话，其记录应该是可信的，也是准确的。

乔幼梅与李华瑞二位教授均认为元昊建国时西夏全国总兵力应是 15 万。[②]理由有两条：一是他们根据庆历年间宋臣赵师民和熙宁年间王安石的两段话估算西夏全国户口为 20 万户、100 万人口；二是根据《隆平集》与《东都事略》的记载，元昊时夏国之兵为“十五万”。应该怎样认识这些材料？准确地认识和判定宋人典籍中的西夏史料之内涵，是研究西夏史之前提。先看看乔、李二位所征引的资料。《长编》卷 146：

> 羌贼所盗陕右数州，于本路十二分之二，校其人众七八之一，虽兼戎狄，亦不过五六分之一。[③]

赵师民这一段话首先是有明显的夸大，与事实不符，元昊建国后拥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十四州之地，从地域上来看，远远大于宋代之陕西路。赵氏反倒过来说，夏国境土只相当于陕西路的“十二分之二”，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这样随意性的宋人之言，难道可以作为推算西夏人口的依据吗？宋人著作有关西夏问题的表述，其中有一部分是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带有一定程度个人见解的叙说，而不是由西夏政权直接颁布的公文或由宋人转述的原始公文，其可信

---

① 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兵种、兵员初探》，载《固原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杜建录：《西夏边防制度初探》，载《固原师专学报》1993 年第 1 期。均认为西夏后期兵力扩充至七十余万。

② 乔幼梅：《西夏兵制初探》；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 156 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46 庆历四年二月丙辰条。

性是要打折扣的。再看看王安石之言，《长编》卷 232：

以陕西一路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①]

按王安石之意，当时陕西分为四路，而夏国之户口则相当于陕西路户口的四分之一。从正式的户口数来讲，王安石之言大体是对的，元昊拥有的西夏州县均是唐宋王朝的郡县，以唐宋户口图籍上的数字来看，在西夏之州县户口数大概就是陕西路户口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必须注意到，西夏境内州县唐宋时有户口数仅仅指汉族人口数，也许还包括少数已进州县入籍番族熟户人口，但绝大多数居住在西夏境内、游牧于唐宋州县农耕区之外的党项、吐蕃、回纥等族户口数是不在其中的。在西夏境内，汉族与番族的人口比例是多少，吾人无以得知。如果仅以王安石册籍上的汉族人口比例来看西夏全国总人口的话，余以为，这个错误应该是不小的。举两个例子，一是丰州户口，据《元丰九域志》宋时丰州主客户共一百五十八户，[②]《长编》卷 124 称居丰州近处黑山之藏才（清译作“藏擦勒”）族有三十八族，部众为“十余万”，[③]可证，藏才族人口未统计入丰州户口中。第二例是兰州户口，《元和郡县图志》统计开元时兰州为四千户，[④]《元丰九域志》统计兰州主客户为六百四十三户；[⑤]而《宋史·苗授传》称兰州定西一带禹藏花麻诸族居住，有“户五万”，可见，这五万亦未计入兰州户口。[⑥]而《李光睿墓志铭》称：“大周广顺元年，府主大王以郡邑封疆，开拓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踰百万家。”[⑦]后周时，夏州定难军管辖区内，“戎夷帐族”就超过了 100 万户。1 户即以 5 口计，则应有 500 万人。当然，很难保证这些资料没有夸大的成分，但仍可告诉一个事实，赵师民、王安石所谈的州县户口、西夏户口等均是唐宋图册上的汉人户口数，并不包括这些地区居住的各番族人口。因为这一地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2 熙宁五年四月丙寅条。李华瑞引此条时间有误。
②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 4《河东路》。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4 宝元二年八月戊辰条。
④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39《陇右道》。
⑤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 3《陕西路》。
⑥ （元）脱脱：《宋史》卷 350《苗授传》。
⑦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载《西夏学》第 1 辑，2006 年。

区的番族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人口调查。因此，以 20 万户、100 万或 150 万人口估算西夏户口是不准确的，[①]西夏户口之实际数应大于乔、李二位之估算数。

《隆平集》和《东都事略》均称元昊时西夏兵力为 15 万人左右。先看看原文，《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

曩霄（即元昊）之兵逾十五万。[②]

《东都事略·夏国传》：

曩霄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③]

关于元昊之兵十五万之记录，还有《范文正公年谱》亦称“其众总十五万”。[④]这些 15 万的资料应怎样看，余以为，这里仅仅是指元昊时期用于发动对宋战争的军队数，可看当时各种文献记录的元昊时期进攻宋边境的军队数字，即可大致明了，《宋史·夏国传》：

元昊自将精兵十万，营于川口。[⑤]

《景文集》卷 96：

前年党项羌叛，乃今正月。穿当路塞劫，余种将十余万骑犯高奴。[⑥]

---

① 人们往往以党项部落一户五口计，其实蕃部一户人口往往大于五口。（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之《言行拾遗事录》3《西夏本末》：“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廷夫，将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三石”。“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户口数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贷禄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可见，当时对番部每家人口估算之中数是十口，而不是五口，如是，则西夏之户口数估算应大大增加。

② （宋）曾巩：《隆平集》卷 20《夏国赵保吉传》。

③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 127《附录》5《夏国传》。

④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之《年谱》。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⑥ （宋）宋祁：《景文集》卷 96《送承制刘济知原州诗序》。

《儒林公议》卷上：

> 贼众十余万，平与石元孙兵不满三万。[①]

《长编》卷132：

> 昊贼自领十余万众，我以二三万人当之。[②]

《宋史·景泰传》：

> 元昊众十万，分二道，……入攻渭州。[③]

正因为元昊侵宋时，每次率领的军队总是十余万。正如韩琦所言："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④]而对这入侵的"十余万"西夏军队，宋臣们总是张大其词地说西夏"倾国入寇"、"举国而来"。[⑤]所以，宋人往往将元昊率领的侵宋军队视为西夏全国的军队，正如尹洙所言：

> 元昊以七州之地，兼党项之众，计其兵不过十余万。[⑥]

《长编》卷139：

> 元昊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⑦]

---

①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326《景泰传》。
④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⑤ （元）脱脱：《宋史》卷312《韩琦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乙卯条。
⑥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按地图》。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乙卯条。

宋人韩琦言：

> 元昊窠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人马精劲，惯习战斗，……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①]

其实，元昊每次侵宋的军队主要是“河外之兵”再加上“横山一带蕃部”。元昊建国初期，国内“诸蕃向背不齐”，[②]先后出现的嵬名部、卫慕部、野利部族人的反叛即是明证；东北的契丹，因元昊与辽兴平公主“不睦”，[③]故双方结隙，契丹军队随时可能对元昊进行报复；西南河湟吐蕃更与党项“结隙方深”，[④]随时都希望夺回被西夏侵占的原吐蕃六谷部之领地；西面甘沙州回纥亦对元昊叛服不常，[⑤]西夏对西部民族的统治基础极为薄弱。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夏有可能将全国的军队都用来发动对宋朝的侵略战争吗？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防守契丹、回纥、西蕃及镇守兴、灵之兵并不可能全部投入到进攻宋朝的战斗中来，进攻宋朝的“十余万”西夏军队也仅仅是“河外”及“山界”兵的一部分，并没有全部抽调。《长编》卷120称西夏全国军队总数“总三十余万”，其中7万驻守河北，5万驻守河南，5万驻守宥州，3万驻守甘州，5万驻守贺兰山，5万驻守灵州，7万驻守兴州，这条资料是可信的，[⑥]而《隆平集》与《东都事略》所指的15万之数，应是指元昊用于侵宋军队之数，而不是全国军队总数。《宋史·夏国传》元丰时夏西南都统嵬名济乃致刘昌祚书称：“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⑦]亦可证，夏国之兵不止15万，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此数，应是《长编》卷120公布的资料“总三十余万”。

元昊以后，西夏的军队总数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特别是到宋朝反攻西夏时期，西夏军队的数量膨胀到令人难以相信的规模。熙宁三年以前

---

① （宋）韩琦：《韩魏公集》卷12《家传》2。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宝元元年七月条。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宝元元年四月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四月甲申条：“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奉首领为朝廷击贼”。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的西夏侵宋军队数量始终保持10万左右，梁太后掌政时，大大扩充西夏军队，“籍境内七十以下，十五以上悉为兵”,[①]使西夏侵宋兵力骤增。《宋史·夏国传》：

（熙宁三年）八月，夏人遂大举入环庆，兵多者号二十万，少者亦不下一二万。[②]

《长编》卷214：

（熙宁三年八月辛巳）秉常果以三十万趋环庆。[③]

《长编》卷316：

（元丰四年九月）诏李宪……夏国举一国之兵以当官军，约三四十万众。[④]

《西夏书事》卷26：

（元丰五年九月）夏国以六监军司兵三十万屯泾原北。[⑤]

《长编》卷329：

（元丰五年九月）先是，夏国调民为兵，十丁取九，得三十万人……。[⑥]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熙宁三年八月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同一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庚辰条为“兵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这一次西夏入侵，他处材料均称为总数三十万，此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当误。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辛巳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甲辰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6元丰五年九月条。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甲申条。

《宋会要辑稿》：

(元丰五年九月）沈括言：西贼三十万寇永乐城。[①]

熙宁、元丰期间，西夏对宋作战的军队常见数为“三十万”，以《西夏书事》之载，仅六监军司就有兵30万，西夏监军司至少有18所，故可推断，与元昊时期相比，西夏投入到对宋战争中的军队数额至少增加了一至两倍。这一时期西夏军队之总兵力亦较元昊时期总兵力的37万应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到元祐及绍圣之时，西夏军队更出现惊人的数字。《宋史·李宪传》：

明年（元祐元年）冬，夏人果大入，围兰州，步骑号八十万众。[②]

《长编》卷502：

（绍圣五年九月）羌人点集百五十万，欲入汉界十程打劫。[③]

《诸臣奏议》卷140：

绍圣三年秋九月，夏人大举寇鄜延，号一百八十万。[④]

“号八十万”，“号一百八十万”，明显有夏人虚张声势的夸大，文献中这些不断扩大的夏军数字的出现，也可反映西夏军队总数在继续扩大。西夏作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6册《兵》8。

② （元）脱脱：《宋史》卷467《李宪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2绍圣五年九月庚辰条。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绍圣五年十月己亥条：“章楶奏西贼把塞……约三十万”，又引《曾布日录》，落蕃兵士亡归云：“二十五日，聚兵百五十万；……凡旬日乃动，因闭……九羊六城寨，约三四十万”，又引《章楶奏议》：“十月，夏主与其母自将兵数十万围平夏城”。（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6册《兵》：“章楶奏：西贼三十万把塞”。可证这一战役夏军实际数应为三十万。

④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0《上徽宗论进筑非便》。绍圣三年夏人侵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及《宋史》均无夏军人数，《西夏书事》卷30作“（乾顺）奉母梁氏率众号五十万入鄜延”。《西夏书事》五十万较《诸臣奏议》一百八十万可信。

为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当宋军已反攻进入西夏境内，这种集全国军队予以反击的现象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多至百余万。故《宋史·夏国传》在最后介绍西夏后期军队总数时，除了十二监军司 50 余万兵力外，还有擒生军 10 万，兴、灵镇守军近 10 万，西夏后期全国总兵力大约是在 70 万左右。总之，以 15 万军队之兵力来估算与宋、辽、金抗衡百余年的西夏，恐怕是偏低的。

五、余论

上述四个问题应是目前西夏军事制度史研究中存在的较大问题。还有些问题，虽已有学者进行研究，但问题依然未解决。如有人提出西夏征兵制只在党项族内实行，而对汉人则实行拣选法，[①] 这种提法证据是不充分的。《贞观玉镜将》与《天盛年律令》提到征兵时并没有提出对蕃、汉人民实行不同的兵役制，《宋史·夏国传》及《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虽然称夏国征兵的对象是以“帐”为单位，但这里的“帐”是对西夏所有家庭而言，即“其民一家号一帐”，因为在宋人的心目中西夏是党项之国，其国民即党项，并没有严格地将其中不是党项的汉人区分开来。所以，《宋史·夏国传》、《隆平集》、《辽史·西夏外记》中的“（男）十五以上为丁”[②] 应是对西夏全国而言，并不分蕃、汉。而《宋史·夏国传》中“得汉人，勇者为前锋，号‘撞令部’；若脆怯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③] 这也不是如陈炳应先生所言，“在汉人中实行拣选法”。这里明明是指对西夏抓获的宋朝汉人俘虏的处置方法，而不是对西夏国内汉族实行的兵役制度，此二者不可混淆。还有关于西夏太尉与枢密职掌的认识，李华瑞认为：“西夏既然设太尉一职，又令蕃汉为之，当不与宋同，而应有其实际意义，或许元昊仿宋的官制控驭武将，使枢使与太尉同掌兵权，枢使只有发兵而无握兵之重，太尉则柄兵而无发兵之权”。[④] 这种推论似乎有理，但却与事实不符。如元昊叔父赵惟亮

---

① 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征选、廪给制度》，载《西北史地》1987 年第 1 期。

②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宋）曾巩:《隆平集》卷 20《夏国赵保吉传》;（元）脱脱:《辽史》卷 115《西夏外记》。

③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④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 151—152 页。

（嵬名山遇）“在元昊处为枢密”，[①]其弟赵惟永，为西夏“太尉”，两人“分掌（西夏）左右厢兵”。[②]则是枢使有“握兵之重”；芭里昌祖为仁孝时“殿前太尉”，却任使金之臣，[③]又可见太尉有时又不“柄兵”。西夏授太尉（宁令）之衔者甚多，多为掌兵权之武臣，野利仁荣（谟宁令）、赵惟亮、赵惟永、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均为元昊建国初期之著名宁令，赵惟永称“太尉”，[④]野利遇乞、赵惟亮、野利旺荣（又作刚浪凌）亦当为太尉。野利仁荣为“谟宁令”[⑤]（其他四人均为“宁令”），当是西夏第一太尉。故更有理由怀疑夏国之太尉同宋一样亦为虚衔。类似问题还有不少。可见，国内西夏军事制度史之基础研究十分薄弱，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及基本文献的阐释还没有搞清楚。很多问题如西夏的汉军、吐蕃军、麻魁（女兵）、擒生军及正统司、经略司、枢密院、山讹、泼喜等仅仅只是提出，而由于文献的不足、记载的歧异或西夏文翻译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使研究者很难深入下去，很多关于西夏军事制度的基本认识还处在十分模糊与混沌的状态之中。因此，余以为，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如果没有更多的新资料的开掘与发现，要完成一部较为系统完整且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西夏军事制度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

①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 12。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2 宝元元年九月己酉条。

③ （元）脱脱：《金史》卷 62《交聘表》下。

④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 12。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6 庆历二年十月条。

略论李继迁反宋战争的性质*

公元982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夏州党项族首领李继捧率族归宋，并以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贡献于宋廷。由于这一事件的出现，引爆了夏州党项族的另一首领李继迁二十二年的反宋战争。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经过了不少的迂回曲折，最终赢得了收复银夏五州并夺取了宋灵州的胜利，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成为党项族内引人瞩目的民族英雄。李继迁对党项族的发展壮大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关于他领导的长达二十二年的反宋战争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的性质？近年来，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显然是多数，而且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①]余以为，这种评价与当时历史事实不符，有必要进行再评价。

一

民族反抗斗争的前提应该是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就无所谓民族反抗斗争，这应是一组矛盾。要知道李继迁的反宋斗争是否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那就必须知道宋朝对党项民族是否有民族压迫的事实，也就势必要知道宋对党项民族的政策是不是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有人说："北宋统治集团顽固地推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还有人说："有宋一代，党项族

---

* 原文发表于邓广铭、徐规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9—396页。今略作修改。

①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章；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载《民族研究》第5期；有吴光耀：《为李继迁辩》，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还有不少学者撰文亦持这一观点。

受尽了宋朝官府和汉族地主等施加的种种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这种结论是否反映历史的真实？

自唐中叶以来，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藩镇割据的出现，中央集权制度遭到了破坏，中央王朝的政令对于边镇将帅失去了约束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五代末。这一段时间，军阀割据，政治黑暗，正如唐人郑处晦言：“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尘坌荡涌，乘艰难际，盗据河右”。[①]割据者想的只是攫取财富，抢夺地盘，哪有工夫顾得上讲民族政策。他们知道的是从周边民族那里抢羊夺马，他们懂得的是加紧对周边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唐宋、五代时，党项族就基本上享受着这种政治待遇。元和元年，唐相杜佑云：

> 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羊马，或取其子女，赇其衣物，征为徒役，嗟怨既多，叛亡遂起。[②]

《李文公集》载：

> 党项千余落以畜牛羊马以代田业。先时，将帅多贪，至有盗其善马者，蕃落成怨，走以出他境。[③]

至五代末，此况仍不见好转。《新五代史》卷74载：

> 广顺三年（953），庆州刺史郭彦钦贪其（党项）羊马，侵扰诸郊，独野鸡族强不可近，乃诬其族犯边。大祖遣使招慰之。野鸡族苦彦钦，不肯从命，太祖遣邠州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等讨之。建武勇于立功，不能通夷情，驰军击野鸡族，杀数百人。而喜玉、折思、杀牛三族闻建武等击破野鸡族，各以牛酒犒军，军士利其物，反劫掠之。[④]

---

①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800《邠州节度使厅记》。

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4《党项传》。

③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13《傅良弼神道碑》。

④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3。

但是，入宋以后，这种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明显得到了改变，这种改变并非宋代的统治者就比唐末五代统治者“善良”一些，而是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的历史条件迫使宋初的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前代王朝的民族政策。

唐末五代的统治者之所以推行民族压迫与民族镇压政策，因为他们着眼点在割据，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也不具备统一的条件。因此，周边民族关系的好坏对于他们是无所谓的。而刚刚建立的宋政权却不是这样，终太祖、太宗两代，他们所着手的事业基本是为了完成统一和巩固统一。在要求统一这一思想指导下，民族关系的好坏就是重要的大事了。当然，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民族思想有可能比不上唐太宗的民族思想。唐太宗认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这种平等的民族思想与他们李氏出于汉与鲜卑人的混血有关。）但从太祖、太宗两代实行的民族政策来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宋初建国，北有窥视中原的强邻契丹，南有秉节持旌的割据群雄，针对这种情况，宋太祖赵匡胤与谋臣赵普制订了一条“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即先削平关内群雄，然后兴师北伐，以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当时的西北地区都是一些裂土割据的民族政权，如沙州曹氏、甘州回鹘、凉州折逋氏、夏州李氏等。宋王朝必须全力投入消灭南方诸国和讨伐契丹北汉的斗争，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政权并无西顾之力。为了避免西北民族对宋边境的侵扰，为了西北边境的和平安定，因此，宋对西北各民族之政策主要是恩抚羁縻。其恩抚羁縻的具体实施手段有三 :

其一 : 许以世袭。《宋史·张方平传》载 :

> 帝（神宗）问祖宗御戎之要。对曰 : 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之酋豪，许之世袭。[②]

这就是不改变这些周边民族的实际领导权，使用他们的首领对周边民族

---

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8《唐纪》14。
② （元）脱脱 :《宋史》卷 318《张方平传》。

地区实行的羁縻统治，是一些不称羁縻州的羁縻州，如当时的夏州、灵州、府州、丰州都是如此。这些州郡的周边民族首领世代领有此地，而且不断受宋王朝的“恩命”，其中以夏州李氏受惠最多。建隆元年正月，宋祖受禅不久，宋朝政府不仅让夏州党项首领李彝兴仍居定难军节度使之职，仍袭西平王之位，而且加授太尉之官。[①]宋初职备三公者，唯宋开国元勋赵普与李彝兴二人；建隆三年，李彝兴贡马于宋，宋太祖“亲视攻玉为带”[②]赐与彝兴，夏州从彝兴直到继捧，均受宋廷之显爵高官，足见宋廷对夏州恩礼之隆。其他如灵州冯氏、府州折氏、丰州王氏亦复如此。

其二：施以恩惠。宋廷为了结欢于西北各族，常以种种恩惠施于部落，以求底宁边鄙。《长编》卷2载：

> 初，五代募民盗戎人马，官给其直，籍数以补战骑之缺。上欲敦信保境。戊戎，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由是，边方畏慕，不敢内侮。[③]

不仅禁边民盗戎马，所盗马尽还戎人，而且还下诏令优待卖马民族。《宋会要辑稿·兵》22载：

> （太平兴国六年）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内属戎人驱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④]

将帅入党项部落中盗劫羊马是唐末五代边镇中司空见惯之事，而宋初制定的“还马”与“买马”政策对于笼络西北民族之人心起到的作用是极大的。

灵州遭灾，宋廷拨粮粟以济，[⑤]对于内属戎人，首领则授以职、赐以俸，并世代承袭，百姓则免征徭赋，并给以闲田，以谋生业。[⑥]另外，只要边境民

---

① （元）脱脱：《宋史》卷1《太祖纪》1。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十月癸巳条。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3册《兵》22。
⑤ （元）脱脱：《宋史》卷5《太宗纪》2。
⑥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

族一有贡献，各种恩赏、赐赍就接踵而至，使边境民族多受其惠。

其三：各从宽宥。宋廷对于侵盗犯边的周边民族也不是采取镇压与屠杀的政策，而是以“宽宥”待之。党项、吐蕃自唐末五代以来，除建立凉州、夏州政权者外，还有许多互不统属的大小部落散居在宋陕西边塞之外，他们由于自然条件太差，经济比较落后，农耕畜牧无以为生，多是靠劫夺过日子，“不事生业，好为盗窃”。[①]特别是居于灵、庆之间的党项部落，则经常“犯边为盗”，[②]而且劫夺外国贡献，“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羊马”。[③]唐末、五代、宋初，莫不如此。但是，宋王朝对于这些“犯边为盗”、“好为盗窃”的散居部落并不是像唐末五代的统治者那样，一味地屠杀、镇压，而是“各从宽宥”，[④]以示怀柔。宋太宗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长编》卷 24 载：

> 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以化外视之（《宋史·吐蕃传》、《东都事略》、《太宗实录》均作“朕常以禽兽畜之”）。自唐室以来，颇有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傥加攘却，必须杀戮，所以置之度外，存而勿论也。[⑤]

这一段话很能代表太祖、太宗的民族思想，他们对于这些“颇为边患”的周边民族并不主张杀戮、攘却，并不主张以雄强并弱小，而是以“存而勿论”的态度处之。因此，在处理一些民族纠纷时，太祖、太宗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建隆三年，服属于夏州的吐蕃尚波于部为了夺取秦州采木场，杀伤宋方采木士卒，边将抓捕了吐蕃四十余人。宋太祖为此事十分生气，将捕人者秦州知州高防撤职，并将被捕人全部释放，为了安辑部落，还命令使者以锦衣银带赐予部落酋长；[⑥]开宝元年（968），党项直荡族啜佶勾引北汉军队进攻宋府州，兵败投降，不但不杀，还授啜佶以怀化将军之职；太平兴国二年

---

①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 29《党项羌》。
②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 138《党项传》。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4《四夷附录》3。
④ （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 240《安抚秦州蕃部尚波于诏》。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 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庚午条。案：有人引这一段材料时，只引至“朕常以禽兽畜之”止，断章取义。使一条本来是很能说明宋太宗民族思想的材料，变成了一条民族歧视的材料。
⑥ （元）脱脱：《宋史》卷 257《吴廷祚传》、卷 270《高防传》、卷 492《吐蕃传》。

(977)，灵州党项部落劫夺宋朝马纲，部送官员张全操扑杀了十八名抢劫的党项人，宋太宗亲自下诏，将张全操打入狱，并流放于沙门岛，还派人携带金帛到党项部落中抚慰，[①]以此感化党项部族。

宋王朝的这一系列作法，都是宋对西北民族“当以绥怀为务”[②]的恩抚羁縻政策的具体表现，为了避免“引惹边事不和”,[③]为了对西北各族“服其心而羁縻之”,[④]宋王朝对西北各族确实是做到了“宽厚待人”，根本没有“顽固地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那么，宋对党项民族有没有民族压迫的现象呢？这一点，不能说是绝对没有的，如宋太祖时知原州王彦升，这是一位贪残暴虐之徒。据《宋史·王彦升传》载：

> 西人有犯汉法者，彦升不加刑，招僚尉饮宴，引所犯以手捽断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体，股栗不敢动。前后招者数百人。[⑤]

这确实是极为残暴的野蛮手段。但是，必须分析，这种现象是个别还是普遍，[⑥]是现象还是本质。不能因为偌大一个宋王朝出了一位王彦升，就将宋王朝的民族政策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分析，必将导致错误的结论。罗列一般的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却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起完全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实都有它的个别情况。

宋初的两位皇帝在人才的择用上是有眼光的，特别是对西北边帅的择用，他们十分慎重。例如，曹翰是宋初诸将中一位有勇有谋的将军，由于他为人暴虐，破江州时曾大肆屠城，因此，他虽然屡进边略，但宋廷却不以边

① 以上二事均见《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266《温仲舒传》。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4。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建隆三年五月条吴广成按语。
⑤ （元）脱脱：《宋史》卷250《王彦升传》。
⑥ 有人为了要说明李继迁反宋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而将五代对党项的压迫、宋对吐蕃的压迫及李继迁反宋以后出现的民族纠纷纳入，统统称作宋对党项的压迫，这种不分时间、不分民族，统而言之的论述，恐怕会有问题。参阅拙稿《〈宋夏关系略论〉一文引用史料上的问题》，原署名“沙人”，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帅委之。[①]就是前面所说的王彦升，虽为宋开国立有大功，但太祖因其暴虐，一直并不很重用。[②]太祖、太宗两朝所任边帅大都是经他们亲自挑选的。这些边帅，不仅智勇双全，而且多以谨厚治边，绝不滋扰生事。因此，政绩颇多，为西北各族所欢迎。下面，仅以几例示之：

侯延广："先是（太宗时），延广知灵州，部下严整，戎人悦服"。[③]

慕容德丰："大平兴国二年知庆州……居任九年，以简静为治，边镇安之"。[④]

郭守文："太平兴国初，秦州内附，蕃部骚动，命守文乘传抚谕，西夏悦伏"。[⑤]

段思恭："（大祖时）思恭代知（灵）州，……绥抚夷落，访求民病，悉条奏免之"。[⑥]

董遵诲："乾德六年，召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刲羊洒酒，宴犒甚至，众皆悦服"。[⑦]

太祖、太宗两朝像这样的西北边臣还有一批，像赵赞、温仲舒、李汉超、贺惟忠、刘熙古、何继筠、姚内斌、侯赟、翟守素、郭密、宋铛等。[⑧]他们都能比较认真地执行和贯彻宋政府对西北民族恩抚羁縻的方针，为缓和民族矛盾、安定西北边境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故范镇言："宋初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⑨]

由于宋王朝恩抚羁縻政策的推行，宋与西北各族的关系在李继迁反宋之前是基本友好的，有些党项、吐蕃部落虽对宋王朝有过寇掠侵扰，在宋怀柔宽宥政策的感化下，多归化内附，有些部落献土纳地，主动要求为宋王朝捍边，成为宋朝保卫西北边境的藩篱。夏州政权在西北诸蕃中实力最强，五代

① （元）脱脱：《宋史》卷260《曹翰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250《王彦升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254《侯延广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251《慕容德丰传》。
⑤ （元）脱脱：《宋史》卷259《郭守文传》。
⑥ （元）脱脱：《宋史》卷270《段思恭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273《董遵诲传》。
⑧ 以上诸人的西北治绩均见《宋史》本传。
⑨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4。

时，不仅对中原朝廷素怀“轻傲之志”，[①]而且还有觊觎中原、牧马南下的野心。入宋以后，由于宋王朝恩抚羁縻政策的推行，宋夏关系极为友好，在李继迁反宋以前，不仅双方和平无事，而且夏州政权还常以宋朝急需的战马入贡，在李光睿与李继筠时期，夏州还以军队援助宋朝对北汉的战争。故《李光睿墓志铭》称光睿：“上遵皇化，下抚黔民；事君有理，执法无私。”《李继筠墓志铭》称继筠：“上事明君，下安赤子。”[②]从太祖开国至李继迁反宋，其间二十余年，宋王朝西北边境并无大的纷扰战事，这不能不说是宋王朝西北御边之策的成功。这种和平的环境，宋与夏州、宋与吐蕃、党项之间的友好关系亦可说明，宋对西北各族推行的不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二

从宋王朝的民族政策中可以看出，宋王朝对于党项民族并没有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那么，对于宋收回银夏五州之地又应作何解释，这种行动是不是对党项民族的压迫？有人认为，宋收银夏五州是“乘人之危，施展阴谋，用巧取豪夺的手段，破坏宋夏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评价仍然是不中肯的，也与事实相违。

银夏五州，自李思恭起就成为党项李氏家族的世袭之地，（拓跋部徙居银夏最早可追溯至唐高宗仪凤年间的拓跋立伽内属）[③]一直是定难军的地盘。五代时，中原虽经八姓十三君的剧变，而西土却已服属李氏家族逾百年，直到继捧之前，李氏政权一直比较稳定。李继筠死后，儿子太小，不得嗣位，于是，李继捧以季弟的身份承袭了定难军之职。这种行为违反了党项族内传统的承袭制度，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宗族多不协”。[④]李克远、克顺兄弟同时起兵讨继捧；李克文上书宋廷，认为李继捧不当承袭。李继捧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宗族携贰，诸父昆弟多相怨”，[⑤]夏州统治集团处于分崩离析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乾祐二年二月条。

②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载《西夏学》第1辑,2006年;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载《唐研究》第8卷，2002年。

③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大平兴国六年八月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之状。在这种情况下，李继捧才决定内附，并献银夏五州之地。宋朝并没有动用一兵一卒，愿意内附的夏州统治者主动纳献银夏五州之地，这怎么能说是“巧取豪夺”呢？边裔民族在本民族处于危困之时向中原王朝归附，不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吗？西汉的呼韩邪，东汉的南匈奴，唐代的东突厥，不都是和李继捧一样率族归附吗？唐太宗时，党项归附，吐谷浑归附，白狗羌归附，其地不也是被唐收回而置羁縻州吗？难道那也是“巧取豪夺”？余以为，不论是从历史的眼光还是站在当时立场上看，周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归附只能说是一件大好事，而不是坏事。

首先，对于交战的双方，归附就意味着停止战争，对于不曾发生战争的双方，归附那就说明和平有了更可靠的保证，双方都可以在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发展生产，双方人民都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次，边裔民族内附以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它将更多地、更广泛地接受先进汉文化的影响，影响的结果，势必更快地促使边裔民族走上封建文明的轨道。

再次，少数民族内附，必然与汉族及其境内其他各族人民进行更多的接触，必然与汉族及境内其他民族联系得到加强。这样，势必促进民族间的团结，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发展。李继捧献五州之地与宋太宗收五州之地都是在做这样一件好事，而且是在不采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和平进行的。对于这样一件大好事，有什么理由横加指责呢？呼韩邪单于的归汉，使濒临绝境的匈奴族以转生机；南匈奴的归汉，使匈奴五部逐渐走上了封建文明；东突厥的归唐，使归附的突厥族与汉族和其他各族逐渐融合；党项族的归唐，使其部落得到更迅速的发展。这些难道不是历史事实？不也是曾得到大家一致承认的民族友好关系的佳话？为什么到宋代，这样的归附就被称作“民族压迫”，甚至称作“巧取豪夺”？这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还必须注意一点，李继捧献五州之地与宋太宗收五州之地，是与当时历史潮流相吻合的。当时的历史潮流是什么？在宋开国到李继捧献五州之地这一段时间内，统一是当时的潮流。赵匡胤虽然夺取了后周政权，但他却继承了周世宗的遗志，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大业，宋的统一事业经太祖太宗两代才基本完成，太祖铲平了南平、荆楚、后蜀、南汉、南唐诸国，太宗又

收回了吴越及泉漳二州，最后平定了北汉，宋太宗收回银夏五州之地也正是处在这一统一过程中，宋太宗收回银夏五州之地的行动与削平其他诸侯国的步骤完全一致。银夏五州割据的出现，是唐末五代混乱的政治局面所造成的，随着五代十国纷争割据混乱局面的结束，收回银夏五州也必然会成为统一的要求。在统一的大势所趋之下，吴越及泉、漳二州不也是主动献土归宋吗？宋收吴越，收泉、漳二州，任何一本教科书都称之为统一，为什么和钱俶、陈洪进一样献土归宋的李继捧的行动却没有人承认这是统一呢？很明显，这些先生看待民族问题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说话，而不是将这些民族问题放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对于民族问题应该以全国范围为标准，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标准，应该从中国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上作具体分析。因此，应该看到，夏州割据政权的早日结束，宋的统一更快完成，是历史的进步，是促进中国封建生产力向前飞跃发展的历史前提，是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大好事。汉武帝讨击匈奴，置河西四郡，从而打通了中西交通的孔道，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导致了河西地区的繁荣；唐太宗平定高昌，置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从而完成了西域地区与祖国内地重新统一的伟大事业，同时也促进了西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宋王朝也是一样，中原地区的统一已基本完成，社会生产向上发展，历史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在当时它是中国境内先进民族和进步生产力代表，而夏州政权所管辖的地区还没有完全跨进封建文明的门槛，生产力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宋王朝。宋收回银夏五州，将银夏五州纳入宋中央政府管辖的郡县之中，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统一，而且，宋王朝的先进生产方式，高度的封建文明势必会影响这些周边民族地区，也必然会促进这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将会把这些地方长期保留的野蛮落后的东西卷进封建文明的漩涡。只有完成这种统一，才会出现这种奇迹。汉唐的武装统一尚值得赞颂，宋太宗这种不诉诸任何暴力而进行的统一何尝不值得称道？如果把这种统一视之为“巧取豪夺”，或者称之为“民族压迫”，那历史上任何统一也就无法进行正确的解释了。

再进一步说，如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宋王朝不接受李继捧献纳的银夏五州，那又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余以为，那只会导致夏州统治集团内部更大的混乱，同室操戈，骨肉相残。按党项之习俗，“为首领者，父死子

继，兄死弟袭”。[1]李继筠死后，其子未立，而其弟继捧却立，这样做是与党项族内宗法制度相违背的。因此，继立的李继捧并没有得到李氏家族的承认，他们纷纷起兵反抗。李克远、李克顺兄弟率兵袭击夏州，李克文又宣布不承认李继捧的承袭，夏州的党项族也发生变乱。李继捧虽然镇压了克远、克顺兄弟的反抗，然仇怨却更为加深，“诸父昆弟多相怨”，李继捧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完全束手无策。如果没有宋王朝的出面，这一场夏州政权内部的残杀绝不会停止，甚至会越演越烈，匈奴“五单于之争”的局面就会在夏州政权内重现。据此，余以为，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宋收银夏五州之地是一件好事，收回银夏五州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不能说是民族压迫，而应说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宋王朝的行动拯救了夏州党项民族，这应该是历史的真实。

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战争；二是统一与割据的战争；三是割据者之间的战争。第一类与第三类的战争性质是很明了的，第二类战争的性质就比较复杂，既有正义的统一战争，又有非正义的割据战争，这就要分清谁是统一者，谁是割据者了。前面已经证明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并不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因此，它不应属于第一类，而应属于第二类，即李继迁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正义割据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应该给予否定。

首先，看一看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李继迁反宋战争的导火线，就是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李继捧以银夏五州纳献于宋的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刚刚建立的宋王朝结束割据、统一全国必然要走的一步。而党项李氏家族却是当时夏州的一位割据者，他们经唐末五代一百多年时间的发展，已经拥有一定的割据力量。唐末五代时，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但王其土久矣”。[2]入宋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宋对全国的统一已成了必然趋势，许多割据者都看到

---

①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显德六年七月条。

了这一点。南汉廷臣邵廷琄多次对南汉主刘𬬮说：

> 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今闻真主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①]

夏州统治集团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积极地向宋王朝靠拢，不断地向宋王朝进贡以求得宋王朝的册封，甚至派出军队配合宋王朝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夏州政权已有归附向化之心。开宝五年（972），夏州李光睿听到宋太祖收诸节镇兵权时，就主动要求罢镇入朝。[②]银夏之地自汉以来，一直就是中原王朝的郡县，这一地区不仅居住着各种部落民族，而且也居住着大量的汉人。唐宋五代以来，虽然李氏家族统治已有百余年，但随着宋王朝对全国统一的基本完成，银夏五州人民渴望统一之心必然萌生，李光睿开宝五年的要求和李继捧太平兴国七年的行动，正代表了银夏五州人民及一部分夏州统治者要求统一的心愿。然而，任何时候总会有进步与反进步、正义与反正义的斗争存在。统一，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潮流，统一，固然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夏州集团中一部分统治者，他们总觉得割据比统一强，统一，寄人篱下，为人之臣，而割据，则独占一方，称王称霸。从这一角度出发，要舍弃“王霸之基”当然是不心甘情愿的。李继迁的反宋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

其次，必须知道这场战争是由哪些阶级发动的。首先看看发动这场战争的是不是党项族人民。自宋建国以后，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胜利，国力一天天强盛。由于中原王朝的国力强盛，周边少数民族内附者日益增多，党项部落内附者更多。《武经总要前集》卷18载：

> 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款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陕西则秦陇、渭原、环庆、鄜延四路，河东则石隰、麟府二路（还不包括灵州的内附党项），……凡四路总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八月戊子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开宝五年三月条。

六百七族，十五万五千六百人。[①]

可见，党项人民是愿意归附的，而且数量不小。李继捧归宋时，党项人民的态度是怎样？《西夏书事》卷3载：

自夏州归顺，蕃部酋豪乐于内附者凡二百七十余人，种族五万余帐，十年以来戎人所掠生口、牛羊数万计，悉还其主。[②]

一帐为一户，一户以五人计，归宋者达二十五万人。如以十口计，则为五十万人。[③]不仅乐于归附，而且还将以前抢劫得来的人口、牲畜归还宋王朝，足见归顺之心是诚恳的。再联系太平兴国七年银州党项拓跋遇部要求移居内地之事，[④]都可证明党项人民要求内附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这种“乐于内附”的行动正是党项人民希望统一的明证。因此，发动反宋战争的绝不可能是党项人民，而是夏州集团中一部分顽固坚持要走割据道路的党项贵族。

从李继迁反宋初期的领导结构来看，主要都是党项族内的一些大姓豪右及依附于夏州政权的汉人。其中有李氏（拓跋氏），像李继迁、李继冲、李

①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陕西路》。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条。按：（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系此事于雍熙元年三月丁巳条，又称“种族五百帐”。（宋）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29作“三五万帐”。今从吴广成说。

③ 人们往往以党项部落一户五口计，其实蕃部一户人口往往大于五口。（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之《言行拾遗事录》3《西夏本末》：“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廷夫，将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三石”。“又牒种世衔相度逐户口数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贷禄粟各一石，十口以上三石”。可见，当时对蕃部每家人口估算之中数是十口，而不是五口。也就是说宋代蕃族一帐的人口平均数应是十人。

④ 关于银州蕃落拓跋遇要求移居内地这一条材料，很多学者都在引用。但奇怪的是，很多学者都以这一条资料来证明宋对党项部落的奴役和剥削。余引原文并加以考辨。《宋史·党项传》：“（太平兴国）七年，……又银州羌部拓跋遇来诉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诏令各守族帐”。先看这条材料的时间。《宋史·党项传》注明是太平兴国七年，并未注明月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也只是说太平兴国七年，并不知月日，故附于岁末。我们知道，李继捧献银夏五州时在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六月乙亥，李继迁才从银州退往地斤泽，就算拓跋遇要求迁往内地的时间是七年十二月，那宋王朝进入银州也只有半年时间。半年时间的统治就能使银州蕃落感到“赋役苛虐”？既然是宋统治银州加重了党项部落的赋役，那为什么党项部落还要求迁往内地呢？岂不是“偏向虎口行”吗？这条材料明明是拓跋遇在诉夏州政权残暴统治之苦，而学者们却移花接木地转嫁到宋王朝头上，于理不公。

继瑗、李廷信、李光祐、李光允等,[①]他们是夏州统治集团中最不愿意统一的一部分，李氏家族独霸西土是他们永远光荣的梦想。因此，由他们发动和领导了这次反宋战争；还有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几个党项大姓，如罔氏、卫慕氏、野利氏。罔氏、卫慕氏是李继迁的母族，野利氏是李继迁的妻族,[②]李氏家族通过政治联姻拉拢党项大族，他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宋战争的领导核心。此外，参加反宋战争的还有党项大姓折氏、破丑氏、嵬悉氏[③]及依附夏州政权的汉人张浦、刘仁谦等。《太平治迹统类》卷2载：

> 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豪，凡数年，渐已强盛。[④]

《西夏书事》卷3称李继迁：

> 联络豪右，卷甲重来。[⑤]

可见，发动反宋战争的主要力量就是党项族内的强宗大姓，而且都是一些顽固、保守、落后的部落酋长。在这些原始落后的党项族部落中，酋长在各自部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部落内，他可以对任何一个部落成员进行奴役、压迫；在部落外，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对外族外部进行抢劫和杀

---

① 李光祐、李光允是继迁的上一辈，继迁叛宋后封为团练使；继冲、继瑗及廷信均是继迁兄弟辈（廷信为从兄弟），见《西夏书事》卷4及《宋史·夏国传》。

② 罔氏，继迁诸母之一，继迁、元昊、乾顺均娶罔氏，《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年二月条："罔氏，西夏大族"。卫慕氏，继迁之母，德明亦娶卫幕氏。关于继迁生母之事有二说，《西夏书事》卷3乾德元年二月条："（李光曮）与妻罔氏游无定河生继迁"；同书卷六咸平元年四月条："封保吉母卫慕氏卫国太夫人"。保吉即宋赐继迁名。《西夏书事》卷6至道二年八月条中的"未慕军主"当即参加反宋战争的卫慕族人；《西夏书事》卷8景德元年五月条："卫慕氏，银州大族"。至于野利氏则是更为著名早期党项八部之一,《宋史》卷264《宋琪传》称"南山野利",《宋史》卷276《尹宪传》有"南山野狸十族"之称，可知野利族为大族，居鄜延以北之"南山",《西夏书事》卷4雍熙元年十二月条："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继迁）"。元昊亦娶野利氏。

③ 当时的党项折氏亦分两派，一派是府州折氏附宋，一派是麟州折氏附李继迁。据《西夏书事》卷4继迁有"并州刺史折八军，代州刺史折罗遇，丰州刺史折御乜"。破丑氏，《新唐书·党项传》称其居庆州，其酋豪破丑重遇贵为继迁"蕃部都指挥使"。破丑氏也是常与李氏家族联姻的党项大族。（参见前说）嵬悉氏，上引书则有"麟州刺史嵬悉咩"及继迁亲信酋长"嵬（悉）罗、嵬悉俄"。

④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太宗经制西夏》。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太平兴国七年六月条。

戮。处于这一社会阶段的党项族内的强宗大姓，当然对统一是不感兴趣的，而把他们全部纳入到宋中央政府及郡县的管辖之下则更使他们反感，因此，他们便十分自然地同李氏家族中一心要搞割据的顽固派勾结起来，组成了他们神圣的反宋同盟，发动和进行了一场反对宋王朝收回银夏五州的割据战争。而大部分党项部民的反宋则是处于这些部落贵族的胁迫之下，正如时人杨亿所言："贼迁睢盱边塞之外，胁制诸羌……致蕃夷之服从，用凶威而驱迫"。[①]

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李继迁究竟是为什么而战，也就是说，李继迁发动反宋战争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李继迁在发动反宋战争前曾对其亲信张浦讲过这么一段话：

> 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②]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指明了李继迁发动反宋战争的政治目的，他就是恋恋不忘这一块割据了"逾三百年"的土地，他仍然怀念"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的割据威风。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恢复割据。恢复他们李氏家族对银夏五州的世代统治。他曾对那些拥护他的党项豪右们说：

> 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③]

很清楚，李继迁发动反宋战争就是为了恢复割据而进行的。为恢复割据，在二十二年中，他先后向宋朝发动了五十多次战争。[④]几乎从未放弃任何一个寇掠和骚扰北宋边境的机会，东起麟府，西至灵凉，沿边诸州都是李继迁进攻的目标，攻城破寨，掳掠一空，侵掠居民，焚烧积聚，不仅沿边人民

---

①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16《议夏州事宜状》。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太平兴国七年六月条。如果从《拓跋寂墓志》中记录的仪凤年（677）拓跋立伽迁入银州算起，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反宋，拓跋部李氏家族进入银夏之地实为三百余年。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治迹统类》、《东都事略》、《西夏书事》等书统计的大约数。

和蕃部无法进行生产，就是住在银州、夏州、会州、绥州、凉州、镇戎军这样的大镇之中的居民，也经常遭受李继迁军队的屠戮。尹洙言："继迁盗起，灵、夏四州，常严兵戍，寨民困于馈挽"。[①]至道二年，光死于李继迁军队兵戈之下的宋朝运粮百姓就达十余万人。[②]这场战争不仅给宋朝人民带来了灾难，连年的战争也耗尽了党项人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本来经济不很发达的党项族在战争的摧残下，"蕃落数年荐饥，道殣相望"，以致"贼境窘，惟劫掠以济"。[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李继迁的反宋战争的结果，给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带来了利益，就是他们的割据终于成了事实，也可以说，他们赢得了这场割据战争的胜利。然而，这一场战争却没有给双方人民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死亡。余以为，李继迁发动的这一场割据战争是一场不义战争，应受到历史的唾弃。

四

问题讨论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但是，人们很可能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既然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被否定，那李继迁这个人物又应该怎样进行评价？

民族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问题不仅要牵涉到对立民族的两个方面，而且还有某一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以及局部民族发展形势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余否定李继迁的反宋战争是着眼于全局来评价的，是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上所作的具体分析。但是，彻底否定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李继迁这个人，因为从党项民族的发展壮大及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两点来看，李继迁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由于他一生坚持不懈的努力，把原来散居在陕西塞外互不统属的党项部落拧成了一个整体；由于他领导的割据战争的胜利，使这个整体有了发展壮大的条件，而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国家的建立就是这个整体发展的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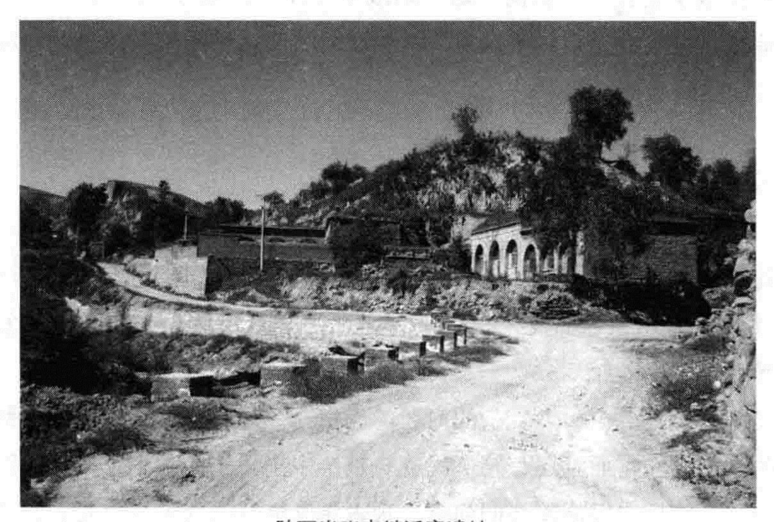
---

①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 23《议攻守》。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1 至道三年七月丙寅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4 咸平六年五月壬子条。

果。因此，余以为，确定战争性质与评价这场战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是一回事，元灭南宋，余以为是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然而，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对元进攻南宋的英勇抵抗和宁死不屈，却又是值得赞颂的民族英雄的行为；匈奴冒顿单于对西汉边境的不断进攻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然而，冒顿单于对于匈奴各部的统一及匈奴政权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贡献，是匈奴族内的民族英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评价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与评价李继迁这个人物，既不能因李继迁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对他领导的反宋战争盲目肯定，又不能因为他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割据战争而全盘否定李继迁这个人，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陕西米脂李继迁寨遗址

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述论 *

一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李继迁死于凉州战役。这位野心勃勃的党项族领袖在临死前对其子李德明讲了这么一段话："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①]继迁的遗嘱对年轻的夏州首领德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衡割据与内属的利弊，富有远见卓识的李德明三年后毅然进表降宋，宋夏之间大规模战事暂告结束，在宋夏关系上，出现一段不可多得的短暂和平。经李德明三十年的惨淡经营，西夏不仅在疆土上获得了较继迁时代更大的发展，而且在对内发展生产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如范仲淹所言："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驼马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甲胄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年"。[②]西夏社会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德明的内附换来了三十年的宋夏和平，兵氛消失，边陲撤警。在这一和平的温床上，宋夏双方的统治者在做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梦：赵家天子与群臣们认为，德明归附朝廷，宋赐以同姓，待之以骨肉，封之以夏王，恩倍隆厚，西夏就会忠顺朝廷，始终如一，而天下也就平安了。然而，西夏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并不是成为宋王朝的属藩，德明表面上虽对宋称臣，但只要避开

---

*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所论文集》，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主编，1985 年。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8 景德元年正月条；（元）脱脱：《宋史》卷 282《向敏中传》。（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33《辽夏》5《上仁宗乞因郊里肆赦招怀西贼》为："尔当倾心归顺朝廷，如一两表未蒙开纳，但连上封章，以析见听"。

②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上册《范文正公集》卷 10《答赵元昊书》。

宋之耳目，也就“自帝其国”。[①]正如范仲淹所言：“德明外示纳款，内实养谋”。[②]实际上，李继迁所制订的反宋建夏的基本方针到德明时期不但没有摈弃，反而更加迅速地付诸实行，只是在“称臣”的幌子下更隐蔽地进行而已。

元昊继位后，一方面，他继续领导完成了西夏对河西地区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其辖境内进行了各种制度的改造和创新，特别是一整套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制度的创立，对西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公开称帝，建立大夏国的条件成熟了，西夏统治者再也不想当帷幕后的天子，“称王则不喜，称帝则是从”，“伏愿一垓之地土，建为万乘之邦家”，[③]他们赤裸裸地向宋王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景祐三年（1036），元昊自建年号称“大庆”，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宣布称帝，“僭号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称“大夏”。当元昊要求册封的使者到达汴京，朝野震惊，不知所措，但一些盲目自大的宰臣枢密如张士逊、章得象、陈执中、张观辈都说“小羌不足忧”，[④]并建议出师讨伐。元昊为了让自己称帝建国的行动得到宋王朝的认可，恃仗国内雄厚的军事力量，对宋边境以武力相要挟，“点其军作五头项，每头项作八溜，共四十溜。胁降熟户，悉坏沿边篱落，七百里中兵烽不绝”。[⑤]西夏的军事行动固然能吓住一部分宋朝边臣将吏，但是，以堂堂大国自居的宋廷绝不会连起码的脸面都不顾去承认元昊的称帝建国。宋仁宗不仅下诏剥夺元昊所封之官爵，撤销赐姓，而且出重赏捕杀元昊。为了准备应付西夏的军事行动，于宝元元年十二月，以夏竦为泾原、秦凤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安抚使，在陕西四路进行了粗具规模的备战。双方对峙，剑拔弩张，从宝元元年开始，直至庆历四年（1044），宋夏之间又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战争，其中主要内容就是著名的三川口、[⑥]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

在三川口战役以前，双方冲突已经发生，宝元二年（1039）六月，夏人

---

①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30《夏元昊拒命》。

②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5《上仁宗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

⑥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11《考迹》：“三川水在鄜州南，以华池水、黑源水、洛水同会，谓之三川。”今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永兴军路》将三川口标在延州稍处，与上述不合。

犯保安军及永平寨，被守将卢守勤和许怀德击走，狄青在这一场卫边战役中立功最多；十二月，宋环庆钤辖高继隆、知庆州张崇俊领兵入夏境，攻拔后桥堡。元昊在这几场小冲突中作了四种准备工作，一是以小部队进犯宋境，激怒宋军，让宋军进行反攻，“不欲曲之在己”；[①]二是派使者到延州议和，但故意使用傲慢之辞并提出宋不能答应的条件，让宋方担当破坏和平的责任，以求自己师出有名；[②]三是在交战中故意丢下大量的“拙钝不堪用”的攻城器械，麻痹宋军，并以小败而骄其军，“盖欲边将见之，疏其备也”。[③]四是用重金高官收买沿边蕃族，如刘怀忠、李士彬及东茭、万刘诸族，以破坏宋边防之藩篱。[④]果然，延帅范雍中计，以为“羌真小而怯也”。于是，“屡遣稗校率兵纵掠”。[⑤]这正好给了元昊对宋进攻的借口，一面派人下书谴责宋军先犯夏境，一面大量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宋陕西重镇延州，三川口之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康定元年（1040）正月，范雍听到了夏军准备进攻延州的消息，十分恐慌，当时延州“地阔而寨栅疏远，士兵寡弱又无宿将”，[⑥]范雍急奏朝廷请兵支援。元昊为了麻痹范雍，一面遣使至延州假作议和，一面又声东击西诈攻保安军，“好谋而少成”[⑦]的范雍根本就搞不清元昊的意图，急忙派庆州守将刘平、延州守将石元孙率军三万驰赴保安军救援，当刘、石二将到达土门（延州塞门寨）时，元昊主力早已至延州北面的金明寨。金明是延州北面的大寨，下属有三十六小寨，有十万蕃兵守御，寨主是党项酋领李继周之子李士彬，号“铁壁相公”。[⑧]金明虽有十万蕃兵，但范雍却令士彬分兵御守三十六寨，因此，各寨防守力量十分薄弱。李士彬“贪而无智”，且“驭下严”，[⑨]当元昊大军进抵金明时，分兵把守的蕃兵无法抵抗，纷纷投降，并将李士彬父

---

①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3宝元二年闰十二月条：“元昊遣供备库使毛迎啜己至鄜延境上，赍表请和，辞甚悖慢，中国不从，遂激众曰：吾求罢兵而南朝不许，奈何。于是众怒。”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3宝元二年十月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350《刘绍能传》、卷290《夏随传》、卷323《赵振传》。

⑤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⑥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⑦ （元）脱脱：《宋史》卷288《范雍传》。

⑧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元）脱脱：《宋史》卷253《李继周传》。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3宝元二年十月条。

子活捉，献予元昊，金明三十余寨尽破，延州被围。范雍又召刘平、石元孙返救延州，刘平轻敌，不了解敌人情况，就率轻骑八千余昼夜兼程地赶赴延州救援，夜至延州西南面的三川口，还没来得及休息，就与夏军相遇，宋将郭遵、王信奋勇杀敌，夏军“委老弱及牛马以饵之”。[①]宋军为了抢功，顿时阵脚大乱，元昊以十万精骑将刘、石二军团团围困。当时宋军不满三万，又进入夏人的埋伏圈，刘平虽率众尽力拼杀，“以疲兵几千敌十余万”，[②]大败，刘平、石元孙皆被执生俘。如果不是一场及时大雪，夏军畏寒撤军，延州定破无疑。延州三川口之战，宋方不仅损失了刘、石二员大将和金明诸寨，重要的是，这一仗是元昊僭号称帝后的第一次大仗，宋军惨败，使宋方人心浮动，军心沮丧，正如田况所言：“自尔贼势雄张，官军慑矣”。[③]

三川口的惨败，不仅震动了骄矜轻敌的宋朝统治集团，而且也激怒了宋朝的边防将帅。这时宋政府对陕西边帅人选进行了调整，以庞籍、范仲淹、韩琦、王沿四人分统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韩琦负责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韩、范二人的战略主张虽有所不同，但为了对三川口之战进行报复，韩、范都同时派出所辖军队向西夏出击。康定元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及庆历元年（1041）正月，宋边将向夏境之白豹城、夏州、遮鹿寨、十二盘、威福军等地发动了连续的进攻，焚城毁舍，掳掠人畜，[④]但由于夏界边防守备甚严，宋军入界“所获无几，陷没极多”，就是所谓有功的任福、刘谦、高继嵩等，也不过是“杀戮老弱以增首级”[⑤]而已。

元昊三川口胜利以后，又乘胜夺取了宋塞门、安远诸寨及乾沟、乾河、赵福等堡，在康定元年八、九、十三个月，先后又对延州之金明寨、青涧城、镇戎军的三川寨发动了几次进攻，双方展开了拉锯式的攻掠战。在这不停的小规模战争中，元昊又准备了对宋边境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

庆历元年二月，元昊一面在夏境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准备“聚兵一路”，“择利进兵”，而另一方面却先后派出使者至延州范仲淹处、泾州韩琦处请和，以图再次麻痹宋边帅。韩琦毕竟老练，识破了元昊的狡计，并令沿边戒

①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③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4《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④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卷323《马怀德传》、卷323《范恪传》。
⑤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4《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严，自己亲自巡边。果然，当韩琦巡至高平时，元昊大军已进入渭州境内的怀远城，韩琦闻讯，尽发镇戎军的守兵，“又募敢勇四万八千人”[①]交付大将任福。临行时，韩琦面授方略，一再申令，必须持重，“度势宋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邀击之”。任福并未以韩琦话为重，恃勇轻进，自率精骑数千直驱怀远城，至张家堡，与夏军相遇交锋，夏军遗弃牛羊马驼无数，伪装败逃，宋军紧追不舍，这时，元昊早以十万精骑埋伏于好水川口。宋军赶至好水川时，“人马已乏食三日”，[②]而这时的谍报者侦察到的情况是“敌兵少”，这就更使任福轻敌。第二天，任福率军循好水川[③]西进至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只有五里之地。宋军已入绝境，才知是中了夏人的诱敌之计，正准备退兵，这时，西夏军队“发伏自山背下击”，宋军“士卒多堕崖堑相覆压”[④]，“任福、桑怿、朱观、武英等将虽奋死拼搏，无奈身陷重围，众寡不敌，终于全军覆没。这一仗，宋指挥使将佐死者十五人，军员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余人，亡马一千三百匹，杀虏民五千九百余口、熟户一千四百余口”。[⑤]史臣于《任福传》末评曰：“元昊倾国入寇，福临敌受命，所统皆非素抚之兵，既又分出趋利，故至于甚败”。[⑥]这种评价并不正确，其实，任福之败，一败于元昊之诡谲，二败于宋将之骄矜，“所统皆非素抚之兵”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好水川这一仗打得宋军人人胆寒，宋政府在又一次惨败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放弃主动进攻西夏的念头，改为全面防守，仁宗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⑦]西夏统治者在连连传捷的胜利面前更加猖狂骄慢，宋使者至西夏，元昊拒而不见，回书宋廷，用词极为不逊。不仅如此，元昊侵宋掠边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庆历元年（1041）到庆历三年，西夏兵事几月月不息，东起麟、府，西至仪、秦，宋边境无一处不遭夏军攻掠，除张亢、张岊、王吉、折继闵等宋将曾稍挫元昊兵锋外，沿边城寨

---

①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
③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11《考迹》：“好水川在隆德县西二里，其源出自六盘山，西与若水合。”
④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
⑤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⑥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
⑦ （元）脱脱：《宋史》卷11《仁宗纪》。

多被夏兵焚毁，庆历元年八月，河东重镇丰州也被西夏攻占，宋夏战争一步一步走向了高峰，一年之后，西夏对宋又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

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在其中书令张元的怂恿之下，率领十万精骑，准备从镇戎军入而直驱关中，给宋王朝打一个措手不及。夏军分东西二道，一出刘璠堡，一出彭阳城，大兵直向镇戎军来，知渭州王沿令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兵七万赴援，刘贺以三万兵从行，葛怀敏并不接受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分兵四路，直驱定川寨。当时泾原路都监还曾劝说葛怀敏，不要轻进，恐途中有伏。果然，一入定川，夏军“蹑其后，为方阵而行，及沟上，寇分二道，自两旁截之，军断为三”。夏军又“毁板桥，断其归路”，“绝定川水泉上流，以饥渴其众”，[1]宋军陷入了西夏十万大军的重围之中，除后军未进入包围圈得以脱免外，中军全歼，前军损失十之七八。葛怀敏突围走，至长城壕，路已断，夏军从四面猛攻，葛怀敏及将校十四人均战死，剩下九千多士兵与六百匹马全为夏军所获。于是，元昊率军长驱直入，从镇戎军到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2]扬长而去。这一仗比前二仗败得更惨，“郭（葛）怀敏陷于定川，偏将以下获全者鲜，皆举军败覆，穷蹙奔溃，诚可痛也。当刘平之战也，尚斩馘千余级，任福亦伤夷敌人数百，至怀敏则束手就殪，如投陷井焉”。[3]当消息传到京城，宰相吕夷简长叹息说：“一战不及一战吁！可骇也。”[4]

西夏三战的胜利，使元昊兴奋到了极点，命部下以诏书的形式告谕关中军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5]大有驱军南下，吞噬关中之意。然则，连绵不断的战事，浩繁的军费开支，本想通过战争掠夺到更多的财富，然而“虽战累胜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6]战争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战争使国内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加之元昊残暴，“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国中数有叛者”，[7]“（西夏）近年屡有点集，人多失业，每入

① （元）脱脱：《宋史》卷 289《葛怀敏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 289《葛怀敏传》。
③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④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⑤ （宋）王巩：《闻见近录》不分卷。
⑥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 3 引李诚之语。
⑦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 127《夏国传》。

寇边郡，计其掠获未足偿其所费，人尚不乐”。[1]西夏国内的各种矛盾都日益尖锐起来。而且，就在庆历三、四年间，西夏与辽为了争夺党项夹山部落，双方关系破裂。[2]桀骜不驯的元昊不愿接受任何一根指挥棒的指挥，当得知辽准备集结大军进攻西夏的消息，他不得不停止对宋的军事行动，为了集中兵力对付辽的进攻，元昊派出了使者与宋议和。议和，对于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宋王朝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双方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协商，于庆历四年（1044）五月，正式签订了宋夏和约，元昊以名义上的称臣换来了每年二十五万的岁赐，表面上这场和约的缔结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实际上是西夏以自己巨大的胜利结束了这场历时七年的战争。

二

从触目惊心的宋夏战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号称拥有数千万人口、百余万军队的宋王朝竟然被僻居荒隅的“弹丸之国”——西夏连连击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师惟不出，出则丧师；寇惟不来，来必得志”。[3]这是什么原因？西夏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屡战屡胜，而宋王朝却一败再败呢？宋在经济上是超级大国，在军事上，其综合力量也远远超过西夏，然而，弱者胜，强者败，其中之内在原因不得不令人深究，余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对比分析。

（一）从宋夏双方的政治状况来看

决定战争的胜负，交战双方的政治状况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孙子将“道”放在战争的第一位，也就是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宋自立国以来，为了加强北宋政权的统治力量，强化中央集权，因此，如何尽可能地扩大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争取他们对北宋政权的支持，也就成了宋政府的基本国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放纵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掠夺，因此，造成了有宋一代土地的迅速集中，早在太宗年间就有人指出：“富者有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条。

② （元）脱脱：《辽史》卷19《兴宗纪》、卷92《耶律侯哂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乙巳条。

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1]到仁宗时，大姓豪强、公卿大臣的占田更为厉害，《宋史·食货志》云：“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之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随着大地主占田的无限发展，必然导致广大农民的破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大批出现，以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的全国户口数看，全国有客户三百七十五万多户，占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客户，即丧失土地的农民。这是官方数据，宋代还有大量的“诡名挟佃”、“诡名寄产”的现象，因此，无地的农民实际远不止三分之一。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量的土地，而国家和地主们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却十分惨重，地主对佃客的剥削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并对他们的人身自由给予极大的限制。国家对于自耕农就是各种苛捐杂税，一个农民除了交二税之外，还有什么身丁税、支移、杂变、和买、和籴等，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国家的徭役，农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司马光《论劝农札子》一段话就很有代表性：

> 今农民苦身劳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赋敛萃至，徭役出焉。岁丰则贱粜以应公上之需，给债家之求；岁凶则流寓弃乡，转死沟壑。[2]

王禹偁《感流亡》诗描绘了一户逃亡农民的境况：

>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唯愁大风雪，僵死山谷间。[3]

这就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写真，而皇室、官僚、地主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呢？从皇帝来看，除太祖、太宗时尚有开国君主崇尚俭朴之风外，真宗以下，无不以侈靡腐朽相标榜，真宗修玉清昭应宫，费时七年，建房二千六百一十间，“耗国帑不可胜计”，[4]仁宗时，仅因“飨明堂”一项就耗钱“一千二百余万缗”，[5]驸马石保吉，家资钜万，为了奢侈摆阔，家中所有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 雍熙三年七月甲午条。
② （宋）司马光：《温国司马文公集》卷 37《论劝农札子》。
③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 3《感流亡》。
④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 2。
⑤ （元）脱脱：《宋史》卷 179《食货志》。

邸舍别墅，甚至食用器皿都饰以彩绸；[①]吕蒙正号称贤相，爱喝鸡舌汤，遗弃之鸡毛竟堆成山；[②]蒲宗孟为州官，一夜燃烛须用三百支。[③]两相比较，怪不得后人惊叹，宋"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引爆了农民的反抗，庆历初，全国就有三四十个州郡发生了小股武装反抗，而且这种反抗"前贼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伙四百人，桂阳监一伙七十人，草贼一伙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⑤]不仅农民反抗激烈，士兵兵变也是此起彼伏，"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⑥]。沂州王伦起义，陕西张海起义，贝州王则起义，宋王朝完全处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之中。

西夏从德明归附到元昊建国，正处在蒸蒸日上向前发展的兴旺阶段，统治者们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一方面继续完成对河西地区的统一，另一方面着手建立和健全一个封建国家应具备的礼仪和制度，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表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疆域扩大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⑦]拥有东西二万余里的土地。紧接着，立官制，定兵制，制礼仪，造文字，建蕃学，一系列崭新的封建制度在西夏国内出现。元昊建制时，多采纳野利仁荣的意见，一方面学习宋制，另一方面按照党项本民族的状况和风俗进行改革，"顺其性而教之以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如宋王朝大力提倡的孔孟儒学，野利仁荣就认为"斤斤言礼言义"，绝没有益处。德明时，礼乐全部模仿宋制，元昊认为："本族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⑧]对于那些缛节繁音，元昊一律加以改造。

为了精简机构，他将中书下属二十四司改并为十六司，为了精选官吏，蕃学完成，通过考试择优授官。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元昊既不重资格，又不宥于民族偏见，不管是汉人、蕃人，不管国人、逃人，只要有本领，统统予

① （元）脱脱：《宋史》卷250《石保吉传》。
② （清）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卷4引《坚瓠集》。
③ （元）脱脱：《宋史》卷328《蒲宗孟传》。
④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宋制禄之厚》。
⑤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4《边防门·盗贼》。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月甲戌条。
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景祐四年五月条。
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景祐四年七月条。

以录用，对被俘虏的蕃官、汉将“多礼不杀”。[①]富弼言：“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以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②]因此，西夏在元昊一朝出现了人才济济的现象。元昊秉政，赏罚严明，故“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③]《宋史·夏国传》还载：

> （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④]

这种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民主主义遗风在元昊身上的保留，对于团结酋豪、加强统治无疑有极大的益处。西夏统治者由于还处在建国初期，在一定程度上还注重保持质朴坚忍的民族美德，上下差距很小，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也相对要轻，一定程度上还多少考虑各部落人民的利益。张舜民称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吝啬财用，爱惜人命，与中国相反”。[⑤]时人孙甫言：元昊“起事之初，自当收拾人心，凡所得，逐时分给其众人”，[⑥]故部落多愿为其效命。因此，国内比较安定，上下比较团结，正如王称所言：“军民之势犹一家也”。[⑦]

（二）从宋夏双方经济情况分析

战争与经济是紧紧相连的，交战的双方谁的经济力量强大，谁的物质基础雄厚，对于战争的胜负往往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宋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人多地广，物产丰阜，以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看，“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⑧]这是一个可观的数据。如果光从这一数据来看，宋王朝不可谓不富。然而，这只是问题一面，另一面就是收入虽多，支出却更多，国用严重不足。宋祁宝元二年（1039）上疏：他认为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4康定元年五月条。
②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1《辽夏》3《上仁宗论西夏八事》。
③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5《上书》。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3《御边》引张舜民疏。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卯条。
⑦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8《夏国传》下。
⑧ （元）脱脱：《宋史》卷179《食货志》。

当今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三冗三费”，[①]概括起来，就是“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国家供养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仁宗宝元时，全国内外官属达15443员，[②]到皇祐时，又有增加，更可怕的是，还豢养了一支数量惊人而又腐败无能的军队，仁宗时，军队总数高达125.9万人，[③]当时“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④]另外，国家用来满足皇室侈靡生活的钱财及天下寺观僧道的费用，也是一笔巨大开支。因此，国家财政经常是入不敷出，年年短亏，《宋史·食货志》载：治平二年（1065）国家收入11613万，而支出12034万，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短亏1500多万。[⑤]当时就有人说：

> 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⑥]

宋政府支出的钱财虽多，但真正将钱花到实际的国防建设上却是很少，因为，宋统治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⑦]他们认为边患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内部的反抗。因此，宋政府一直把镇压农民的反抗和兵变放在第一位，对于国防建设往往极不重视，城寨不修，战马不备，粮饷不足，器械不精，在宋夏交战时，甚至出现了用纸甲代替铁甲，[⑧]十名骑兵竟无一二人有马的怪现状。[⑨]国家宁肯花最大限度的钱来养一支几乎不能作战的禁军，但真正有较强战斗力的蕃兵却没有军俸，[⑩]因此，可以看出，宋王朝尽管“竭民租赋以养不战之卒，

① （宋）宋祁：《景文集》卷126《上三冗三费疏》。
② （元）脱脱：《宋史》卷179《食货志》。
③ （元）脱脱：《宋史》卷187《兵志》1。
④ （宋）蔡襄：《蔡忠惠集》卷18《强兵》。（宋）王铚：《枢廷备检》为：“皇祐一岁之入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
⑤ （元）脱脱：《宋史》卷179《食货志》。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癸丑条。
⑦ （宋）欧阳修：《欧阳修集》卷98《奏议》2《再论王伦事宜札子》。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己丑条。
⑨ （宋）宋祁：《景文集》卷29《又乞养马札子》。
⑩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王曾瑜认为，宋仁宗时，蕃兵是没有军俸的，参见氏著《宋朝兵制初探》，第220页。（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25《蕃兵》吕诲《上英宗重造蕃部兵帐》：“（蕃部）首领薄有俸钱”。以禁军与蕃兵同等职务都虞侯比较，禁军都虞侯为三十千至十九千，而蕃官只有七百文，约相当于禁军的三十分之一。可见蕃官俸之薄。

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①]但是，这种养兵政策主要是为了使“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②]是消弭战乱、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而绝不是去进行有效的国防建设。

西夏并不是经济大国，论土地，它不如宋广，论人口，它不如宋多，论物产，它不如宋阜。但是，西夏的社会经济并不完全像马端临所说的那样“与诸封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如囊时”。[③]西夏统一河西以后，除了一部分沙漠之地外，它控制了甘凉、兴灵、横山三大农牧业区。《宋史·夏国传》：

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利，岁无旱涝之虞。[④]

《金史·西夏传》载：

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⑤]

横山、天都山、马衔山一线更是西夏“赖以为生”[⑥]的农牧业区，“多马而宜稼”,[⑦]沿这一线的西市、龛谷、智固、胜如、七里平、桃堆平、鸣沙川、葭芦、米脂、定边等城寨都是西夏御仓所在地，仅鸣沙川一地，西夏储粮就达百万石。[⑧]畜牧业更是发达，德明时，西夏在景德三年、四年间就进贡马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兵考》4引《两朝国史·兵志》。
② （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舆地》8《雍州》。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6元祐六年九月壬辰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335《种谔传》。
⑧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14、第190册《方域》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丙子条、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辛卯条,《宋史》卷176《食货志》上4,《韩魏公集》卷12《家传》，苏辙《栾城集》卷41《再论熙河边事札子》、卷42《乞罢熙河修质孤胜如等寨札子》。

匹和骆驼三千多匹[①]（其中还有一次无数据），对契丹还岁贡马驼三百二十匹；[②]元昊时，仅保安军一处榷场，夏对宋的输出额就是马四千匹，羊两万只，[③]还不包括其他榷场与民间贸易，民间羊马贸易额达“岁数百万”。[④]可见，西夏经济不论是农业和畜牧业都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德明附宋以后，三十年的和平生产，带来了西夏社会经济的繁荣。除了西夏本身的经济积累外，宋、辽对西夏的岁赐和回赐也是西夏经济又一重要储存，德明附宋，宋必须每年颁赐金、帛、钱各四万，茶二万斤，三十多年的积累，到元昊称帝时，这已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故宋人称元昊反宋是“向得岁赐而不用，积年而叛”，[⑤]再者，西夏统治者意识到自己经济条件并不是很优越，因此，在元昊建国以后，一直保持“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建国方针，国家机构精简，国风民俗淳朴，官员不食俸禄，战士自备刍粮，[⑥]官僚机构和军队都没有给国家造成多大的负担。因此，国家可以将更多的钱财投入到国防建设中来。

（三）从宋夏双方军事力量考察

1. 军队数量的对比

宋军数量虽然不小，以庆历兵籍计算，其额为125.9万人，但是，其中不能作战的厢军有43.3万人，而真正投入到宋夏战场上的军队又是多少呢？据宝元元年刘平言，陕西四路有精兵20万，[⑦]就是到庆历二年后，四路之兵也不过21.5万，[⑧]这21万是兵额，宋禁军中多“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⑨]编制严重不满员。以20万军队防守东西二千余里的宋夏边防线，沿线有二十四个州军，近二百个堡寨，都得列兵守御，故韩琦说，“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⑩]

---

① 参阅拙稿《北宋与西北各族马贸易》，载《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2年。

②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西夏国进贡物件》。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市籴》1。

④ （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引孙沔上言。

⑤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引李诚之语。

⑥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上册《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云:“（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

⑦ （元）脱脱：《宋史》卷325《刘平传》。

⑧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6册《兵》8。

⑨ （元）脱脱：《宋史》卷194《兵志》8。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条。

西夏后期全国总兵力是69.5万，其中有10万擒生军，9.5万卫戍军，在宋夏边境上屯军10万。[①]元昊时期的全国军队总数应为“三十余万”。[②]西夏攻宋往往是聚数路之兵攻宋一路，故韩琦云：“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③]进攻军队的数量往往高出防守军队的数倍以上，故欧阳修说：“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④]刘敞更言：“陕西兵无虑二十万，分屯四路，不足自守，贼尝三战三胜者，由以十当一也”。[⑤]

2. 军事制度的对比

有宋一代，最犯忌者为武人权重，宋为了限制边镇将帅的权力，作战方略阵图一般由皇帝制定，所谓边帅并不能独立自主地指挥战斗，临战之事必须申报朝廷，听候中枢指挥，身为统帅者只能“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翻录行下”。[⑥]为了监督边防将帅，皇帝还派内臣出任监军，他们不懂军事，但却有权干预边将们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该出战时他们督促出战，出现可战之机时他们要禀告朝廷，范仲淹对差中使监军的作法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在战场上，宋制规定：“有寇则官卑者先出”。这种以官位的高低来决定战斗的阵列，必然会出现大官怕死，小官送死的现象，既不利于鼓动士兵们勇敢作战，又不能培养将官们身先士卒的作风，故范仲淹说：“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⑦]宋军统帅，不仅上受制于皇帝，中受制于监军，下还要受制于部属。仁宗时，一路之部署、钤辖、都监多达十几员。边帅遇事都要和他们商量，这些人“权均势敌，不相统制”，[⑧]一事之议，争论不决，往往坐失战机。再加上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所留下的后遗症，“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西北边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这种军事制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③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④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6《辽夏》8《上英宗论西边可攻四事》。

⑤ （宋）刘敞：《公是集》卷51《王公行状》。

⑥ （元）脱脱：《宋史》卷324《张亢传》。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庚戌条。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七月癸亥条。又（宋）宋祁：《景文集》卷28《论三路边防七事》载：“部署钤辖，位均势侔，不相兢一，赏滥而不实，罚弛而不行，上下相蒙，徼一切之幸。”

度带来了一系列弊病，也严重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与宋军事制度相反，西夏统兵将帅是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西夏以监军司为主要的军事单位，各监军司的军队都是由西夏得力亲信酋豪指挥，一个监军司的主要负责人只有三人：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有时一个统军或监军又可统几个监军司，[①]每一个监军司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军事单位，其军队直接由中央调遣。西夏皇帝与将帅酋豪之间关系亲密，作战计划是大家在一起打猎时商订，出战之前，要歃血盟誓，来表示团结一致、英勇杀敌的决心，这些制度，明显是部落联盟时军事民主制的遗风，是一种原始的军事制度，但在实际战斗中却显示了良好的效果。西夏军队作战不以官位高低为先后，而多勇于冲锋陷阵，从皇帝到将帅，无一不是英勇杀敌的先锋。西夏士兵与首领的关系更为密切，田况云："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②]这就是由部落首领统领本部落的兵，由于首领熟悉士兵，"少长服习"，因此，在战争中就能指挥自如，配合杀敌，与宋之"兵将不识"、"兵将分离"的制度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李纲在《御戎论》中对宋夏双方治军用兵之道有一个比较，很能说明问题：

> 彼军旅之力全，而我军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规者大，而我所规者小；彼所图者久，而我所图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四也。将帅之任不专，士卒之气不振，粮粮之蓄不广，钱货之法不通，赏罚之令不明，攻守之议不审：此自治之术未尽善者六也。[③]

上述双方用兵治军优劣之差距注定了夏胜宋败。

3．军队素质的比较

太祖、太宗朝的中央禁军一般都是经过"选练"才能入籍的，在选练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景祐三年九月条。但西夏后期监军司负责人数似有不同，《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载，每监军司有二位正监军使，一位副监军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丙戌条载，统军贺朗赉统洪、宥、韦三州监军司；（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3《韩世忠碑》夏国驸马兀哆统"十军监军"。

②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4《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③ （宋）李纲：《梁溪全集》卷144《御戎论》。

中，老弱多被淘汰，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召募壮士，选择强者编入禁军。因此，太祖、太宗时期的中央禁军素质是比较高的，成为当时统一中原、削平割据的一支劲旅。太宗以后，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大量召募饥民当兵，仁宗朝就曾在河北、关中、川陕等地大批召募流民当兵；为了增加兵员，宋政府有规定，州官能募兵一千者，转一资；除募兵之外，还强迫抽丁，一般以三丁抽一，陕西是每家一丁。这种募兵和强迫当兵的办法，必然导致军队素质低劣。再加上太宗以后，和平寝久，士兵长期不经战阵锻炼，“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①]“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②]甚至“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③]仁宗时，陕西募二十营神捷兵，“所募多市井选软，不足以备守”。京师来的禁军“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④]《宋史·张亢传》载：

> 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一指挥四五百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余皆瘦弱不可用，且官军所恃者，步军与强弩尔。臣知渭州日，见广勇军扩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仅百人，余仅七八斗；臣以跳镫弩试，皆不能张，阅习十余日，裁得百余人。[⑤]

像骁胜、云武二军的骑兵就更可笑了：“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⑥]苏舜卿在《庆州败》一诗中描写了腐败宋军的丑态：

> 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连颠自欲堕深谷，……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⑦]

---

①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59《原弊》。

② （宋）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0《谘目》2。

③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59《原弊》。

④ （元）脱脱：《宋史》卷187《兵志》1《禁军》上。

⑤ （元）脱脱：《宋史》卷324《张亢传》。

⑥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4《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⑦ （宋）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庆州败》。又（宋）宋祁：《景文集》卷28《论三路边防七事》载：“（宋军）士气丧沮，每闻金鼓之音皆股战胆销，有百走逃生之心，无一前斗死之志”。

士兵战斗力如此之弱，将领们又怎样呢？既缺乏“身当行阵，为士卒先”[①]的勇将，又没有精于三韬六略文武双全的帅臣，由于宋朝右文轻武之风太甚，一般人都轻视军事职业，所谓统军之将大都为“不经行阵”、“未识偏伍”[②]的书生，就包括仁宗时的几届陕西四路统帅全都是文帅，即使有一两个能征战的战将，如王德用、狄青等，也不被重用，重用者多为一些亲旧恩倖，贾昌朝言：

况今武臣多亲旧恩倖，出即为将，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万之命，是驱之死地矣。[③]

西夏党项本就是一个极为强悍的民族。“其民俗勇悍”，“强梗尚气”。[④]中唐以前，他们曾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中唐以后，其居地则在今毛乌素沙漠稍南的沙碛荒原之中。恶劣的环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乐战斗，耐饥渴，其视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故能惊边徼，摩封疆，出没飘暴，不可制驭”。[⑤]全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⑥]且不分男女，“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⑦]居于山间的部落，“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居于平夏的骑兵，“最能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⑧]特别是横山地区的羌人，更是“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⑨]是一支能打恶仗的西夏劲旅。西夏以羊马为国，以游牧为生，精骑而善射是西夏人的特点，这种素质不仅表现在元昊建国初期，即在元灭西夏后，由西夏人组成的元军仍然保持着“善骑射”[⑩]的习俗。西夏军队不仅能征惯战，精于骑射，而且组织纪律性极强，队伍成列以后，部伍中无人敢言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癸未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285《贾昌朝传》。
④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宋）李纲：《梁溪全集》卷144《御戎论》。
⑥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
⑧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条。
⑩ （元）余阙：《青阳山房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

语。[①]雪夜巡逻及四更，夏人仍“逐更而巡”。[②]间谍被宋俘获，至死也无人招供。[③]故当时人多赞叹夏军纪律之整肃，宋之不如也。[④]西夏作战不鼓励斩首级而注重“得大将，覆大军”。“故其战斗轻首级而不争，乘利逐北，多致大胜”；而宋方奖赏“每得一首级则转一资”，故作战时，“每杀一人，则必下马斩首”，耽误战机，“故吾之胜未尝有大捷也”。[⑤]

4．军队装备的比较

宋军之装备不可言不好，但有两大弊病却足以坏事。一是不重视常规武器的建设，喜欢搞一些不宜实战的奇兵异器，什么三十斤重的铁轮拨，五十斤重的盘铁槊，还有神盾、劈阵刀、无敌流星弩、拒马竹皮牌等，名目极多，但多不实用，故前引《宋史·贾昌朝传》：“今之兵仗制造，殊不适应”。二是和平以后，国家不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宋仁宗即位，因天下太平，马上颁诏，诸路每年减掉原造兵器的一半，[⑥]特别是战马一项，天圣以前，宋在西北置场买马岁进三万四千九百匹，[⑦]天圣以后减到“岁市马二万二百”，[⑧]到宝元、康定以后，每年只买马七千多匹。[⑨]因此，军队战马奇缺，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群牧司言：“今内外诸军阙马”[⑩]，以致达到“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⑪]宋与西夏接壤之处，“绵亘数千里，无山河之阻”，如无一定数量的骑兵与对方奔冲，要想求得边防之固是不可能的。

西夏与之相反，该国本是产马之国，党项马早在唐代就是有名的良种马，能吃苦耐寒，宜于奔冲，故宋人称西夏“铁鹞子”骑兵“百里而走，千

---

①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4《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②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4引黄绥言。

③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引范雍诗：“拘俘询虏事，肉尽无一声，盖为前屡得贼中谍者，虽脔其肉且尽，终无一言，故雍诗有云。”

④ （宋）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庆州败》言宋军“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言夏军“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范雍称宋军“承平废边事，备预久已亡，万卒不知战，两城皆复隍。”又云：“啸聚类缩乌，奔败如惊鹿。”而称夏：“剧贼称中寨，驱驰甲锁精，昔惟矜笑骑，今亦教攻城”。

⑤ （宋）李纲：《梁溪全集》卷144《御戎论》。

⑥ （元）脱脱：《宋史》卷197《兵志》11。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九月戊申条。

⑧ （元）脱脱：《宋史》卷292《丁度传》。

⑨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0《兵考》12《马政》：“自用兵四年，所市马才三万”。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十二月丙午条。

⑪ （宋）宋祁：《景文集》卷29《又乞养马札子》。

里而期”。[①] 这种骑兵不仅是马好而且装有重甲，刺斫不入，夏人称之为“铁林”[②]。西夏步兵也有较好的装备，夏人所用之甲，是自己用冷锻法打制，这种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③]夏人所用之弓弩也很有名，据沈括说，威力很大的“神臂弓”，就是党项人的发明[④]，故王尧臣称西夏步兵能“挽强注射，锋不可当”[⑤]；至于夏军所用之刀剑，在当时竟有“天下第一”[⑥]的美称；其他如高车笼梯、毡盾、马鞍等都是质地优良的西夏产品。总之，西夏人尚武喜战，因此，对军队的武器装备表现得尤为重视，西夏器甲之精利也曾得到许多宋将的赞叹。

综上所述，以宋夏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宋虽大，实则贫弱，夏虽小，实则雄强，宋夏交战，就好比一头身患重病的巨狮去搏击一只凶狠强悍的恶狼，焉能有胜之理。更何况，西夏不仅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实力，而且还有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元昊在亲自指挥每一场战争，元昊精于韬略，用兵如神，声东击西，乍出乍入，时和时战，诡谲莫测，当时人欧阳修评元昊指挥作战称：

> 若夫假潜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悦其心；然后养精锐，为长久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备多而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方已老，民力已疲，……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⑦]

他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次又一次将宋军拖疲打垮，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军一次又一次中计。范雍虽说无能，而韩琦、范仲淹号称一

---

① （元）脱脱：《宋史》卷191《兵志》5。
②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2。
③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辽夏》4《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④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9《器用》。
⑤ （元）脱脱：《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⑥ （清）曹溶辑：《学海类编》卷4太平老人《袖中锦》。
⑦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2《辽夏》4《上仁宗论庙算三事》。

代名臣，怎么也败于元昊之手？这一方面说明元昊在军事上确有过人之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以儒臣领兵之弊。韩、范虽一时之人杰，但他们毕竟不是出于戎行的将帅，从未领过兵打过仗，[①]因此，在实际战争中，他们的军事谋略与久经战阵的元昊相比，就显得逊色不少；韩、范如此，就更不要说那些“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②]的夏守赟之流。三军之命，系于将帅，以宋夏双方军事统帅相比，吾人亦可悟出西夏能屡次击败宋军的道理。

三

余在前面的文章里曾对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的性质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余以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不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而是一场反对统一、坚持割据的非正义战争。那么，对于元昊时期的宋夏战争又应该怎样看呢？从元昊建国到庆历和议之间长达七年的宋夏战争，与前一时期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呢？余以为，这两个阶段的宋夏战争的性质不能完全画等号，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已改变了这一阶段战争的基本属性，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之所以具有割据的性质，是由于他的反宋战争是在统一趋势中所表现出来的分裂行为。然而，元昊时期的宋夏战争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宋方面来讲，太宗雍熙北伐以来，由于歧沟惨败，宋君臣表现出一种畏战如虎的心理，主张“永息征战”，[③]不愿再提北伐之事；由于至道二年（996）宋太宗亲自部署五路伐夏，全师而出，无功而还，且耗资甚巨，因此，对于收回银夏五州，宋君臣已不是很感兴趣了。北面的燕云之地统一不了，西面的银、夏五州干脆也不要，根据赵普的建议，宋廷将已收归版图十五年的银夏五州又还政于李继迁，尔后，甚至连灵州也一并放弃，来满足西夏的割据。尹洙言：“国家以至仁为念，诚乎黩武，不爱七州之地，委以旄钺之重，侯王许其世及”。[④]统一，已至太宗截止，北界真、定，西界秦、陇，这就是宋王朝自己承认的疆土，至于银、夏、兴、灵，俱为化外。

①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上册《范文正公文集》卷17《让观察使第一表》：“但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虽知屡困，日勉一日”。可见，范仲淹任边帅确是勉为其难。

② （元）脱脱：《宋史》卷290《夏守赟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287《赵孚传》。

④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23《议攻守》。

因此，可以看出，太祖、太宗时期的统一战争，已止于雍熙北伐。尔后，宋不论是对辽还是对夏，已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了。从西夏方面来讲，从德明到元昊时期，不仅巩固了原有的银、夏之地，而且不断开拓疆土，南下兰、会，西克甘、凉、瓜、沙、肃，至元昊时，河之内外，凡州郡二十有二，[1]形成了整个河西地区的统一。德明时，虽表面称臣于宋，实际上却自成一国。《儒林公议》卷上：

> 其号令、补署、宫室、旌旗一拟王者，每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辅始出饯馆，已更赭袍、鸣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2]

已俨然是位南面称孤的帝王。元昊继位，不仅是在宫室、舆服、仪仗方面仿效，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开始创建自己的制度，更加注重于国家政权的实际建设。到宝元元年（1038）公开称帝后，一架肝胆俱全的封建国家机器已完整地耸现在人们面前，不管它名义上怎样称呼，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已屹立在辽、宋之间，它与辽、宋二国以自己的实际存在而鼎足三分，这不是谁口头上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如果再把这一时期的宋夏战争视作统一与割据的斗争，那么就未免有些迂腐：既然天下已成鼎足三分之势，那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也就只能看作是一场割据者之间的混战，丝毫无统一之味了。

在割据者与割据者之间的混战中是否还有是非曲直，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呢？余以为还是应该有的，因为历史总是在呈波浪形状地向前发展，既有大统一的时候，也有分裂割据的时候，大统一的时候，破坏统一的割据战争肯定是非正义的，如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在分裂割据的时候，破坏平等国家之间和平的侵略战争（无庸忌讳侵略二字），也应该是非正义的，如金对南宋的多次进犯，这就要看战争的发动者究竟是谁，罪恶的战火是由哪一方点燃。

有人提出这一时期战争的肇事者是宋朝，是宋朝“引爆了这场战争”，还有人提出，是宋朝封建统治者“一手挑起了战争，迫在眉睫的战争正在威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胁着夏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之安全，使元昊清醒认识到只有在自卫战争中，打败宋军的进攻，才能巩固新建的夏国。因此，夏国人民进行自卫自立，反对宋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斗争，无疑是自卫性的、正义的。”[①]所言是历史事实吗？能经得起材料的验证吗？应作深入分析。

先从远一点说起，德明时期，当西夏羽翼已丰时，德明就有引兵犯宋之举，大中祥符九年（1016），德明使千五百骑兵犯庆州，天禧三年，德明又率兵攻柔远寨，天禧四年，德明又使属羌进攻延州，天圣元年（1023），德明部属万余攻掠渭州，[②]可见，德明虽已奉表归款，但是，由于宋王朝过分害怕战争，一味以“恩礼”厚赂德明，年年岁赐，月月厚赂，且屡加封爵，攻灭凉州吐蕃，不敢出兵支援；袭击甘州回鹘，也不遣一词重责，即使“频窥边境”，也只是“约束”[③]而已，一味姑息养奸，因此，德明“志气骄盈”[④]，“桀骜渐形”，“遂敢建宫阙，窥边境，大起僭端”。[⑤]

到元昊继位以后，准备僭号称帝可以姑且不谈，但对宋边境的掳掠进犯几乎未断。景祐元年（1034）二月，元昊领兵侵掠府州境地；五月，又发动了对府州的进攻；七月，元昊领兵掠环庆州境，杀戮居人；同月，元昊又犯庆州，设伏执环庆都监齐宗矩；景祐二年（1035）七月，元昊使首领讹遇领兵几次入寇环庆路；景祐三年（1036）十月，元昊攻占河西后占领兰州，“遂有窥陇蜀之志”[⑥]；宝元元年（1038）正月，元昊使人窥探河东道路，谋掠河东；七月，又“悉会诸部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约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门、赤城路三道入”[⑦]。这都是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表演，难道这不是元昊挑动战争最明显的证据吗？元昊准备发动对宋的大规模进攻，很多酋豪不赞成，元昊下令，“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⑧]，就连他

---

① 以上观点见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载《民族研究》1982 年第 5 期;吴光耀:《略论夏国创建人——赵元昊》，载《青海民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② 德明四次犯宋边境，见（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0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条、天禧三年三月条、天禧四年正月条及天圣元年八月条。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 明道元年五月条。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0 天禧四年六月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9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条。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2 景祐三年十月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2 景祐三年九月己酉条。

的叔父嵬名山遇的劝告也不听，足见元昊要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心。

再看看宋夏交战前宋王朝的态度，据目前材料揭示，在元昊称帝之前，宋对夏（包括德明、元昊）一直是推诚相待的，还未见一处宋进犯夏境的记载，尽管德明、元昊一再在边境上挑衅而且多次已攻入宋之州郡，宋廷只是命沿边严加戒备并无反击之意。元昊灭甘州、下河湟虽然都已违背当时的誓约，但宋并没有对回鹘、吐蕃这两个盟友支援一兵一卒。元昊在国中改换年号，反迹已明，宋依然给元昊不断加官晋爵。这一切，目的十分清楚，宋自真宗景德以后，北边和盟，西方撤警，天下久安，人人泰然，不习战斗，不识兵革，没有人愿意去破坏这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宋朝的态度是不愿意在宋夏之间再次发动战争。如果宋朝真有发动战争之意，那元昊的叔父、掌握西夏兵权的嵬名山遇内附就不会不接纳，山遇奔保安军，边臣还以“自德明纳贡四十年，其长纳附者未尝纳之”[①]为理由，将山遇送还西夏而被元昊射杀。这一事件，宋方处理得太愚蠢，也看出宋边臣的迂腐。然而，正是这种迂腐，恰恰反映了宋不愿意扩大宋夏之间的矛盾，更不愿意因此事而引爆宋夏之间的战争。若不如是，那熟知西夏军事的山遇归宋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何必将归明之人而投畀豺虎，岂不阻绝他人向化之路？总之，在元昊称帝前，宋对西夏既无发动战争的思想准备，又无发动战争的事实。反之，西夏却是蓄谋已久，时刻期待着这场战争的爆发。

元昊公开称帝后，更是加紧准备发动这场战争，为了师出有名，他处心积虑地作了多种准备，一是以嫚书傲辞辱骂讥讽宋朝；二是煽诱边境部落归夏；三是以小部队不断地向宋边境侵扰；四是以大部队在边境上耀武扬威，目的就是要激怒宋朝。果然，宋朝君臣被激怒，削夺元昊官爵，撤销赐姓，并出重赏募人捕杀元昊，而且，有些将官也按捺不住，为贪小利，竟多次派出军队去骚扰西夏边境[②]，这样，给急于发动战争的元昊以极好口实，“元昊既忿，且以为辞”，[③]早已准备好的十几万大军就浩浩荡荡地杀向延安府，宋夏大战正式揭幕。可见，元昊称帝后，企图引爆这场战争的仍然是西夏而不是宋。

---

①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 15《李公墓志铭》。

②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32《辽夏》4 载田况《上仁宗兵策十四事》：“范雍在延州，屡使王文恩辈先肆侵掠，规贪小利，贼遂激怒，执以为辞。”

③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元昊称帝后，宋尽管对西夏进行了一连串的威胁警告，又是削官，又是撤赐姓，而且还有一部分大臣主张以武力教训元昊，但是，宋廷始终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而是屡次告诫边臣“密严边备”，[①]“毋得轻出”[②]，夏竦条陈十事，全为备边之策，田况上言治边十四事亦是谨自守备，吴育、王尧臣、范仲淹等都反对主动出击西夏。[③]宋为了加强防守，主要致力于堡寨和步兵的建设，许多大臣都主张减省骑兵而增加步兵，这样有利于防守，根本不考虑主动出击西夏。宋祁说：

> 臣料朝廷与虏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则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④]

正因为宋廷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守策，故宋对骑兵建设并不十分重视。可见，宋除了对夏迫不得已的防御之外，并不想对西夏发动战争，汉、唐之所以能主动歼击匈奴、突厥，就是以自己强大的骑兵去战胜对方的骑兵，宋损骑益步，以步制骑，就足以反映宋想的不是去进攻西夏，而是在设法保卫自己。

有人说，元昊称帝，宋王朝“下诏削夺元昊官爵，绝互市，揭榜于边，募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授定难节钺，这是宋朝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一下子把事态扩大到战争的边缘”，并说“可见这场战争的肇事者是宋朝”。[⑤]这样看问题恐怕太简单，一道诏令，一张文榜难道就是这场战争的历史前提？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元昊称帝之前，早已在贺兰山和酋豪们歃血为盟，相约寇略宋境；元昊称帝之前，曾多次在边境武装挑衅，就是为了大举侵宋。西夏虽说在元昊时已开始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但它毕竟还是一个以畜牧生产为主的游牧国家。游牧民族由于他本身经济生活的局限，需要农耕民族的文化产品，游牧民族上层贵族的贪欲和奢侈，农业社会的丰富物资就

---

① （元）脱脱：《宋史》卷11《仁宗纪》。

② （元）脱脱：《宋史》卷325《任福传》。

③ （元）脱脱：《宋史》夏竦、田况、吴育、王尧臣、范仲淹等传。

④ （宋）宋祁：《景文集》卷29《上便宜札子》。

⑤ 以上观点见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吴光耀：《略论夏国创建人——赵元昊》，载《青海民院学报》1984年第3期。

对他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可以用强力获得他们用自己生产品所不能交换到的财物。[①]因此，掠夺、抢劫对于游牧民族的贵族阶层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增加财富的手段。元昊的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

所得奉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却。不若练习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俱丰，于我何恤。[②]

可见，元昊"讨掠"、"侵夺"的目的就是要"上下俱丰"，就是要从宋王朝那里劫夺更多的财富，因此，"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劫掠财货"，[③]这才是元昊真正的目的，"其屡次入边，不过为掳掠计"。[④]宋朝即使不搞那一套威胁讹诈，战争仍然不可避免，只要宋王朝那丰富的物资存在，只要西夏有足以对付宋王朝的军事力量，劫夺就不会终止。

至于前面提到的"西夏自卫"一说，就更不值得一驳了。什么叫自卫？难道元昊大肆叫嚣的"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⑤]是一种"自卫"？难道元昊告谕关中，"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也是一种"自卫"？为什么场场战争都"卫"的是宋朝疆土，三川口在延州，好水川在镇戎军，定川寨在渭州，麟府丰在河东，都是宋朝的疆土，为何西夏到此来"自卫"？不错，宋军确有劫掠夏境之事，宋军亦确有打掳部族之人，但余作过一个统计，元昊时期，宋夏交战大小 44 次，宋军进攻夏境有 8 次，夏军进攻宋境有 36 次，宋军攻夏规模最大一次是任福统军七千攻破西夏白豹城，而西夏攻宋集兵 10 余万者却在 4 次以上，[⑥]这样的数据，难道能说明西夏是在进行"自卫"？西夏军队啸集而来，重掠而去，焚荡庐舍，屠戮居民，从景祐元年（1034）一直到庆历四年（1044）以后，几乎年年不断，高峰时甚至达到月月入侵，不

① （俄）A.Ю. 雅库博夫斯基著，魏英邦译：《十一至十三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4 宝元二年九月丁未条。
③ （元）脱脱：《宋史》卷 292《王尧臣传》。
④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7《康定元昊扰边》。
⑤ （宋）王巩：《闻见近录》不分卷。
⑥ 这些数据主要依据《西夏书事》、《宋史·夏国传》、《太平治迹统类》、《皇宋十朝纲要》、《宋史·仁宗纪》进行粗略统计。

仅将罪恶的战火烧遍了宋陕西边境，而且还多次集结重兵准备牧马关中。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西夏是这一场战争的发动者，元昊就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从元昊建国到庆历和议，西夏对宋发动了历时七年的残酷战争，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灾难，给宋夏双方带来的都是沉重的灾难。就宋方来说，战争使几十万军民丧生，战争使沿边城寨焚毁殆尽，遍地哀鸿，疮痍满目。为了防御西夏，宋不得不大量增募军队，军额激增，兵费繁重，“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敝”，[①]“西陲用兵，国帑虚竭”，[②]导致了宋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宋王朝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他们把沉重的战争负担又转嫁到人民头上，以关中一地为例：“夏寇扰边，关中科敛频仍，民力大困，掌计簿者，迁徙靡宁无久职之计，人户逃移几半，公移窘蹙”，[③]“西鄙用事以来，关中生聚，凋残尤甚，物价踊贵”。[④]人民惨遭战争之害，生活无法维持，反抗不断涌现，富弼言：“臣伏见西鄙用兵，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聚而为盗”。[⑤]张海、郭貌山起义就爆发在这一时期。就西夏来讲，是否如元昊所言，战争会使西夏“上下俱丰”呢？元昊对宋发动一系列战争，本想从战争中掠夺财富，但是，由于西夏军事力量毕竟有限，虽然它能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一时取胜，但它并不能对宋方的主要城镇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占领，因此，得不偿失。李诚之言：“今用兵数岁，(夏）虽战累胜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⑥]西夏经济力量本就有限，人口又少，战争的伤亡虽远比宋要小，但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却要比宋大得多，《西夏书事》卷 16 载：“（元昊）兵数入边，得地不能据，军民死亡创痍过半”，[⑦]这必然导致西夏社会生产力的奇缺，以致正常的生产活动无法进行，造成财用不足、物价上涨的艰难局面。“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

---

①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7《康定元昊扰边》。

② （元）脱脱：《宋史》卷 320《余靖传》。

③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0 庆历七年四月庚戌条。

⑤ （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317《弭盗门》引富弼《乞选任转运守令以除盗贼疏》。

⑥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 3 引李诚之语。

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6 庆历三年五月条。又《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夷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足”。

饮无茶，一绢之直八九千钱。”[1]甚至“国中为‘十不如’之谣怨之”。[2]战争已把西夏带到了民穷财尽、人怨沸腾的崩溃边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由元昊领导和发动的对宋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宋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居于自卫的地位。如果持论公允，事实足可说明：正义在宋一方。正如苏辙所言：“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惟恐在后，虽捐躯中野，不以为怨，兵力竟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矣”。[3]



西夏国王图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庆历三年正月条。同书引张方平《玉堂集》载：“元昊寇三年，虽常得逞，……未能有尺寸之地，而绝其俸赐，禁诸互市，民间尺布至直钱数百”。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苏辙：《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状》。

金夏关系述评 *

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中，金夏关系乃是极为薄弱的一环。究其原因，除了传统地对边裔民族政权之间相互关系不重视外，资料缺略恐怕就是人们不愿涉其堂奥的重要原因。本文在爬梳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对金夏之间百余年的交往过程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并得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

在公元 12 世纪前，女真族与西夏都处于相互隔膜的状况之中，一个在我国的东北，一个在我国的西北，由于辽国的阻隔，它们之间几乎无任何往来。公元 12 世纪后，女真族崛起，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了大金国。继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向已经衰微的辽政权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陷黄龙府、克上京，辽军连连败北，统治岌岌可危，就连辽国皇帝也被追赶得如丧家之犬，被迫逃入天德、云中一带的夹山地区，辽“天下郡县所失几半”。[①]这时，作为辽的盟友、姻亲——西夏对已濒临灭亡的辽王朝并未抛弃，不仅继续接受辽的册封，[②]即仍然承认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主动将辽国皇帝迎请到自己国中避难。[③]于是，原来一直相互隔绝的金、夏两国直接对立起来，并开始初步的接触。

金要灭辽，采取的是联宋的外交策略，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宋金“海上之

---

* 原文发表于《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与刘建丽先生合作，今作修改补充。

①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 11《天祚帝纪》中。

② （元）脱脱：《辽史》卷 115《西夏外记》。

③ （元）脱脱：《辽史》卷 29《天祚皇帝纪》3。

盟”，而要彻底灭辽，绝不可忽视辽之盟友夏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只要辽国的残余势力与西夏结成一体，彻底灭辽，就绝不是指日可待之事。金人显然明白此理，当时，金大军已逼近夏境，西夏也结集军队屯于境上，“今西夏以重兵压云中，狡诈窥视，托为存亡继绝之言”。[①]于天辅六年（1122）占据辽之金肃、河清两军，并声称“奉昏主（金人对辽主之称）之命，军州及土地人民权令守护”。[②]金并没有因此而动怒，他们深知，要彻底灭辽，必须离间辽夏联盟。于是金采取了十分谨慎的策略，不与夏军兵锋相接，自己主动撤军以图后举。

然而，西夏对金的早期认识并不深，一方面，为了表示对辽国不忘旧情，另一方面，则想趁机将自己的国土扩展到黄河以东。“契丹旧酋，走入夏国，借得人马过黄河，夺了西京以西州军，占了土地不少”[③]。还十分鲁莽地派李良辅率领三万夏军支援辽国。天德军境内野奂谷一战，金将斡鲁与娄室将三万夏军“败之几尽”，连主帅李良辅也成了“生口”，[④]素称强悍的西夏军队遭受重创。野奂谷之败，使西夏认清金朝军事力量的强大，通过再三分析，看出金灭辽的必然趋势，坚持援辽抗金的方略显然是危险的。为了保存自己，迅速地改变了原来的对外政策，决定弃辽附金。金挫败夏国的进攻后，并不是向夏国展开反攻，而是集中全部力量去消灭自己的死敌——辽国。因此，作为胜利者的金朝反而主动遣使赴夏国议和，以图破坏辽夏之盟而结金夏之好。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太祖阿骨打之子宗望亲自到阴山与夏国议和。天会二年（1124）夏接受金的议和条件，向金进誓表，并表示：以事辽之旧例向金称臣；辽主奔夏，当即执献；保证不再援辽，金有权在西夏征兵，同意给西域进贡金朝的使团借道。西夏就以这样的诺言换取了“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泺西”[⑤]的金朝割赐地。从此，金夏两国便正式建立了以君臣相称的政治关系。

---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政宣上帙》宣和四年八月丁亥引宇文虚中《论收燕山利害》。
② （金）佚名：《大金弔伐录》卷1《白札子》。
③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政宣上帙》宣和四年九月三日引《燕云奉使录》。
④ （元）脱脱：《金史》卷71《斡鲁传》。
⑤ 夏国誓表内容见（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金朝割地见《金史》卷3《太宗纪》。《金史》卷134《西夏传》“耶利”作“耶刮”。《宋史》卷486《夏国传》下作“许割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

金夏交好的初期，即金天会元年（1123），金夏开始议和，至金天眷三年（1140），金夏第一次和议成功。这十八年中，双方的关系表现得极其微妙复杂。从表面上看，双方以君臣相称，四时八节也有聘使往来，似乎是一片友好氤氲笼罩金夏之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金夏双方均不是以诚相待，而是各有盘算，互不信任，存有极强的戒心。金对西夏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夏对金言词恳切，信誓旦旦，但辽夏旧情始终不能让金放心，这从金给宋帝的回书中可以看出，“夏国素号狡狯，唯务诈诞，与昏主实甥舅唇齿之国”。[①]夏国从李继迁时代起，与辽之关系甚为笃厚，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曾给西夏以极大的援助，夏之所以独立强盛，与辽的大力支援是绝对分不开的。加之辽夏世代联姻，当时在位的夏崇宗乾顺之妻就是辽国的成安公主。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绝不是夏国几句信誓而能轻易勾消的。当时，辽耶律大石又率部西迁，且“军势日盛，锐气百倍”，还多次声言，要“翦我仇敌，复我疆域”。[②]因此，金担心西辽、西夏合谋犯边。《金史·完颜希尹传》载：“（希尹）奏曰：‘闻夏使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部，以臣观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军入其境，不知信与否也。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③]金人不仅在边境上对夏严加防范，而且多次纵兵入境，掠取人畜。

金对西夏不信任的原因还有，西夏不仅与辽旧情不断，而且还明里暗里不断与宋联系。金灭辽后，约西夏共同伐宋，夏一方面派军队向宋陕西五路进攻，另一方面继续遣使向宋进贡。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夏入贡于宋；宣和七年（1125），钦宗即位，夏亦遣使表贺。[④]而且宋夏之间国书不断，据吴玠言：“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⑤]不忘宋朝不一定是真情，但可表明，西夏在金、宋两大国之间是充分玩弄外交手腕，并无诚意附金。西夏这种挂钩三方的态度招致了金对西夏的极不信任。

西夏对金也同样不信任。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服于金朝强大的武力，并非虔诚归顺，正如宇文懋昭所言，“是时，金国方盛，胁而从之”。[⑥]这

① （金）佚名：《大金弔伐录》卷1《白札子》。
② （元）脱脱：《辽史》卷30《天祚皇帝纪》4。
③ （元）脱脱：《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22《徽宗纪》4、卷486《夏国传》下。
⑤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丁酉条。
⑥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5《太宗文烈皇帝》3。

一时期，金人亡辽吞宋，背约弃盟，狼子野心，早已路人皆知。辽、宋尚且是金人砧上之肉，更何况西夏呢？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西夏不得不与之应付、周旋。

由于金夏双方的互不信任，因此，它们之间的初期交往实质上是明争暗斗，各怀鬼胎，于是在一系列事件中，金夏矛盾日益激化。

（一）结盟之后，金约夏从银、夏等地出兵，夺取宋关中之地。西夏并不唯命是从，一方面，趁宋金激战之时，派兵收复了原来被宋占领的陕西沿边地，[①] 如震威城（原西夏境内铁炉骨堆，距府州三百里）、建宁砦（麟州新秦西）、定边军（陕西吴旗西）、怀德军（宁夏固原与同心之间）及西安州（宁夏海原）。另一方面，又派兵夺取了黄河之东天德、云内二军，武州及河东八馆之地。[②]“八馆者，膏腴产稻”。[③]天德、云内均为控扼蒙古高原与西域交通的战略要地，西夏在这一地区驻军，无疑是向金之腹里插入一把尖刀。金人对夏国这一举动十分恼怒，立即派大将兀室率数万精骑，阳为出猎，[④]对屯驻河东地区的夏军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一举夺取河东之地，夏人虽“中怀怨愤”，但又“惧不敢违”。[⑤]

（二）麟、府二州为西夏东部边境的军事要地，北宋时，以折氏八代世守其地以抗西夏，与西夏结成世仇。至折可求时，“以麟、府州、晋宁军叛附金人”。[⑥]金则利用折氏与夏人之仇，“欲因折氏以并夏国”。[⑦]于是双方围绕麟、府二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夏人多次“破麟、府二州”，并授其为“定难军承宣使”。还进而“夹围晋宁军”[⑧]。金被迫将折可求一族迁往青州，而将麟、府划归西夏[⑨]。

（三）金屡令夏不得纳契丹降人，但夏却阳奉阴违。伪齐同州知州李世

---

① （元）脱脱：《宋史》卷23《钦宗纪》、卷486《夏国传》下、卷353《张叔夜传》。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5《政宣上帙》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条。河东八馆为：兜答、厮喇、曷童、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

③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4。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4，第54页。

⑥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20《炎兴下帙》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庚子条。又参见范浚：《香溪集》卷21《徐忠壮传》。

⑦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4。

⑧ （宋）李石：《方舟集》卷15《范元功墓志》。

⑨ （元）脱脱：《金史》卷28《张奕传》。

辅谋杀金帅撒里曷不克，投奔西夏，夏立即接纳，还“从乾顺借兵伐延安以复仇”；[①]金熙河经略使慕洧叛金失败，逃入夏国，夏主不仅接纳，还授他为“山讹首领”；[②]天会十年（1132），辽“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③]乾顺统统予以安置，并立监军司统之。[④]

（四）金帅粘罕灭辽后，准备约西夏一同伐宋之川陕，粘罕依盟约向夏提出假道夏国攻宋之川陕，被夏人拒绝；[⑤]遣使至西夏征兵两次，乾顺亦“拒之不从”。[⑥]金遂生灭夏之意，假言“欲马万匹”，要西夏支援，如西夏拒绝，金就以此为由向西夏出兵。夏明金意，假意允许，要金派人来取马。当金人来取马时，夏军将金人团团包围，一举全歼，大挫金人锐气。[⑦]

（五）天会五年（1127）三月，金单方面与夏、楚划定边界；楚废齐立，又单方面给夏、齐划界。[⑧]夏国对金的划界规定并不承认，天会十年（1132），夏向金请环、庆二州；天会十一年（1133）夏攻金怀德城；天会十四年（1136），夏取乐州、西宁州；天会十五年（1137），夏又向金乞河外三州。[⑨]据《金中杂书》载：“今年（金废刘豫时为天会十五年）正月间，陕西帅司申报夏国大军压境，并密封夏国榜来。时四太子方在东京，虑腹背受敌，几乎失措，大急，先发割界文字前往陕西，方解此事”。[⑩]金为了缓和金夏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不得不多次割地予夏，原想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金夏边界问题，但却事与愿违。

总之，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一连串的武装冲突，给刚建立的金夏关系投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

①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壬申条。
②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5。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绍兴二年十二月条。
⑤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9《熙宗孝成皇帝》1。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绍兴四年四月条。
⑦ （宋）王明清：《挥麈录》之《后录》卷4《夏人沮粘罕之气》。
⑧ （金）佚名：《大金吊伐录》卷4《与楚计会陕西地书》、《与齐计会陕西地书》。
⑨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
⑩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引《金中杂书》。

二

金夏之间的真正友好应始于金熙宗在位之时，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应是金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时期，而这种友好关系的出现，恰好与当时整个中国形势的发展及两国内部形势的需要完全一致。

金熙宗在位时，整个中国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辽已早亡，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西辽后，已安居西土，着眼于对西方的开拓与经营，东返故土已不可能，且无实际意义。金之腹心隐患基本消除。

金宋之间，双方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新的变化，金由强转弱，决定了金不能灭南宋，宋却由弱转强，但又还不足以亡金，各种势力的均衡逐渐发展为两个政权相峙局面的形成。加之建国不久的金王朝经过十多年残酷的拉锯战争后，亟需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尤其需要适应对新占领的汉族地区的统治。

因此，从金熙宗起，金统治者开始将太祖、太宗时期的对外扩张政策迅速全面地转变为对内的整顿与改革，铲除旧势力，加强皇权，迅速发展封建经济，而减少和停止对外战争，争取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乃是完成上述问题的前提。

到章宗时，金之封建政治及社会经济均已发展到极盛之时，“治平日久，宇内小康”。[①] 随着封建国家的繁荣，统治集团日益腐朽，骄奢淫逸，整个国家“风俗侈靡”。[②] 特别是女真上层分子转化为封建地主后，逐渐失去了原来“戆朴勇鸷”[③] 的习性，也像汉族士人一样吟风弄月，沉溺于嬉戏之中。[④] 这样的统治集团，这样的国家军队，早已丧失斗志，害怕战争，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邦交上不得不努力谋求和平。金夏友好关系的发展就出现在熙宗、世宗、章宗这三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与此同时，西夏已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灾难，国家一直处于动荡的战乱

---

① （元）脱脱：《金史》卷12《章宗纪》4。

② （元）脱脱：《金史》卷9《章宗纪》1。

③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重和二年正月十日条。

④ （金）刘祁：《归潜志》卷6：“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

之中，国家需要安定，人民怨恨战争，再加上夏仁宗仁孝即位之初，内乱频生，叛党纷起，[①]西夏政权处于十分危急之时。为了争取较长的和平时期来医治战争创伤，为了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金的信赖与支持得以平息叛乱，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权，因此，在对金关系上，夏仁宗主动与金修好。[②]

夏桓宗纯祐“仁慈恭俭”，亦是守成之主，即位后，与金交好的政策依然不变。正因为双方的统治者着眼点都是基于国内的改革和建设，因此，金夏关系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好转。以下从三方面来阐述这一时期金夏之间的友好往来。

（一）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 年）到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除正隆末与明昌初金夏之间两次极短暂分裂时期，双方曾发生过一些武装冲突外，六十余年中，双方没有爆发战争。夏仁宗即位之初，就决心与金修好，但却遭到了国内亲辽派的强烈反对，辽成安公主的旧势力夏州统军萧合挞联合境内契丹“乙室、耶剌旧部”发动叛乱，对于国内这股反金的契丹旧势力，夏仁宗毫不姑息，给予坚决镇压，为金夏友好扫清了障碍。[③]金熙宗时，宋将吴璘曾多次派遣使者到西夏，约西夏与宋联合攻金，然而，“夏人终不报”。[④]这些行动可以说明西夏与金交好确有诚心。尤为可贵的是金世宗对待西夏的态度，夏仁宗即位之时，国内一直动荡不安，蕃部起义，大臣叛乱，紧接着又是任得敬搞分裂阴谋，逼仁孝“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地”[⑤]给得敬，另立一国。任得敬一方面与宋臣王炎“帛书通好”，[⑥]希望获得宋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上表给金世宗，希望得到金的支持。金若无与夏友好的诚意，此应是夏国自我削弱的良机。但金世宗却严守君臣之体，为了维护夏国领土的完整，极力反对任得敬的分裂行为，并下诏仁孝：“先业所传亦当固守”，还说：“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全力以赴支持仁孝清除叛党。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5 绍兴十年四月“夏州统军李合挞据城叛”，绍兴十一年六月“夏枢密使慕洧兄弟叛”，绍兴十三年三月西夏大地震，“逾月不止”，“人畜死者万数”，七月“大饥，威、静、定三州部族为盗，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

② （元）脱脱：《金史》卷 4《熙宗纪》：皇统元年三次使金进贺，二年两次进贺。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5 绍兴十年八月及十月条。

④ （清）戴锡章：《西夏纪》卷 23 引《西夏事略》。

⑤ （元）脱脱：《金史》卷 134《西夏传》。

⑥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 149《奉诏录》4。

甚至还指责宋朝“汝国乃以帛书密与夏国任得敬结纳，此何理也？”[①]这种凛凛正气的大国君主气概令仁孝十分感动，任得敬之乱平息后，“仁孝深念世宗厚恩，十七年，献本国所造百头帐”。[②]而到宋孝宗淳熙时，“吴挺结约夏国，放达石契丹过彼界到陕西，许他时策为夏帝”。[③]宋方的意思是宋、西辽、西夏共同对付金，但仁孝也没有予以回应。金夏双方由过去互相贪图对方土地的争斗转向互相尊重和维护对方领土的完整统一，这种转变，可以反映金夏之间的友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深度。

（二）在熙宗到章宗的六十余年中，金夏交聘极为频繁。金夏初和，即通使节，此后，两朝庆吊，星轺相属百余年。然金之通使，盛于世宗、章宗两朝，夏之通使却繁于仁孝、纯祐之时。金太宗时，夏虽四时入贡于金，但金基本上没有派遣使者回聘。仁孝即位后，夏使入金益频，一般多为每年三至四次，最多时一年入金五次。金使的回聘自熙宗以后也日渐增多，金世宗时，每年回聘使者几乎平均两次。据统计，仁孝一朝入金使者高达一百四十三次，而世宗一朝回聘使者高达三十四次，在与宋、夏、高丽的聘使往来中，仅次于宋而多于高丽。[④]这些频繁的聘使往来，从表面看，似乎都不过是节日、喜丧的庆吊，而实际上通过这些往来，加强了金夏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政治上，金通过聘使往来，册立夏国各代君主；夏通过聘使往来，承认金对夏的宗主国地位。经济上，双方通过聘使往来，各自将名贵物资及土特产品作为贡品和赐品输入对方。《北行日录》卷上记载了西夏对金的贡品有“礼物十二床，马二十匹，海东青七，细狗五”。[⑤]《金史·礼志》记载金对夏的回赐有金银、绢帛、绫罗、布衣、貂裘、金带、鞍辔、书匣等，其中赐绢帛、绫罗量最大。[⑥]每次夏国使到金国，“许使贸易三日”。[⑦]《西夏书事》卷38称：“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大定中使者辄市禁物”。[⑧]这种一年几次的贡赐交往，实际上就是双方变相进行的贸易活

①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1《范公成大神道碑》。
②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49《奉诏录》4。
④ 以上统计数来自《金史》卷60至62《交聘表》上、中、下三卷。
⑤ （宋）楼钥：《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
⑥ （元）脱脱：《金史》卷38《礼志》11。
⑦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8绍熙元年十二月条。

动。文化上，双方通过聘使往来，许多文化名人都曾作为使者出使对方国，他们将各自国家的优秀文化产品也随之带到了对方。金著名诗人赵秉文“大安中出使宁夏，（李）屏山以诗送之”。[①]夏国著名史学家罗世昌、书法家刘志直也作为使者出使金。[②]夏使李师白两次使金，“尽得其民风土俗，著《奉使日记》三卷”。[③]在聘使往来中，金国屡派名医为夏宗室贵族治病，[④]王恽《二马图说》：“明昌初，西夏国母病，章庙遣尚医往治愈之，献名马回谢”。[⑤]先进的金国医疗技术传入夏国，必然推动夏国医学的发展。

（三）从熙宗到章宗的六十余年中，金向西夏展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榷场贸易。金天会十二年（1134）及天眷元年（1138），夏崇宗乾顺曾请金于陕西诸地置榷场通互市，金一直没有应允。到仁宗即位后，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应仁孝之请，首次对西夏置榷场进行互市。最早开放的榷场在云中西北，于“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口”[⑥]数处置场。这一带曾是辽与西夏的贸易点，金占有这一地区后，在辽榷场的基础上恢复和扩大了贸易。辽时，对于“铁禁甚严”，曾令夏国与鞑靼人“不得夹带交易”。金因为与夏关系日趋密切，且为了本国的经济收入，“铁禁遂弛”。[⑦]尔后，又继续在陕西沿边诸州置场，共有东胜、净、环、庆、兰、绥德、保安等州及来远军。[⑧]其中有些是北宋与西夏贸易的旧榷场，但绝大部分是金朝新置的榷场。西夏是羊马之国，除了畜产品是它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外，珠玉（如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软玻璃）、药材（柴胡、苁蓉、甘草、大黄）也是

---

① （金）刘祁：《归潜志》卷10。
② （元）脱脱：《金史》卷62《交聘表》下。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乾道三年正月条。
④ 据（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任得敬有疾，金派名医“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9庆元六年正月条，“（夏太后）罗氏病头风，久不愈。金使太医时德元、王利贞来治，并赐药物”。
⑤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6《二马图说》。
⑥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3《海陵炀王》上。
⑦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3《海陵炀王》上。
⑧ （元）脱脱：《金史》卷50《食货志》5。

西夏的名贵商品。[①]金的农业与手工业均较西夏发达，铜器、铁器、瓷器、丝、帛应该都是金对西夏输出的商品。《金史·西夏传》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②]《大金国志》称，金夏云中西北市场"铁禁遂弛"，[③]就反映了金对夏输出主要商品是铁和丝帛。《西夏书事》卷36载："仁孝遣使请市儒、释诸书，金主许之"。[④]在西夏黑水城发现金代平阳的出版物，[⑤]如黑城发现的《四美图》即题有"平阳姬家雕印"。[⑥]克恰诺夫在黑城遗书中还发现了用女真文写的残卷；[⑦]在西夏省嵬城发现金之"正隆元宝"。[⑧]据黑水城出土夏大庆三年（1142）夏金榷场贸易文书，双方贸易所涉物品种类甚多，其中丝毛织品有：粗褐、黄褐、白褐、白缨、绢、小绢（子）、中绢、川绢、河北绢、紫绮、紫押、纱、大纱、生押纱、粗押纱、小绫、中罗缬、小晕缬、小绝缬、川缬等；食用品有生姜、干姜、椒、蜜、茶、米等；文具则有笔、墨、连抄等。这其中既有西夏的商品，也有金国的商品。[⑨]这一切均可反映，在金夏榷场贸易中，西夏不仅在铁器、绢帛的需求上依赖于金，而且还从金榷场内购回大批的文化产品。但须着重指出的是，金夏之间的最大宗贸易仍是马匹。《金史·食货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⑩] 太宗时，粘罕一次提出要夏提

---

① （元）陶宗仪：《说郛》卷18引顾文若《负暄杂录》："玛瑙……生西北者，色黑青，……若灵、夏、瓜州羌地沙碛中时得之者尤奇；软玻璃，……夏国为最"。卷31引庞元英《谈薮》："犀角……出西蕃；琥珀，……出西蕃"。卷87引曹昭《格古论》："北方银州柴胡只须一服"。《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3："梏石生河西山谷；黑梏惟出西戎；流黄香出南海边诸国，今中国用者从西戎来。"卷4："雄黄生敦煌山之阳；青盐从西羌来者，形块棱，明莹而青黑色最奇；水银来自西羌界"；卷5："硇砂出西戎，今西凉、夏国及河东、陕西近边州郡亦有之"；卷6："甘草，河西川谷有之"；卷7："肉苁蓉生河西山谷"；卷9："甘松香出姑臧"；卷10："大黄生河西山谷"；卷13："胡桐泪出肃州以西平泽山谷中，今西蕃亦有商人货之者"；卷17："羖羱出河西川谷"；卷18："野驼出塞北、河西"；卷23："葡萄生陇西、敦煌山谷"。

②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3《海陵炀王》上。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绍兴二十四年九月条。

⑤ 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载《文物》1959年第3期。

⑥ K.T.W. "Chinese Print under Four Dynasties", in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3. Baltimore，1950.

⑦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第6章《十一至十三世纪的西夏文献——黑城遗书》，第129页。

⑧ 《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

⑨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5章《西夏与金朝的榷场贸易》，第97页。

⑩ （元）脱脱：《金史》卷50《食货志》5。

供马万匹[①]，白彦敬市马于夏金边境的西北路招讨司，一次得六千余马；[②]故宋人称“彼（指金）平时取马，或于西界（指夏）”。[③]可反映出在平时的榷场贸易中，夏对金的马匹贸易数量不小。值得注意的是，金本身与西域各国没有更多的联系，而西夏却正是中西商路上的一个大的中转站。西夏商人与金的贸易中，很多商品（如硇砂、和阗玉等）都是在中转贸易中获得，[④]这样西夏实际成了金与西方经济联系的纽带。仁孝时，金夏之间不仅榷场的公开贸易十分发达，而且富商边民利用榷场之便展开的走私贸易也十分兴盛，西夏“百姓多由火山军，武州八馆之天德、云内货铁于北方”，[⑤]以致迫使金国不得不关闭一些榷场。榷场贸易的开展对于双方均有利。北宋时，西夏经济的不足部分主要依赖同宋的贸易来补充，金灭北宋后，夏与南宋几乎没有任何经济联系，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只有依赖于金，同金展开各种形式的商业贸易，促使金夏之间的商品流通，打破国内较为单一的经济形式，这对西夏来说，乃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事情。当然这些商业贸易的开展对金也具有多重效益，榷场的税收能增加政府的经济收入，交流的商品可弥补自己生产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金朝通过这种贸易形式加强了与邻国、邻族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安定边境的作用。

金夏之间六十余年的友好往来，使我国北方广大农牧业地区得到了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的和平时期，使金、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从而促使12世纪中后期的北部中国走向了新的繁荣。

三

《金史·西夏传》称：“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从这段文字理解，元代史学家似乎认为从金太宗到金章宗这一时期，金夏关系一直是友好的，而且双方不曾爆发过战争，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从金太宗到金章宗八十余年中，金夏之间不仅爆发过多次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而且

---

① （宋）王明清：《挥麈录》之《后录》卷4《夏人沮粘罕之气》。

② （元）脱脱：《金史》卷84《白彦敬传》。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66册《刑法》2。

④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1《回鹘》。

⑤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3《海陵炀王》上。

在这一期间，金夏关系还出现过两次较大的分裂，一次则发生在海陵王正隆末年，一次发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这两次时间短暂的分裂，再加上卫绍王至金宣宗时长达十余年的金夏分裂，就形成金夏关系史上的三次分裂。由于《金史》的缺略，前两次的前因后果及分裂过程成了空白。我们综合宋金两方面文献记载，将这两次分裂勾勒出一个大体轮廓。

先谈海陵王正隆末年金夏关系的破裂。海陵王完颜亮是靠谋弑金熙宗而登上大金国皇帝宝座的，当时，由金熙宗开始的金夏友好关系正逐渐趋于正常。因此，当海陵王派使者至夏国告哀并谕废立之事时，仁孝义正词严地责问使者，“圣德皇帝（熙宗）何为见废？”[1]还拒绝接纳金之告哀使。这就说明，对于海陵王的“逆弑”行为，夏国统治者是不满的。海陵王篡位之初，两国关系还没有破裂，然而海陵王仗恃着金朝的强盛，视天下为草芥，极为狂妄地制定了不合时宜的侵宋决策，他还决定平宋之后，以兵由陕西定夏国。海陵王这一愚妄的决定实际上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自己的盟友夏国推向了南宋一边。据《南渡录》一条材料透露，在正隆二年（1157），金夏之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 正隆二年、三年，金兵大败夏人于河朔，因先二年夏人败金师（完颜）亮，至是遣大将军郭相公破之，即有云奴也。兵至灵州，尽复前后所侵故地。夏主李景光纳款，仍奉岁币金玉以和，金主不许，再遣将攻战，遂俘其弟李守光，夏主于是亲诣军前送款，乃从和。[2]

余嘉锡认为《南渡录》是一本伪书，“所载全非事实”。[3]余以为《南渡录》伪托辛弃疾之名不假，所载有一些怪诞不经及道听途说也是事实，但其中许多史实却与其他宋代文献相吻合，正隆年间的金夏之战就是一例。

《三朝北盟会编》中的一条材料亦印证了此事。宋方收到了完颜亮的一

---

①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宋）辛弃疾:《南渡录》卷4《正隆二年三年金兵大败夏人于河朔》,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1912年。按：辛弃疾《南渡录》现传有多种版本，有一卷本、两卷本及四卷本，其中以四卷本最佳，内有不少西夏资料，十分珍希，均为今西夏史研究所缺。此处“李景光”当即西夏国王李仁孝，为仁孝之另名也。

③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5《史部》3。

道诏书，其中云："今朕亲将五百万兵，速降夏国，以九月下旬回国"。[1]当时宋臣也认为这是完颜亮的妄诞夸饰之言，[2]余以为，完颜亮之言虽有夸大之处，但却并非妄诞。这又从《宋史·夏国传》中的一条材料得到印证：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归宋官李宗闰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怨金人叛盟，夺其所与地，此其情可见。

"金人叛盟，夺其所与地"，正与《南渡录》中正隆二年金"尽复前后所侵故地"相吻合。《西夏书事》卷36中保留的一材料也可作旁证，"（正隆四年三月）金人遣兵部尚书萧恭经画边界，颇占夏国分地"。[3]金夏边界早已划定，再次经画，必是解决正隆二年金夏之战后的遗留问题。正隆三年，夏国虽兵败求和，但对完颜亮的淫威及金占其分地是极为不满的。因此，主动派使者两次入南宋沟通已中断多年的夏宋联系。绍兴三十一年（正隆六年，1161），当宋向西夏发檄书及遣使臣至西夏要求派兵出击时，夏一反原来"终不报"的态度，积极回书响应。当年十月，西夏在《回刘琦等檄书》中言：

孤闻丑虏无厌，敢叛盟而失信，骄戎不道，妄称好以和亲，……顾惟雄贼，来寇吾疆，使长驱急骑以争先，终救杀扶伤而不暇，使彼望风而遁，败衄而归，岂知敢犯于皇威，遽辱率兵而大举。[4]

同年十二月，又在《回吴璘答书》中言：

尔众士既造于南土，我小国当应于西偏，……张皇宋之一路，鼓天兵而四临，……誓将灭其众而犁其庭，相与寝其皮而食其肉。[5]

---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1《炎兴下帙》引《金主伪诏》。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1《炎兴下帙》引《败盟记》。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绍兴十九年三月条。
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3《炎兴下帙》引《西夏刘琦等檄书》。
⑤ （元）陶宗仪：《说郛》卷18叶实《坦斋笔衡》。

从这两封极为珍贵的夏国文书中，可以看出西夏报仇心切，迫不及待地要与宋联合伐金，而且以实际行动投入了对金的战争。这在《金史·西夏传》中有所反映："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陇，夏亦乘隙攻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虽然《金史》中就这样淡淡一笔，如将这条材料与上述材料联系起来，就基本上可以认清《金史》隐去的这次金夏关系破裂的全过程。

正隆末，金世宗即位，迅速拨乱反正，夏人也将侵占的城寨归还于金，金又同意开放对夏的互市，①金夏关系遂复归于好。夏主李景光（仁孝）亲诣军前送款，乃从和。②

金夏关系的第二次破裂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西夏书事》卷38载：

> 金主璟（章宗）立，以夏国臣属已久，凡横赐、生日使礼意颇倨，仁孝怒，以兵侵岚、石等州，掠人畜而还。③

紧接着明昌二年（1191），夏又连续向金鄜、坊、保安州及镇戎军发动了进攻，掠取"牲畜无算"，还袭杀金将阿鲁带。④清人吴广成将这次金夏关系的破裂归咎于金使的态度，余以为，金使"礼意颇倨"只是仁孝出兵的借口，西夏叛金自有其内在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金世宗时，金夏之间经历近三十年的友好往来，"情谊笃厚"；但是，在友好之中并没有将旧有的矛盾彻底解决，特别是关于边界领土的纠纷依然存在。太宗时，金从夏手中夺走天德、云内二军及武州八馆之地，一直没有归还，后来答应金定陕西后，将陕西北鄙之地割予夏国。然而，这个条件几经反复，最终还是没有落实。⑤夏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迫于当时金之强大，不敢反抗，怨恨之心并不因盟好而泯灭，只要有时机，夏国必然会给予报复。

---

①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宋）辛弃疾：《南渡录》卷4《正隆二年三年金兵大败夏人于河朔》。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8绍熙元年十二月条。

④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陕西北鄙，余以为是指唐宋时陕西北面极边之地，即丰、胜州及三受降城一带，在云中迤西及北。金开始可能曾将胜州一带遗夏，但后又收回。正如宋人所言乃"孙权借荆州斗曹氏"之意。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7《靖康中帙》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引《林泉野记》之王以宁上书。

第二，金世宗时，金夏贸易发展极快，各种贸易形式都在全面展开，西夏通过这些贸易获得很大利益。但是榷场贸易的全面开放给边境保卫带来很多麻烦。部分间谍奸细趁榷场之便得以随便往来，[①]于是，金停闭了一部分榷场。原来西夏使者到京，金政府允许使者们自带货物到市场上自由买卖，后来由于使者们“辄市禁物”，[②]于是，金政府又命令使者只能在都亭内进行贸易。到金章宗即位之初，金政府干脆命“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③]由原来的三日贸易削减为一日。部分榷场关闭及使者贸易的限制和停止，给西夏带来很大的损失，金政府的这些行动给正在发展的西夏经济带来严重的威胁。

第三，夏仁宗晚年，国内安定，“渐启侈心”。[④]而金世宗死后，金章宗新立，人心未定，国势混乱。再加上章宗“极意声色之娱，内外嗷嗷，机事俱废”，[⑤]强大的金王朝至此已渐显颓势。仁孝认为，这是向金报复的良机，故借金使态度“颇倨”之由，向金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进攻，以图收复被侵占的故土。

金对西夏这一连串的军事进攻一直持忍让态度，除了要求西夏严惩肇事者外，并没有对西夏进行军事报复。[⑥]因此这场分裂没有持续几年，仁孝死，纯祐即位，金夏关系又重新和好。

金夏关系的第三次破裂在卫绍王完颜永济大安元年（1209）。大安元年二月，蒙古军再次攻入西夏克兀剌海城，破克夷门，进而围逼夏都中兴府，夏主安全遣使至金，乞金派军队援夏抗蒙。当时，金国大臣都认为“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然而，卫绍王却认识不到这一点，居然还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⑦]拒绝派军队援夏而隔岸观火。这样，本来就积怨已久的金夏矛盾更为加深，终于爆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极为愚蠢的自相残杀。

在此期间，夏对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从大安二年（1210）至元光二年

---

① （元）脱脱：《金史》卷50《食货志》5。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8绍熙元年十二月条。
③ （元）脱脱：《金史》卷9《章宗纪》1。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8绍熙四年九月条。
⑤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1《章宗皇帝》下。
⑥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0嘉定二年十月条。

（1223），夏对金的军事进攻一直没有停止，金陕西边境的州军城寨无一不遭夏军的攻掠和破坏，吴广成言：“夏自安全衔失援之憾，构怨于金，遵顼继之，平凉、巩、会间无岁不扰”。[①]蒙古从公元1205年就开始进攻西夏，对于蒙古的强大及对外扩张，西夏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西夏采取的却是附蒙攻金之方略。当蒙古铁骑南下中原，攻掠金国时，西夏每次都出兵配合作战，西夏统治者意识不到附蒙攻金的危险性，他们的经验是，过去附金侵宋得到不少好处，现在趁蒙金交战之时也可以占一些便宜。交战之初，金多以防御为主，许多城寨连被攻陷。[②]贞祐四年（1216），金宣宗下令主动出击，分兵直取夏国盐、宥、灵、夏等州。西夏附蒙攻金不得志，转而又遣使南宋，“因思假宋兵威，以逞其忿”。[③]兴定四年（1220），宋夏联合攻金，在金军的顽强抵抗下，宋夏军队都被击退，夏联宋攻金也没有成功。其间虽有复盟之时，如金宣宗时，赵秉文有《答夏国告和书》称：“乃者北兵大扰，因而东道不通，岂意同盟，堕此奸计，俾我两朝之交质，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开悔祸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④]但这种和盟时间应极为短暂。

有人将第三次金夏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西夏，[⑤]这是不妥当的。余以为，第三次金夏关系的破裂与第二次破裂有不同之点，那就是金对这次破裂应承当一定的责任。金夏既是唇齿相依的邻国，又是盟好数十年的友邦，夏遭蒙古军队的重围，从道义上讲，金援夏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蒙古军已三次攻入西夏，西夏削弱，蒙古则强，蒙古越强，于金则越为不利。从本身利益上讲，援夏抗蒙对金来说乃是刻不容缓之急务。然而，昏庸的卫绍王却视以敌国相争而幸灾乐祸，这不能不说是金在处理金夏关系时所犯的极大错误。因此，余以为第三次金夏关系的破裂，金应负其首要责任。

对于西夏来说，如果能对金持隔岸观火的态度消怨释怀，捐弃前嫌，并主动与金修好，当时，金兵未弱，夏国未衰，两国联合抗御蒙古，蒙古灭金、灭夏，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夏国统治者丧失了在与宋、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0嘉定七年七月条。

② （金）刘祁：《归潜志》卷5：“大安中，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边州”。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0嘉定二年十月条。

④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卷10《答夏国告和书》；（清）庄仲方编：《金文雅》卷4《答夏国告和书》。

⑤ 张博泉：《金史简编》第7章第5节《金与夏的战争》。

辽、金早期斗争中的明智，为逞一时之忿，对金发动一连串的军事进攻，他看到的只是“金人亦为鞑靼所扰，势益衰”。[1]于是乎可以乘机抢夺金之领土，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不惜借蒙古之力来夺金之土地，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

当金夏两国打得“精锐皆尽，两国俱毙”[2]时，双方才停止战争，携手合作。然而为时已晚，蒙古大军乘金夏两败俱伤之机，前后不过七八年，就将金夏这两个曾在我国北方逞雄百余年的少数民族政权吞灭，建立了又一个大统一的新王朝。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9《西夏叩关》。

② （元）脱脱：《金史》卷 134《西夏传》。

西夏“铁鹞子”诸问题的考释 *

西夏有一种经常出现的军队，称为“铁鹞子”。这种军队战斗力极强，在西夏对宋作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铁鹞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军队？它源出何处？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些学者对“铁鹞子”一军还产生了较大的误解，如吴天墀先生在他的《西夏史稿》中，就曾对“铁鹞子”作了这样的解释：“按：金人侵宋曾使用所谓‘拐子马’，殆属于与西夏铁鹞子相同的兵种。据清人赵翼考证，这本是古代鲜卑族早已使用过的战术。他的《陔余丛考》卷20‘拐子马始于女真’条说：‘《宋史》谓金善用拐子马，三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皆女真为之，号常胜军，战酣然后用之。……按《晋载记》：穆帝时，慕容恪击魏主冉闵，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阵而前，遂破闵，是古时已有为之者。’”[①]吴先生还撰文说：“（西夏）在军事上使用‘铁鹞子’，与金军‘拐子马’战术是相同的。……这种特殊战术，又是从鲜卑传下来的”。[②]如果将吴先生对“铁鹞子”的认识简单归纳，就可以列出下面等式来，即铁鹞子＝拐子马＝连环马（铁锁连其马为方阵）→鲜卑人所传。余不同意吴先生这一观点，为了澄清事实，并对铁鹞子作出正确探索，特作如下考释。

一、有关西夏“铁鹞子”的文献记载

要对西夏“铁鹞子”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第一步工作应该是将有关

---

* 原文发表于邓广铭、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章第3节《西夏的政治军事制度》注11，第219—220页。

② 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文献中关于西夏“铁鹞子”的记载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由于元人没有为西夏修专史，因此，关于西夏的军事制度也就没有专门记载，余也就只能从零星记载中观其涯略。西夏“铁鹞子”一词最早记载在元昊时，《长编》卷 132 载：

（庆历元年七月癸丑）王尧臣又言：昨安抚陕西，体问得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敌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①]

这条材料又见于《宋会要辑稿》及《诸臣奏议》诸书中，而西夏“铁鹞子”一词最晚记载见于乾顺时，《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3 载：

（绍兴九年二月）夏人以“铁鹞子”万骑来，显忠以八百余人拒之。[②]

在宋夏最有名的“永洛之战”中，西夏曾以“铁鹞子”大败宋军。《永乐大典》卷 8089《永洛故城》载：

贼（指西夏）大至，俄铁骑五千（原文为十，当误），涉无定河。（高）永能又进前曰：“此羌人铁鹞子骑，过河得平地，其锋不可当，乘其未济击之，可使歼焉。若使之毕济，我师殆矣。”（徐）禧又不听。已而铁骑过河，冲践王师，阵遂动，贼以大兵乘之，（曲）珍等大败，奔归城中者三百人。[③]

这条材料同见于《宋史·夏国传》，但略于此。又在元祐七年的宋夏战争中，西夏“铁鹞子”被宋军击败。《长编》卷 479 载：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七月癸丑条。
②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3《李显忠传》。
③ 《永乐大典》第 9 册卷 8089《永洛故城》。

（元祐七年十二月丁卯）至未时以来，贼军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1]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还无法看出“铁鹞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军队。《宋史·兵志》中宋人何常有一段话介绍西夏“铁鹞子”比较详细：

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前所谓劲马奔冲，强弩犄角，其利两得之，而贼之步跋子，与铁鹞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之中，必先择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斩马刀，别以一将统之，如唐李嗣业用陌刀法。遇铁鹞子冲突，或掠我阵脚，或践踏我步人，则用斩马刀以进，是取胜之一奇也。[2]

宋人何常的话又可与夏国晋王察哥所言印证，《西夏书事》卷31载：

（察哥）言：“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3]

北宋中期人范镇所著《东斋记事》卷2中所记西夏“铁鹞子”与何常所言互为补充：

王吉阵于兔毛川，贼（西夏）以铁鹞子来阵，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阵刀披其甲，豁马臁，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自陕西用兵，惟兔毛川胜捷者，由劈阵刀也。铁鹞子，贼中谓之“铁林”，骑士以索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9元祐七年十二月丁卯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190《兵志》4。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崇宁二年九月条。

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以豪族子弟亲信者为之。[1]

这种说法又可在《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外记》得到印证。《宋史·夏国传》：

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2]

《辽史·西夏外记》：

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3]

范镇所言西夏称"铁鹞子"为"铁林"，又可在北宋人钱惟演的《金坡遗事》中得到验证：

西边呼铁鹞子为铁林骑。[4]

材料大致就是这些，研究者只能依据这些材料对西夏的"铁鹞子"进行判断，一切无根据的推测都是不科学的。

二、关于西夏"铁鹞子"的认识

综合上面所提供的材料，余可对西夏的"铁鹞子"提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铁鹞子"就是"铁骑"，即所谓《宋史·夏国传》的"重甲"、"善马"，在文献中有时称"铁鹞子"，有时又称"铁骑"，即西夏国内一种披有铁甲的骑兵，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种装甲骑兵。这种装甲骑兵可能始建

①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2。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④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20《武部·甲兵门》。

于元昊时代。《宋史·夏国传》称：“铁骑三千，分十部”。[①]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元昊）常选部下骁勇自卫，分为十队，队各有长”。[②]很可能这种骑兵开始是作为夏国皇帝禁卫军而创建的，相当于汉武帝所建的“羽林骑”。由于元昊经常率军作战，因此这支被称作“铁鹞子”的禁卫军也经常投入到战争中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经常作战的正规军队，人数也由“三千”发展到“数万”。因此，余以为，西夏“铁鹞子”一词的含义，只能表示是一种骑兵兵种，铁，即指骑士和战马所披的铁甲；鹞子，则是比喻这种骑兵迅捷勇猛如同鹰鹞。

（二）“铁鹞子”不是“连环马”。赵翼所引《晋载记》中的连环马是“铁锁连其马为方阵”，就是将几匹马用铁锁皮绳相连，有三马连环，也有五马连环，一匹马倒下，其他几匹马都不能行进。首先，目前所见的全部西夏“铁鹞子”的记载没有一条说“铁鹞子”是连环马。范镇所说的“铁林”，也没有连环马的意思。铁林者，铁骑如林也，即比喻西夏的铁骑进攻时像树林一样密密麻麻，但绝不是连环马，既为连环马，就应是极为笨重的骑兵，行动也必然迟缓。但“铁鹞子”不是这样，它能“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这难道是连环马所能达到的吗？苏舜卿在《庆州败》中描写西夏铁骑说：“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③]用连环马埋伏在山上去围截敌人，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肯定“铁鹞子”不是连环马。但是“铁鹞子”有一个特征容易使人误会，就是《宋史·夏国传》和《辽史·西夏外记》中的记载，说：“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这个“用钩索绞联”很容易使人误为连环马。这个“用钩索绞联”不是将几匹马相互连起来，而是将人与马用钩索连起来，也就是范镇所言：“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其目的是“虽死马上不落”，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不愿意让自己的尸体落入敌人之手所采用的一种常见方法，与连环马无丝毫关系。

（三）“铁鹞子”不是“拐子马”。这里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拐子马”。“拐子马”不是“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的连环马，这个问题已由邓广铭先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③ （宋）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庆州败》。

生进行了极为精当的考证，他还说，“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1]余仅援引两条原始材料进行诠释，《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2]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7载：

东西拐子马，为大阵之左右翼也，奉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3]

很明显，“拐子马”是一种用骑兵布置的阵法，即“拐子马阵”，又可称“拐子阵”。而“铁鹞子”一词不具有任何阵法的意义。“拐子马”或进攻、或救援的阵法是将骑兵分为左右翼，而“铁鹞子”则完全不具备这种阵法规矩。《宋史·夏国传》说：“铁骑为前军”，《辽史·西夏外记》是为“前锋”，《东斋记事》则是以“铁鹞子”为“束阵”，《宋朝事实类苑》则是将铁鹞子埋伏在山上。[4]《长编》记载更清楚：“贼之师回，皆选精兵铁骑以为殿后，行阵坚壮甚雄伟，我之追兵，缘路屡为铁骑翼张围里，难以追逐”。[5]从没有发现作为左右翼骑兵向敌人进攻的记载。因此，可以说“铁鹞子”与“拐子马”是外延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可以说“铁鹞子”与“拐子马”使用的左右翼铁骑就是“铁鹞子”一类的骑兵，而不可以说“铁鹞子”与“拐子马”是相同的兵种，“拐子马”不是一种兵种。也不可以说“铁鹞子”与“拐子马”是相同的战术，因为“铁鹞子”不是一种战术。在西夏的军事史上，不知道是没有掌握“拐子马”这一战术，还是不需要使用这种战术，但可以肯定一点，西夏未见“拐子马”的记载。

---

① 邓广铭：《岳飞传》附录2《有关“拐子马”诸问题考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4—531页。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炎兴下帙》引《汪若海札子》。

③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7《东西拐子马阵》。

④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2《诈妄谬误》。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9元祐七年十二月丁卯条。

三、"铁鹞子"之名始于契丹

吴先生认为"铁鹞子"是一种战术，并称它"是从鲜卑传下来的"，这种看法不太妥当。余以为，"铁鹞子"实质上就是"铁骑"，也就是装有铁甲的骑兵，它根本不需要从哪儿传下来，只要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大都有这样的军队。《三朝北盟会编》卷218《韩世忠墓志铭》：

> 北方之俗，壮士善骑健马，披铁衣数重，上下山坡如飞，矢刀不能伤，故常以骑兵取胜。①

这不就是"铁鹞子"吗？只不过没使用"铁鹞子"这名罢了。再看前引《宋史·兵志》何常的话："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平夏"就是指居住在银夏州的党项部落；又"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山间部落"是指居住在横山地区的党项部落，横山在夏州南，唐称南山部落。《宋史·宋琪传》载：

> 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平碛，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②

平夏部即鲜卑拓跋部，其习为游牧之俗，长于骑战，故"铁鹞子"出自平夏部；南山部为半耕半牧部族，而长于步战，故"步跋子"出于南山部，并不是西夏的"铁鹞子"是鲜卑传下来的，而是西夏的拓跋部仍然保持着"善骑健马，披铁衣数重，上下坡如飞"的"北方之俗"。

"铁鹞子"之名最早见于契丹。《辽史·百官志》有"左右铁鹞子军详稳司"③的机构，《辽史·高模翰传》称后晋时，高模翰曾在辽国"总左右铁鹞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8《炎兴下帙》引《韩世忠墓志铭》。

② （元）脱脱：《宋史》卷264《宋琪传》。

③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子军”，[1]《辽史·萧阳阿传》称他曾为铁鹞军详稳，[2]《资治通鉴》卷284后晋开运二年，契丹攻晋，“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胡三省注云：“契丹谓精骑为铁鹞，谓其身被铁甲，而驰突轻疾，如鹞之搏鸟雀也”。[3]很明显，契丹的“铁鹞子军”也是指“铁骑”，即装甲骑兵。但值得注意的是，契丹有左右铁鹞子军，这是不是“拐子马”？余以为，单从“左右铁鹞子军”上看，它是不能算作“拐子马”的。因为这两个“铁鹞子军”从字义上理解还只能是两个部队的番号，而“拐子马”却是一种阵法。如果将左右“铁鹞子军”作为左右翼进攻的骑兵来使用，那就是“拐子马”了。契丹设置左右“铁鹞子军”，很可能就是为“拐子马”这一阵法而设置的。

西夏在李继迁至元昊这一段时间内受契丹影响特别大。可以说，西夏国是在契丹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契丹不仅在军事上支持西夏反宋，而且还经常以宗主国的身份调遣西夏的军队。李继迁刚开始反宋时曾担任辽国的“夏州管内蕃落使”，他的弟弟李继冲则负责“四蕃都军所”，均属辽国“西路诸司”管辖。[4]因此，余以为，西夏“铁鹞子”之名是从辽国搬来的，将自己国内的精锐铁甲骑兵也称作“铁鹞子”，应该是受契丹的影响。

不仅契丹有“铁鹞子”，女真也有“铁鹞子”，《三朝北盟会编》卷72载：

> 先是应天帅胡直孺以东道总管领兵一万来勤王，至襄邑遇铁鹞子百余骑，一万之众，不战而溃。[5]

宋勤王兵在河南襄邑所遇的“铁鹞子”可以肯定是女真人的“铁鹞子”。这样，女真人不仅有称“拐子马”的，还有称“铁鹞子”的，受谁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契丹不仅有“铁鹞子军”，还有“铁林军”。《辽史·百官志》有“铁林

---

① （元）脱脱：《辽史》卷76《高模翰传》。
② （元）脱脱：《辽史》卷82《萧阳阿传》。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4。
④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⑤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2《靖康中帙》引《别录》。

军详稳司”，[①]《宋史·太宗纪》有“契丹铁林厢主”，[②]《宋史·何继筠传》有契丹“铁林相公”。[③]

据前引范镇及钱惟演所言，西夏人自己将“铁鹞子”又称作“铁林”或“铁林骑”，但契丹“铁鹞子军”与“铁林军”却是两支军队，《辽史·萧阳阿传》：“年十九为本班部君，历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④]可见，西夏的“铁鹞子”与“铁林”之名虽然同契丹都有关系，[⑤]但双方的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契丹有“铁鹞”，还有“铁林”，而西夏则将“铁鹞”与“铁林”合二为一了。

四、西夏“铁鹞子”与“背嵬军”的关系

“背嵬军”在南宋是一支十分著名的军队，中兴诸将不仅韩世忠、岳飞手下有“背嵬军”，[⑥]李显忠、刘光世、吴玠、吴璘手下也有“背嵬军”，[⑦]直到宋孝宗淳熙年间还重建“背嵬军”。[⑧]南宋最早创建“背嵬军”的是韩世忠。孙觌《韩世忠墓志铭》载：

> 公在建康，搜集恶少年、敢死士为一军，教以击刺战射之法，号背嵬，如古羽林、佽飞、射声、越骑之俦，履锋镝，蹈水火，无一不当百。于是，胡马牧淮、楚间，公至天长之大仪，与之遇，虏酋孛堇挞不也拥骑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长柄巨斧堵而进，上椹其胸，下梢其马

①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② （元）脱脱：《宋史》卷4《太宗纪》1。

③ （元）脱脱：《宋史》卷273《何继筠传》。

④ （元）脱脱：《辽史》卷82《萧阳阿传》。

⑤ “铁林军”在唐宋五代时屡见，多在沙陀人统治的后唐政权中，参阅（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之《安元信传》、《刘彦琮传》、《袁建丰传》、《李建崇传》等，沙陀之“铁林军”与契丹之“铁林军”不知何关系。

⑥ （元）脱脱：《宋史》卷365《岳飞传》。（明）韩霖《守国全书》卷5之2引曹尔植《兵效纪略》韩霖加按语称：“曹大司农参藩济南，练兵二千，不减岳家背嵬军。”可见明人韩霖对岳飞之背嵬军评价甚高。

⑦ 参见《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景定建康志》卷14刘光世条及《宋史》卷366《吴玠、吴璘传》。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绍兴九年三月丙申条，知寿州王威手下亦有“背嵬军”。王威似为韩世忠属下。

⑧ （元）脱脱：《宋史》卷34《孝宗纪》。

足，百遇百克，人马俱死。①

南宋人袁燮《论招募》的札子中云：

中兴之初，背嵬一军，最为勇健，各持巨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此敌深惮之。②

韩世忠首建的“背嵬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从上面记载看，应该是一支步兵，是一支由勇健士卒组成的使用“长柄巨斧”去破金人铁骑的步兵。令人费解的是，韩世忠为什么将这支军队取名为“背嵬”？南宋人赵彦卫这样解释。《云麓漫钞》卷7载：

四帅之中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令为之籍。每旗头，寻甲队阙，于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众者为之，将副有缺，则于诸队旗头押队内取之；另置亲随军，谓之背嵬，悉于四等人内角其优者补之。……燕北人呼酒瓶为嵬，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故韩岳用以名军。③

这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的附会，将“背嵬”解释为背上负酒瓶的人，实在有些滑稽。“背嵬”一词应该是西夏语，这在文献中并不少见。《长编》卷510载：

（元符二年五月乙卯）河东司言：靖化堡麻也族蕃官伊锡元是衙头背嵬，投汉累为向导，致获全胜。④

《宋会要辑稿·蕃夷》6：

---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8《炎兴下帙》引《韩世忠墓志铭》。

② （宋）袁燮：《絜斋集》卷7《边防质言论十事》之《论招募》。

③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元）李翀：《日闻录》所录文字相同。又“嵬”，他本又作“嵬”。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乙卯条。

（元符二年）七月三日，泾原路经略司收到部落子讹山等二十人归正。按：讹化唱山乃妹勒都逋亲随得力背嵬。[①]

这里的“衙头”应指兴州（西夏首都）或夏国朝廷。[②]“背嵬”作何解释呢？南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9载：

背嵬者，大将帐前骁勇人也。章氏《槁简赘笔》曰：背嵬即圆牌也，以皮为之，朱漆金花，焕耀炳日。予将漕时，都统郭纲，韩蕲王背嵬也。……惟章氏书号为皮牌。[③]

章氏言背嵬为皮牌显然不合适，拿到上引的史料中去套也明显不合，只有用“骁勇人”来解释则比较适宜。西夏文“龙”、“鹰”二字都读作“嵬”，“蛇”字读作“瘂”，与“背”音相近，[④]“背嵬”可译作“蛇龙”或“蛇鹰”，用它们喻作“骁勇人”是很合适的。故《宋史·韩世忠传》云：“（世忠）师还建康，置背嵬军，皆鸷勇绝伦者”。[⑤]《景定建康志》卷14：“刘光世置背嵬亲随军，皆鸷勇绝伦，一以当百”。[⑥]前引《韩世忠墓志铭》：“号背嵬，如古羽林、佽飞、射声、越骑之俦”。羽林、佽飞、射声、越骑都是汉代设置武官之名，由骁勇之士充任，前引《云麓漫钞》称“背嵬军”是在“角其勇出众者”的“旗队、甲队、将、副”四等人内之“优者”拣选，均为极骁勇之士。可见，“背嵬”当为“骁勇”解。

这个问题搞清楚后，再找一找北宋是否有“背嵬军”。前面所引材料说明了韩世忠创建成的“背嵬军”是一支勇健士卒组成使用“长柄巨斧”去破金人铁骑步兵，这种类似的军队在北宋是有的，前引《宋史·兵志》何常的

---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

② （宋）郑刚中：《北山集》卷13《西征道里记》：“夏国主兴州谓之衙头”。（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衙头，盖夏国朝廷也”。

③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9《背嵬》。

④ （西夏）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地用下》。

⑤ （元）脱脱：《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⑥ （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卷14刘光世条。

讲话中有："步兵之中，必择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斩马刀，别以一将统之，如唐李嗣业用'陌刀法'。'陌刀'即长柄刀，又称'斩马刀'，刀长丈二尺以上，毡皮裹之"。[①]这种由"魁健材力之卒"组成的使用"陌刀"专门破西夏铁鹞子的步兵就是"背嵬军"，只不过在北宋官方的军队番号不称"背嵬"而称"骁勇"，《宋史·兵志》陕西路下的步兵中有"骁勇"一军驻守邠州，[②]它就是北宋的"背嵬军"。沈括《梦溪笔谈》卷5《边兵凯歌》有：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③]

这里的"回回"是指西夏，[④]"背嵬"即指"背嵬军"，意思是，背嵬军的士兵穿着银白色的衣甲去打西夏，沈括当时是鄜延路（又称鄜延邠宁路）经略使，邠州的"骁勇军"应属他调遣，他在歌词中采用"市井鄙俚之语"，[⑤]将"骁勇"的西夏读音"背嵬"作歌词写入军歌中，可见，这一"俗语"应就是当时当地老百姓的方言，即称"骁勇军"为"背嵬军"。韩世忠生在西边，长在西边，又同西夏多次作战，[⑥]部下建有"背嵬军"的将领除岳飞外，均为长期同西夏作战的西北将领，李显忠、刘光世本身就是党项族人。[⑦]因此，他们对"背嵬"一词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北宋人破西夏铁鹞子的军队名称，被他们移来作为破金人铁骑的名称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永乐大典》卷10877引庞谦孺《白苹集》中的两首诗，也可以说明"背嵬军"与"铁鹞子"的关系。其一曰：

铁鹞乘时转海津，兜牟闪闪白如银，

---

① （元）脱脱：《宋史》卷190《兵志》4。
② （元）脱脱：《宋史》卷189《兵志》3。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5《边兵凯歌》。
④ 参阅拙文《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
⑤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5《边兵凯歌》。
⑥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
⑦ 韩世忠，延安人；吴阶、吴璘，德顺军人；李显忠，绥德清涧人，为党项苏尾九族；刘光世，保安军人，为党项蕃官刘绍能之后。参见各人《宋史》本传，又参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杂事·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唯该书记刘光世为保大军人，误。

只今边郡羞投拜，淮北淮南正杀人。

其二曰：

间道诸军遣背嵬，柘皋合战打头回，
不烦宣抚亲提剑，铁塔前锋一布摧。[①]

第一首写金人之铁鹞子驰骋淮海，第二首则写背嵬军冲锋陷阵，这不正好说清楚了二者的关系。于是，韩世忠创建了南宋著名的“背嵬”一军，并在击破金人铁骑的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后来李显忠、吴氏兄弟亦仿效韩世忠创建的“背嵬军”，仍用“背嵬”一名。至于岳飞之“背嵬军”，就只能视之为借用其名，但各家背嵬军均应是一支专门用来破敌人铁骑的骁勇军。

① 《永乐大典》第5册卷10877引庞谦孺《白苹集》。

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 *

西夏监军司，是元昊建国以后推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军事制度。为便于对周边宋、辽、鞑靼、回鹘、吐蕃等进行军事进攻和防守，西夏将全境分为若干军事区，名为监军司。元昊时期，西夏所建监军司之数为十八所，到西夏后期，为十二监军司，[①] 详见《宋史·夏国传》。其名为：左厢神勇、石州祥祐、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罗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白马强镇、瓜州西平、黑水镇燕、黑山威福。这十二监军司中，除宥州嘉宁、韦州静塞、卓罗和南、甘州甘肃、瓜州西平五监军司驻地已有定论外，其余七监军司驻地尚有异议。本文拟就此略陈陋见。

一、左厢神勇监军司

左厢神勇监军司，省称左厢监军司、神勇军，[②]《西夏须知》作“神猛军”。[③]

左厢监军司设在何处？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2 说驻地在天都山；[④]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以下简称《地形图》）标

---

* 原文发表于《历史地理》第 6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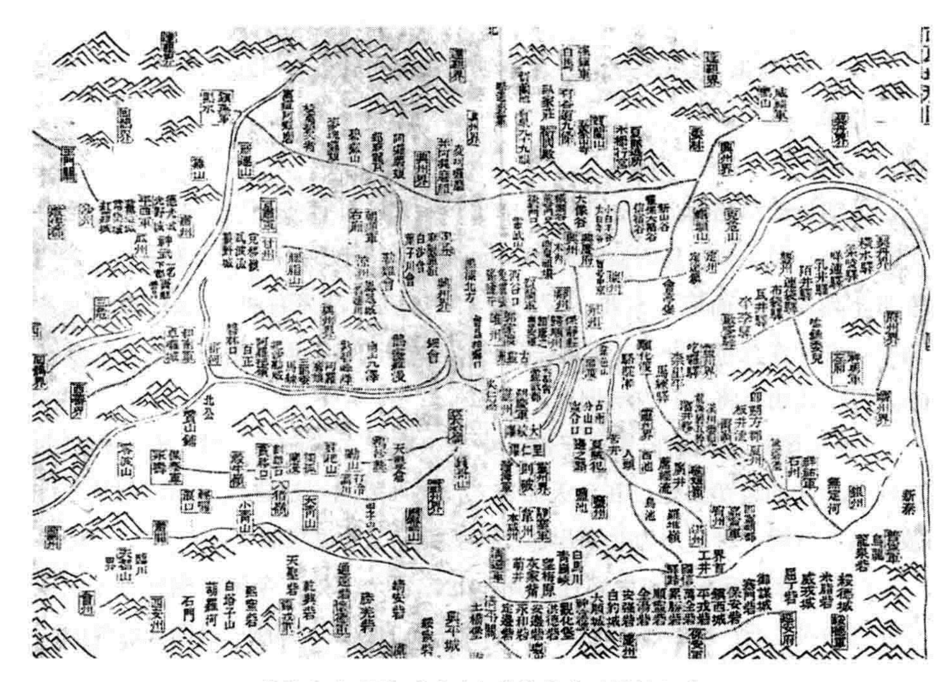
① 参阅拙搞《西夏史琐谈》第 5 节，载《宁夏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② 元昊初建监军司时，以驻地命名，无军号。至谅祚时，才仿宋制，主军名，尔后文献中或呼全名，或省称。参见（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6 嘉祐七年六月癸未条。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0 引刘温润《西夏须知》，刘书今佚。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2 景祐三年九月条。

在麟、府州之间；[1]《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西夏图》（以下简称《西夏图》）将左厢神勇监军司标在夏州铁冶务东北二百余里。[2]这三种说法，孰正孰误，试予辨析。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附《西夏地形图》

吴广成认为在天都山。天都在横山之西，北宋人曾公亮言：

> 天都山，按《关右陇西图记》并无此山，今虏中目为天都山，在镇戎军西北百五十里。[3]

北宋人章楶言：

---

①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据黄盛璋先生介绍，在明万历三年刊刻《重校范文正公集》附录中找到此图，参阅黄氏《唯一传世的金朝地图——陕西五路之图初探》，载《中国古地图集：战国至元》，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5—68页。

②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西夏图》，第36—37页。

③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勘会天都山乃在九羊谷西北，去镇羌寨一百余里。[①]

光绪《海城县志》卷6《古迹志》：

天都山，一名西山，在县西四十余里，……山下有元昊避暑宫遗址。[②]

上述记载虽略有差异，但与《宋史·地理志》西安州境内的天都山地望大致相合，即在今宁夏固原海城西不远。[③]如西夏以兴、灵二州为中心，兰州一带不属左厢，而应为右厢（后引魏泰书亦证天都为右厢）。吴广成以左厢监军司驻地在天都山，将右厢监军置于夏州弥陀洞，但天都山在右，夏州在左，吴广成明显将左右方向倒置。

《地形图》标左厢监军司于麟州之北，府州之南。按：麟、府二州是北宋河东地区的边防要地，在金灭北宋之前，西夏虽屡次进攻二州，但从未占领州城。既麟、府二州为北宋州郡，西夏焉能于此设置监军司？

《西夏图》标左厢监军司在夏州东北二百余里处，今陕西榆林县东，地望亦有偏误之处。现试述宋人关于左厢监军司的记载。郑刚中《西征道里记》：

夏国左厢监军司接麟、府沿边地，分管户二万余户。[④]

魏泰《东轩笔录》卷8：

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厢，命两将统之，刚浪凌统明堂左厢，野利遇乞统天都右厢。[⑤]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6元符元年三月乙丑条。

② （清）杨金庚：《（光绪）海城县志》卷6《古迹志》，《甘肃新通志》卷6《舆地志·山川》上固原直录州海城县条同，而（明）何景明《雍大记》卷10《考迹》称："天都山在兰州东三十里。"又《（道光）兰州府志》卷2《地理志》称天都山在皋兰山南三十里，不确，当在海城西。

③ （元）脱脱：《宋史》卷87《地理志》3。

④ （宋）郑刚中：《北山集》卷13《西征道里记》。

⑤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8。

所谓山界，就是“东则横山，西则天都山、马衔山”一线的宋夏边界地带。[①]“明堂左厢”说明其监军司驻地与“明堂”有关，“明堂”即明堂川之略。《宋史·神宗纪》：“曲珍等败夏人于明堂川”。[②]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载“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③]银州故址今已发现，在榆林河与无定河交会处，与上引记载相合，知明堂川即今之榆林河。

又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载：

> 西贼大将刚浪凌兵马最为强劲，在夏州东弥陀洞居止，又次东七十里有铁冶务，即是贼界出铁制兵器之处，去河东麟、府界黄河西约七八十里。[④]

这恐怕即诸书所称监军司在夏州弥陀洞之据。按魏泰言，刚浪凌为左厢监军司统帅，则左厢监军司的驻地应在夏州东弥陀洞。夏州故址在今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白城子，则左厢监军司应在其东的海流图庙一带。其地离明堂川甚近，故宋人称为“明堂左厢”，又因与宋麟、府二州毗连，故亦可称“接麟、府沿边地”，特别是西夏监军司多驻在宋夏边镇，洪、宥、韦、绥等州都设有监军司，作为西夏早期根据地的夏州这一边境重镇，应必有监军司之设。《西夏书事》卷35有“夏州统军李合挞”[⑤]之称，统军为监军司正职，可证夏州设有监军司。

二、石州祥祐监军司

《宋史·夏国传》载：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6元祐六年九月壬辰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16《神宗纪》3。

③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9《徐禧永乐之败》。又《宋史》卷350《贾岩传》亦载：“又为河东将，败西夏兵于明堂川”。（宋）李复：《潏水集》卷11载：“督运宿明堂川，在夏州北”，实应为夏州东北，同书卷16又有诗：“督运昨宿明堂川，……密雪拥渡无定河”之句。

④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上册《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再奏乞蒋偕转官知原州》。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绍兴十年四月条。

（嘉祐七年）又改……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为祥祐军。[①]

《宋史·夏国传》所列十二监军司有“韦州静塞军”、“石州祥祐军”，《地形图》也标为“韦州静塞军”、“石州祥祐军”。《长编》卷319载高遵裕言：

韦州在横山之北，西人恃此为险扼，立监军司屯聚兵马，防拓兴、灵等州。[②]

《西夏书事》卷29作：

韦州居横山之北，曩霄时立静塞军司。[③]

可见，“静塞军”为韦州监军司的军号，“祥祐军”则应为石州监军司的军号，《夏国传》上将石州和韦州的监军司名称相互颠倒。

西夏建国之初并无石州，《宋史·夏国传》：

元昊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④]

《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绥怀之初，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⑤]

两处记载，均不及石州。可见，《宋史·夏国传》嘉祐七年有石州监军司之名不可信。《长编》卷196：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庚子条。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元祐七年三月条。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⑤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嘉祐七年）夏国改……威州监车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①]

北宋延州守臣刘温润《西夏须知》：

（嘉祐七年）五月，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②]

威州即韦州，则嘉祐时，静塞军为韦州（或威州）监军司军号，祥祐军为绥州监军司军号。又《西夏书事》卷22：

（熙宁三年）绥州监军吕效忠犯德顺军。[③]

监军为西夏监军司之要职，也可证，西夏前期绥州设有监军司。据上，祥祐军初驻地在绥州。

宋神宗熙宁二年，西夏绥州部落酋领银、夏、绥三州监军嵬名山降宋，宋将种谔乘虚攻取绥州，并将绥州改为绥德城，隶延州。西夏虽失绥州，但并未废“祥祐军监军司”。《太平治迹统类》卷15：

（元丰四年十月）（种）谔赴夏州，而石州监军司亦遁去。[④]

西夏前期无石州，就不可能有石州监军司。元丰四年“石州监军司”出现，应是西夏失绥州后将祥祐军名置于石州，即出现后来的“石州祥祐监军司”。

石州之名也始于元丰四年，原称石堡城。《宋史·神宗纪》：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六月癸未条。

②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7《伪史类》：“《西夏须知》一卷。右皇朝刘温润守延州日编录伪境杂事。”书今佚，《西夏书事》存两处，此引《西夏书事》卷20。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2熙宁三年十二月条。

④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神宗经制西夏》。

（元丰四年十月）己巳，入银州。……戊寅，种谔入夏州……（十一月）辛卯，种谔降横河平人户，破石堡城。……癸卯，种谔至夏州索家平。[①]

《宋史·种谔传》：

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②]

《皇宋十朝纲要》卷10：

（元丰四年）十月丁巳，谔攻米脂寨，破之，降其将令介讹遇。癸亥，入石州。戊辰，入夏州。己巳，入银州。[③]

以上反映的是同一历史事实，而其中两处称“石州”，一处称“石堡城”，可见“石堡城”即石州。这可能由于石堡城改石州的时间尚短，因此，宋人有称旧名者，亦有称新名者。元丰四年十月，石州虽一度被宋军所占，但旋又归西夏，到宋末又由宋军占，《杨公（宗闵）墓碑》载：“（公）独提轻骑一万，由石州监军路攻夏州”。[④]但不久又归西夏，故“石州祥祐”监军司名存至西夏后期。《天盛律令》中十二处监军司亦有“石州”之名。[⑤]

石州具体方位，《嘉庆一统志》卷239云，在陕西榆林南，《读史方舆纪要》卷62载，在夏州东南，[⑥]据宋代文献及《地形图》，在银、夏州之间，综合上述记载，石州应定在今陕西横山东北之波罗堡一带。

---

① （元）脱脱：《宋史》卷16《神宗纪》3。
② （元）脱脱：《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 （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0元丰四年十月丁巳条。
④ （宋）刘一止：《苕溪集》卷48《杨公（宗闵）墓碑》。
⑤ 史金波等译：《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⑥ （清）潘锡恩：《（嘉庆）清一统志》卷239《陕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11。

三、西寿保泰监军司

西寿保泰监军司，省称西寿监军司或保泰军。西寿又作西市、西使，《地形图》作“永寿”，实均指一地。《韩魏公集》卷15《家传》：

> 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于其中修盖行衙，闻甚宏壮，伪驸马花麻总领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①

《宋史·夏国传》：

> 夏国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②

《长编》卷320：

> （元丰四年）李浩言，兰州节次招到西使监军司管辖顺夏国西蕃……二百三十余户。③

可见，西市、西寿、西使皆同指一地。其地距古渭寨一百二十里，而古渭寨即今甘肃陇西。④《长编》卷316载李宪奏疏云：

> 自西市城约百五十里将至金城。⑤

宋兰州即今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一带，东一百五十里，约在今定西，⑥其地

① （宋）韩琦：《韩魏公集》卷15《家传》5。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元丰四年十一月辛丑条。

④ （元）脱脱：《宋史·地理志》：巩州“奉通远车、熙宁五年，以秦州古渭砦为军。崇宁三年升为州。”（明）陈循：《寰宇通志》卷97：“巩昌府，……唐置渭州，后陷为吐蕃，宋得其地置通达军，改巩州”，又“陇西县，……宋初立古渭砦，后改为陇西县”。明巩昌府府治陇西县，清沿袭不变。1913年裁府留县，即今甘肃陇西。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丙申条。

⑥ 陈守忠先生《李宪取兰会及相关城寨遗址考》认为西使城即今兰州东南六十余里的榆中三角城，此地与宋代文献中记西使至兰州、陇西距离相差太远，似为不当，见《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距兰州、陇西与记载基本相合。《宋史·地理志》：

> 定西城，元丰四年，以兰州西使城为定西城。[①]

又《长编》卷333：

> 定西城最扼贼冲，元系敌人设置监军之地。[②]

据此可知，西寿保泰监军司驻地即在今甘肃定西一带。[③]但《宋史·地理志》又云：

> （会州）怀戎堡，崇宁二年筑，属秦凤路，……北至柔狼山界堠四十里，系与夏国西寿监军地对境。[④]

又据宋张安泰《建设怀戎堡碑记》：

> 怀戎东南曰屈吴山，……东北去西寿监军司一百五十里。[⑤]

《西夏书事》及《西夏图》同，则西寿监军司驻于会州怀戎堡北的柔狼山。怀戎堡，据《读史方舆纪要》卷62载在甘肃靖远东面六十里，[⑥]今靖远县东北有狼山，疑即西夏之柔狼山。

为什么在文献中西寿保泰监军司的驻地会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呢？这应当是由于宋夏战争使监军司驻地发生了变化。

---

① （元）脱脱：《宋史》卷87《地理志》3。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3元丰六年二月癸亥条。

③ 宋有两定西城，一即上言之地，一即驽札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载，李宪改定西城为通远军，以努札堡为定西城。《宋史·地理志》努札堡作汝遮堡。（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6亦将努札译作汝遮堡。《长编拾补》则明言努札即女遮。上揭陈守忠文视定西城为二是对的，但视女遮、努札为二似为不当。

④ （元）脱脱：《宋史》卷87《地理志》3。

⑤ （清）长庚:《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4《建置志·城池》海城县条引（宋）张安泰:《建设怀戎堡碑记》。

⑥ （清）潘锡恩：《(嘉庆）清一统志》卷239《陕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11。

西寿保泰监军司是西夏在宋夏战争中继绥州祥祐监军司之后失去的第二个监军司。据《宋史·夏国传》，西寿监军司至迟在宋嘉祐七年以前即已设置。元丰四年，李宪、高遵裕等率领宋军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八月，败夏人于西市城，西寿统军禹藏花麻属下首领“二十余人、兵万余举西使城降”，“花麻弃西使城入兴州”。[①] 宋军占领西市城后，改为定西城，但西夏并未废西寿监军司。《宋史·夏国传》：

元符元年十二月，泾原折可适掩击夏西寿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获之。[②]

《长编》卷505：

（元符二年正月）环庆司言：生擒六路统军威明阿迈，锡硕克监军穆凡什赍多卜。[③]

“锡硕克”即清人改译之“西寿”。可见，至元符二年，西夏失西市城后十八年，西寿监军司仍存在。因此，可以推断，元丰四年，夏失西市城后，将西寿监军司移置柔狼山，《天盛律令》十二种监军司中仍有“西寿”一名，[④] 直到后期仍以“西寿保泰”为名。至于《地形图》将保泰军标在兰州东北的零波山后，不知何据，零波山亦不可考。

四、右厢朝顺监军司

右厢朝顺监军司，又省称右厢监军司。其驻地，至少有四种以上的说法：一、《西夏书事》称在夏州弥陀洞；二、《西夏纪》称在中兴府（银州）的克夷门；三、《东轩笔录》称在天都山；四、《地形图》称在凉州。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5元丰四年八月条、卷26元丰五年二月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壬戌条。

④ 史金波等译：《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西夏书事》云驻夏州弥陀洞，前已考证为吴广成将左、右厢监军司的驻地倒置，致《西夏纪》卷6也因循其误。

《西夏纪》中兴府克夷门之说似也不能成立。该书卷26云：

克夷为中兴府外卫，两山对峙，中途一径，悬绝不可登。元昊时，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1]

戴锡章原文据称源于《元史·太祖纪》。查《太祖纪》：

四年己巳春，帝入河西，……至克夷门，……薄中兴府。[2]

并无"元昊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之语。又《宋史·夏国传》：

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山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3]

这里虽说有七万人守兴庆府的记载，但并没有说："右厢朝顺监军司"设于此。可见戴氏右厢朝顺军驻地说是无根据的。

天都山说主要出自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他十分明确地说，"野利遇乞统天都右厢"，[4]天都山在西夏疆域中，若以山界为标准，确属右厢。沈括说："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5]这个"野利"，应即魏泰所说的"野利遇乞"。又西夏在天都山确有监军司之设。《长编》卷493：

（绍圣四年十一月甲午）泾原奏，人马至天都山，入监军司，搜空，一无所见。[6]

---

① （清）戴锡章：《西夏纪》卷26嘉定二年四月条。
② （明）宋濂：《元史》卷1《太祖纪》。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8。
⑤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3《权智》。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甲午条。

可见，魏泰“天都右厢”之说实为可信。

但右厢监军司设在天都山的时间不长。元昊时，宋夏边境以横山、天都山为界，故夏以明堂川为左厢，天都山为右厢；谅祚以后，宋对吐蕃、西夏发动进攻，宋将王韶夺取了吐蕃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拓地千二百里”，[①]宋夏边境已达河、兰州一线，加上失去兰州附近的西寿保泰监军司后，西夏的右厢防线中心置于天都山显然不适宜。而且宋军占领兰州后，对凉州造成极大威胁，《西夏书事》卷24：

> （熙宁六年五月）梁氏以中国城武胜，又复河州、洮西地，恐兵从西蕃入，修凉州城及旁近诸砦为守计。[②]

元昊时，凉州未见设监军司。因此，可能在熙丰之际，西夏将右厢监军司从天都山移至凉州，以便于指挥本国西线地区对宋军的防务，和加强凉州这一重镇的军事力量。现将所见史料列述如下：

（一）《宋会要辑稿·兵》8：

> （绍圣四年三月）六日，泾原路经略司言：西夏起甘州、右厢、卓罗、韦州、中寨、天都六监军人马屯偏江州（川）、白草原。[③]

此处“右厢”排列顺序在甘州之后、卓罗之前，应指凉州，“中寨”可能为灵州，[④]可以看出，其时右厢监军司已不在天都山。

（二）《长编》卷503：

> （元符元年十月丁亥）诏……苏沁定玛为供备库副使，卓罗、右厢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辛卯条。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4熙宁六年五月条。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8。

④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引范雍一诗有“剧贼称中寨”句，灵州为总监军司，故中寨监军司似为灵州监军司之别称。

一带蕃巡检。[①]

（三）《长编》卷 503 引《曾布日录》云：

吕永信……除甘州团练使，右厢、卓罗一带都巡检使。[②]

（四）《长编》卷 503 又载：

王愍将兵径趋卓罗、右厢以东攻讨，以牵泾原贼势。[③]

（五）《长编纪事本末》卷 140：

南宗寨在（湟）州之北，距夏国卓罗、右厢监军司百里。[④]

（六）《宋史・夏国传》：

崇宁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国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⑤]

以上（二）、（三）、（四）、（五）、（六）等五处记载都将卓罗与右厢并提，卓罗应即指卓罗监军司，卓罗城约在吐蕃喀罗川（庄浪河）侧，[⑥]西夏曾在此建和南军以防吐蕃。《元史・太祖纪》太祖二十一年秋“取西凉府搠罗和罗等县”，[⑦]应即是“卓罗和南”之异译。今本《西夏图》标其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南庄浪河侧是对的。那与“卓罗”并提的“右厢”监军司是指何处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3 元符元年十月丁亥条。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3 元符元年十月丁亥条引《曾布日录》。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3 元符元年十月壬寅条。

④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40《收复鄯廓州》。

⑤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1 绍圣四年九月壬申条称：“卓罗去金城百二十里”，同书卷 492 绍圣四年十月癸未条又称卓罗“逼近邈川（湟州）”。（元）脱脱:《宋史・地理志》称会州德威城、静胜堡、通泉堡均与“河北岸卓罗监军地分相对”。可见卓罗监军司辖地很广。

⑦ （明）宋濂：《元史》卷 1《太祖纪》。

呢？余以为，非凉州莫属。其理由有二：

第一，卓罗在凉州之南，距凉州很近，据《元史·太祖纪》记，“搠罗”（卓罗）似乎就是西夏西凉府的属县。《长编》卷489载：

> （绍圣四年六月壬寅）布又言：章楶虽不以（钟）传取会州为然，而锐意欲令经营卓罗监军司以窥凉州。[1]

文献中多称“卓罗、右厢一带”或“右厢、卓罗一带”蕃巡检，意即管辖卓罗至凉州一线蕃部的巡检官。前揭《宋史·夏国传》称仁多保忠为“卓罗、右厢监军”，意即卓罗监军司和凉州监军司的监军，西夏一人兼领数监军司是常见的现象，卓罗与右厢同一人兼领，可见两地相邻。

第二，文献中确有以凉州为右厢的材料。《长编》卷460：

> （范育言）臣观夏贼之为国，自奄有西凉，开右厢之地，其势加大。[2]

如果说《长篇》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题名有监修人“右厢孽祖乩介臣埋马皆”，碑阴西夏文译作：“南院监军谏品臣埋马皆”。[3]监军一词，《蕃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译音“遏足尼”，[4]与“孽祖”二字音近，右厢孽祖，当为右厢监军之意。既为凉州碑监修人，又称为“右厢监军”。可见，右厢监军司从天都山迁至凉州的时间至少在绍圣元年以前。

五、白马强镇监军司

关于白马强镇监军司的驻地，后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西夏书事》认为在盐州，《西夏纪》同，《地形图》将白马强镇军标在兴州北面，且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今本《西夏图》亦采其说。上述两种意见，余均不赞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六月壬寅条。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丙午条。
③ 史金波：《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释补正》，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④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人事》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丁亥条有“夏国锡硕克鄂则尔”之名，锡硕克即西寿，鄂则尔亦即监军之西夏语译音。

同，最基本的理由就是没有任何原始依据。下面谈谈余对白马强镇军驻地的看法。

要考证白马强镇军的驻地，余以为应该从“娄博贝监军司”谈起。关于“娄博贝监军司”，可见《长编》卷471的记载：

> （元祐七年三月丙戌）听西界人说，……有塔坦国人马于八月内出来打劫了西界贺兰山后面娄博贝监军司界住坐人口孳畜。……西界投来蕃部苏尼通说，称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右厢打劫了人口孳畜。[①]

《西夏书事》卷29载：

> 塔坦闻乙逋兵入河东，率所部袭贺兰山，入罗博监军司……[②]

《西夏书事》所用“罗博”是宋译，“娄博贝”则是清人改译。“罗博”是宋人记西人之语，当是西夏语，据《蕃汉合时掌中珠》，西夏语将“白”读作“瘥”，将“马”读作“啰”。按西夏语文法，“白马”应写作“马白”，即读为“啰瘥”，又西夏语均无鼻韵尾，[③]故“啰瘥”二字读音与“罗博”二字读音极近。由此可知，“罗博（娄博贝）”即西夏语“白马”二字的译音，罗博监军司即白马监军司。

前引《长编》称罗博监军司在“贺兰山后”，又言与“右厢”有关。贺兰山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北起宁夏石嘴山西，南至宁夏青铜峡西，南北二百余公里。“山后”，按南北走向山脉而言，应指山的西面，《东夷考》卷首《宁夏图》，[④]在贺兰山西中卫城北标有“贺兰山后”四字，因此，可以肯定“罗博监军司”应在贺兰山之西，又据上引《长编》，塔坦打劫罗博监军司后，又入“西界右厢”，前已证“右厢”即夏之凉州，从贺兰山西到凉州只有灵武至凉州一条通道，亦即后晋高居诲使于阗所经之路。可证，罗博监军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条。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元祐六年九月条。

③ 李范文：《关于西夏语鼻韵尾问题》，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又承陈炳应先生告知，特此致谢。

④ 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第93册《东夷考》卷首《宁夏图》。

司的驻地约在灵武西南的贺兰山侧。《宋会要辑稿·兵》8载：

夏国母自三月初点集河南、西凉、罗庞界、甘、肃、瓜、沙，十人发九人，欲诸路入寇。[①]

《东都事略》卷127《西夏传》：

（李宪）追过天都山，至罗逋山乃还。[②]

《金史·西夏传》：

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地与（任）得敬。[③]

《长编》卷319引《新纪》：

李宪败夏人于罗逋川。[④]

上述之“罗庞”、“罗逋”应即“罗博（娄博贝）”、“嗵瘥”之异译，“罗庞岭”即“白马岭”，“罗逋川”即“白马川”。《元一统志》卷6：

灵武城在白马岭之北。[⑤]

《太平寰宇记》卷33《关西道》9：

白马水出北塞夷中。[⑥]

---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8。

②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西夏传》。

③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史金波等译：《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记十二处监军司亦称“罗庞岭监军司”。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丑条引《新纪》。

⑤ （元）李兰肹：《元一统志》卷6《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⑥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3《关西道》9。

《(嘉庆)灵州志迹》卷2《星野》:

啰庞山，在州西。[①]

从上述记载可知，罗庞（白马）山的确切方位应在宋灵州城的西南，而宋灵州西南只有一山，即贺兰山，“突厥谓马为贺兰”，鲜卑语则谓白马为贺兰。[②]余以为，罗庞山为白马山的西夏语译音，而贺兰山则是白马山的突厥语和鲜卑语译音，西夏罗博监军司即白马强镇监军司，而白马强镇监军司的驻地就在宋灵州西南的贺兰山。

另外，余以为西夏白马强镇监军司的得名还与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太平寰宇记》卷37灵州回乐县条：

白马骝城，《十六国春秋》云：赫连勃勃时，有骏马死，即取其毛色为号，故名白马骝。[③]

回乐为灵州治，古有“白马骝城”之名，北魏置薄骨律镇。可见，灵州既有“白马”之名，又可称为“强镇”。西夏自称承赫连之旧业，创北魏之初基，为了炫耀远祖，将设置于灵州城西贺兰山的监军司命名为“白马强镇军”是完全可能的。又《元史·地理志》载：

灵州，下。唐为灵州，又为灵武郡。宋初陷于夏国改为翔庆军。[④]

《西夏书事》卷20引刘温润《西夏须知》：

---

① （清）丰延泰：《(嘉庆)灵州志迹》卷2《星野》。

②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4《夷狄门》。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骏为贺兰”。“驳”又作“驳”。《(乾隆)宁夏府志》卷3《山川》引程大昌《北边备对》称：“北人谓马之驳者为贺兰”。《山海经·海外北经》:“有兽焉，其名驳，状如白马”，《北堂书钞》卷129引《述异记》载：慕容庞十一世祖乾罗“乘白马，……自天而坠，鲜卑神之。”疑鲜卑语亦称“驳”为贺兰，此北人亦含鲜卑人。

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

④ （明）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3。

（嘉祐七年五月）谅祚更于西平府（灵州）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1]

此处记载的翔庆军是否乃灵州另一监军司呢？如果翔庆军是灵州又一新设之监军司，且又是总领诸监军司的机关，不应该在《宋史·夏国传》所录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中无名。余以为，灵州翔庆军或即白马强镇军，因灵州古有“白马城”之名，而“翔庆”与“强镇”音近，“强镇”可能是原意，宋人据耳闻记录，将“强镇”译为“翔庆”。信如上论，则文献中“娄博贝监军司”、“白马强镇军”、“灵州翔庆军”之混音记载可得澄清。

六、黑水镇燕监军司

黑水镇燕监军司在宋元汉文文献中仅一见，即《宋史·夏国传》所列十二监军司中名；西夏文《天盛律令》中则有两处提到“黑水监军司”，[2]驻所何处未载。据《西夏书事》黑水监军司在兀剌海城，《西夏纪》同。吴广成的史料依据是什么，不得其详。

关于兀剌海城，文献并不少见，又称乌纳喇城，斡罗孩城，是西夏军事要地，蒙古五征西夏，其城共三次分见于《元史》、《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中。Hyacinthe 氏不知何据云，斡罗孩本党项语，义犹长城中通道。[3]王先谦《蒙古通鉴长编》采其说。《蒙兀儿史记》卷三称，兀剌海故城在今蒙古阿拉善、额鲁特旗西南之龙首山北，与甘州之山丹县接界，蒙古名阿拉克鄂拉。[4]《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西夏图》亦采其说，标在甘州东北方向的龙首山一带，后标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岑仲勉先生不同意龙首山说，其考证斡罗孩为“唐言回乐路”。[5]本文不拟讨论兀剌海城的地理位置；但须指出：一、蒙古三次攻西夏兀剌海，从未提及在此设有西夏监军司；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0引刘温润《西夏须知》。

② 史金波等译：《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③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卷第3章引 Hyacinthe 书，第379页。

④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按：屠寄实采施世杰说，见《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卷12。

⑤ 岑仲勉：《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考》，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

二、兀剌海城并无“黑水”之名，西夏监军司前二字多表示驻地，“黑水镇燕军”之“黑水”应为镇燕军驻地，而《元史·地理志》明确说兀剌海城与黑水城是两座城：“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口攻河西”。[①]因此，《西夏书事》将黑水镇燕军定在兀剌海不能成立。

《西夏图》否定吴氏兀剌海之说，将黑水镇燕军标在肃州北面、弱水中游。从“黑水”二字而言是合理的，因弱水一称黑水，[②]但与“镇燕”含义不符。西夏北疆在居延泽一线，《西夏图》标镇燕军的位置距边境尚有三百多公里，而西夏称契丹为“燕”，[③]所谓镇燕军应是西夏防御契丹设立的监军司。弱水中游，去辽夏边境甚远，在此设防，何能“镇燕”？故《西夏图》所标亦不太妥。

黑水镇燕军究在何处？余以为，应为《元史·地理志》中“黑山威福军”的位置。《元史·地理志》载：

> 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泽，西北俱接沙碛，乃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④]

有两条理由可否定《元史》之载，一、在居延城附近，有西夏黑水城，1908至1909年，俄人科兹洛夫在我国黑城（xapoxom）取走的西夏文献中有《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黑水守将”即黑水城守将，[⑤]此城与《元史·太祖纪》中太祖二十一年二月所取之“黑水城”相合。二、居延泽一带为夏国北境，与契丹上京道比邻，夏国在此驻军意在防御契丹南下（蒙古人也是从黑水城南下破甘、肃等州，然后从凉州通道进攻兴、灵二州），夏称契丹为“燕”，故又与“镇燕”二字相符。因此，余疑《元史·地理志》将居延古城的黑水镇燕军误为黑山威福军。后人因以致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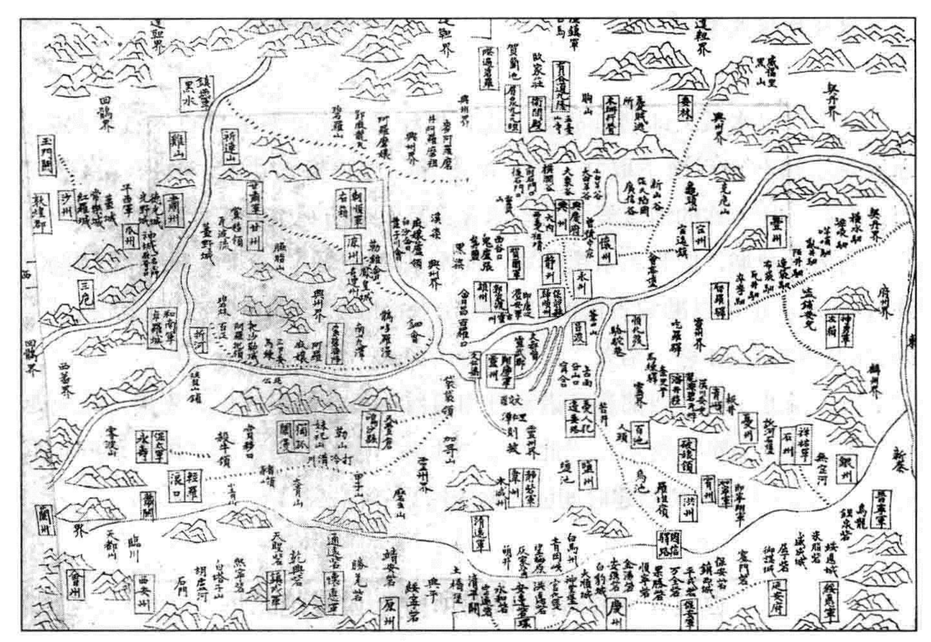
① 《元史·地理志》中载兀剌海方位可能有误，黑水城是西夏边城，按《地理志》言，兀剌海似在黑水城东北，已出夏境，与其他几处记载不合，具体方位，尚待详考。

② （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6《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游牧所在》：“肃州境有二黑水，其一即张掖河，别名黑河，其一黑水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下流与张掖河合”。张掖河上游即弱水。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夏国书云：“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此大燕即指契丹。

④ （明）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3。

⑤ （俄）克恰诺夫：《黑水所出1224年西夏文书》，载《匈牙利东方学报》（AOH）第24卷2期，1971年。



俄藏《西夏地形图》

现存两幅西夏地图所标黑水镇燕军的位置也可证明此说。[①]一幅是《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的《西夏地形图》，另一幅是苏联列宁图书馆所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地图册手稿》中的《西夏国旧图》，它们都将黑水镇燕军标在肃州北面，虽然比例并不准确，但却在夏与鞑靼边界上，鞑靼（又称阻卜）当时属辽，其主要部落都在辽上京道境内。可见，两图所示黑水镇燕军在辽夏边境的居延泽一带。苏联列宁图书馆收藏的另一幅《西夏疆域总图》中，对“黑山镇燕军”作了如下注解（注者不详）：

> 《元史·地理志》载，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口攻河西，……《太祖纪》载，二十一年春，（太祖）亲自率领军队征伐西夏。二月占领黑水等城，……攻占应理县。应理县即今宁夏府中卫县，而黑

① 关于这两幅图的作者、制作年代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前者是否宋代地图，既不可轻率否定，也不好贸然肯定，但它依据的资料大部分今已不见，许多地名仅见此图，笔者准备另撰专文讨论。

水城即镇燕军。[①]

这个“黑水城”即居延故城，成吉思汗第五次征西夏就首先进攻此城，夺取黑水镇燕军后南下取甘、肃、凉等州，过腾格里沙漠，渡河，直逼灵州。因此，从名称的地域概念、政治含义及军事防卫上看，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的黑水故城，应为黑水镇燕军，而不是黑山威福军。西夏文𗼃𗷁（黑水）读若 dzina，也可以勘蒙古语的“亦集乃（edzina)”，即今天的“额济纳。”[②]《西夏书事》卷 34 称，绍兴二年十二月，契丹“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乾顺处于北鄙，别立监军司统之”。[③]此处之“北鄙”建监军司疑即“黑水镇燕监军司”。如是，该监军司始建时间应在南宋绍兴二年。

七、黑山威福监军司

黑山威福监军司的位置主要有两说：一说在今额济纳旗的居延故城，一说在西夏东北边境与契丹天德军接壤处。

持居延说的有《西夏书事》、《西夏纪》、《西夏图》等，其根据主要来源于上引《元史·地理志》。对这一材料前文已予否定，另据到过居延的同志见告，居延只有“黑水”，而无“黑山”，[④]当地全是一望无际的沙碛及干涸的河床，根本就没有可以驻扎军队的大山。按西夏监军司命名通例，既无“黑

① （俄）克恰诺夫：《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此文公布了列宁图书馆所藏西夏地图册手稿一册，共 38 页，13 幅，载苏联《东方国家与民族》第 1 册，莫斯科，1959 年。李步月译文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 年第 1 期。

② 聂鸿音：《黑山威福军司补证》，载氏著《西夏文献论稿》，第 147—151 页。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4 绍兴二年十二月条。

④ 吴天墀先生引《元史·地理志》云：“甘州路正文下有注：‘本路黑山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屯田，计一千一百六十一顷’。可见在额济纳河流域一带，黑山这个地名是存在的”。按黑山，《元史·兵志》又作“黑山子”。（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63《陕西》:“黑山在卫北沙漠中，黑水经其下”，又“黑水在卫西北十五里，自沙漠中南流，经黑山下，又南合于白水”。以其地望实即今甘肃高台北面的合黎山，去居延泽还有千余里。吴文见《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修订本，第 420 页。

山”，似不会称为黑山威福军。清无名氏云：“元史述沿革多误”。[①]《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居延故城记载的西夏黑山威福军应是黑水镇燕军。

《地形图》及藏于苏联的《西夏国旧图》都将黑山威福军标在西夏东北边境与契丹接壤处，其所据材料是什么，不得其详。陈炳应先生亦主其说，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河套西北有一座黑山；二、《宋史·夏国传》叙述十二监军司似乎是按东南西北的顺序排列，是黑山威福军应在东北方向；三、从军事防卫上看，东北面临契丹，不可能没有一个监军司。[②]这个说法有一定理由。前引清无名氏亦云：“威福军在夏之西北不在东北，然不应三军俱置在西北，而东北临契丹之地反空虚”。[③]

但是，不能因文献中无记载，就断言西夏于东北边境未设监军司，《太平寰宇记》：“（灵州）北至碛南弥娥川水一千里”[④]，《太白阴经》白亭海北面可至“弥娥山”，[⑤]南宋黄裳所绘《地理图》有“碛南弥娥州”，[⑥]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有“瞀饿州”和“瞀饿州监军司”。[⑦]按：“弥鹅”、“弥娥”、“瞀饿”，皆一音之转，知西夏在其东北边境也有监军司，而为文献缺略。另外，如果仅凭黑山一名来确定威福军的位置，那也不完全妥当。据记载，仅西夏东北就有数座“黑山”，[⑧]而陈炳应所引《宋史·党项传》中的河北“黑山”应在契

① （俄）克恰诺夫：《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该文附“西夏疆域总图”之说明文字。该图将黑山威福军标在河套西北、白马强镇军东南，并言：“或可威福军之守，在元代亦属亦集乃路”。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2章《西夏修建的城镇堡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6页。

③ （俄）克恰诺夫：《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载苏联《东方国家与民族》第1册，莫斯科，1959年。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13。

⑤ （唐）李筌：《太白阴经》卷3《关塞四夷篇》。

⑥ （宋）黄裳：《地理图》，公元1247年刻，现藏苏州市文庙中。转引曹宛如：《介绍三幅古地图》，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⑦ 陈炳应：《西夏的石窟、寺庙和佛塔》，载《西夏文物研究》第1章，第20—21页。

⑧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1《陕西》10：“有黑山在中受降城正北稍东八十里”。地在今内蒙大青山；（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藏才几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后”。据《宋史》卷491《党项传》、《宋会要辑稿》第185册《方域》21，藏才为丰州境内部族，在黄河北面居住，此黑山也应在古丰州，地在今内蒙阴山，当时也属契丹境内党项部族，后归宋移入宋境。（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总镇》：“黑山，（银州）城东北二百里”。地在今内蒙磴口之狼山，北宋时在契丹境内。

丹境内，即《辽史·地理志》中天德军境内的“黑山”，[①]亦即今内蒙乌拉特中后旗境内之阴山。《辽史·营卫志》又载：“迭剌迭达部，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②]黑山为辽西南路招讨司部族卫戍之地，可见，西夏不可能在辽国境内置威福军。即使金灭辽后，西夏曾一度占领“天德、云内二军”及“武州八馆”之地，但很快又被金将兀室夺回。[③]西夏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在此置监军司。《地形图》及《西夏国旧图》所载威福军驻地不足为据。陈炳应先生之说，亦不成立。鲁人勇先生所称巴彦谆尔临河县的高油坊古城，余以为即契丹迭剌迭达部之黑山戍守地，当时应属辽。[④]

其实，宋人著作中黑山威福军的位置还是有线索可寻的。《西夏书事》卷14引《长编》卷131载：

> 黑山威福军驻黄河西，泾原都监桑怿率兵袭之。焚族帐，掠马驼甚众。[⑤]

由此可见：一、其地在黄河西岸；二、离宋泾原路不远。又《宋史·王珪传》：

> （王珪）改泾原都监。明年，为本路行营都监，勒金字处置牌赐之，使得专诛杀。寻至黑山，焚敌族帐，获首级马驼甚众。[⑥]

曾慥《类说》卷1引《名臣传》：

---

① 陈炳应：《西夏修建的城镇堡寨》：“河套西北部却正好有一座黑山，……宋王朝又以黑山北庄浪族龙移为安远大将军，昧克为怀化将军，以对抗继迁。又说这个庄浪族‘在黄河北’，即在河套地区的黄河北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也载：‘龙移昧克，一云庄郎昧克，其地在黄河北。’”（见《西夏文物研究》第2章）此黑山在黄河北，西夏境地从未超越黄河，黄河北岸，虽为党项族帐居地，但在契丹境内，属辽西南招讨司管辖。《辽史·地理志》天德军条下：“有黄河、黑山峪。”可见，河北地属契丹。

② （元）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③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4建炎二年十二月条；（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鲁人勇：《西夏监军司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⑤ 此条材料十分重要，而今存《长编》诸本均无此条，吴广成所见《长编》本当详于今存之残本。可证，今日《长编》之散佚情况，尚存许多疑窦。

⑥ （元）脱脱：《宋史》卷312《王珪传》。

（郑戬）代范仲淹为四路，置府于泾。……元昊拥众临黑山，戬勒兵巡边。[①]

《西夏书事》卷 24：

梁乙埋伏万骑于黑山外，令部首千骑犯刘沟。[②]

上述“黑山”为西夏驻军之地，与宋泾原路相对。因此，应为西夏威福军所在，具体方位似在今陕西省榆林县南之地。明人何景明《雍大记》载：

黑山在榆林城南三十里，俗名黑土圪羓。其地水草茂，北虏每内侵，必驻此以便水草。[③]

北虏内侵必驻此，可证是一军事驻地。此黑山当即威福军驻地。《（雍正）陕西通志》卷 16 又载：

黑山营，在榆林西北十五里，今废。《县册》。康定元年，都监王珪至黑山。[④]

“黑山营”，可见，此处原为驻军之地，此地又在西夏境内，黄河西岸；宋泾原军队沿东北行即可至此。上述几个条件均与《长编》卷 131 之记载相合，因此，可基本推断黑山威福军驻地应在宋银州北面，夏州东面的黑山，即今陕西榆林县之南，与左厢神勇军驻地甚近。宋熙宁以后，西夏为了对付宋军对其发动的军事进攻，大力加强与宋相邻边境的防守，故在宋夏边境增设不少监军司，黑山威福军当为其一。《天盛律令》称黑山威福军为“官黑

---

① （宋）曾慥：《类说》卷 1 引《名臣传》。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4 熙宁七年五月条。

③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 9《考迹》之“黑山”条。

④ （清）刘与义：《（雍正）陕西通志》卷 16《关梁》1 之“榆林县”条；（清）李熙龄：《榆林府志》卷 6《关隘》。

山”，陈炳应又译作“黑函山”。[①] 聂鸿音否认了二人的译法，称西夏文𗍳𗢸𗌮三字的读音通常构拟作 ow-rar-nja，实际应读作 o-ra-nja。o-ra-nja 应即《宋史·夏国传》中“午腊蒻”。[②] 此说极为有理。《宋史·夏国传》称：“（元昊）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③] 这个“午腊蒻山”即西夏语“黑山”。只不过此“黑山”并不是聂鸿音先生所言黄河北面阴山山脉的某一段。因为传文称“自河北至午腊蒻山”。如果午腊蒻山亦在河北，此语则无法理解。如果将“午腊蒻山”对应榆林县南的“黑山”，就最为适宜。因为这一“黑山”即契丹内侵驻军“以便水草”之地，故西夏自河北以至河套内之“午腊蒻山”驻七万人以防契丹。

---

① 史金波等译：《西夏天盛律令》卷 10《司序行文门》；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第 15 页。

② 聂鸿音：《黑山威福军司补正》，载氏著《西夏文献论稿》，第 147—151 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西夏天文学初探 *

西夏，如果从拓跋思恭的夏州政权算起，它在历史上存在了340余年；若从赵元昊称帝推算，它立国也近200年，在这样一段不算很短的历史时期中，党项族及西夏境内的汉、吐蕃、回鹘、吐浑、契丹等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夏文化，本文拟就西夏文化的一个方面——西夏天文学进行初步探讨。由于资料缺略太甚，不能对西夏天文学进行全面论述，只能凭借一些星散资料，将西夏天文学勾勒出一个大略轮廓。

一、早期党项人的天文知识

党项人最早的居住地主要在川北、甘南及青海东部地区，他们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散居游牧于甘肃、青海一带的高原，那时候，党项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生活条件也很简陋。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深山大谷之间，与外界“不相往来”，[①]因此，尽管周围的汉族地区此时早已跨进了封建文明的门槛，外界先进文化的冲击波却被甘青高原的崇山峻岭远远地隔绝开来，直至唐初，原始的党项部落仍然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②]表现在思想意识上则是极为原始的自然崇拜，“三年一相聚，杀牛以祭天”。[③]原始萨满教在党项社会

---

* 原文发表于《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①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中极为盛行，“笃信机鬼，尚诅祝”，[①]他们的思想意识“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②]因此，党项人不论是战争或工作，首先必须占卜，以求天来预示凶吉，这些都是由于党项人对整个自然界茫然无知而产生的迷信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早期党项人天文知识的贫乏。

据《隋书》、《北史》及新、旧《唐书》对党项人的记载，早期党项人是不知历法的。《隋书·党项传》称党项“候草木以记岁时”，称后来进入党项部中的宕昌羌“候草木荣落纪其岁时”。[③]这反映了草原牧业民族的原始历法——物候，即以草木枯荣来记录时间的流逝。草的荣枯标志着牧业生产的一周期，“草”具有了牧区“年”的意义。《旧唐书·党项传》载：“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④]草生与霜降都与党项的游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年”、“月”等时间阶段划分在党项人中逐渐出现。党项人并定“以十二月为岁首”，[⑤]这些年、月、岁首等概念的形成，可以表明早期党项人已有了粗具规模的原始历法。

8世纪初，吐蕃在西藏地区崛起，势力不断向东北扩张。党项族在吐蕃的逼迫下，开始向东北方迁徙。他们从极为偏僻闭塞的甘青高原迁进了中古时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交通要道——陇东、河套地区。尽管他仍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⑥]但是，与唐王朝及周边部落的贸易已将过去那种闭塞保守的局面打开，逐渐与汉族农业地区的先进文化有了较多的接触，唐王朝为了使这些经常寇掠边境的党项部落得以安抚，在边境州县中，经常拨出部分“空闲田地”，[⑦]分给党项部民，力图使其在农耕化的基础上逐渐定居，以成为封建王朝的编户边民。这样，先进的农业文化通过种种管道慢慢浸润到那些落后的党项部落中来，因之而产生了从事农耕生产的党项人。《宋史·郑文宝传》载：“先是（宋初时），诸羌部落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③ （唐）魏征：《隋书》卷83《党项传》；（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宕昌羌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6册《兵》28。
⑥ （清）董诰：《全唐文》卷737《夏平》。
⑦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树艺殊少，但以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①]到宋神宗时，党项人居住的横山地区更称“多马而宜稼”，[②]成为西夏“赖以为生”[③]的农牧业区。从“不知稼穑”到“树艺殊少”再到“多马而宜稼”，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已经在党项部落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这样，余可以推断，逐渐走向农耕生产的党项人的天文知识必然较纯游牧时期有所进步。

二、西夏境内通行的几种历法

党项人正式有自己的政权应该从公元881年算起，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册封为夏州节度使、夏国公，统辖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名义上虽然臣属于中央王朝，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中央王朝无力控制的割据政权。唐王朝为了笼络这个西北强镇，不断给予各种恩赏赐赉，如唐僖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④]这样大规模的乐队赐予夏州政权，完全可以反映唐代文化对党项文化影响是极大的。唐时，中央王朝向周边属国、节镇颁赐历书是例行之恩礼，因此，余以为，在夏州政权时，唐历完全可能传入党项部落。《西夏书事》卷9载：“西夏自保吉倔扰，羌戎不知正朔几二十年”。[⑤]这句话告诉我们，赵保吉（即李继迁）公元982年反宋以前，羌戎是知正朔的，羌戎所指即是夏州。此语正可反证唐朝历书曾传入党项部落。可知，宋王朝早在太祖、太宗时就给夏州政权颁赐历书。

赵德明继位后，宋夏交好，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和平交往，互通使臣，贡赐频繁。景德四年（1007）十月，德明向宋王朝请历，宋真宗将新制《仪天历》颁赐西夏；[⑥]乾兴元年（1022），宋又赐西夏《仪天具注历》；[⑦]赵元昊时，

---

① （元）脱脱：《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② （元）脱脱：《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6元祐六年元月壬辰条。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景祐四年七月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景德四年十月条。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景德四年十月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又赐新制《崇天万年历》；[①]以后，几乎每次创新历时，都要颁赐西夏，[②]直到宋高宗时，因夏国附金，才停止对西夏颁赐历日。[③]因此，从唐宋五代一直到南宋初年，200 多年的时间内，西夏国内一直通行汉族历法。

西夏境内虽然主要使用宋朝历法，但据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西夏也有自己的历法。《西夏书事》卷 18 载："曩霄（元昊）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④]。斯坦因从黑城带走的墨书西夏文和汉文并用的日历即为西夏国创制的丁亥年（1047）日历。[⑤]可知，在西夏建国初期，"夏历"就创制成功。在宋夏交战期间及南宋时期，宋对夏停止赐历，亦不见辽、金政权对夏赐历，在这些时期，西夏国内"不行中国历"，[⑥]而主要使用本国创造的"夏历"。1971 年在甘肃武威出土了西夏历书残页，残历存七至十二月，根据闰十一月和每个月朔日的干支，可以推知这是夏仁宗仁孝人庆二年的日历。[⑦]这正是宋停赐日历以后的"夏历"。从这残页历书的干支朔闰来看，"夏历"主要受宋历影响创制而成。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西夏文献中还有五份西夏历书，登录号分别为 5282、5868、6711、7385、8085，其中多为残页，书写主要是汉文，也间有西夏文。[⑧]由于原件未全文公布，其内容虽不可详知，但据《文海》和《蕃汉合时掌中珠》的材料反映，西夏将一年分为十二月，有四季、八节之分，十二月始春正（与早期以十二月为岁首不同），终于冬腊；正、二、三月为春，七、八、九月为秋；每月十日和十五日称为"节限"；一月称正月，又称"新年月"，二月称"成双月"，三、四、五、六、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8 庆历五年十月条。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53 册《运历》载，元丰八年，赐夏国主新历；（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 27《内制》载，赐夏国主元昊五年历日；（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4 绍兴二年正月条载："故事：每于上年孟冬，受中国赐历"。

③ （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 21 绍兴元年八月壬辰条称绍兴元年停赐夏国历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46 绍兴元年八月壬辰条同；（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4 称绍兴二年停行中国历。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18 庆历五年十月条。

⑤ （英）斯坦因公布的日历载于《英国博物馆季刊》1961 年第 14 卷第 3—4 号，转引自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 7 章《历书》。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4 绍兴二年正月条。

⑦ 陈炳应：《甘肃武威发现的一批西夏文物》，载《考古》1974 年第 3 期；又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4 章《西夏社会风俗》，第 255 页。

⑧ （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民族史译文集》第 3 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78 年。



西夏文和汉文合璧历书

七月无异称，八月又称“二四月”，九月称“四五月”，十月又称“二五月”，十一月又称“五六月”，十二月称腊月，又称“残冬月”。并有闰月之称，四季各有天官以察天时，以干支纪年。[①]西夏人除了重视冬至节外，还十分重视寒食节。[②]在西夏文献中，还有类似于汉族月令之类的书籍。[③]根据这些，大致可以判断，西夏历法主要受汉族历法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基本是全盘接受，以致原来党项人的风俗习惯可以说在官方都不予承认。这可反映，西夏建国后，随着西夏封建化的深入，党项人也就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西夏历法除了受汉族历法影响，还受藏历的影响，从民族关系上看，古代的党项同古代吐蕃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血亲关系，他们的王族及属下许多部族与鲜卑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部民毫无疑问羼杂有为量不少的古羌人成分。西夏建国后，西夏境内（特别是兰州至河西一线）居住有不少的

① 黄振华：《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载《中亚学刊》第 1 辑，中华书局，1983 年；（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天相中》。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86 册《兵》28。

③ （俄）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ё фонды,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Т.1, СТР.74-94.

吐蕃人，因此，藏族文化在西夏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以致国家强制规定，西夏僧人必须学习藏文。[①]据藏文材料记载，在11世纪前，木雅人中就出现了精通天文历算的天文学家，他的先辈就是吐蕃赤松德赞时派往外地学习算学经的青年。[②]基于这种关系，可以想见，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天文学不可能不对西夏产生影响。十二生肖纪年就是西藏最为广泛传播的纪年法，安多藏区唃厮罗时期仍是兔年、马年相称，[③]在西夏，不论民间、官府都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武威出土的西夏文账单，其纪年就称为“天庆虎年”，[④]夏仁宗乾祐七年在甘州所立“黑水桥碑”，阳为汉文，阴为藏文，汉文纪年是“岁次丙申乾祐七年”，藏文纪年则称“阳火猴年”。[⑤]以五行配十二兽纪年，除西藏外，古代高昌残历亦是如此。而藏人往往还有五行之上加阴、阳，如藏历第一胜生第一年为“阴火兔年”，第二年为“阳土龙年”，这种纪年法古代西藏并不很流行，[⑥]而在西夏的河西地区却作为官方纪年，可以看出，藏历在西夏影响是较大的。

三、西夏设置的天文机构及天象记录

西夏天文机构建立在什么时候，没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可以证明，但从某些文献记载反映，在李继迁时代西夏的天文机构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李继迁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起兵反宋以来，一直在毛乌素沙漠中对宋展开游击战，并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封建时代的天文机构历来都是封建国家的重要机关，李继迁时代根本还不具备创建一个封建国家的条件，因此，可以推断，李继迁时期，西夏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天文机构。咸平六年（1003）十一月，有彗星现，“大如杯，青白色，光芒四尺余”。[⑦]按占星术，彗星为兵凶之象，不利于战，然而，继迁政权领导集团竟无一人识此星象，

---

① （俄）克恰诺夫：《西夏国内的藏族和藏族文化》，载《纪念乔玛论文集》，布达佩斯汉学研究院，1987年。

② 催成群觉、索良班觉编译：《藏族天文历法史略》，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

③ （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

④ 陈炳应：《甘肃武威发现的一批西夏文物》，载《考古》1974年第3期。

⑤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⑥ 韩儒林：《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年第6期。

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咸平六年十一月条。

以致兵败凉州。占星术虽然荒谬，但可反映，这一时期西夏人还不具备对星象观测的知识。到了德明时期，宋夏通和，双方停止征战，出现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西夏有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稳定环境。这一时期，西夏对宋表面称臣，实际上在暗中筹建自己的国家。德明本人“精天文”，[①]善观星象，[②]西夏国家的天文机构很可能始建于德明时期。所以从德明时期开始，西夏就正式有了自己的天象观察记录。

元昊公开称帝建国后，开始正式设立各种政府机构。在仿效宋政府机构的基础上，元昊又有改进，如宋中央有二十四司之设，元昊就改设十六司。[③]西夏的天文机构也是一样，既有与宋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宋在元丰以前，国家的天文机构是“司天监”，元丰以后，“罢司天监，立太史局”。[④]西夏的天文机构看来比宋复杂，从文献记载反映，西夏天文机构至少有三种：一是司天监，[⑤]二是大恒历院，[⑥]三是史卜院，[⑦]大恒历院称又称大恒历司。司天监官品不明，大恒历司及史卜院在西夏官阶中都位列三品，掌天文历法和卜算，[⑧]西夏天文机构的官职人员有以下几种名称：

大恒历司正（见《凉州感应塔碑》）

司天（见《西夏书事》）

太史（见《西夏书事》）

日者（见《西夏书事》）

占者（见《西夏书事》）

术者（见《西夏书事》）

这多种天文机构及多种天文职官人员在西夏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天文历法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西夏天文事业绝非草创，而是已达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条。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称：“明年，出侵回鹘，恒星昼见，德明惧而还”。可说明德明很善于观察天象。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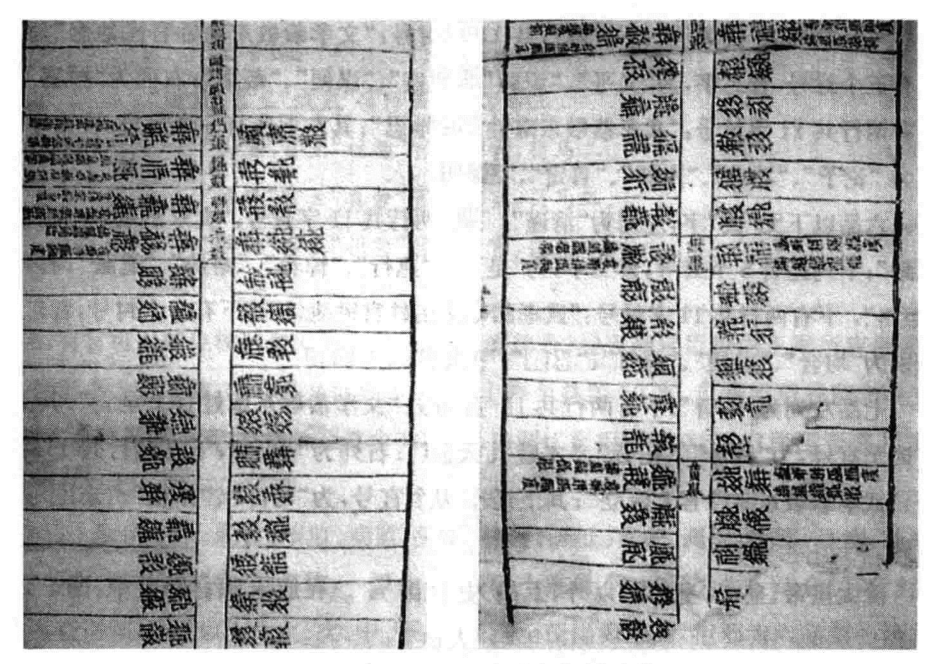
④ （元）脱脱：《宋史》卷165《职官志》5。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8元祐三年正月条、卷34绍兴九年正月条。

⑥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⑦ 史金波等译：《天盛年改定新律》卷70《司序行文门》。

⑧ 史金波等译：《天盛年改定新律》卷10《司序行文门》；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1991年。



黑水城出土两件西夏文《官阶封号表》

到了一定的水平。

更为宝贵的是，余从《西夏书事》中发现了许多西夏人自己记录的天象资料，其中有些天象是宋、辽、金司天机构缺漏的，有些天象则比它们记载详细或不同，元人没有给西夏单独修史，因此，西夏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天文志，这些天象资料的残存，不能不说是天文学史中的一大幸事。下面将《西夏书事》中反映的天象记录全部移录表中（表内时间的年代按公历，月份按我国农历）。①

① 这些西夏天象记录出于清人吴广成的书中，当有所本。吴广成编修《西夏书事》一书时，参阅了许多今天已散佚的书，如《西夏须知》、《夏国枢要》、《西行记》等，甚至吴广成当时所见《长编》亦详于今存之《长编》。从《西夏书事》中保存的今天已不见载的史料来看，吴广成手头可能有西夏自己编修的《国史》、《实录》之类，因明清以来还屡有记载。曾见西夏《实录》及《国史》之人，有姚士粦（《见只篇》）、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戴锡章（《西夏纪》），故吴广成有可能得见此书。《西夏书事》中的天文记录从宋、辽、金三史天文志找不到，可见吴广成另有所本。当然其中有数条乃抄自《宋史》、《金史》之《天文志》，为保持完整，一并收录。

时间		天象记录	备注
982年	二月	月犯井鬼，掩鬼之西南星，入于井	宋志有，但不详
998年	五月	日有食之，食将既	宋志同
1003年	十一月	有星索于东井，大如杯，青白色，光芒四尺余，实五诸侯	宋志最详
1008年	七月	太白犯舆鬼，入积尸	较宋志详
1009年*	十二月	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	宋志无
1020年	四月	两月并出，见西南方	与宋志异
1024年	十月	月犯井钺，钺一星附东井前	较宋志详
1025年	五月	太白犯辰星，在东井十三度	较宋志详
1025年*	十二月	月犯东井	与宋志同
1026年	八月	荧惑入东井，十余日始去	较宋志详
1027年	九月	有星没东井，出于北河，没于东井	与宋志同
1030年	九月	火星入南斗，西州谣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	宋志无
1032年	正月	荧惑犯东井，犯井东北星	与宋志异
1032年	七月	镇星犯鬼，犯东南星，时大风扬尘拔木，德明心恶之	宋志无
1034年	正月	填星犯舆鬼，占者云：大臣有变	与宋志异
1034年	九月	有星如太白出东井，色黄赤，有尾迹，向东没，光照地	与宋志同
1035年	五月	太白犯填星，在舆鬼	较宋志详
1038年	正月	朔日有食之	宋志同
1040年	正月朔	日有食之，日西先有一珥。杨守素曰："此吾军胜象也"	宋志无
1040年	六月	岁星犯井钺	宋志同
1040年	七月	（岁星）又犯东井，在井十度	较宋志详
1042年	七月	有星出弧矢，贯东井，南行没于浊，赤黄，有尾迹，光炎触地	较宋志详
1043年	九月	月入东井，星月相犯，占者云：大臣忧	较宋志详

续表

时间		天象记录	备注
1048年	正月朔	日赤无光，元旦行朝贺仪，群臣相顾失色	与宋志异
1049年	正月朔	日有食之，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日日食，天象可畏	与宋志同
1049年	七月	月犯岁星，在东井十二度	较宋志详
1056年	九月	有星出东井，如太白，赤黄色，向北速行，没	与宋志同
1064年	二月	黑云贯东井，起西北方，长五丈许	宋志无
1081年	三月	月犯东井，入于钺	较宋志详
1081年	七月	太白昼见，经天行，识者指为兵象	较宋志详
1086年	闰二月	太白犯荧惑，术者谓“国有兵丧”	较宋志详
1088年	正月	太白昼见，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	宋志无
1089年	三月	月入东井，犯西扇北第二星，群臣以国家用兵过多，请息国民	宋志无
1094年	三月朔	日有食之，时乾顺年幼，诸梁恣横，国中皆危之	与宋志同
1097年	八月	彗星见，肆赦，改明年元曰永安	与宋志异
1098年	九月	有星出东井西，如太白状，占者曰：宫中有忧	与宋志同
1098年*	十二月	月犯东井，犯西扇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	宋志无
1105年	二月	月入东井，犯距星，未几，距犯水位	与宋志异
1105年	三月	荧惑犯东井，留井距入钺	与宋志异
1106年	三月	彗星见，出西方，其长竟天	与宋志异
1110年	十月	太白昼见，群臣咸谓主兵丧	与宋志同
1112年	六月朔	白虹贯日，乾顺命群臣直言	宋志无
1137年	三月	岁星逆行入舆鬼，犯积尸气	与宋志同
1137年	四月	太白入东井，与荧惑合	宋、金志均无

续表

时间		天象记录	备注
1139年	正月	太白、荧惑合于井，司天谓：不利用兵	宋、金志均无
1144年	九月	彗星见，改元，星见坤宫，五十余日而灭	宋、金志均无
1145年	六月朔	日食于井，仁孝下诏求直言	较金志详
1155年	五月朔	日有食之，越日大风雨雷电，震坏宫鸱尾	较金志详
1156年	七月	彗星见，丙午出东井，约长一丈，光芒竟尺，癸丑，又犯五诸侯	与宋志同
1173年	五月朔	日食于井，云阴不见，群臣表贺，仁孝却之	较宋、金志详
1175年	三月朔	日食（金主改次日朝见）	宋志无
1198年	正旦己亥朔	日食（金主改辛丑日入贺）	宋志同
1204年	十一月	白气亘天，贯东井舆鬼三次	宋、金志均无
1205年	三月	太白昼见，日者云：主兵乱	与宋志同
1205年	六月	天鸣有声，在西南方，已而荧惑犯太微右执法	与宋志同
1205年	九月	黑云起西北方，间赤色如火，次及西南有白气贯其中，每至夜四更乃散	较金志异
1209年	二月朔	太白昼见，其光经天	与金志同
1211年	三月	有黑气起北方，广若长堤，内有三白气贯之，如龙虎状	与金志同
1213年	三月	太阴与太白并见，相去仅尺余	宋、金志均无
1217年	九月	月犯东井西扇北第二星	较金志祥
1220年	三月	岁星犯舆鬼，入积尸气	较金志异
1222年	八月	彗星见，出西方，两月而灭	与宋志同
1223年	八月	荧惑入舆鬼，掩积尸气	与金志同
1223年	九月朔	日有食之，食色淡，无光，兴庆城外大风拔木	较金志详
1224年	六月	太白昼见，与日翠明，德旺求直言	较宋志异
1227年	六月	太白入东井，地下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	较金志详

注：表中带*者该月已进入下一公历年。

四、西域天文学对西夏天文学的影响

从上表记录的天象材料中，可以看出，西夏天文机构采用的观天手段、记录方法以及对各种天象的称谓，与汉族完全一致，从而表明，汉族天文学直接影响着西夏天文学。这从许多西夏文献中又可得到印证，如四象：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七曜：太阳（日）、太阴（月）、金星（太白）、木星（岁星）、水星（辰星）、火星，土星；[①]二十八宿，《掌中珠》有十八宿名：星、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等；聂历山搜集的西夏文材料中还有毕、觜、参、井、鬼、张、翼、轸、柳、昴等十宿名，[②]其他星辰还有勾陈、腾蛇、将星、华盖、逊星、扫河、天河、霹雳、寡宿、北斗、攒昴、参斜、人星、珠星、紫星、攀鞍、驿马、天星、明星等。[③]然而，在肯定汉族天文学对西夏天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西域天文学对西夏天文学的影响。

西夏，地处著名丝绸之路的河西通道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荟萃之地，汉族文明和西域（包括中亚、印度、西藏）文明曾对这一地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西夏就夹在这两大文明之间，西夏又是一个极为崇佛的国家，从元昊开始，佛教一直隆盛不衰。西域天文学也通过佛经的翻译不断传入西夏：一是通过回鹘僧人的翻译，二是从藏文佛经中大量翻译过来。如黄道十二宫，就是属于西方体系的天文学知识。古代巴比伦、印度、希腊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将黄道带等分为十二部分，称为黄道十二宫。每宫三十度，各宫均以动物或他物命名，黄道十二宫是随着佛经的翻译而传入我国，大约在隋代的译经中，就已出现十二宫名。[④]西夏通俗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也有十二宫名：摩羯、宝瓶、巨蟹、人马、室女、天蝎、

①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天相中》。

② （俄）Н. А. Невский, Культ небесных светил в танту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II века, Тантутская фила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③ 参阅《蕃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研究》及上揭聂历山书。其中有些星宿名如寡宿、逊星、珠星等目前还未见其他文献记载。

④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载《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

天秤、狮子、金牛、白羊、双鱼，缺双子一名。[①]很明显，西夏人的黄道十二宫的知识也是从佛经中得来的。因为西夏的统治阶级上层极为崇佛，大力翻译各种文字的佛经，保存在《大方等日藏经》、《宿曜经》、《七曜禳灾诀》、《支轮经》、《玉函经》中，也就说明，这一西方的天文知识也较广泛地为西夏人所接受。敦煌莫高窟六十一窟的甬道两侧壁有一幅壁画，壁画主题是炽盛佛乘车图，车两旁和后面有九曜神像，天宫中有黄道十二宫图形，南北壁各六宫，北壁为金牛、巨蟹、室女、人马、宝瓶、双鱼六宫，南壁为双子、天秤、天蝎、摩羯、白羊、狮子（后二宫图形已剥落）六宫。图形和画法都已中国化，其中双子一宫图即两披发的蒙古利亚女子，从服装上看，不像汉人，很可能就是当时西夏人的写真。壁画下端有供养人题名，题名为汉文、西夏文对照并书。[②]这幅珍贵的壁画及前面提及的《蕃汉合时掌中珠》的记载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西夏天文学的主要内容中，不仅有系统的中国传统天文学，而且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西域天文学知识。

在西夏天文学中，“十一曜”和“九曜”的概念也是受西域天文学影响而产生的。中国传统历书中，只有“七曜”之名，即日月五星。隋唐以来，西域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影响极大，《唐会要》卷42载：“太史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诏与麟德历相参行”。[③] 瞿昙罗乃印度僧人，所上为印度历书，故知唐初中国历书中已参用印度历法。尔后瞿昙悉达又撰《开元占经》，内译载印度《九执（曜）历》，一行作《大衍历》也曾参考《九执历》。《玉海》卷5又载，中唐时，印度术士李弥乾作《都利聿斯经》五卷，“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④]可见，唐时汉族人中多信仰此方术。在西夏文献中也多处见到“十一曜”和“九曜”之名，即日、月、五星加罗睺、计都、紫炁（气）、月孛。[⑤]《星宿魔图》中还有“十一曜”的图像。[⑥]在汉族官方历书中，一般都无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四曜，此四曜在历学上叫作四余，明人杨

①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天相中》。

②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133页。图见《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图版二、三。

③ （宋）王溥：《唐会要》卷42《历》。

④ （宋）王应麟：《玉海》卷5《天文·圭景》。

⑤ （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之《天相中》。

⑥ （俄）Н. А. Невский, Культ небесных светил в танту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II века, Тантутская фила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黑土城出土的《月孛星图》



黑土城出土的《木星图》



黑土城出土的《月星图》



黑土城出土的《土星图》

慎这样解释：

> 七政：日月木火土金水谓之七政，亦曰七曜，今术家增入月孛、紫炁、罗睺、计都四余星为十一曜。计生于天尾，罗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闰。盖日月行道如两环，两环相交，一处曰天首，一处曰天尾，天尾为计，天首为罗；月之行，迟速有常度，迟之处即孛也；炁生于闰，二十八年十闰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数，无光象，故与罗、计同谓之四余。今七政历亦有四余躔度。[①]

四余之名，虽然很早就见于文献，但官方历书直至元代都未曾著录。五代王朴作钦天历，以罗计为蚀神首尾，行之民间小历。《月离历指》一书认为，中西两家，凡为正术者，对四余星皆弃之弗录，所谓十一曜星行历者，实为西国之旁门。[②]四余见之于西夏通俗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及《星宿魔图》中，很可能也是民间通行此法，而官方还是接受传统正宗的汉历。

总之，从目前所见的西夏天文学材料反映的情况来看，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西夏天文学过去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没有一定的位置，主要原因是元人修宋辽金三史时，将西夏列入外国传而没有专修国史，因此造成了大量西夏天文资料散失而不得保存，今天，余将各种零散资料汇成一编，并勾勒出大致轮廓，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天文史专家们的注意。余相信，在苏联保存的数种西夏历书和其他西夏文献全部公布后，西夏天文学的研究肯定会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西夏天文学在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能并不低于辽、金。

---

① （明）杨慎：《丹铅续录》卷8《七政》。

② 《月离历指》，转引自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册第8章《佛典中的星象》。

党项西夏史札记*

元人修史，以宋、辽、金为正朔，以西夏为偏霸，故疆境万余里、立国二百年的大夏国竟无一专史。自清以来，不少学者掇拾烬余，补葺史阙，完成了多部西夏专史。民初至今，七十余年中，经历了三代学者的研究，可以说，西夏史不再是若存若亡、若明若昧的状态，而是以比较明确清楚的内容出现在人们面前。然而，由于西夏史料极为繁芜，要比较全面地掌握各种文字及诸多文献中蕴藏的西夏史料并非易事。近几年来，余常注意各种杂书，目的是探骊得珠，故每获一条新材料，必抄录之，并写成札记，曾以“琐谈”的形式发表了一些，今又将其束以成札者，奉献给对此感兴趣的同行。

一、拓跋思头与拓跋思泰

拓跋思头与拓跋思泰，是党项族内比较早的两位首领，但有人认为，这两位拓跋氏党项酋领可能是一个人。其理由有三点：第一，拓跋思泰都督静边州，上距拓跋思头降唐的时间并不太远；第二，两人同为以拓跋为姓的党项羌大首领；第三，“头”、“泰”声母相同，应系一个同音异译字。[①]这三点，后两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第一点却不能成立。何以知道“拓跋思泰都督静边州，上距拓跋思头降唐的时间并不太远”呢？关于拓跋思泰事迹仅保留见于两处的一条材料，即《全唐文》卷16中的《赠拓跋思泰特进制》。据《全唐文》介绍，这份制文是唐中宗在位所发，其内容如下：

---

* 文章内容于1983至1988年间先后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宁夏社会科学》及《中国民族史研究》（2），今汇成一文，多处地方作了修改和补充。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5页。

念功之典，书有明训，赠终之数，礼著彝式。党项大首领、故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节达溢等一十二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拓跋思泰。顷者，戎丑违命，爰从讨袭，躬亲矢石，奋其忠勇，方申翦馘之勋，俄轸丧元之痛。壮节弥亮，美名可嘉，宜崇宠章，俾慰泉壤。可赠特进兼左金吾大将军，赐物五百段，米粟五百石，以其子守寂袭其官爵。[①]

从制文的内容可以看出一点，拓跋思泰是死在战场上，故受唐王朝特进之恩，且以其子守寂袭职。但制文发布的具体时间不可得知。制文为中宗时所发，中宗第一次即位在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但至嗣圣元年（684）二月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前后不到三个月，故制文不可能发于此时。中宗复辟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在位七年。据此可知，制文发布的时间当在公元705年至710年之间，也就是说，拓跋思泰也当死于此时。然而，拓跋思头在李靖进攻吐谷浑时就是一个成年人了。《旧唐书·党项传》载：

李靖之击吐谷浑，（拓跋）赤辞从子思头密送款，其党拓跋细豆又以所部来降，于是，思头并率众内属。[②]

如果假定这率众内属的拓跋思头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李靖进攻吐谷浑在贞观八年（634）十二月。从贞观八年到制文可能发布的起码时间神龙元年（705），中隔七十余年。就算当时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怎么能在七十年后还“躬亲矢石，奋其忠勇”去战死沙场呢？显然，这在时间上至少有二三十年的距离无法解释。这是《全唐文》中的制文。此外，同一内容的制文又见于《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1，制曰：

党项大首领、故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节达溢等十二

① （清）董诰：《全唐文》卷16《赠拓跋思泰特进制》。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拓跌思泰。[①]

除此处将“拓跋”误为“拓跌”之外，基本与《全唐文》制文相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明确记载了制文颁布的时间是“开元九年六月丁酉”。开元九年，即公元721年，上距中宗在位的时间又相差十余年。这份制文是因拓跋思泰战死沙场而颁特进之制，故可断应在拓跋思泰死后不久的时间内颁布，也就可以说，拓跋思泰大约就死在开元九年六月之前。如果思头与思泰是一个人的话，那思泰死时就已是一百多岁的寿翁了，这样的年纪还领兵打仗，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而这两处所载，又应以《册府元龟》所记较可靠，因《册府元龟》为宋人修，而《全唐文》为清人抄，清人抄宋人之书而发生误差的，也是不乏其例的，从《通志》卷9《氏族略》5中的《拓跋氏条》看，也可证明拓跋思泰死于开元九年而不在中宗时，“唐开元后，有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②]前面制文载，思泰死，其子守寂袭职为“静边州都督（其他均为虚衔）”，此处亦载，开元后，守寂为“静边州都督”。可见，《册府元龟》开元九年之说是可信的。

近年新发现的《拓跋寂（守寂）墓志铭》亦提供证据：

公讳寂，字守寂。迨仪凤年，高祖立伽府君委质为臣，率众内属。曾祖罗胄府君，祖后那府君，考思泰府君。[③]

即拓跋思泰的父亲为拓跋后那，其祖父为拓跋罗胄，其曾祖为拓跋立伽。而拓跋立伽归顺唐朝时为“仪凤年”（676—677），[④]即可证明，拓跋思泰的曾祖拓跋立伽辈分及年龄都应小于拓跋赤辞，因思头为赤辞“从子”，故立伽应与拓跋思头年龄相仿。完全可以证明，思头与思泰不是同一人。

---

①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1。

② （宋）郑樵：《通志》卷29《氏族略》5《拓跋氏》。

③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224—225页。《西夏书事》卷1中和元年三月条称守寂为赤辞之“孙”，当误。《新唐书·党项传》称拓跋思恭为拓跋赤辞之“裔孙”，即远代子孙也。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党项传》；（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二、拓跋思恭与拓跋思敬

《新五代史·李仁福传》云：

>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当唐僖宗时，有拓跋思敬者，为夏州偏将，后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①]

《旧五代史·李仁福传》云：

> 李仁福，世为夏州牙将，本拓跋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广明之乱，唐僖宗在蜀，诏以思恭为京城西北收复都统，预破黄巢有功，僖宗赐姓，故仁福亦以李为氏。[②]

二史所载，同一人一事，然欧史作“拓跋思敬”，薛史作“拓跋思恭”，这是什么原因？思恭与思敬是一人抑或二人？

欧史成书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薛史成书于宋太祖开宝五年（972），薛史较欧史早几近百年。薛史所记，多本之实录，梁、唐、晋、汉、周五代实录均为薛居正所见。实录之缺点，多粉饰虚美之词，但载人名、地名及不含政治观点之事，则实录所载较为准确，所以《旧五代史》作“思恭”应该是正确的，而且，《新唐书·党项传》、《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外记》、《东都事略·夏国传》、《金史·西夏传》等书都作“思恭”，故破黄巢被唐僖宗赐李姓者应是“拓跋思恭”。那么，为什么欧史却称“拓跋思敬”呢？宋人黄朝英在其《靖康缃素杂记》卷3中说：

> 欧阳《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谓薛史避国讳耳。按《旧唐书》、《实录》皆作思恭。《实录》：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夏节度使思恭，保大节度使思孝之弟，思

①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0《李仁福传》。
②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2《李仁福传》。

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遂升节度，又徒（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曰：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使，思孝为保大节度。以孝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使。然则思恭、思敬乃是两人，思敬后附李茂贞，因赐国姓，故更姓李。文忠公（欧阳修）合为一人，误也。[①]

黄朝英的考证提供了一段现今不存的唐昭宗《实录》原文，这是一段很珍贵的西夏材料。拓跋思敬归附李茂贞之事，诸书不见载，以城降王建事仅见于《新五代史·王建传》，然欧阳修却系此事于天复元年条下，其辞云：

是时，凤翔李茂贞兼据梁、洋、秦、陇，数以兵侵建，天复元年，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②]

黄朝英所引《实录》为天复二年九月，可订欧史之误。更重要的是，黄朝英指出，欧阳修认为薛居正修五代史时是避宋翼祖之讳，翼祖名赵敬，而书“拓跋思敬”为“拓跋思恭”。所以，他修《新五代史》时，就将“拓跋思恭”还原为“拓跋思敬”。聪明反被聪明误，欧阳修这一还原，却将历史上的两个人物混成了一人，而铸成大错。拓跋思恭、拓跋思敬、拓跋思谏、拓跋思孝本是兄弟四人，这在《新唐书·党项传》是记载得比较清楚的，而欧阳修却将思恭与思敬误成一人，以成后人之谜。

可能会有人问，欧阳修既然将思恭误为思敬，为什么在他参与撰修的《新唐书》中又明确记载“思恭”与“思敬”为兄弟二人？可以这样解释，《新五代史》是欧阳修一人撰修，而《新唐书》为欧阳修、宋祁合修，《新唐书》纪、志、表为欧阳修主之，《新唐书》列传却是宋祁主之，《党项传》当出自宋祁之手，非欧阳修所作，故《新唐书》与《新五代史》载同一人而用名各异。但是，欧阳修曾对250卷的《新唐书》作过总汇裁定工作，对“思恭”与“思敬”之异未作认真考证，亦可见欧史撰修之疏。

---

① （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3《思恭》。
②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3《王建传》。

三、拓跋思恭的赐名

拓跋思恭由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加官晋爵，并赐国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然而，拓跋思恭赐姓为李，是否赐名呢？这一点各种正史都不见记载，所以，有些人就干脆认为是赐姓名为“李思恭”。近翻宋人笔记，得一条材料，原来拓跋思恭不仅有赐姓，而且有赐名。此为诸史所阙。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卷5载：

> 至唐僖宗朝，有拓跋思恭镇夏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名石。卒，有拓跋仁福为蕃部都指挥使，亦从其姓。[①]

据此，可知拓跋思恭赐姓名李石，是否正确，惜为孤证，但宋朝人记五代事，且谓所记者为“近事”，余以为还是比较可信的，今存此聊备一说。

四、德明与德昭

宋人文献材料记载李继迁的儿子都称“德明”，如《宋史》、《长编》、《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隆平集》等，而在《辽史》中，却有两种不同的名字出现，《辽史·西夏外记》中有一处作“德明”，而其他地方（包括本纪、列传）均称“德昭”。如：《辽史·西夏外记》云：

> 十八年，援继迁子德明朔方军节度使。二十一年，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为夏国王。[②]

这里的“德昭”与“德明”究竟是一人抑或两人？这恰恰与“思恭”、“思敬”相反，欧阳修将“思恭”、“思敬”两人误作一人，而有的先生就将

---

① （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卷5《拓跋思恭》。

② （元）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德明”、“德昭”一人分为两人。[①]

李继迁的儿子为李德明，这是诸史明载的，也没有什么异议，但为什么《辽史》却称继迁子为“德昭”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避讳的问题。《辽史》成书，主要是根据辽人耶律俨所修的《实录》，辽人撰修的辽朝《实录》，即当时人记当时事，必然会要避讳，所以，今天保存的《辽史》中就有大量的避讳事例。如《辽史·圣宗纪》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将沙州曹宗寿之名称为“曹寿”，[②]《辽史·圣宗纪》和《辽史·属国表》为了避辽景宗耶律贤之讳，故将沙州曹贤顺称为“曹顺”或“曹恭顺”。[③]《辽史》称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德昭”，那是因辽穆宗先为耶律璟，后更名为耶律明，“明”为穆宗之讳，故辽人修实录时将“德明”都改为“德昭”。辽虽有避讳之别，但辽毕竟不同于宋，封建礼法远不如宋那么严密，避讳之别也不是那么严整，所以修《实录》存几处讳未避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辽史·西夏外记》一处“德明”未改者，应归咎史官之疏漏。

五、嵬名氏与元氏

《西夏书事》卷11载：

> （明道元年，元昊）改姓嵬名氏，称吾祖。复以李赵赐姓不足重，自号嵬名氏，称吾祖。吾祖，华言可汗也。于是属族悉改嵬名，蕃部尊之，疏族不与焉。[④]

西夏王族本姓拓跋，唐赐姓为李，宋赐姓为赵，元昊继位后，下令废唐宋之赐姓，以“嵬名”为氏。“嵬名”，清译《长编》作“威明”，吴澄《李世安墓志》作“于弥”，[⑤]《元史·察罕传》作“乌密”，[⑥]《元史·卜颜铁木儿传》

---

① 牛达生：《李继迁的继承人究竟是谁？》，载《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② （元）脱脱：《辽史》卷11《圣宗纪》。

③ （元）脱脱：《辽史》卷12《圣宗纪》3、卷70《属国表》。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明道元年十一月条。

⑤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42《李世安墓志》。

⑥ （明）宋濂：《元史》卷120《察罕传》。

作“吾密”。[①]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嵬名、威明、于弥、乌密、吾密当系一词之异译，均音译自西夏文。可以说，这些词的对音是解决了，但嵬名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王静如先生根据西夏文“𗼇𗼒”与“乌密”之“密”，“于弥”之“弥”考证，认为“𗼒”、“密”、“弥”与《北史·党项传》、《隋书·党项传》中党项称“弥猴种”有关，并引伸出“𗼒”、“密”、“弥”与战国楚姓“芈”同出一源。[②]

岑仲勉先生却根据突厥文《阙特勤碑》东面31行，以“umai”譬其母可敦，汤森氏释“umai”为女神，又释为胎盘或阴户，故岑仲勉先生认为于弥为女神或女性生殖器崇拜。[③]

二说都是根据语音相近这一点而作出的推测，并无历史根据，不太可信。关于嵬名、于弥、乌密等词的汉意，《元史·李恒传》透露了一点消息：

> 李恒，字德卿，其先姓于弥氏，唐宋赐姓李，世为夏国主。[④]

前已言之，于弥即嵬名之异译，这里告诉我们，在“唐宋赐姓李”之前，西夏王族就姓“于弥氏（嵬名氏）”，我们知道，在“唐宋赐姓李”之前，西夏王族姓“拓跋氏”，并无“嵬名”之说。那么，“嵬名”与“拓跋”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的一段记载解决了这个问题：

> 是岁（宝元二年），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⑤]

由于赵元昊改姓“元氏”，宋朝下令将“宝元”年号改为“康定”，这样的大事，且出自与元昊同时代的欧阳修之手，应该说是可信的。如果可信，那么为什么其他史籍都说元昊改姓“嵬名氏”，而欧阳修却说元昊改姓“元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44《卜颜铁木儿传》。

②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辑。

③ 岑仲勉：《中外史地丛考》上册《党项与于弥语源辨》。

④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⑤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氏”，岂不大相径庭？余以为，欧阳修的记载与其他史籍记载并不矛盾，“嵬名”一词很可能就是“元”字的西夏语读音，元字西夏文意为“始初”，读作“乌”。[①]与“嵬名”之“嵬”，“于弥”之“于”，“吾密”之“吾”，系一音之转，“元”字的正确译读既可作“嵬名”、“于弥”、“乌密”（wumi），又可简读为“乌（wu）”。明白了“嵬名”一词是“元”字的西夏语译读后，就不难理解，《元史·李恒传》为什么说在“唐宋赐姓李”之前，西夏王族姓“于弥氏”。[②]因西夏王族姓拓跋氏，而拓跋氏在孝文帝已改姓为“元氏”，自称为元魏后裔的西夏拓跋氏自然也是“元氏”之后，而“元”之译读为“于弥（嵬名）”，故《李恒传》称：“其先姓于弥氏，唐宋赐姓李”。[③]实际上，文献中称赵元昊改姓“嵬名氏”是不确切的，应该是赵元昊为了要标榜自己是元魏的后代，具有当皇帝的合法地位并恢复了旧姓——元氏。陈炳应先生在《西夏的诗歌、言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一文中说，元昊改姓“嵬名”，可“证明西夏王族出自党项羌”。[④]余以为，恰恰相反，元昊将西夏王族改姓“嵬名”，更加证明了西夏拓跋氏不是源于羌而是来自鲜卑。

六、乌珠、兀卒、吾祖与青天子

《长编》卷122载：

> 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⑤]

李焘这一段话严格来说是错误的。“乌珠”，又译作“兀卒”、“吾祖”，此词译意为“可汗”。《长编》卷139载：

> 乌珠，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⑥]

---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0·262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7页。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④ 陈炳应：《西夏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庚子条。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癸巳条。

《宋史·夏国传》亦云：

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①]

可汗是阿尔泰语系各族流行的对本族最高首领的称号，即皇帝的意思，北方民族又称“天”为可汗。可见，乌珠（兀卒、吾祖）一词只含“天子”之义，并无“青天子”的意思。又《长编》及《西夏书事》均载，西夏称太后为“乌泥”。[②]“乌泥”是西夏太后的译音，那“乌珠”也只能译作“天子”，而不能译作“青天子”。《文海杂类》中的西夏文皇帝，译音为“祖”，西夏文皇后，译音为“尼则”，[③]“祖”、“尼则”当即“乌珠”、“乌泥”省去前元音u之译读，可见《长编》中保存的宋人对西夏语的译音与西夏人自己的译音基本一致，亦可证，“乌珠”只能译作“皇帝”或“天子”，而不能译作“青天子”。

那么，李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据余之浅见，这是因为赵元昊称自己为“嵬名吾祖”而引起的。《太平治迹统类》卷7载：

赵元昊自袭封，自号嵬名吾祖。[④]

《宋史·夏国传》载：

（元昊）即袭封，自号嵬名吾祖。[⑤]

“吾祖”者，天子也；“嵬名”者，元也，元即玄，玄即青，元昊自称“嵬名吾祖”，就是自称“青天子”。李焘不明“嵬名吾祖”与“吾祖”之别，而形成此误。如此说成立，则又为“嵬名氏”即“元氏”找到了另一个旁证。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景祐元年十月条。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杂3·111条、杂4·143条，第533、535页。
④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七、元昊与嵬名曩霄

《宋史·夏国传》载：

曩霄本名元昊。[①]

可见，元昊不仅改姓，而且改名。《梦溪笔谈》卷25载：

元昊乃更称兀卒曩霄。[②]

《石林燕语》卷8载：

（元昊）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③]

郎霄即曩霄之异译。前已证之，兀卒为天子之意，曩霄则为元昊后改之名。元昊改"嵬名"为姓，改"曩霄"为名，全称为"嵬名曩霄"，表面上看改动很大，实际上却没有作何变更，只不过是废掉了李唐和赵宋的赐姓罢了。这种别出心裁的巧安排与景祐间投奔西夏的二位书生有关。《桯史》卷1载：

景祐中，有二狂生曰张、曰吴，皆华州人。闻夏酋有意窥中国，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无以动其听，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来饮此楼"。逻者见之，知其非国人也，迹其所憩，执之。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④]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③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
④ （宋）岳珂：《桯史》卷1《张元吴昊》。

可见，赵元昊改姓名为“嵬名曩霄”是受宋书生张元、吴昊的影响。张吴二人是“负气倜傥，有纵横才”[①]的汉族士人，他们入西夏后的所作所为对赵元昊的叛宋立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这句话正是嘲讽元昊还使用宋朝赐姓，并鼓动他废赵姓而改自己的姓，也就是劝告元昊要自己独立建国，不要依附于宋，更改姓氏正是同建国的政治目的相一致，改姓“嵬名氏”就是要为西夏的建国找到理论根据，也可成为团结部落，加强民族精神的一股动力。然而，由于羽翼未丰，对宋朝还不得不避嫌疑，故只以“嵬名”相称，而不以“元氏”直告，这就是张、吴二人的心计所在。其实，“嵬名曩霄”一名，其义就是“元昊”。嵬名者，元也，曩霄者，高深之天空，亦即“昊”也。“嵬名曩霄”只是“元昊”变换了一种方式的读法与写法，其汉意并无改变。这一切巧心的安排，恐怕都出自张元、吴昊二人。故洪文敏言：“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华州人士张元与吴昊”。[②]

八、谅祚之小字

西夏国主之名多有小字。德明小字阿移，元昊小字嵬理（又作嵬埋、威抉），[③]谅祚亦有小字，《宋史·夏国传》载：

> 谅祚，景宗长子也，小字宁令哥，国语谓“欢嘉”为“宁令”。两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从元昊出猎，至此而生谅祚，遂名焉。[④]

据此传，则谅祚之小字为“宁令哥”。然而，《夏国传》这一段文字错讹甚多，殊不可信。

首先，《宋史·夏国传》称谅祚为景宗长子即误。谅祚虽是元昊王位的实际继承人，却不是长子。据《宋史·夏国传》谅祚生于庆历七年（1047）

---

①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2《记张元事》。

②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2《记张元事》。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二月六日，[①]到元昊死时，谅祚还不到一岁，而据《长编》卷162及《东都事略·西夏传》，谅祚却是元昊之遗腹子，[②]即元昊死时，谅祚还未出生。元昊一共几个儿子，各书所载不一，《长编》记载了元昊六个儿子，[③]《归田录》记载了两个儿子，但均以谅祚为其幼子，而非长子。[④]

第二，宁令哥不是谅祚之小字，《宋史·夏国传》有误。《长编》卷162载："曩霄凡七娶，五曰叶勒氏，约噶从女也，硕长有智谋，曩霄畏之，戴金起云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次宁令噶，曩霄以貌类己，特爱之，以为太子；次锡哩，蚤死。"又"初，欲纳宁令噶妻，曩霄见其美，自取之，号为新皇后。宁令噶愤而杀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匿黄罗谤家，为罗谤所杀，曩霄遂因鼻疮死。"[⑤]

这一段记载是很详细的，并指出：一、宁令噶（宁令哥）是叶勒（野利）氏的次子，曾被立为太子；二、宁令噶在元昊死前就被元昊臣黄罗谤所杀，谅祚是没藏皇后生，且为元昊的继承人。因此，可以断定，谅祚与宁令噶（哥）绝不是一人。其他文献所载虽与《长编》歧异，但也可为此事之旁证。《梦溪笔谈》卷25载：

> 先是，元昊后房生一子曰宁令受，其后又纳没藏讹咙之妹，生谅祚而爱之。[⑥]

《归田录》卷2：

> 赵元昊二子，长曰佞令受，次曰谅祚。谅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宠，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谅祚母之兄没藏讹咙者，亦黠虏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谋。元昊已见杀，讹咙遂以弑逆之罪诛佞令受母子，而谅祚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称:"没藏氏（谅祚母）既娠而曩霄死"。（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7《夏国传》同。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载元昊六子：米母氏子无名；咩迷氏子阿理；野利氏三子：宁明、宁令哥、薛埋；没藏氏一子谅祚。

④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⑥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乃得立。[①]

宁令受、佞令受当即宁令哥（噶），各种文献都可证明宁令哥与谅祚不是一人，宁令哥也非谅祚小字。

那么，谅祚小字是什么？《宋史·夏国传》载："两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从元昊出猎，至此而生谅祚，遂名焉"。[②]

前面已说谅祚小字"宁令哥"，后又述谅祚生两岔河而以"两岔"为名，令人难解其义。《西夏书事》卷18吴广成注云："谅祚本名宁令两岔，哥字乃宋板讹也"。[③]这就十分清楚了，《宋史·夏国传》原文应为：

> 谅祚，景宗长子，小字宁令两岔。国语谓"欢嘉"为"宁令"，两岔，河名也，从元昊出猎，至此而生谅祚，遂名焉。

据此可知，宁令哥乃野利氏之子，谅祚为没藏氏之子，其小字为"宁令两岔"。

九、梁太后之族属

西夏中期，国内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女性——梁氏二后：一为谅祚之妻，秉常之母；一为秉常之妻，乾顺之母，她们同出梁氏一门，擅西夏朝政三十余年，酿成西夏国内的"武韦之乱"，导致了西夏王朝由盛转衰。这一著名的西夏梁氏源出何族，余对某些记载深表怀疑，特稍作辩证，以清源流。

《西夏书事》卷22吴按："梁氏本中国人"。[④]吴氏之言何来，当本自《梦溪笔谈》卷25："有梁氏者，其先中国人"。[⑤]从文献所载，梁太后当为汉人。然而，有许多事实却令人不解。

其一，梁氏既为汉人，为何不喜用汉礼，而偏重蕃仪。《西夏书事》卷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庆历七年二月条。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2熙宁二年七月条。
⑤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22 载："（熙宁二年，1069）秋七月，复蕃仪。梁氏不乐用汉礼，伪为秉常表，请复本国旧蕃仪，神宗许之"。[①]《西夏书事》卷 25："秉常以爱行汉礼，为梁氏所恶，梁乙埋等皆不悦"。[②]又《种谔奏议》云："西夏国母屡劝秉常，不行汉礼"。[③]一个身居要位的汉族妇女居然厌恶高度发达的汉族文明，居然反对、拒绝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岂不是一件怪事。

其二，梁氏既为汉人，为何一族人名均为蕃名。《梦溪笔谈》卷 25："（谅祚）以梁氏为妻，又命其弟为乞埋（又作乙埋）为家相"。又"梁乞埋死，其子移逋（又作乙逋、叶普）继之"。[④]据《长编》卷 467，又有梁阿格；[⑤]《西夏书事》卷29有"梁阿哆"；[⑥]《宋史·神宗纪》有"梁格嵬"[⑦]；《宋史·夏国传》有"梁哆哆"。[⑧]这些当是梁氏一族，其名乙埋、乙逋、阿格、阿哆、格嵬、哆哆全是蕃名，且是党项人常用之人名。

其三，梁氏既为汉人妇女，应该是弱不禁风的女子。然而，梁氏强悍，雄强类丈夫。元祐七年（1092），梁太后亲自将兵进犯环州，兵败，"梁氏几不得脱，尽弃其供帐、襜褕之物而逃"。[⑨]绍圣三年（1096）二月，"梁氏愤发兵自将军入绥德界攻义合寨"，[⑩]十月，又挟乾顺率众五十万进犯鄜延，攻陷金明寨，梁氏还"亲督桴鼓"以助战。[⑪]这种强悍好斗的性格，显然不是汉族女子的性格，却与"俗尚武"[⑫]的党项民族的性格相近。党项妇女，据《隆平集》载："有凶丧者，未复，负甲叶以为记。不能复者，集邻族妇女，烹牛羊，具酒食，介而趋仇家，纵火焚之"。[⑬]不仅在打冤家复仇的场合中党项妇女表现勇悍，而且，妇女多能出征打仗，驰骋沙场。在西夏的军队中，经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2 熙宁二年七月条。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5 元丰四年三月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2 元丰四年四月壬申条。
④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 25《杂志》2。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67 元祐六年十月庚申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 176 册《兵》8 称"梁阿革"。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9 元祐八年十月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 16《神宗纪》。
⑧ （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78 元祐七年十月辛酉条。
⑩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0 绍圣三年二月条。
⑪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 127《西夏传》。
⑫ （唐）魏征：《隋书》卷 83《党项羌传》。
⑬ （宋）曾巩：《隆平集》卷 20《夏国赵保吉传》。

常有被称作“麻魁”[1]的女兵随军作战。作为一国之母的梁太后居然也随军作战，并且亲自指挥，带头冲锋陷阵，兵败则易服而逃，这种行为完全不像一汉族妇女之行为，而更像一个英勇尚武的党项妇人行为。

其四，梁氏既为汉人，为何保留了一种古代北方民族的习俗。《长编》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己亥条引《章楶奏议》云：

> 十日，夏主与其母将兵数十万围平夏城。大溃，一夕皆遁，戎母惭哭，剺面而还。[2]

《西夏书事》卷30作：“梁氏惭哭，剺面而遁”。剺面、剺面，就是用刀划脸，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乃至西域等地人民的一种风俗（后与突厥、回纥人杂居的其他民族亦可能接受这种风俗）。《宋云行记》：“（于阗国）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3]《周书·王庆传》：“突厥谓庆曰：前后使来，逢我国丧者，皆剺面表哀”。[4]杜甫有诗云：“花门（回纥称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5]《三朝北盟会编》卷3：“（女真人）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为之送血泪”。[6]这种自残其容的可怕风俗绝不会在汉人中流传，然梁太后却在大败后，竟剺面以示哀，这恐怕不是汉人所为。

从上述四条理由，基本上可以看出宋沈括、清吴广成言梁氏为汉人是不可信的。吴广成当是因袭沈括之说，而沈括之言则有可能拾摭于道听途说，并未详加考证，故其所言亦有失也。

那么，梁氏一门属于哪一族呢？余以为是出自党项梁家族。《范文正公年谱》载：“（庆历二年，1042）六月初，石昌镇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并与小遇族蕃官薛娘等为仇，其梁家族点集一千余人骑待报仇相杀”。[7]这一支梁家族居住环州石昌镇一带。又《长编》卷50：“继和上言，镇戎军为泾、

---

① （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己亥条引《章楶奏议》。
③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宋云行纪笺注》，载《禹贡》第4卷第1期，1935年。
④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33《王庆传》。
⑤ （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卷9《哀王孙》。
⑥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3重和二年正月十日条。
⑦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下册《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原、仪、渭北面扞蔽，又为环、庆、渭、仪、秦熟户所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咩逋、贱遇、马藏、梁家诸族之路”。[1]这一支梁家族又居住在镇戎军以西。这些“梁家族”当出自贺兰山地区的党项族内的“大凉、小凉”，亦作“大梁、小梁”。《宋史·党项传》：“上闻贺兰山有小凉、大凉族甚盛，常恐与继迁合势为患”。[2]《宋会要辑稿》195册《丰州》：“真宗睹边奏云：迁贼屡为龙移昧乞所败。此族在黄河北，数万帐。东接契丹，北接鞑靼，南至河（《长编》卷54作南至河西），与大梁、小梁接”。[3]可见，大凉、小凉即大梁、小梁，亦可称为梁家族，是党项部落很强的一支，原居在贺兰山一带，西夏统一党项诸部后，为了发动对宋战争，梁家族可能迁往宋夏边境地带，梁氏一门即当出于此族。[4]

十、安全与失都儿忽

西夏后期的历史，由于史料奇缺，很多问题是较难搞清楚的，关于“失都儿忽”一词的解释就是一例。

失都儿忽，蒙文写作Sidurghu，汉文本《蒙古源流》译作锡都尔固，那珂通世、小林高四郎、韩儒林先生都认为蒙文Sidurghu意为“正直”。[5]《蒙古秘史》续集卷2称：

> 第三日成吉思合罕降旨，赐亦鲁忽不儿罕以失都儿忽之名。[6]

据《秘史》所载时间为“戌年秋”，即公元1226年，则这一被赐名为失都儿忽的西夏主应是李晛。《蒙古源流》卷4称：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庚申条。

② （元）脱脱：《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丰州》。

④ 余疑党项梁家族可能出自鲜卑梁氏（拔列兰氏），亦可能出于宕昌梁氏。《旧唐书·党项羌传》：“自周氏灭宕昌、邓至，党项始强”。可见宕昌有可能进入党项。吴天墀先生亦有此说，见《西夏史稿》，第98页。

⑤ 参阅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358页注9；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载《穹庐集》，第459—465页。

⑥ 道润梯步译：《蒙古秘史》续集卷2，第355页。

（成吉思汗）杀锡都尔固合罕，纳其古尔伯勒津高娃夫人，并收服密纳克唐古特国。[①]

很明显，这里的锡都尔固（失都尔忽）亦是指夏末主李睍。《圣武亲征录》却载：

（庚午）秋，复征西夏，入李王庙，其主失都儿忽出降，献女为好。[②]

庚午年为公元1210年，时为夏主安全在位时。《元史·太祖纪》：

四年己巳春，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夏主纳女请和。[③]

可知，"献女为好"者也是李安全。拉施特《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称西夏君主名sdargu，又称"唐兀惕国王失都儿忽"，唐兀惕语称作李王，并将献女之李安全与被成吉思汗所杀的李睍都称作"失都儿忽"。[④]根据这些记载，后人得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

王国维认为，同一蒙文名"失都儿忽"，一作李安全，一作李睍，二者必有一误。[⑤]

洪钧认为，"失都儿忽"见《秘史》，谓是来降后帝为改名。今考，帝未崩前，西夏主但纳降，未来谒，则失都儿忽当即其名，《亲征录》可证，可见《秘史》称成吉思汗将不儿罕改名失都儿忽之事有误。[⑥]

韩儒林先生根据《史集》的记载又提出了一种意见，他认为，"失都儿

① （清）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蒙古源流》卷4，第176页。
② （元）佚名著，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第125页。
③ （明）宋濂：《元史》卷1《太祖纪》。
④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编《唐兀惕部落》，第1卷第2分册《成吉思汗纪》6，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 （元）佚名著，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第125页。
⑥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1下，第22页。

忽”不是哪一个西夏主的人名，而是历代夏主的共用徽号。[①]从而否定了王、洪二家之说。

韩儒林先生这种看法根据似乎不足。《史集》将西夏后期的君王统称 lunk-sadargu 是不可为其说之力证的，因为拉施特所得到的有关西夏材料不可能十分确切，其中大部分材料恐怕来自“各民族的口头传说”。[②]当时的波斯人并没有直接同西夏人打交道，拉施特只能从蒙古人或西域商人的言谈中得到有关西夏的知识。而且，根据《史集》中关于“失都儿忽”的记载，既称失都儿忽献女求和，并说失都儿忽即唐兀惕语之李王，又称失都儿忽为成吉思汗所杀，好像是糅合了《秘史》与《亲征录》的两种不同记载，也即是采用了当时流行在蒙古人中的两种说法。其实，西夏历代国主之号应是“不儿罕”（Burqan），这在《秘史》中记载就十分清楚，《秘史》载西夏主之名从安全直到李晛均称为“不儿罕”，或称之为“亦鲁忽·不儿罕”，而不是“失都儿忽”。

元代僧人释念常的记载却十分清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丙寅，西夏拓跋失都儿忽，乾顺小子仁友之子，乃仁宗侄儿，是年五月立；辛未，西夏神宗拓跋须蕃邸立；癸未，西夏拓跋改德仁，是年九月立；丙戌，次年，清平郡王立。[③]

丙寅年为公元 1206 年，所立者为李安全；辛未年为公元 1211 年，所立者为李遵顼；癸未年为公元 1222 年，所立者为李德旺；丙戌次年为公元 1227 年，所立者为李晛。系年时间均与《宋史·夏国传》合，可证，释念常这一记载绝非信手拈来，必有相当可靠的依据。据此可知，“失都儿忽”确是一人名，即是李安全，与《亲征录》记载相合。“失都儿忽”、“须蕃邸”，“改德仁”都分别是安全、遵顼、德旺之名，很可能是他们的“小字”。西夏国主除名之外，均有“小字”，如德明小字阿移，元昊小字嵬理，[④]“失都儿忽”

---

① 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载《穹庐集》，第 459—465 页。

②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汉译本序言》。

③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40。

④ （元）脱脱：《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很可能就是安全之小字，而不是西夏历代国主的共同徽号。因为元人释念常这一段最清楚、最宝贵的材料是极易区分这一名称的实际含义的，而且释念常距西夏亡国甚近，所载可信。因此，余以为王、洪、韩三家之说当以洪钧说更为接近史实，王说含混，韩说则证据不足。

十一、西夏封王之始

由于史籍记载缺略，关于西夏国内的各项制度，学界所知甚少，而关于西夏的封王之制，则更难以述其本末。吴天墀先生认为，1103年，乾顺册封庶弟察哥为晋国王，“这是西夏封王制度正式在记载上的出现”，并且，否认了《宋史·刘绍能传》中元昊用“王爵”招诱刘怀忠之事。[①]李范文先生亦主此说，“西夏封王，最早见于乾顺时期”。[②]

元昊称帝，立国建制，自称西朝，与宋、辽鼎足而三。国内各项制度基本与宋相同，官制爵命亦大体完备，《西夏书事》卷11：“其名号悉仿中国故事”，又“其制多与宋同”。[③]目前虽然不见元昊颁布的封王之制，但从两点可以证明，元昊时期确有封王制度：

（一）元昊时，已有立太子之制，野利皇后生三子，长子宁明、次子宁令噶、三子锡哩。元昊因宁令噶“貌类己”而立为太子。[④]既然西夏在皇子中有太子之制，按宋制，其他皇储必然封王爵或其他爵位。

（二）元昊时，有侯、伯等爵之册封。《西夏书事》卷9载，张浦卒后，元昊追封其为“银州伯”。[⑤]《西夏书事》卷16载，野利仁荣卒，“赠富平侯”。[⑥]

按宋制，爵位有王、公、侯、伯、子、男等级差，王、公、侯等爵中又分几等。西夏元昊时既有侯、伯之爵封，则最高爵位王爵也必然设置，断不会只设侯、伯之爵，而无王爵之封。

从文献记载及考古材料上也可证明，在乾顺之前，西夏即有封王制度。

---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58、170页。

②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西夏研究论文集》，第142页。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

⑤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9大中祥符七年七月条。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庆历二年七月条。

据1975年发掘的西夏皇陵一〇八号墓，墓主叫嵬名惠安，在乾顺亲政之前，他就被封过王，其王号为“梁国正献王”。[①]元昊时期，文献中也有西夏封王的记载，《儒林公议》卷上：

其（唃厮罗）子瞎毡、摩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毡角素依首领郢成俞龙为谋主。俞龙复纳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②]

这才是西夏封王的最早记载，可见，封王之制在西夏建国后即已出现，并非始于乾顺之时。元昊以“王爵”招诱宋边境将吏并非虚衔诱饵，而是说明元昊知人善用，重视人才，这从张元、吴昊之流入西夏后所处的地位，就可得到证明。

十二、释“衙头”

衙头，是西夏人常用的一个词，在宋代文献中已多处出现，但应如何准确释义，似乎还没有定论。余原以为，“衙头”一词可作西夏主或西夏主的居住地解释。吴天墀先生则认为“衙头应为西夏国主发令之处”。[③]

看来，两说均不是准确的解释。余还是先罗列有关“衙头”的材料。

（一）《宋史·程琳传》：

（夏人）且言，契丹兵至衙头矣，国中乱，愿自归。[④]

（二）《长编》卷316：

衙头闻汉兵四出，即分遣诸监军司兵马委贼帅总领，谋抗官军。[⑤]

---

①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第76页。

②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与吐蕃联姻之梁王宁令，当即野利皇后之长子宁明。

③ 拙稿《〈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及《西夏蕃号官名表补正》，附吴天墀给学报编辑之信，载《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④ （元）脱脱：《宋史》卷288《程琳传》。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己酉条。

（三）《宋朝南渡十将传》：

夏主命翰林杨文璞赐显忠衣服，金银器皿，赐橐橐，且欲以女妻之。显忠欲一到衙头。[①]

（四）《长编》卷 508：

衙头差大使庆瑭科卜、磋迈喀嗟桑来计会。[②]

（五）《长编》卷 510：

河东司言：靖化堡麻也族蕃官伊锡元是衙头背嵬，投汉累为向导。[③]

（六）《长编》卷 507：

胁降到王固策称，系西界衙头服事小大王。[④]

（七）《长编》卷 406：

凡是捉虏到汉界人生口，并一一赴衙头呈纳，多是于近里去处监防羁管。[⑤]

（八）《长编》卷 325：

其首领皆牙头选募血战之人。[⑥]

---

①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3《李显忠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8 元符二年四月己卯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10 元符二年五月乙卯条。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7 元符二年三月丁巳条。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06 元祐二年十月甲申条。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25 元丰五年四月庚申条。

（九）《梦溪笔谈》卷 5《乐律》：

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①]

（十）宇文之邵《上皇帝书》：

贼之来也，大则六监军、衙头一时俱发。[②]

不管是余之旧释，还是吴先生的解释，都很难在上述材料的内容中得到较为合理的应用。实际上我们都是根据上述材料的内容在进行猜测，由于分析材料不够全面，故均有偏颇之处。其实，宋人对“衙头”一词是有解释的。郑刚中《西征道里记》称：

夏国主兴州谓之衙头。[③]

郑刚中的说法和余之观点较接近一些，而与吴先生的说法去之则远一点。还有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3《李显忠传》：

衙头，盖夏国朝廷也。[④]

宋人之解释仍有歧异，一谓兴州为衙头，一谓夏国朝廷为衙头，其实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只是不太清楚而已。“衙”即“牙”，北方民族以其可汗的居地称作“牙”或“牙帐”。《周书·突厥传》：

可汗恒处都斤山，牙帐东开。[⑤]

---

①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 5《乐律》。

② （宋）吕祖谦：《宋文鉴》卷 53 宇文之邵《上皇帝书》。

③ （宋）郑刚中：《北山集》卷 13《西征道里记》。

④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 3《李显忠传》。

⑤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 50《突厥传》。

《新唐书·回鹘传》：

菩萨附薛延陀相唇齿，树牙独乐水上。[1]

《新唐书·地理志》：

七百里至回鹘衙帐。[2]

《新唐书·回鹘传》：

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温昆河之间。[3]

西夏之“衙头”当即“牙帐”之意（上述第七条材料就将“衙头”写作“牙头”），即指可汗或国主的居处，而一般游牧行国的“牙帐”建树之处，亦即定居王国的首都，故宋人释之为兴州（夏国首都）或夏国朝廷（夏主居处）都是正确的。

十三、元昊夺取甘州的时间

目前公认，西夏灭甘州政权是天圣六年（1028）。此说依据是《宋史·夏国传》：

天圣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4]

但是，这一记载既不见于《宋史·回鹘传》，又不见于《宋会要辑稿》及《长编》等书。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宋史·夏国传》记载是否有误。

---

①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
②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3《地理志》7。
③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与甘州回鹘的争夺战争由来已久，大中祥符三年（1010），西夏就曾攻破过一次甘州。正同西凉府一样，西夏虽然攻破甘州，但很快就被甘州回鹘夺回，这从甘州回鹘的世系就可看出。天圣五年（1027）以前甘州回鹘可汗是夜落隔通顺，天圣五年至六年间是宝国夜落隔。至天圣七年（1029），甘州回鹘还出现了一位新可汗“伊噜格勒雅苏”。宋庠《赐交趾郡王李德政、甘州可汗王伊噜格勒雅苏历日》：

> 朕只仰乾经，顺修时训，每缘命朔，必谨颁常。卿诏服世勋，协宁边略，属岁元之更序，资玉历以布和。宣克钦承，用符恭授。[1]

据《宋史·宋庠传》，仁宗时，宋庠为朝廷知制诰，[2]此敕书乃宋庠亲自撰写的官方文件，敕书内容虽属虚华之辞，而赐“甘州可汗王伊噜格勒雅苏历日”却是最为可靠的记载。这位“伊噜格勒雅苏”虽属甘州回鹘王族“夜落隔（药罗葛）”氏（伊噜格勒为“夜落隔”之清人改译），但什么时候当上了甘州回鹘的可汗王呢？可从“交趾郡王李德政”身上找到一些证明。李德政是交趾的统治者，其父李公蕴，据《宋史·交趾传》，李公蕴在天圣四年前被宋封为交趾郡王，后又转进南平王，天圣七年卒。[3]《宋史·仁宗纪》载：

> （天圣七年四月）辛卯，南平王李公蕴卒，其子德政遣人来告，以为交趾郡王。[4]

又《宋会要辑稿·交趾》载：

> （天圣七年四月）安南静海军权知留后事李德政言：“臣父公蕴以六年三月三日薨，见遣使入贡，寻授德政官如（公）蕴初（即交趾郡王）”。[5]

---

① （宋）宋庠：《元宪集》卷28《赐交趾郡王李德政、甘州可汗土伊噜格勒雅苏历日》。
② （元）脱脱：《宋史》卷284《宋庠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8《交趾传》。
④ （元）脱脱：《宋史》卷9《仁宗纪》1。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4《交趾》。

可见，李德政为交趾郡王是天圣七年四月以后的事。那么，宋赐交趾郡王李德政历日之事必在天圣七年四月以后，因此，与交趾郡王同赐历日的“伊鲁格勒雅苏”就应当是天圣七年四月还在位的甘州回鹘可汗王。那么，天圣六年二月还在位的“宝国夜落隔”可能在天圣七年四月之前又被“伊噜格勒雅苏”取代。也就可证明，天圣七年甘州回鹘政权并未灭亡。前引敕书还称：“卿诏服世勋，协宁边略，属岁元之更序，资玉历以布和”。[①]宋王朝在这里还褒奖“伊噜格勒雅苏”继承其父祖之勋业，协同宋王朝一起抗夏卫边，并按属岁更元颁赐历日的常规给甘州颁赐历日，可见，天圣七年四月，甘州仍在回鹘“夜落隔”氏的股掌之中，并无政权更变之痕迹。

那么，《宋史·夏国传》误在何处呢？根据文献记载，余以为，元昊攻占甘州是两次，一次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另一次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第一次甘州虽被攻破，但未被长期占领，甘州回鹘政权也未因此而亡；第二次西夏攻破甘州，不仅长期占领，而且正式收归西夏政府管辖，这样，以甘州为牙帐的回鹘政权应正式宣告灭亡。《宋史·夏国传》天圣六年（1028）的那一条材料正是第一次西夏破甘州的记载，其中“天圣六年”当为“天圣元年”之讹。可以《宋史·夏国传》的另一条材料为证：

> 曩霄本名元昊，弱冠，独引兵袭破回鹘夜洛隔可汗王，夺甘州，遂立为皇太子。[②]

古人以二十岁左右为“弱冠”，元昊死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终年46岁，则应生于咸平五年（1002）。如果以21岁为元昊“弱冠”之年的话，那就正好是天圣元年（1023）。“天圣六年”元昊已经26岁，已不能称作“弱冠”之年。所以，“弱冠”夺甘州的赵元昊，是应该在天圣元年，而不在天圣六年。“六”、“元”形近，容易错讹，史书中“六”讹成“元”，“元”讹成“六”，且不乏其例。故余以为《宋史·夏国传》中“天圣六年”当为“天圣元年”之讹。因此，“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的记载应在天圣元年。

天圣元年，西夏这一次对甘州的进攻，完全是突然袭击，“元昊独引兵

① （宋）宋庠：《元宪集》卷28《赐交趾郡王李德政、甘州可汗王伊噜格勒雅苏历日》。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袭破回鹘夜落隔可汗王”这一句话可以反映，这是赵德明为其子元昊参入正式战争指挥而安排的一次实战演习。所以，甘州虽破，并无长期占领之意。田况《儒林公议》卷上载："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时，将兵破甘凉，其可汗自焚，仍俘其妻孥以归"。[①]这位自焚的甘州可汗就是“夜落隔归化”，《宋史·夏国传》省称为“夜落隔”。由于“夜落隔”即“药罗葛”，为传统的漠北回鹘可汗之姓，故外人呼甘州回鹘可汗多有省称之例。如：夏竦《文庄集》卷2和《宋大诏令集》卷240都将“夜落隔归化（伊噜格勒圭呼）”省称为“夜落隔（伊噜格勒）”，[②]前引《宋大诏令集》卷240还将“夜落隔通顺”省称为“夜落隔”。[③]夜落隔归化从大中祥符九年（1016）开始，即为甘州回鹘可汗，到天禧四年（1020）甘州可汗仍是归化，天圣五年五月后，甘州可汗已易名为“夜落隔通顺”。“归化”也就是在天圣元年西夏破甘州后自焚而亡，这也是元昊在天圣元年（1027）破甘州的一个旁证。由于西夏破甘州后迅速撤军，“俘其妻孥以归”，并无占领之意。因此，甘州回鹘政权以“夜落隔通顺”为汗而得以保存下来。之后又有宝国夜落隔、夜落隔（伊噜格勒）雅苏，“雅苏”是否宝国夜落隔之名，尚无证据。

西夏第二次攻破甘州是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也是西夏最后攻占甘州的时间。西夏在赵德明时期，东联契丹，南和赵宋，休生养息，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展开对西部的开拓，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统一河西的时机已经成熟。明道元年，赵元昊率领的西夏铁骑对河西各政权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元昊“志在恢拓，数侵诸蕃”，[④]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甘、凉二州。《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载：

仁宗皇帝明道元年冬十一月，既陷甘州，复举兵攻西凉府，未逾

①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而（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作："天圣六年夏五月，德明使其子元昊攻回鹘，取甘州。……夜落隔归顺仓卒出奔，元昊置戍其地而还"。很明显，吴氏接受《续纲目》之说，定取甘州为天圣六年五月，而后面所载又与《儒林公议》冲突。余以为后两句为吴氏演绎之说。吴氏搜求西夏史实虽富，但《儒林公议》中几条极为重要的史料却不见采录，实为吴氏之疏，故不可取。（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却用田况之语，可见，张鉴已察吴氏之误。

② （宋）夏竦：《文庄集》卷2《外制》；《宋大诏令集》卷240《赐甘州回纥天圣五年历日敕书》。

③ （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240《甘州外甥回纥可汗王夜落隔可特进怀宁顺化可汗王制》。

④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时，德明死，元昊继立。[①]

《皇宋十朝纲要》卷 5 亦载：

（明道元年十一月）是岁，德明取甘州及西凉府。[②]

《东都事略》卷 127 还载：

（明道元年）德明尝攻陷甘州，拔西凉府。[③]

李焘《长编》将元昊取甘州事并叙于德明临卒时，而书德明之死在明道元年末。[④]可见，李焘也认为元昊取甘州在明道元年。

十四、蕃号官名与蕃官名号

余于 1983 年在《四川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原文标题是《西夏蕃号官名表补正》，其内容是讨论西夏之蕃号官名。[⑤]然而，学报的同志可能是根据吴天墀先生的意见，将余文中提及的“蕃号官名”全部改成了“蕃官名号”。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字次序上的颠倒，但实际上牵涉到西夏官制两种不同的认识。吴先生认为，西夏官制分汉官与蕃官两个系统。[⑥]余以为，在西夏出现的“蕃官”与“汉官”的区别，并不具备官制意义的不同，而只是一种民族意义上的区分。“蕃官”就是指非汉族的官员，不仅指西夏国内的非汉族官员，而且亦指宋朝境内的党项、吐蕃、回鹘、吐浑、契丹等族官员，与“蕃兵”、蕃将”、“蕃弓箭手”为同一类型的词；“蕃官”乃宋人对外

①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7《康定元昊扰边》。
② （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 5 明道元年十一月条。
③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 127《西夏传》。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1 明道元年十二月条。
⑤ 拙稿《西夏蕃号官名表补正》，载《四川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⑥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202 页。又林旅芝：《西夏史》第 3 章《西夏之政制及文化》；蔡美彪：《中国通史》第 6 册第 4 章《西夏的兴亡》均持此观点。

族官员的一种统称，而在西夏并不存在一套如蕃汉字、蕃汉学分立的“蕃官系统”。那么，也许会有人问，那在许多西夏官员前冠以“领卢”、“枢铭”、“宁令”、“祖儒”、“吕则”、“庆唐”等词又作何解释？这就是“蕃号官名”。吴广成云：“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素晋、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①]吴广成称之为“蕃号”，可见其认识是正确的。所谓“蕃号”，即指西夏推行的宋朝官制的西夏语译音。就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近来李蔚与白滨二位先生已发表了高见，可以说基本解决了西夏不存在汉官与蕃官两种官制系统这一问题。[②]因此，余不再在理论上进行多余的阐述，只就几个“蕃号官名”谈谈具体的认识。如宁令、谟宁令二蕃号，《梦溪笔谈》卷25称：“宁令者，华言大王也”，“谟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③]以沈括之言，宁令当为“大王”之西夏语译音。大，西夏文作“𗂸”，《掌中珠》读作“魁”；王，西夏文作“𗼃”，读音不明，但明显可知，西夏文“𗂸𗼃”二字译音不应为“宁令”。《宋史·庞籍传》：“遣籍报书，使呼旺荣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④]以其意，则“宁令”和“谟宁令”均当指“太尉”一官称，西夏文“𗫔（太）”字，《掌中珠》读作“令”，“尉”字不见西夏字中，故知“宁令”，当为太尉一词之西夏语音，而大王则又是西夏人对夏国中掌握军权的最高官员“太尉”一词之俗称。“谟宁令”，《长编》卷331有“梁默宁凌”，[⑤]“默”，西夏语“天”读作“没”，与“谟”“默”同音，则“谟宁令”应释为“天太尉”，实际就是“第一太尉”，《宋朝事实类苑》有西夏“二太尉、三太尉”之载，[⑥]可见，“谟宁令”当释为“第一太尉”。故沈括有上述之言。

现存的蕃号官名中有释义者：“兀卒（乌珠）”是皇帝，《文海杂类》读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条。

② 李蔚：《西夏蕃官刍议》，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白滨：《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④ （元）脱脱：《宋史》卷311《庞籍传》。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乙巳条：“永乐之役，初总兵至者乃梁默宁凌”。

⑥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5《安边御寇》。

作“祖”；[①]“领卢”是枢密，[②]又作“凌罗”，《长编》卷283“夏人谓伪枢密为‘凌罗’也”，[③]《掌中珠》又读作“令落涅”；中书《掌中珠》读作“酩腮”，《凉州碑》译作“铭赛”；监军《掌中珠》读“遏足尼”，《凉州碑》译作“孽祖”；“鼎利”当即“閤门”之译音，《掌中珠》译閤门为“顶疾”；“谟箇（摩格）”当即“宣徽”，《掌中珠》译宣徽为“暮讹”；“令能”当即“陈告（使）”，《掌中珠》译陈告为“绿遥能”，[④]其他蕃号不可释义者尚多。

另外还有两个蕃号官名是余在《西夏蕃号官名表》中未提及的，一是“必吉”，《雪楼集·魏国公先世述》：

> 家世河西，曾大父答加沙为其国必吉，必吉者，犹宰相也。[⑤]

这就告诉我们，“必吉”亦为西夏蕃号官名，宰相的西夏语译音作“必吉”，在夏国任相者甚多，均未见称“必吉”者，宰相似未见西夏语译字。二是“钤部”，西夏人物中多以钤部（Sgampo）为名者。沙陀昔李氏一家中即有昔里钤部、小钤部、束南玉钳部，昂吉儿的父亲称也蒲甘卜，余阙的父亲为沙剌藏卜，克烈部长王罕弟弟亡命西夏时，名札阿绀孛，[⑥]《蒙古秘史》中有西夏大将阿沙敢不，[⑦]钤部、敢卜、绀孛、臧卜、甘卜，显然都是Sgampo的译音。钤部一词为何义？韩儒林先生作过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夏人之钤部即采自吐蕃的赞普，因“唐兀与吐蕃境地相接，佛教且甚流行，夏人取其赞普徽号而用之，固极自然之事”。[⑧]是的，“赞普”一词与“钤部”一词音极相近，但仅凭一词之音近而断言西夏“钤部”一词必采自吐蕃似缺少有力之证据。《新唐书·吐蕃传》称：“其俗谓雄强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

---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杂4·143条，第535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292《程戡传》。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七月乙亥条。
④ 以上见（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绝域方言丛书》第1辑；及《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10页。
⑤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⑥ 参阅《元史》卷123《也蒲甘卜传》、卷122《昔里钤部传》、卷143《余阙传》、卷1《太祖纪》。
⑦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续集卷2，第352页。
⑧ 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载《穹庐集》，第459—465页。

曰赞普（bcanpo）”。[①]《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吐蕃号其王为赞府”。[②]可见，赞普是吐蕃君长之称号，岂可滥称，一般人是不可称其号的，而西夏人则比比皆是。钤部显然是一般的官职，与吐蕃赞普无涉。上引《雪楼集》之《魏国公先世述》即可证明这一点。

> 钤部者，河西之军职也。[③]

可见，钤部乃西夏之武官职名。姚燧撰《虎公神道碑》称木速忽勒为乌纳城“钤部官”。[④]昔里钤部是沙州守将，也蒲甘卜是甘州守将，阿沙敢卜是贺兰山守将，西夏字“将”，李范文标音为biū。[⑤]可见，钤部乃西夏一地区守将之职名，钤部为西夏地方守将之汉译音。

下面拟将汉文文献中出现的有关西夏职官有汉字译音者（即蕃号）列表如下：

西夏蕃号官名表

蕃号官名	蕃号汉意	任职者	资料来源
吾祖（兀卒、乌珠）	皇帝	元昊	《长编》卷123 《宋史·夏国传》 《文海杂类》
尼则、乌泥	太后		《长编》卷123 《文海杂类》
宁令（谟宁令、没宁令）	太尉	野利旺荣	《宋史·庞籍传》 《梦溪笔谈》卷25
祖儒、族汝		嵬名聿则	《宋史·夏国传》 《东原录》
必吉	宰相	答加沙	《雪楼集》卷25
钤部、敢卜、甘普	将军	昔里 阿沙	《牧庵集》卷14 《雪楼集》卷25
庆唐		徐舜卿 威明科卜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508

①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②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官号》。

③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④ （元）姚燧：《牧庵集》卷14《虎公神道碑》。

⑤ 李范文：《同音研究》，第221页。

续表

蕃号官名	蕃号汉意	任职者	资料来源
吕宁、吕尼		拽浪撩黎 如定聿舍	《长编》卷142 《宋史·夏国传》
领卢、凌罗、令落逕	枢密（院）		《宋史·程戡传》 《长编》卷283 《蕃汉合时掌中珠》
铭赛、酩腮	中书（令）	梁行者乜	《掌中珠》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京六、广乐、恭罗	经略（司）	们色勒裕勒 毛示聿	《掌中珠》 《长编》卷396 《宋史·夏国传》
正暮、程谟	正统（司）	田快庸	《掌中珠》 《长编》卷506
外母、遏暮、星茂（昴）[①]	统军（司）	嵬名济乃 卧屈则	《掌中珠》 《长编》卷331 《凉州碑》
北与	殿前（司）		《掌中珠》
卧则、斡则尼	皇城（司）	卧屈皆	《掌中珠》 《凉州碑》
卒尼讹、哲伊	御史	叶朗僚礼	《掌中珠》 《长编》卷193
暮讹、谟个、摩格	宣徽（司）	咩迷乞遇	《掌中珠》 《长编》卷350 《宋史·夏国传》
则尼割	三司		《掌中珠》
姑要、创祐、春约	内宿（司）	讹罗聿赛 勒阿拉雅赛	《掌中珠》 《宋会要辑稿·蕃夷》7 《长编》卷380
西正尼	巡检（司）		《掌中珠》
吃讹	工院		《掌中珠》
力讹	马院		《掌中珠》
绿逕能、令能、哩宁、令逊	陈告（司）	嵬名济赛	《掌中珠》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519、506
赤剋	磨勘（司）		《掌中珠》

① 统军，《掌中珠》作“外母”，《凉州碑》作“遏暮”，《长编》卷331称“夏国西南都统星茂威明吉鼐”，《宋史·夏国传》作“夏国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乃”，而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4称“夏国西南都统嵬名济乃”，无“星茂”、“昴星”二字，都统即都统军之意，疑“星茂”，同“外母”、“遏暮”一样，为统军一词之西夏语译音，而“昴星”则为“星昴”之倒置。

续表

蕃号官名	蕃号汉意	任职者	资料来源
与合力	审刑（司）		《掌中珠》
顶疾、鼎理、鼎利	閤门（司）	罔豫章	《掌中珠》 《宋史·夏国传》
顶赤罗、顶直罗	大恒历院	卧屈皆	《掌中珠》 《凉州碑》
相	农田（司）		《掌中珠》
遏足尼、孽祖、鄂则尔	监军（司）	埋笃皆 鄂迪驸马	《掌中珠》 《长编》卷266 《凉州碑》
能合	群牧（司）		《掌中珠》
嚰张	受纳（司）		《掌中珠》
枢铭		靳允中	《东原录》
丁努、鼎罗、鼎努		嵬名谟铎 关聿则	《长编》卷385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154
吕则、吕则依		陈聿精 罔裕玛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389
芭良		嵬名济	《宋史·夏国传》
昂聂、昇聂		嵬名嚷 张聿正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360 《长编纪事本末》卷83
映吴、扬乌		嵬名谕密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396
祝能、视能		野乌禹实	《西夏书事》卷28 《长编》卷396
磋迈		额结桑	《长编》卷508
阿泥、阿克泥		嵬名科荣	《西夏书事》卷23 《长编》卷226
素赍		咩布移则	《西夏书事》卷18 《长编》卷156
僚礼、寮黎		旺约特和尔 罔聿嚷	《长编》卷142
旺令、旺精[①]		嵬名嚷	《宋史·夏国传》 《长编》卷511

① 《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弟“嵬名嚷”之前冠一蕃号“旺令”，疑为一蕃号官名。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甲戌条称:“西界投来首领伊实巴特玛系西界叶令吴箇，官在旺精之下，正钤辖之上”。很明显“旺精”即是蕃号官名。旺令、旺精疑为同一蕃号官名。

续表

蕃号官名	蕃号汉意	任职者	资料来源
德明		雅卜裕木攀	《长编》卷511
足尼领、凑铭	承旨	吴没	《掌中珠》，《凉州碑》
仓尼扁	都监		《掌中珠》
阿六	都案	麻女契多革	《掌中珠》 《长编》卷318
嵬足尼	州主		《掌中珠》
托精尼	通判		《掌中珠》
正祖尼	正听		《掌中珠》
令批		浑嵬名遇	《凉州碑》
粟铭		刘屈栗崖	《凉州碑》
叶令（业令）吴箇[①]		叶石悖七 伊实巴特玛	《宋会要辑稿》兵17 《长编》卷511 《凉州碑》
吴箇		叶石悖七	《宋会要辑稿》 《凉州碑》

十五、十二监军司与十八监军司

监军司制是西夏国内重要的军事制度之一。据《宋史·夏国传》元昊时，“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②]并且在《夏国传》的末尾部分还详细地记录十二监军的军名。[③]但《长编》卷120却载赵元昊于景祐四年“置十八监军司”，[④]而《长编》之载还可得到《范文正公年谱》的印证，亦称元昊“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⑤]于是，关于西夏监军司之数，在清人修西夏史时亦各采一说，吴广成之《西夏书事》、戴锡章之《西夏纪》云置

① 据前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1知“叶令吴箇”为一蕃号官名。据《凉州碑》中之“吴箇”，陈炳应释其义为“监”。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29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⑤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年谱》。

十二监军司，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却云置十八监军司，[①]令人莫衷一是。

元昊时，西夏监军司究竟是十二还是十八呢？《宋史·夏国传》当然是治西夏史最重要的资料，其言元昊时建十二监军司似乎不宜轻易否定；而《长编》作者李焘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学家，他采用元昊立十八监军司之说，想必有所本，亦绝非妄言。十二与十八两说之原始依据均只有一条资料，即《宋史·夏国传》与《长编》卷120中的记录，很难判断其正误。近日又获一条史料，即李裕民先生在日本发现的司马光《日录》，内称：

> 刚浪唆死，又曰：始，元昊分国中兵马为左右厢，使唆兄弟分统之，唆反诛，元昊更分左右厢为十六监军，各有首领。[②]

十六监军再加上左、右厢监军，则为十八监军。司马光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其所载与李焘《长编》相合，其所记应较元人所修《宋史·夏国传》可信。故余以为元昊所建监军司应是十八，而非十二。

《宋史·夏国传》上称元昊时建十二监军司，《宋史·夏国传》下更列出十二监军司之名，即为左厢神勇、石州祥祐、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罗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③]有几点可以说明上述十二监军司不是元昊时建，一是石州祥祐军，元昊建国时，西夏没有石州。《宋史·夏国传》：

> 元昊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④]

《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 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绥怀之初，有夏、银、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景祐三年九月条；（清）戴锡章：《西夏纪》卷6景祐三年“定兵制”条；（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元昊叛逆》。

② 李裕民点校：《司马光日记校注》之《日录》卷2第101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①

两处所载，均可知，元昊建监军司时，西夏尚无石州。《宋史·夏国传》载："（嘉祐七年）又改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②好像石州之名在嘉祐七年之前即已存在。但这条材料又是《宋史·夏国传》的误记。据《长编》卷196：

（嘉祐七年六月癸未）夏国改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③

当时的延州宋将刘温润《西夏须知》更载：

（嘉祐七年五月）谅祚以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④

可知《宋史·夏国传》之石州监军司为绥州监军司之误。直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种谔攻取绥州后，西夏将石堡城升为石州，至元丰时始有"石州"及"石州监军司"之名。⑤故《宋史·夏国传》下记录西夏后期的二十二州名中有石州，记录的十二监军司中有"石州祥祐监军司"。故知前列之十二监军司名并非元昊时所建监军司名，而是西夏后期监军司名。

二是"西寿保泰监军司"。元昊建监军司时亦无此监军司名。《韩魏公集》卷15载：

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⑥

《长编纪事本末》卷83所载与《韩魏公集》相同，⑦《宋史·夏国传》及

---

①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②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七月癸未条。

④ （宋）刘温润：《西夏须知》，转引自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0嘉祐七年五月条。

⑤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神宗经制西夏》；（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0下元丰四年十月丁巳条。

⑥ （宋）韩琦：《韩魏公集》卷15《家传》5。

⑦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韩琦筑甘谷城》。

《长编》卷196均称嘉祐七年夏国“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1]韩琦上言时间是“熙宁元年”，距嘉祐七年仅四五年时间，故称“近年”，韩琦之言是“建保泰军”，故知元昊时并无保泰军，并非如吴广成所言：“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是元昊旧定军名”。[2]如依韩琦所言，亦可证，上述十二监军司并非元昊时创建监军司名。还有魏泰《东轩笔录》卷8：

> 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厢，野利遇乞统天都右厢。[3]

“天都右厢”则证明天都山设立监军司，《长编》卷505即载“天都监军”[4]之名。野利遇乞，元昊时人，可证天都监军司元昊时即已设立。然而，上述十二监军司名并无天都监军司。以上三点均可证明，《宋史·夏国传》下记录的十二监军司之名并非元昊时所建，而是西夏后期的全国监军司名。而《宋史·夏国传》上称：“元昊置十二监军司”[5]完全有可能是元人修《宋史》时，见到有西夏后期全国十二监军司之名，为了解决歧异，元人又未进行更细致的考订，故将原记的十八监军司改为十二监军司，以求前后统一。

元昊时建十八监军司，但其后西夏监军司的设置则在不断变更，特别到了宋夏战争的高峰期，西夏监军司的变化更大。如谅祚时，就在灵州增设一全国之总监军司，“更于西平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6]《宋史·钟传传》称：“由清远距罗（逋）山走灵州百里，夏国以五监军统焉”。[7]百里之区，设五监军司。《韩世忠碑》则有“十军监军驸马郎君兀啄”[8]之载。一人统领十监军，可以反映在战争高峰期西夏全国监军司数远远超过元昊初期的十八监军司。下面将各种文献记载夏国监军司名罗列如次（均为《宋史·夏国传》十二监军司名未见者）：

---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六月癸未条。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0嘉祐七年五月条。

③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8。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己酉条。

⑤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宋）刘温润：《西夏须知》，转引自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0嘉祐七年五月条。

⑦ （元）脱脱：《宋史》卷348《钟传传》。

⑧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3《韩世忠碑》。

绥州监军司：《西夏书事》卷22："绥州监军吕效忠犯德顺军"。[①]监军为监军司的主要官吏，故知绥州设有监军司。

洪州监军司：《西夏书事》卷30："（元符元年）正月，王愍率诸将由塞门入界。大首领凌吉讹遇合洪、宥两监军"。[②]又《长编》卷490："洪、宥、韦三州都统军贺朗赍"。[③]故知洪州设有监军司。

沙州监军司：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中有用西夏文写的"沙州监军司"，并与"瓜州监军司"同时出现。[④]可见瓜沙地区有二监军司。

砮饿州监军司：据陈炳应先生所录榆林窟二十五窟西夏文题记中，还有"砮饿州监军司"，[⑤]南宋王志远摹刻《地理图》碑石在贺兰山居延海左近有"碛南弥饿州"，[⑥]砮饿、弥俄，系同音异译，故知西夏在贺兰山和居延海之间还有一监军司。

中寨监军司：《宋会要辑稿·兵》8："西夏起甘州、右厢、卓罗、韦州、中寨、天都六监军人马屯编江州（当为川)"。[⑦]可知，西夏有中寨监军司。田况称："中寨，贼之劲悍者也"，[⑧]疑即灵州翔庆军。

天都监军司：上引《辑稿》材料即有"天都"监军司，又《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己酉）勘会穆赍多卜等是天都监军"。[⑨]可见，天都山有监军司。

剉子山监军司：《西夏书事》卷30："熙河两路兵四万出塞，将至剉子山监军司"。[⑩]剉子山，地望不确，约在兰州的东北面。

娄博贝监军司：《长编》卷471："塔坦国人马于八月内出来打劫了西界贺兰山后面娄博贝监军司界住坐人口、孳畜"。[⑪]《西夏书事》译作"罗博监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2熙宁三年十二月条。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0元符元年正月条。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丙戌条。
④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21页。
⑥ 今苏州文庙收藏南宋地理图，见曹宛如：《介绍三幅古地图》，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8。
⑧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己酉条。
⑩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0绍圣四年十一月条。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条。

军司”。[①]“贺兰山后”，即贺兰山山南，当为兴、灵一带之监军司。

银州监军司：《永乐大典》卷8089《绥州城录》：“治平四年，种谔直奏云：银州监军嵬名山请以所部数万众归款”。[②]《宋史·陆佖传》亦有“银州监军”[③]之名。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

> 逐授告除（显忠）定难军承宣使（即夏州），遂许出兵，发诸监军司二十万骑，盖宥州、石州、盐州、龙州、石堡、青池诸监军司。文臣王枢、武臣哆讹为收复陕西招抚使，以显忠为鄜延岐雍等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择日进兵。时绍兴九年二月十四日。[④]

这条材料记载了六个监军司名，其中宥州和石州两监军司名见于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名之中，而盐州、龙州、石堡、青池四个监军司之名却仅见于此。

盐州监军司：为《宋史·夏国传》中早期十九州中的一州，后期的二十二州亦有盐州，地在今陕西定边县，盐州监军司始置于何时不详，余以为也应当是宋夏战争高峰年代所增设的监军司，而且一直保存到南宋初年还未废除。

龙州监军司：为《宋史·夏国传》中早期十九州中的一州，但后期二十二州中无龙州之名，龙州何时为西夏所废，史无明载，有人认为崇宁三年宋人攻占之石堡寨，后赐名威德军即是西夏龙州，这似乎不妥当。因为，《武经总要前集》卷19中明言，龙州乃石堡镇升，又称石堡镇在延州西边。[⑤]据《宋史·地理志》延州石堡寨条：“国初尝置城，至道后废之，地在延州北”。[⑥]此石堡寨在“延州北”，宋初就建为石堡城，而西夏又升石堡城为石州。元丰间，宋军曾攻占石州，兵败后寻又弃州，崇宁间再度攻占，这个石堡寨，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元祐六年九月条。
② 《永乐大典》第9册卷8089引《绥州城录》。
③ （元）脱脱：《宋史》卷332《陆佖传》。
④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卷3《李显忠传》。
⑤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
⑥ （元）脱脱：《宋史》卷87《地理志》3。

即西夏石州，而非龙州。[①]龙州似乎未被宋人攻占，至绍兴年间，龙州仍为夏国之州。另外，《金史·西夏传》中还有一条材料：

> （兴定三年）华州元帅完颜合达出安塞堡，至隆州败其兵二千。进攻隆州，克其西南，会暮乃还。[②]

安塞堡，在金延安府之西北，出安塞西北行，即至夏龙州。《金史》之“隆州”当为“龙州”，就像“韦州”有时又写作“威州”一样，从字音及地望上看均相合。故可知，西夏龙州至夏亡国之前九年仍存在，《宋史·夏国传》后期二十二州无龙州之名令人不解。

石堡监军司：这里出现了一个“石堡”，且与“石州”、“龙州”同时并存。一石堡镇元昊时升为龙州，一石堡城秉常时升堡为石州，绍兴年间，夏国又出一“石堡监军司”，看来只有作这样的推测，夏国之地原就有多处以“石堡”为名的地方（这是常见之事），否则无法作圆满解释。

青池监军司：青池一名未见，余以为，青池当即乌池，西夏另有白池，即著名青白盐之产地。《宋史·食货志》：“青白盐出乌、白池，西羌擅其利”。[③]《山堂考索前集》卷57《财赋门》：“初唐盐州五原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④]可知，乌池在唐盐州五原县地，西夏在此设青池监军司。

从前引《宋史·钟传传》灵州一带即设五监军，而青池本就在盐州境内，即盐州又设两监军，可以反映，在宋夏战争紧张年代，西夏在宋夏沿边地带设置监军极多而密。连石堡城、青池这些小地方都设置监军司，可以推断，在宋夏边境，凡是西夏驻军之地，都有可能设置监军司。所以，宋夏战争高峰期，特别是元丰、绍圣、元符时期宋朝大举讨伐西夏时，夏国设置的监军司应远远超过元昊时期的十八监军司，如以上面征引的十三个，再加上

---

① 参阅拙著《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载《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

②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元）脱脱：《宋史》卷183《食货志》下。

④ （宋）章如愚：《山堂考堂前集》卷57《财赋门》。（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载：“（嵬名）山遇先在元昊处为枢密，兄弟室家皆居细项”。此“细项”是 否即盐州之“细项池”。嵬名山遇为元昊时四太尉之一。嵬名山遇即（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之赵善约特，又名赵惟亮，其弟称“三太尉”，名赵惟永；另有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此四人元昊时共掌兵权。四人西夏蕃号均为“宁令”或“谟宁令”。

后期保存的十二个，则西夏全国监军司数最高时至少有二十五个。

西夏乾顺、仁孝之后，文治益隆，武备每况愈下，军事力量较元昊、谅祚时期大大削弱。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言："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①]随着西夏对外战争的日渐减少，重文轻武的仁孝皇帝必然会对过多的监军司进行整顿，到仁孝天盛年间，西夏监军司明显减少。据《天盛律令》记载，当时全国监军司共十七个，分为两类：

> 十二种监军司全部派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等九人：石州、东院、西寿、韦州、卓啰、南院、西院、沙州、啰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
>
> 五种监军司均一正、一副、二同判、三习判等遣七人：肃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②]

上述十七监军司名中石州、西寿、韦州、卓啰、瓜州、黑水[③]六监军见于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名中，沙州即前引之沙州监军司；南院，据《凉州碑》则知是右厢朝顺军，地在凉州；[④]啰庞岭即前引之娄博贝监军，又称罗博监军，即白马强镇军；[⑤]西院疑即甘州甘肃军；[⑥]官黑山疑即黑山威福军；东院疑

---

①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政和二年六月条。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第250页。陈炳应译文略有不同，将"官黑山"译为"黑函山"，见该氏《贞观玉镜将研究》，第15页。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绍兴二年十二月条:"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人蜂起亡入夏国。乾顺处之北鄙，别立监军司统之"。又卷35绍兴十年六月条:"（夏州统军萧合挞叛）于是，河东八馆、山金司、南北王府前置北鄙诸契丹蜂起应之，合众数万，围灵州，监军司使罔存礼拒战，数败"。乾顺在夏国"北鄙"安置契丹降户的监军司是哪一个呢？余以为就是见于《天盛律令》中的"黑水监军司"，亦即《宋史·夏国传》下记录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之一的"黑水镇燕军"。黑水监军司设在居延泽之额济纳旗，为西夏"北鄙"，"镇燕"即镇契丹降户也。如是，则知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设置年代在夏乾顺正德六年（1132）。

④ 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10页。

⑤ 参阅拙著《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载《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

⑥ 如以西夏首都兴州为中心，凉州在其东南，故称南院，西面有甘、肃、瓜、沙四州，而瓜、沙、肃三州均见十七监军司名中，西面唯一未见名者为甘州，故疑甘川为西院。

即左厢神勇军；[1]北院疑即啰娥州监军司。[2]其他年斜、北地中、南地中不知所指。《天盛律令》中还设有四个军：

> 四种军一安抚、一同判、一习判、一行主，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3]

这四种军职官为“安抚”，与监军司职官“监军”不同，故可认这四种军并非监军司。还有《西夏地形图》中的“清远军”、“贺兰军”及“瀚海军”，[4]这些军很可能是沿袭宋以来的地方行政军名，或者是仿照宋朝设置的地方行政军名，并无监军司之设。

到西夏后期，西夏国内和平寝久，武备废弛，又在仁孝天盛年间十七个监军司的基础上，裁去五个监军司，裁去者当是北院、肃州、沙州、北地中、南地中等五个监军司。剩下十二监军司为石州（石州祥祐）、东院（左厢神勇）、西寿（西寿保泰）、韦州（韦州静塞）、南院（右厢朝顺）、西院（甘州甘肃）、啰庞岭（白马强镇）、官黑山（黑山威福）、黑水（黑水镇燕）、卓啰（卓啰和南）、瓜州（瓜州西平），还有一监军司为《宋史·夏国传》后期十二监军司中的“宥州嘉宁”，余疑即《天盛律令》中的“年斜”监军司。所以，到西夏后期只保留了夏国周边四境的一些重要防守据点，即《宋史·夏国传》下记录的西夏后期之十二监军司。

---

① 如以西夏首都兴州为中心，兴州东面重镇为夏、宥两州，既然右厢监军司凉州称之南院，那么左厢神勇军也应有“院”一级的地位。左厢神勇军在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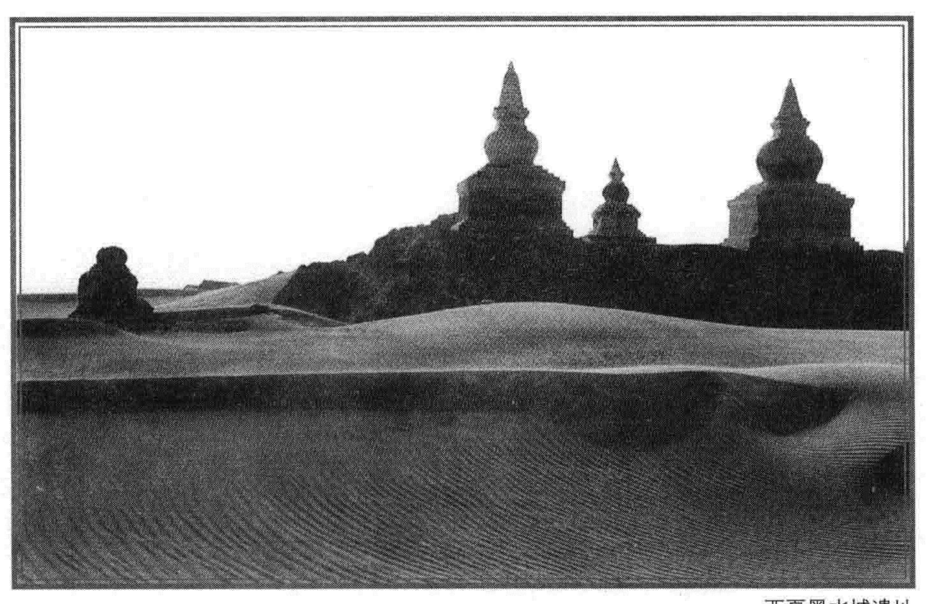
② 如以西夏首都兴州为中心，兴州北面的监军司见于史籍者仅二，一是黑水镇燕军，一是啰娥州监军司，黑水监军司在上述十七监军司中有名，那“北院”监军司即当为啰娥州监军司。

③ 史金波等译：《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第250页。陈炳应译“大通军”为“鞑靼军”，见《贞观玉镜将研究》，第15页。

④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

下 编

遗民编



西夏黑水城遗址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

元代碑刻，传世甚少，而像《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以下称《肃州碑》）这种阳面汉文、阴面回鹘文的传世碑刻，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注意到了这通元碑的重要性，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对《肃州碑》的研究并没有展开。直至1976年，白滨、史金波二位先生于甘肃省酒泉市文化馆访得此碑后，探颐索隐，勤研细读，于1979年将该碑全文公之于世，并由耿世民先生将碑阴回鹘文译成汉文，附录于后，[①] 筚路蓝缕，功莫大焉。余出于对《肃州碑》的兴趣，翻检文献，在白、史二位先生考释的基础上，作一些补充，文中或有歧异之处，即为余争鸣之言。

一、《肃州碑》碑主之族属

《肃州碑》碑主为谁，碑文交代十分清楚，上起举立沙，下至赤斤贴木儿，一共六代，立碑人为第五代之善居，这是元代河西肃州一阀阅之家，为元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但是，关于举立沙一家之族属，却是碑文记载含糊之处。碑文云：

> 太祖皇帝，御驾西征，天戈一挥，五郡之民，披云睹日，靡不臣服。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一方士民咸□□化，举立沙瞻圣神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

---

*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① 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之碑〉考释》，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下引白、史之文，均见此处。

白、史二人认为，“唐兀氏”即党项，举立沙即党项族人。余不敢苟同。唐兀即党项，如仅从字面意义上解释，是没有错误的。但元代对唐兀有专门的解释，唐兀即西夏，其内涵应远大于党项。元人关于“唐兀氏”的解释很明确。元吴海《王氏家谱叙》云：“河西，古诸羌，宋李元昊据之，为边患，宝元、康定相继用兵，士有陷没者，逮中原为金并，不能自还，杂为夏人。元初得天下，赐姓唐兀氏。”[①] 柯劭忞《新元史·氏族表》亦云：“唐兀氏，故西夏国。太祖平其地，称其部众曰唐兀氏。”[②] 很清楚，在元人及后人的眼中，“唐兀氏”并不是指党项而是指西夏国。故陈垣先生也说：“五代而后，河西陷西夏者二百年，诸羌杂处，元人谓之唐兀氏。”[③] 唐兀氏，乃元人对杂处河西诸民族的总称谓。众所周知，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政权，有党项、吐蕃、回鹘、鞑靼以及其他民族。虽然党项族是该国的主体民族，但西夏绝不等于党项，《辽史》将西夏、党项区分甚明。《辽史·百官志》载：“辽境……西制西夏、党项、吐蕃、回鹘等强国以百数”。[④] 还分别立“党项国大王府”和“西夏国大王府”条。可见党项、西夏不能画等号；元人称西夏为唐兀，故党项、唐兀亦不能画等号。因为在“唐兀氏”中不仅有党项人，还有其他的民族成分。如前引《王氏家谱叙》云：“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齐人，没元昊者，其宗族在东阿、阳谷甚盛。国初附属，时以其高祖即复归山东，殁，从其族葬阳谷。曾祖从右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将军，领兵千户，镇庐州。迄今又三世，坟墓皆在庐州，辽军袭职，冠旧氏名上”。[⑤] 另据《续修庐州府志》卷35载：“王翰，字用。其先灵武人，陷于元昊。元初下江淮，授用兵千户，赐姓唐兀氏”。[⑥] 可见，这位汉人王氏在元代亦被称为“唐兀氏”。许有壬《张雄飞诗集序》中称张雄飞也为“唐兀氏”，[⑦] 党项姓中无“张姓”，这个称“唐兀氏”的张雄飞恐怕也是陷于西夏的汉人，元人因其出于西夏，故称为“唐兀氏”。这个其先灵武人的“王翰”，即山东东阿之王

---

① （元）吴海：《闻过斋集》卷1《王氏家谱叙》。

②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28《氏族表》。

③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2《儒学篇》。

④ （元）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2。

⑤ （元）吴海:《闻过斋集》卷1《王氏家谱叙》。（明）王称《虚舟集》卷5《自述诔》亦称王氏为“东阿人”。

⑥ （清）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35《忠义传》。

⑦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3《张雄飞诗集序》。

翰。所以，余以为，正如宋称西夏为河西一样，[①]元人称西夏人为唐兀，唐兀实际上是指西夏人，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并非一个具体民族称谓。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有“唐兀”二字，就把“唐兀氏举立沙”看作党项人，如果仔细翻检文献，就可以找到许多证明。

《元史·昔里钤部传》记载了成吉思汗取肃州之事。据白、史二人的考证，《元史》中的“昔里钤部”同《肃州碑》中的“举立沙可能是同一家族的同辈兄弟”。这一见解极是，不仅是“同辈兄弟”，而且是骨肉同胞。此言何来？《元史·昔里钤部传》载：“（帝）进兵围肃州，守者乃钤部之兄”。[②]成吉思汗围肃州之事仅一次，据《肃州碑》记载，这一次的肃州守将为举立沙，举立沙应为昔里钤部之兄。又据程钜夫《魏国公先世述》载：

> 太祖圣武皇帝西征，围肃州，州将昔李都水，公伯氏也，欲以城内附，为众所害，牋及其家。城既破，上命屠之，惟都水亲戚奴婢等一百六户不杀，及命都水子孙世袭其州达鲁花赤。[③]

另据《肃州碑》载：“太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悼其战死之不幸，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以旌其父子之功”。两处所载，言词微异。一处称“命都水子孙世袭其州（肃州）达鲁花赤”；一处称“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可见，记载的是同一件事，那么，昔李都水就应是举立沙，举立沙当为昔李都水之别名。而昔李都水又是魏国公的“伯氏”，那魏国公又是谁呢？又据《魏国公先世述》载：

> 昔李钤部是为贞献公，薨，年六十二，官给驿传归葬肃州先墓，追封魏国公，赐谥贞献。[④]

昔里都水为昔里钤部之兄，钤部死后，国家派车要将钤部归葬肃州。可

①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9称“河西首领赵元昊”。（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9元符二年四月癸巳条：“河西小国，蕞尔疆土”。（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亦称西夏为“河西”。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

③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④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见，他们为“同一家族内的同辈兄弟”确属无疑。何以知为同胞骨肉呢？《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载：

> 钤部李公其人也。公益立山，昆弟四人，独公少负气节，通儒释，洞晓音律，以荫傔直宫省，职劳调沙州钤部。逢国朝运开乾维时，公兄由肃州大长奉使于我，太祖圣武皇帝异其材辩，在与馆接使察罕深相结纳情好，既密约输款内附。天兵围肃，以射书事竟遇害。[①]

前面已证，昔李都水为举立沙，这里又称昔里钤部为“益立山”，昆仲之间，名姓相谐，且《李公神道碑》[②]又称“昆弟四人”，另外二人虽不可得，但举立沙与益立山同出一胞确属无疑。

既然证明了举立沙与益立山为同胞兄弟，那么，要找出举立沙的族属就不是很难的事了。关于举立沙，《元史》无传，其他文献也无记载；但关于益立山，在前引《李公神道碑》中却清楚地指出他的族属，“公讳益立山，其先系沙陀部长”。《新元史·昔里钤部传》亦云：“昔里钤部，河西人，其先本沙陀部长”[③]。同书《氏族表》还载：“昔里氏，唐兀世族，本沙陀族”。[④]由此可见，元人心目中的唐兀氏，并非全是党项人，除党项以外，还有其他民族：唐兀昔里氏，就不是党项，而是沙陀，《肃州碑》中的“唐兀氏举立沙”就是沙陀贵族的后代。不仅从文献上可以证明“唐兀氏举立沙”不是党项，而是沙陀，就是从《肃州碑》碑阴面使用回鹘文字这一点上，也可以得到旁证。如果举立沙是党项人的话，那么，党项人在撰述自己祖先的世系和业绩时，绝不会不使用元代还十分盛行的西夏文[⑤]，而采用完全是另一民族另一语系的回鹘文。沙陀族恰恰相反，沙陀属于西突厥处月种，与回鹘同属于突厥语。在突厥汗国强盛时，不仅突厥人使用突厥文，而且回鹘人也使用突

---

①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② 本文将王恽撰神道碑简称为《李公神道碑》，将姚燧撰神道碑简称为《忠节李公神道碑》，以示区别。

③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131《昔里钤部传》。

④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28《氏族表》。

⑤ 元成宗大德年间宣化、杭州等都雕印过西夏文佛经，并施送到西北各地寺院；元代从成宗到仁宗时，共印西夏文佛经5次，共190藏，60余万卷，反映西夏文在元代盛行。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9章《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佛教活动》，第207页。

厥文；[①]当回鹘汗国强大以后，新回鹘文又取代了突厥文的地位，8世纪，不仅回鹘人使用回鹘文，而且突厥人也使用回鹘文，如突厥跋悉蜜人、突骑施人。[②]可见，突厥语种的各民族之间，不论是突厥文或回鹘文，都是可以互通的。更何况回鹘强盛后，沙陀、回鹘之间互相参错，关系密切，沙陀酋长自称，“沙陀本回鹘部人”。[③]以致宋人孙光宪也称：“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④]所以，留居在肃州地区的沙陀后代在撰述自己祖先的世系和业绩时，就正使用的是回鹘文，而不是西夏文。因此，余以为《肃州碑》碑阴面使用回鹘文正是证明碑主不是党项族，而是沙陀族的一个有力旁证。

二、举立沙一族之姓氏

《肃州碑》所载举立沙一族，只传世袭，而未说明其姓氏。白、史二位认为：“《元史》所载唐兀人昔里钤部之‘昔里’，可能同《肃州碑》之唐兀氏举立沙之‘举立’为党项族同一姓氏。昔里、举立音相近，可能为一音之转”。这个比较谨慎的推断看来是错误的。昔里、举立发音固然相近，但绝非一音之转。前引《魏国公先世述》和《新元史·氏族表》，昔里钤部和昔李都水（即益立山和举立沙），还有《正德大名府志》卷10《古迹志》中的“昔李野速普花”和“昔李勃”，都为“昔里（李）氏”。[⑤]“昔李”为何意？小李也。《中堂纪事》载：“又黜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鲁，河西人，小李钤部之子”。[⑥]小李钤部即昔里钤部。《元史·昔里钤部传》载：“（昔里钤部）卒于家，年六十九，子爱鲁”。[⑦]可见，“昔里”乃“小李”之音转。《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载，昔李勃之先祖有“小李玉黑”、“小李玉”等，“昔里”原作“小李”。为什么会称“小李”呢？这就有必要追述一下肃州地区这支沙陀族的来源。《新唐书·沙陀传》云：“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

---

① 如回鹘可汗的《磨延啜第二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维列依碑》均用突厥文撰。
②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
③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卷19《唐纪》11。
④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7《朱邪先代》。
⑤ （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卷10《古迹志》。
⑥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中堂纪事》。
⑦ （明）宋濂：《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

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①]可见，沙陀原居北庭地区的蒲类海一带，后吐蕃势力进入北庭，“徙其（沙陀）部甘州”。[②]这是沙陀人进入河西地区的最早记载。后来，虽然沙陀酋长朱邪执宜率众归唐，将沙陀部落迁到阴山一带，但可以想见，当时留居河西没有东迁的沙陀族人应该是有的。高居诲的记载就可以证明：“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氏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③]可见，在唐宋五代时期，甘州一带居住着沙陀族人。到唐懿宗时，朱邪执宜的儿子因功被唐王朝“赐氏李，名国昌”，[④]并封为振武军节度使。元代肃州地区沙陀“昔李氏（原作‘小李’）”之“李”姓，就是从这里得来。前引《李公神道碑》称：“其先系沙陀贵种”。[⑤]既为“沙陀贵种”，又为“李”姓，很可能即为李国昌之后。唐僖宗乾符以后，吐谷浑赫连铎对李国昌进行了一次偷袭，李国昌大败，只剩“五百骑还云州”。[⑥]可见，当时有很多沙陀人被打散。故《李公神道碑》称：

> 唐亡，（昔李氏）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避地遁五台山谷，后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湖（当为河之讹）西人。显祖府君历夏国中（书）省官兼判枢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级爵受肃州钤部，其后因以官为号，丧乱谱亡，遂逸名讳。[⑦]

可以看出，在唐朝末年，有一部分沙陀人被打散而流落在陕陇间，那支“沙陀贵种”却迁到了肃州地区。为什么要往河西地区迁？一是由于在河西地区还居住着一批沙陀人；二是由于当时河西地区的统治者是回鹘族，与他们有着十分密切的近缘关系，[⑧]所以他们“遂为河西人”。西夏占领河西以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3引《高居诲使于阗记》。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⑤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⑦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⑧ 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71《石雄传》、卷217《回鹘传》、卷218《沙陀传》；（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5《请更发兵山外邀截回鹘状》。其中都有回鹘与沙陀互相参错和回鹘归入沙陀之记载。

后，这支“李氏”沙陀投降了西夏，并世代为西夏高官。姚燧《忠节李公神道碑》载：“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称”。[①]“康懿”是昔李钤部父亲答加沙的谥号，前引《魏国公先世述》载：“答加沙……今赠效翊忠运保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柱国，追封魏国公，赐谥康懿”。[②]答加沙以上七代为夏国相，举立沙为答加沙之子，怪不得《肃州碑》称“举立沙”为“肃州阀阅之家”。“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称”是什么意思呢？西夏王姓李，肃州沙陀也姓李，故“同其王李姓”。西夏李姓，乃唐拓跋思恭时唐王朝的赐姓；沙陀李姓，是唐朱邪赤心时唐王朝的赐姓。统治河西之后，西夏李氏为统治民族，沙陀李氏为其臣属，所以，西夏李氏当为大李，而沙陀李氏则为小李，故“以小大称”。其实，并非姓“小李”，而是对西夏王室的一种屈称。姚燧《忠节李公神道碑》是为昔李钤部的儿子阿噜（即爱鲁）作，王恽《李公神道碑》是为昔李钤部本人作，二人均称“李公”。所以，《新元史·昔里钤部传》云：“昔里钤部，河西人。……其先本沙陀部长，从唐赐姓为李氏，以别于西夏国姓，为小李，后讹为昔里”。[③]可见，昔里氏之来源乃“小李”之讹，“小李”又源于沙陀李姓。故《肃州碑》碑主举立沙一家亦应为李姓。

三、举立沙献城和战死事迹辨析

《肃州碑》关于成吉思汗征西夏取肃州之事是这样记载的：“举立沙瞻圣神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据碑，则肃州之得，乃和平解决，举立沙投诚。但是，据史，则恰恰相反。先罗列材料，再进行辨析。《元史·太祖纪》：“（太祖二十一年）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④]这里看不出是和平解决，还是暴力解决。曾廉《元书》记同条事却为：“（太祖二十一年）夏，避暑浑垂山。师克甘、肃等州”。[⑤]《元史·察罕

---

① （元）姚燧：《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
②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③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131《昔里钤部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太祖纪》。
⑤ （清）曾廉：《元书》卷1《太祖纪》。

传》："（察罕）又从攻西夏，破肃州，师次甘州"。[1]《元史·地理志》："元太祖二十一年，西征，攻肃州下之"。[2]后面三条材料，一"克"，一"破"，一"下"，都表示元取肃州并非和平解决，而是暴力夺取。在这《元史·昔里钤部传》中有更清楚的叙述：

> 进兵围肃州，守者乃钤部之兄，城破害及其家，先以为请。帝怒城久不下，有旨尽屠之。惟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3]

上文明示，蒙古军队围肃州，肃州非但没有献城，而且"城久不下"，以致成吉思汗下旨屠城，仅留一百零六户。这次屠杀在地方文献中也有记载。清光绪二十三年《肃州新志稿》载：

> 乱骨堆，在城东南十五里，相传蒙古铁木真以兵取肃州，钉戮其众，积尸原野，掘坑埋之。后凡无主骼骸，悉瘗于此。[4]

可见，献城是假，屠城是真。既然举立沙没有献城，那为什么他们一家被封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事情是这样的，据前引《李公神道碑》载：

> 公兄由肃州长奉使于我，大祖圣武皇帝异其材辨，因与馆接使察罕深相结纳情好，既密约输款内附，天兵围肃，以射书事竟遇害。[5]

原来是准备归附，没有成功而遇害。所以，"太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及命都水子孙世袭其州达鲁花赤"。[6]

---

① （明）宋濂：《元史》卷 120《察罕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 60《地理志》。
③ （明）宋濂：《元史》卷 122《昔里钤部传》。
④ 清光绪二十三年《肃州新志稿》，甘肃省图书馆藏抄本。
⑤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 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⑥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 25《魏国公先世述》。

据上所述，举立沙虽有输诚内附之意，但由于城中守将的反对，举立沙被害，献城也未成功，其结果是肃州惨遭屠城之祸，城中除“昔里氏”一家亲戚奴婢一百零六户保全外，“皆歼之，不遗龋稚”。[①]明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什么在《肃州碑》中却变成“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的和平景象呢？淡淡一笔，将事实真相全部抹掉，这正是立碑人善于巧妙安排之处，其目的有二：

（一）从立碑的时间看，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下距元朝的灭亡仅差七年，这个时期，正是元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最后时刻。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全国性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已经爆发，而且波及到了甘肃、宁夏地区。作为“肃州阀阅之家”的沙陀昔里氏，由于世承皇元之恩典，对元王朝当然是感恩戴德的。为了维护元王朝的统治，所以，立碑人主要是歌颂元朝的恩德和他们一家在肃州统治的功绩，而不敢披露成吉思汗时对肃州的那次大屠杀。如果披露，那种令人发指的屠杀活动是否会引起当时十分敏感的民族矛盾在肃州地区爆发呢？这正是立碑人所担心和害怕的。

（二）将“城既破，上命屠之”[②]改成为“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不仅可以掩饰成吉思汗对当时河西人民的暴行，而且又表彰了其先祖顺乎天理、倾葵向日的献城义举，夸大了其家祖对于大元王朝的功劳，又可以成为其子孙世享皇恩的资本，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从“屠城”到“献城”的更变，其隐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肃州碑》还谈到了举立沙之死。碑文云：

> （举立沙）又督义兵，助讨不服，忘身殉国，竟殁锋镝。太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悼其战死之不幸，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以旌其父之功。

“竟殁锋镝”，“战死不幸”，很明显，这又是颂扬粉饰之词，为了夸大其先祖的功绩，继续掩盖事实的真相。关于举立沙之死，各种文献记载是很清楚的。《魏国公先世述》：“围肃州，州将昔李都水，公伯氏也，欲以城内附，

① （元）姚燧：《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

②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15《魏国公先世述》。

为众除害，戕及全家”。[①]《李公神道碑》:“即密约输款内附，天兵围肃，以射书事竟遇害。”[②]《忠节李公神道碑》:“遣兵围肃州，守者其伯氏。钤部谋以城下，不克，害及其家”。[③]可见，举立沙还没有来得及投诚，就被城中守将杀害，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又督义兵，助讨不服，忘身殉国，竟歾锋镝”之壮举，这仍然是立碑人粉饰其先祖的褒颂之辞，绝无据可凭。《秋涧先生大全集》的作者王恽、《牧庵集》的作者姚燧、《雪楼集》的作者程钜夫都是与举立沙同时或稍后之人，他们三人都是有元一代声望甚高的儒学名臣，特别是牧庵先生，更为一代宗工，当时子孙“欲叙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传信，不得者每以为耻”。[④]因此，由他们三人所撰碑志之史实远比举立沙五代孙善居所述之史实要可靠得多，献城和战死之事应属子虚，不可信。

四、阿沙甘布事迹辑补

《肃州碑》阳面汉文载，举立沙之子为阿沙；而阴面回鹘文则为“阿沙甘布”，这是怎么回事？甘布者，甘卜者，钤部之音转。《元史·昔里钤部》载：“钤部亦云甘卜，音相近而互用也”。[⑤]钤部为何意？《魏国公先世述》:“钤部者，河西之军职也”。[⑥]又《李公神道碑》:“皇考府君用级爵受肃州钤部，其后因以官为号”。[⑦]可知，钤部原是西夏一军职官号，后沙陀李氏竟以这个官号为名。则回鹘文“阿沙甘布”乃沿袭祖宗之习惯而称“甘布”，其实即指“阿沙”。

关于阿沙的事迹，白、史二位在《元史》中找到了一些零星记载。如：抚治甘肃，赈赡河西贫民，签发河西军，统唐兀卫等，大大地丰富了碑文中的阿沙活动史实。余在此基础上想补充的就是，《新元史》中的“阿沙敢卜”就是《肃州碑》汉文中的“阿沙”，回鹘文中的“阿沙甘布”。首先从余对《肃州碑》记载的怀疑谈起。

---

①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②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③ （元）姚燧：《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

④ 分别见《元史·王恽传》、《元史·姚燧传》、《元史·程钜夫传》。

⑤ （明）宋濂：《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

⑥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⑦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肃州碑》记载，举立沙死后，成吉思汗立即“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达鲁花赤”。查《元史·地理志》肃州称“路”乃元世祖至元七年之事，[①]故太祖时不应有“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之职，这是破绽之一。从《肃州碑》所记来看，好像阿沙亦同其父举立沙一起归顺太祖，故举立沙一死，阿沙即为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查《魏国公先世述》、《忠节李公神道碑》和《新元史·昔里钤部传》均言全家被害，仅留“亲戚奴婢等一百六户不杀”。那这个举立沙子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破绽之二。总之，《肃州碑》关于阿沙的记载，余以为仍然是前面粉饰之辞的继续，是不可信的。事情真相应该是这样。《新元史·太祖纪》载：

> （太祖二十年六月）帝亲征西夏初，西夏主伪降，请纳质子，且言愿助兵西讨，及征兵于西夏，其大将阿沙敢卜对使者曰：俟大国兵败，吾师方出。帝怒，西夏主乃阴结漠北诸部酋拒守之计。[②]

同书同卷又载：“（二十一年）三月，自将诸军拔西夏黑水等城，败其将阿沙敢卜于贺兰山，获之。夏，避暑于浑垂山。……克西夏甘、肃等州”。[③]这位“阿沙敢卜”，余以为就是《肃州碑》中的“阿沙”或“阿沙甘布”。“敢卜”者，甘卜也，即钤部的音转，为西夏军官的称号。阿沙世家肃州，他怎么会到西夏主身边为将呢？这是不奇怪的。《魏国公先世述》载：“家世河西，高曾以上仕于国中（指西夏），位丞弼者七世。曾大父答加沙为其国必吉。必吉者，犹宰相也”。[④]《李公神道碑》载：“显祖府君历夏国中书省官兼判枢密院事”。[⑤]《忠节李公神道碑》载：“康懿之先，七世相夏”。[⑥]可见西夏对于“小李”一家是很器重的，不仅沙州、肃州一带地方由其家族治理，而且中央政府的最重要机构中书省、枢密院等官也由其家族人充任，而阿沙敢卜，西夏必吉（宰相）答加沙之孙，调西夏国主身旁为大将是完全可

---

① （明）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
②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3《太祖纪》。
③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3《太祖纪》。
④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⑤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
⑥ （元）姚燧：《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

能的。太祖二十一年，由于贺兰山一仗失败，阿沙敢卜被擒，很可能他投降了成吉思汗，这就是为什么举立沙一系还能留下一棵独苗的唯一可能。由于阿沙敢卜的投降，再加上其叔父昔里钤部的归顺，于是，肃州守将举立沙也“欲以城内附”。但是，由于事情暴露，举立沙以及在肃州城内的全家都被杀害，而阿沙敢卜成了举立沙留下的唯一后代，故《肃州碑》中所反映的举立沙所传世系，也仅阿沙一子。如果举立沙还有其他的儿子，在《肃州碑》中一定会反映出来。所以，成吉思汗破肃州城后，即“命都水子孙世袭其州达鲁花赤”，子即阿沙敢卜。

《元史》里面还有两条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旁证。《元史·兵志》载：

唐兀卫：至元十八年（1281），阿沙、阿束言：今年春，奉命总领河西军三千人，但其所带虎符金版者甚众，征伐之重，若无官署，何以防闲之。枢密院以闻，遂立唐兀卫亲军都指挥司以总之。①

第二条材料是《元史·世祖纪》载：

（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乙巳，以米二万石、羊万口给阿沙所统唐兀军。②

可见，河西军、唐兀卫都是由阿沙统领，所谓河西军、唐兀卫就是由西夏人组成的军队。为什么将这样一个重任委于举立沙的儿子阿沙呢？余以为，这与阿沙敢卜担任过西夏主身边统军大将有关，由这位原先就是西夏统军大将的阿沙敢卜来统领由西夏人组成的河西军、唐兀卫，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

五、沙陀昔李氏所传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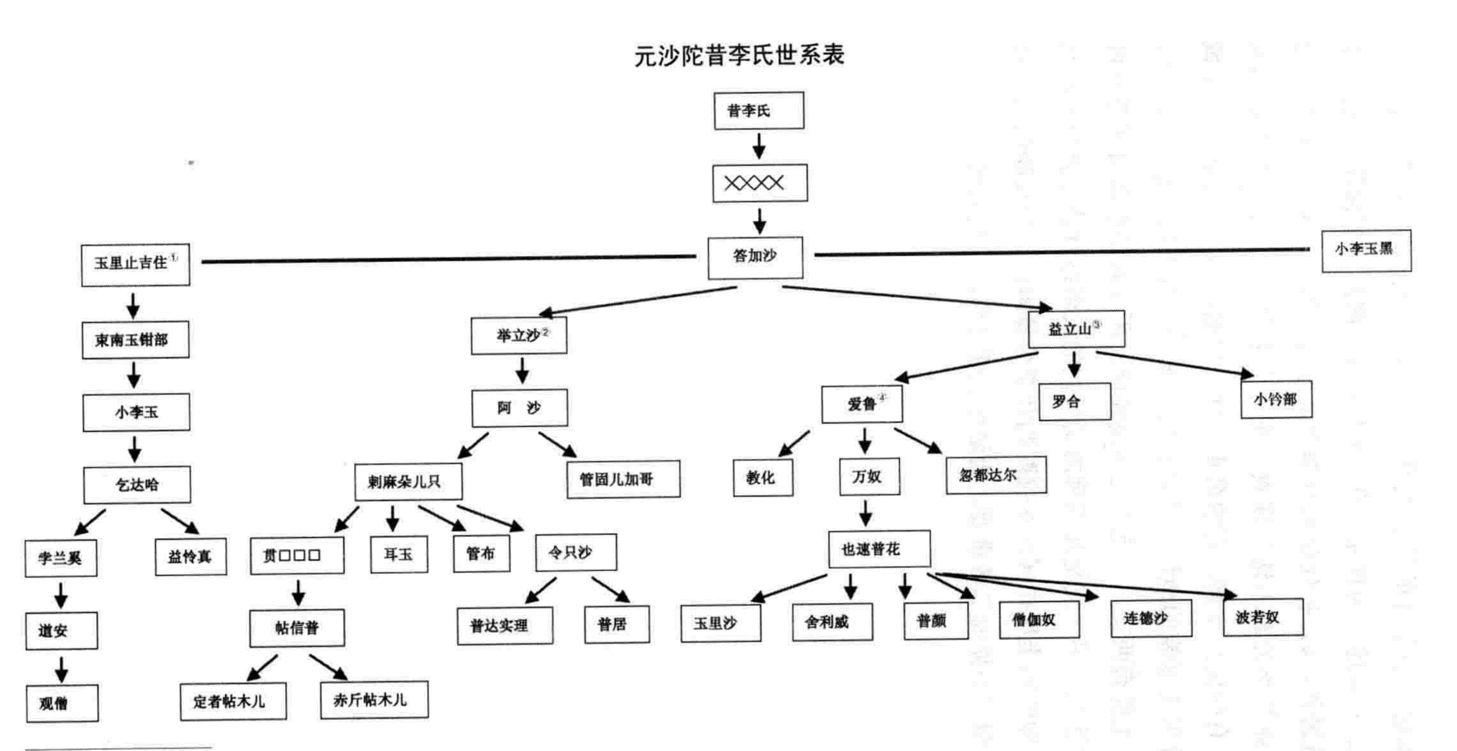
沙陀昔李氏一族，在唐代可能为李国昌之后，称“沙陀贵种”；在西夏“位丞弼者七世”，称“肃州阀阅之家”；在元代，这一家族仍为赫然一大家，

---

① （明）宋濂：《元史》卷99《兵志》2。
② （明）宋濂：《元史》卷14《世祖纪》11。

仅从现存他们家的五个墓碑的作者来看，就可以反映出昔里氏在元朝的社会地位。《魏国公先世述》为程钜夫作，《李公神道碑》为王恽作，《忠节李公神道碑》为姚燧作，《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为欧阳圭作，还有一通《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现收《正德大名府志》，作者佚名。四人皆为元代名臣，有的位至宰弼，有的名重儒林，居然都为“昔李氏”一家撰文，足以反映昔里氏家族的地位。从现存材料来看，昔李氏一家入元以后，分为三支相传，主要有两支，一支即是《肃州碑》所反映的世袭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的举立沙系。另一支是几通碑志所反映的大名路世袭达鲁花赤的益立山系。第三支即欧阳圭所作《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所反映的勃兰奚系。从地位来看似乎不如前二者重要。为避免叙述之麻烦，列表附后。

元沙陀昔李氏世系表



① 答加沙兄弟三人及玉里止吉住系见（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

② 举立沙系见《肃州碑》及白、史二人所列世系表。

③ 益立山系见《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路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

④ 爱鲁三子，三处记载互异。（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李公神道碑》作:“长教化、次也先帖木儿、次小钤部”;（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路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作：“长教化、次万奴、次忽都答儿”;（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28《世族表》作：“长教化、次也先帖木儿、次骨都歹”，又列万奴称“昔里钤部孙”，不知孰是，待考。

附原碑文：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第2行）将士郎云南嵩明州判官段天祥撰。（第3行）圆通慈济禅师肃州在城洪福寺住持定慧明书丹并篆额。（第4行）□（盛），而三山五岳之气分；太明升，而四海六合之照；圣作而九夷蛮之人服。此天理之必然，人物之功用也。惟我（第5行）皇元肇基朔漠，乘龙御极，志靖万邦。（第6行）太祖皇帝，御驾西征，天戈一挥，五郡之民，披云睹日，靡不臣服。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一方士民□（咸）化，举立沙瞻（第7行）圣（祖）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又督义兵助讨不服，忘身殉国，竟殁锋镝。（第8行）大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悼其战死之不幸，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以旌其父之功。（第9行）宪宗皇赐以虎符。（第10行）世祖皇帝愈加宠赍，升昭武大将军，迁甘肃等处宣慰使。阿沙二男，长曰剌麻朵儿只，次日管固儿加哥。剌麻朵儿只先授奉训大夫，甘州路治中，又升奉义（第11行）大夫，肃州路达鲁花赤，莅政一考，思义让之心，逊其职与弟管固儿加哥，事四载，复将前职于其兄，受奉政大夫，依旧袭职。剌麻朵儿（第12行）只四子：长曰贯□□□，次曰耳玉，又次曰管布，季曰令只沙。□□□□□□□□□□□之职，授宣武将军，治郡三载，又慕其祖祢忠义之绩，思同（民）（第13行）之和，以其职让与弟令只沙，受宣武将军。令只沙公平正大，名□（第14行）朝廷，又升怀远大将军，甫视事间，又让其职与兄之子帖信普。不期年，□□□□□□□□□□□□字命议，令只沙在职，莅政无私，最有声绩，备咨于（第15行）朝，复膺前职，受亚中大夫。在任四载，以其长男普达实理尚在髫龄，让其职与帖信普之子定者帖木儿。定者帖木儿又逊与其叔父普达实理。普达实理（第16行）又让与帖信普之次子赤斤帖木儿，受宣武将军，见居其职。其□□□□□□□□□思□孝，非英雄豪杰之士，有大人君子之量，能如是哉！又令只（第17行）沙之次子普居，因其伯父管布无子，以普居为嗣，其人才德出众，德……（第18行）主上（待）以近侍，授宣武将军，仕武备寺同判。后除甘州郎中，授中宪大夫，翊赞□□□□□□，迁永昌路达鲁花赤，牧民以仁惠之道，守己以

正直之心，公事（第19行）细微必察，私意纤毫不行，民怀其德，吏服其廉，解组而归，以酬孝道。□□□祖□□□其先祖之功，命工刻石，以记其事。子（自）蜀□□□（旅住）甘泉，一（第20行）日□□（得）不复已，不揆陋鄙，奉之铭曰：（第21行）……（第22行）太祖，驾御六龙，亲讨西夏，圣武威雄。因公献□，□风□□。□以世袭，用酬其功。子孙相继，奕叶兴隆。让□（以）□，（第23行）□□以中，黔黎怀惠，政令乐从。齐家克孝，为国尽忠。子孙善居，念其祖宗。刻铭示后，体哉无穷。（第24行）至正二十一年岁次辛丑……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

西夏亡国以后，历史给经过一场残酷战争洗劫的西夏遗民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作为被征服者的西夏人，他们在蒙古王朝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一课题在国内元史学界似乎还未曾有专文涉及，国外学者如克恰诺夫、佐口透、札奇斯钦诸人虽对这一课题有所探研，但他们在有关这一方面资料的搜求及问题探讨的深度上略嫌不足，[①] 余欲就加深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些努力。

本文拟将元代西夏人政治势力的发展、政治地位的变化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

一、蒙古国时期的西夏人

蒙古国时期，即指元朝建立前铁木真（太祖）、窝阔台（太宗）、贵由（定宗）、蒙哥（宪宗）四位蒙古大汗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各位蒙古大汗对亡国的西夏遗民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在前四汗时期，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是不高的，如与同一时期的回回、畏吾儿、吐蕃诸族相比，其地位更是相形见绌，即使与处于同样亡国性质的金人相比，金之遗民这一时期在蒙古宫廷中的地位也远较西夏人高，历史将幸存的西夏人抛进了当时社会的最底层。

蒙古灭亡西夏的时间是公元1227年，但是，如从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的

---

* 原文发表于陈乐素、常绍温主编：《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① （俄）克恰诺夫：《成吉思汗入侵后有关西夏历史命运的几种见解》，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期，1965年；（日）佐口透：《蒙古帝国时期的唐古特》，载《日学杂志》昭和25年（1950）第12期；札奇斯钦：《元史中的唐古——唐兀惕》，载《中国边政》1963年第3期。

时间——公元1205年算起，蒙古灭西夏全过程的时间共花去二十余年。而且，在蒙古灭西夏的全过程中，西夏人的抵抗是极为罕见的顽强，在沙州、乌纳城、灵州、中兴府等战役中，骄慢的蒙古军队遭到了西夏军民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而且每一次战役都使蒙古军队出现可怕的伤亡。[①]可以说，蒙古人在西夏境内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极为惨重的。

对于几乎可称之为战无不胜的蒙古军来说，西夏人的顽抗足以使其恼羞成怒，特别是西夏人所采用的时降时叛的诡谲外交手腕，[②]更使那些骄慢的蒙古首领们怒不可遏，因此而招致了蒙古统治者对西夏人的强烈仇恨。《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将西夏）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③]咬牙切齿的誓言，可以说明这位蒙古大汗对西夏仇恨之炽烈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仇恨之火化成"复仇之剑"，"天兵破灭夏以西，有旨：戈矛所向，耆髫无遗"，[④]甚至"全定河西一国，不留一童男"[⑤]。破银州，斩夏人；破黑水城，杀蕃部数万；[⑥]破肃州，屠城，免死者仅一百零六户；[⑦]驻盐州川，搜杀遗民，"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⑧]就在成吉思汗临死前，夏末主李睍及中兴府全体居民主动出降，成吉思汗还遗诏密令将夏主及中兴府居民全部杀死，[⑨]以泄旧日之积恨。今日银川城西西夏皇陵被炮火焚毁而留

①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编《成吉思汗纪》；（元）姚燧：《牧庵集》卷3《李公家庙碑》；（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李公神道碑铭》；（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嘉定十七年五月条及宝庆三年三月条等。

② （明）宋濂：《元史》卷119《木华黎传》称，木华黎引兵由东胜州渡河，而西夏河西诸堡悉降，遵顼惧，遣监府塔海宴之，河南使塔哥甘普等以兵五万属焉。（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嘉定十七年二月，西夏结漠北诸部以拒蒙古，十一月，遣使蒙古请降。

③ 道润梯步译：《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续集卷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④ （元）柳贯：《柳待制文集》卷10《师氏先墓碑》。

⑤ （元）元明善：《清河集》卷3《丞相东平忠宪王碑》。

⑥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宝庆二年二月条。

⑦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

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宝庆二年十二月条。

⑨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编《成吉思汗纪》称："（唐兀惕国王）及唐兀惕京城全部居民遭屠杀"。道润梯步译：《蒙古秘史》续集卷2称："自唐兀惕百姓之父母直至其子孙之子孙，尽殄无遗矣"。（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6《王德真神道碑》："太祖征西夏，……怒其负固不服，欲屠其城。群臣莫敢言，公谏曰：'犯顺效逆者，既已就戮，民各为其主，百万之罪，宜话陛下，同仁一视，子怜万国，非敌百姓也，幸宽灭诛。'太祖悦悟，遂赦之。"《元史·察罕传》也称："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罕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全部杀死西夏中兴府居民，似不可信，以上引文语意度之，可能是在大屠杀发生后，经察罕、王德真等力谏，得以制止，故称"安集遗民"。

下的遍地瓦砾，就是当年蒙古人疯狂报复、血洗中兴府的铁证。

蒙古人对于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态度大概有两种区分标准，一是归附先后，一是抵抗程度。对于自愿归附者，一般来说，蒙古人都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对于战场上的抵抗者，如若是死抗，蒙古人的惩罚和报复是极为凶残可怕的，一旦抵抗即使投降，虽然能得蒙古人某种程度的宽容，但他们绝不会从蒙古统治者那里得到多少恩惠。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生来就会的战阵力学。西夏人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是在接连不断的拼死抵抗中亡国的，这种顽抗曾经使大量的优秀蒙古将士死亡，以致造成蒙古人在相当时期内对西夏人存在一种心理上的敌忾情绪，而这种情绪势必影响他们后来所制定的对西夏遗民的政策，并在征服西夏后的一些善后处理工作中，仍然表现出了蒙古人对西夏遗民的报复心理。

首先，可以从几个被征服民族的领土分封上，看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处置态度。

畏吾儿人最先归附蒙古，因此，蒙古汗廷对待畏吾儿人是很优待的，不仅畏吾儿国主亦都护被成吉思汗认作第五子，并“与诸皇子约，得为兄弟”。[①]更重要的是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领地，并取得相当程度的政治自主权。[②]吐蕃人的归附虽然稍后，但他们使蒙古统治者兵不血刃地得到了整个西藏，因此蒙古人原封不动地将西藏交给了吐蕃人自己管理，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并招为驸马，受命治理吐蕃三区。[③]金与西夏可以视为同样性质的覆亡之国，然而，在金国彻底灭亡前，蒙古统治者还在已经征服的汉地上分封了七个“万户”，这些汉人万户列土分民，世代传袭，成为汉地最为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合一的力量。[④]但是，对西夏领土处置态度就大不相同，首先是将投降了的西夏王李睍诛杀，西夏宗室几无幸免，然后将东西万里的夏地全部瓜分给蒙古宗王，拔都首得沙州，[⑤]察合台次得山丹，[⑥]阔端则封西凉，[⑦]就连失国的高昌王在西夏

①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7《全公神道碑铭》。

② （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译：《西回鹘国史研究》第1章《元初的亦都护们及其都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陈庆英：《元代乌斯藏萨迦政权及其与蒙古皇室的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④ 唐长孺、李涵：《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载《文史》1981年第11辑，中华书局。

⑤ （明）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3。

⑥ （明）宋濂：《元史》卷121《按竺迩传》，山丹后为阿只吉封地，见《元史》卷60《地理志》3。

⑦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故地也获得永昌之地，[①]所谓“河西诸王”将西夏故地分割成了一件百衲衣，[②]但蒙古统治者从未将任何一块土地分封给已经归附了的西夏人。

其次，可以从几个被征服民族上层分子的任用上，看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处置态度。

畏吾儿人在蒙古国时期被起用者最多，而且地位也比较高，像哈剌亦剌哈赤北鲁、塔塔统阿、撒吉思、岳怜帖穆儿在太祖时都在蒙古宫廷供职，且大都为蒙古皇室子弟之师，赵孟頫称畏兀儿“宠异冠于诸国”[③]是不夸大的。回回人在太祖朝就有被重用者，有两个名叫牙老瓦赤的回回人，一是阿吉思·马合木·牙老瓦赤，为蒙古统治河中地区的“大丞相”；一是祃祃·牙老瓦赤，为蒙古治理哥疾宁的长官，[④]到宪宗时，大批的回回人进入了蒙古汗国的上层统治圈，除牙老瓦赤与马思忽惕父子外，进入尚书省任要职的还有赛典赤、匿昝马丁、暗都拉兀尊、阿合马、也的沙等。[⑤]至于金旧臣在蒙古国时期任要职就更多，最著名的就有耶律楚材、粘合重山、石抹明安等，[⑥]这都是蒙古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西夏在亡国前后归降于蒙古的人并不算少，拉施特言，太祖时“出自于唐兀惕部落的异密不少”。[⑦]但他们在蒙古国时期地位都十分卑微。以西夏幸存的两位宗室子弟来看，李桢作为质子控制在蒙古内廷，[⑧]李惟忠则为淄川王封地的一名小达鲁花赤。[⑨]夏国的名门大族在蒙古国时期亦无任要职者，斡扎簀，夏国宰相名臣斡道冲之后，投降后只任命为中兴路副管民官；[⑩]高智耀，屡世为夏国相，在河西号为名族，虽几经人

---

①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5《高昌王世勋碑》。

② （日）佐口透：《河西的蒙古封建王侯》，载《和田博士纪念论丛》，1951年。

③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7《全公神道碑铭》。又参见尚衍斌：《元代畏吾儿研究》第5章，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92—193页。

④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第1部第15章《征服河中简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参阅何高济、陆峻岭:《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⑤ （明）宋濂：《元史》卷3《宪宗纪》。

⑥ （明）宋濂：《元史》卷2《太宗纪》、卷146《耶律楚材传》、卷146《粘合重山传》及卷150《石抹明安传》等。

⑦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编《唐兀惕部落》。

⑧ （明）宋濂：《元史》卷124《李桢传》。

⑨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⑩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儿赤传》。

举荐，但在前四汗时始终未授一职。[①]其余投诚归顺的西夏人或以质子身份入大汗斡耳朵从事各种服役，如：西卑、述速忽里为博儿赤（厨师），[②]朵吉、捌思吉朵儿只为怯里马赤（翻译），[③]僧吉陀为必阇赤（文书），[④]拉吉尔威为宿卫[⑤]等；或成为蒙古军前效力的百户、千户之类的中下级军官，如火夺都为秃鲁花军百户，[⑥]小丑为怯怜口行营工匠百户，[⑦]也蒲甘卜累世为西夏大将，太祖时以甘州降蒙古，太祖将这支河西军隶于蒙古，仅封也蒲甘卜为千户，[⑧]昔里钤部亦为西夏勋阀世胄，镇守沙州，太祖时，率部曲降，仅予以木华里帐下一小军职，直到西征时立有大功才授予千户。[⑨]太祖时，位置最高的西夏人就是阿沙，由于乃父昔里都水因降蒙古而遭杀害，故敕封其子为肃州路达鲁花赤。[⑩]就上述的西夏个人来说，他们与那些畏吾儿、回回、吐蕃、金人一样，都是主动归降蒙古的，然而待遇却有很大的差距，其他各族的上层分子归降后，封王列土者有，位及公卿者有，身居要职者有，独西夏人无一入流品者，稍加比较，就可清楚看出，在蒙古统治下的被征服民族中，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基本上处于当时社会的最底层。

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在元太宗窝阔台时，蒙古统治者对西夏遗民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元史·高智耀传》：

> 夏亡，（智耀）隐贺兰山，太宗访求河西故家子孙之贤者。众以智耀对，召见将用之。[⑪]

窝阔台当时还亲自去贺兰山拜访这位西夏名儒，虞集称“访问之勤”，可以说明窝阔台是想用刘皇叔三顾茅庐的办法请高智耀出山，亦曾想起用西

①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② 《永乐大典》第2册卷2806卑字引《元史·西卑传》；《元史》卷129《来阿八赤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44《星吉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33《暗伯传》。
⑤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⑥ （明）宋濂：《元史》卷133《拜延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罗台传》。
⑧ （明）宋濂：《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⑨ （明）宋濂：《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
⑩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原文录于《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第69页。
⑪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夏人才。然而，高智耀出山后，却始终不见窝阔台授高智耀一职，高自觉无趣，不得不又“归旧隐”。[①]窝阔台对李桢的态度也是一样，皇子阔出伐金时，窝阔台说：“凡军中事，须访桢以行”，[②]可见，窝阔台对李桢的才干是极为赏识的，但是，在李桢数次立功后，窝阔台仅授李桢为“军中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③]的小官。太宗时，昔日钤部从贵由、蒙哥征西域，参加无数次酷烈战役，多次立功。攻阿速蔑怯思城时，围城三月不下，昔李钤部率死士十人，“蹑梯登陴”而破城。被赐名“巴图”，表其战烈，征战六年，后亦仅封“千夫长”。[④]以此数例，可以说明，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虽然从认识上和态度上对西夏遗民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仍然对西夏遗民保留着一种敌忾情绪，至少可以说，他们对曾经拼死抵抗过蒙古人的西夏人还存有相当严重的戒心。

在这一时期中，唯有西夏人察罕破例被蒙古统治者重用。拉施特称，太祖时，察罕曾统辖成吉思汗的主要千户，太宗时，被任命为统率驻扎在乞台边境上的全部军队，并管辖乞台境内的诸王和异密；《元史》本传则称，太宗时授马步军都元帅，宪宗时“以都元帅领尚书省事”。可见地位是非常显赫的，但这个破例完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前提，察罕是成吉思汗进攻西夏前就归顺了蒙古，当时他还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孩子，故被成吉思汗收为养子，称“五儿”，察罕基本上是在蒙古部落中长大，姓蒙古之姓，妻亦为蒙古人，实质上是一个地地道道蒙古化了的西夏人。[⑤]因此，蒙古统治者并没有将察罕视为异类，故得重用。

二、元朝前期的西夏人

这里所指的元朝前期即忽必烈（世祖）及铁穆耳（成宗）统治时期。

---

①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1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4《李桢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4《李桢传》。

④ （元）姚燧：《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

⑤ 以上参见（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编《唐兀惕部落》，第237—238页；及《元史》卷120《察罕传》。余以为《史集》中所记兀察罕（aujgan）那颜与不劣（buren）那颜即《元史》中的察罕一人，拉施特据察罕之事而误分记为两人。

蒙古统治者对西夏遗民的敌忾和戒心一直延续到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忽必烈初期的宰相和大臣的名单中，只有四种民族成分，即大食（回回）、汉（金人）、畏吾儿和基督教徒（大约指汪古、乃蛮中信此教者），其中找不到一位西夏人。[①]但是，可以清楚地感到，在忽必烈即位不久，蒙古统治者在对待西夏遗民的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史·朵儿赤传》载：

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②]

这"试用"一词可以充分说明，在此以前，西夏子弟一直未被蒙古统治者起用。要起用西夏子弟，必须消除对西夏遗民传统的敌忾情绪和戒备心理，这一点在吴海的记录中得以保存：

世祖以其（西夏）人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俾附国籍，次蒙古一等。[③]

可见，忽必烈不仅对西夏遗民公开表示了自己坚定的信任，还给予西夏人以较高的评价。赐姓，俾附国籍，当然是元王朝赐予西夏遗民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有意识地提高西夏遗民的地位。可以列举至元年间的四个诏令：

（一）至元五年（1268）诏："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仍旧"。[④]

（二）至元五年诏："凡投下官必须用蒙古人员"。六年诏："以随路见任并各投下并差达鲁花赤内多女直、契丹、汉人，除回回、畏兀、乃蛮、唐兀同蒙古例许叙用，其余拟合革罢"。[⑤]

（三）至元二十一年（1284）诏："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

---

①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2卷《成吉思汗之子托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第2部分。
②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儿赤传》。
③ （元）吴海：《闻过斋集》卷1《送王潮州序》。
④ （明）宋濂：《元史》卷6《世祖纪》3。
⑤ （明）宋濂：《元史》卷82《选举志》2。

儿等各依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①]

（四）至元十八年（1281）组建唐兀卫："朝廷初分侍卫亲军，列以为卫。唐兀卫之立，遣使籍河西六郡良家子以充之”。并以阿沙为都指挥。[②]

很明显，在忽必烈即位不久，西夏遗民的地位已从民族阶梯的最底层一跃而登上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之中，它获得了与回回、畏吾儿等色目种类同样平等的政治待遇，在元王朝划分的四个民族等级中，西夏遗民的地位超过了汉人（指金人）、南人（指宋人）。

长期被压在民族统治最底层的西夏遗民为什么会奇迹般地获得上帝的福音？是什么缘由致使蒙古统治者对西夏遗民的政策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可归纳的原因大概有下面三点。

第一，出于稳定元王朝在西夏地区统治的需要。

由于蒙古征服者对西夏的抵抗给予的报复太残酷，屠杀的血水给西夏遗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可以想见，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肯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对抗。蒙古灭夏后，蒙古人不仅没有进行较好的安抚善后工作，反而一味加重对西夏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窝阔台时规定，西夏人“种地不纳税者死”，[③]蒙古人将西夏实行领地分封制，西夏遗民既要受分封诸王的奴役和盘剥，又要向蒙古汗国交纳租税，经济上承受着国家与领主们的双重剥削。阔端镇凉川时，“大发民为兵”，曾征调大批的西夏遗民去充当蒙古侵略军的炮灰；特别是北方金地已开始戊戌年的科举选士，大批儒士从奴隶的地位获得解放，但“西北之儒多在俘虏中”，有数千人之多，他们还是受蒙古统治者役使的“驱奴”。[④]更严重的是，忽必烈即位之初，西北地区连续发生了拥护阿里不哥的浑海都、阿蓝答儿、霍忽等人的叛乱，元朝与叛军交锋的主要战场大都在西夏故地，西夏遗民再一次遭受战争的屠戮，“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⑤]整个西夏地区在亡国以后的数十年中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故吴海言："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⑥]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3《世祖纪》10。
② （明）宋濂《元史》卷99《兵志》；（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2《刘完泽神道碑铭》。
③ （明）宋濂：《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④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⑤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
⑥ （元）吴海：《闻过斋集》卷1《送王潮州序》。

河西地区对于元王朝来说，既是在军事上控扼西北诸蒙古宗王的前沿阵地，又是在政治上与中亚诸蒙古汗加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迅速稳定元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统治，乃是忽必烈必须尽快完成的一件大事，而要稳定元朝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就必须改变过去实行的压制西夏遗民的政策，必须起用西夏遗民的后代，以稳定西夏之民心，以西夏人治西夏地也是较好的方策。忽必烈第一个起用的西夏人是朵儿赤，被授予中兴路新民总管，[①]紧接着命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②]同时又升原肃州达鲁花赤阿沙为甘肃等处宣慰使，[③]基本上将管理西夏的大权都交给了西夏人，而实行以夏人治夏。果然收到明显效果，至元二十五年（1288），"宁夏"[④]路的建立，就是西夏得以安宁的标志。吴海称："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后乃服"，[⑤]应即言此。

第二，出于迅速完成统一全国大业的迫切需要。

忽必烈即位不久，西北诸王及李璮的叛乱旋即平定，摆在元王朝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迅速消灭南宋政权，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人才急缺的紧迫感对忽必烈来说已形成一种压力。一是因为战争的不断延长与扩大，作为投入战争本身人员就必须大量增加，特别是战争的对象又是拥有百余万军队的大国。二是因为阿里不哥之乱后，动摇了忽必烈对一部分蒙古贵族的信任；李璮之乱后，又使许多汉人官僚（特别是汉地领有重兵的诸万户）大遭猜忌，像史、张、刘、严等家均被铲削兵权。[⑥]因此，长期不曾起用的西夏遗民受到了特殊重视。再者，西夏民族本身又是一个英勇尚武的民族，他们曾长期同宋金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让他们担任对宋作战的军事指挥官，在忽必烈看来乃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大批的西夏人在忽必烈时期被破格提拔到重要的军事岗位上来。拓跋按扎儿，应是较早归附蒙古的党项人，太祖时即扈从南征，但未重用。世祖平金时，"定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儿赤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③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原文录于《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第69页。

④ （明）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3。

⑤ （元）吴海：《闻过斋集》卷1《送王潮州序》。

⑥ 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1985年第4期。

诸部有功”，为蒙古军前锋总帅，屯平阳以备金。[①]李恒，至元七年（1270）任益都、淄莱新军万户，至元十五年（1278）任蒙古汉军都元帅，成为东线灭宋的主要统帅之一；[②]木花里（察罕子），至元四年（1267）为蒙古军万户，从阿术攻襄樊；[③]塔出，至元七年为山东统军使，至元十三年（1276）升江西都元帅；[④]爱鲁，至元五年（1268）为云南诸道都元帅，平定西南的主要军事统帅之一；[⑤]昂吉儿，至元九年（1272）为信阳军万户，后加淮西都元帅，为平定两淮的统帅之一；[⑥]拜延，至元十二年（1275）为东西两川蒙古汉军万户，为西线攻宋的重要将领。[⑦]忽必烈时期担任过重要军事职务的西夏人还有罗合（万户）、教化（万户）、乞答哈（万户）、[⑧]李世安（万户）、[⑨]李世雄（万户）、[⑩]暗伯（万户）、[⑪]圹乌氏（万户）、[⑫]来阿八赤（益都路元帅）、[⑬]阿荣（山东道副都元帅）、[⑭]阿束（唐兀亲军副都指挥使）。[⑮]这一威武壮观的军事阵容，与蒙古国时期对照，确实有今非昔比之感。

第三，西夏遗民对新王朝的效顺尽忠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

西夏初亡时，西夏遗民的上层分子对残暴的新统治者是不满的，如高智耀之流，他们以隐逸来对抗蒙古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活着的西夏遗民都慢慢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顺应了新主子，原来是投降的，到后来之表现就越忠心耿耿，原来有对抗情绪的，到后来就完全烟消云散，也变成了蒙古统治下的新顺民，高智耀即是典型。在蒙古军队中服役的西夏遗民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在蒙古汗廷中服务的西夏遗民也表现了他们的赤胆忠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22《按扎儿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0《察罕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35《塔出传》。
⑤ （明）宋濂：《元史》卷122《爱鲁传》。
⑥ （明）宋濂：《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133《拜延传》。
⑧ 三人均见《正德大名府志》卷10《李公墓志铭》。
⑨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42《李公墓志铭》。
⑩ （元）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卷4《李公墓志铭》。
⑪ （明）宋濂：《元史》卷133《暗伯传》。
⑫ （元）王沂：《伊滨集》卷21《书圹乌碑后》。
⑬ （明）宋濂：《元史》卷129《来阿八赤传》。
⑭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0《黄头公墓碑》。
⑮ 《永乐大典》第2册卷2806卑字引《元史·西卑传》。

心，从而赢得了蒙古统治者的信任。袁桷言："太祖皇帝经略西土，为武功首，灵夏旧地始臣质委，然犹强节好义，策殊勋，受上赏者史不绝书"。[①]

如果说忽必烈以前，西夏遗民对蒙古统治者的效顺尽忠还只能使蒙古统治者在量上逐渐增加信任感的话，那么，中统年间李璮之乱中，西夏人李恒的表现则促使忽必烈在西夏遗民的认识上出现一种质的转变。《元史·李恒传》载：

> 中统二年（1261），命恒为尚书断事官，恒以让其兄，李璮反涟海，恒从其父弃家人入告变。璮怒，系恒阖门狱中，璮诛，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莱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偿其所失家资。[②]

李璮叛乱，一大批曾受忽必烈信任和重用的汉人、色目人官僚或与李璮勾结，或与李璮保持联系，然而，与蒙古人有亡国灭族之仇的夏神宗嫡曾孙李恒，却不惜身家性命，冒险入京告发李璮的阴谋。相形之下，这一感人肺腑的忠烈之举，足以令这位聪颖睿智的蒙古皇帝"汗颜"。还有党项人拓跋拙赤哥在征李璮战役亦"战死之"。[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恒对元王朝拼死尽忠的精神感化了忽必烈，忽必烈也真正看清了西夏人"刚直守义"的品质，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西夏人的强烈信任感占领了忽必烈的心扉。很自然，起用西夏人的速度开始跃马扬鞭，于是，在忽必烈的周围出现了一批深受信任而且又影响甚大的西夏族文武大臣，如高智耀（翰林学士）、[④]李恒（湖广行省平章）、[⑤]亦力撒合（南台御史中丞）、[⑥]杨琏真伽（江南释教总统）、[⑦]杨暗普（宣政院使）、[⑧]暗伯（知枢密院事）[⑨]等。知枢密院事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首脑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忽必烈将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授予西夏人（据箭内亘博士统

①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2《按扎儿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⑤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⑥ （明）宋濂：《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202《释老传》。
⑧ （明）宋濂：《元史》卷13《世祖纪》10。
⑨ （明）宋濂：《元之》卷133《暗伯传》。

计，终元一代色目人为枢密院长官者仅四人[①]），可以反映忽必烈对西夏人的信任程度之深。

这里还须稍费笔墨谈一下杨琏真伽。杨琏真伽，西夏僧人，法号永福大师，元世祖时，命为江南释教总统，是元前期政界和宗教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也是一个倚权仗势、作恶多端的大坏蛋，然而，他却得到忽必烈极为特殊的宠信。杨琏真伽主管江南佛教时，与权臣桑哥表里为奸，结成死党，权势盛极一时。他霸占田产，攘夺财物，贪污受贿，戕杀平民，干尽了各种不法之事。据《元史·释老传》透露，杨琏真伽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霸占民田二万三千亩，最令人发指的是，竟公开“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②]成为人人切齿的江南一霸。桑哥事发后，其党羽“皆弃市”，独杨琏真伽却“贷之死”，而且“给还其人口、土田”。[③]特别令人奇怪的是，其子杨暗普在杨琏真伽受处分后，竟不受任何牵连，居然还担任了宣政院使这样极为重要的高级职务。[④]不难看出，忽必烈对于这一家西夏遗民有着一种近似于溺爱的特殊好感。之所以如此，除了杨琏真伽在江南成功地实现了忽必烈的宗教政策这一因素外，[⑤]恐怕还与这一时期忽必烈对整个西夏遗民的基本政策有关。

成宗是一个守成的皇帝，西夏勋臣的后代大都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如暗伯、阿乞剌、李世安、教化、立智理威等。可以说，成宗十几年的统治，继续了忽必烈起用西夏遗民的政策。

三、元朝中期的西夏人

元朝中期是元廷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武仁授受、南坡之变、明文篡夺等一系列争夺皇位的丑剧不断在蒙古宫廷爆发，而这一时期西夏人的政治力量的兴衰、政治地位的升降完全随着这种斗争的变化而变化，时险时夷，

---

① （日）箭内亘：《元代社会の三阶级》，载《蒙古史研究》第297期，1916年。按：箭内氏这一统计是不准确的，据余统计仅西夏人担任过知枢密院事者就有五人，详见本文附表。

② （明）宋濂：《元史》卷202《释老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3《世祖纪》10。

④ （明）宋濂：《元史》卷13《世祖纪》10。

⑤ 陈高华：《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载《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跌宕起伏。作为这一时期的西夏遗民的主要代表人物，完全卷进了这历时二十余年争夺皇位的漩涡中。

世祖、成宗时，蒙古统治者对西夏遗民的政策虽作了根本性的修正，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虽然也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西夏人的政治力量兴起的时间毕竟不长，这种力量的蓄积层毕竟不厚，因此，在元朝最上层的核心领导集团中只有极个别人跻身入列，在中书省的宰相名单中，还找不到一个冠以唐兀氏族的人。到武宗时，这种现象就全面改观，由于种种的偶然因素，西夏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飞黄腾达的黄金时期。

元成宗卒于大德十一年（1307）初，当时，由于皇太子早死无嗣，皇后卜鲁罕掌权，谁来继嗣皇统？在几处地方，有几双贪婪的眼睛都觊觎着这一“伟大的椅子”，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在虎视鹰瞵中酝酿。然而，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是出镇朔漠的海山汗，他成为元朝历史上执政的第三位皇帝——元武宗，西夏人史氏一家与元武宗个人及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史氏一家也就是凭借着这种特殊关系而勃兴。

西夏史氏，出于何族，碑传不纪。据姚燧《史公先德碑》，称史氏“其来姑臧，不知其纪”，[①]则又可说明他们是西夏武威人。太祖平西夏时，拉吉尔威入为宿卫，到算智尔威时，入侍世祖，后平云南有功，官至云南行省右丞。史家发迹在乞台普济这一代，乞台普济是算智尔威的次子，先后侍奉忽必烈、真金等数十年，海山与八达出世后，乞台普济又被命为保育之臣，皇帝召见诸王时，每次都是由乞台普济“左右兼抱之至前”，[②]可以反映乞台普济与元朝皇室关系极为密切。乞台普济担任了教育海山与八达二位皇子的重任，他为人谨慎，办事得体，深受成宗与裕圣皇太后（真金妻）的信任。大德三年（1299），海山奉成宗之命出镇北边。担任元朝北边防卫军的总指挥。当时乞台普济与也儿吉尼父子扈从海山出镇，成宗委乞台普济以重任，称为“壹是军务，悉听于公”。[③]当时防守北边的军队都是蒙古宗王与驸马家族的部队，由于乞台普济善于治军，又是裕宗真金的旧臣，因此在军中威望极高，

---

①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②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③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宿卫诸将皆父事之”。[1]他在漠北训练六军，积谷屯田，颇有效益，协助海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对海都、笃哇等与元朝敌对的中亚蒙古诸王势力的防御体制。[2]在防御海都、笃哇的战斗中，乞台普济率军多次败敌。因此，对于海山汗来说，乞台普济不仅于己有教养之大恩，而且还有潜藩辅佐之殊勋。

特别是乞台普济入京求玺，对海山后来得以较顺利地夺取帝位起了极大的作用。据《史公先德碑》：

> （大德）四年（1300），以文移元印，难杜罔欺，又（乞台普济）以身入闻，得裕宗信宝以归。[3]

裕宗信宝，即忽必烈时赐真金的“皇太子印”。此印“盖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诸所部，以为机密符令之信”。[4]成宗得此印，抚军漠北，而定其大业。海山如得此印，则可以确切的皇太子身份去掌管元朝的一切军政事务。当时掌管此印的就是真金妻裕圣皇太后，海山派乞台普济进京，明显是利用他侍奉裕宗真金数十年而又深得裕圣皇太后信任的旧关系来打通关节。果然，乞台普济马到成功。海山所有的成功，几乎无一不与这位西夏人有关，无论是从需要还是良心，海山汗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位忠心耿耿的教父和老臣。

成宗崩，武宗未正式即位，就假乞台普济为平章政事，至大都登基后，立即授乞台普济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至大元年（1308）二月，拜中书左丞相，十一月，又进中书右丞相。武宗即位十九个月中，九次降制，给乞台普济加官晋爵，以示深恩殊荣。至大三年（1310），进封安吉王，西夏遗民生前封王者仅此一例，“人臣之位至是极焉”。[5]

海山为了报恩，不仅对乞台普济父祖大加追赠，其兄弟子孙亦多庇其荫。兄阿拉克布济克（即阿剌普济）授荣禄大夫、司徒兼都元帅，弟昂齐授荣禄大夫、司徒、平章政事；弟日尔塞授荣禄大夫、宣政院使、宁夏甘肃释教都总统；弟托罗岱授管军千户。子也儿吉尼曾是海山之少年侍读，成为海

---

①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② （日）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载《东方学》第64辑，1982年。

③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④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1《襄敏杨公神道碑》。

⑤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山少年时代的“那可儿（伴当）”。海山出镇漠北，也儿吉尼在海山麾下诸将中“胆略材武推为冠军”，[①]在与海都、笃哇叛军作战中，也儿吉尼军功最多。武宗即位后，先后任唐兀亲军都指挥使、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遥授中书左丞相、遥授中书右丞相。次子哩日初事晋王甘剌麻，晋王当时协同海山对西北叛王作战，哩日有功，后海山将哩日从晋王处调至身边，武宗即位后，也屡领要职，一直官至遥授中书左丞相。西夏史氏，“一门之间，三为丞相”，[②]权力显赫，势焰熏天，在元代所有的色目人中恐怕也是仅有的一例。

武宗的皇位本是弟弟（仁宗）拼命抢来的，只是慑于哥哥的兵威，才将这一口中之食吐出来，送给了哥哥，自己却以皇太弟的身份而自命为皇太子，又以“叔侄相承”的盟誓以求各自利益的均衡，虽然通过了“三宫（答己太后、武宗、仁宗）协和”，[③]但是，武、仁之间的根本矛盾并不会因此而消除。武宗在位时，其核心集团人物就曾密谋废仁宗太子位而未成功，仁宗即位后，借改革武宗旧政之机，将武宗主要亲信人物或诛杀，或罢免，曾最受武宗宠信的西夏人史氏一家也未能摆脱这一灾难，乞台普济被免去太傅位，也儿吉尼被罢去仁虞院使。[④]在仁宗撕毁“叔侄相承”的盟约后，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又命晋王出镇。作为晋王府旧臣乞台普济之子哩日对此深感不平，于延祐三年（1316）冬十月，在陕西延安发难，事败后不知去向。[⑤]在仁宗时，也儿吉尼虽还在朝中任职，但西夏史氏家族的势力至此已明显衰落。

英宗、泰定帝时又曾将也儿吉尼以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外放，一次去甘州选戍卒，一次去江西任平章，一次去云南任右丞相。[⑥]文宗即位后，因也儿吉尼是文宗父亲武宗的旧臣，且文宗之母又是西夏人，故念及僻处云南的也儿吉尼，两次下诏至云南召也儿吉尼进京，但也儿吉尼却被云南藩王拘禁，后逃入八番，才辗转回京。回京后，以翰林学士承旨的身份知行枢密院事，[⑦]仍官居一品，但权势明显下降，后也儿吉尼亦不知所终。《新元史》称其卒于

---

①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②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③ （明）宋濂：《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
④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1《乞台普济传》。
⑤ （明）宋濂：《元史》卷31《明宗纪》。
⑥ （明）宋濂：《元史》卷28《英宗纪》、卷29《泰定帝纪》。
⑦ （明）宋濂：《元史》卷32《文宗纪》。《蒙兀儿史记》称“知院”，误。

仁宗时，当为柯劭忞之误。[①]

元中期，西夏人杨教化兄弟也是参与争夺皇位斗争的风云人物，其权势虽比不上史家，但在当时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及造成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教化兄弟少年丧父，靠母亲赵氏鞠养，后因其父式腊唐兀台早年事忽必烈有功，故以其二子入宫，教化事武宗，弟朵儿只事仁宗。武宗出镇漠北，杨教化随军出征，乞台普济入京得裕宗信宝归后，海山汗将这一“天子之所服用”的“机密符令之信”交给了教化，教化成为武宗潜邸中最为亲信的掌印人。《杨公神道碑》载：

> 武宗顾左右忠信可任无如公者，命公密怀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如也。军务纤悉所出命，则公以其章行焉。[②]

可见，虽然教化当时并没有担任什么要职，但可反映在海山集团的核心人物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位。

在迎立武宗的过程中，教化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掌权，这时卜鲁罕及一部分大臣议立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因阿难答在世祖诸孙中年为最长，国立长君乃宗社之福，故阿难答应是合法继统人。然而，海山早就有成宗死后夺大位的准备，但时间极为紧迫，海山远在朔漠，一时鞭长莫及。恰巧教化当时“以军事入奏京师”，他作为海山集团的核心人物，对当时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也知道近居怀孟的八达也有夺取皇位的野心。于是，他“昼夜疾驰”，去见八达，以宗庙社稷安危之利害，力劝八达入京定难，促使徘徊观望的八达及时进京，[③]逮捕了卜鲁罕与阿难答一党，并迎海山即位，使海山兵不血刃即得大统，教化也因此成为武宗即位的定难勋臣之一。海山抚军漠北，昧于政事，将教化留在身边帮助处理政务，称之为“朕之左右手”。[④]御史台奏教化为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海山不愿教化远离，改命将作院使，秩正二品。

---

① （民国）柯绍忞：《新元史》卷 219《也儿吉尼传》。

②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 41《襄敏杨公神道碑》。

③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 41《襄敏杨公神道碑》。

④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 41《襄敏杨公神道碑》。

杨教化的弟弟朵儿只从小就入侍仁宗潜邸，很受仁宗器重，当时李孟称元仁宗时人才，“孟以朵儿只为第一”。[①]仁宗在位时，他先后担任礼部尚书、御史中丞、中政院使、集贤大学士。在仁宗身旁，他成了一位最敢犯颜直谏的宪臣，荐张珪，保纳麟，弹张闾，杖斡来，特别是权臣帖木迭儿为相后，“怙势贪虐，凶秽滋甚”，成为中外切齿的奸佞之臣，杨朵儿只时为御史中丞，“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同其他御史一起，揭发帖木迭儿“私罪二十余事”，致使仁宗罢其相位。[②]仁宗一死，朵儿只失去了这一靠山的恃仗，备受太后宠信的帖木迭儿趁英宗年幼，诬朵儿只违太后旨，斩杀于国门之外；直至泰定帝时，此冤才得以昭雪，追封朵儿只金紫光禄大夫、夏国公，谥襄愍，其子侄亦受恩荫，杨不华、杨文殊讷、杨衎饬（教化之子）均以御史起家。时称：“一家世有大节，前后五人皆受耳目之寄，岂他宗所可及哉”。[③]

元朝中期在中央机关和地方行省任要职者还有几位西夏人，如：昔里教化（中书平章）、李世安（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杨暗普（宣政院使），其中教化与暗普均在生前加封国公，但无事迹具录。元中期西夏人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主要反映是史、杨二家的兴衰。

四、元朝后期的西夏人

从总的趋势看，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势力越到后期越大，其政治地位也是越到后期越高。至元顺帝时，西夏遗民不仅完全摆脱了被人奴役、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地位，而且也抛弃了在元前期、中期的历史舞台上一直充当配角的位置，在元王朝统治的最后二十余年中，他们以极为重要的角色演出了自己一出又一出威武雄壮的剧目来。

元后期西夏人政治势力的发展及政治地位提高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西夏遗民在元朝政府机构各级任职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任职官员在元代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四大中央高级机关主要长官的任职情况看，中书省：西夏人担任过要职者共十四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
②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1《襄敏杨公神道碑》。
③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1《襄敏杨公神道碑》。

人，其中在元顺帝以前任职者有八人，顺帝时任职者五人，一人时间不明；枢密院：西夏人担任过要职者共八人，其中元顺帝以前任职者五人，顺帝时三人；御史台：西夏人担任过要职者共十三人，其中元顺帝以前任职者六人，顺帝时七人；宣政院：西夏人担任要职者共十人，顺帝前六人，顺帝时四人。这四大机关顺帝一朝担任要职者约占总数的一半，特别是行省中任要职的西夏人更多，顺帝一朝就有二十六人出任（以上参见本文附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大概有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元王朝长时期对色目人实行各种优待政策，因此，作为色目之一的西夏人得以大批进入元朝政府的各级机构。

首先是元王朝实行的怯薛制度。怯薛是蒙古语 Kešig 的音译，即轮流值宿守卫之意，指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成吉思汗时，怯薛地位就很高，入元后，怯薛成了元朝高级军政官员的最主要来源。最显贵的怯薛官可以一开始就授予一品大员。忽必烈以前，怯薛中除了蒙古、色目人外，还有一批汉人子弟。成宗以后，明确规定不得再收汉人、南人子弟入怯薛，故怯薛成员主要来自蒙古、色目勋旧子弟，而政府高级官员也主要来自这些怯薛成员中，西夏遗民在元后期出任政府要职者也大都来自怯薛。如高纳麟，以名臣子“入备宿卫”，后官至中书省参政、御史大夫、太尉等；[①]亦怜真班，暗伯之子，仁宗朝“令入宿卫”，后累官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江浙行省右丞相；[②]星吉，武宗时“袭怯里马赤”，后为中政院使、宣政院使、南台御史大夫、湖广行省平章政事；[③]福寿，“既长，入备环卫”，后为燕南廉访使，同知枢密院事；[④]卜颜帖木儿，“早备宿卫”，后为监察御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⑤]

其次是荫叙。元政府对色目官员恩荫甚厚，在荫叙上，色目人与汉人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异，元成宗时规定诸官子弟受荫“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⑥]仁宗时，规定诸职官承荫必须考经史，但“蒙古、色目愿试者听，仍

---

① （明）宋濂：《元史》卷 142《纳麟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 145《亦怜真班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 144《星吉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 144《福寿传》。
⑤ （明）宋濂：《元史》卷 144《卜颜帖木儿传》。
⑥ （元）完颜纳丹：《通制条格》卷 6《荫例》。

量进一阶”。[1]父祖官至一品者，子孙叙五品，官二品者，叙六品，亦怜真班官至正一品，其子八人，除一子早夭外，其余七人均受其荫，后皆得高官；[2]星吉官至从一品，其子五人，其中二人受荫，一授利国监太卿，一授签辽阳行枢密院事。[3]还有世袭一项，如大名路达鲁花赤由西夏昔里氏世袭，肃州路达鲁花赤由西夏昔里氏另一支世袭，[4]益都淄莱路达鲁花赤由西夏李氏家族世袭，[5]等等，他们从蒙古国时期开始直至元末，始终担任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再次，在科举取士上元政府对色目人也有许多优待。考试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前二种考卷较易，后二种考卷较难。以御试为例，“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6]如果是色目人愿试汉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录取时，每科进士以一百人为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取二十五名。[7]表面看似乎公允，但以各民族总人数的比例及文化水准的高低来衡量的话，就知道里面含有多么严重的不平等。色目人在四种人中能参加科举考试者可能与蒙古人差不多，但与汉人、南人相比，何啻相差千百倍。然而，取录人数比例则“一视同仁”，何等冠冕堂皇的民族压迫。因此，色目人录取的可能性无论从哪一角度言都远较汉人、南人大得多。在元代色目诸种中，西夏人的汉族传统文化水平是很高的，畏吾儿、回回的文化水平虽然也很高，但他们文化的中心内容主要受中亚、西域文化影响，当然不排斥部分汉文化程度较深的畏吾儿和回回人。从西夏来说，首先西夏故地早已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近千年的地区，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汉族统治下的郡县，它的文化基因属汉族文化系统。其次是西夏中后期以来，该国君臣极力提倡汉文化，尊崇儒学，国内出现了一批以斡道冲为代表的儒士，使儒学在西夏地区得以昌盛

① （明）宋濂：《元史》卷 82《选举志》2。
② （明）宋濂：《元史》卷 145《亦怜真班传》。
③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 18《星吉公神道碑铭》。
④ 拙稿《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载《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⑤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 42《李公墓志铭》。
⑥ （明）宋濂：《元史》卷 82《选举志》2。
⑦ （元）完颜纳丹：《通制条格》卷 5《科举》。

发达。[①]一方面西夏人享受着元政府规定的种种科举考试中对色目人的优待，另一方面西夏人又大都研习精熟汉族传统文化。因此，在元代的科举选士中，西夏人的竞争能力极强，大批的西夏人通过科举这一途径入仕，以《元统癸酉进士录》为据，顺帝元统元年一科，西夏遗民进士及第者八人，在色目人中位居第一，一科规定取色目二十五人，西夏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这次考试的殿试中，高中一甲二名者就是移居庐州的西夏人余阙。[②]史称："以色目第一人登第"。[③]

第二，元后期西夏人地位急骤上升，同这一时期回回、畏吾儿人地位相对下降有一定的关系。

前已言之，回回人早在蒙古国时期就有不少人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到元朝建立后，回回人地位更高，中统年间，回回人祃祃官居右丞相，为中书省首席长官。李璮事件爆发后，中书省的汉人官僚大受忽必烈猜忌，回回人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阿合马以其杰出的才干博得忽必烈的赏识。至元年间，阿合马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又升左丞相。阿合马当政十九年，大力培植亲信党羽，致使这一时期回回人势力极盛。据统计，世祖一朝回回人在中书省任要职者就有十一人（西夏无一人）。[④]成、武、仁三朝回回人势力虽比不上世祖朝，但实际地位仍很高。英宗时，回回人曾一度失势，而至泰定即位后，回回势力又完全恢复，晋王（即泰定帝）亲信回回人倒剌沙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又升左丞相，成为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倒剌沙执政期间，元廷的行政、军事及监察机构中多为回回人掌权。时称"倒剌沙柄国，西域人多附"。[⑤]泰定死后，文宗即位，以倒剌沙为首的回回人集团彻底失败。从此，回回人势力一蹶不振，一直延续到元朝末期。[⑥]

元代的畏吾儿人似乎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首先是他以最诚悦的态度第一个投入了蒙古人的怀抱，而且他的文字又为没有文字的蒙古人所采用，

---

①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18《西夏相公斡公画像赞》；（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8绍熙四年九月条称：西夏仁孝"崇儒学，禁奢侈，修国史，制新律。又尊孔子为帝，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

② 《元统元年癸酉进士录》卷上，宋元科举三录本。

③ （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49《七哀辞余左丞并序》。

④ 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⑤ （明）宋濂：《元史》卷190《赡思传》。

⑥ 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基于这些因素，使元代的畏吾儿人始终立于“命运宠儿”的位置上。蒙古国时期畏吾儿人“宠异冠诸国”，[①]迨至元末，“今高昌之人，内禁侍近，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他族，而其人则多贵且贤”。[②]蒙古国时期，早期的畏吾儿文化人大都成为蒙古贵族的老师，他们直接参与了早期蒙古人的各种政治斗争，对于蒙古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政治地位极高。忽必烈时期，畏吾儿的政治力量在忽必烈的潜邸中表现甚强，廉希宪、廉希贤、孟速思、昔班、阿里海牙、叶仙鼐等一批畏吾儿人都成了辅佐忽必烈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重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廉希宪，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在与回回人阿合马的斗争中，廉希宪几次失败，以致罢相。[③]廉希宪以后，畏吾儿人在元朝廷的地位仍很高，据尚衍斌先生研究资料反映，元代中书省畏吾儿人宰臣人数是世祖朝六人，成宗朝二人，武宗朝一人，仁宗朝二人，泰定帝朝一人，文宗朝一人，顺帝朝十三人。[④]可见，到元后期，出身畏吾儿族的上层政治人物仍然很多，但他们大都是以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才干而闻名于世，[⑤]像廉希宪那样的政治家再也不曾出现。从畏吾儿人对蒙元早期政治的强力渗透这一角度而言，该族人到元后期之政治势力亦呈衰微之势。

总的说来，元代的回回人是以善于经商和理财的手段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畏吾儿人则是以自己的优秀文化（草原型的）被早期蒙古所接受而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些因此必然会使他们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上带来一定的局限，当元王朝逐步深入地“行汉法”，蒙古统治者逐渐倾向于“汉化”时，较善于用汉族政治制度治国治军的西夏人比起回回、畏吾儿人来，就显示出更高的价值。因此，当回回人和畏吾儿人政治势力逐渐衰微时，作为色目三大种之一的西夏人的政治势力就在这空隙中成长壮大，以致出现元顺帝时的骤然膨胀之势。

第三，元朝后期西夏遗民政治势力的迅速发展与元末江南人民大起义

---

①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7《全公神通碑铭》。

②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5《高昌王神道碑》。

③ 匡裕彻：《元代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载《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④ 尚衍斌：《元代畏吾儿研究》第5章，第198页。

⑤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8中记录了畏吾儿人十一人，高昌人十七人，共二十八人，占全部葱岭东之“华化”西域人的一半，大都是元后期人。桑哥，据《汉藏史集》，当为藏族：《元史》记为畏吾儿，当误。

有关。

元朝后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阶级压迫和异族统治的人民大起义。这场起义发展极为迅速，至正十一年（1351），“汝、颍、蕲、黄民皆为逆，次年，徐、宿炽然盗起，蔓及钟离、定远，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数万”，[①]顷刻遍及江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不完者皆陷”。[②]到元朝末年，蒙古贵族与蒙古军队早已丧失了当年的勇猛剽悍，“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但以飞觞当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③]女真人当年在汴梁城腐化自毁的悲剧在蒙古人中又一次重演，驻守在中原地区的蒙古军队已无法抵挡起义大军。红军初起，野也不花率三十万军队进攻红军，未交锋主帅就跃马先逃；参政孛罗等率蒙古军队讨方国珍，兵未战就自己崩溃；[④]脱脱领兵百万围张士诚于高邮，但久围而不下，[⑤]蒙古军已完全堕落而不堪战阵。回回人是善于经商的民族，沙场驰战不为其长，元朝后期的畏吾儿人大都以文学艺术之名称著于时。只有西夏人，不管是迁居内地者，还是留住河西者，始终是聚族而居，长期保持较为淳朴的风俗，而且这种风俗“传越久则俗越定”，[⑥]特别是“沉鸷尚勇”[⑦]的武风，更是这个民族的精髓。西夏人三旦八镇江浙时，手下有一支号称“飞山子”的西夏甲兵，个个英勇善战，时称“其千夫长、百夫长沐浴风烈者不可以枚书”。[⑧]西夏人余阙镇淮南，他手下有一支西夏军，“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⑨]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统治者很自然地将镇压人民起义的重任交给了西夏人。至正十二年（1352），高纳麟为南台御史大夫兼太尉，总制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军马镇压江淮义军；[⑩]至正十二年，亦怜真班以江西行省左丞相的身份领兵镇压

---

① （明）姚世观编校：《明太祖文集》卷14《纪梦》。
②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3《修合肥城记》。
③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
④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
⑤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
⑥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⑦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⑧ （元）杨维桢：《铁崖文集》卷2《三旦八公勋德碑》。
⑨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
⑩ （明）宋濂：《元史》卷142《纳麟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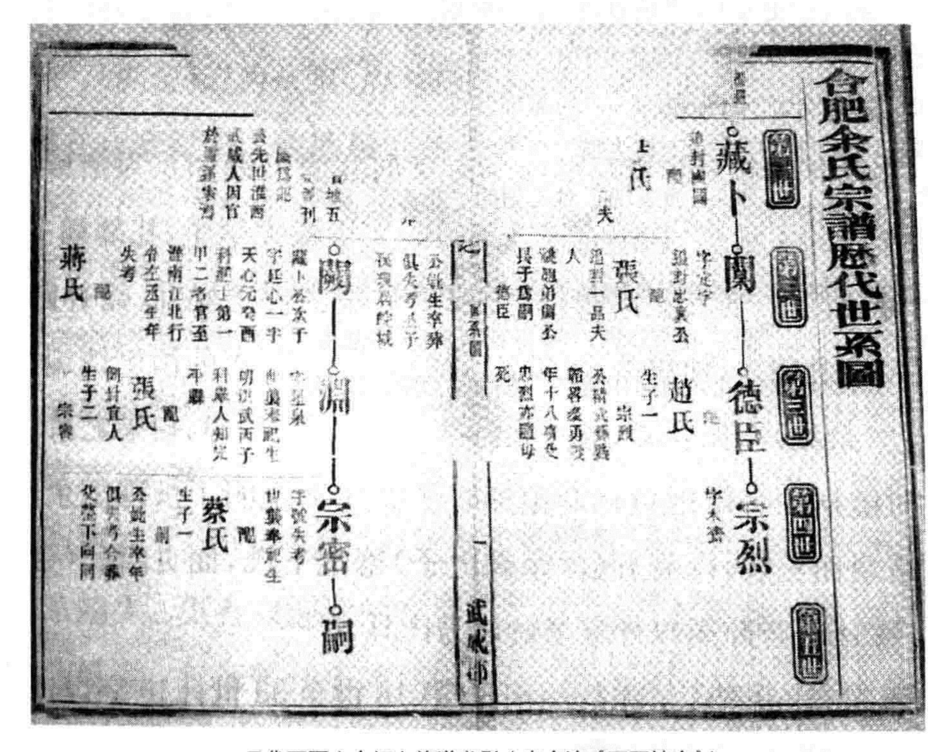
江西义军，[1]至元二十五年，江西参政李世安领兵平畲寇钟明亮及丘元。[2]参加镇压江南人民起义的西夏高级官员还有：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3]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永年、[4]广西平章政事也儿吉尼、[5]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6]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7]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8]淮南行省左丞余阙，[9]都是当时的"宿望重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西夏人沙览答里曾担任过中书左丞相，[10]西夏人亦怜真班曾三次担任知枢密院事，[11]西夏人高纳麟、韩嘉纳曾几次担任御史大夫，[12]所以说，这一时期元王朝的行政、军事以及监察大权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西夏人手中，亦可以说，元朝后期极力挽救元王朝命运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夏人，"兵起淮、汉，为臣子者或拥兵自卫，或望风而降，……而忠臣义士几何人斯？"[13]"文武之臣鲜克勤事"[14]。只有西夏人以"质直而上义"[15]的品质表现了对元朝的"愚忠"，确实没有辜负元朝统治者的厚望，作战之勇敢，气节之忠烈，赢得后世人的多少赞叹。然而，不管西夏遗民怎样竭尽全力替元朝统治者卖命，仍然无法改变他必将灭亡的命运。余阙死节庐州，[16]星吉死节江西，[17]福寿死节集庆，[18]也儿吉尼死节广西，[19]周喜同、塔彦晖、明安达儿、丑时中等，[20]或满门殉难，或全家尽忠，"其忠精之气炯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传》。
② （元）刘壎：《水云村稿》卷2《参政陇西公平寇碑》。
③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8《星吉公神道碑铭》。
④ （元）陈基：《夷白斋稿》卷20《西夏永年公勋德诗序》。
⑤ 《永乐大典》第1册卷2343梧字引《梧州府志》。
⑥ （明）杨维桢：《铁崖文集》卷2《三旦八公勋德碑》。
⑦ （明）宋濂：《元史》卷144《福寿传》。
⑧ （明）宋濂：《元史》卷144《卜颜帖木儿传》。
⑨ （明）宋濂：《元史》卷143《余阙传》。
⑩ （明）宋濂：《元史·顺帝纪》及《宰相表》；（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2《人物》。
⑪ （明）宋濂：《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传》。
⑫ （明）宋濂：《元史·纳麟传》及《顺帝纪》。
⑬ （元）余阙：《青阳山房集》之附录《贾伯良〈余忠宣公死节记〉》。
⑭ （元）余阙：《青阳山房文集》之程国儒序。
⑮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
⑯ （明）宋濂：《元史》卷143《余阙传》。
⑰ （明）宋濂：《元史》卷144《星吉传》。
⑱ （明）宋濂：《元史》卷144《福寿传》。
⑲ 《永乐大典》第1册卷2343梧字引《梧州府志》。
⑳ （明）宋濂：《元史》卷194《喜同传》、《塔不台传》，卷195《明安达儿传》、《丑闾传》。

炯，上贯霄汉”，[1]一批标明着西夏族属为元朝殉难的“烈士”，虽也曾“彪炳史册”，但他们却永远也得不到人民的承认。

当提笔要结束此文时，余才意识到，历史给这一时期的西夏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百多年以前，将西夏人亡国灭族的是蒙古人，一百多年以后，为蒙古人最后死节殉难的却又是西夏人，余思，他们之间大概有着某种难解的生死之缘。


合肥余氏宗譜歷代世系圖

藏卜—闕—德臣—宗烈

張氏　趙氏

闕—淵—宗密—嗣

蔣氏　張氏　蔡氏

元代西夏人余阙之族谱书影（史金波《西夏社会》）

[1]（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1《余左丞传》。

附录一

元中书省、枢密院西夏人任职

	人名	任职	时间	史料来源
中书省	乞台普济	平章、左、右丞相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额尔济纳	遥授左丞相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哩日	遥授左丞相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昔里教化	平章	武宗朝	《元史·宰相表》
	昂吉	平章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李世安	平章	武宗朝	《吴文正公集》卷42
	大慈都	遥授参知政事	武宗朝	《蒙兀儿史记》卷10
	哈剌	中书参知政事	武宗朝	《梧溪集》卷3
	高纳鳞	参政、平章	顺帝朝	《元史·宰相表》
	沙览答里	平章、左丞相	顺帝朝	《元史·宰相表》
	韩嘉纳	平章	顺帝朝	《元史·宰相表》
	福寿	平章	顺帝朝	《蒙兀儿史记·宰相表》
	论卜	平章	顺帝朝	《嘉靖宁夏新志》卷2
	祝真普	参政	?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枢密院	暗伯	知枢密院事	世祖朝	《元史·暗伯传》
	阿乞剌	知枢密院事	成宗朝	《元史·暗伯传》
	额尔济纳	知枢密院事	武宗、仁宗朝	《牧庵集》卷26
	李世安	商议枢密院事	武宗朝	《吴文正公集》卷42
	都罗乌□吃铁木儿	知枢密院事	仁宗朝	《过去庄严劫千佛发愿文》
	福寿	同知枢密院事	顺帝朝	《元史·顺帝纪》
	马的室理	签书枢密院事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亦怜真班	知枢密院事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附录二

元御史台、宣政院西夏人任职表

	人名	任职	时间	史料来源
御史台	亦力撒合	南台御史中丞	世祖朝	《元史·亦力撒合传》
	高纳麟	南台御史中丞	成宗朝	《元史·高纳麟传》
	也儿吉尼	御史大夫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哩日	御史大夫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杨朵儿只	御史大夫	仁宗朝	《元史·朵儿吉传》
	桑节	御史大夫	仁宗朝	《明一统志》卷37
	高纳麟	御史大夫	顺帝朝	《元史·高纳麟传》
	亦怜真班	南台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星吉	南台御史大夫	顺帝朝	《宋学士全集》卷18
	沙览答里	南台御史大夫	顺帝朝	《嘉靖宁夏新志》卷2
	韩嘉纳	御史大夫	顺帝朝	《元史·顺帝纪》
	福寿	南台御史大夫	顺帝朝	《元史·福寿传》
	永年	南台御史大夫	顺帝朝	《夷白斋稿》卷20
宣政院	杨暗普	宣政院使	世祖、武宗朝	《元史·世祖纪》 《元史·武宗纪》
	李闾伯	同知宣政院使	成宗朝	《巴西集》卷下
	日尔塞	宣政院使	武宗朝	《元史·武宗纪》
	尔禄	签宣政院事	武宗朝	《牧庵集》卷26
	杨执里不花	宣政院使	仁宗朝	《至正集》卷31
	文伯要解	宣政院副使	仁宗朝	《至顺镇江志》卷1
	星吉	宣政院使	顺帝朝	《宋学士全集》卷18
	纳麟	行宣政院使	顺帝朝	《元史·高纳麟传》
	哈蓝朵儿只	宣政院使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韩嘉纳	宣政院使	顺帝朝	《元史·顺帝纪》

附录三

元行中书省西夏人任职表

行省	人名	任职	时间	史料来源
征东	必宰牙	左丞	?	《元史·塔出传》
岭北	桑哥答思	平章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沙嘉室理	参政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辽阳	亦力撒合	参政、左丞	世祖朝	《元史·亦力撒合传》
	必宰牙	右丞	?	《至正集》卷58
	塔出	右丞、平章	世祖朝	《新元史·行省宰相表》
江西	李恒	参政	世祖朝	《元史·李恒传》
	李世安	参政、平章	世祖、武宗朝	《元史·李世安传》
	塔出	右丞	世祖朝	《元史·塔出传》
	斡赤	右丞	?	《道园学古录》卷22
	额尔济纳	平章	英宗朝	《元史·英宗纪》
	桑节	平章	仁宗朝	《明一统志》卷37
	星吉	平章	顺帝朝	《宋学士全集》卷18
	亦怜真班	左丞相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哈剌	参政	顺帝朝	《梧溪集》卷3
	李希谢	左丞	顺帝朝	《山居新话》
	教化第三子某	平章	顺帝朝	《牧庵集》卷26
	道童	平章	顺帝朝	《万历宁国府志》卷14
江浙	杨暗普	左丞	世祖朝	《元史·世祖纪》
	李世安	参政	成宗朝	《吴文正公集》卷42
	教化	平章	成宗朝	《元史·成宗纪》
	万奴	参政	顺帝朝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李闾伯	参政	武宗朝	《巴西集》卷下
	高安安	参政	文宗朝	《九灵集》卷14
	纳麟	右丞、平章	顺帝朝	《元史·纳麟传》
	亦怜真班	平章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韩嘉纳	平章	顺帝朝	《元史·顺帝纪》
	卜颜帖木儿	平章	顺帝朝	《元史·卜颜帖木儿传》
	三旦八	平章	顺帝朝	《铁崖文集》卷2
	恩宁普	参政	顺帝朝	《木纳斋集》卷3
	星吉	左丞	顺帝朝	《元史·顺帝纪》
福建	景福	参政	顺帝朝	《梧溪集》卷4
	恩宁普	右丞	顺帝朝	《木纳斋集》卷3

续表

行省	人名	任职	时间	史料来源
四川	亦力撒合	左丞	世祖朝	《元史·亦力撒合传》
	立智理威	参政、左丞	成宗朝	《元史·立智理威传》
	万奴	参政	顺帝朝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云南	算智尔威	右丞	仁宗朝	《元史·仁宗纪》
	也儿吉尼	左丞相	泰定帝	《元史·泰定帝纪》
	爱鲁	参政、左丞	世祖朝	《元史·爱鲁传》
	三旦八	右丞	顺帝朝	《万历云南通志》卷9
陕西	杨执里不花	左丞	顺帝朝	《至正集》卷31
	亦力撒合	平章	世祖朝	《元史·亦力撒合传》
	亦怜真班	平章	文宗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甘肃	三哥儿	左丞	成宗朝	《永乐大典》卷2806
	刘沙喇班	左丞	顺帝朝	《夷白斋稿》卷15
	亦怜真班	平章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三旦八	平章	顺帝朝	《存复斋集》卷7
	嵬的	右丞	顺帝朝	《元史·顺帝纪》
河南（淮南）	昂吉儿	参政、左、右丞、平章	世祖朝	《元史·昂吉儿传》
	李世安	参政	成宗朝	《吴文正公集》卷42
	纳麟	平章	顺帝朝	《元史·纳麟传》
	万奴	参政、左丞	顺帝朝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余阙	右丞	顺帝朝	《元史·余阙传》
	张讷	参政	顺帝朝	《申斋文集》卷6
	永年	平章	顺帝朝	《夷白斋稿》卷20
	三旦八	平章	顺帝朝	《存复斋集》卷7
	福寿	平章	顺帝朝	《元史·福寿传》
湖广	李恒	左丞	世祖朝	《元史·李恒传》
	来阿八赤	右丞	世祖朝	《元史·来阿八赤传》
	塔出	参政	世祖朝	《新元史·行省宰相表》
	立智理威	右丞	成宗朝	《元史·立智理威传》
	李世安	左丞	武宗朝	《吴文正公集》卷42
	桑节	平章	仁宗朝	《明一统志》卷37
	纳麟	参政	文宗朝	《元史·纳麟传》
	星吉	平章	顺帝朝	《宋学士全集》卷18
	亦怜真班	左丞相	顺帝朝	《元史·亦怜真班传》
	也儿吉尼	平章	顺帝朝	《永乐大典》卷2343
	忽剌出	丞相	顺帝朝	《至正昆山郡志》卷2
	彻里帖木儿	参政	顺帝朝	《至正昆山郡志》卷2

元代西夏人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元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各民族都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一度活跃在元代历史舞台上的西夏人也是如此，他们在元代的各个领域中都作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在许多方面还有着独特的贡献。

一

从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伐金，到公元1279年宋帝昺之死，蒙古人经历了68年的时间完成了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并建立了元王朝。元朝的统一，从规模上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达到汉、唐之世亦未有之的空前盛况。它不仅彻底结束了唐中叶以来黄河流域的分裂割据局面，而且还将长期以来峙立在中国边裔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中。毫无疑问，元朝的全国大统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完成这次统一的主要领导者当然是蒙古人，但是，必须指出，如果没有全国其他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协助，蒙古人要取得这场统一战争的胜利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夏人在蒙古人领导的一系列战争中就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蒙古统治者将大量的西夏军队投入到对金、宋的战争中。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而这时的金、宋政权还与蒙古国处于激烈的对抗之

* 原文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① （明）宋濂：《元史》卷58《地理志》1。

中。西夏不仅在地理上成了蒙古人从西线进攻金、宋的跳板，而且还变成了补充蒙古兵源的重要后方。早在西夏灭亡之前，蒙古人的军队中就已有不少的西夏人。[①]《元史·拜延传》：

> （火夺都）以质子从太祖征河西，太祖立质子军，号秃鲁花，遂以火夺都为秃鲁花军百户。[②]

这就是最早的蒙古军事力量中的西夏军队——河西质子军。西夏灭亡后，西夏人更成为蒙古统治者的重要征兵对象，除了将一部分降伏的西夏军队隶属蒙古军籍外，还调拨了一批又一批西夏人当兵。窝阔台时，皇子阔端镇守西凉，"大发民为兵"，[③]太宗七年，"签河西匠人为军"。[④]忽必烈时，元政府在西夏地区签军七次，一次人数可多至三千。[⑤]在诸色目人种中，西夏地距中原最近，征调夏人为兵，可节省许多转戍之劳，因此蒙古人对由西夏人组成的军队较为重视，往往将其投放到对金、宋作战的第一线，东线作战的木华黎、伯颜、阿术、察罕、李恒麾下均有河西军。西线四川、云南方面亦有大批的西夏军队参战。

克恰诺夫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蒙古人在1205年从唐兀惕人的夏国了解到有关投石机和'勃利特'炮的情况，这些武器装备在后来的近东及欧洲战争都发挥过很大作用"。[⑥]克恰诺夫所说"勃利特"炮，很可能就是《宋史·夏国传》中的"旋风炮"：

> 有炮手二百人"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⑦]

我们一般只知道蒙古人在攻坚战中采用中亚传入的"回回炮"，征回回

---

① 《永乐大典》卷12969陈桱《通鉴续编》："木华黎遂由东胜州涉河，而西夏主闻亡惧，……遣塔哥甘普将兵五万属焉"。
② （明）宋濂：《元史》卷133《拜延传》。
③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④ （明）宋濂：《元史》卷99《兵志》2。
⑤ 根据《元史·世祖本纪》之数统计。
⑥ （俄）克恰诺夫：《唐兀惕和蒙古文化的联系》，载《蒙古文学关系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⑦ （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炮手来协助作战。其实，西夏炮及西夏炮手也大量投入到对金、宋的战争中来，这却鲜为人知。苏天爵《元参知政事王宪穆公行状》载：

> 河西之人居鄢陵者万家，号炮手。[①]

仅河南鄢陵一地就有西夏炮手之军户万家，由此可推知，西夏军队不仅在蒙古人的常规部队中占有相当比例，而在蒙古人的特种部队中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其次，一大批杰出的西夏将领在统一战争中建立了一系列的辉煌战功。袁桷言：

> 太祖皇帝经略西土，为武功首，灵、夏旧地始臣服委质，然犹强节好义。策殊勋，受上赏者史不绝书。[②]

一时间，“西夏风气休复，俊杰间出”。[③]察罕、塔出、木花里、拓跋按扎儿、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李世安、拜延等，都是这一时期为元朝的统一建立过不朽功勋的西夏将领，其中以察罕与李恒为最。

察罕在第一次蒙古伐金的战争中，率领先锋部队进攻金北边昌、恒、抚等州。当时，金将定薛（《金史》作完颜承裕）拥重兵四十万据守野狐岭天险，察罕打探到金军士气沮丧，力劝成吉思汗一鼓作气进击金军，成吉思汗命察罕攻击，在野狐岭上大败金军。金军逃至宣平浍河川，蒙军又紧追不舍，双方大战，金军主力被歼。当时人称这一仗：“金之亡决于是役”。[④]而在这一次极重要的对金作战中，西夏人察罕立有大功，因此，成吉思汗封察罕为御前帐首千户，命他统辖成吉思汗的主要千户。此后，于公元1212年克金奉圣州，公元1216年围金南京，公元1217年攻霸州之战中，察罕屡建奇功。在对宋作战中，又被任命为马步军都元帅，先后攻克枣阳光化军、光州、天

①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3《元参知政事王宪穆公行状》。
②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贺兰堂记》。
③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2《彭城郡侯刘公神道碑》。
④ （元）脱脱：《金史》卷93《完颜承裕传》。

长县及滁、寿、泗等州，成为对金、宋作战最著名的军事统帅之一。至宪宗时，被任命为“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并赐地一万四千五百余顷，户二万余”，受到了蒙古统治者多次重奖。[①]

李恒是夏神宗遵顼的嫡曾孙，因告发李璮之叛而发迹，被忽必烈任命为益都、淄莱新军万户。他从至元七年（1270）开始参加平宋战争，到至元十六（1279）年彻底灭宋，打了整整十年的硬仗。至元七年襄阳之战，李恒在水路设伏败吕文焕军；至元十年（1273）李恒率精兵首破樊城；至元十一年（1274），李恒在阳保大败夏松（夏贵子）军，攻占鄂州、汉阳；至元十二年（1275），于洞庭湖擒宋将高世杰，又下岳州，克沙市。尔后，挥戈转战，先后“下江西州七、闽中州三、广东州十四”。[②]在最后的厓山之战中，李恒与张弘范配合作战，南北合击宋军，将拥有几十万军队、千余艘海舰的南宋军队尽歼于南海之上，彻底打垮了南宋小朝廷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全国声望最高的军事统帅。[③]姚燧纪其功云：“（李恒）平生小大百战，下城邑百有五十，为户三百万”。[④]在追随李恒的征讨中，其部将西夏虎益是战功最为卓著者。碑传称其“移武愍（李恒谥号）军，往徇于洪，从收闽广，狼烟一空”。[⑤]

二

可以说，从蒙元政权建立到元朝最后覆亡，其内部的分裂和叛乱就始终没有停止过，而西夏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各种叛乱的斗争中，也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元代的叛乱大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推行汉法，建立蒙汉统治阶级联合政权，遭到了蒙古族内的草原保守势力的反对，一部分蒙古宗王起兵反叛，如阿里不哥、乃颜、海都等；另一种是地方割据

---

① 参阅《元史・大祖纪》、《元史・察罕传》及（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2卷第1分册第3编《唐兀惕部落》。

② （元）姚燧：《牧庵集》卷14《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兼管内劝农事虎公神道碑》。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④ （元）姚燧：《牧庵集》卷3《李公家庙碑》。

⑤ （元）姚燧：《牧庵集》卷14《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兼管内劝农事虎公神道碑》。

势力由于个人野心勃发，导致同中央的抗衡，或者是周边少数民族酋领对元政府的反叛，如李璮之乱及云南诸王的分裂等。不过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叛乱，在当时的形势下都是一种分裂行动。因此，可以说，平定上述叛乱，就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元政权，亦即维护当时新出现的统一形势。西夏人在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元王朝的尽忠。

忽必烈即位之初，阿里不哥在漠北称汗，与大都的元政权分庭相抗，为了保卫新建立的元政权，忽必烈暂时停止了对南宋的战争，发动主要兵力，兴师讨叛。当时，不少西夏人参加了这次平叛战争，火夺都平忽都于临洮；[①]算智尔威随忽必烈出征，参加“大小之战十五”，因功授予蒙古唐兀军民达鲁花赤；[②]塔儿忽台战死于失亩里秃之地；朵罗台从战亦累立战功。[③]

阿里不哥败降后，海都成了西北叛王的领袖，屡次兴兵南侵。鉴于海都的威胁，忽必烈不得不将对宋作战的主力部队伯颜、阿术等军抽调北征。当时昂吉儿、塔出等西夏军队均属伯颜、阿术管辖，这一批西夏军队应参加了对海都的作战[④]。海都之乱一直延续到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最后被元武宗海山及晋王甘剌麻的军队击败，而海山与甘剌麻的军中，西夏人乞台普济、也儿吉尼、哩日父子三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乞台普济在漠北训练六军，屯田积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对海都、笃哇的防御体系，并在防御战斗中获得了辉煌的战果；也儿吉尼在库布哩、昂吉尔图、哈喇台等一系列战役中，多次粉碎海都叛军的进攻，屡建奇功，仅大德十年（1306）的一次战斗，就俘获叛军万余人，寇平之后，“第诸将功，胆略材武推为冠军”，哩日扈从晋王，在库布哩战役中亦立大功。[⑤]

在海都叛乱时，居于辽东的蒙古宗王乃颜亦发动叛乱响应海都，企图对忽必烈进行东西夹击。当时担任北京宣慰使的西夏人亦力撒合知道乃颜“有异志，必反”，乃密奏朝廷早准备。于是，元建辽阳北省借以镇慑诸王，控制辽东，亦力撒合任辽阳行省参政。乃颜叛时，亦力撒合“掌运粮储，军供无乏”，为平叛战争的胜利，作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受到了忽必烈的嘉

① （明）宋濂：《元史》卷133《拜延传》。
②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③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罗台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32《昂吉儿传》、卷135《塔出传》。
⑤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

奖。[①]西夏人暗伯在平定乃颜的战斗中更是功勋卓著，他率领唐兀卫的战士随忽必烈亲征，多次克捷叛敌，因功被命为克流速（今赫尔苏河）、不鲁合（义谓柳河，辽河支流）、不周兀等处万户。后诸王哈鲁、驸马秃绵答儿亦叛，暗伯率军与叛军战于克流速石巴秃（石巴秃，义为泥淖）之地，身被重创，拼死克敌，斩秃绵答儿，生擒哈鲁，大获全胜，以功授唐兀卫都指挥使。[②]其他西夏将领如寄僧、拓跋忙哥、昂阿秃等在平定乃颜之乱中也立有功勋。[③]

李璮之乱是忽必烈即位之初发生的一次地方军阀的叛乱，虽然叛乱首尾不到五个月，但对元初的政治影响甚大。忽必烈对李璮叛心虽早有警觉，但对李璮具体举事的时间还是不可能十分清楚的。当时忽必烈正集结兵力全力应付北边的阿里不哥，内地防范极为空虚。这时，西夏人李恒父子“弃家人入告变”，及时报告了李璮起兵的消息，因而全家被李璮系于狱中。[④]李璮被诛后，李恒即被授为淄莱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在平定李璮叛乱时，西夏人虎益亦从军讨伐，因功受到元政府的奖赏。[⑤]

云南、四川、甘青地区俱是我国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元朝虽然统一了这些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局势一直不太稳定，其中特别是云南地区，常处于一种混乱的局面。在此期间，有一部分西夏人为了稳定西南边陲的局势，参加了当时的平叛战争。西夏人爱鲁“使相西南二十一年，小大之战无虑百数”，先后平定金齿、白衣、乌蛮、都掌、圔冢、鹅夷、罗氏鬼国、罗佐山、白水江蛮诸部的叛乱，以致“夷蛮詟其威名”。[⑥]朵儿赤为云南廉访副使时，“云南诸蛮叛”，当时许多官吏僚佐纷纷逃走，朵儿赤却坚拒叛军；其子斡仁通为云南省理问，天历时，云南诸王与万户伯忽叛，斡仁通率军抗之，死于战阵。[⑦]延祐间，江西宁都盗起，“声势摇煽张甚”，李世安“提兵临捕”，仅二三月而盗平，故称：“自混一以来，用师之神速，成功之伟特，未有若斯之盛者”。[⑧]顺帝时，西蕃为乱，西夏人亦怜真班为宣政院使，曾“设法弭西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133《暗伯传》。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2《按扎儿传》、卷123《也蒲甘卜传》、卷129《来阿八赤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29《李恒传》。
⑤ （元）姚燧：《牧庵集》卷14《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兼管内劝农事虎公神道碑》。
⑥ （明）宋濂：《元史》卷122《爱鲁传》；（元）姚燧：《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儿赤传》。
⑧ （元）刘将孙：《养吾斋集》卷14《李龙川平盗诗序》。

羌之寇”,[①]西边之民为感亦怜真班的恩德，刻石碑纪颂。王翰为福州路治中，“三魁贼起，地险，难猝用兵，制君制造其垒谕降之”。[②]

三

蒙古国早期的国家机器一直比较简单，仅“以万户统军旅，断事官治刑政”,[③]当时的国家还不具有正式的监察机构，而元代监察机构的建立，其中就含有西夏人的功劳。

忽必烈即位之初，虽然中书省枢密院等官僚机构已基本完备，但御史台则是“草创之初，未遑举行”。[④]监察机构在封建专制统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从忽必烈与张雄飞的一段对话中便可以看出。忽必烈说：“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名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乎？”张雄飞说：“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贪秽不称职者，即纠劾之，如此则纪纲举，天下治矣。”[⑤]在此前后，有许多大臣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纷纷向忽必烈进言，如刘秉忠、姚枢、郝经、孙公亮、廉希宪、张雄飞等都谈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起实质性作用的人还是西夏人高智耀，当时他在忽必烈身边任翰林学士，忽必烈知高智耀贤明有才干，对他极为“宠赉”。至元四年（1267），高智耀向忽必烈上奏建立御史台，他说：

> 前代御史台，为天子耳目，所以肃官常，整治具，诚不可阙。[⑥]

忽必烈当时即“命宰臣记其事”，并决定采纳这一建议，于至元五年（1268）正式下令建立御史台。可见，高智耀在元代御史台的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元史·高智耀传》称“至元五年立御史台，用其议

---

① （明）宋濂：《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传》。

② （元）吴海：《闻过斋集》卷5《友石山人墓志铭》。

③ （明）宋濂：《元史》卷85《百官志》。

④ 《永乐大典》第2册卷2607《经世大典·御史台》。

⑤ （明）宋濂：《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⑥ （元）佚名：《庙学典礼》卷11《秀才免差发条》。

也”，也就是肯定了高智耀的功劳。

西夏人在元监察机构中任职者极多，地位很重要，而且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据《元代西夏人物表》中的材料统计，[①]约有60余位西夏人为御史出身，其中任南北台御史大夫者10人，任御史中丞者4人，任各道廉访使者16人。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认真履行自己的监察职责，“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以“肃正纲纪”，[②]甚至不怕得罪权贵，与邪恶势力作不退让的斗争。

西夏人亦力撒合是元世祖时有名的宪臣，他任南台御史中丞时，正值权臣阿合马当政，亦力撒合不畏阿合马之势焰，弹劾其子江浙平章政事忽辛，“发其奸，得赃钞八十一万锭，而诛之”。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宰相桑哥的死党，又是忽必烈最为宠信的人物，倚权仗势，在江南干了种种不法之事，亦力撒合给予全面的揭露，致使这一罪大恶极的江南豪霸受到了惩处。[③]

仁宗时西夏人杨朵儿只更是疾恶如仇，初任侍御史时，弹劾和惩治了不少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有犯法，虽贵幸，无所贷”。[④]任御史中丞时，御史高纳麟因直谏触怒了皇帝，杨朵儿只极力保救，“一日至八九奏”，[⑤]并以魏征与唐太宗的故事来说服仁宗，使纳麟得以无事。仁宗之母答己干预朝政，以其私党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势倾朝野。铁木迭儿是一个贪奸不法的歹徒，恃仗太后之威势，在其执掌朝政之时，“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袭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他霸占公私之田产财物无数，贪赃受贿亦无数，号称他“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⑥]以致“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⑦]杨朵儿只当时正任御史中丞之职，他“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⑧]将铁木迭儿所干的种种罪行上奏仁宗，并称“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⑨]但由于皇太后答己的庇护，铁木迭儿只受到罢相之贬，而未加深究。仁宗死后，睚眦必报的小人铁木迭儿

---

① 拙稿《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明）宋濂：《元史》卷86《百官志》。
③ （明）宋濂：《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
④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0《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
⑤ （明）宋濂：《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
⑥ （明）宋濂：《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
⑧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0《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
⑨ （明）宋濂：《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也就将朵儿只斩杀于国门之外。

西夏人星吉也是一位有名的宪臣。他历事泰定帝、文宗及顺帝三朝。泰定元年（1324），他第一次出任监察御史，即针对丞相铁木迭儿及御史大夫倒剌沙的专擅进行了弹劾。至顺元年（1330），迁河东、山西廉访使，“薅奸剔秽，煦其朽枯，境内贴息”。元统二年（1334），又移派浙西江北廉访使“一道称治”；三年，监大都路，对于权幸奸佞一律“操其纪纲，风追雷断，不问谁何”，致使“奸宄贴然屏伏”。至正八年（1348），拜南台御史大夫。星吉“择刚明御史行十道，纠劾贪邪，疏拔冤滞”。至正十年（1350），任湖广平章，威顺王宽彻不花横行乡里，蹂践民间，而“有司莫敢问”。星吉亲自出面制止了威顺王的不法行为。宋濂赞星吉云：“正色厉言，以折奸杀，既司行台，亦尹京邑，贪邪宵遁，鬼神昼泣”，[①]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亦可反映星吉与元朝邪恶势力的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元顺帝时伯颜为丞相，“专权擅政”，西夏人亦怜真班被赶出京城为南台御史大夫。但亦怜真班仍坚持与伯颜斗争，“寻杀其子答里麻，而谪置海南”，直至伯颜事败，才召回京城。亦怜真班再次出任御史大夫后，更加注重各地御史宪臣之人选，史称“尽选中外廉能之官置诸风宪，一时号称得人”。[②]一批忠直敢言的风宪之臣，获得起用，其中属河西者有也儿吉尼、永年、杨执里不花、朵儿赤、余阙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同权贵们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哪怕是炙手可热的权臣。如也儿吉尼“为内台御史，劾丞相别儿怯不花不可为相者五事”；永年“其在行台，风厉各道，屏除奸慝，凛凛大人君子之风”；杨执里不花“延祐间为行御史，有大奸席势恶窃巨位，人重足侧目，击之，不报，迁内台，又击之”。[③]余阙“出佥浙东道廉访司事，发奸擿复，聪察若神，州县闻阙至，贪墨吏多解印绶去”。[④]至正时刘沙喇班“以宪节监于江右……正纲纪，省刑罚，审证令，不宜于民者，平而治之，简条约以莅守令，使得以行其职而无侵其官也”。[⑤]封建国家的监察机

---

①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8《忠肃星吉公神道碑铭》。

② （明）宋濂：《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传》。

③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219《也儿吉尼传》；（元）陈基：《夷白斋稿》卷20《南台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勋德诗序》；（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1《杨公行实序》。

④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1《余左丞传》。

⑤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39《刘沙喇班去思碑》。

构在封建专制统治中起着保护国家机器的重要作用。元明宗和世㻋曾将监察人员比之为“良医”，他们不仅在正常情况下能肃正风纪，清除弊害，即使在朝廷恶势力横行之时，也敢于“极言无隐，毋惮他人”。[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持与邪恶进行斗争。虽然他们对“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的国家官吏队伍的打击，可能只是杯水车薪，而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清政本”。[②]但是，他们在某一时间、某一局部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

元代西夏人分布甚广，在全国十一个省及吐蕃、畏吾儿、安南、征东等地都有西夏人的宦绩，其中还有不少西夏人在各行省中担任过极重要的职务，在元朝边郡及内地的建设和治理上均有建树。

（一）打击豪强，罢除苛政

西夏人昔里钤部在定宗时任大名路达鲁花赤。当时，境内十分混乱，“魏自兵后，官府甫建，群豪诸司错迭，长雄不相下，致政令不行”。昔里钤部针对这种混乱局面，采用治乱世须用重典之法，对那些豪强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举廉能，捉奸暴，扶良善，惠鳏寡”，并对过去的弊政进行改革，“率立行而更张之”。他在大名路任职九年，“号令明肃，豪右屏息，四境乐业，邻藩悚其威望”。[③]

西夏人立智理威在成宗时为荆湖北道宣慰使。荆湖地区弊政甚多，而对百姓危害最大的是公田一项。荆湖本公田，但政府却要依百姓所输租额另收公田租，水旱不免，成为荆湖地区农户之大害。立智理威到任后，访得“民所不便凡十数事上于朝，而言公田尤切”，致使朝廷派使者来进行调查，并罢去公田租一项，大大减轻了当地百姓的经济负担。他“为政严明，豪民猾吏，缩手不敢犯”。碑传称他“兴利除害，知无不为”。[④]

西夏人余阙任泗州同知时，泗州豪民横行不法，官府无力约制，余阙

---

① （明）宋濂：《元史》卷31《明宗纪》、卷6《世祖纪》。
② （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8《送朱佥事诚逋浙东之任序》。
③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1《李公神道碑》。
④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2《立智理威神道碑》。

至，“绳尤暴者数十”，严厉惩处了豪强们的暴行。在广西，他曾以布帛代输粟，免去百姓道险运粮之苦；在浙东，取消各种违法的徭役和赋税，对于贪官污吏，给予严厉制裁。因此，“州县闻（余）阙至，贪墨吏多解印绶去”。[①]

还有，高纳麟任杭州总管“锄奸去蠹，吏畏民悦”；[②]哈斯呼任保定总管，“兴农劝学，扶弱抑强”。[③]囊加歹任永城县达鲁花赤亦抑制豪强，劝农兴学。[④]观音奴知归德府，“廉明罔断，发擿如神。民有衔冤不直者，虽数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诉，观音奴立为剖决，旬日悉清”，[⑤]成为当地的“包青天”。

（二）赈济饥民，安集流散

西夏人李桢随阔出伐金，下河南诸郡。阔出派遣李桢去唐、邓二州。当时，河南新罹兵革，人民流散十之八九，李桢至后，开仓廪以赈恤饥寒，以致“归者如市”。[⑥]

至元十七年（1280），常德、澧、辰、沅、靖五州发生大饥荒，“民至易子以籴”。当时李恒任湖广左丞，下令发州县仓廪赈济饥民，被救的饥民“为口亡虑十万计。”[⑦]

大德八年（1304），四川发生大饥荒。当时任四川左丞的立智理威亲自出马，力劝富户出钱粮赈济灾民，以致“贫者得以活，富者无所病”。[⑧]

野仙任柘城县主簿，河南各地多被灾荒。流民四散，大量饥民流入柘城县境，野仙拿出自己的私财买米熬粥给饥民为食，救活饥民达千余人。[⑨]伯颜帖木儿任慈溪主簿时，亦劝富民捐赈，平抑粮价，赈恤饥民。[⑩]

肃州路达鲁花赤阿沙因河西地区土瘠民贫，多经战乱，经常发生饥馑，他多次出面赈济贫民，当国家财务不济时，他就用私家资财赈济之。仅中统四年一次，忽必烈就偿还阿沙赈济银三千七百两。[⑪]《肃州碑》称“黔黎怀惠，

---

①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 11《余左丞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 142《纳麟传》。
③ （清）李卫：《畿辅通志》卷 68《宦绩》。
④ （明）郑礼：《（嘉靖）永城县志》卷 4《宦绩》。
⑤ （明）宋濂：《元史》卷 192《观音奴传》。
⑥ （明）宋濂：《元史》卷 124《李桢传》。
⑦ （明）宋濂：《元史》卷 129《李恒传》；（元）姚燧：《牧庵集》卷 12《李公家庙碑》。
⑧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 42《立智理威神道碑》。
⑨ （明）寿濂：《嘉靖柘城县志》卷 5《宦绩》。
⑩ （清）杨泰亨：《（光绪）慈溪县志》卷 23《宦绩》。
⑪ （明）宋濂：《元史》卷 5《世祖纪》2。

政令乐从”。[①]

也儿吉尼，顺帝时任广西廉访使。当时，广西大饥，“民有食殍死之肉者”，也儿吉尼“不忍视其民死而弗恤，乃悉捐禄秩之储五千缗，市粟以赈之”，以致地方土庶胥吏均仿效，“得粟万数千石”，使饥民免死于沟壑。湖湘一带饥民也闻讯来归，也儿吉尼全力安集收留，致使流亡者有“若赴其家”之感。[②]

（三）屯田积谷，发展生产

昂吉儿任淮西宣慰使时，正值南宋初亡，“西淮兵革之余，荆榛蔽野”。昂吉儿首倡淮西屯田，被采纳，在芍陂、洪泽等地试行，“以二万兵屯之，岁得米数十万斛”。[③]

西夏地区原来一直用国家的正规军队进行屯田，然而，军队经常被征调出战，对于生产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西夏地区的旷野之地“十未垦一”。朵儿赤任中兴路新民总管后，废原有的军屯，将南军子弟成丁者别编入籍进行屯田，这样不仅节省了兵力，还扩充了屯田规模，“凡三载，赋额倍增”。[④]

至元间，爱鲁任云南中庆路达鲁花赤，他先在永昌括田，增田数倍，又在中庆清理户籍得隐户万余，以其中四千户立中庆路民屯，[⑤]开屯田近八万亩，[⑥]占元代云南屯田的一半。清理隐户屯田是为了增加行省的财政收入，而这些土地的开发和种植，对恢复发展云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此外，木八剌沙、[⑦]捏古伯[⑧]在上都、辽东等地的屯田也有成绩。

（四）兴修水利，治理河患

昔里钤部在大名路时，境内衡、漳二水“岁霖潦泛滥，为民害甚侈”，昔里钤部亲自率民“跨河建堤，仍植槐柳万本，苞固峻址，捍御崩齧”，[⑨]制止了河泛对人民的危害。

---

①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永乐大典》第1册卷2343引《梧州府志》录《也儿吉尼公德政碑》。

③ （明）宋濂：《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④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儿赤传》。

⑤ （明）宋濂：《元史》卷100《兵志》3。

⑥ （明）宋濂：《元史》卷99《兵志》2。

⑦ （明）宋濂：《元史》卷8《世祖纪》5。

⑧ （明）任洛：《辽东志》卷5《宦绩》。

⑨ （明）宋濂：《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

朵儿赤在宁夏开屯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①]这“三流”很可能就是指疏复淤塞已久的秦家、汉延、唐来三大水渠。参与这次水利工程的还有汉人水利专家和大批的西夏水工，据《元史·郭守敬传》，这次在宁夏，疏通正渠十，支渠六十八，溉田九万余顷。[②]这次水利工程完成，对元代宁夏地区的经济恢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夏人陈子恒至元间任河南荥县尹。荥泽地段，正是黄河屡为患害之区，为民害甚。子恒到任后，亲自率领当地人民，修堤筑坝，防患于未然。其后，河数年不为患，“民至今赖焉”。[③]顺帝时，白茅决间，西夏人脱脱任都水大监，亲自主持了这次堵塞白茅全河的巨大工程。[④]也儿吉尼出监广西时“缮城郭，造阳桥，修灵渠，皆政纪之卓然。”[⑤]秃满台任济宁时，“疏浚沟浍，以泄内侵，水害以息。”[⑥]

五

西夏人对元代文化、教育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高智耀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陶宗仪言：

>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⑦]

高智耀，西夏之望族，父祖数辈为夏国相，自己亦为西夏之名儒。窝阔台时，就请高智耀出山。高智耀挺身而出，“奔走于干戈戎马中，再三为儒户请命”。[⑧]阔端镇西凉，准备发儒士为兵，高智耀上谒，力言其不可，遂“以

① （明）宋濂：《元史》卷134《朵儿赤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164《郭守敬传》。
③ （明）胡谧：《成化河南总志》卷4《名宦》。
④ （元）纳延：《金台集》卷1《送都水大监脱脱使君奉命塞白茅全河》。
⑤ （清）汪森：《粤西文载》卷26《学校记》。
⑥ （清）黄维翰：《(道光)巨野县志》卷20《金石》。
⑦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高学士》。
⑧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2《高智耀传论》。

其言而罢之”。[1]宪宗时，又有人建议以儒为兵，高智耀再次力谏，反复陈奏儒士于治乱的作用，致使宪宗罢黜前议。忽必烈时，高智耀被任命为“专领汉、夏诸儒事”，更加努力解救儒生。首先将在俘虏中的儒生“遣为良民”；其次是另立儒生户籍；再则开办学校使儒生有谋食之业。经高智耀解救的儒生实难以数计，故虞集言：“抗正言于干戈抢攘之中，存儒术于涂炭颠沛之极，我朝儒业之不泯，实权于此”。[2]元代学校除祀孔孟外，高智耀也是被祭祀者，学生们往往“肖其像而礼之”。[3]反映出高智耀对元代文化教育事业的保存和发展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还有不少西夏人作出成绩。立智理威在江东时，“所治郡，兴学校，谨教养，拔俊秀而用之”；[4]余阙在合肥，“每解政，开门授徒，萧然如寒士”；[5]刘沙喇班，“乃以暇日亲理学校，自龙兰郡庠至于东湖、宋濂两书院，皆作新之，去蠹弊，广学舍，立五经之师，聚生徒而教之，弦诵相接”。[6]也儿去尼出任广西廉访使时重修桂林府儒学并爰捐已俸，爰集工人，撤故以新。拓跋元善任平乐府达鲁花赤时，主持重修平乐府儒学。[7]杨亦执里不花在其任职中“修学校，励风俗，教戒家至”；[8]张讷弃官不仕居保定，“建义学其家”；[9]西夏人六十在苏州时，“旦日谒先师先圣，饬学官，增弟子员，礼聘名师，用月书季考之法程试之。……郡诸生化之争自激昂，以明经取进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10]卜元吉出任庆元路翁州书院山长，唐兀彦国任密州儒学正、崇义书院主师席。[11]其他如野仙、黑厮、斡朵忽都、勃罗帖木儿、师克恭、斡玉伦图、囊加歹、张长吉、唐兀君、王翰等，[12]这些西夏人在其任职中都比较注重教育，在各地兴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其中斡玉伦图在建宁路建“屏山书院”，

---

①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②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③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④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2《立智理威神道碑》。
⑤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1《余左丞传》。
⑥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39《刘沙喇班去思碑》。
⑦ （清）汪森：《粤西文载》卷26《学校记》。
⑧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1《杨公行实序》。
⑨ （元）刘岳申：《申斋文集》卷6《瑞芝堂记》。
⑩ （元）陈基：《夷白斋稿》卷12《平江路达鲁花赤西夏六十公纪绩颂碑》。
⑪ （民国）喻长霖：《台州府志》卷99《寓贤录》；（元）杨崇喜：《述善集》卷2《育材》。
⑫ 参见本书《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各人物栏。

斡朵忽都与王翰分别在高唐州及潮州修复和重建三皇庙，[1]对元代地方教育及医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居在濮阳地区的西夏人杨氏一族对濮阳地区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创办乡校“亦乐堂”，延聘名儒讲学，在地方产生极大影响，元廷赐名为“崇义书院”。[2]

述善集叙

述善集者紀唐兀崇喜彖賢氏世德行事之實而彖賢彙録之冊示不忘也記序碑名字說詩文雜著凡為篇二十九其十有二皆故禮部尚書魏郡潘先生作餘則僉憲愚庵顏先生洎名薦紳逢掖之為辭彖賢所自著而中書禮部郡侯縣大夫之旌勸而褒嘉者咸在焉予受而讀之嘆曰彖賢之先自賀蘭而澶淵為善之積蓋四世矣夫其龍祠鄉社有約藍田呂氏之範也

新发现元代西夏人杨崇喜《述善集》书影

續修楊氏族譜序

鄉也余於棠頭繙閱載籍見有述善集本則余季弟所抄捧讀之下不勝愛慕然特見一斑未窺全豹歲庚申蘇程兄弟秀峯寺延余與安潤生先生續修其家乘乃獲覩述善之全斯集也係楊氏四世祖 彖賢老先達所留遺分善俗育材行實三卷為篇二十有九銘賛序記詩賦箴說胥一時之賢士大夫所撰著吟哦則 彖賢先達之生平嘉言善行備載其中余讀之不禁慨然曰甚哉先民之制行高而垂訓於裔禩者詳且遠也今序譜蕆事之餘

元代濮阳西夏人《杨氏家谱》书影

西夏佛教后期受喇嘛教影响很大，而元朝又十分推崇喇嘛教，因此，西夏佛教及西夏僧人对元代宗教文化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元太宗后乃马真称制的“乙巳年（1245）”，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即已雕刊，后从元世祖到仁宗，西夏僧人雕刻了大量的西夏文大藏经，[3]元代大规模刻印西夏文佛经是在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载，这次负责印经者为西夏人皇使都勾管作者僧人那征大德李、御史台侍御杨那尔

① （元）姚燧：《道园学古录》卷 36《屏山书院记》；（明）胡民表：《嘉靖高唐州志》卷 5《宦绩》；（元）吴海：《闻过斋集》卷 3《潮州三皇庙记》。

② （元）杨崇喜：《述善集》卷 3《唐兀公碑铭》。

③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 2 章，第 99—101 页。

征、枢密院知院都罗乌□吃铁木儿。又据史金波先生统计，元代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共190藏，一藏为3620余卷，前后共印687800卷。[①]这么大规模地印制西夏文大藏经，足以说明盛行于西夏的喇嘛教对元代佛教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元代著名僧人杨慧觉为西夏人，由于“校经”有功，曾受忽必烈接见，赐“宗密圆融大师”之号，后受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之邀，来凉州讲学，并创建寿光、觉海二寺[②]，为河西地区佛教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是，西夏人杨琏真伽任江南释教总统后，将喇嘛教带到了江南地区。他在江南不仅大力倡导和传播喇嘛教，而且掘宋帝王及大臣之陵墓修建喇嘛教寺庙，杭州的尊胜塔，又名西番佛塔，即杨所建，“其形如壶，俗称一瓶塔；高二百丈，内藏佛经数十万卷，佛菩萨像万躯，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③]他还修建报国、兴元、般若、仙林、尊胜五大寺庙，其中尊胜塔寺，“正殿佛皆西番佛像，赤体侍立”。[④]杨琏真伽还在杭州附近的山中凿窟造像，亦多为西番佛像。除杨琏真伽外，在杭州的西夏僧人三宝也曾在钱塘门“叠石为西番塔”。[⑤]杨氏一案在元代影响甚大，当时江南汉人对这位西夏“杨髡”无不切齿，恨之入骨。无疑，杨氏所为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惨重的，但另一方面，将西藏文化（西藏喇嘛教及密宗）这么大规模地移植到江南汉人聚居的中心区域来，不能不说，这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各族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汇通，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西夏人在保护和继承汉族传统文化方面也有不小的成就。儒学是汉族文化之宗，但蒙古时期，北方儒学备受歧视，“儒者皆隶役”。西夏人高智耀向蒙哥汗进言：

> 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⑥]

---

①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经发愿文〉译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及该氏《西夏佛教史略》第9章，第205—208页。

② （元）法洪：《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转引自赵振华：《元朝白马寺释源宗主塔铭考》，载《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

③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7《南山胜迹》。

④ （元）郭畀：《云山日记》卷上。

⑤ （元）陶宗仪：《说郛》卷20郑元祐《山樵杂录》之《纪游》。

⑥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并要求蠲免儒者的“徭役”，蒙哥采纳了他的意见。世祖时期，安徽、四川等地儒士被俘者，“皆没为奴”，元称为“驱口”。又是高智耀进言，将“数千儒士从蒙古人的驱口中解放出来”。①另一位西夏人李桢以“文学为近侍”，随察罕南征时，“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②这两位西夏儒者对蒙元初期儒学的继承和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入元以后的西夏人就有不少精于儒学的大臣，如高智耀、昔里教化、朵儿赤、斡玉伦图、唐兀彦国、丑时中、余阙、迈里古思、师克恭、六十、李屺等。其中余阙“善谈名理，余阙之学因绝出四方”，又“五经悉为之传注，多新意”。③六十子约为平江路达鲁花赤，“从容为言修身理人之术，出入经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④丑时中知安陆府，“君才已历试，儒术素所优”。⑤何伯翰“通春秋五传、毛氏诗，尤长于易”。⑥余阙“在浙东时，有所著《易说》五十卷”。⑦

在史学方面，西夏人参与元朝修史者有刘沙剌班、余阙、斡玉伦图、甘立、普达失理、星吉等，其中刘沙剌班、余阙、斡玉伦图参加了著名的《宋史》和《金史》的纂修。刘中守则参与《经世大典》的编纂。⑧

在文学方面，西夏人中出现的人才也不少，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4《文学篇》收西夏人五名。⑨《元史》称余阙：“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⑩戴良则称余阙诗“与阴铿、何逊并驾齐驱”，而称斡克庄的诗“清新俊拔，成一家言”。⑪杨铁崖称昂吉诗：“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才名久擅场”。⑫昂吉还是元末时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的常客，有十几首

① （明）宋濂：《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② （明）宋濂：《元史》卷124《李桢传》。
③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1《余左丞传》。
④ （元）陈基：《夷白斋稿》卷12《平江路达鲁花赤西夏六十公纪绩颂碑》。
⑤ （元）吴当：《学言稿》卷2《送丑时中安陆知府》。
⑥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8《送何生序》。
⑦ （元）脱脱等：《宋史》附录《进宋史表》及《金史》附录《进金史表》。
⑧ （元）贡师泰：《玩斋集》卷6《送刘中守佥事还京师序》。
⑨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4《文学篇》，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
⑩ （明）宋濂：《元史》卷143《余阙传》。
⑪ （元）丁鹤年：《鹤年诗集》卷首《戴良序》。
⑫ （清）顾嗣立：《元诗选》第3集《录事昂吉》。

诗保存在《玉山名胜集》及《草雅堂集》中。[①]杨铁崖称甘立"惟诗善链饬，脱去凡近，其《夜鸟啼曲》可配古乐府"。[②]许有壬称张雄飞"尤工于诗，往往脍炙人口，佳章奇句，不可悉举"。[③]其他如王翰、刘沙剌班、孟昉诗文亦为时人称颂。故陈垣先生称西夏人"入元以来，以诗名者较他族为众"。[④]留下著作的有余阙《青阳山房集》、孟昉《孟待制文集》、贺庸《野堂集》、王翰《友石山人遗稿》、张雄飞《张雄飞诗集》、甘立《甘允从集》、昂吉《启文集》、刘沙剌班《学斋吟稿》、迈里古思《哀诗》。西夏人何伯翰，以杨维桢为师，曾编《古乐府集》。[⑤]其他还有完泽、纳麟、贺庸、燕不花、观音奴、买住、必申达儿、达石帖木儿、拜帖木儿等。[⑥]

在书法绘画方面西夏人的成就亦有可观者，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收元代西夏书法家四人，为余阙、甘立、斡玉伦图、孟昉，[⑦]不载于陶宗仪书中的西夏书法家还有王翰、李屺、杨不花、昔李孛、刘中守等。[⑧]宋濂称余阙"诗、文、篆、隶，皆精致可传"。[⑨]西夏人善画者史载不详，有记载的仅斡玉伦图的《西夏贺兰图》[⑩]、李屺的《一香图》[⑪]及刘沙剌班之《雪山图》,[⑫]惜今皆不传。

---

① （元）顾瑛:《玉山名胜集》及《草雅堂》。有参见刘成群《玉山雅集与党项遗离昂吉的创作》,载《西夏学》第6辑，2010年。（明）唐肃《丹崖集》卷8《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官高君墓志铭》称其为"高昂吉"，故知昂吉仅为其名。

② （清）顾嗣立：《元诗选》第2集《甘相掾立》。

③ （元）许有壬：《圭圹小稿》卷5《张雄飞诗集序》。

④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4《文学篇》。

⑤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8《送何生序》。

⑥ （清）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上卷第322、401、654、756、888页，下卷第942、986、1150页，中华书局，2001年。

⑦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

⑧ 参见本书《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各人物栏。

⑨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11《余左丞传》。

⑩ （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7《斡克庄侍郎〈贺兰山图〉赞》。

⑪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80《题李伯瞻〈一香图〉》。

⑫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9《雪山记》。

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

治元史者，无不深感元代氏族问题复杂。从钱竹汀始，即撰《元史氏族表》一书，想将元代氏族问题料理清楚，尔后，屠寄、柯劭忞等又不满足于钱氏成就，在《蒙兀儿史记》及《新元史》中亦列氏族表，大体均以钱竹汀稿为蓝本而各有增删。[①]故诸书《氏族表》均有唐兀（元谓西夏为唐兀）氏族一目，钱、屠、柯三氏虽然都是博学之士，所收元代唐兀氏族甚为广泛，但是，今就其三表观之，三氏限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而未著录者尚多，很难反映元代西夏人物之全貌，且所录唐兀氏族还有错讹之处。余从浩瀚之元明清典籍中对元代西夏人物进行较为全面的收录，特别是发掘元明人文集及地方志资料和吸收新的考古材料及西夏文藏文之翻译资料，使元代西夏人物之活动、事迹大大地丰富起来。

1985年，余作《元代西夏人物表》，十余年后，又获不少文献及考古材料，加之旧表体例、叙事均有不妥之处，故增订此表，并作删改。今表正目列仕宦元朝或有事迹之西夏人物344人，而世次附录无仕宦事迹而有姓名者又130余人，在钱、屠、柯三氏的基础上增录元代西夏人物200余人，大体将见于文献的元代西夏人物补齐。

由于人物太多，牵涉面较广，既要补正钱、屠、柯三表之缺误，又要将元代西夏人物的情况介绍清楚，仍采用表格一式。分列姓氏、爵里、职官、事迹、史料来源数栏。这样，近500余位元代西夏人物之大体情况通过此表

---

* 原文发表于《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今又作了很大程度的增补。

①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4《氏族表·色目氏族》上；（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29《氏族表》下。

而纲举目张。

西夏民族是两宋时期以党项为主又融合了杂处西北地区其他民族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建树，它不仅建立与宋、辽、金三大国鼎足而立的西夏国，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蒙古灭西夏后，作为国家政权的西夏实体已经消失，但西夏民族并没有随之灭亡，仍然活跃在元代历史舞台上，甚至还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直到元朝灭亡后，才逐渐融入汉族、蒙古族、藏族之中，如今天生活在安徽合肥的西夏遗民[①]及河南濮阳的西夏后代，[②]就是十分典型的事例。

因此，搞清元代西夏人物的全部情况，绝不是仅仅为解决西夏史或元史中的某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表所反映的元代西夏人的分布情况及他们的活动事迹，就可以得知为什么元以后西夏民族逐渐消亡，也可以反映出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为正确地阐述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大量的事例与资料。

创制本表尚须作如下几点说明：一、所谓西夏人并非指党项族，而是指蒙古灭西夏后属于原西夏国内的各民族人物。元代将西夏称为“唐兀”，既指西夏的党项族，又包括西夏的汉族、吐蕃、回鹘、沙陀各族；二、限于篇幅，本表未收女性，如文宗之母“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如南台侍御史笃鲁迷失之妻“河西李氏”，及大量的唐兀氏女眷；三、本表中同名西夏人甚多，如“伯颜”、“观音奴”、“闾马”、“野仙”、“赫厮”、“也先帖木儿”等，由于佐证资料不足，尚无法证其异同，故并存；四、本表人物所录事迹繁简不一，事多者，择其要，事少者，尽量全录，故所录事选择不当及遗漏者尚多；五、旧表新表版面大小不同，故将原表旧有栏目进行合并，成今日之状。虽然此表创制增订前后耗时很长，耗功不少，但可能仍有遗漏，特别是方志，尚未能全面普查，甚为憾也。故借此次出简体字版之机，又对元明以来方志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检，收获不小，又得漏载西夏人物十余人，一并补录如次。

---

① 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② 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李惟忠	贺兰山于弥部人，家淄州，夏国宗室子，父德任守兀纳城，子十三人。	益都、淄莱军民都达鲁花赤，赠金吾卫上将军，佥书枢密院事，追封滕国公，谥忠襄	从经略中原有功	《元史·李恒传》，《吴文正公集》卷42，《牧庵集》卷3
李恒，字德卿，号长白	惟忠第四子先居淄州，后居大都。	益都、淄州路新军万户，福建、江西等处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中书左丞、行省湖广，封滕国公，谥武愍	从伯颜征湖南、江西、广东、占城、交趾有功	《元史·李恒传》，《牧庵集》卷3，《申斋文集》卷7，《柳待制集》卷9
李世安，字彦豪[①]，一名散木解	恒长子，子五人：屺、岩、屿、嵘、峙	广州路达鲁花赤，世袭益都、淄莱上万户，湖广左丞，除江西等处行省平章政事	治理江西有善政，二十余年无寇乱	《新元史·李世安传》，《吴文正公集》卷42，《正德建昌府志》卷13
李世雄，字彦豪，一名囊加真	世安弟，子繁	袭兄职为万户，后让兄子屿	在职十年，江西称“贤帅”	《养蒙先生文集》4，《元史·李恒传》
李世显，一名逊都歹	世雄弟	同知湖南宣慰司事，建昌、吉安、瑞州三郡之监，昭勇大将军	江西称“贤守”	《元史·李恒传》，《吴文正公集》卷42，《新元史·李世安传》
李屺，字伯瞻，号熙怡，一名薛彻干	世安长子，子保	中议大夫，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	能书画，能词曲	《元史·李恒传》，《吴文正公集》卷31、42，《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1
李屿，一名薛彻秃	世安次子，子顺	袭万户，让世雄子李繁，不就职，又让屺子保		《元史·李恒传》，《吴文正公集》卷42
李岩	世安三子	栖霞县达鲁花赤		《吴文正公集》卷42
李嵘	世安五子	奉议大夫，江西行省理问		《吴文正公集》卷42
李（拓跋）元善	李世显之子	由京铁出监象州，再升广西省理问官	主持重修平乐府儒学	《粤西文载》卷26
李桢，字干臣	其先夏国族子	以文学为近侍，军前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襄阳军马万户	从阔出伐金，从蔡罕伐宋有功	《宋元学案补遗》，《元史·李桢传》
李希谢，一名朵儿只，号贺兰	灵武人，居钱塘	至元间为处州路总管，后官至江西行省左丞	处州有善政	《山居新话》，《清容居士文集》卷19

①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180《李世安传》称世安“字彦豪”，查《养蒙先生文集》卷4《李公墓志铭》：“讳世雄，字彦豪”，可见，李世雄字彦豪，非李世安也，疑《新元史》误。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卜颜帖木儿，字珍卿	唐兀乌密氏，叔父阿术，时人称“花马平章”	早备宿卫，监察御史、南台经历、殿中侍御史，大都路达鲁花赤，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平徐寿辉有功	《元史·卜颜帖木儿传》，《至正金陵新志》卷6，《万历杭州府志》卷61
祝真普	唐兀威弥氏，野速普花岳父	参政，至元二十五年以镇国上将军任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		《正德大名府志》卷10，《嘉靖广西通志》卷5
察罕，初名益德，又名五儿	唐兀乌密氏，又言逸的氏[①]，父曲也怯律，夏甘州守将。兄曲也怯祖[②]	成吉思汗养子，太祖时管直属千户，太宗时为马步军都元帅，宪宗时兼尚书省事，追封河南王，谥武宣	从太祖征西域、西夏，从太宗征金征宋有功	《元史，察罕传》，《道园类稿》卷42，《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编
不劣	唐兀乌密氏	成吉思汗养子，察罕被委以重任后，由不劣接任其职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编
木花里	察罕子	四斡耳朵怯怜口千户，世祖时为蒙古军万户，追封梁国公，谥武毅	攻宋有功	《元史·木花里传》
塔出	察罕孙，父布兀剌	世祖宿卫，山东统军使，佥淮西等处行枢密院事，江西都元帅，江西宣慰使，资政大夫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	平宋有功	《元史·塔出传》，《至正集》卷58
宰牙	塔出长子	袭爵、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		《元史·塔出传》
必宰牙	塔出次子	征东行省左丞、辽阳行省右丞		《元史·塔出传》，《至正集》卷58
曲也怯祖	察罕兄	夏国进士第一，太祖命从察合台镇回鹘，官达鲁花赤		《元史·亦力撒合传》，《道园类稿》卷58
阿波古	曲也怯祖子	阿鲁忽位下达鲁花赤		《元史·亦力撒合传》，《道园类稿》卷58

① （明）宋濂：《元史》本传及（元）虞集：《道园类稿》均以察罕族为“唐兀乌密氏”。（元）许有壬：《至正集》卷58称察罕族出“逸的氏”。屠氏言旧传误，证据不足，故两存。

②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4《氏族表》将怯祖与怯律同辈，误。（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2《立智理威忠惠公神道碑》云：“敕诸军护视曲也怯律家，……得其子曲也怯祖，则察罕之兄也”。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亦力撒合	曲也怯祖孙	世祖时为南台御史中丞、北京宣慰使、辽阳行省左丞、四川行省左丞	劾泰不华、阿合马子忽辛、杨琏真伽等不法事，平乃颜有功	《元史·亦力撒合传》
立智理威	亦力撒合弟	至元中为嘉定路达鲁花赤、江东道宣慰使，后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湖广行省右丞，封宁夏郡公，谥忠惠	治理四川、湖广有善政，于蜀人有大德	《元史·立智理威传》，《道园类稿》卷 58
答哈兀	立智理威弟	陕西行台监察御史		《元史·立智理威传》
买纳	立智理威长子	监察御史、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元史·立智理威传》，《道园类稿》卷 58
韩嘉纳	立智理威次子	监察御史，西台侍御史，同知宣徽院事，顺帝时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又为宣政院使、御史大夫，江浙平章		《元史·立智理威传》，《道园类稿》卷 58，《元史·宰相年表》，《元史·顺帝纪》
达理麻	买纳子	内府宰相		《元史·立智理威传》
昔李钤部，又名益立山，又译疾利沙，赐名拔都	沙陀人，后徙居沙州，父答加沙，夏国相	夏沙州将，降元后授千户，定宗时，进大名路达鲁花赤。赠太师，谥贞献	征西域有功	《元史·昔里钤部传》，《秋涧集》卷 51，《雪楼集》卷 25，《正德大名府志》卷 10
爱鲁	世居大名，昔李钤部长子	袭大名路达鲁花赤，至元中为云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帅，中书右丞行云南行省事，赠魏国公，谥毅敏，后改谥忠节	平定治理云南有功	《元史·爱鲁传》，《牧庵集》卷 19，《正德大名府志》卷 10
罗合	爱鲁弟	为大名路行军万户		《正德大名府志》卷 10，《秋涧集》卷 51
小钤部	爱鲁弟	代兄袭职为大名路达鲁花赤，授昭勇大将军	至元十三年，坐奸赃伏诛	《秋涧集》卷 51，《元史·世祖纪》
教化，又称昔李教化的	居大名，后居镇江，爱鲁长子	太宗定宗时为也可扎鲁火赤，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兼新附军万户，后升中书平章政事，封魏国公	至大初，被江南行台弹劾，称冒受赐货	《正德大名府志》卷 10，《雪楼集》卷 25，《牧庵集》卷 19，《至顺镇江志》卷 19，《元史·武宗纪》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万奴	居大名，小钤部子[①]	代兄教化为大名路达鲁花赤，后迁中奉大夫，河南、四川、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河南左丞，谥襄惠	大名任职二十四年，有善政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也先帖木儿	居大名，爱鲁次子	敦武校尉，周镇铁官提举，后为江西行省平章		《秋涧集》卷51，《牧庵集》卷19
忽都答儿，又作骨都歹	居大名，爱鲁幼子	袭大名路达鲁花赤授少中大夫，升嘉议大夫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野速普花，字从善	万奴子	授中顺大夫，升亚中大夫，大名路达鲁花赤	政尚宽惠，民用德之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玉里沙	野速普花子，弟舍利威、普颜、僧加奴、连德沙、波若奴	授承务郎、南陵县达鲁花赤同知濬州事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普颜	王里沙弟	大名路达鲁花赤，中顺大央		《正德大名府志》卷6
昔李都水，一名举立沙	沙陀人，居肃州，父答加沙	夏肃川守将，降蒙古	亡于战阵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②]《雪楼集》卷25
阿沙	举立沙子	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祖时升昭武大将军，迁甘肃等处宣慰使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剌麻朵儿只	阿沙子	奉训大夫，甘州路冶中，又升奉议大夫，肃州路达鲁花赤，让职于其弟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管固儿加哥	阿沙子	袭肃州路达鲁花赤四载，复归职剌麻朵儿只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令只沙	剌麻朵儿只幼子，兄贯□□□、耳玉、管布	袭肃州路达鲁花赤，宣武将军，升怀远大将军	莅政无私，公平正大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① 三《氏族表》均将万奴列为小钤部子，爱鲁三子:《正德大名府志》、《雪楼集》、《秋涧先生大全集》、《牧庵集》各不相同：一作教化、万奴、忽都答尔；一作教化、也先帖木儿、万奴；一作教化、也先帖木儿、骨都歹。只有程钜夫《雪楼集》认为万奴非爱鲁子，其他均认为万奴为爱鲁子，三表择程钜夫说。王颋《西域南海史地探索》考证万奴“或者是过继给爱鲁的堂侄”。

②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文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善居	令只沙子，兄普达实理，后为伯父管布嗣子	授宣武将军，仕武备寺同判，除甘州路郎中，授中宪大夫，迁永昌路达鲁花赤	牧民以仁惠之道，守己以正直之心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帖信普	贯□□□子，子定者帖木儿、赤斤帖木儿	袭肃州职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乞合答哈	沙陀昔李氏，曾大父玉里止吉住，祖束南玉钳部，父小李玉，居大名	至元中授昭勇大将军，怀孟卫辉等路新军万户，历沅州、安庆、江陵、陕州四路达鲁花赤	伐宋有功，所至有治绩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益怜真	乞合答哈长子，居大名	武德将军，新昌州达鲁花赤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昔李孛，字天广，小字孛兰奚	乞答哈次子	入宿卫，历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南台监察御史、江西行省理问，泰定除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太常礼仪院制	善书法及医学，好读史	《正德大名府志》卷10，《至正金陵新志》卷6
道安，号菊心	孛兰奚子，子观僧	大都烧钞库大使，遵化主簿，辟大宗正椽，饶阳县达鲁花赤	好艺菊	《正德大名府志》卷10
按扎儿	拓跋氏，应为党项	平金前锋总帅	从太祖南征平金有功，善战，有威名	《元史·按扎儿传》
忙汉	拓跋氏，按扎儿长子，子乃蛮	管军千户，领探马赤军	征乃颜、海都有功	《元史·按扎儿传》
拙赤哥	拓跋氏，按扎儿次子	入宿	征李璮战死	《元史·按扎儿传》
阔阔术	拓跋氏，拙赤哥子	御史台都事，湖南廉访使	献奉玺，有功	《元史·按扎儿传》
也蒲甘卜	张掖野蒲氏	世为西夏将，降蒙古后隶蒙古军籍为千户	从木华黎出征，病卒	《元史·也蒲甘卜传》
昂吉儿	居庐州，甘卜子	袭千户，加信阳军万户，至元中迁镇国上将军，淮西宣慰使，行尚书省右丞，行中书省左丞	平宋有功，屯田两淮有效	《元史·昂吉儿传》
昂阿秃	居庐州，昂吉儿子，子教化的，世袭千户	至元中充速古儿赤，代父职，授庐川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	征乃颜有功	《元史·昂吉儿传》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暗普	居庐州，昂阿秃弟	泰定授唐兀秃鲁花千户，后改海北海南道廉访使		《元史·昂吉儿传》
火夺都	河西人	太祖时唐兀秃鲁花百户，太宗时为千户	从征四川	《元史·拜延传》
拜延	河西人	世祖时袭千户，后为东西两川蒙古汉军万户，升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	征四川有功	《元史·拜延传》
答荼儿	拜延子	授明威将军，兴元、金州万户府达鲁花赤		《元史·拜延传》
老索	河西人，居保定子阿勾，次子忙古得，孙忽都不花	顺天路达鲁花赤	劝夏国王降蒙	《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①
纳怀	老索曾孙居保定	惠宗时为集贤侍读学士		《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
鲜卑仲吉	党项鲜卑氏，居中山	太祖时降，援滦州节度使，后为河北等路汉军兵马都元帅，开国侯	征金灭金有功	《元史·鲜卑仲吉传》②
鲜卑准	鲜卑仲吉子	管军千户，昭武大将军，大都屯田下户	征阿里不哥、李璮有功	《元史·鲜卑仲吉传》
鲜卑诚	鲜卑仲吉子 子息笃土	副万户，怀远大将军，武卫亲军都抬择便	征下哇征八百媳妇有功	《元史·鲜卑仲吉传》
哈斯呼，小字哈斯	唐古氏	至元四年任保定路总管	劝农兴学，扶弱抑强	《畿辅通志》卷68
高智耀，字显道	河西人，曾祖逸，祖良惠，考惠德，皆西夏名臣③	至元中为翰林学士、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赠宁国公，谥文忠	尊儒，立御史台皆智耀之议	《元史·高智耀传》，《道园类稿》卷25

---

① 《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原碑存河北保定市莲池公园内，碑立于至正十年（1350），转引自白滨：《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载何广博主编《述善集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② 鲜卑又作西壁、昔壁、西卑，为党项姓氏，各种资料中党项人姓鲜卑者甚多，故疑鲜卑仲吉为党项人。

③ 三表皆作良惠为智耀父，误。（明）宋濂:《元史》本传称:祖良惠。（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称，考讳惠德。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高睿	智耀子	翰林待制，嘉兴路总管，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追封宁国公，谥贞简	有治绩	《元史·高睿传》，《至正金陵新志》卷6
高纳麟，字文灿	睿子，居苏州	幼备宿卫，后除嘉兴路总管，杭州路总管，湖广行省参政，至正时除宣政院使、御史大夫、太尉	治江西、杭州均有善政，能诗	《元史·高纳麟传》，《万历南昌府志》卷15，《元诗选癸集》
高长寿	智耀子	佥行枢密院事		《道园类稿》卷25
高安安	纳麟子	江浙行枢密院判官，浙江省参政	至正末治浙江	《元史氏族表》，《九灵集》卷14，《蒙兀儿史记》卷81
高桢	纳麟子	枢密院经历		《元史氏族表》
高玉林，字岳文	高桢子	行台御史，广东廉访司佥事，入明为永平府通判		《元史氏族表》
木速忽里	西夏夏州人	太祖时选居宿卫，命掌膳事	从宪宗伐宋	《西夏书事》卷42，《元史·来阿八赤传》
来阿八赤	木速忽里子	先掌膳事，世祖时为益都等路宣慰使，征东宣慰使、都元帅，后迁胶莱海道漕运及湖广右丞	开运河、理漕运、征交趾有功	《元史·来阿八赤传》，《嘉靖青州府志》卷13
寄僧	来阿八赤子	为水达达屯田总管府达鲁花赤，迁雷州路总管	征乃颜、平黎蛮有功	《元史·来阿八赤传》
完者不花	寄僧子，弟秃满不花、也先不花及太不花	同知潮州路总管府事		《元史·来阿八赤传》
木速忽勒	河西人，居开封	夏兀纳城钤部官，归蒙古为淄州军民总管		《牧庵集》卷14
虎益	木速忽勒子，子文辉、文焕	世祖时为承事郎知万户府事，龙兴路达鲁花赤，历抚州、袁州、徽州三路，擢少中大夫	讨李璮，平南宋，送文天祥至京有功	《牧庵集》卷14
虎仪	益弟，子文郁、文灿、文炳	承务郎，提举崇明州盐场		《牧庵集》卷14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僧吉陀	唐兀嵬名氏	秃鲁哈必阇赤兼怯里马赤	迎太祖于不伦答儿哈纳之地	《元史·暗伯传》
秃儿赤	僧吉陀子	袭父职，宪宗时为文州礼店元帅府达鲁花赤		《元史·暗伯传》
暗伯	秃儿赤子	至元中领唐兀卫，兼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赠甘肃行省右丞，宁夏郡公，谥忠遂	使于阗、平乃颜有功	《元史·暗伯传》
阿乞剌	暗伯子	成宗时为知枢密院事		《元史·暗伯传》
亦怜真班	唐兀嵬名氏，[①]暗伯子	顺帝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陕西、甘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二年任南台御史中丞，湖广左丞相，封齐王，谥忠献	地方治理有善政	《元史·亦怜真班传》，《青阳先生集》卷4，《至大金陵新志》卷6
普达失理	亦怜真班子，兄答里麻，早死	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		《元史·亦怜真班传》
桑哥八剌	普达实理弟	同知称海宣慰司事		《元史·亦怜真班传》
哈蓝朵儿只	桑哥八剌弟	宣政院使		《元史·亦怜真班传》
桑哥答思	哈蓝朵儿只弟	岭北行省平章政事		《元史·亦怜真班传》
沙嘉室理	桑哥答思弟	岭北行省参知政事		《元史·亦怜真班传》
易纳室理	沙嘉室理弟	大宗正也可扎鲁火赤		《元史·亦怜真班传》
马的室理	易纳室理弟	佥书枢密院事		《元史·亦怜真班传》
马剌室理	马的室理弟	内八府宰相		《元史·亦怜真班传》
斡扎篑	西夏宁州人，[②]又作灵武人	世掌西夏国史，归蒙古后为中兴路管民官	曾为夏西凉府守臣	《元史·朵儿赤传》，《西夏书事》卷42

① （元）余阙：《青阳山房集》卷4《送归彦温使河西序》称："今皇帝（顺帝）用嵬名公为御史大夫，公乃历选朝著，尽拔名臣为廉访使"。（明）宋濂：《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传》："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尽选中外廉能之官，置诸风宪，一时号称得人"。故知嵬名公乃指亦怜真班。

② 西夏无"宁州"之建置，元代宁州为陕西宁县，在庆阳之南，不在西夏之境。疑此"宁州"为"西宁州"，或为"灵州"之音讹。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朵儿赤，字道明	斡扎箦子	世祖时中兴路新民总管，升潼川府尹，云南廉访使，文宗时任绍兴路总管	宁夏营田修河有功，于云南有善政	《元史·朵儿赤传》，《正德云南志》卷17，《雍正浙江通志》卷116
斡仁通	朵儿赤子	云南行省理问	天历二年抗云南叛王殁	《元史·朵儿赤传》，《正德云南志》卷17
斡玉伦图，字克庄，自号海樵	斡仁通子	登进士第，历奎章阁典笺，南台经历，至元七年为工部侍郎，迁山南廉访使，拜侍御史	修建宁路屏山书院，修《宋史》，有诗名，善书画	《元史·朵儿赤传》，《道园学古录》卷4、31、36、39，《至正金陵新志》卷6，《书史会要》卷7
斡朵忽都	朔方人①	武德将军，至元为高唐州达鲁花赤	任职内严公廨，新驿传，兴医学，置义阡	《嘉靖高唐州志》卷5，《万历东昌府志》卷6、20
斡赤，字善之	朔方人，妻铁理	武宗时为江西行省右丞，曾拜集贤大学士，后封宁朔郡王	治军实于幕府，自覃怀而入定内难	《道园学古录》卷22，《元行省宰相平章政事年表》
刘容，字仲宽	西夏西宁人，居云中；高祖阿华西夏臣，父海川	至元中权中书掾，后改秘书监，出为广平路总管	江西、广平有惠政	《元史·刘容传》
刘完泽，字完甫	西夏敦煌人，后居张掖；久居长安四子	唐兀右卫千户，至大拜监察御史，行台江南，除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副使，追彭城郡侯	有惠政长安建学斋为讲习之所	《道园类稿》卷29、42
刘伯温，又名沙剌班	完泽长子	至正三年拜秘书卿，太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浙江行省郎中十年，泽甘肃行中书省左丞	善制黄羊毛笔，善绘事，修《金史》，有《学斋吟稿》	《道园类稿》卷17、卷42，《赵氏铁网珊瑚》卷6，《夷白斋稿》卷15
观音奴	完泽次子，弟锁住，早卒	奉训大夫，刑部郎中		《道园类稿》卷42，《至大金陵新志》卷6
忙哥帖木儿	完泽幼子	从事郎，蒙古翰林院应奉		《道园类稿》卷42
唐兀海平	唐兀氏	世祖时任大同路总管		《道园类稿》卷42
师某	宁夏人，居濮阳；父某仕夏为管僧官，国中称大姓	不仕，以子赠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宁夏郡公	崇重儒术乡里号为“德人”	《柳待制文集》10，《正德姑苏志》卷40

① “斡朵忽都”及下之“斡赤”均为朔方人，朔方之地理概念虽与西夏相关，但无明证为西夏人。因“斡氏”为西夏大姓，故收录于此。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师克恭，字敬之，一名朵列秃	居濮阳；子恒、晋、升，三娶拜叶伦氏	历南台监察御史、浙西廉访副使、兵部侍郎，出牧平讧，选为京尹，泰定二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由兵部尚书出为淮东宣慰使		《柳待制文集》卷10
师脱脱木儿	居濮阳；克恭弟，娶乃蛮氏，子德宁、勃罗登，侄塔海	封承事郎，长垣县尹		《柳待制文集》卷10
师晋	克恭子	国子生，承事郎，同知泗州事		《柳待制文集》卷10
师升	克恭子	国子生		《柳待制文集》卷10
师孛罗登	脱脱木儿子	泰定元年进士，承事郎，同知浚州事		《柳待制文集》卷10
唐兀海牙		世祖任大同路总管		《乾隆大同府志》卷17
买术，字永锡	西夏人	起身宿卫，连佐省台，资善大夫，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监，万户		《东维子集》卷23
小丑	唐兀氏，居和林	成吉思汗赐名怯延兀兰，怯怜口行营工匠百户		《元史・朵罗台传》
塔儿忽台	小丑子	世袭为怯怜口行营工匠百户	征战有功	《元史・朵罗台传》
朵罗台	塔儿忽台子	世祖时为前卫亲军百户，芍坡屯田千户所达鲁花赤，昭信校尉	善业弓	《元史・朵罗台传》
阔阔出	朵罗台弟	大同路广胜库达鲁花赤，大同路诸军奥鲁劝农事，大德初升大同路武州达鲁花赤，拜监察御史、中大夫，大宁路总管		《元史・朵罗台传》《乾隆大同府志》卷10
脱欢	朵罗台子	监察御史，迁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四川廉访司佥事，枢密院都事，升断事官		《元史・朵罗台传》
常八斤	西夏人，居和林	以治弓见知于太祖		《弘治宁夏新志》卷2下，《辍耕录》卷2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唐括斡，字国贤	唐括氏，[①] 居真定；父德寿，子世享	太宗时为樊州管民官，至元九年迁裕州知州，后为襄樊新军总管	平宋有功	《嘉靖鲁山县志》卷9
谢睦欢	西夏丰州人	太祖攻西夏时降蒙占，从攻金有功，官太原路金银铁治达鲁花赤	劝夏兀剌城守将降	《元史·谢仲温传》，《元史·太祖纪》
谢仲温，字君玉	睦欢子	宿卫世祖，后擢平阳太原两路宣抚使顺德路总管、湖南、淮东等宣慰使	有善政	《元史·谢仲温传》
谢兰	仲温子，子李完	江州路达鲁花赤		《元史·谢仲温传》
王集	西夏灵武人，居庐州独山，其先山东东阿人	授武德将军，领兵上千户，镇庐州	从昂吉儿下江淮有军功	《友石山人遗稿》附录，《续修庐州府志》卷23，《虚舟集》卷5
也先不花	王集孙，少居庐州	袭千户，后为淮西宣慰副使		《友石山人遗稿》附录，《续修庐州府志》卷23
王翰，字用文，一名那木罕	也先不花子，子称、修、伟，居福州永福山	历庐州路治中改福州治中，福建、江西行省郎中、潮州路总管兼督循梅惠州	正直不阿，仁惠爱下，死不仕明，有《友石山人遗稿》	《闻过斋集》卷1，《友石山人遗稿》附录，《嘉靖广东通志》卷48
西卑	唐兀西壁氏，夏太傅西壁讹答后[②]	太祖时充博儿赤，金紫光禄大夫		《永乐大典》卷2806[③]
阿束	西卑子	世祖时充速古儿赤，授安远大将军，唐兀亲军副都指挥使，进奉国上将军	领唐兀卫三十一年	《永乐大典》卷2806
仙仙	阿束子	初充舍儿伯赤，元贞初授昭勇大将军，唐兀亲军都指挥使		《永乐大典》卷2806
三哥儿	仙仙弟	袭职唐兀卫，后改升甘肃省左丞		《永乐大典》卷2806

① 金之唐括即辽之唐古，即阿尔泰语之唐古特，亦即党项，故录之。

②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3《太祖纪》称“夏太傅西壁讹答”,（明）宋濂:《元史》卷1《太祖纪》称“太傅讹答”,《西夏书事》卷40称“太傅西壁氏”。“西壁”、“西卑”均为“鲜卑”之音转。

③ 《永乐大典》卷2806引《元史·西卑传》。按：今本《元史》无《西卑传》。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和实纳	仙仙子	袭职唐兀卫，积官昭武大将军	从安西王讨倒剌沙有功	《永乐大典》卷 2806
沙剌藏卜，一名屑耳	唐兀氏，一作伊吾儿氏，武威人，居庐州；父铣节，子余阑、沙剌八、洪保、余阙、福寿	官庐州		《元史·余阙传》，《元统元年进士录》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号青阳先生	沙剌藏子，长子德臣（德生）从死，次子渊甫入明为合肥著姓	元统元年进士同知泗川，应奉翰林文字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封夏国公，谥忠愍	修宋、辽、金史，以文学名，有善政，死节庐州，留《青阳先生文集》	《元史·余阙传》，《续修庐州府志》卷 58，《宋学士全集》卷 11，《草木子》卷 4
卜元吉	唐兀氏，居天台	以乡试副榜任庆元路翁州书院山长		《(民国）台州府志》卷 99
朵吉	河西人	赠荣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封秦国公、雍王		《元史·星吉传》，《宋学士全集》卷 18
搠思吉朵儿只	朵吉子	赠荣禄大夫，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封代国公，凉王		《元史·星吉传》，《宋学士全集》卷 18
搠思吉	搠思吉朵儿只子，子六人	事太祖、宪宗、世祖为怯里马赤，封邠王		《元史·星吉传》，《宋学士全集》卷 18
星吉，字吉甫	搠思吉第三子，子五人，从子伯不花，两妻蒙古人	顺帝时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江西平章政事，大都路达鲁花赤，宣政院使，追封咸宁王，谥忠肃	有善政，死节江西	《元史·星吉传》，《宋学士全集》卷 18
剌哈咱识理	星吉长子	荣禄大夫，利月监太卿		《宋学士全集》卷 18
答儿麻八	星吉次子	太中大夫，签辽阳行枢密院事		《宋学士全集》卷 18
达尔麻识理，赐名吉昌	星吉第三子，弟宝山、宝童	入明为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司副使		《宋学士全集》卷 18
述哥察儿	河西著族，父哈石，善战挚勇，太祖赐名拔都，母篾里吉氏	少入宿卫，宪宗时为浚州达鲁花赤，赠魏郡伯	从宪宗征战，治浚州有绩称："田野日辟，境内称治"	《正德大名府志》卷 10，《吴文正公集》卷 33，《述哥察儿墓碑》[1]

① 任崇岳：《元代〈濬州路达鲁赤述哥察儿墓碑〉考释》，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哈剌哈孙	述哥察儿子，母康里氏	大德中授承事郎、江西等处行省左右司都事，同知江州路总管府事，以汉阳知府致仕	读儒书，通文法	《正德大名府志》卷10；《吴文正公集》卷33，《浚县金石录》卷下
赫思	唐兀人，蒙古灭夏后迁居应昌	为弘吉剌部特薛禅之孙纳陈之部属，元统时，监济宁		《(道光)巨野县志》卷20
咬住	赫思子			《(道光)巨野县志》卷20
秃满台	咬住长子，子三人：长子伯颜察迩，次子仲儿，季子缺名，女四人	延祐二年任郓城县达鲁花赤，后升某州达鲁花赤，至顺二年升任济宁路达鲁花赤，从三品	任内兴学、劝农、治水有功	《(道光)巨野县志》卷20
睦里赤	咬住次子	为昭武校卫，管领济宁东平等处打捕鹰房诸色人匠等户总管府达鲁花赤，从三品		《(道光)巨野县志》卷20
设都戴尔	咬住三子	无宦绩		《(道光)巨野县志》卷20
八里颜	唐兀（台）氏	崇明州达鲁花赤	新建州儒学	《洪武苏州府志》卷47
大礼普化，字君宝	唐兀氏	许州达鲁花赤兼襄城		《嘉靖许州志》卷5
伯颜察儿，字林卿	唐兀氏，东平阳谷人	由蒙古胄监生官慈溪县主簿	劝富民捐赈，平抑粮价，赈恤饥民	《天启慈溪县志》卷15，《光绪慈溪县志》卷23
塔出	唐兀氏	文宗时任义乌县达鲁花赤		《万历金华府志》卷12，《嘉庆义乌县志》卷8
梁帖木儿	唐兀氏	金华府某县达鲁花赤		《万历金华府志》卷12
田厮	唐兀氏	元惠宗至元五年任昌平州达鲁花赤	劝农讲学平盗有政绩	《康熙昌平州志》卷20
那海	唐兀氏	至正十一年以奉议大夫同知山东路都转运盐使司事		《光绪利津县志·利津文征》卷2
王义	唐兀氏	泰定至正间任咸宁知县	修咸宁县公署	《乾隆西安府志》卷9
安普，字行之	唐兀氏	至顺进士，后任诸暨县通判		《乾隆诸暨县志》卷16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蒙古不花	唐兀氏，居河南新安县铁门镇水延村	无宦绩		《重兴新安洞真观碑》①
按弹不花	唐兀氏，居河南新安县铁门镇水延村	无宦绩		《重兴新安洞真观碑》
大不花	唐兀氏，居河南新安县铁门镇水延村	无宦绩		《重兴新安洞真观碑》
脱因	哈剌哈孙子	临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吉水州判官，江西行省宣慰使		《正德大名府志》卷10，《吴文正公集》卷33
纳嘉德	哈剌哈孙子	从事郎，泽州安化县达鲁花赤兼劝农事		《正德大名府志》卷10，《吴文正公集》卷33
教化	哈剌哈孙子	泰定四年进士，江州路瑞昌县达鲁花赤		《正德大名府志》卷10，《吴文正公集》卷33，《浚县金石录》卷下
福寿	唐兀人	长入备环卫，授长宁寺少卿，后任饶州路达鲁花赤，工部侍郎，监察御史拜户部尚书，淮南行省平章，同知枢密院事，至正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封魏国公，谥忠肃	仕多政绩，死节集庆	《皇明文衡》卷65，《元史·福寿传》，《重修安徽通志》卷137，《万历杭州府志》卷61
孟昉，字天昉	西夏人，一作河东人，盖唐兀氏也，居北平	由乡举得解，从事臬司宪部椽枢府进中书西曹，延祐时典国子监簿，至正中由翰林待制官南台御史	工书法，有文学名，有《孟待制文集》	《夷白斋集》卷22，《燕石集》卷15，《傅与砺文集》卷4
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先生	西夏人，居无锡；十世祖硕仕西夏	处士	以画闻名	《清秘阁集》卷11
失剌唐兀台	河西宁夏人，父失刺，封夏国公，母米卜氏	世祖时为太子亲信，赠推忠翊戴功臣，太傅，追封夏国公，谥康靖		《道园学古录》卷16、卷42

① 政协新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新安散存石刻辑录》，2003年，第12—14页。参阅王俊伟、周峰：《元代新安县的西夏遗民》，载《薪火相传——史金波先生七十寿辰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9—137页。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杨朵儿只，又名文钊	失剌唐兀台子	仁宗时为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御史中丞，封夏国公，谥襄愍	敢于直言，弹劾权臣不法，为铁木迭儿害死	《元史·杨朵儿只传》，《道园学古录》卷16、42，《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①]
杨不华	朵儿只长子	以荫补司提点，转签河东廉访司事，文宗时除通政院判，赠礼部尚书	在河东有善政，死于陕西兵叛之中	《元史·杨教化传》，《道园学古录》卷16、42
杨文殊奴	朵儿只次子	监察御史		《元史·杨教化传》，《道园学古录》卷16、42
杨教化	朵儿只兄	武宗时拜正议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江南湖北道廉访使，后为将作院使，夏国公，谥襄敏	迎武宗归有功	《元史·杨教化传》，《道园学古录》卷16、42
杨衍饬	教化子	儒林大夫，至元六年任南台监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遗风	《元史·杨教化传》，《至正金陵新志》卷6
杨双泉	西夏人，居苏州	都水庸田使	寓所有“云水亭”	《夷白斋稿》卷27
张翔，字雄飞	唐兀氏，河西人	延祐首科进士，元统三年南台监察御史，至元三年南台都事，历浙东道、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	有诗名，留有《张雄飞诗集》	《至正集》卷33，《元诗选癸集》，《至正金陵新志》卷6，《升庵集》卷59
张讷	西夏人，居保定	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官中台	后弃官不仕，至元起义学于其家	《申斋文集》卷6
杨亦执里不花	西夏人	延祐间为行台御史，由户部尚书拜治书侍御史，陕西行省左丞，宣政院使，监河西宪监宪	河南、河西有德政，夏人被其泽	《至正集》卷31
迈里古思，字善卿	西夏武威人，姓吴氏，居松江；曾祖忽难，祖也失迭，父别古思	至正十四年进士，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历江东宪府事，赠江浙枢密院事，封西夏侯，谥忠勇	通《诗》、《易》二经，治绍兴有政绩，死于萧拜住之手	《元史·迈里古思传》，《辍耕录》卷10，《东维子集》卷24、31，《九灵集》卷13

①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观音奴，字志能	唐兀人，居新州	泰定四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广西廉访司经历、南台监察御史，知归德府，后升都水监官	治归德有政绩，号为良吏，有诗名	《元史·观音奴传》，《雁门集》卷5，《元诗选癸集》，《至正金陵新志》卷6，《傅与砺诗集》卷7
周喜同	河西人	初为后宫卫士，顺帝时充承徽寺经历，再调南阳县达鲁花赤，赠南阳判官	战死南阳，一家死节二十余人	《元史·喜同传》
塔不台，字彦晖	唐兀氏，居聊城；祖朱沙，敦武校尉，父认管你，忠翊校尉	元统元年进士，襄阳路录事司达鲁花赤	为元死节	《元史·喜同传》，《元统元年进士录》上
丑闾，字时中	唐兀氏（一作蒙古氏）；妻侯氏赠宁夏郡夫人	贯昔宝赤身役，元统元年进士，累官京畿漕运副使，出知安陆府，赠河南行省参知政事	至正十二年战死安陆	《元史·丑闾传》，《元统元年进士录》上，《伊滨集》卷8
景福，字仲祯，后名福大全	丑时中次子	至正十八年福建行省理问，后升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后削发为僧		《梧溪集》卷4下，《玩斋集》卷9
大慈都	唐兀人	武宗时遥授参知政事，行詹事丞，加平章军国重事		《蒙兀儿史记》卷10
文伯要斛	河西人	中大夫，仁宗时任镇江总管兼管内劝农事，延祐五年除宣政院副使		《至顺镇江志》卷15
脱脱，字子安	西夏敦煌人	黄岩州判宫，迁官余姚州达鲁花赤	有惠政	《万历绍兴府志》卷37
脱脱	唐兀氏	天历元年任南台监察御史，元统元年进南台经历		《至正金陵新志》卷6
李琏赤	唐兀氏，居濮州鄄城	山东宣慰司副都元帅、明武将军		《道园学古录》卷40
李阿荣	琏赤子，子黄头、山住	世祖时，山东道宣慰司副都元帅迁汀州总管，同知邵武路事，转德庆路总管	有惠政	《道园学古录》卷40
李黄头，别名世雄	子九人：哈剌、脱脱木儿、元童、别帖木、保童、乃蛮歹、和尚、安童、赵安	先为大冶县达鲁花赤，延祐元年擢海道都漕运副万户，都万户，怀远大将军，郴州路达鲁花赤，除昭毅大将军，平江路达鲁花赤	管元海道漕运有功	《道园学古录》卷40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李朵罗歹	黄头从弟	京畿广衍仓使		《道园学古录》卷 40
李保童	黄头子	抚州路崇仁县达鲁花赤，承直郎		《道园学古录》卷 40，《嘉靖抚州府志》卷 8
李元童	黄头子	承直郎，平江路长州县达鲁花赤		《道园学古录》卷 40
脱脱，字清卿	唐兀氏	至正间为都水大监		《金台集》卷 1、2
丑闾	唐兀氏	至元五年任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 6
六十，字子约	唐兀氏	濠州同知，南平、浦城二县达鲁花赤，南阳府同知、归德知府、监察御史，至正平江路达鲁花赤	于平江路兴修佛寺，有惠政，漕运有功	《夷白斋稿》卷 12、27，《正德姑苏志》卷 3
李闾伯[①]	西夏宁州人，后徙大同，祖天祐，父昌、兄安、弟绢，子四人	幼入宿卫，至元十七年授武略将军、太原路坚州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总制宣政、隆禧、崇祥院，至大时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资政大夫，封陇西郡公	长子知雅州，次子为宝具库达鲁花赤	《巴西集》卷下，《雍正浙江通志》卷 116
木八剌沙	西夏人，祖某，仕元为平章	至正时任两浙盐运使司同知	于嘉禾有善政，于上都屯田有效绩	《东维子集》卷 23，《元史·世祖纪》，《万历杭州府志》卷 9，《正德姑苏志》卷 4
忽剌出	唐兀氏	银青荣禄大夫，湖广省丞相		《至正昆山郡志》卷 2
彻里帖木儿	忽剌出子	中奉大夫，湖广省参知政事		《至正昆山郡志》卷 2
勃罗帖木儿，字存中，号一斋	彻里帖木儿子	奉训大夫，武备寺丞，历大府监提点，至正时昆山州达鲁花赤	开河道，修庙学，劝善爱民	《至正昆山郡志》卷 9
永年	西夏人	曾为饶州路总管，又历台省，至正时由淮南行省平章任江南等处行御史大夫	饶州任上有惠政，抗击义军有功	《夷白斋稿》卷 20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巴西集》及清抄本《巴西邓先生文集》均作“李口口”，缺名。查（清）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 116《职官》6，元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有二李姓，一为李嘉宾，但其任浙江参政为顺帝时，不合；二为李闾伯，方志称其任职时间“未审其次”，故疑与《巴西集》中李公为同一人。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三旦八，字山堂	西夏人	官至甘肃、淮南平章，云南行省右丞，至正十二年迁江浙平章	属下有“飞山子”铁甲兵，平南方义军有功	《铁崖文集》卷2,《存复斋集》卷7,《万历云南通志》卷9
鲁宗岱，号云岩	西夏贵族	昆山州通判	廉公仁爱，大得民和	《铁崖文集》卷5
沙览答里	河西人，姓路氏，居大同	南台御史大夫，至正二十五年进中书平章，二十七年进左丞相		《嘉靖宁夏新志》卷2,《万历朔方新志》卷3,《元史·顺帝纪》
黑厮	唐兀氏，居保定	至元时，由内史府咨议出任保定路总管	劝农兴学治蝗，有政绩	《弘治保定郡志》卷9
赫斯	西夏人	至正时为旌德县达鲁花赤	有惠政	《贞素斋集》卷2
阿尔长普	西夏人	顺帝时安庆路达鲁花赤		《青阳先生文集》卷3
拉吉尔威	河西姑臧人，姓史氏，父持持理威，夏臣	宿卫太祖，谥敬简，赠服勤翊武功臣		《牧庵集》卷26
算智尔威	拉吉尔威子，妻乌纳氏，子五人	世祖时为蒙古唐兀军民达鲁花赤，云南行省右丞，赠太师，上柱国，谥忠宣	平云南诸国及讨漠北叛王有功	《牧庵集》卷26,《元史·仁宗纪》
乞台普济	算智尔威次子，子三人，孙十七人，曾孙六人①	历世祖、成、武、仁三宗，官至中书平章，左丞相、右丞相，进太子太师，封庆国公，进安吉王	海山保育人，随武宗平叛及助武宗即位均有大功	《牧庵集》卷26,《元史·仁宗纪》
日尔塞	算智尔威四子	荣禄大夫，宣政院使，甘肃释教都总统		《牧庵集》卷26
阿剌普济	算智尔威长子	荣禄大夫，司徒，都元帅		《牧庵集》卷26
昂吉	算智尔威三子	荣禄大夫，司徒，授平章政事		《牧庵集》卷26
托罗台	算智尔威五子，子乌尼尔威、珠特尔威	管军千户	早卒	《牧庵集》卷26

① （元）姚燧:《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算智威尔之孙:达实和尔布、伦图尔威、塔海、诺海、都迪尔威、伊齐特穆尔等，其余不载。曾孙:额尔吉纳威、玖哲尔威、布都尔威、单尔齐、阿鲁珲、彻尔济勒尔威等。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额尔济纳	乞台普济子	武宗时为唐兀亲军都指挥使，拜御史大夫，授中书左、右丞相，历武、仁、英、泰定、文五朝，四次任知枢密院事	镇漠北，迎立武宗，镇云南有功	《牧庵集》卷26，《蒙兀儿史记》卷121
哩日	乞台普济子	武宗时授资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兼将作院使	镇漠北，迎立武宗有功	《牧庵集》卷26，《蒙兀儿史记》卷121
尔禄	乞台普济子	幼为沙门，后授正议大夫，签宣政院事		《牧庵集》卷26
达实和尔布	额尔济纳子	虎符管军万户		《牧庵集》卷26
也儿吉尼，字尚文	唐兀氏；子不花帖木儿	至元时为内台御史，历浙西宪、中政院判，广西廉访使，湖广行省平章，广西平章	死节广西	《永乐大典》卷2343，《至正金陵新志》卷6，《万历广西通志》卷24
吉祥，字文卿	西夏人，居洛阳	官湖南茶陵	谢官居洛阳	《夷白斋稿·外集》
五十六，字正卿	唐兀氏	至正二十五年，由签将作院事迁秘书大监		《元秘书监志》卷9
埜仙普化，字有恒	唐兀氏，居德州；曾祖木念兹，祖驴儿，父黑口子探马赤军户	元统元年进士，大名路滑州判官		《元统元年进士录》
桑节	河西人	仁宗时历官南台御史大夫，历湖广、江西等省平章，召为大司农	为政公廉，死节江州	《甘肃新通志》卷35，《明一统志》卷37
哈答儿	唐兀氏，居成安；祖业母，父唐兀歹	成安县达鲁花赤		《元统元年进士录》
买住，字从道	哈答儿子，居广平	元统元年进士，保定路同知安州事，松阳县达鲁花赤	有政绩，有诗名	《元统元年进士录》，《元诗选癸集》，《光绪处州府志》卷14
野仙	唐兀氏	至元二十九年以武略将军为莫州路达鲁花赤	惩暴安民，捐俸助婚，有善政	《嘉靖河间府志》卷17，《乾隆任邱县志》卷7
埜仙，字若思	唐兀氏	至正间为柘城县主簿		《嘉靖柘城县志》卷4、5、9
伯颜，字鲁卿	唐兀氏，居成都温江；曾祖剌真，祖秃弄歹，父赫闾，蒙古军户	元统元年进士，授崇庆州同知，至元时，为奉化州达鲁花赤		《元统元年进士录》，《至正四明续志》卷2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伯颜，号谦斋	唐兀氏，居嘉兴崇德	至正十二年为黟县达鲁花赤	死节	《山居新话》
伯颜	河西人	至元二十九年任镇江路同知	病卒	《至顺镇江志》卷15
明安达耳，字士元	唐兀氏，居曹州；曾祖军儿，祖传思郎，父囊加台，子桂山海牙	元统元年进士，授宿州判官，迁潜江县达鲁花赤	死节	《元史·忠义传》，《元统元年进士录》
明安达儿	唐兀氏	天历初为真州达鲁花赤		《隆庆仪真县志》卷5
也先帖木儿	唐兀氏	至元二年任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伯帖木儿，字冲霄	唐兀氏	安岳县达鲁花赤		《万历潼川府志》卷11
达石帖木儿	宁夏人	天历间为南乐县达鲁花赤，后官刑部侍郎	有善政，工诗	《正德大名府志》卷6，《正统大名府志》卷5，《元诗选癸集》
明安帖木儿	唐兀氏	至正五年为赞皇县达鲁花赤		《嘉靖真定府志》卷4、24，《畿辅通志》卷69
也怜帖木儿，字文卿	唐兀氏	浙西廉访司经历		《东维子集》卷12
彻彻帖木儿	唐兀氏	至正二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哈剌，字友文	唐兀氏	元统三年南台监察御史，至正间为信州路达鲁花赤，后任中书参知政事	尊尚儒雅，事上驭下俱中礼	《至正金陵新志》卷6，《梧溪集》卷3，《嘉靖江西通志》卷11，《同治广信府志》卷6
伯颜，字清斋	唐兀氏，大同人，居案安	至正末以省镇抚调任崇安县尹	理军治民平叛	《弘治建宁府志》卷11，《闽书》卷56
拜帖木儿	唐兀氏		有诗名	《元诗选癸集》
贺庸，号野堂	武威人，明初侨寓兴化	累官至弘文馆，曾授经余阙，以教授为业	有《野堂集》	《元诗选癸集》
明安帖木儿	唐兀氏	至正间授庄浪同知		《五凉全志》卷5
阿拉威	河西人	大德初授富州达鲁花赤		《万历南昌府志》卷15
宝宝，字子约	唐兀氏	钟离县达鲁花赤	廉洁，有善政	《成化中都志》卷6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伯牙兀歹	河西人	至元十四年丹徒县达鲁花赤		《至顺镇江志》卷16
刘伯牙吾歹	河西人	大德三年丹徒县主簿		《至顺镇江志》卷16
久住，字仲义	唐兀氏	先任处州龙泉县主簿，至大四年任镇江路判官	以家财倡修城隍庙	《光绪处州府志》卷26，《至顺镇江志》卷15
札忽儿歹	河西人	至元二十年为宁都县达鲁花赤	有善政	《万历宁都县志》卷4
殳城卜	宁夏灵州人；子冯答兰帖木	仕元至国公	降明	《嘉靖宁夏新志》卷3
桑哥实理，字仲凯	唐兀氏	至正二十四年任秘书监丞		《元秘书监志》卷9
美里吉台，字洪范	唐兀氏	至顺元年进士，四年任秘书监校书郎，至正六年任西台御史		《元秘书监志》卷9，《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下
蒙古歹	唐兀氏，居温州路永嘉县	管库甘刑官，千户		《丹崖集》卷8，《弘治温州府志》卷13
探马赤	蒙古歹子	为福建罗源县令		《丹崖集》卷8
僧家奴	探马赤子	明州鄞县为史		《丹崖集》卷8
昂吉，字启文，姓高氏	僧家奴子，居太平，子喜同	至正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绍兴路录事参军迁池州录事，信州路贵溪县丞、福建行省检校官	有诗名，留《启文集》	《草堂雅集》卷10，《吴中人物志》卷10，《万历绍兴府志》卷10，《元诗选》3集《丹崖集》卷8
安笃刺	唐兀氏，居滕州邹县；祖□□儿赤，父公安	元统元年进士，授卫辉路辉州判官		《元统元年进士录》
论卜	河西人	仕元至司徒平章	元末守宁夏	《嘉靖宁夏新志》卷2
必申达儿，号樵隐	唐兀氏，居济南	文宗时为艺林库提点，至元六年迁南台监察御史	有诗名	《道园学古录》卷3，《至正金陵新志》卷6，《元诗选癸集》
山马	唐兀氏	任澧州同知	有治绩	《隆庆岳州府志》卷13
朵儿只	西夏人	曲沃县监，承事郎	为政宽爱	《成化山西通志》卷8，《嘉靖曲沃县志》卷4
天祐	唐兀氏	泰定元年甲子科进士，后至元六年任新城县达鲁花赤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顺昌	唐兀氏	泰定二年南台监察御史，至元四年浙东廉访副使		《至正四明续志》卷1，《至正金陵新志》卷6
世式	唐兀氏	至元三年南台监察御史，承德大夫		《至正金陵新志》卷6
添受	唐兀氏	至大四年任丹徒县达鲁花赤，昭信校尉		《至顺镇江志》卷16
胆八	唐兀氏	元统三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脱因不花	西夏人	至元十五年高平县尹		《万历泽州志》卷5
药僧，字子元	唐兀氏	至正十八年自中书任稷山县达鲁花赤		《正德绛州志》卷4，《万历平阳府志》卷6
庆喜	唐兀氏	泰定四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唐兀台	唐兀氏，世居宁夏路贺兰山，又称武威人	乙未，从皇子南征	征金、宋有功	《述善集》卷3①
闾马	唐兀台子，后移居开州濮阳	至元间充蒙古侍卫亲军百夫长，赠敦武校尉	征宋有功，参加襄樊之战	《述善集》卷3
杨忠显，又名达海	闾马子	忠显校尉：左翊蒙古侍卫百户长		《述善集》卷3
杨崇喜，又名唐兀崇喜，字象贤	达海长子，子理安	国子上舍生，左翊蒙古侍卫百户长，至正末输米五百担草万担以助国用	重文教，于濮阳官人寨建“崇义书院”	《述善集》卷3，《嘉靖开州志》卷6及卷9
杨卜兰台，字敬贤	达海次子，子从安	任塔塔里军屯田万户府百户、敦武校尉	攻习儒书及蒙古文字，通农务知水利	《述善集》卷3
杨镇花台	闾马次子	任塔塔里军民万户府百户、敦武校尉		《述善集》卷3
杨塔哈出，字齐贤	镇花台子，子保童、祐童	任塔塔里军民万户府百户、敦武校尉		《述善集》卷3

① （元）杨崇喜：《述善集》卷3《唐兀公碑》，见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7—152页。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杨闾儿	闾马第三子，子换住（思贤）、留住（继贤）、教化（居贤）、伯颜（希贤）、春兴（尚贤）、禄僧（世贤）	任左翊蒙古侍卫令史		《述善集》卷3
杨当儿	闾马第四子，子帖睦、不老（绍贤）、脱脱、广儿、野仙普化			《述善集》卷3
杨贴睦，字师贤	当儿子，妻乃蛮氏，子四人：冀安、卫安、奈儿、芦安			《述善集》卷3
杨冀安	贴睦子	以军功除固始县达鲁花赤		《述善集》卷3
杨广儿，又名伯颜普化，字志贤	当儿子，子关住	国子生，至正四年授进义校尉，洛宁路金乡县务司提领		《述善集》卷3
杨野仙普化，又名奈惊，字惟贤	当儿子，子哈剌	敦武校尉，长芦盐运司利民司令		《述善集》卷3
杨买儿	闾马第五子，妻乃蛮氏，子拜住			《述善集》卷3
道童，字德章，号贺兰逸人	唐兀氏	至正中由工部尚书出为江东廉访使，后为江西行省平章[1]		《万历宁国府志》卷14，《十驾斋养心录》卷9，《元史·亦怜真班传》
朵儿只班	唐兀氏	至元元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完者不花，字仲美	唐兀氏	至正二十一年任秘书监奏差		《元秘书监志》卷11
札忽儿歹	河西人	至元二十年为宁都达鲁花赤	有善政，民立生祠	《嘉靖赣州府志》卷8
甘立，字允从	河西人，居陈留	官至奎章阁照磨，中书检校	有诗名，善书法，存《甘允从集》	《书史会要》卷7，《元诗选二集》
孛鲁合答儿	河西人	阿里海牙节制下军官		《元史·世祖纪》

① 《元史·亦怜真班传》有江西行省平章道童，疑即此道童。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邬密公	西夏人，居苏州			《夷白斋稿》卷28
塘乌氏	西夏人，子桓勇都尉，弟袭万户	世祖时为云中郡伯、封万户	从世祖征讨有功	《伊滨集》卷21
董氏	河西贵族，居扬州		与河西李氏、高氏为婚姻	《九灵集》卷14
李彦辉	唐兀氏，西夏贺兰人	濮州嘉禾堂主		《述善集》卷3
李彦国，又唐兀彦国，字伯都	唐兀氏，居濮州	国子上舍生，濮阳监邑，密州儒学正，崇义书院主讲席	燕南名进士	《述善集》卷2
刘让	西夏人	濮阳通判		《述善集》卷2
重福	唐兀氏，江西乡贡进士	延祐二年以嘉议大夫任广西廉访使	长于政事，所至有能声	《嘉靖广西通志》卷5，《元史氏族表》，《嘉庆临桂县志》卷13
溥华	重福子	领江西省廷祐间进士第五名		《嘉庆临桂县志》卷13
阿赤	河西人	天历元年金坛县达鲁花赤		《至顺镇江志》卷16
阿都赤	河西人	至元元年丹徒县达鲁花赤		《至顺镇江志》卷16
恩宁普，字德卿	唐兀氏，西夏名族	历浙东宣慰使，至正十四年江浙参政，迁福建右丞，除福建行台御史大夫		《木纳斋集》卷3，《经济文集》卷6，《万历杭州府志》卷9，《雍正浙江通志》卷116
阿阙	西夏人，后居汴梁路鄢陵县	吏员出身，授奉训大夫中卫千户所知事		《嘉靖内黄县志》卷5
安住	阿阙子	泰定元年进士，泰定三年为内黄县达鲁花赤，授承事郎	有善政，民立碑	《嘉靖内黄县志》卷5，《中州金石考》卷4
泼皮	唐兀氏	泰定四年任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李罗	唐兀氏	泰定二年南台监察御史	顺帝时从福寿守集庆路	《至正金陵新志》卷6，《元史·福寿传》
剌思八朵儿只	唐兀氏	至正三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李赏哥	唐兀氏，传为夏末帝晛子，子梅的古，孙管吉禄	入元为岐王府官，以金吾官守宁夏，后驻西宁，封鄗善王		《会宁伯李公神道碑》，《高阳伯公墓志铭》①

① 两碑均收入《西夏李氏世谱》中，参见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一》，载《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李南哥	管吉禄子，先居灵州，后居西宁	元末任西宁州同知，洪武初归明		《金文靖公集》卷9，《陇右金石录》卷2
张长吉，字彦忠	西夏人，居华亭	至正间进士，授宣城录事	后弃官教授	《梧溪集》卷4、6
唐兀君	唐兀氏，居镇原州	致和初迁承务郎，为真定路获鹿县监	宽流亡，节浮贾，劝农劝学，尊礼师儒有德政	《嘉靖获鹿县志》卷8
囊加歹	唐兀氏	至元中为永城县达鲁花赤	兴学劝农，抑制豪强，有德政	《成化河南总志》卷4，《嘉靖永城县志》卷7
火失不花	河西人	至元二十九年镇江路通政院同知		《至顺镇江志》卷17
弘家奴	唐兀氏	至元四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完泽，字兰谷	唐兀氏	至元中为永城县达鲁花赤，后为平江路一字翼万户府万户	廉谨尚义，尤工于诗律	《西湖竹枝集》，《元诗选癸集》
燕不花，字孟初	河西张掖人		有诗名	《辍耕录》卷28，《元诗选癸集》
忽都答儿	唐兀氏，居镇江	承德郎，任广德路判官		《至顺镇江志》卷19
朵歹	唐兀氏	元统三年南台监察御史		《至大金陵新志》卷6
捏古伯	唐兀氏	至元间从征日本，后屯田辽东复州		《辽东志》卷5，《全辽志》卷4
同口	唐兀氏	至正国子生，中副榜		《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下
仲保，字斯道	唐兀氏	至正国子生，中正榜		《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下
嵬的	西夏人①	顺帝时为甘肃行省右丞	至正十四年讨捕西番	《元史·顺帝纪》
何伯翰	西夏人，居杭州，祖息简礼，父益怜质班	杨维桢弟子，为元举人	通春秋三传毛氏诗，尤长于《易》，编《古乐府集》	《东维子集》卷1、8
方显祖，字子谦	唐兀氏，又作女真人	曾任金华诸暨县尹		《乾隆绍兴府志》卷27

① “嵬”为党项姓。史金波等：《文海研究》13·231条：“此族姓‘嵬’之谓也。”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赵德平	河西唐兀人，世居开平	泰定三年领乡举，业儒		《存复斋续集》
刘炜，一名忙古解	河西人	嘉议大夫，至元二十三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兼府尹		《至顺镇江志》卷15
刘中守	西夏人	由郡文学辟东曹掾，累官宣文阁博士、工部员外郎、福建廉访司佥事	善书，参修《经世大典》	《玩斋集》卷6
九住哥	唐兀氏	至正元年任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偰偰斯	河西人[①]	元末知嘉定州	以全城降明	《正德姑苏志》卷41
李朵儿赤	河西人	大德八年至十二年任平江府总管		《正德姑苏志》卷3
脱忽脱	河西兀剌海牙氏	黄岩州同知，后至元三年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		《正德松江府志》卷23
答哈	河西宁夏人	泰定中任海北广东廉访使，致和元年以嘉议大夫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使		《大德南海志》卷9，《嘉靖广西通志》卷5
买诺	西夏人	至元六年由大鸿胪乡出任荆湖北道宣慰司使		《燕石集》卷12
陈子恒	唐兀氏	至元间任河南荥县尹	筑黄河堤，有善政	《成化河南总志》卷4
朵朵	唐兀人	至正九年以朝列大夫任广西廉访副使		《嘉靖广西通志》卷5
也速迭儿	河西人	仕元至廉访使		《弘治宁夏新志》卷下
李察罕	河西人	至顺二年金坛县达鲁花赤		《至顺镇江志》卷16
帖木儿不花	唐兀氏	至元二十四年南台监察御使，元统三年南台架阁库管勾		《至正金陵新志》卷6
也先不花	唐兀氏	奉议大夫至二年任南台监察御史		《至正金陵新志》卷6

① （明）王鏊：《正德姑苏志》卷41《宦迹》称“偰偰斯”为河西人，称“偰斯”为高昌人，尚衍斌认为偰偰斯即偰斯，为一人，参见尚衍斌：《元代畏吾儿研究》第7章，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唐兀带	唐兀氏	至元十九年以参知政事镇守黄州、建康、江陵、池州、兴国		《乾隆池州府志》卷26
唐兀歹	唐兀氏	至元间为鄜县县尹		《宣统鄜县志》卷4
唐兀那怀	唐兀氏	至正时任溧阳州同知		《至正直记》卷1
唐兀公	唐兀氏	文宗时官左司	与程钜夫、野云廉公为友	《雪楼集》卷13
忙哥帖木儿	唐兀人	宣武将军，至正四年任抚州府达鲁花赤		《弘治抚州府志》卷17
山马	西夏人	岳州同知	有治行	《弘治岳州府志》卷10
观音保	唐兀氏			《景泰云南志》卷6
安僧	西夏唐兀氏	朝请大夫、翰林修撰		《同治番禺县志》卷30
文殊奴	唐兀氏，居甘肃	元末任云南□□路达鲁花赤		《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
祖师保各	唐兀氏	官桂林宪司		《嘉庆临桂县志》卷2，桂林石刻《孔子造像记》①
常公，号方壶	西夏名族	未曾仕宦，四方云游，以为神仙中人		《樗隐集》卷4
那征大德李	西夏僧	元皇使都勾管作	成宗时主持刻印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
杨□正，号静隐	西夏贵族	壮年登显宦，后隐		《蒲室集》卷13
智妙酩布	西夏人	大都寺庙僧人		《居庸关过街塔六体文石刻》②
冲卜	西夏人，弟监藏班臧卜	文宗时任西夏僧总统，封国公	卒于天历二年，弟袭职	《元史·文宗纪》
都罗乌□吃铁木尔	西夏人，居保定	仁宗时为枢密院知院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
杨琏真伽，号永福大师	西夏僧	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	发南宋诸陵，以宋帝遗骨建塔	《宋遗民录》卷6，《延祐四明志》卷18，《癸辛杂识别集》卷上

① 桂林文管会编：《桂林石刻》之《孔子造像记》，第368页。

②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2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0—103页。

续表

姓名字号	族称、居地、世次	职官、爵位、谥号	主要事迹	史料来源
杨暗普	真伽子	世祖时由宣政院使出为江浙左丞，仁宗时封秦国公	任宣政院使职二十余年	《元史·世祖纪》，《元史·仁宗纪》
杨慧觉，又名一行慧觉	河西姑臧人，父西夏显官	先为贺兰山云岩谷慈恩持护国法师，后为河南僧录，赐宗密圆融大师之号，封释源宗主	于凉州建寿光、觉海二寺	《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①
冯某	河西僧，其子亦为僧，居杭州	与杨琏真伽同里同学	参与杨髡发掘江南坟墓事	《遂昌杂录》
胆巴	河西僧	大德间与帝师并驾	善对	《山居新话》
三宝	河西僧，居杭州		在杭州钱塘门叠石为西番塔	《遂昌杂录》
史福胜，名省吉巴，号妙峰	唐兀氏，夏僧			《常山贞石志》卷24
惠广	河西僧			《存复斋文集》卷7
查巴达	西夏僧，居藏地，父崩德，子多吉衮坡，孙南喀甸巴	世祖时，取得宝印及司徒之职，世袭萨迦本勤之职	建北部昂仁寺	《西藏王臣记》
惠善	西夏人	西夏仁王院僧	至元八年到丰州	《丰州万部华严塔题记》②
永济尚师	河西人	西夏释氏祖师	通五学	《弘治宁夏新志》卷下
黑禅和尚	河西人		通禅观之学	《弘治宁夏新志》卷下

① 赵振华：《元朝白马寺释源宗主塔铭考》，载《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李灿、侯浩然：《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生平、著述新探》，载《西夏学》第6辑，2010年。

②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2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0、103页。

征引文献版本*

一、古人著作

《逸周书》1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战国〕荀况，《荀子》20卷，四部丛刊本。

〔东汉〕王符，《潜夫论》10卷，四部丛刊本。

〔汉〕司马迁，《史记》13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汉〕班固，《汉书》10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南朝〕范晔，《后汉书》12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西晋〕陈寿，《三国志》65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房玄龄，《晋书》13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梁〕沈约，《宋书》10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梁〕萧子显，《南齐书》59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姚思廉，《梁书》56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姚思廉，《陈书》36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齐〕魏收，《魏书》13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李百药，《北齐书》5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令狐德棻，《周书》5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魏征，《隋书》85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李延寿，《南史》8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

* 书中征引论文不另注录，参见各文脚注。

〔唐〕李延寿，《北史》10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后晋〕刘昫，《旧唐书》20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225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15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74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脱脱，《宋史》496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脱脱，《辽史》116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脱脱，《金史》135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宋濂，《元史》21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257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536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后魏〕崔鸿，《十六国春秋》16 卷，四部备要本。

〔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100 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294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30 卷，四部丛刊本。

〔元〕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12 卷，资治通鉴大全本。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22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

〔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60 卷，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

〔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200 卷，清光绪十九年广雅书局本。

〔唐〕杜佑，《通典》200 卷，万有文库本。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16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嵇璜，《续通志》527 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郑樵，《通志》200 卷，万有文库本。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384 卷，万有文库本。

〔宋〕王溥，《唐会要》100 卷，丛书集成本。

〔宋〕王溥，《五代会要》30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200 册，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王称，《东都事略》130 卷，台湾文海书局影印本。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1000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130卷，适园丛书本。

〔宋〕李昉编，《文苑英华》1000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李昉编，《太平御览》1000卷，四部丛刊本。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30卷，适园丛书本。

〔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一作《宋九朝编年备要》）3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25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15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宋〕徐自明编，《宋宰辅编年录》2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佚名，《宋大诏令集》196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文海书局影印本。

〔宋〕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10卷，四库存目丛书本。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刻本。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丛书集成本。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27卷，扫叶山房本。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4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小岘山房本。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40卷，守山阁丛书本。

〔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20卷，四部丛刊本。

〔元〕佚名，《宋史全文》36卷，台湾文海书局影印本。

〔隋〕杜宝，《大业杂记》不分卷，续谈助本。

〔唐〕李筌，《太白阴经》8卷，墨海金壶本。

〔唐〕林宝，《元和姓纂》10卷，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本。

〔宋〕司马光，《稽古录》20卷，四部丛刊本。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1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2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22 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万历本。
〔宋〕邵思，《姓解》3 卷，丛书集成本。
〔宋〕曾布，《曾公遗录》残存 3 卷，藕香零拾本。
〔宋〕田况，《儒林公议》2 卷，丛书集成本。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78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宋〕熊克，《中兴小纪》40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宋〕沈括，《梦溪笔谈》30 卷，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宋〕魏泰，《东轩笔录》3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王应麟，《玉海》20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212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吕祖谦编，《宋文鉴》150 卷，万有文库本。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4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欧阳修，《归田录》2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龚鼎臣，《东原录》1 卷，稗海本。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4 卷，丛书集成本。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1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王巩，《闻见近录》1 卷，知不足斋本。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3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20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宋〕庞元英，《谈薮》不分卷，说郛本。
〔宋〕顾文若，《负喧杂录》不分卷，说郛本。
〔宋〕李上交，《近事会元》5 卷，说郛本。
〔宋〕张师正，《倦游杂录》1 卷，说郛本。
〔宋〕范镇，《东斋记事》6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苏辙，《龙川略志》10 卷，又《龙川别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6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1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庄绰，《鸡肋篇》3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洪迈，《容斋随笔》74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宋〕曾慥，《类说》60 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王巩，《甲申杂记》1卷，知不足斋本。
〔宋〕王易，《重编燕北录》1卷，说郛本。
〔宋〕武珪，《燕北杂记》1卷，说郛本。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15卷，丛书集成本。
〔宋〕岳珂，《桯史》15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辛弃疾，《南渡录》4卷，上海广益书局碑本。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12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1卷，丛书集成本。
〔宋〕洪皓，《松漠纪闻》2卷，丛书集成本。
〔宋〕张师颜，《南迁录》1卷，丛书集成本。
〔宋〕程大昌，《演繁露》22卷，丛书集成本。
〔宋〕叶实，《坦斋笔衡》1卷，说郛本。
〔宋〕康与之，《昨梦录》1卷，说郛本。
〔宋〕上官融，《友会丛谈》3卷，说郛本。
〔宋〕孔平仲，《谈苑》4卷，涵芬楼秘笈本。
〔宋〕太平老人，《袖中锦》1卷，学海类编本。
〔宋〕赵起，《种太尉传》1卷，《宋武臣传》穴砚斋史抄本。
〔宋〕周密，《癸辛杂识》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楼钥，《北行日录》2卷，知不足斋本。
〔宋〕文惟简，《虏廷事实》1卷，说郛本。
〔宋〕谢枋得，《碧湖杂记》1卷，学海类编本。
〔宋〕袁褧、袁颐，《枫窗小牍》2卷，说郛本。
〔宋〕王明清，《挥麈录》10卷，上海书店标点本。
〔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1卷，涵芬楼秘笈本。
〔宋〕孟珙，《蒙鞑备录》1卷，丛书集成本。
〔宋〕彭大雅，《黑鞑事略》1卷，丛书集成本。
〔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10卷，守山阁丛书本。
〔宋〕佚名，《使辽录》1卷，说郛本。
〔宋〕道宣，《续高僧传》31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刘祁，《归潜志》14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佚名，《大金弔伐录》4卷，守山阁丛书本。

〔金〕张存惠，《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四部丛刊本。

〔夏〕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残本1卷，嘉草轩丛书。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3卷，知不足斋本。

〔元〕李翀，《日闻录》1卷，守山阁丛书本。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23卷，台湾影印文渊阁本。

〔元〕佚名，《圣武亲征录》，海宁王忠慤公遗书本。

〔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15卷，台湾影印文渊阁本。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70卷，四部丛刊本。

〔元〕佚名，《元统癸酉进士录》1卷，宋元科举三录本。

〔元〕王士点，《元秘书监志》1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100册，河北佛协出版社排印本。

〔元〕郭畀，《云山日记》2卷，横山草堂丛书第1集。

〔元〕佚名，《庙学典礼》6卷，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元〕佚名，《通制条格》30卷，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元〕孔克齐《至正直记》4卷，清毛氏抄本。

〔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1卷，知不足斋本。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1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2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3卷，四部丛刊本。

〔元〕钟嗣成，《录鬼簿》2卷，巴蜀书社点校本。

〔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8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火源洁，《华夷译语》不分卷，涵芬楼秘笈本第4集。

〔明〕杨慎，《丹铅续录》8卷，涵芬楼秘笈本。

〔明〕胡侍，《真珠船》6卷，涵芬楼秘笈本。

〔明〕茅瑞徵，《东夷考略》4卷，玄览堂丛书本。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24卷，《志余》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明〕方凤，《夷俗考》1卷，涵芬楼秘笈本。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109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陈士龙，《姓觿》18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张穆，《蒙古游牧记》1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160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36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沈曾植，《海日楼扎丛》8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清〕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20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丁靖，《宋人轶事汇编》2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周春，《西夏书》10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36卷，宁夏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清〕戴锡章，《西夏纪》28卷，宁夏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民国〕洪钧，《元史译文证补》30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137卷，日本国书刊行会铅印本。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100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近人〕袁珂校注，《山海经》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晋〕常璩，《华阳国志》12卷，巴蜀书社标点本。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樊绰，《蛮书》1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孛兰肸，《元一统志》10卷辑本，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李贤，《明一统志》90卷，三秦出版社影印本。
〔明〕陈循，《寰宇通志》119卷，玄览堂丛书本。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560卷，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二十三年版。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13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景定〕《建康志》50卷，宋元方志丛刊本。
〔淳熙〕《新安志》10卷，附录1卷，宋元方志丛刊本。
〔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辑校本。
〔至顺〕《镇江志》21卷，宋元方志丛刊本。
〔至正〕《金陵新志》15卷，宋元方志丛刊本。

〔至正〕《昆山郡志》6卷，宋元方志丛书本。

〔至正〕《四明续志》12卷，宋元方志丛书本。

〔延祐〕《四明志》20卷，宋元方志丛书本。

〔洪武〕《苏州府志》50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洪武十二年抄本。

〔成化〕《河南总志》20卷，明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成化〕《中都志》10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成化〕《山西通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弘治〕《建宁府志》60卷，明弘治六年刻本。

〔弘治〕《保定郡志》25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弘治〕《宁夏府志》8卷，宁夏图书馆藏抄本。

〔弘治〕《延安府志》8卷，陕西省图书馆影印北图胶片。

〔弘治〕《温州府志》22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点校本。

〔弘治〕《八闽通志》87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正德〕《大名府志》11卷，明正德十年刻本。

〔正德〕《绛州志》7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正德〕《姑苏志》60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正德〕《建昌府志》19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正德〕《云南志》44卷，明嘉靖三十二年翻刻本。

〔嘉靖〕《浙江通志》110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嘉靖〕《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刻本。

〔嘉靖〕《山东通志》40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河间府志》28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归德志》8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抚州府志》16卷，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嘉靖〕《真定府志》33卷，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嘉靖〕《高唐州志》7卷，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嘉靖〕《浚县志》2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辽东志》9卷，附图1卷，辽海丛书本。

〔嘉靖〕《全辽志》6卷，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嘉靖〕《罗川志》4卷，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嘉靖〕《赣州府志》12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青州府志》18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广西通志》60 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嘉靖〕《鲁山县志》10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获鹿县志》12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柘城县志》10 卷，明嘉靖三十三年抄本。
〔嘉靖〕《太原县志》6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嘉靖〕《许州志》8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
〔嘉靖〕《曲沃县志》5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续编本。
〔嘉靖〕《开州志》8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
〔嘉靖〕《内黄县志》9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
〔嘉靖〕《宁夏新志》8 卷，宁夏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嘉靖〕《内黄县志》9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隆庆〕《仪真县志》14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隆庆〕《岳州府志》18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隆庆〕《赵州志》10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天启〕《慈溪县志》16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明天启刊本。
〔万历〕《广西通志》42 卷，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万历〕《潼川府志》54 卷，明万历四十七年刻本。
〔万历〕《宁国府志》10 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万历〕《杭州府志》101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万历七年刻本。
〔万历〕《金华府志》30 卷，台北中国史学丛书影印万历六年刊本。
〔万历〕《云南通志》17 卷，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30 卷，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万历〕《重刊甘镇志》6 卷，甘肃省图书馆藏顺治十四年本。
〔万历〕《湖广总志》98 卷，明万历十九年刻本。
〔万历〕《绍兴府志》50 卷，台北影印万历十五年刻本。
〔万历〕《朔方新志》5 卷，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万历〕《泽州志》18 卷，明万历三十九年续修本。
〔万历〕《平阳府志》10 卷，清顺治二年修补本。

〔万历〕《任丘志》8卷，明万历六年刻本。
〔万历〕《永城县志》6卷，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
〔万历〕《宁都县志》8卷，明万历二十年刻本。
〔崇祯〕《太仓州志》15卷，清康熙十七年补刻本。
〔明〕何乔远，《闽书》15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明〕何景明，《雍大记》36卷，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
〔康熙〕《昌平州志》26卷，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雍正〕《浙江通志》280卷，乾隆元年刻本。
〔雍正〕《畿辅通志》120卷，雍正十三年刻本。
〔雍正〕《陕西通志》100卷，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乾隆〕《五凉全志》不分卷，台北影印乾隆十四年刻本。
〔乾隆〕《宁夏府志》22卷，宁夏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乾隆〕《保德州志》13卷，清乾隆五十年增刻本。
〔乾隆〕《府谷县志》4卷，台北影印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乾隆〕《西安府志》，三秦出版社点校本。
〔乾隆〕《诸暨县志》44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乾隆〕《大同府志》32卷，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本。
〔乾隆〕《任邱县志》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乾隆〕《池州府志》58卷，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乾隆〕《甘州府志》16卷，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乾隆〕《武威县志》1卷，台北影印乾隆十四年刻本。
〔嘉庆〕《河套志》6卷，清乾隆七年刻本。
〔嘉庆〕《灵州志》4卷，宁夏历代方志萃编本。
〔嘉庆〕《临桂县志》32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嘉庆〕《义乌县志》22卷，嘉庆七年刊本。
〔道光〕《神木县志》8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道光〕《榆林府志》50卷，台湾学生书局新修方志丛刊本。
〔道光〕《兰州府志》12卷，道光十三年刻本。
〔道光〕《巨野县志》24卷，道光二十六年续修刻本。
〔同治〕《番禺县志》56卷，清同治十年刻本。

〔同治〕《广信府志》12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光绪〕《利津县志》10 卷，光绪九年刻本。
〔光绪〕《海城县志》10 卷，宁夏图书馆 1962 年油印本。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2 卷，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光绪〕《慈溪县志》56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光绪〕《肃州新志》不分卷，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光绪〕《处州府志》30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光绪〕《甘肃全省新通志》100 卷，1909 年坊刻本。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380 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宣统〕《郿县志》18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民国〕《台州府志》140 卷，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神木乡土志》4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三秦出版社点校本。
〔清〕康基田，《晋乘搜略》32 卷，嘉庆十六年霞荫堂藏版。
〔清〕黄叔敬，《中州金石考》8 卷，顾氏金石舆地丛书第 1 集。
〔清〕陈棨仁，《闽中金石略》15 卷，菽庄丛书本。
〔清〕叶昌炽，《语石》10 卷，宣统元年刊本。
〔清〕毕沅，《关中金石志》8 卷，经训堂丛书刊本。
〔清〕佚名，《道孚风俗纪略》不分卷，清抄本。
〔清〕熊象阶，《浚县金石录》2 卷，台湾石刻史料新编本。
〔清〕王昶，《金石萃编》160 卷，光绪癸巳本。
〔清〕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台湾石刻史料新编本。
〔清〕夏宝晋，《山右金石录》1 卷，顾氏金石舆地丛书第 1 集。
〔民国〕《新修张掖县志》12 卷，1975 年张掖县铅印本。
〔民国〕沈涛，《常山贞石志》10 卷，台湾石刻史料新编本。
〔民国〕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3 卷，云窗丛刻本。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 年。
桂林文管会编，《桂林石刻》，桂林文管会内部出版，1974 年。
政协新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新安散存石刻辑录》，2003 年。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10 卷，民国三十二年刻本。

〔民国〕罗振玉，《西陲石刻录》不分卷，云窗丛刻本。
〔清〕康熙敕修，《全唐诗》90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董浩编，《全唐文》1000 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清〕庄仲方编，《金文雅》16 卷，清光绪江苏书局重刻本。
〔元〕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50 卷，四部精要本。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3 集、癸集，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元稹，《元氏长庆集》6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71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杜牧，《樊川文集》2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沈亚之，《沈下贤集》2 卷，四部丛刊本。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20 卷，国学基本丛书本。
〔宋〕田锡，《咸平集》30 卷，宋人集本。
〔宋〕曾巩，《隆平集》20 卷，七业堂刊本。
〔宋〕胡宿，《文恭集》40 卷，四部丛刊本。
〔宋〕余靖，《武溪集》20 卷，广东丛书本。
〔宋〕苏舜卿，《苏舜卿集》16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刘敞，《公是集》54 卷，丛书集成本。
〔宋〕宋祁，《景文集》62 卷，丛书集成本。
〔宋〕王珪，《华阳集》40 卷，丛书集成本。
〔宋〕苏东坡，《东坡七集》115 卷，四部备要本。
〔宋〕范纯仁，《范忠宣集》20 卷，岁寒堂刊本。
〔宋〕李纲，《梁溪全集》18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郑獬，《郧溪集》28 卷，湖北先正遗书本。
〔宋〕翟汝文，《忠惠集》11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宋庠，《元宪集》36 卷，四库珍本。
〔宋〕张舜民，《画墁集》9 卷，丛书集成本。
〔宋〕王安石，《临川集》100 卷，四部丛刊本。
〔宋〕刘攽，《彭城集》40 卷，武英殿聚珍本。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55 卷，四库珍本。
〔宋〕吕颐浩，《忠穆集》8 卷，四库珍本。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集》70卷，四部丛刊本。

〔宋〕曾巩，《曾巩集》（《元丰类稿》）5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宋〕王尧臣，《王尧臣文集》，引《永乐大典》卷8413兵字。

〔宋〕李复，《潏水集》16卷，四库珍本。

〔宋〕刘一止，《苕溪集》55卷，四库珍本。

〔宋〕刘安世，《尽言集》13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72卷，中华书局校点本。

〔宋〕韩维，《南阳集》31卷，四库珍本。

〔宋〕王安中，《初寮集》8卷，四库珍本。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上、下册，凤凰出版社点校本，2004年。

〔宋〕鲁言编，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40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韩琦，《安阳集》5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韩琦，《韩魏公集》20卷，正谊堂康熙刻本。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作《传家集》）80卷，四部丛刊本。

〔宋〕苏辙，《栾城集》96卷，四部丛刊本。

〔宋〕夏竦，《文庄集》36卷，四库珍本。

〔宋〕张方平，《乐全集》40卷，四库珍本。

〔宋〕蔡襄，《端明集》（一作《蔡忠惠集》）36卷，四库珍本。

〔宋〕文彦博，《文潞公集》40卷，山右丛书本。

〔宋〕尹洙，《尹河南集》27卷，四部丛刊本。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153卷，四部丛刊本。

〔宋〕杨亿，《武夷新集》2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晁说之，《嵩山文集》20卷，四部丛刊续编本。

〔宋〕王禹偁，《小畜集》30卷，四部丛刊本。

〔宋〕刘挚，《忠肃集》20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秦观，《淮海集》40卷，四部丛刊本。

〔宋〕袁燮，《絜斋集》24卷，武英殿聚珍本。

〔宋〕郑刚中，《北山集》3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李石，《方舟集》24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范浚，《香溪集》22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周必大，《文忠集》20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楼钥，《攻媿集》120卷，四部丛刊本。
〔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15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许翰，《襄陵文集》12卷，四库珍本。
〔宋〕张咏，《乖崖集》12卷，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畿辅丛书本。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30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50卷，四部丛刊本。
〔元〕虞集，《道园类稿》50卷，北图藏元刊本。
〔元〕程钜夫，《雪楼集》30卷，四部丛刊本。
〔元〕姚燧，《牧庵集》25卷，丛书集成本。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31卷，四部丛刊本。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9卷，四部丛刊本。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49卷，乾隆万氏刻本。
〔元〕许有壬，《至正集》81卷，宣统石印本。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100卷，四部丛刊本。
〔元〕柳贯，《柳待制集》20卷，四部丛刊本。
〔元〕刘岳申，《申斋集》15卷，元人珍本文集汇刊本。
〔元〕刘壎，《水云村稿》15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刘将孙，《养吾斋集》32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1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10卷，四部丛刊本。
〔元〕李士瞻，《经济文集》6卷，湖北先正遗书本。
〔元〕陈基，《夷白斋稿》35卷，四部丛刊本。
〔元〕傅若金，《傅与砺诗文集》，嘉业堂丛书本。
〔元〕元明善，《清河集》8卷，藕香零拾本。
〔元〕徐一夔，《始丰稿》14卷，武林往哲遗著本。
〔元〕杨维桢，《铁崖文集》6卷，四部丛刊本。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50卷，四部丛刊本。

〔元〕马祖常，《石田文集》15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王沂，《伊滨集》24 卷，四库珍本。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30 卷，四部丛刊本。
〔元〕吴海，《闻过斋集》8 卷，嘉业堂丛书本。
〔元〕萨都拉，《雁门集》14 卷，古典文学丛书本。
〔元〕吴当，《学言稿》6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邓文原，《巴西文集》1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胡行简，《樗隐集》6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宋褧，《燕石集》15 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元〕释大䜣，《蒲室集》15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26 卷，怡山堂丛书本。
〔元〕戴表元，《剡源集》30 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元〕王逢，《梧溪集》8 卷，知不足斋本。
〔元〕贡师泰，《玩斋集》15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杨维桢，《西湖竹枝集》1 卷，武林掌故丛编本。
〔元〕许有壬，《圭圹小稿》13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10 卷，四部丛刊本。
〔元〕丁鹤年，《鹤年诗集》3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舒頔，《贞素斋文集》8 卷，道光戊戌刻本。
〔元〕杨崇喜，《述善集》3 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校注本。
〔元〕郑元祐，《山樵杂录》（一作《遂昌杂录》）不分卷，说郛本。
〔元〕乃贤，《金台集》2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王毅，《木讷斋文集》6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14 卷，四部丛刊本。
〔元〕顾瑛，《草堂雅集》1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顾瑛，《玉山名胜集》全 2 册，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王翰，《友石山人遗稿》1 卷，嘉业堂丛书本。
〔元〕陈旅，《安雅堂集》13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张昱，《可闲老人集》4 卷，四库珍本。
〔元〕杨瑀，《山居新话》4 卷，知不足斋本。

〔元〕倪瓒，《清秘阁集》12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75 卷，四部丛刊本。

〔明〕杨慎，《升庵集》81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张景春，《吴中人物志》13 卷，扬州古籍书店影印万历本。

〔明〕王称，《虚舟集》5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王祎，《王忠文公集》25 卷，金华丛书本。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10 卷，明人文集丛刊本。

〔明〕陶宗仪，《辍耕录》30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叶子奇，《草木子》4 卷，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程敏政，《皇明文衡》100 卷，四部丛刊本。

〔明〕程敏政，《宋遗民录》15 卷，知不足斋本。

〔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100 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唐肃，《丹崖集》8 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权衡，《庚申外史》2 卷，涵芬楼秘笈本。

〔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2 卷，涵芬楼秘笈本。

〔清〕张澍，《养素堂文集》36 卷，道光十七年刻本。

〔清〕汪森，《粤西文载》75 卷，广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二、今人著作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采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3 卷 9 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白滨、史金波、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8 卷，法律出版社，1999 年。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年。

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年。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 年。
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丹珠昂奔，《藏族神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4 册，中华书局，1958 年。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1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甲，1932 年。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2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乙，1933 年。
王颋，《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王颋，《内陆亚洲史地求索》，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年。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第 4 卷第 3 号，1932 年。
《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 年。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 年。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 年。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蔡美彪，《中国通史》第 6 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李范文编，《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
林旅芝，《西夏史》，香港，1975 年。
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7 年。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年。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 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韩世明，《辽金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 年。
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 年。
尚衍斌，《元代畏吾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 年。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 年。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敦煌资料》第 1 辑，中华书局，1961 年。
邓广铭，《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
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第 2 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华祖根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第 3 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
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
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 年。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平励耘书屋，1935 年。
萧启庆，《元朝史新论》，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9 年。
萧启庆，《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 年。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 年。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 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 年。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 年。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张博泉，《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
陈序经，《东南亚史研究论文集》，海天出版社，1998 年。
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 年。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 年。

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年。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李范文、中嶋幹起编著，《西夏文杂字研究》，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7 年。

福幢著，上官剑壁译，《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年。

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木雅贡布，《博·贡嘎活佛传》，民族出版社，1997 年。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松巴堪钦·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年。

道润梯步译注，《蒙古秘史》12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年。

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蒙古源流》8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何锐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 年。

〔意〕马可孛罗著，冯承钧译，《马可孛罗游记》，上海书店，1999 年。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 年。

〔俄〕A.Ю 雅库博夫斯基著，魏英邦译，《十一至十三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科学出版社，1959 年。

〔意〕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 年。

〔法〕贝凯，韩百诗译注，耿昇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美）柔克义译注，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 年。

〔日〕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 27，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 年。

〔日〕冈崎精郎，《党项习惯法与西夏法典》，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1968年。

〔日〕冈崎精郎，《西夏之李元昊与秃发令》，《东方学》第19辑，1959年。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の研究：西夏语的再构成与西夏文字的解读》Ⅰ-Ⅱ，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64—1966年。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昭和61年（1986）。

〔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法〕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5年。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俄〕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著，崔红芬、文志勇译，《西夏物质文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

〔俄〕科兹洛夫著，王希隆译，《蒙古、安多与死城哈喇浩特》，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4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2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佚名著，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俄〕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 аппарате Си Ся. Публика- ция.（КСИНА. 69）

〔俄〕Е. И. Кычан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俄〕Е.И.Кычанов: Море значений,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святым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Центр《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7.

〔美〕H.D. Martin：The Mongol wars with Hsi Hsia（1205—1227），JRAS.1942.

〔俄〕Е. И. Кычанов: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а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р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1149—1169）, Москва, 1988.

〔俄〕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ё фонды,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а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人名部族名索引

A

B

C

D

E

F

G

H

M

N

Q

R

Y

后 记

1992年，学界友人言：何不将你的西夏史研究出个集子？虽然心动，但始终未敢实施。担心的是，看的书不够，特别是宋元集部、明清方志及金石之书有多种未能经眼寓目。资料搜集不全，贸然出书，白纸黑字，传于后世，恐留太多遗憾。别人评价如何，余不会过多去想，但自己必须尊重自己。人之遭毁者，非毁于人，乃毁于己也。经过近五年时间的磨砺，余从六十余篇党项、西夏史研究论文中挑选二十一篇，并进行认真仔细的史料复查，版本核对，还对多处文字进行了修改补充，总算拿出了余之第一部《党项西夏史探微》。如有可能的话，过七八年，再完成一部，即可了结余对西夏史的研究情结。"人生易老天难老"，倏忽之间，党项、西夏史研究余已走过了二十四五年，虽不是一直停驻于这一领域，但这"小番、杂虏"、朔漠孤烟之情，始终未能忘怀，去岁梦中尚念"金帐人趋新党项，尘寰谁识病维摩？"（萨都剌《雁门集》卷二《休上人见访》）南下羊城，虽有十余载，但始终没有苏大学士之浪漫情怀，吃三百颗荔枝就愿"长作岭南人"。倒霉的是，余连三颗荔枝都不敢吃，吃了就上火，故至今未成一真正的岭南人。这恐怕也与余之学业长期游弋在西域南海之间有关。

于己而言，这部集子是经过余精心挑选，有几篇早期作品，今日看来，觉得是有些不太成熟，但余还是收进此集，主要想反映余之研究经历与变化。余之西夏史研究，不敢自诩为"上乘"，但有一点却敢肯定，这里面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东西：有些观点是前人研究成果的发展，有些结论则是个人独到的创见；余亦不敢标榜这些观点和结论就一定正确，但不讲无证之言，不下无据之论，在基本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层面上进行严肃学术研究，余丝毫不敢作轻忽文字和应景文章。特别是对汉文西夏新史料的发掘，余自以为

用力尚勤。

在以往的学术研讨中，余同许多前辈学者或同辈学者针对西夏史研究中很多疑难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些讨论直到今天尚未结束。所幸的是，正常的学术争论引致的是相互之间更为频密的学术交往及学术友谊，如：余与史金波、白滨先生的讨论，与吴天墀先生的讨论及与陈炳应先生的讨论，甚至与余师金宝祥先生及李蔚先生的讨论，均使我们的交往友谊日渐加深。

西夏史研究虽前后加起来做了二十多年，但深感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有的问题通过不断地深入探索，不断有新考古资料的发现，以致越来越接近问题的解决，如党项拓跋氏族属问题。有的问题则感到无法解决。从文献上讲，有汉文资料与西夏文、藏文，甚至突厥、回鹘文资料的勘比问题，各种文字资料歧异太大，究竟应以何种文字资料记录为准？即使是汉文文献，也有正史同野史、杂史、文集、笔记及方志资料的冲突问题，何种资料记录某事更为准确真实，是研究者必须极为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还有，研究西夏史不能不用的吴广成《西夏书事》一书，是一部清代人撰写的西夏历史，严格来讲，对于西夏史研究而言，吴氏书只能算作第二手资料。然而，该书中不仅保存了许多今天已经散佚的文献资料，如刘温润的《西夏须知》、佚名《夏台事迹》及刘涣《西行记》等宋人著作之残存，而且，吴氏书中还有一大批没有标出书名的史实记录，在今天的文献中找不到出处，很可能就是吴广成在清代还可以看到的许多文献今天已经散佚，故对吴广成《西夏书事》一书应予以特殊的重视，考证出那些未注书名的史料真实与否，以落实吴氏之书的史料价值。

从研究问题上讲，余认为有些重大问题是从目前已有的西夏史料中无法解决的。如西夏的社会性质，完整系统的西夏政治制度、西夏军事制度及西夏经济发展，甚至西夏社会的民族分布、人口发展等问题，因为可供研究的史料实在有限。如果一定要依据这些少得可怜的史料对西夏社会定性，并写出一部部西夏政治制度史、西夏军事制度史及西夏经济发展史来，一定会去真实很远。西夏史本来就是一部“断烂朝报”，故西夏史的研究很多均只能局限在某些局部上，而无法完成一个整体。这是余之一点不成熟意见。现阶段的西夏史研究应如何深化？进一步发掘汉文文献史料，准确翻译现存西夏文和藏文史料，继续深入对西夏史的各个局部或细节展开专题研究，部分地

还原西夏之历史，仅此而已。余所作的研究也大都如此。提出问题不少，解决问题不多，但给后来的研究者至少提供相当数量的历史数据和基础史料。做到这一点，于愿足矣。

本书的完成，先后获得不少师长及师兄弟的指点与帮助，如金宝祥先生、陈高华先生、李蔚先生、周伟洲先生、史金波先生、白滨先生、黄振华先生、陈炳应先生、耿昇先生、荣新江先生、聂鸿音先生、马明达先生、王颋先生、曾瑞龙先生及日本西田龙雄先生、美国邓如萍女士等，一并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不幸的是，上述金宝祥先生、黄振华先生、陈炳应先生及曾瑞龙先生均先后逝世，深感悲切，并在此予以哀悼。

乙酉年春于广州暨南大学小万卷楼

后记补：

当本书简体字版将要面世时，为拙著推荐出版并撰写序言的萧启庆教授已于壬辰年孟冬离开人世。萧先生不仅是余之师长，且多有恩于余。萧先生离世，令人怅惘不已。近两三年，学术界与余关系洽睦，多有交往，且为余钦崇膺服的师辈人物先后逝世。先是陈师学霖，继则萧师启庆，今又黄师时鉴，接二连三，巨匠星陨。呜呼！天道兮不仁，哲人兮短辰。恩师湮没，永往难追。

癸巳年仲春

于澳门氹仔澳门大学珍禧楼